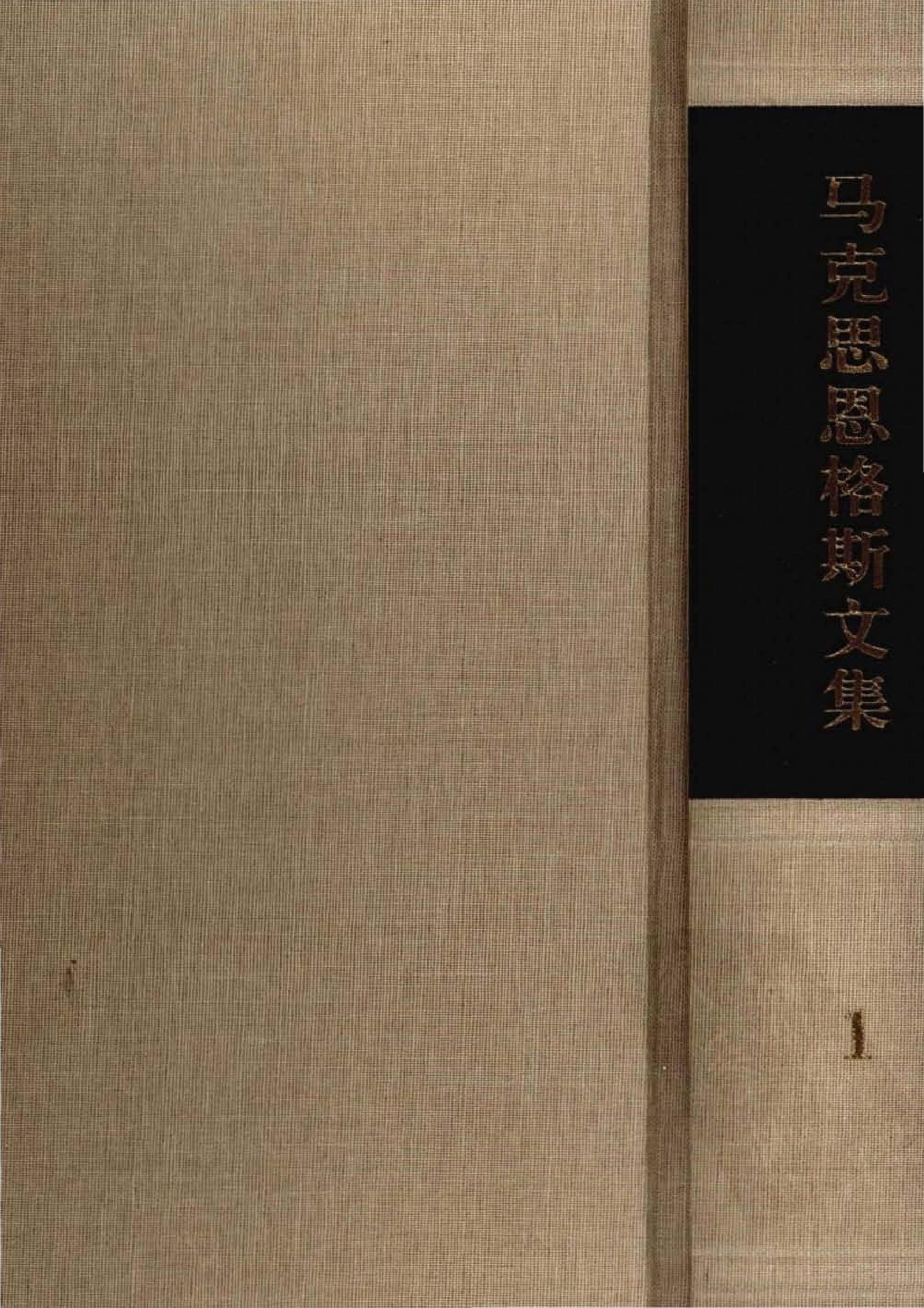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1

1843—1848年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统筹：曹　春
编辑助理：崔继新
技术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吴海平　赵立新　徐林香　张　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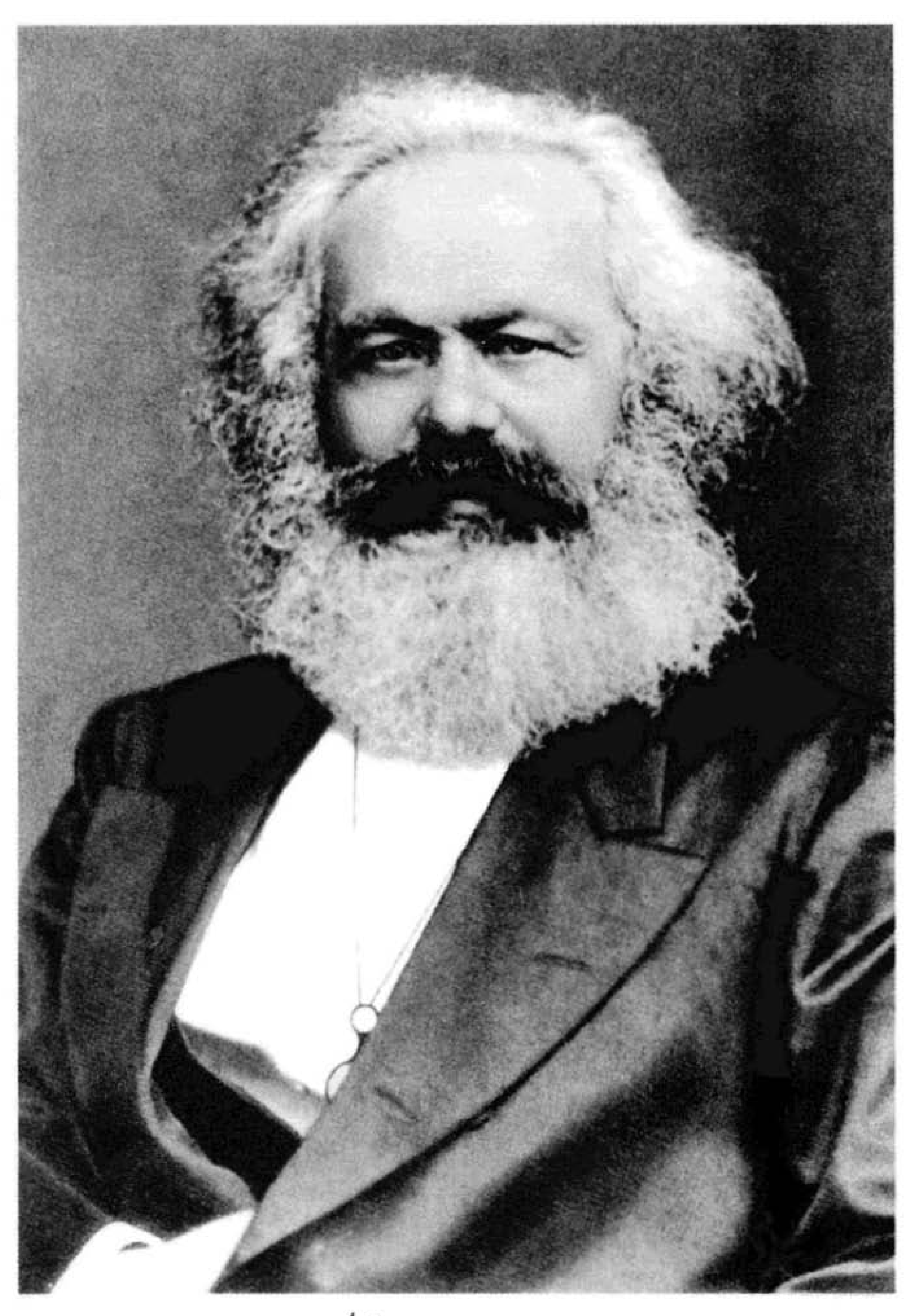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01-008461-9

Ⅰ.马…　Ⅱ.中…　Ⅲ.马恩著作—文集　Ⅳ.A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4139号

书　　名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MAKESI ENGESI WENJI
　　　　　第一卷
编 译 者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6)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60
字　　数　781千字
书　　号　ISBN 978-7-01-008461-9
定　　价　118.00元





Karl Marx



F Engels

编辑说明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旨在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为了编辑这部文集，经中共中央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由中央编译局组织实施。

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为十卷，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写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文集的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法学、史学、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的著作按编年和重要专著单独设卷相结合的方式编排：第一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至1848年期间的著作；第二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9年期间的著作；第三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至1883年期间的著作；第四卷收入恩格斯在1884年至1895年期间的著作；第五、六、七卷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第八卷为《资本论》手稿选编；第九卷收入恩格斯的两部专著《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第十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选编。

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著作的译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课题组根据最权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对全部译文重新作了审核和修订。校订所依据的外文版本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莫斯科、伦敦、纽约）。部分文献还参照了国外有关机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编辑出版的专题文集和单行本。

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各卷均附有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和名目索引，第十卷还附有《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课题组对原有的各类资料作了审核和修订，力求资料更翔实、考证更严谨。在注释部分，重新编写了全部著作的题注，增加了对各篇著作主要理论观点的介绍，以便读者把握这些著作的要义。在对各篇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流传情况的介绍中，增加了对重要著作中译本出版情况的介绍，以便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些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技术规格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相关规定：在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 ]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未注明“编者注”的脚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注。

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对文集的整体方案、各卷文献篇目、译文修订标准以及各篇著作的题注进行了认真审议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对提高文集编译工作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目　　录

插　图

第一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选收马克思和恩格斯1843—1848年的著作，以及他们后来为一些著作写的序言和导言。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推进，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显现，工人阶级在大工业发展进程中不断壮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封建专制制度而进行革命斗争。这一切为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诞生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工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创立科学的理论体系。

本卷开篇部分选收的三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阐明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本质，揭示了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特征，提出了推翻这一反动制度的战斗任务，论述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同时首次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论述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本质特征，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历史局限性和虚伪性，强调消灭私有制并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评

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影响，分析和批判了它的主要范畴，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表现，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全面变革现存的社会关系，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三篇文章写于1843年至1844年初。在此期间，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实践中为无产阶级锻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本卷收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马克思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各种历史文献和思想观点进行系统研究和批判的最初成果。在这部手稿中，他论述了劳动对于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造成劳动的异化，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工人阶级必须采取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打碎私有制的桎梏，使本阶级和整个社会获得解放。手稿围绕这一基本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学观点、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观点。

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实现共同的理想而结成深厚友谊，开始了密切的合作。收入本卷的《神圣家族》就是他们在1844年合写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这部著作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初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指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物质生产而不是自我意识，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阐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瓦解的历史趋势，强调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论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

历史地位和进步意义，阐明了唯物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联系。这部著作为全面阐述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研究中高度重视对社会状况的考察，以便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确凿可靠的事实基础上。恩格斯在1844—1845年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这方面的范例。这部著作以生动具体的材料展现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惨遭剥削和压迫的情景，揭示了工人遭受蹂躏的社会根源，并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必然会促使他们奋起抗争，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创建新社会的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决批判唯心主义，一方面自觉地同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1845年春，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作用的主要缺点，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哲学家们过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认为，《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阐述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的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对唯物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他们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指出研究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科学的历史观的前提，论述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论证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阐述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

必然性；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建设新社会并在斗争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任务，同时强调未来新社会的创建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这个新世界观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1847年，马克思撰写了《哲学的贫困》。他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蒲鲁东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散布的取消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观点，批判了他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进一步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以及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对抗性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尖锐化，资本主义终将为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新社会所代替，而工人阶级就是实现这一历史性变革的伟大革命阶级。这部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包含着后来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他们在这个时期同工人阶级革命团体建立并保持广泛联系，使自己的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导和支持下，1847年成立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收入本卷的《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为同盟撰写的纲领草案，是《共产党宣言》的重要准备著作。恩格斯在这篇文献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历史的发展决定了无产阶级必将完成埋葬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使命。恩格斯强调废除私有制是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要求，同时阐明了消灭私有制的历史条件，论述了共产主义者的斗争道路和策略原则，并科学地预言了未来新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

本卷还选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重

要论著和演说。恩格斯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阐明了无产阶级在工业革命中诞生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论述了科学进步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阐述了共产主义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波兰的演说》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论述了以剥削雇佣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阐述了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科学论证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重要思想。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贸易自由”实质上就是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自由，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这些论著和演说从不同角度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和科学性。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43—1848年



卡·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

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谬误在**天国**为神祇所作的雄辩[oratio pro aris et focis①]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一个人，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假象**，只去寻找非人了。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Point-d'honneur]，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

①见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直译是：为保卫祭坛和炉灶所作的雄辩；转义是：为保卫社稷和家园所作的雄辩。——编者注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2]——这是为这项工作尽的一份力——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一探讨是联系**德国**进行的。

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status quo]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

发辫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①,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

不错,德国历史自夸有过一个运动,在历史的长空中,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是这个运动的先行者,将来也不会是这个运动的模仿者。我们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敢于进行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种情形下,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害怕了,在第二种情形下,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害怕。我们,在我们的那些牧羊人带领下,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

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有个学派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鞭子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的鞭子——的每一声呐喊都宣布为叛乱;正像以色列人的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历史对这一学派也只是显示了自己的后背[a posteriori]②,因此,这个**历史法学派**[3]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杜撰,那就是它杜撰了德国历史。这个夏洛克,却是奴才夏洛克,他发誓要凭他所持的借据,即历史的借据、基督教日耳曼的借据来索取从人民胸口割下的每一磅肉。

相反,那些好心的狂热者,那些具有德意志狂的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寻找我们的自由历史。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谁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唤什

①1789年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4年)开始的年份。——编者注

②《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第23节。——编者注

么，森林就发出什么回声。还是让条顿原始森林保持宁静吧！

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而是既应当受到鄙视同时又已经受到鄙视的**存在状态**。对于这一对象，批判本身不用自己表明什么了，因为它对这一对象已经清清楚楚。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

这是指描述各个社会领域相互施加的无形压力，描述普遍无所事事的沉闷情绪，描述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狭隘性，而且要在政府制度的范围内加以描述，政府制度是靠维护一切卑劣事物为生的，它本身无非是**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劣事物**。

这是一幅什么景象呵！社会无止境地继续分成各色人等，这些心胸狭窄、心地不良、粗鲁平庸之辈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这些人正因为相互采取暧昧的猜疑的态度而被自己的**统治者**一律——虽然形式有所不同——视为**特予恩准的存在物**。甚至他们还必须承认和首肯自己之**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而另一方面，是那些统治者本人，他们的身价与他们的人数则成反比！

涉及这个内容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而在搏斗中，问题不在于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旗鼓相当，是否**有趣**，问题在于给敌人以**打击**。问题在于不让德国人有一时片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

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partie honteuse]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则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的决定性原因。

甚至对**现代**各国来说，这种反对德国现状的狭隘内容的斗争，也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对当代德国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而对过去的回忆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自己的**悲剧**的旧制度，现在又作为德国的幽灵在演自己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人突然产生的想法的时候，简言之，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必定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相反，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假象**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4]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已经悲剧性地因伤致死的希腊诸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

性地重死一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进程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政治力量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

可是,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开始是以何种形式引起德国人的关注的呢?以**保护关税、禁止性关税制度、国民经济学**[5]的形式。德意志狂从人转到物质,因此,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在某个早晨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所以在德国,人们是通过给垄断以**对外的统治权**,开始承认垄断有对内的统治权的。可见,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好不容易才敢于从**狡猾的**理论①向最无情的实践过渡。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因此,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那里,正涉及解决问题;这里,才涉及冲突。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说明我们的历史就像一个不谙操练的新兵一样,到现在为止只承担着一项任务,那就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

---

①德文*listige* Theorie(狡猾的理论)在这里是双关语,暗示弗·李斯特的保护关税宣传,特别是指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listige(狡猾的)和List(李斯特)读音相近。——编者注

因此，假如德国的**整个**发展没有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那么德国人对当代问题的参与程度顶多也只能像**俄国人**一样。但是，既然单个人不受国界的限制，那么整个国家就不会因为个人获得解放而获得解放。希腊哲学家中间有一个是西徐亚人[6]，但西徐亚人并没有因此而向希腊文化迈进一步。

我们德国人幸而不是西徐亚人。

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œuvres incomplètes]，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œuvres posthumes]——**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that is the question①]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在先进国家，是同现代国家制度**实际**分裂，在甚至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德国，却首先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批判地**分裂。

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把自己这种梦想的历史一并归入自己的现存制度，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他们的未来既不能**局限于**对他们现实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局限于**他们观念上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实现，因为他们观念上的制度就具有对他们现实的制度的直接否定，而他们观念上的制度的直接实现，他们在观察邻近各国的生活的时候几乎已经**经历过了**。因此，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

---

①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编者注

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错误的因素是**相反的。**

该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该派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尽管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定是正确的——相反地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关于这一派，我们留待以后作更详细的叙述。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7]

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8]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正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如果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它的现实仍然是彼岸世界，虽然这个彼岸世界也只在

莱茵河彼岸——的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只是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那么反过来说，**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是这些国家的**理论良心**。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因此，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现状表现了旧制度的**完成**，即表现了现代国家机体中这个肉中刺的完成，那么**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

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

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啊！人家要把你们当人看哪！"

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9]。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

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但是，新教即使没有正确解决问题，毕竟正确地提出了问题。现在问题已经不再是世俗人同**世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而是同他**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同他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如果说新教把德国世俗人转变为僧侣，就是解放了世俗教皇即**王公**，以及他们的同伙即特权者和庸人，那么哲学把受僧侣精神影响的德国人转变为人，就是解放**人民**。但是，正像解放不应停留于王公的解放，财产的**收归俗用**[10]也不应停留于**剥夺教会财产**，而这种剥夺是由伪善的普鲁士最先实行的。当时，农民战争，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因碰到神学而失败了。今天，神学本身遭到失败，德国历史上最不自由的实际状况——我们的现状——也会因碰到哲学而土崩瓦解。宗教改革之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仆。而在德国发生革命之前，它则是小于罗马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忠顺奴仆，是土容克和庸人的忠顺奴仆。

可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

就是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

思想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回答之间有惊人的不一致,与此相应,市民社会[11]和国家之间以及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是否会有同样的不一致呢?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但是,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它怎么能够一个筋斗[salto mortale]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呢?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对德国来说实际上应该看做摆脱自己实际障碍的一种解放,而且应该作为目标来争取。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所应有的前提和基础,看来恰好都不具备。

但是,如果说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那么从另一方面看,它分担了这一发展的**痛苦**,而没有分享这一发展的欢乐和局部的满足。一方面的抽象痛苦同另一方面的抽象活动相适应。因此,有朝一日,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水平以前就处于欧洲瓦解的水平。德国可以比做染上基督教病症而日渐衰弱的**偶像崇拜者**。

如果我们先看一下**德国各邦政府**,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政府由于现代各种关系,由于德国的形势,由于德国教育的立足点,最后,由于自己本身的良好本能,不得不把**现代政治领域**(它的长处我们不具备)的**文明缺陷**同旧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完整地保存着)的**野蛮缺陷**结合在一起。因此,德国就得越来越多地分担那些超出它的现状之上的国家制度的某些方面,即使不是合理的方面,至少也是不合理的方面。例如,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像所谓立宪德国这样,天真地分享了立宪国家制度的一切幻想,而未分享它的现实呢?而德国政

府突发奇想，要把书报检查制度的折磨和以新闻出版自由为前提的法国九月法令[12]的折磨结合在一起，岂不是在所难免！正像在罗马的万神庙可以看到一切民族的**神**一样，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13]可以看到一切国家形式的**罪恶**。这种折中主义将达到迄今没有料到的高度，而一位德国国王①在**政治上**、**审美上的贪欲**将为此提供特别的保证，这个国王想扮演王权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他想，这样做如果不是以人民的名义，便是以他**本人**的名义，如果不是为了人民，便是为**他自己本身**。**德国这个形成一种特殊领域的当代政治的缺陷**，如果不摧毁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特有的障碍。

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要夺取这种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

①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要使**一个**等级被承认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陷就必定相反地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定成为引起普遍不满的等级，成为普遍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定被看做是整个社会中**昭彰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级真正[par excellence]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就必定相反地成为公开的奴役者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消极普遍意义决定了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积极普遍意义。

但是，在德国，任何一个特殊阶级所缺乏的不仅是能标明自己是社会消极代表的那种坚毅、尖锐、胆识、无情。同样，任何一个等级也还缺乏和人民魂魄相同的，哪怕是瞬间相同的那种开阔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对敌人振振有辞地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14]。德国的道德和忠诚——不仅是个别人的而且也是各个阶级的道德和忠诚——的基础，反而是**有节制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表现出自己的狭隘性，并用这种狭隘性来束缚自己。因此，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叙事式的。每个领域不是在受到压力的时候，而是当现代各种关系在没有得到它的支持的情况下确立了一种社会基础，而且它又能够对这种基础施加压力的时候，它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才开始带着自己的特殊要求同其他各种社会领域靠拢在一起。就连**德国中等阶级道德上的自信**也只以自己是其他一切阶级的平庸习性的总代表这种意识为依据。因此，不仅德国国王们登基不逢其时[mal-à-propos]，而且市民社会每个领域也是未等庆祝胜

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有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度的本质，就表现了自己心胸狭隘的本质，以致连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机遇，也是未等它到手往往就失之交臂，以致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因此，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中等阶级还不敢按自己的观点来表达解放的思想，而社会形势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已经说明这种观点本身陈旧过时了，或者至少是成问题了。

在法国，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地位，就足以使他希望成为一切。在德国，一个人如果不想放弃一切，就必须没有任何地位。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在法国，全部自由必须由逐步解放的现实性产生；而在德国，却必须由这种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产生。在法国，人民中的每个阶级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它首先并不感到自己是个特殊阶级，而感到自己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因此，**解放者**的角色在戏剧性的运动中依次由法国人民的各个不同阶级担任，直到最后由这样一个阶级担任，这个阶级在实现社会自由时，已不再以在人之外的但仍然由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为前提，而是从社会自由这一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在德国则相反，这里实际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无实际内容，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

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

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

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虽然不言而喻，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这样一来，无产者对正在生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就同**德国国王**对已经生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一样了。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者就是国王。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

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15]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

载于1844年2月《德法年鉴》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卷翻译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herausgegeben

von

Arnold Ruge und Karl Marx.

1ste und 2te Lieferung.

PARIS,

IM BUREAU DER JAHRBÜCHER.	}	RUE VANNEAU, 22.
AU BUREAU DES ANNALES.		

1844

《德法年鉴》杂志的封面



1935年上海辛垦书店出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及其所载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中译文

卡·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16]

(1)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

(2)布鲁诺·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43年在苏黎世—温特图尔出版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第56—71页。

一

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

德国的犹太人渴望解放。他们渴望什么样的解放?**公民**的解放,**政治**解放。

布鲁诺·鲍威尔回答他们说:在德国,没有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我们自己没有自由。我们怎么可以使你们自由呢?你们犹太人,要是为自己即为犹太人要求一种特殊的解放,你们就是**利己主义者**。作为德国人,你们应该为德国的政治解放而奋斗;作为人,你们应该为人的解放而奋斗。而你们所受的特种压迫和耻辱,不应该看成是通则的例外,相反,应该看成是通则的证实。

或者,犹太人是要求同**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享有平等权利?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承认**基督教国家**是无可非议的,也就承认普遍奴役制

度。既然他们满意普遍奴役，为什么又不满意自己所受的特殊奴役呢？既然犹太人不关心德国人的解放，为什么德国人该关心犹太人的解放呢？

基督教国家只知道**特权**。犹太人在这个国家享有做犹太人的特权。作为犹太人，他享有基督徒所没有的权利。那他何必渴望他所没有而为基督徒所享有的权利！

如果犹太人想从基督教国家解放出来，他就是要求基督教国家放弃自己的**宗教**偏见。而他，犹太人，会放弃**自己的**宗教偏见吗？就是说，他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放弃宗教呢？

基督教国家，按**其本质**来看，是不会解放犹太人的；但是，鲍威尔补充说，犹太人按其本质来看，也不会得到解放。只要国家还是基督教国家，犹太人还是犹太人，这两者中的一方就不可能解放另一方，另一方也不可能得到解放。

基督教国家对待犹太人，只能按照基督教国家的方式即给予特权的方式：允许犹太人同其他臣民分离开来，但也让犹太人受到分离开来的其他领域的压迫，何况犹太人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处于**宗教**对立的地位，所受的压迫也更厉害。可是，犹太人对待国家也只能按照犹太人的方式即把国家看成一种异己的东西：把自己想象中的民族跟现实的民族对立起来，把自己幻想的法律跟现实的法律对立起来，以为自己有权从人类分离出来，决不参加历史运动，期待着一种同人的一般未来毫无共同点的未来，认为自己是犹太民族的一员，犹太民族是神拣选的民族。

那么你们犹太人有什么理由渴望解放呢？为了你们的宗教？你们的宗教是国教的死敌。因为你们是公民？德国根本没有公民。因为你们是人？你们不是人，正像你们诉求的对象不是人一样。

——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

鲍威尔批判了迄今为止关于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的提法和解决方案以后，又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问道：应当得到解放的犹太人和应该解放犹太人的基督教国家，二者的**特性**是什么？他通过对犹太人的宗教的批判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分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对立，他说明了基督教国家的本质，——他把这一切都做得大胆、尖锐、机智、透彻，而且文笔贴切、洗练和雄健有力。

那么，鲍威尔是怎样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结论是什么？他对问题的表述就是对问题的解决。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就是对犹太人问题的回答。总之，可简述如下：

我们必须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别人。

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对立。怎样才能消除对立？使它不能成立。怎样才能使**宗教**对立不能成立？**废除宗教**。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们互相对立的宗教只看做**人的精神的不同发展阶段**，看做**历史**撕去的不同的蛇皮，把**人**本身只看做蜕皮的蛇，只要这样，他们的关系就不再是宗教的关系，而只是批判的、**科学的**关系，人的关系。那时**科学**就是他们的统一。而科学上的对立会由科学本身消除。

德国的犹太人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没有得到政治解放和国家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性质。但是，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问题是一个不以德国的特殊状况为转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就是宗教对国家的关系问题、**宗教束缚和政治解放的矛盾**问题。他认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条件，无论对于想要得到政治解放的犹太人，还是对于应该解放别人从而使自己得到解放的国家，都是一样。

“有人说，而且犹太人自己也说：很对，犹太人获得解放，不应当是作为犹太人，不应当是因为他身为犹太人，不应当是因为他具有什么高超的普遍的人的

伦理原则；相反，犹太人自己将退居公民之后，而且也将成为公民，尽管他是而且应当始终是犹太人，这就是说，他是而且始终是犹太人，尽管他是公民，并生活在普遍的人的关系中：他那犹太人的和狭隘的本质最终总要战胜他的人的义务和政治的义务。偏见始终存在，尽管普遍的原则胜过它。但是，既然它始终存在，那么它就会反过来胜过其他的一切。”“只有按照诡辩，即从外观来看，犹太人在国家生活中才能始终是犹太人；因此，如果他想始终是犹太人，那么单纯的外观就会成为本质的东西并且取得胜利，就是说，他在国家中的生活只会是一种外观，或者只是违反本质和通则的一种暂时的例外。”(《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二十一印张》第57页)

另一方面，我们看看鲍威尔是怎样提出国家的任务的。他写道：

“不久以前〈众议院1840年12月26日的辩论[17]〉，法国在犹太人问题上，就像经常[①]在其他一切政治问题上一样，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生活的情景，这种生活是自由的，但又通过法律取消了自己的自由，因此，它宣布这种自由是一种外观，另一方面，又在行动上推翻了自己的自由法律。”(《犹太人问题》第64页)

“在法国，普遍自由还未成为法律，犹太人问题也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法律上的自由——公民一律平等——在生活中受到限制，生活仍然遭到宗教特权的控制和割裂，生活的这种不自由对法律起反作用，迫使它认可：本身自由的公民区分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上]，第65页)

那么，在法国，犹太人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决呢？

“比如说，犹太教徒不让自己的戒律阻止自己履行对国家和对同胞的义务，就是说，例如在犹太教的安息日去众议院并参加公开会议，那他必定不会再是犹太教徒了。任何宗教特权，从而还有特权教会的垄断，必定会被消灭，即使有些人，或者是许多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还认为自己必须履行宗教义务，那也应该看成是纯粹的私事而听其自便。”(第65页)“如果不再存在享有特权的宗教，那就不再有什么宗教。使宗教丧失其专有的势力，宗教就不再存在。”(第66页)“正像马丁·迪诺尔先生把反对在法律中提到礼拜日的建议看成是宣布基督教已经不复存在的提案一样，根据同样的理由(并且这种理由是完全有

①布·鲍威尔原著中写的是：“就像七月革命以来经常……”——编者注

根据的),如果宣告安息日戒律对犹太人不再具有约束力,那就等于宣布取消犹太教。"(第71页)

可见,一方面,鲍威尔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般人放弃宗教,以便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另一方面,鲍威尔坚决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以宗教为前提的国家,还不是真正的、现实的国家。

"当然,宗教观念给国家提供保证。可是,给什么样的国家?给哪一类国家?"(第97页)

这一点暴露了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片面**理解。

只是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批判还应当做到第三点。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①

鲍威尔并没有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因此陷入了矛盾。他提供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是**政治**解放本身的本质引起的。他提出的是一些不包括在他的课题以内的问题,他解决的是一些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的课题。鲍威尔在谈到那些对犹太人的解放持反对意见的人时说:"他们的错误只在于:他们把基督教国家假设为唯一真正的国家,而没有像批判犹太教那样给以批判。"(第3页)我们认为,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

①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3页和第61页。——编者注

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如果鲍威尔问犹太人：根据你们的观点，你们就有权利要求**政治解放**？[①]那我们要反问：**政治解放的观点**有权利要求犹太人废除犹太教，要求一般人废除宗教吗？

犹太人问题依据犹太人所居住的国家而有不同的表述。在德国，不存在政治国家，不存在作为国家的国家，犹太人问题就是纯粹**神学的**问题。犹太人同承认基督教为自己基础的国家处于**宗教**对立之中。这个国家是职业神学家。在这里，批判是对神学的批判，是双刃的批判——既是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又是对犹太教神学的批判。不管我们在神学中**批判起来**可以多么游刃有余，我们毕竟是在神学中移动。

在法国这个**立宪**国家中，犹太人问题是立宪制的问题，是**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因为这里还保存着国教的**外观**，——虽然这是毫无意义而且自相矛盾的形式，并且以**多数人的宗教**的形式保存着，——所以犹太人对国家的关系也保持着宗教对立、神学对立的**外观**。

只有在实行共和制的北美各州——至少在其中一部分——犹太人问题才失去其**神学的**意义而成为真正**世俗的**问题。只有在政治国家十分发达的地方，犹太教徒和一般宗教信徒对政治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宗教对国家的关系，才呈现其本来的、纯粹的形式。一旦国家不再**从神学的角度**对待宗教，一旦国家是作为国家即从**政治的角度**来对待宗教，对这种关系的批判就不再是对神学的批判了。这样，批判就成了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在问题不再是**神学**问题的地方，鲍威尔的批判就不再是批判的批判了。

“美国既没有国教，又没有大多数人公认的宗教，也没有一种礼拜对另一种

---

①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19—21页。并见本卷第38页。——编者注

礼拜的优势,国家与一切礼拜无关。"(古·德·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835年巴黎版第214页)北美有些州,"宪法没有把宗教信仰和某种礼拜作为取得政治特权的条件"(同上,第225页)。尽管这样,"在美国也并不认为一个不信教的人是诚实的人"(同上,第224页)。

尽管如此,正像博蒙、托克维尔和英国人汉密尔顿异口同声保证的那样①,北美主要还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不过,在我们看来,北美各州只是一个例子。问题在于:**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怎样对待宗教?既然我们看到,甚至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那么这就证明,宗教的定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但是,因为宗教的定在是一种缺陷的定在,那么这种缺陷的根源就只能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束缚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束缚。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我们**撇开**政治国家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而去批判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这样也就批判了它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国家和某一**特定宗教**例如和**犹太教**的矛盾,就是国家和**特定世俗**要素的矛盾;而国家和**一般宗教**的矛盾,也就是国

①古·德·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218—221页,亚·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制》1835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209—234页,托·汉密尔顿《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1834年曼海姆版第2卷第241—244页。——编者注

家和它的一般**前提**的矛盾。

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信奉任何宗教，确切地说，信奉作为国家的自身时，国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质所固有的方式，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

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①]。鲍威尔自己默认了这一点，他提出了如下的政治解放条件：

> "任何宗教特权，从而还有特权教会的垄断，必定会被消灭，即使有些人，或者是许多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还认为自己必须履行宗教义务，那也应该看成是纯粹的私事而听其自便。"[②]

由此可见，甚至在**绝大多数人**还信奉宗教的情况下，**国家**也是可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因为自己是私下信奉宗教就不再是宗教信徒。

不过，国家，特别是**共和国**对宗教的态度，毕竟是组成国家的**人**对宗教的态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得到解放，他**在政治上**从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就是在与自身的矛盾中超越这种限制，就

①德文原文是"Freistaat"，原义为"共和国"。在这句话中，这个词在字面上也含有"自由国家"的意思。——编者注

②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65页。——编者注

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这种限制。其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就是用**间接的方法**，通过一个**中介**，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使自己得到解放。最后，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即使已经通过国家的中介作用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就是说，他宣布国家是无神论者，这时他总还是受到宗教的束缚，这正是因为他仅仅以间接的方法承认自己，仅仅通过中介承认自己。宗教正是以间接的方法承认人。通过一个**中介者**。国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正像基督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束缚**都加在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

人对宗教的**政治**超越，具有一般政治超越所具有的一切缺点和优点。例如，像北美许多州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一旦国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国家作为国家就宣布**私有财产**无效，人就以政治方式宣布私有财产已被**废除**。**汉密尔顿**从政治观点出发，对这个事实作了完全正确的解释：

“**广大群众战胜了财产所有者和金钱财富。**”①

既然非占有者已经成了占有者的立法者，那么私有财产岂不是在观念上被废除了吗？**财产资格限制**是承认私有财产的最后一个**政治**形式。

尽管如此，从政治上宣布私有财产无效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

①托·汉密尔顿《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1834年曼海姆版第1卷第146页。——编者注

为**非政治的**差别，当它不考虑这些差别而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一切要素的时候，国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尽管如此，国家还是让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作为文化程度、作为职业来**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本质。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因此，**黑格尔**确定的**政治国家**对宗教的关系是完全正确的，他说：

> "要使国家作为精神的**认识着自身的**伦理现实而获得存在，就必须把国家同权威形式和信仰形式区别开来；但这种区别只有当教会方面在自身内部达到分裂的时候才会出现；只有这样超越特殊教会，国家才会获得和实现思想的**普遍性**，即自己形式的原则。"（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版第346页）

当然！只有这样**超越特殊**要素，国家才使自身成为普遍性。

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11]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也处于同样的对立之中，它用以克服后者的方式也同宗教克服尘世局限性的方式相同，即它同样不得不重新承

认市民社会,恢复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在这里,即在人把自己并把别人看做是现实的个人的地方,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相反,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做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

人作为**特殊**宗教的信徒,同自己的公民身份,同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他人所发生的冲突,归结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世俗**分裂。对于作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来说:"在国家中的生活只是一种外观,或者是违反本质和通则的一种暂时的例外。"①的确,bourgeois,像犹太人一样,只是按照诡辩始终存在于国家生活中,正像citoyen[公民]只是按照诡辩始终是犹太人或bourgeois一样。可是,这种诡辩不是个人性质的。它是**政治国家本身的诡辩**。宗教信徒和公民之间的差别,是商人和公民、短工和公民、土地占有者和公民、**活生生的个人**和**公民**之间的差别。宗教信徒和政治人之间的矛盾,是bourgeois和citoyen之间、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和他的**政治狮皮**[18]之间的同样的矛盾。

犹太人问题最终归结成的这种世俗冲突,政治国家对自己的前提——无论这些前提是像私有财产等等这样的物质要素,还是像教育、宗教这样的精神要素——的关系,**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鲍威尔在抨击这些世俗对立**在宗教上**的表现的时候,竟听任这些世俗对立持续存在。

①布·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见《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57页。——编者注

"正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即保证市民社会的持续存在和保障市民社会的必然性的那种需要，使它的持续存在经常受到威胁，保持了它的不稳固要素，产生了那种处于经常更迭中的贫穷和富有、困顿和繁荣的混合物，总之产生了更迭。"（[《犹太人问题》]第8页）

我们不妨再读一读根据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要点写成的《市民社会》整个一节（[《犹太人问题》]第8—9页）的内容[19]。鲍威尔承认同政治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是必然的，因为他承认政治国家是必然的。

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

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这样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因为在国家中，人——虽然是以有限的方式，以特殊的形式，在特殊的领域内——是作为类存在物和他人共同行动的；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20]的精神。它已经不再是**共同性**的本质，而是**差别**的本质。它成了人同自己的**共同体**、同自身并同他人**分离**的表现——它**最初**就是这样的。它只不过是特殊的颠倒、**私人的奇想**和任意行为的抽象教义。例如，宗教在北美的不断分裂，使宗教**在表面上**具有纯粹个人事务的形式。它被推到许多私人利益中去，并且被逐出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体。但是，我们不要对政治解放的限度产生错觉。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这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

人**分解为**犹太教徒和公民、新教徒和公民、宗教信徒和公民，这

种分解不是**针对**公民身份而制造的谎言,不是对政治解放的回避,这种分解**是政治解放本身**,是使自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政治**方式。当然,在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通过暴力从市民社会内部产生的时期,在人的自我解放力求以政治自我解放的形式进行的时期,国家是能够而且必定会做到**废除宗教**、**根除**宗教的。但是,这只有通过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通过消灭生命、通过**断头台**,才能做到。当政治生活感到特别自信的时候,它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现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是,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

的确,那种把基督教当做自己的基础、国教,因而对其他宗教抱排斥态度的所谓**基督教**国家,并不就是完成了的基督教国家,相反,**无神论**国家、**民主制**国家,即把宗教归为市民社会的其他要素的国家,才是这样的国家。那种仍旧持神学家观点、仍旧正式声明自己信奉基督教、仍旧不敢宣布自己**成为国家**的国家,在其作为国家这一**现实性**中,还没有做到以**世俗的**、**人的**形式来反映**人的**基础,而基督教是这种基础的过分的表现。所谓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非国家**,因为通过现实的人的创作所实现的,并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只是基督教的**人的背景**。

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通过基督教来否定国家,而决不是通过国家来实现基督教。仍然以宗教形式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还不是以国家形式信奉基督教,因为它仍然从宗教的角度对待宗教,就是说,它不是宗教的人的基础的**真正实现**,因为它还诉诸**非现实性**,诉诸这种人的实质的**虚构**形象。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不完善**的国家,而且基

督教对它来说是它的不完善性的**补充**和**神圣化**。因此，宗教对基督教国家来说必然成为**手段**，基督教国家是**伪善的**国家。**完成了的**国家由于国家的一般**本质**所固有的缺陷而把宗教列入自己的**前提**，**未完成的**国家则由于自己作为有缺陷的国家的**特殊存在**所固有的缺陷而声称宗教是自己的**基础**，二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宗教成了**不完善的政治**。在前一种情况下，甚至完成了的**政治**具有的那种不完善性也在宗教中显露出来。所谓基督教国家需要基督教，是为了充实自己而**成为国家**。民主制国家，真正的国家则不需要宗教从政治上充实自己。确切地说，它可以撇开宗教，因为它已经用世俗方式实现了宗教的人的基础。而所谓基督教国家则相反，既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当它把国家形式降为外观时，也就同样把宗教降为外观。

为了阐明这一对立，我们来看一下鲍威尔根据对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观察所得出的有关基督教国家的构思。鲍威尔说：

> "近来有些人为了证明基督教国家的*不可能性或非存在*，常常引证福音书①中的一些箴言，这些箴言，[当前的]国家*不仅不遵循*而且*也不可能遵循*，如果国*家不想使自己*[作为国家]*完全解体的话*。""但是，问题的解决并不那么容易。那么，福音书的那些箴言到底要求些什么呢？要求超自然的自我否定、服从启示的权威、背弃国家、废除世俗关系。这一切也正是基督教国家所要求和实行的。它领悟了*福音书的精神*，即使它不用福音书借以表现这种精神的那些词语来复制这种精神，那也只是因为它用种种国家形式来表现这种精神，就是说，它所用的这些形式虽然来自这个世界的国家制度，但它们经过一定要经历的宗教再生过程，已经降为单纯的外观。基督教国家是对国家的背弃，而这种背弃是利用国家形式实现的。"（第55页）

---

①指《新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编者注

鲍威尔接着阐明:基督教国家的人民只是一种非人民,他们已经不再有自己的意志,他们的真实存在体现于他们所隶属的首脑,但首脑按其起源及本性来说是与他们相异的,就是说,他是上帝所赐,他降临于人民面前并没有得到他们本身的帮助;这样的人民的法律并不是他们的创作,而是实际的启示;他们的元首需要在自己和本来意义上的人民即群众之间有一些享有特权的中介人;这些群众本身分成许多偶然形成并确定的特殊集团,这些特殊集团是按各自利益、特殊爱好和偏见区分的,并且获准享有彼此不相往来的特权,等等(第56页)。

但是,鲍威尔自己却说:

> "如果政治只应当成为宗教,那么它就不再可能是政治了,正像把刷锅洗碗的事看做宗教事务,这种事就不再可能是家务事一样。"(第108页)

但是,要知道,在基督教日耳曼国家,宗教是"家务事",就像"家务事"是宗教一样。在基督教日耳曼国家,宗教的统治就是统治的宗教。

把"福音书的精神"和"福音书的词语"分割开来,是**不信宗教的**行为。国家迫使福音书使用政治词语,即与圣灵的词语不同的词语,这是亵渎行为,即使从人的眼光来看不是这样,但从国家自身的宗教眼光来看就是这样。应该用圣经的**字句**来反驳把基督教奉为自己的最高规范、把**圣经**奉为自己的**宪章**的国家,因为圣经的每个字都是神圣的。这个国家,就像它所依靠的**庸碌无用之辈**一样,陷入了痛苦的、从宗教意识的观点来看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有人要它注意福音书中的一些箴言,这些箴言,国家"不仅不遵循而且**也不可能遵循,如果国家不想使自己作为国家完全解体的话**"。那么,国家究竟为什么不想使自己

完全解体呢?对这个问题,它本身既不能给自己也不能给别人作出答复。由于自己**固有的意识**,正式的基督教国家是个不可实现的**应有**;这个国家知道只有通过对自身扯谎来肯定自己存在的现实性。因此,它对自身来说,始终是一个可疑的对象,一个不可靠的、有问题的对象。可见,批判做得完全正确,它迫使以圣经为依据的国家陷于神志不清,连国家自己也不再知道自己是**幻想**还是**实在**,国家的**世俗**目的——宗教是这些目的的掩盖物——的卑鄙性,也同它的**宗教**意识——对这种意识来说,宗教是世界的目的——的真诚性发生了无法解决的冲突。这个国家只有成为天主教会的**警士**,才能摆脱自己的内在痛苦。面对着这种主张世俗权力机关是自己的仆从的教会,国家是无能为力的,声称自己是宗教精神的支配者的**世俗**权力机关也是无能为力的。

在所谓基督教国家中,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异化**,而不是**人**。唯一起作用的人,即**国王**,是同别人特别不一样的存在物,而且还是笃信宗教的存在物,同天国、同上帝直接联系着的存在物。这里占统治地位的关系还是**信仰的**关系。可见,宗教精神并没有真正世俗化。

但是,宗教精神也不可能**真正**世俗化,因为宗教精神本身除了是人的精神某一发展阶段的**非世俗**形式外还能是什么呢?只有当人的精神的这一发展阶段——宗教精神是这一阶段的宗教表现——以其**世俗**形式出现并确立的时候,宗教精神才能实现。在**民主制**国家就有这种情形。这种国家的基础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人的基础**。宗教仍然是这种国家的成员的理想的、非世俗的意识,因为宗教是在这种国家中实现的**人的发展阶段**的理想形式。

政治国家的成员信奉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人把处

于自己的现实个性彼岸的国家生活当做他的真实生活;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宗教在这里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是人与人分离和疏远的表现。政治民主制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为在这里,人,不仅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是**享有主权的**,是最高的存在物,但这是具有无教养的非社会表现形式的人,是具有偶然存在形式的人,是本来样子的人,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而堕落了的人、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是受非人的关系和自然力控制的人,一句话,人还不是**现实**的类存在物。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权——不过人是作为一种不同于现实人的、异己的存在物——在民主制中,却是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

在完成了的民主制中,宗教意识和神学意识本身之所以自认为更富有宗教意义、神学意义,这是因为从表面上看来,它没有政治意义、没有世俗目的,而只是关系到厌世情绪,只是理智有局限性的表现,只是任意和幻想的产物,这是因为它是真正彼岸的生活。在这里,基督教**实际**表现出自己包罗一切宗教的作用,因为它以基督教形式把纷繁至极的世界观汇总排列,何况它根本不向别人提出基督教的要求,只提出一般宗教而不管是什么宗教的要求(参看前面引证的博蒙的著作①)。宗教意识沉浸在大量的宗教对立和宗教多样性之中。

可见,我们已经表明,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让宗教持续存在,虽然不是享有特权的宗教。任何一种特殊宗教的信徒同自己的公民身份的矛盾,只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普遍世俗矛盾的一部分**。基督教国家的完成,就是国家表明自己是国家,并且不理会自己

①古·德·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181—182、196—197和224页。——编者注

成员信奉的宗教。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因此，我们不像鲍威尔那样对犹太人说，你们不从犹太教彻底解放出来，就不能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相反，我们对他们说，因为你们不用完全地、毫无异议地放弃犹太教就可以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所以**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如果你们犹太人本身还没作为人得到解放便想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那么这种不彻底性和矛盾就不仅仅在于你们，而且在于政治解放的**本质**和**范畴**。如果你们局限于这个范畴，那么你们也具有普遍的局限性。国家，虽然是国家，如果要对犹太人采取基督教的立场，那就要**宣讲福音**，同样，犹太人，虽然是犹太人，如果要求公民的权利，那就得**关心政治**。

但是，如果人，尽管是犹太人，能够在政治上得到解放，能够得到公民权，那么他是否能够要求并得到所谓**人权**呢？鲍威尔**否认**这一点。

"问题在于：犹太人本身，就是说，自己承认由于自己的真正本质而不得不永远同他人分开生活的犹太人，他是否能够获得*普遍人权*，并给他人以这种权利呢？"

"对基督教世界来说，人权思想只是上一世纪才被发现的。这种思想不是人天生就有的，相反，只是人在同迄今培育着他的那些历史传统进行斗争中争得的。因此，人权不是自然界的赠品，也不是迄今为止的历史遗赠物，而是通过同出生的偶然性和历史上一代一代留传下来的特权的斗争赢得的奖赏。人权是教育的结果，只有争得和应该得到这种权利的人，才能享有。"

"那么犹太人是否真的能够享有这种权利呢？只要他还是犹太人，那么使他成为犹太人的那种狭隘本质就一定会压倒那种把他作为人而同别人结合起来的人的本质，一定会使他同非犹太人分隔开来。他通过这种分隔说明：使他成为犹太人的那种特殊本质是他的真正的最高的本质，人的本质应当让位于它。"

"同样，基督徒作为基督徒也不能给任何人以人权。"（[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第19、20页）

依照鲍威尔的见解,人为了能够获得普遍人权,就必须牺牲“**信仰的特权**”①。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所谓人权,确切地说,看看人权的真实形式,即它们的**发现者**北美人和法国人所享有的人权的形式吧![21]这种人权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只是与别人共同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共同体**,确切地说,就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这些权利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而公民权利,如上所述,决不以毫无异议地和实际地废除宗教为前提,因此也不以废除犹太教为前提。另一部分人权,即与*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不同的*droits de l'homme*[**人权**],有待研究。

信仰自由就属于这些权利之列,即履行任何一种礼拜的权利。**信仰的特权**或者被明确承认为一种**人权**,或者被明确承认为人权之一——自由——的结果。

1791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10条:“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信仰,即使是宗教信仰,而遭到排斥。”1791年宪法第I编确认“每个人履行自己信守的宗教礼拜的自由”是人权。

1793年**人权**……**宣言**第7条把“履行礼拜的自由”列为人权。是的,关于公开表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的权利、集会权利和履行礼拜的权利,甚至这样写道:“宣布这些权利的必要性,是以专制政体的存在或以对它的近期记忆为前提的。”对照1795年宪法第XIV编第354条。

宾夕法尼亚宪法第9条第3款:“人人生来都有受自己信仰的驱使而敬仰上帝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根据法律,任何人都不可能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去信奉、组织或维护任何一种宗教或任何一种宗教仪式。任何人的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信仰问题或支配灵魂的力量。”

新罕布什尔宪法第5、6条:“自然权利中的有些权利,按其性质来说是不能让渡的,因为它们无可替代。信仰的权利就是这样。”(博蒙,前引书第213、214页)

---

①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60—61页。——编者注

在人权这一概念中并没有宗教和人权互不相容的含义。相反，**信奉宗教**、用任何方式信奉宗教、履行自己特殊宗教的礼拜的**权利**，都被明确列入人权。**信仰的特权**是**普遍的人权**。

Droits de l'homme，**人权**，它**本身**不同于*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与*citoyen*［**公民**］不同的这个*homme*［**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做"人"，只称做"人"，为什么他的权利称做**人权**呢？我们用什么来解释这个事实呢？只有用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用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

首先，我们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人权**，不同于*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的*droits de l'homme*［**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请看最激进的宪法，1793年宪法的说法：

>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 **第2条**："这些权利等等〈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财产。"

自由是什么呢？

> **第6条**："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或者按照1791年人权宣言："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

这就是说，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每个人能够**不损害**他人而进行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两块田地之间的界限是由界桩确定的一样。这里所说的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22]的自由。依据鲍威尔的见解，犹太人为什么不能获得人权呢？

— 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

"只要他还是犹太人,那么使他成为犹太人的那种狭隘本质就一定会压倒那种把他作为人而同别人结合起来的人的本质,一定会使他同非犹太人分隔开来。"①

但是,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

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

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什么呢?

第16条(1793年宪法):"财产权是每个公民任意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勤奋所得的果实的权利。"

这就是说,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à son gré)、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但是,这种自由首先宣布了人权是

"任意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勤奋所得的果实"。

此外还有其他的人权:平等和安全。

平等,在这里就其非政治意义来说,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就是说,每个人都同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单子。1795年宪法根据这种平等的含义把它的概念规定如下:

---

①见本卷第38页。——编者注

第3条（1795年宪法）："平等是法律对一切人一视同仁，不论是予以保护还是予以惩罚。"

安全呢？

第8条（1793年宪法）："安全是社会为了维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他的保障。"

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维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黑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把市民社会称为"需要和理智的国家"。[23]

市民社会没有借助安全这一概念而超出自己的利己主义。相反，安全是它的利己主义的**保障**。

可见，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己、扫除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竟郑重宣布同他人以及同共同体分隔开来的利己的人是有权利的（1791年《宣言》）。后来，当只有最英勇的献身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时候，当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利己主义必将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又再一次这样明白宣告（1793

年《人权……宣言》)。尤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我们看到的,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甚至都被那些谋求政治解放的人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因此,citoyen[公民]被宣布为利己的homme[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最后,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

"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1791年《人权……宣言》第2条)"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保障人享有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1793年《人权……宣言》第1条)

可见,即使在政治生活还充满青春的激情,而且这种激情由于形势所迫而走向极端的时候,政治生活也宣布自己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的目的是市民社会生活。固然,这个政治生活的革命实践同它的理论还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例如,一方面,安全被宣布为人权,一方面侵犯通信秘密已公然成为风气。一方面"不受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1793年宪法第122条)作为人权的个人自由的结果而得到保证,一方面新闻出版自由又被完全取缔,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危及公共自由,是不许可的"(小罗伯斯比尔语,见毕舍和卢-拉维涅《法国革命议会史》第28卷第159页[21])。所以,这就是说,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同自己的**目的**即同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定被抛弃。但是,实践只是例外,理论才是通则。即使人们认为革命实践是对当时的关系采取的正确态度,下面这个谜毕竟还有待解答:为什么在谋求政治解放的人的意识中关系被本末倒置,目的好像成了手段,

手段好像成了目的?他们意识上的这种错觉毕竟还是同样的谜,虽然现在已经是心理上的、理论上的谜。

这个谜是很容易解答的。

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旧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封建主义**。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它们以这种形式规定了单一的个体对**国家整体**的关系,就是说,规定了他的**政治**关系,即他同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相分离和相排斥的关系。因为人民生活的这种组织没有把财产或劳动上升为社会要素,相反,却完成了它们同国家整体的**分离**,把它们建成为社会中的**特殊**社会。因此,市民社会的生活机能和生活条件还是政治的,虽然是封建意义上的政治;就是说,这些机能和条件使个体同国家整体分隔开来,把他的同业公会对国家整体的**特殊**关系变成他自己对人民生活的普遍关系,使他的特定的市民活动和地位变成他的普遍的活动和地位。国家统一体,作为这种组织的结果,也像国家统一体的意识、意志和活动即普遍国家权力一样,必然表现为一个同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事务**。

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为现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是人民同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众多表现。于是,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它把市民社会分割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体**,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

素。它把似乎是被分散、分解、溶化在封建社会各个死巷里的政治精神激发出来，把政治精神从这种分散状态中汇集起来，把它从与市民生活相混合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它构成为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事务的领域，在观念上不依赖于市民社会的上述**特殊**要素。**特定的**生活活动和特定的生活地位降低到只具有个体意义。它们已经不再构成个体对国家整体的普遍关系。公共事务本身反而成了每个个体的普遍事务，政治职能成了他的普遍职能。

可是，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是摆脱束缚住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枷锁。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

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

因此，这种**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他就是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的人。

但是，利己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

因此，人没有摆脱宗教，他取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他没有摆脱财产，他取得了占有财产的自由。他没有摆脱经营的利己主义，他取得了经营的自由。

政治国家的建立和市民社会分解为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的关系通过**法制**表现出来，正像等级制度中和行帮制度中的人的关系通过**特权**表现出来一样——是通过**同一种行为**实现的。但是，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即**非政治的**人，必然表现为**自然**人。*Droits de l'homme*［**人权**］表现为*droits naturels*［**自然权利**］，因为**有自我意识**

的活动集中于**政治行为**。**利己的**人是已经解体的社会的**消极的**、**现成的**结果，是有**直接确定性**的对象，因而也是**自然的**对象。**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变革**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没有加以批判。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做**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做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做自己的**自然基础**。最后，人，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与*citoyen*［**公民**］不同的*homme*［**人**］，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

可见卢梭关于政治人这一抽象概念论述得很对：

> "敢于为一国人民确立制度的人，可以说必须自己感到有能力改变人的本性，把每个本身是完善的、单独的整体的个体变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体以一定的方式从这个整体获得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有能力用局部的道德存在代替肉体的独立存在。他必须去掉人自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人一种异己的、非由别人协助便不能使用的力量。"（《社会契约论》1782年伦敦版第2卷第67页）

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二
布鲁诺·鲍威尔：
《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二十一印张》第56—71页)

鲍威尔在这个标题下探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以及它们对批判的关系。它们对批判的关系是它们"对获得自由的能力"的关系。

结论是:

> "基督徒只要跨越一个台阶,即跨越自己的宗教,就可以完全废除[1]宗教",因而就可以获得自由,"相反,犹太人不仅要摒弃自己的犹太本质,而且要摒弃自己宗教的趋于完成的发展,即摒弃自己宗教的那种始终与自己相异的发展"(第71页)。

可见,鲍威尔在这里把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变成了纯粹的宗教问题。谁更有希望得救,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这个神学上的疑虑问题,在这里以启蒙的形式再现:他们中间谁**更有能力获得解放**?的确,已经不再是这样提问:使人获得自由的,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而是相反:什么使人更加自由,是对犹太教的否定还是对基督教的否定?

---

①引文中的"废除"(aufheben)一词,在布·鲍威尔的文章中是:"放弃"(aufgeben)。——编者注

“如果犹太人想要获得自由，那么他们不应该信奉基督教，而应该信奉解体了的基督教，信奉解体了的宗教，即信奉启蒙、批判及其结果——自由的人性。”（第70页）

这里谈的还是关于犹太人应该**有所信奉**，但信奉的不再是基督教，而是解体了的基督教。

鲍威尔要求犹太人摒弃基督教的本质，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这个要求不是从犹太本质的发展中产生的。

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的结尾处认为犹太教只是对基督教的粗陋的宗教批判，因而从犹太教找到的“仅仅”是宗教意义。既然如此，不难预见，犹太人的解放在他笔下也会变成哲学兼神学的行动。①

鲍威尔把犹太人的**理想的**抽象本质，即他的**宗教**，看做他的**全部**本质。因此，他有理由作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犹太教徒轻视自己的狭隘戒律”，如果他废除自己的整个犹太教，“那就不会对人类有任何贡献”（第65页）。

照此说来，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关系是这样的：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解放的唯一兴趣，是一般的人的兴趣、**理论的**兴趣。犹太教在基督徒的宗教眼光中是个侮辱性的事实。一旦基督徒的眼光不再是宗教的，这个事实也就不再是侮辱性的了。犹太人的解放本身不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

相反，犹太人要想解放自身，不仅要做完自己的事情，而且要做完基督徒的事情，学完《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耶稣传》，等等。

---

①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114—115页。——编者注

"他们自己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将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历史是不让人嘲弄自己的。"(第71页)

我们现在试着突破对问题的神学提法。在我们看来,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必须克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要素才能废除犹太教的问题。因为现代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就是犹太教和现代世界解放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于犹太教在现代被奴役的世界中的特殊地位而必然产生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现实的世俗犹太人,但不是像鲍威尔那样,考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考察**日常的犹太人**。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

那好吧!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

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经商牟利的前提,从而消除经商牟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淡淡的烟雾一样,在社会这一现实的、生命所需的空气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如果犹太人承认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并为消除它而工作,那么他就会从自己以前的发展中解脱出来,直接为**人的解放**工作,并转而反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实际**表现。

总之,我们在犹太教中看到普遍的**现代的反社会的**要素,而这种要素,经由有犹太人在这一坏的方面热心参与的历史发展,达到自己目前这样的高度,即达到它必然解体的高度。

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①中解放出来。

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

> “例如在维也纳只不过是被人宽容的犹太人，凭自己的金钱势力决定着整个帝国的命运。在德国一个最小的邦中可能是毫无权利的犹太人，决定着欧洲的命运。各种同业公会和行会虽然不接纳犹太人，或者仍然不同情他们，工业的大胆精神却在嘲笑这些中世纪组织的固执。”（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第114页）

这并不是个别的事实。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不仅因为他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势力，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

例如，汉密尔顿上校说：

> “新英格兰的虔诚的和政治上自由的居民，是类似**拉奥孔**那样的人，拉奥孔没有作出最起码的努力去挣脱缠住他的两条蛇。**玛门**是他们的偶像，他们不仅口头上，而且整个身心都崇拜它。在他们的眼里，尘世无非是个交易所，而且他们确信，在这尘世间，他们除了要比自己邻居富有而外，没有别的使命。经商牟利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思想，变换所经营的货品，是他们唯一的休息。比如说，他们在旅行的时候也要背上自己的货物或柜台，而且所谈的不是利息就是利润。即使他们一时没考虑自己的生意，那也只是为了要探听

---

①马克思这里说的“犹太精神”，德文原文是Judentum。在本文中，马克思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Judentum一词：一种是在宗教意义上，指犹太人信仰的宗教，中文译为“犹太教”；一种是在世俗意义上，指犹太人在经商牟利的活动中表现出的唯利是图、追逐金钱的思想和习气，中文译为“犹太精神”。——编者注

一下别人的生意做得怎样。"①

的确,在北美,犹太精神对基督教世界的实际统治已经有了明确的、正常的表现:**宣讲福音**本身,基督教的教职,都变成了商品,破产的商人讲起了福音,富起来的福音传教士做起了买卖。

> **"你看到的那位主持体面的布道集会的人,起初是个商人,经商失败以后他才成了神职人员。另一个人,起初担任神职,但当他手里有了些钱,他就离开布道台而去经商牟利。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神职真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博蒙,前引书第185、186页)**

鲍威尔认为,

> "这种情况是虚假的:在理论上不给予犹太人以政治权利,实际上他却有很大的权力,而且**在很大的范围内**显示自己的政治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在一些细节上**被缩小了。"(《犹太人问题》第114页)

犹太人的实际政治权力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就是政治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

犹太教之所以能保持与基督教**同时**存在,不仅因为它是对基督教的宗教批判,不仅因为它体现了对基督教的宗教起源的怀疑,而且因为犹太人的实际精神——犹太精神——在基督教社会本身中保持了自己的地位,甚至得到高度的发展。犹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成员,只是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的特殊表现。

犹太精神不是违反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保持下来的。

---

①托·汉密尔顿《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1834年曼海姆版第1卷第109—110页。——编者注

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

犹太人的宗教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际需要,利己主义。

因此,犹太人的一神教,在其现实性上是许多需要的多神教,一种把厕所也变成神律的对象的多神教。**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

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

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

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在犹太人的宗教中,自然界虽然存在,但只是存在于想象中。

托马斯·闵采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下述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 "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但是,生灵也应该获得自由。"①

抽象地存在于犹太人的宗教中的那种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

---

①托·闵采尔《为反驳维滕贝格的不信神、生活安逸、以歪曲方式剽窃圣经从而使可怜的基督教惨遭玷污的人而作的立论充分的抗辩和答复》1524年纽伦堡版。马克思的引文援自莱·兰克《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1839年柏林版第2卷第207页。——编者注

和对于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视,是财迷的**现实的**、**自觉的**看法和品行。就连类关系本身、男女关系等等也成了买卖对象!妇女也被买卖。

犹太人的**想象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说,是财迷的民族。

犹太人的毫无根基的法律只是一幅对毫无根基的道德和对整个法的宗教讽刺画,只是对自私自利的世界采用的那种徒具**形式的**礼拜的宗教讽刺画。

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人的最高关系也是**法定的**关系,是人对法律的关系,这些法律之所以对人有效,并非因为它们是体现人本身的意志和本质的法律,而是因为它们**起统治作用**,因为违反它们就会**受到惩罚**。

犹太人的狡猾手法,即鲍威尔在塔木德[24]中发现的那种实际的狡猾手法,就是自私自利的世界对统治着它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狡猾地规避这些法律是这个世界的主要伎俩。①

的确,这个世界在它这些法律的范围内的运动,必然是法律的不断废除。

犹太精神不可能作为**宗教**继续发展,即不可能在理论上继续发展,因为实际需要的世界观,按其本性来说是狭隘的,很快就会穷尽。

实际需要的宗教,按其本质来说不可能在理论上完成,而是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因为实践才是它的真理。

犹太精神不可能创造任何新的世界,它只能把新的世间创造物和世间关系吸引到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因为以自私自利为明智的实

①参看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24—30页;《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见《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60—62页。——编者注

际需要是被动的，不能任意扩大，而是**随着**社会状况的进一步发展而扩大。

犹太精神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己的顶点；但是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

基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

基督教只是表面上制服了实在的犹太教。基督教太**高尚了**，太唯灵论了，因此要消除实际需要的粗陋性，只有使它升天了。

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思想升华，犹太教是基督教的鄙俗的功利应用，但这种应用只有在基督教作为完善的宗教从**理论上**完成了人从自身、从自然界的自我异化之后，才能成为普遍的。

只有这样，犹太教才能实现普遍的统治，才能把外化了的人、外化了的自然界，变成**可让渡的**、可出售的、屈从于利己需要的、听任买卖的对象。

让渡是外化的实践。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

基督徒的天堂幸福的利己主义，通过自己完成了的实践，必然

要变成犹太人的肉体的利己主义,天国的需要必然要变成尘世的需要,主观主义必然要变成自私自利。我们不是用犹太人的宗教来说明犹太人的顽强性,而是相反,用犹太人的宗教的人的基础、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来说明这种顽强性。

因为犹太人的真正本质在市民社会得到了普遍实现,并已普遍地世俗化,所以市民社会不能使犹太人相信他的**宗教**本质——这种本质只是实际需要在观念中的表现——的**非现实性**。因此,不仅在摩西五经或塔木德中,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都看到现代犹太人的本质不是抽象本质,而是高度的经验本质,它不仅是犹太人的狭隘性,而且是社会的犹太人狭隘性。

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经商牟利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他的意识将不再有对象,因为犹太精神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将会人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

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

载于1844年2月《德法年鉴》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卷翻译

弗·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25]

国民经济学[5]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

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人们还有一种幼稚的看法，以为金银就是财富，因此必须到处从速禁止"贵"金属出口。各国像守财奴一样相互对立，双手抱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妒忌心和猜疑心注视着自己的邻居。他们使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多地骗取那些与自己通商的民族的现钱，并使这些侥幸赚来的钱好好地保持在关税线以内。

如果完全彻底地实行这个原则，那就会葬送商业。因此，人们便开始跨越这个最初的阶段。他们意识到，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会不断增殖。于是，人们变得比较友善了，人们开始把自己的杜卡特①当做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杜卡特一并引回来，并且认识到，多花一点钱买甲的商品一点也不会吃亏，只要能以更高的价格把它卖给乙就行了。

重商主义[26]体系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商业的贪婪性已多少有所遮掩；各国多少有所接近，开始缔结通商友好条约，彼此做生意，并

①14—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通用的金币。——编者注

且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甚至尽可能地互相表示友爱和亲善。但是实质上还是同从前一样贪财和自私，当时一切基于商业角逐而引起的战争就时时露出这种贪财和自私。这些战争也表明：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他们就甚至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强行订立这些条约。

贸易差额论是整个重商主义体系的要点。正因为人们始终坚持金银就是财富的论点，所以他们认为只有那最终给国家带来现金的交易才是赢利交易。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以输出和输入作比较。如果输出大于输入，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差额会以现金的形式回到本国，国家也因这个差额而更富裕。因此经济学家的本事就是要设法使输出和输入到每年年底有一个顺差。为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幻想，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商业也有了它的十字军征讨[27]和宗教裁判所[28]。

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正如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一样，正如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相对立，社会契约[29]和神权相对立一样，经济学的革命也未能克服对立。到处依然存在着下述前提：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政治学没有想去检验国家的各个前提本身；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这样，经济学就具有仁爱的性质；它不再宠爱生产者，而转向消费者了；它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体系的血腥恐怖表示

神圣的厌恶，并且宣布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一切都显得十分辉煌壮丽，可是上述前提马上又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创立了与这种伪善的博爱相对立的马尔萨斯人口论[30]，这种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这些前提创造并发展了工厂制度和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①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

可是，难道说亚当·斯密的体系不是一个进步吗？当然是进步，而且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为了使私有制的真实的后果能够显露出来，就有必要摧毁重商主义体系以及它的垄断和它对商业关系的束缚；为了使当代的斗争能够成为普遍的人类的斗争，就有必要使所有这些地域的和国家的小算盘退居次要的地位；有必要使私有制的理论抛弃纯粹经验主义的、仅仅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使它具有一种也对结果负责的更为科学的性质，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有必要通过对旧经济学中包含的不道德加以否定的尝试，并通过由此产生的伪善——这种尝试的必然结果——而使这种不道德达于极点。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乐于承认，只有通过对贸易自由的论证和阐述，我们才有可能超越私有制的经济学，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有权指出，这种贸易自由并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我们所要评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

①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编者注

决就必定越严厉。因为斯密和马尔萨斯所看到的现成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片断，而在新近的经济学家面前却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一切结论已经作出，各种矛盾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但是，他们仍不去检验前提，而且还是对整个体系负责。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因此，比如说，**李嘉图**的罪过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

新近的经济学甚至不能对重商主义体系作出正确的评判，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片面性，而且还受到重商主义体系的各个前提的拖累。只有摆脱这两种体系的对立，批判这两种体系的共同前提，并从纯粹人的、普遍的基础出发来看问题，才能够给这两种体系指出它们的真正的地位。那时大家就会明白，贸易自由的捍卫者是一些比旧的重商主义者本身更为恶劣的垄断者。那时大家就会明白，在新经济学家的虚伪的人道背后隐藏着旧经济学家闻所未闻的野蛮；旧经济学家的概念虽然混乱，与攻击他们的人的口是心非的逻辑比较起来还是单纯的、前后一贯的；这两派中任何一派对另一派的指责，都不会不落到自己头上。因此，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无法理解李斯特为什么要恢复重商主义体系[①]，而这件事我们却觉得很简单。前后不一贯的和具有两面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必然要重新分解为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得前进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必定一方面造成垄断的恢复，另一方面造成私有制的消灭。

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

①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各种规律。这种经济学确实包含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还没有被阐述为最后的结论，还没有被清楚地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在涉及确定生财捷径的一切地方，就是说，在一切严格意义的经济学上的争论中，贸易自由的捍卫者们是正确的。当然，这里指的是与支持垄断的人争论，而不是与反对私有制的人争论，因为正如英国社会主义者早就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证明的那样①，反对私有制的人能够从经济的观点比较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

因此，我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作出结论。

———

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人们要么完全抛弃这个用语，要么采用一些使它具有意义的前提。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

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即彼此交换必需品，亦即买和卖。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种商业与其他一切活动一样，必然是经商者收入的直接源泉；就是说，每个人必定要尽量设法贱买贵卖。因此，在任何一次买卖中，两个人总是以绝对对立的利益相对抗；

---

①指约·弗·布雷、威·汤普森、约·瓦茨和他们的著作：布雷《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汤普森《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瓦茨《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科学原则述评，去伪存真》1842年曼彻斯特—伦敦版。——编者注

这种冲突带有势不两立的性质，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有关商品的价格的事情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商业中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并且也同样允许夸大自己的商品本来没有的品质。总而言之，商业是合法的欺诈。任何一个商人，只要他说实话，他就会证明实践是符合这个理论的。

重商主义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某种纯朴的天主教的坦率精神，它丝毫不隐瞒商业的不道德的本质。我们已经看到，它怎样公开地显露自己卑鄙的贪婪。18世纪民族间的相互敌视、可憎的妒忌以及商业角逐，都是贸易本身的必然结果。社会舆论既然还不具有人道精神，那么何必要掩饰从商业本身的无人性的和充满敌意的本质中所产生的那些东西呢？

但是，当**经济学的路德**①，即亚当·斯密，批判过去的经济学的时候，情况大大地改变了。时代具有人道精神了，理性起作用了，道德开始要求自己的永恒权利了。强迫订立的通商条约、商业战争、民族间的严重孤立状态与前进了的意识异常激烈地发生冲突。新教的伪善代替了天主教的坦率。斯密证明，人道也是由商业的本质产生的，商业不应当是“纠纷和敌视的最丰产的源泉”，而应当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的纽带”（参看《国富论》第4卷第3章第2节）；理

---

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这个提法作了解释，见本卷第178—179页。——编者注

所当然的是，商业总的说来对它的**一切**参加者都是有利的。

斯密颂扬商业是人道的，这是对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商业也有对道德和人性表示尊重的一面。但这是怎样的尊重啊！当中世纪的强权，即公开的拦路行劫转到商业时，这种行劫就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当商业上以禁止货币输出为特征的第一个阶段转到重商主义体系时，商业也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现在连这种体系本身也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当然，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与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一个民族要是引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对情绪，就太不明智了。它表现得越友好，对它就越有利。这就是商业的人道，而滥用道德以实现不道德的意图的伪善方式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引以自豪的东西。伪君子叫道：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文明带往世界上遥远的地方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并减少了战争次数吗？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然而你们是**怎样**做的啊！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以便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所有权，更自由地、更不受限制地起作用；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你们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但这是盗贼的兄弟情谊；你们减少了战争次数，以便在和平时期赚更多的钱，以便使各个人之间的敌视、可耻的竞争战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你们什么时候做事情是从纯粹的人道出发，是从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毫无意义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而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利己的动机呢？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使敌对情绪普遍化，使人类变成一群**正因为**每一个人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互相

吞噬的凶猛野兽——竞争者不是凶猛野兽又是什么呢？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做完这个准备工作之后，只要再走一步——使家庭解体——就达到目的了。为了实现这一点，它自己美妙的发明即工厂制度助了它一臂之力。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了，至少在这里，在英国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孩子一到能劳动的时候，就是说，到了九岁，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寄宿处，付给父母一定的膳宿费。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还能有别的什么呢？从构成自由贸易体系的基础的利益分离，还能产生什么别的结果呢？一种原则一旦被运用，它就会自行贯穿在它的一切结果中，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乐意。

然而，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商业形成的第一个范畴是**价值**。关于这个范畴和其他一切范畴，在新旧两派经济学家之间没有什么争论，因为直接热衷于发财致富的垄断主义者没有多余时间来研究各种范畴。关于这类论点的所有争论都出自新近的经济学家。

靠种种对立活命的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一种**双重的**价值：抽象价值（或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关于实际价值的本质，英国人和法国人萨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前者认为生产费用是实际价值的表现，后者则说什么实际价值要按物品的效用来测定。这个争论从本世纪初开始，后来停息了，没有得到解决。这些经济学家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这样，英国人——特别是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断言，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请注意，是抽象价值，不是交换价值，不是 *exchangeable value*，不是商业价值；至于商业价值，据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生产费用是价值的尺度呢？请听！请听！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把竞争关系撇开，没有人会把物品卖得低于它的生产费用。没有人会卖吧？在这里，既然不谈商业价值，我们谈"卖"干什么呢？一谈到"卖"，我们就要让我们刚才要撇开的商业重新参加进来，而且是这样一种商业！一种不把主要的东西即竞争关系考虑在内的商业！起初我们有一种抽象价值，现在又有一种抽象商业，一种没有竞争的商业，就是说有一个没有躯体的人，一种没有产生思想的大脑的思想。难道经济学家根本没有想到，一旦竞争被撇开，那就保证不了生产者正是按照他的生产费用来卖自己的商品吗？多么混乱啊！

还不仅如此！我们暂且认为，一切都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假定某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和巨大的费用制造了一种谁也不要的毫无用处的东西，难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也同生产费用一样吗？经济学家回答说，绝对没有，谁愿意买这种东西呢？于是，我们立刻不仅碰到了萨伊的声名狼藉的效用，而且还有了随着"买"而来的竞争关系。经济学家是一刻也不能坚持他的抽象的——这是做不到的。不仅他所竭力避开的竞争，而且连他所攻击的效用，随时都可能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说法，恰恰都只是抽象的非实在的东西。

我们再一次暂且假定经济学家是对的，那么在不把竞争考虑在内的情况下，他又怎样确定生产费用呢？我们研究一下生产费用，就可以看出，这个范畴也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在这里又一次表明经济学家是无法贯彻他的主张的。

如果我们转向萨伊的学说，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抽象。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至少它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徘徊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确定的。根据这种理论，生活必需品应当比奢侈品具有更大的价值。在私有制统治下，竞争关系是唯一能比较客观地、**似乎**能大体确定物品效用大小的办法，然而恰恰是竞争关系被撇在一边。但是，只要容许有竞争关系，生产费用也就随之产生，因为没有人会卖得低于他自己在生产上投入的费用。因此，在这里也是对立的一方不情愿地转到另一方。

让我们设法来澄清这种混乱吧！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因素，争论的双方都要强行把这两个因素分开，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徒劳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可是，如果以这个基础为出发点，那么又该谁来决定物品的效用呢？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人**受骗。或者，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双方、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以物品固有的效用为依据的规定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受骗了。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规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私有制一旦被消灭，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概念的实际运用就会越来越限于决定生产，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

然而，目前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看到，价值概念被强行分割了，它的每一个方面都叫嚷自己是整体。一开始就为竞争所歪曲的生产费

用，应该被看做是价值本身。纯主观的效用同样应该被看做是价值本身，因为现在不可能有第二种效用。要把这两个跛脚的定义扶正，必须在两种情况下都把竞争考虑在内；而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在英国人那里，竞争代表效用而与生产费用相对立，在萨伊那里则相反，竞争带来生产费用而与效用相对立。但是，竞争究竟带来什么样的效用和什么样的生产费用！它带来的效用取决于偶然情况、时尚和富人的癖好，它带来的生产费用则随着需求和供给的偶然比例而上下波动。

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基于下述事实：物品的价值不同于人们在买卖中为该物品提供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这个所谓等价物就是物品的**价格**，如果经济学家是诚实的，他就会把等价物一词当做“商业价值”来使用。但是，为了使商业的不道德不过于明显地暴露出来，他总得保留一点假象，似乎价格和价值以某种方式相联系。说**价格**由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的规律。经济学家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这个纯经验的规律；接着他从这个规律中抽去他的实际价值，就是说，抽去竞争关系均衡时、供求一致时的价格，这时，剩下的自然只有生产费用了，经济学家就把它称为实际价值，其实只是价格的一种规定性。但是，这样一来，经济学中的一切就被本末倒置了：价值本来是原初的东西，是价格的源泉，倒要取决于价格，即它自己的产物。大家知道，正是这种颠倒构成了抽象的本质。关于这点，请参看费尔巴哈的著作。①

---

①路·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见《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64—71页。——编者注

在经济学家看来，商品的生产费用由以下三个要素组成：生产原材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的报酬。但人们立即就发现，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蓄的劳动"[①]。这样，我们这里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方面，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即劳动。劳动包括资本，并且除资本之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经济学家与发明的精神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没有他参与的一切发明就不会落到他手里吗？有哪一件发明曾经使他花费过什么？因此，他在计算他的生产费用时为什么要为这些发明操心呢？在他看来，财富的条件就是土地、资本、劳动，除此以外，他什么也不需要。科学是与他无关的。尽管科学通过贝托莱、戴维、李比希、瓦特、卡特赖特等人送了许多礼物给他，把他本人和他的生产都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这与他有何相干呢？他不懂得重视这些东西，科学的进步超出了他的计算。但是，在一个超越利益的分裂——正如在经济学家那里发生的那样——的合理状态下，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并且会在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那时，我们自然会满意地看到，扶植科学的工作也在物质上得到报偿，会看到，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②]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现在我们可以回过来谈谈经济学家和他的

---

①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94页。——编者注

②见本卷第98—105页。——编者注

生产费用。

———

经济学家说，凡是无法垄断的东西就没有价值。这个论点以后再详细研究。如果我们说：凡是无法垄断的东西就没有**价格**，那么，这个论点对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状态而言是正确的。如果土地像空气一样容易得到，那就没有人会支付地租了。既然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被占有的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那人们就要为一块被占有的即被垄断的土地支付地租或者按照售价把它买下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样弄明白了土地价值的产生以后，还得听经济学家说什么地租是付租金的土地的收入和值得费力耕种的最坏的土地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大家知道，这是李嘉图第一次充分阐明的地租定义。①当人们假定需求的减少**马上**影响地租并立刻使相应数量的最坏耕地停止耕种的时候，这个定义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因此这个定义是有缺陷的；况且这个定义没有包括地租产生的原因，仅仅由于这一点，这个定义就已经站不住脚了。反谷物法同盟[31]盟员托·佩·汤普森上校在反对这个定义时，又把亚当·斯密的定义②搬了出来并加以论证。据他说，地租是谋求使用土地者的竞争和可支配的土地的有限数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这至少又回到地租产生的问题上来了；但是，这个解释没有包括土壤肥力的差别，正如上述的定义忽略了竞争一样。③

---

①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第54页。——编者注

②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237—242页。——编者注

③托·佩·汤普森《真正的地租理论，驳李嘉图先生等》，见他的《政治习作及其他》1842年伦敦版第4卷第404页。——编者注

这样一来，同一个对象又有了两个片面的因而是不完全的定义。正如研究价值概念时一样，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把这两个定义结合起来，以便得出一个正确的、来自事物本身发展的、因而包括了实践中的一切情况的定义。地租是土地的收获量即自然方面（这方面又包括**自然的**肥力和**人的**耕作即改良土壤所耗费的劳动）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学家会对这个“定义”摇头；当他们知道这个定义包括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时，他们会大吃一惊的。

土地占有者无论如何不能责备商人。

他靠垄断土地进行掠夺。他利用人口的增长进行掠夺，因为人口的增长加强了竞争，从而抬高了他的土地的价值。他把不是通过他个人劳动得来的、完全偶然地落到他手里的东西当做他个人利益的源泉进行掠夺。他靠**出租土地**、靠最终攫取租地农场主的种种改良的成果进行掠夺。大土地占有者的财富日益增长的秘密就在于此。

认定土地占有者的获得方式是掠夺，即认定人人都有享受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权利或不播种者不应有收获，这样的公理[①]并不是我们的主张。第一个公理排除抚育儿童的义务；第二个公理排除任何世代的生存权利，因为任何世代都得继承前一世代的遗产。确切地说，这些公理都是由私有制产生的结论。要么实现由私有制产生的一切结论，要么抛弃私有制这个前提。

甚至最初的占有本身，也是以断言老早就存在过**共同**占有权为理由的。[①]因此，不管我们转向哪里，私有制总会把我们引到矛盾

①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85—86页。——编者注

中去。

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出卖土地，就是走向自我出卖的最后一步；这无论过去或直至今日都是这样一种不道德，只有自我出让的不道德才能超过它。最初的占有土地，少数人垄断土地，所有其他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就不道德来说，丝毫也不逊于后来的土地出卖。

如果我们在这里再把私有制撇开，那么地租就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就归结为实质上可以作为地租基础的合理观点。这时，作为地租而与土地分离的土地价值，就回到土地本身。这个价值是依据面积相等的土地在花费的劳动量相等的条件下所具有的生产能力来计算的；这个价值在确定产品的价值时自然是作为生产费用的一部分计算在内的，它像地租一样是生产能力对竞争的关系，不过是对**真正的**竞争，即对某个时候会展开的竞争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其次，我们从经济学家自己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到，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开，立刻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但是，经济学家还是把资本和劳动分开，还是坚持这两者的分裂，他只在资本是“积蓄的劳动”这个定义[①]中承认它们两者的统一。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这种分开完成之后，资本又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

①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94页。——编者注

过程中所获得的增长额，虽然实践本身立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投入周转中。甚至利润又分裂为利息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在利息中，这种分裂的不合理性达到顶点。贷款生息，即不花劳动单凭贷款获得收入，是不道德的，虽然这种不道德已经包含在私有制中，但毕竟还是太明显，并且早已被不持偏见的人民意识看穿了，而人民意识在认识这类问题上通常总是正确的。所有这些微妙的分裂和划分，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开和这一分开的完成，即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这一分裂正日益加剧，而且我们将看到，它**必定**会不断地加剧。但是，这种分开与我们考察过的土地同资本和劳动分开一样，归根结底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各占多少分量。这三个量是不可通约的。土地出产原材料，但这里并非没有资本和劳动；资本以土地和劳动为前提，而劳动**至少**以土地，在大多数场合还以资本为前提。这三者的作用截然不同，无法用任何第四种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因此，如果在当前的条件下，将收入在这三种要素之间进行分配，那就没有它们固有的尺度，而只有由一个完全异己的、对它们来说是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地租包含着竞争；资本的利润只有由竞争决定，至于工资的情况怎样，我们立刻就会看到。

如果我们撇开私有制，那么所有这些反常的分裂就不会存在。利息和利润的差别也会消失；资本如果没有劳动、没有运动就是虚无。利润把自己的意义归结为资本在决定生产费用时置于天平上的砝码，它仍是资本所固有的部分，正如资本本身将回到它与劳动的最初统一体一样。

———

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①，是人的自由活动，但很少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正如资本已经同劳动分开一样，现在劳动又再度分裂了；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它与劳动分开，并且通常又由竞争决定，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来确定劳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离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被让渡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

我们知道，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始终娇惯和爱抚着她，但是请看，在这里出现的是一张什么样的美杜莎的怪脸。

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无人施肥就会荒芜，成为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是土地。其次，我们看到，人的活动又怎样分解为劳动和资本，这两方面怎样彼此敌视。这样，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这三种要素的彼此斗争，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支持；现在，我们还看到私有制使这三种要素中的每一种都分裂。一块土地与另一块土地对立，一个资本与另一个资本对立，一个劳动力与另一个劳动力对立。换句话说，因为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

---

①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9—10页。——编者注

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

———

竞争的对立面是**垄断**。垄断是重商主义者战斗时的呐喊，竞争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厮打时的吼叫。不难看出，这个对立面也是完全空洞的东西。每一个竞争者，不管他是工人，是资本家，或是土地占有者，都**必定**希望取得垄断地位。每一个较小的竞争者群体都必定希望为自己取得垄断地位来对付所有其他的人。竞争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利益又引起垄断；简言之，竞争转为垄断。另一方面，垄断挡不住竞争的洪流；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正如禁止输入或高额关税直接引起走私一样。竞争的矛盾和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是完全一样的。单个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群体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因此，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直接对立的。竞争的矛盾在于：每个人都必定希望取得垄断地位，可是群体本身却因垄断而一定遭受损失，因此一定要排除垄断。此外，竞争已经以垄断即所有权的垄断为前提——这里又暴露出自由主义者的虚伪——，而且只要所有权的垄断存在着，垄断的所有权也同样是正当的，因为垄断一经存在，它就是所有权。可见，攻击小的垄断，保留根本的垄断，这是多么可鄙的不彻底啊！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经济学家的论点，凡是无法垄断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因此，凡是不容许垄断的东西就不可能卷入这个竞争的斗争；如果我们再把经济学家的这个论点引到这里来，那么我们关于竞争以垄断为前提的论断，就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了。

———

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

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供给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达到过刚好满足需求的情况；供给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永远不相适应，因为在人类的不自觉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给究竟有多大。如果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上涨，因而供给似乎就会兴奋起来；只要市场上供给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会急剧下跌，因而需求又被激起。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而总是兴奋和松弛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一种达不到目的的永恒波动。这个规律永远起着平衡的作用，使在这里失去的又在那里获得，因而经济学家非常欣赏它。这个规律是他最大的荣誉，他简直百看不厌，甚至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条件下都对它进行观察。然而，很明显，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这是一个产生革命的规律。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向你们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①，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回答，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80年来，这些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定期来临，而且它们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参看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版第211页）。当然，这些商业革命证实了这个规律，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个规律，但不是用经济学家想使我们相信的那种方式证实的。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

①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97页。——编者注

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那么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危机的倾向了。你们有意识地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进行生产吧，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但是，只要你们继续以目前这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而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由竞争关系造成的价格永恒波动，使商业完全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至于**价值**就无须再谈了。这种似乎非常重视价值并以货币的形式把价值的抽象推崇为一种特殊存在物的制度，本身就通过竞争破坏着一切物品所固有的任何价值，而且每日每时改变着一切物品相互的价值关系。在这个漩涡中，哪里还可能有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交换呢？在这种持续地不断涨落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定**力图碰上最有利的时机进行买卖，每个人都必定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算计别人的倒霉，或利用偶然事件发财。投机者总是指望不幸事件，特别是指望歉收，他们利用一切事件，例如，当年的纽约大火灾①；而不道德的顶点还是交易所中有价证券的投机，这种投机把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类贬低为那种用来满足善于算计或伺机冒险的投机者的贪欲的手段。但

①指1835年12月16日在纽约发生的火灾。——编者注

愿诚实的、“正派的”商人不以“我感谢你上帝”等表面的虔诚形式摆脱交易所投机。这种商人和证券投机者一样可恶，他也同他们一样地投机倒把，他必须投机倒把，竞争迫使他这样做，所以他的买卖也与证券投机者的勾当一样不道德。竞争关系的真谛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种与人类相称的状态下，不会有除这种竞争之外的别的竞争。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但是，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关系，判断从合理的社会状态下能期待的生产力提高的程度，请读者参看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①并部分地参看傅立叶的著作②。

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竞争，即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的竞争等等，被归结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并且到目前为止只有傅立叶作过差强人意的说明的竞赛③，这种竞赛将随着对立利益的消除而被限制在它特有的和合理的范围内。

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

---

①约·弗·布雷《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威·汤普森《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约·瓦茨《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科学原则述评，去伪存真》1842年曼彻斯特—伦敦版。——编者注

②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和《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1829年巴黎版。——编者注

③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第175、244—245、265和434—436页。——编者注

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要是资本不最大限度地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经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要是土地的生产力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要是工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劳动，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争者。总之，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一方的这种过度紧张，其结果必然是另一方的松弛。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人们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长期以来，英国就处于这种荒诞的状况中，处于这种极不合理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波动得比较厉害——这是这种状态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经济学家从来就解释不了这种怪诞状况；为了解释这种状况，他发明了人口论[30]，这种理论和当时这种贫富矛盾同样荒谬，甚至比它更荒谬。经济学家不敢正视真理，不敢承认这种矛盾无非是竞争的结果，因为否则他的整个体系就会垮台。

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很容易解释。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按照最有才智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计算（参看**艾利生**的《人口原理》第1卷第1、2章[32]），“人口过密”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内，将使粮食生产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的需要。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让竞争自由发展，它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之中起作用。一部分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而另一部分土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3 000万英亩好地——却荒芜

着。一部分资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转，而另一部分资本却闲置在钱柜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工作14或16小时，而另一部分工人却无所事事，无活可干，活活饿死。或者，这种分立现象并不同时发生：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这时，大家都工作，资本以惊人的速度周转着，农业欣欣向荣，工人干得累倒了；而明天停滞到来，农业不值得费力去经营，大片土地荒芜，资本在正在流动的时候凝滞，工人无事可做，整个国家因财富过剩、人口过剩而备尝痛苦。

经济学家不能承认事情这样发展是对的，否则，他就得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放弃自己的全部竞争体系，就得认识到自己把生产和消费对立起来、把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对立起来是荒诞无稽的。但是，既然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为了使这种事实与理论一致，就发明了人口论。

这种学说的创始人马尔萨斯断言，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资料，一当生产增加，人口也以同样比例增加，人口固有的那种其繁衍超过可支配的生活资料的倾向，是一切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因此，在人太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或者用暴力将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饿死。可是这样做了以后，又会出现一个空隙，这个空隙又会马上被另一次繁衍的人口填满，于是，以前的贫困又开始到来。据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仅在文明的状态下，而且在自然的状态下都是如此；新荷兰[①]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个野蛮人，却也和英国一样，深受人口过剩的痛苦。简言之，要是我们愿意首尾一贯，那我们就得承认：**当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从这种阐述得出的结论是：正因为穷人是过剩人口，所以，除了尽可能减轻他们饿死的痛苦，使他们相信这是无法改变的，他们整个阶

①澳大利亚的旧称。——编者注

级的唯一出路是尽量减少生育，此外就不应该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或者，如果这样做不行，那么最好还是像“马尔库斯”所建议的那样，建立一种国家机构，用无痛苦的办法把穷人的孩子杀死；按照他的建议，每一个工人家庭只能有两个半小孩，超过此数的孩子用无痛苦的办法杀死。[33]施舍被认为是犯罪，因为这会助长过剩人口的增长；但是，把贫穷宣布为犯罪，把济贫所变为监狱——这正是英国通过“自由的”新济贫法[34]已经做的——，却算是非常有益的事情。的确，这种理论很不符合圣经关于上帝及其创造物完美无缺的教义，但是“动用圣经来反驳事实，是拙劣的反驳！”①

我是否还需要更详尽地阐述这种卑鄙无耻的学说，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诬蔑，并进一步探究其结论呢？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一切战争和垄断制度所造成的灾难，与这种理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要知道，正是这种理论构成了自由派的自由贸易体系的拱顶石，这块石头一旦坠落，整个大厦就倾倒。因为竞争在这里既然已经被证明是贫困、穷苦、犯罪的原因，那么谁还敢对竞争赞一词呢？

艾利生在上面引用过的著作中动摇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他诉诸土地的生产力，并用以下的事实来反对马尔萨斯的原理：每一个成年人能够生产出多于他本人消费所需的东西。如果不存在这一事实，人类就不可能繁衍，甚至不可能生存；否则成长中的一代依靠什么来生活呢？②可是，艾利生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因而他最后也得出了同马尔萨斯一样的结论。他虽然证明了马尔萨斯的原理是不正确的，但

①托·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109页。——编者注

②阿·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1840年爱丁堡—伦敦版第33—82页。——编者注

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提出他的原理的事实。

如果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那么他必定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从马尔萨斯写作时起①，任何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都极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这是马尔萨斯应当从总体上加以考察的事实，而对这些事实的考察必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只选出一个事实，对其他事实不予考虑，因而得出荒谬的结论。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把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有多少人能够就业，就有多少人出生，简言之，劳动力的产生迄今为止由竞争的规律来调节，因而也同样要经受周期性的危机和波动，这是事实，确定这一事实是马尔萨斯的功绩。②然而，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由于机器力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仅就其最终结果而言；而生活资料，只要生产力稍有提高，就立刻增加。这里暴露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矛盾。经济学家所说的需求不是现实的需求，他所说的消费只是人为的消费。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现实的需求者，现实的消费者。但是，如果事实是这样：每一个成年人生产的东西多于他本人所消费的东西；小孩像树木一样能够绰绰有余地偿还花在他身上的费用——难道这不是事实？——，那么就应该认为，每一个工人必定能够生产出远远多于他所需要的东西，因此，社会必定会乐意供给他所必需的一切；同时也应该认为，大家庭必定是非常值得社会向往的礼

①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1版于1798年在伦敦出版。——编者注

②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826年伦敦版第1卷第18—21页。——编者注

物。但是，由于经济学家观察问题很粗糙，除了以可触摸的现金向他支付的东西以外，他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等价物。他已深陷在自己的对立物中，以致连最令人信服的事实也像最科学的原理一样使他无动于衷。

我们干脆用扬弃矛盾的方法消灭矛盾。只要目前对立的利益能够融合，一方面的人口过剩和另一方面的财富过剩之间的对立就会消失，关于一国人民纯粹由于富裕和过剩而必定饿死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这种比一切宗教中的一切奇迹的总和更不可思议的事实就会消失，那种认为土地无力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也就会消失。这种见解是基督教经济学的顶峰，——而我们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基督教经济学，这一点我可以用任何命题和任何范畴加以证明，这个工作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做的；马尔萨斯的理论[30]只不过是关于精神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由此而来的关于二者的堕落的宗教教条在经济学上的表现。我希望也在经济学领域揭示这个对宗教来说并与宗教一起早就解决了的矛盾的虚无性。同时，如果马尔萨斯理论的辩护人事先不能用这种理论的原则向我解释，一国人民怎么能够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并使这种解释同理性和事实一致起来，那我就不会认为这种辩护是站得住脚的。

可是，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绝对必要的中转站。我们由于他的理论，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学，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我们在战胜了这种经济学上的绝望以后，就保证永远不惧怕人口过剩。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变革汲取到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完全正确，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变革，原因是只有这种变革，只有通过这种变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

对付人口过剩的最有效和最简易的办法。[1]我们由于这个理论才开始明白人类的极端堕落，才了解这种堕落依存于竞争关系；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它由此也指出竞争制度如何屠杀了并且每日还在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

然而，为了驳倒对人口过剩普遍存在的恐惧所持的根据，让我们再回过来谈生产力和人口的关系。马尔萨斯把自己的整个体系建立在下面这种计算上：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32……增加，而土地的生产力按算术级数1+2+3+4+5+6增加。[2]差额是明显的、触目惊心的，但这是否对呢？在什么地方证明过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呢？土地的扩大是受限制的。好吧。在这个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我们假定，由于增加劳动而增加的收获量，并不总是与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这时仍然还有一个第三要素，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无足轻重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与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与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仅仅一门化学，光是汉弗莱·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两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可见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与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与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地增长，而科学则与前一代人遗留的知识量成比例地发展，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而对科学来说，又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当"密西西比河流域有足够的荒地可容下欧洲

①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826年伦敦版第2卷第255—269页。——编者注

②同上，第1卷第11页。——编者注

的全部人口"①的时候，当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种了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用现在已经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谈论什么人口过剩，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这样，竞争就使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与土地占有对立起来，同样又使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力量较强的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要预卜这个斗争的结局，我们就得研究一下参加斗争的各方的力量。首先，土地占有或资本都比劳动强，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占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占有过活。其结果是：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占有所得。此外，较强的工人把较弱的工人，较大的资本把较小的资本，较大的土地占有把小土地占有从市场上排挤出去。实践证实了这个结果。大家都知道，大厂主和大商人比小厂主和小商人占优势，大土地占有者比只有一摩尔根土地的占有者占优势。其结果是：在通常情况下，按照强者的权利，大资本和大土地占有吞并小资本和小土地占有，就是说，产生了财产的集中。在商业危机和农业危机时期，这种集中就进行得更快。一般说来，大的财产比小的财产增长得更快，因为从收入中作为占有者的费用所扣除的部分要小得多。这种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与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

---

①约·瓦茨《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1842年曼彻斯特—伦敦版第21页。——编者注

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任何法律，土地占有的任何分割，资本的任何偶然的分裂，都无济于事，这个结果必定会产生，而且就会产生，除非在此之前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

作为当今经济学家主要口号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的事情。垄断至少具有使消费者不受欺骗的意图，虽然它不可能实现这种意图。消灭垄断就会为欺骗敞开大门。你们说，竞争本身是对付欺骗的办法，谁也不会去买坏的东西；照这样说来，每个人都必须是每一种商品的行家，而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垄断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也在许多商品中表现出来。药房等等**必须**实行垄断。最重要的商品即货币恰好最需要垄断。每当流通手段不再为国家所垄断的时候，这种手段就引起商业危机，因此，英国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威德博士，也认为在这里有实行垄断的必要。①但是，垄断也不能防止假币。随便你站在问题的哪一方面，一方面的困难与另一方面的困难都不相上下。垄断引起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又引起垄断；因此，二者一定都失败，而且这些困难只有在消灭了产生这二者的原则时才能消除。

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竞争是强有力的发条，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陈旧而衰退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状况活动起来，但是，它每努力一次，也就消耗掉一部分日益衰败的力量。竞争支配着人类在数量

①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152—160页。——编者注

上的增长，也支配着人类在道德上的进步。谁只要稍微熟悉一下犯罪统计，他就会注意到，犯罪行为按照特有的规律性年年增加，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有的规律性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工厂制度的扩展到处引起犯罪行为的增加。我们能够精确地预计一个大城市或者一个地区每年会发生的逮捕、刑事案件，以至凶杀、抢劫、偷窃等事件的数字，在英国就常常这样做。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证明社会产生了犯罪的**需求**，这个需求要由相应的**供给**来满足；它证明由于一些人被逮捕、放逐或处死所形成的空隙，立刻会有其他的人来填满，正如人口一有空隙立刻就会有新来的人填满一样；换句话说，它证明了犯罪威胁着惩罚手段，正如人口威胁着就业手段一样。别的且不谈，在这种情况下对罪犯的惩罚究竟公正到什么程度，我让我的读者去判断。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证明竞争也扩展到了道德领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在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前两个要素比劳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越条件，那就是科学的帮助，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连科学也是用来反对劳动的。例如，几乎一切机械发明，尤其是哈格里沃斯、克朗普顿和阿克莱的棉纺机，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力而引起的。对劳动的渴求导致发明的出现，发明大大地增加了劳动力，因而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求。1770年以来英国的历史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棉纺业中最近的重大发明——自动走锭纺纱机——就完全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引起的；这项发明使机器劳动增加了一倍，从而把手工劳动减少了一半，使一半工人失业，因而也就降低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这项发明破坏了工人对工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坚持与资本作力量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参看**尤尔博士**《工厂哲学》第

2卷①)。诚然,经济学家说,归根结底,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因为机器能够降低生产费用,因而替产品开拓新的更广大的市场,这样,机器最终还能使失业工人重新就业。这完全正确,但是,劳动力的生产是受竞争调节的;劳动力始终威胁着就业手段,因而在这些有利条件出现以前就已经有大量寻求工作的竞争者等待着,于是有利的情况形同虚构,而不利的情况,即一半工人突然被剥夺生活资料而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被降低,却决非虚构,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就忘记了呢?发明是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因而这种不利的情况将永远继续下去,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就忘记了呢?由于我们的文明,分工无止境地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只有在一定的机器上被用来做一定的细小的工作才能生存,成年工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根本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新的职业,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又忘记了呢?

考虑到机器的作用,我有了另一个比较远的题目即工厂制度;但是,现在我既不想也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个题目。不过,我希望不久能够有机会来详细地阐述这个制度的极端的不道德,并且无情地揭露经济学家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出色的那种伪善。[35]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43年
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

载于1844年2月《德法年鉴》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卷翻译

①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修订第2版第366—373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英 国 状 况

十 八 世 纪[36]

初看起来，革命的世纪并没有使英国发生多大变化便过去了。在大陆上，整个旧世界被摧毁，历时25年的战争[37]净化了空气，而在英国，一切依然风平浪静，无论是国家还是教会，都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是，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38]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在英国已经进行了七八十年，目前正在向着自己的决定性关头快步迈进。

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造成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这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可是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步，所以它仍然是片面的，还陷于矛盾之中。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

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只是在18世纪才有，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牛顿由于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物理学也正是在18世纪获得了科学性质；化学刚刚由布莱克、拉瓦锡和普利斯特列创立起来；由于地球形状的确定和人们进行的许多次只有在今天才对科学有益的旅行，地理学被提高到科学水平；同样，博物学也被布丰和林耐提高到科学水平；甚至地质学也开始逐渐地从它所陷入的荒诞假说的旋涡中挣脱出来。百科全书思想是18世纪的特征；这种思想的根据是意识到以上所有这些科学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可是这种思想还不能够使各门科学彼此沟通，所以只能够把它们简单地并列起来。在历史学方面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著作，它们固然还缺乏评介并且完全没有哲学上的分析，但毕竟不是从前那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政治学已经以人作为基础，而国民经济学[5]则由亚当·斯密进行了改造[①]。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完成过程的结果。反对基督教的抽象主体性的斗争促使18世纪的哲学走向相互对立的片面性；客体性同主体性相对立，自然同精神相对立，唯物主义同唯灵论相对立，抽象普遍、实体同抽象单一相对立。18世

---

①参看本卷第58页。——编者注

纪是与基督教精神相反的古典古代精神的复活。唯物主义和共和政体——古代世界的哲学和政治——又复活了；基督教**内部**代表古典古代原则的法国人，曾一度夺取了历史主动权。

因此，18世纪没有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历史从一开始就具有的，而且这种对立的发展贯穿于整个历史之中；但是，18世纪使对立的双方在针锋相对中得到充分发展，从而使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由于对立的这种明显的、极端的发展，结果产生了普遍的革命，这个革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将来的实现，同时就是迄今历史上的对立得到解决。德国人，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就是说英国人身上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所以比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更广泛，因此，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这一点需要更详细地加以探讨，因为各个民族所占的地位，至少是在近代所占的地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哲学中都阐述得很不充分，或者更确切些说，还根本没有加以阐述。[39]

德国、法国和英国是当代史上的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我认为这是既成的事实。德国人代表基督教唯灵论的原则，法国人代表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原则，换句话说，前者代表宗教和教会，后者代表政治和国家，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到时候就会显现出来。英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大引人注目，但对我们现在的论题是至关重要的。英吉利民族是由日耳曼语民族和罗曼语民族构成的，那时候正值这两个民族彼此刚刚分离，刚刚开始向对立的双方发展。日耳

曼成分和罗曼成分并列地发展，最后形成一种具有不调和的两个片面性的民族。日耳曼唯心主义保留有那样多自由活动的余地，它甚至能够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即转变为抽象的外在性；妻子儿女仍然可以被合法地出卖以及英国人的整个商业精神，肯定应该归之于日耳曼成分。同样，罗曼唯物主义也转变为抽象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内在性和宗教笃诚；由此就产生了日耳曼新教**内部**持续存在着罗曼天主教这种现象，产生了国教会、世俗君主的教皇权势以及使宗教拘泥于仪式这种彻头彻尾的天主教作风。英吉利民族的特征是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的合一。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信宗教的民族，同时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民族；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关心彼岸世界，可是与此同时，他们生活起来却好像此岸世界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向往天国，然而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同样坚信这个"赚不到钱的地狱"①。因此，英国人怀着持久的内心不安——一种无法解决矛盾的感觉，这种不安促使他们走出自我而行动起来。矛盾的感觉是毅力的源泉，但只是外化了的毅力的源泉，这种矛盾的感觉曾经是英国人殖民、航海、工业建设和一切大规模实践活动的源泉。无法解决矛盾这一点贯串着全部英国哲学，并促使它走向经验和怀疑论。由于培根未能用**他的**理性解决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矛盾，人们就认为理性根本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把唯心主义丢到一边，而把经验看做是唯一的拯救良方。对认识能力的批判和一般的心理倾向也正是从同一源泉产生的。英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只是在这种倾向的范围内兜圈子，在为解决矛盾而进行了一切徒劳的尝试以后，英国哲学最终宣称矛盾

①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36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04页。——编者注

是不可解决的，理性是不能胜任的，它不是求救于宗教信仰就是求救于经验。休谟的怀疑论今天仍然是英国一切非宗教的哲学推理的形式。持这种看法的人声称：我们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即使上帝存在，他也不可能和我们有任何交往；因此，我们不妨按照上帝并不存在这一假定来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我们无法知道，灵魂是否能同肉体分开，灵魂是否不死；因此，我们就按照这辈子是我们仅有的一生这个想法来生活，而不用那些超出我们的理解力的事物来折磨自己。简单地说，这种怀疑论在实践上恰好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但是，它由于无法明确作出判断，因而仍停留于形而上学的理论。——英国人身上具有推动大陆上历史发展的两种成分，因此，尽管他们同大陆的联系不很密切，可是他们仍然跟上运动的步伐，有时甚至走在运动的前面。17世纪英国革命恰恰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先声。在"长期国会"[40]里，很容易识别相当于法国制宪议会[41]、立法议会[42]和国民公会[43]的三个阶段。从立宪君主制到民主制、军事专制制度、复辟和中庸革命[44]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中也鲜明地显现出来。克伦威尔集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一身；长老派[45]相当于吉伦特派[46]，独立派[47]相当于山岳派[48]，平等派[49]相当于阿贝尔派[50]和巴贝夫派[51]。两次革命在政治上的结果都相当可怜；整个这一类似现象——本来可以描写得更详尽一些——同时也说明：宗教的革命和非宗教的革命，只要它们始终是政治性的，那么最终仍然会归结为一回事。当然，英国人只是暂时领先于大陆，慢慢地又与大陆处于同一水平了；英国的革命以中庸和两个全国性政党的建立而告终，可是法国的革命还没有结束，并且在没有达到德国哲学革命和英国社会革命应该达到的结果以前，它是不可能结束的。

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质上和德国人、法国人的民族特性都不

相同；对消除对立丧失信心因而完全听从经验，这是英国人的民族特性所固有的。纯粹的日耳曼成分固然也把自己的抽象内在性转变成抽象外在性，但是这种外在性从来没有失去它的起源的痕迹，并且始终从属于这种内在性和唯灵论。法国人也站在唯物的、经验的这一边；但是，因为这种经验直接是一种民族倾向，而不是自身分裂的民族意识的副产品，所以它通过民族的、普遍的方式起作用，并作为政治活动表现出来。德国人认定唯灵论是绝对有根据的，因此竭力在宗教方面，后来又在哲学方面阐明人类的普遍利益。法国人把唯物主义当做一种绝对有根据的东西来对抗这种唯灵论，因而把国家当做人类普遍利益的永恒形式。但是，英国人**没有**普遍利益，他们不触及矛盾这一痛处就无法谈普遍利益；他们对普遍利益不抱希望，他们只有单个利益。这种绝对的主体性——把普遍分裂为许多单一——当然导源于日耳曼成分，可是前面已经讲过，它已经和自己的根分离，因而它只是**以经验的方式**起作用，英国的社会经验和法国的政治经验的区别就在这里。法国的活动从来就是民族的活动，这种活动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和普遍性；英国的活动则是独立的、彼此并立的个人的活动，是无联系的原子的运动，这些原子很少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动，而且即使作为整体行动的时候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目前的普遍贫困和极端涣散就是个人之间缺乏统一性的表现。

换句话说，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在逐渐走向社会的历史，可是他们还没有社会的历史。在大陆，也有穷苦、贫困和社会压迫，然而这对民族的发展没有产生影

响；相反，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大陆，社会因素还完全隐藏于政治因素之下，还丝毫没有和后者分离；而在英国，政治因素已逐渐被社会因素战胜，并且为后者服务。英国的全部政治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只因为英国还没有越出国家的界限，因为政治还是英国必需的适当手段，所以社会问题才表现为政治问题。

只要国家和教会还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普遍规定性的唯一形式，就根本谈不到社会的历史。因此，古代和中世纪也表明不可能有任何的社会发展；只有宗教改革——这种还带有成见、还有点含糊的反抗中世纪的初次尝试，才引起了社会变革，才把农奴变成了“自由的”劳动者。①但是，这个变革在大陆没有那么持久的影响，其实这种变革在这里只是经过18世纪的革命才告完成。而在英国，随着宗教改革，当时所有的农奴变成了维兰、包达尔、考塔尔[52]，从而变成了享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阶级，而且，这里早在18世纪就已经发展了这一变革的结果。至于这种情况为什么只发生在英国，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古代根本不懂主体权利，它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实体性的，因此古代没有奴隶制就不可能存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观以抽象的主体性，从而以任意、内在性、唯灵论作为基本原则同古代相对抗；但是，正因为这种主体性是抽象的、片面的，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它所带来的也就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对主体的奴役。抽象的内在性变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贬低和外在化，这一新原则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奴隶制以

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85—486页。——编者注

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现；这种形式不像奴隶制那样令人厌恶，却因此而更虚伪和不合乎人性。废除封建制度，实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从**表面上**看这是消灭了农奴制，实际上只是使它变得更不合乎人性和更普遍。政治改革第一次宣布：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虽然这样一来它就否定了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它恰好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因为它把在此以前被教会所篡夺的内容归还给国家，从而给予这个在中世纪时并无内容也无意义的国家以重新发展的力量。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产生了基督教国家，这是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达到的顶点。由于利益被升格为普遍原则，这个基督教世界秩序也在另一方面达到了顶点。因为利益实质上是主体的、利己的、单个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就是日耳曼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和单一化原则的最高点。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这种单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达到的顶点。——其次，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封建奴役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①。这样一来，财产，这个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就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这个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

①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198页。——编者注

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国家只是一般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衰亡，国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灭，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人，如果正像他现在接近于要做的那样，要重新回到自身，那么通过金钱的统治而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

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灭亡的危机已经为期不远；而且，这个危机时代，虽然不能准确地从年份和量上加以预测，但可以确切地从质上加以预测：一旦废除了谷物法[53]并实行了人民宪章[54]，也就是说，一旦金钱贵族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战胜了金钱贵族，这个危机就必然到来。

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结束了中世纪，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则，建立了英国的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并使日益增长而且已经相当强大的中等阶级同贵族并列。在17世纪的动乱以后，社会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并采取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说1790年。

当时有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一个是贵族大地主，他们是这个王国仅存的和未受损害的贵族，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块出租，自己就靠地租在伦敦吃喝玩乐或到处游览。另一个是非贵族大地主或

country-gentlemen[1]（通常称为乡绅），他们住在自己的田庄里，出租土地；在租佃者和其他邻近居民的心目中，他们享有贵族的威望，但在城市里，由于他们出身低微、缺乏教养、土里土气，则得不到这种尊敬。这个阶级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过去的乡绅在邻近的农村居民中靠家长式的威信进行管辖，他们既是顾问又是公断人，统管一切，这些乡绅现在已经死光了；他们的后代自称为英国的无封号贵族，这些人就文化教养、文雅举止、奢侈挥霍以及贵族气质来讲，都足以和贵族相比，贵族也没有什么比他们优越的地方；除了占有土地这一点外，他们和自己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和粗俗的祖先毫无共同之处。——第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是自耕农，即小块土地所有者，他们自己耕种土地，耕作方法通常还是自己祖先使用的十分古老的粗放的方法；这个阶级在英国也已经消失了，社会革命剥夺了它，结果就发生了一种怪异的情况：当法国的大地产被暴力分割时，英国的小块土地却被大地产侵占和吞并。和自耕农同时存在的还有小租佃者，他们通常除种地外还从事织布；这些人在现代的英国再也找不到了；现在几乎全部土地都划分成数量不多的大庄园，并以庄园为单位出租。大租佃者的竞争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使他们穷困潦倒；于是他们就变成雇农和靠工资生活的织工，这些人大批流入城市，使城市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大起来。

农民当时十分虔诚地、安分守己地过着平静和安宁的生活，生活中没有多少操心的事，也没有什么变动，没有普遍利益，没有文化教育，没有精神劳动；他们还处在史前阶段。城市的状况也没有多大差异。只有伦敦是一个较大的商业所在地；利物浦、赫尔、布

①英国拥有土地的绅士。——编者注

里斯托尔、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格拉斯哥等地方，都还不值一提。主要的工业部门——纺织部门——大部分在农村，至少是在城外和郊区；金属制品和陶器的生产还处在手工业的发展阶段。那么，城市又能是什么样子呢？选举制度无比简单，这使市民用不着在政治上费心思，他们在名义上有的算是辉格党人[55]，有的算是托利党人[56]，但他们十分清楚，其实都是一样，反正他们没有选举权。小商人、小店主和手工业者构成了全部城市居民，他们过着大家熟悉的、对现代英国人却完全陌生的小城市的生活。矿山还很少被利用，铁、铜和锡还相当平静地埋在地下，而煤则仅供家用。简言之，英国当时所处的状况正是今天法国、特别是德国大部分地区所处的那种——够糟糕的——状况：像远古时代人似的对任何普遍利益和精神需求漠然处之，处在还没有社会、还没有生活、没有意识、没有活动的社会幼年时期。这种状况事实上是封建主义以及中世纪缺乏思想性的状况的继续，只有在出现了现代封建主义、社会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克服。前面已经谈过，我们大陆上的人们还深深地陷于这种状况中。八十年来英国人同这种状况进行了斗争，而克服这种状况已经有四十年了。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因此它们终于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的前提）、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

1760年乔治三世执政，他把自乔治一世时起几乎一直在执政的、自然是执行很保守的政策的辉格党人赶下台，开创了一直延续到

1830年的托利党人独霸的局面。这样一来，政府又名实相符了；在英国的政治保守时代，应该由保守的党派执政，这是完全合乎时宜的。从此以后，社会的运动汲取了全国的力量，遏制甚至消灭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因为以后全部国内政治只不过是隐蔽的社会主义，是各种社会问题为了能够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注意而采取的形式。

1763年格里诺克的詹姆斯·瓦特博士着手制造蒸汽机，1768年制造成功。

1763年乔赛亚·韦奇伍德采用科学原理，为英国的陶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由于他的努力，斯塔福德郡的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生产陶器的手工业区。目前这个地区共有6万人从事陶器生产，在近年的社会政治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764年兰开夏郡的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只要一个工人管理，就可以比旧式纺车多纺纱15倍。

1768年兰开夏郡普雷斯顿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发明了翼锭纺纱机，这是从一开始设计时就考虑用机械动力发动的第一部纺纱机。它纺制water-twist，即织布时作经纱用的纱线。

1776年兰开夏郡博尔顿的赛米尔·克朗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翼锭纺纱机的机械原理，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它和珍妮纺纱机一样，纺制mule-twist，即纬纱。这三种机器都是供棉花加工用的。

1787年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机械织机，这种机器又经过多次改进，到1801年才得到实际应用。

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棉纺织业的兴起。虽然珍妮纺纱机降低了纱线的生产费用，并且由于扩大了市场而给予工业以第一推动，但是，它几乎没有触及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生产的性质。只是在阿克莱和克朗

普顿的机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机建立了工厂制度以后，运动才开展起来。最初出现的是使用马力或水力的比较小的工厂，但它们很快就被使用水力或蒸汽力的比较大的工厂排挤了。第一个蒸汽纺纱厂是瓦特于1785年在诺丁汉郡建立的；随后又有另一些厂建立起来，新的制度很快就普及了。蒸汽纺纱厂，也像工业中所有其他同时期的和较晚的革新一样，异常迅速地得到推广。原棉的输入量，1770年一年还不到500万磅，后来增加到5 400万磅（1800年），1836年又增加到36 000万磅。现在，蒸汽织机得到了实际应用，给予工业进步以新的推动。所有的机器都经过无数次微小的但总起来却很有意义的改进，而每一次新的改进都给予整个工业体系的扩展以有利的影响。所有的棉纺织业部门都发生了革命。由于采用机械的助力，同时由于化学的进步使染色和漂白有了改进，印花业的水平空前提高；织袜业也卷入这个潮流。从1809年起，细棉织品、绢网、花边等开始用机器生产。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我不能通过棉纺织业史的细节来追述它的进步，只能说明一下它的成果。可是，如果把这些成果同使用纺车、手摇梳棉机、手工织机、棉花输入量仅为400万磅的已远远落后的工业比较一下，它们就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①]

1833年不列颠帝国生产了1 026 400万绞纱，其总长度在50亿英里以上，印染了35 000万码棉织品；当时有1 300家棉纺织工厂在进行生产，在工厂劳动的纺工和织工有237 000人；纱锭有900万个以上，蒸汽织机10万台，手工织机24万台，织袜机33 000台，六角网眼纱机3 500台；棉花加工机器所使用的动力为：蒸汽力——33 000马力，水力——11 000马力，直接或间接靠这一工业部门生活的有

①参看本卷第391—394页。——编者注

150万人。兰开夏郡的人完全靠棉纺织业为生，拉纳克郡的人大部分靠棉纺织业为生；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是棉纺织业辅助部门的主要所在地。自1801年以来，棉织品的输出量增加了7倍。国内本身的消费量增加得更多。

棉纺织业所得到的推动很快地传到其他工业部门。在这以前，**毛**纺织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现在它被棉花加工业取代，但是它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展。1785年，对前三年收集的羊毛还未进行加工；当纺工仍然使用他们那些简陋的纺车时，他们是无法纺完这么多羊毛的。后来人们开始用纺纱机纺羊毛，经过几次改进以后，这样做完全成功了，于是毛纺织业也同样迅速发展起来，正如我们在棉纺织业中所看到的一样。原毛的输入量从700万磅（1801年）增加到4 200万磅（1835年）；1835年有1 300家毛纺织工厂在进行生产，共有71 300名工人在工作，其中还不包括在家里劳动的大批手工织工、间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大批印花工、染色工、漂白工等等。这一工业部门的主要所在地是约克郡的西区和“英格兰西部”（特别是萨默塞特郡、威尔特郡等）。

麻纺织业的主要所在地以前是爱尔兰。第一批亚麻加工工厂是上一世纪快结束时建立起来的，确切地说，是在苏格兰建立的。但那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这种原料很难加工，需要大力改进机器。法国人日拉（1810年）第一个改进了机器，但这些改进只是在英国才发挥了实际的重要作用。用蒸汽织机来织亚麻，是更晚一些时候才实行的，从那时起，麻织品的生产尽管经受棉纺织业的竞争，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英格兰的利兹、苏格兰的邓迪和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都成了麻纺织业的中心。1814年，单是邓迪这个城市就输入

亚麻3 000吨，1834年输入19 000吨。除使用蒸汽织机织布外还保持着用手工织布的爱尔兰，1800—1825年麻织品输出量增加了2 000万码，增加的这些几乎全部运往英格兰，其中有一部分又从英格兰输出。1820—1833年不列颠帝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的麻织品的总额增加了2 700万码；1835年有347家麻纺工厂在进行生产，其中170家在苏格兰；这些工厂共有33 000名工人，人数众多的爱尔兰手工业者还没有计算在内。

丝纺织业只是从1824年起，由于取消了繁重的关税，才取得重要地位。从那时以来，生丝的输入量增加了一倍，工厂的数目增加到266个，共有3万名工人。这一工业部门的主要所在地是柴郡（麦克尔斯菲尔德、康格尔顿及其附近地区），其次是曼彻斯特，还有苏格兰的佩斯利。织带业的所在地是沃里克郡的考文垂。

由此可见，这四个纺织工业部门都全面发生了革命。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手工劳动由蒸汽动力和机器作业代替。现在一个八岁的儿童在机器的帮助下，比以前20个成年男子生产得还要多。60万名工厂工人，其中一半是儿童，而且大半是女性，做着15 000万人的工作。

但是，这只是工业变革的开始。我们已经看到，染色、印花和漂白是怎样通过纺和织的进步而发展起来，其结果又是怎样得力于力学和化学的。自从使用蒸汽机和金属滚筒印花以来，一个工人做着200人的工作。由于漂白时用氯气代替了氧气，操作时间由几个月缩减到几小时。既然工业革命对于产品在纺和织**以后**所经过的那些工序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那么它对新兴工业所需原料的影响就更要大得多了。蒸汽机第一次使绵延于英国地下的无穷尽的煤矿层具有真正的价值。许多新的煤矿开始投入生产，而原有的煤矿则加倍紧张地开采。纺

纱机和织布机的制造现在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并且达到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完善程度。机器开始由机器制造，并且因分工精细而达到的精密度和准确性成了英国机器的优点。机器制造业又影响到铁和铜的开采，虽然其主要推动力来自其他方面，但这毕竟也是瓦特和阿克莱引起的初次变革带来的结果。

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前进运动会传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门。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新产生的力量需要营养；新产生的劳动人口带来了新的生活关系和新的需求。机械生产的优越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从而使生活必需品降价，其结果是使工资普遍更低了；所有其他的产品也卖得更便宜了，这样，由于价格低廉，就争得了一个与价格低廉相称的更广阔的市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而获益一旦成为先例，一切工业部门也就渐渐仿效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随着棉纺业的革命，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如果我们不是一直都能密切注视这种运动着的力量怎样传播到工业体系中比较间接的部门，那么这只能归咎于统计材料和历史材料的不足。但是，我们到处都会看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

除纺织业外，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要算是**金属**加工业了；它的主要所在地是沃里克郡（伯明翰）和斯塔福德郡（伍尔弗汉普顿）。这里很快就采用蒸汽力为辅助力，再加上实行分工，结果使金属制品的生产费用降低四分之三。同时，从1800年到1835年输出量增加三倍。1800年输出86 000公担铁制品和同样多的铜制品，1835年输出32万公担铁制品、21万公担铜制品和黄铜制品。条铁和生铁的输出

只是在这时才占有相当的地位。1800年输出4 600吨条铁，1835年输出92 000吨条铁和14 000吨生铁。

英国的刀类制品全部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蒸汽力的采用，特别是用于磨快和磨光刀刃；炼钢，只是现在才受到重视；还有新铸钢法的发现，都在这个部门引起了彻底的革命。仅设菲尔德一个地方每年就要消耗50万吨煤和12 000吨铁，其中有1万吨铁是外国的（主要是瑞典的）。

生铁制品的使用也是在上一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只是最近几年才获得目前这样的重要地位。由于使用瓦斯照明（实际使用是从1804年开始的），就非常需要生铁管；铁路、链式吊桥以及机器等等更增加了这种需要。1780年发明了搅炼，即用高温和抽出碳素的办法把生铁变成锻铁，这就使英国的铁矿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在此以前，由于缺乏木炭，英国人所需的全部锻铁不得不从国外输入。钉子和螺丝钉先后从1790年和1810年开始用机器制造；1760年亨淤曼在设菲尔德发明了铸钢法；钢丝可用机器拉制了，整个制铁部门和制铜部门都普遍地采用了大批新的机器；手工劳动被排挤，凡是企业性质允许的地方，都建立了工厂制度。

采矿业的发展只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1788年以前，铁矿石全是用木炭来熔炼的，由于燃料不够，铁的开采受到限制。从1788年起，人们用焦炭（炼焦的煤）来代替木炭，因此六年之间铁的年开采量增加了五倍。1740年一年开采了17 000吨，1835年开采了553 000吨。1770年以来，锡矿和铜矿的开采量增加了两倍。除铁矿外，煤矿也是英国最重要的一个矿业部门。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煤的开采量的增加是无法计算的。现在，工厂、矿山使用的无数蒸汽机所消耗的大量煤炭，以及锻工炉、熔炼炉、铸造场和人数增加了一倍的居民的取暖设备所消

耗的大量煤炭，在数量上远非一百年前或八十年前所能比拟。现在，仅熔炼生铁一项，每年就要耗费300万吨以上（1吨合20公担[①]）。

建立工业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交通的改善。在上一世纪，英国的道路和其他国家的道路一样糟，而且在著名的麦克亚当把筑路归结为几条科学原理从而给文明的进步以新的推动以前，一直是这样。从1818年到182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总长1 000英里的新公路，比较窄的乡村道路不算在内，而且几乎全部旧有的道路都按照麦克亚当原理重新修建。在苏格兰，公共工程局自1803年以来建造了1 000多座桥梁；爱尔兰南方广阔的沼泽地，那里曾住着半开化、好抢劫的居民，现在已经是道路纵横交错的地方。这样一来，国内那些从前一直和整个世界隔绝的偏僻地区，现在全都有路可通了；尤其是威尔士那些讲凯尔特语的地区、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南方，不得不因此而去了解外部世界，并接受强加于它们的文明。

1755年兰开夏郡开凿了第一条值得一提的运河；1759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始动工开凿一条从沃斯利到曼彻斯特的运河。自那时以来，修建的运河总长2 200英里；此外，英国还有1 800英里可以通航的河流，其中大部分只是近来才开始加以利用。

从1807年起，蒸汽力开始用来推动船舶，英国的第一艘轮船造成（1811年）以后，又建造了600艘轮船，1835年往来于英国各个港口的轮船达550艘之多。

第一条公共铁路是1801年在萨里修建的；但只是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通车（1830年）以后，这种新的交通工具才获得重要意义。六年后，又修筑了680英里铁路并有四大干线运营：伦敦至

①德国1公担等于50公斤。——编者注

伯明翰、伦敦至布里斯托尔、伦敦至南安普敦、伯明翰至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从那时起，整个英国布满了铁路网；伦敦是九条铁路的枢纽站，曼彻斯特是五条铁路的枢纽站。①

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上面已经谈过，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

财产的统治必然要首先反对国家，瓦解国家，或者，既然财产没有国家又不行，那么至少也要挖空它的基础。与工业革命同时，亚当·斯密开始从事这种挖空基础的工作，他在1776年发表自己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而创新了财政学。全部以前的财政学都纯粹是国家的；国家经济仅仅被看做全部国家事务中的一个部门，从属于国家本身；亚当·斯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并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和目的。他把政治、党派、宗教，即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因此他认为财产是国家的本质，致富是国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威廉·葛德文(《论政治正义》1793年版)论证了共和主义的政治制度，并且与耶·边沁同时提出了功利原则[58]，因而从公共福利

①上面列举的统计材料大部分引自乔·波特所著《国家的进步》一书。波特是辉格党政府商业部的官员，因此这是官方的资料。[57]

是最高的法这一共和主义的原则得出各种合法的结论，并提出国家是祸害这一论点来攻击国家的本质。葛德文还把功利原则完全一般地理解为公民的义务，即舍弃个人的利益，只为普遍福利而生活；边沁则相反，他进一步阐释了这一原则的根本社会本性，他和当时全国的倾向相一致，把单个利益当做普遍利益的基础；边沁在人类的爱无非是开明的利己主义这一论点中承认，单个利益和普遍利益是同一的，而且还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代替了“普遍福利”，后来这个论点由他的学生穆勒进一步发展了[59]。这里，边沁在自己的经验中犯了黑格尔在理论上犯过的同样错误；他没有认真地克服二者的对立，他使主语从属于谓语，使整体从属于部分，因此把一切都颠倒了。最初他说普遍利益和单个利益是不可分的，后来他就仅止于片面地谈论赤裸裸的单个利益；他的论点只是另一个论点即关于人就是人类的论点在经验上的表现，但因为这一论点是在经验上表现出来的，所以它不是把类的权利赋予自由的、意识到自身和创造自身的人，而是赋予粗野的、盲目的、陷于矛盾的人。边沁使自由竞争成为伦理道德的实质，他根据财产的规律即物的规律，根据自然规律调整人类的关系；因此，这里是旧的、基督教的、自然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结束，即外在化的最高点，而不是那种应该由意识到自身的人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创造的新秩序的开始。边沁没有越出国家的范围，但他抽去了国家的全部内容，用社会的原则代替了政治的原则，使政治组织成为社会内容的形式，因而使矛盾达到了最高点。

民主主义党派与工业革命同时出现。1769年约·霍恩·图克创立了权利法案协会[60]，自共和国时代①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协会中重新

①指1649—1660年的共和国。——编者注

讨论民主主义原则。正如在法国一样，民主主义者全都是有哲学素养的人，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上等的和中等的阶级是同他们对立的，只有工人阶级才倾听他们的原则。他们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间发现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1794年已经相当强大，但它毕竟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不断地进行活动。从1797年到1816年间，它无声无息；在1816年到1823年的动荡年代里，它又非常活跃，但后来重又停止活动，一直到七月革命[44]。从那时起，它一直和那些老的团体并驾齐驱，并且不断在前进。这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

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1780年以前，英国的无产者很少，这是上面所描述的英国社会状况必然产生的结果。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新的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过去的例外变成了通则，而且还逐渐扩展到城市以外。小块土地的耕作被大租佃者所排斥，这样就产生了新的雇农阶级。城市人口增加了两三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采矿业的扩展同样需要大量的新工人，这些工人也是全靠自己的日工资生活的。

另一方面，中等阶级上升到了明确的贵族地位。在工业的前进运动中，厂主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的资本成倍增长，商人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份，而这次革命所创造的资本就成为英国贵族用来反对法国革命的工具。

整个前进运动的结果是：英国人现在分化成三派，即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这是英国仅有的三派，是这里唯一起作用

的动力；至于它们**怎样**起作用，我们也许将在以后的文章[①]中加以说明。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44年1月初—2月初

载于1844年8月31日、9月4、7和11日《前进报》第70、71、72和7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卷翻译

①指恩格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编者注

卡·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61]

序　言

[XXXIX]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2]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因此，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62]由于这个原因，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5]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

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①

①手稿中删去下面一段话："与此相反，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者还用'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批判的批判'、'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集的大批群众'、'代大批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这个评论家还应当首先提供证据，证明他除了神学的家务以外还有权过问**世俗的事务**。"[63]——编者注

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64]但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65]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

此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①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67]。**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得不到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68]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XL]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这是一种必然的**不彻底性**，因为即使是**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出发，或者当他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产生怀疑的时候，就怯懦地和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明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和对这种屈从的恼

---

①手稿中删去下面一句话："一些人出于狭隘的忌妒，另一些人则出于真正的愤怒，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轶文集》中的《哲学改革纲要》[66]——尽管这两部著作被悄悄地利用着——可以说策划了一个旨在**埋没**这两部著作的真正阴谋。"——编者注

恨。[①]仔细考察起来，**神学的批判**——尽管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的进步因素——归根结底不外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本身来显示哲学的消极解体，即哲学的腐烂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我将在另一个

---

①手稿中删去下面的文句："他是这样消极而无意识地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他不断反复保证他自己的批判的**纯粹性**，另一方面，为了使观察者和他自己不去注意**批判**和它的诞生地——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德国哲学——之间**必要的**辩论，不去注意现代批判必须克服它自身的局限性和自发性，他反而企图制造假象，似乎批判只同它之外的某种狭隘的批判形式——比如说，18世纪的批判形式——并同**群众**的局限性有关系。最后，当有人对他自己的哲学前提的本质有所发现——如**费尔巴哈的**发现——，批判的神学家一方面制造一种假象，似乎这些发现是**他**完成的，确切地说，他是这样制造这种假象的：他由于不能阐发这些发现的成果，就把这些成果以口号的形式抛给那些还受哲学束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善于通过下述方式使自己确信，他自己的水平甚至超过这些发现：他发觉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还缺少黑格尔**辩证法**的某些要素，这些要素还没有以经过批判的形式供他使用，这时，他自己并不试图或者也没有能力把这些要素引入正确的关系，反而以隐晦的、阴险的、怀疑的方式，搬用这些要素来反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就是说，从自身开始的实证真理这一范畴刚刚以其**特有的**形态得到确立并显现出来，他就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搬用间接证明这一范畴来加以反对。神学的批判家认为，从哲学方面应当**做出**一切，来使他能够**侈谈**纯粹性、决定性以及完全批判的批判，是十分自然的；而当他**感觉到**例如黑格尔的某一因素为费尔巴哈所缺少时——因为神学的批判家并没有超出感觉而达到意识，尽管他还对'**自我意识**'和'**精神**'抱有唯灵论的偶像崇拜——，他就以为自己是真正**克服哲学的人**。"——编者注

场合[69]加以详细的介绍。①

①手稿中删去下面一句话："相反，**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阐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编者注

笔 记 本 I

工 资

[I]**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常见的和有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因此，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这样，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和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可是，工人的劳动则必须如此。

因此，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糊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70]即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相适应的最低工资。

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么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因此，工人的存在被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工人成了

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工人的生活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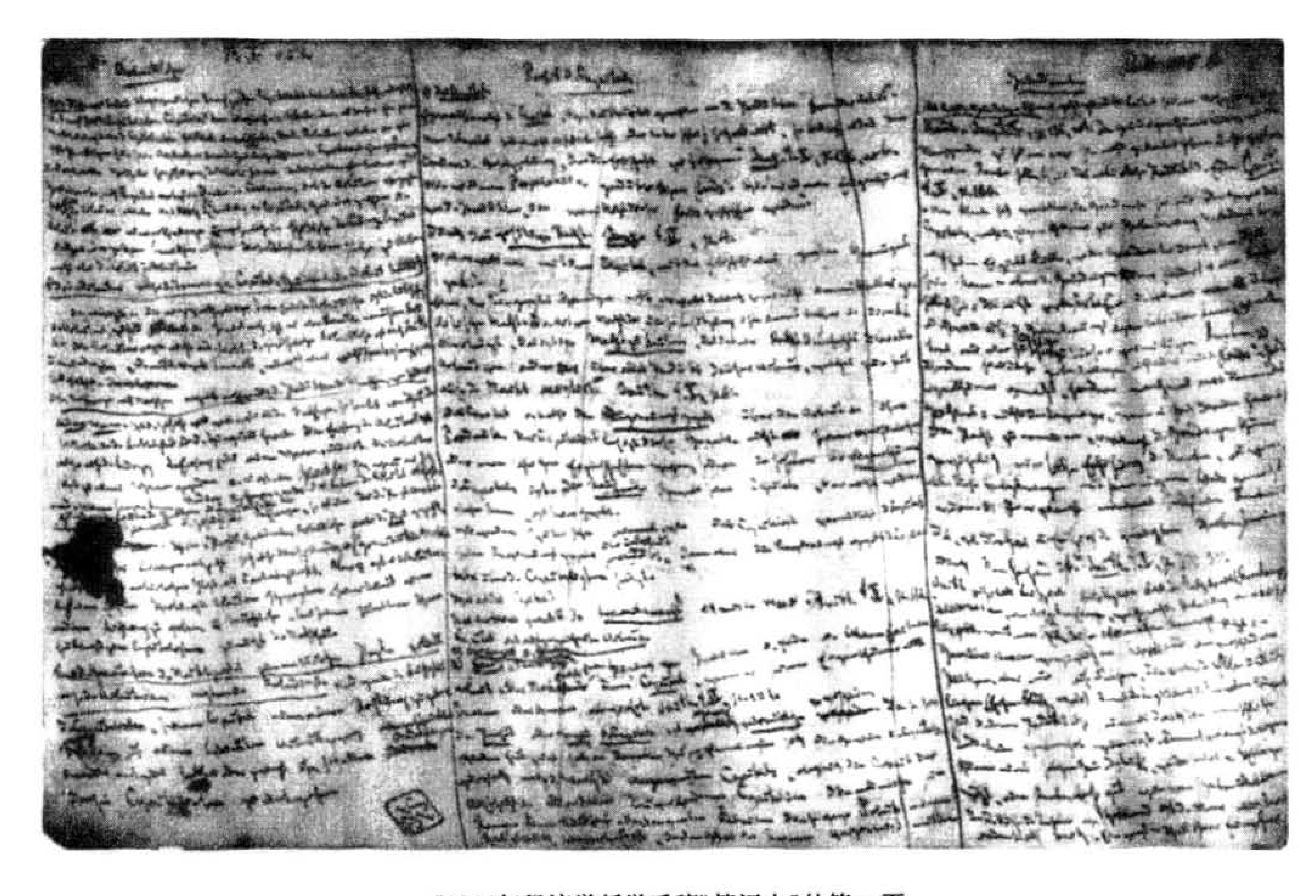
如果供给的量超过需求，那么价格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就低于**价格**而支付，结果，这些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就脱离这种使用，从而市场价格也就倾向于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但是，第一，在分工有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工人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他方面是极为困难的；第二，在工人对资本家处于从属关系的情况下，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因此，当市场价格倾向于自然价格时，工人遭到的损失是最大的而且是绝对的。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他方面的这种能力，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

[II]市场价格的偶然的和突然的波动，对地租的影响少于对分解为利润和工资的价格部分的影响；而对利润的影响又少于对工资的影响。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当某个地方工资提高时，别的地方工资保持**不变**，还有的地方工资在**降低**。

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制造业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拥有的地段的位置有利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的时候，工人也无利可得。

其次，**劳动价格要比生活资料的价格远为稳定。**二者往往成反比。在物价腾贵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而下降，因生活资料价格提高而提高。这样就互相抵消。无论如何，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没有饭吃。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提高而提高，因生活资料价格下降而下降。这样也就互相抵消。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的第一页



工人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

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劳动价格的差别，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的差别要大得多。在劳动中，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会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并且对**现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心。

总之，应当看到，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

工人不仅必须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必须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手段而斗争。

我们列举社会可能处于的三种主要状态，并且考察工人在其中的地位。

(1)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么工人遭受的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像所有者阶级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①

[III] (2)现在且以财富正在增长的社会来说。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状态。这里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但是，

首先，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缩短对整个工人阶级是一个有利状况，因为这样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对劳动的

---

①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2卷第162页。——编者注

新需求。这个阶级始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

其次，社会在什么时候才会处于财富日益增长的状态呢？那是在一个国家的资本和收入增加的时候。但是，这只有由于下述情况才可能：（α）大量劳动积累起来，因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①；就是说，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从他手中被拿走，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越来越多地积聚在资本家手中。（β）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这样，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兴致。同时，由于单靠[IV]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增加，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降低了。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

（γ）在一个富裕程度日益提高的社会中，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行业，或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商业。这样一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加剧，资本的积聚会加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会沦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则由于增加了人数，部分地又要经受工资降低之苦，同时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资本家由于人数减少，他们为争夺工人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工人由于人数增加，彼此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因此，工人等

---

①参看本卷第130页。——编者注

级中的一部分人必然沦为乞丐或陷于饿死的境地，正像一部分中等资本家必然沦为工人等级一样。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

[V]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激起资本家那样的致富欲望，但是，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且导致资本的积累，从而使劳动产品越来越作为异己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同样，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越来越有依赖性；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的竞争。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最后，正像资本的积累增加工业的数量，从而增加了工人一样，由于这种积累，同一数量的工业生产出**更大数量的制品**；于是发生生产过剩，而结果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失业，就是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极其可怜的最低限度。

这就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正在增加、增长的**状态所产生的后果。

然而说到底，这种正在增加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时工人的处境会怎样呢？

(3)“在财富已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会很低。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致工资会缩减到仅够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而国家的人口这时已达到饱和，因此这个人数不可能再增加了。”①

①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193页。——编者注

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

因此，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

[VI]但是，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社会的最富裕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遭受这种痛苦，而且国民经济学(总之，私人利益的社会)是要导致这种最富裕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是社会的**不幸**。

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还应指出，工资的提高对资本家来说，可以由劳动时间量的减少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工资的提高和资本利息的提高会像单利和复利那样影响商品的价格。

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本来，依照概念来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是属于劳动者的。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万万不能缺少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维持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

懒惰的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大都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忙碌的资本家的利润甚至两倍于货币利息，而剩余的那一部分，即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挣得的部分就只有这么多：如果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必定要饿死。

[VII]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而根据同一国民经济学，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不过是享有特权的、闲散的神仙——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唯一不变的物价；可是，再没有什么比劳动价格更具有偶然性、更容易发生剧烈波动的了。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跟随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急剧的生产衰落。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社会却总是而且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1)因为工资的提高可以由劳动时间量的减少和上述其他后果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2)因为对社会来说全部总产品就是纯产品，而区分纯产品只对私人来说才有意义。

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依照概念来说，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受到的**扣除**。但是，在现实中，工资是土地和资本让工人得到的一种扣除，是从劳动产品中让给工人、让给劳动的东西。

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的压迫

特别沉重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的一般压迫则是由于社会状况。

而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社会的最富裕状态，这个大致还是可以实现并且至少是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11]的目的的理想，对工人来说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做**工人**来考察。因此，它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从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出发，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做社会革命的目标[71]，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

[VIII]"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时间先期训练的职业，总的来说，已变得比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并很容易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仍然为数最多。因此，如果说第一类工人现在所挣得

的是50年前的七倍，而第二类工人所挣得的和50年前一样，那么二者所挣得的**平均起来**当然是以前的四倍。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从事第一类劳动的只有1 000人，而从事第二类劳动的有100万人，那么就有999 000人并不比50年前生活得好，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上涨，那么他们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坏**。而人们却想用这种肤浅的**平均计算**，在关系到居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问题上欺骗自己。此外，**工人的工资**多少只是估计**工人的收入**的因素之一，因为对衡量工人的收入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获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续性**估计进去。但是，在波动和停滞不断出现的所谓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根本谈不到这种持续性的。最后，还应注意过去和现在的通常劳动**时间**。最近25年来，也正是从棉纺织业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来，这个部门的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IX]而增加到每日12—16小时，而在到处还存在着富人无限制地剥削穷人这种公认权利的情况下，一国和一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必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他地方。”（舒尔茨《生产运动》[72]第65页）

“然而，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都增长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属实，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从而贫富间的对立也可能更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而**相对的**贫困可能增加。吃海豹油和发臭的鱼的萨莫耶德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封闭的社会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要。但是，在一个**前进着的国家**，生产总量在大约十年内与社会①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挣得的工资仍和十年前一样多，他们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收入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同上，第65、66页）

但是，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

“一个民族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会赢得这种时间。的确，今天由于有了新的动力和改进了的机器，棉纺织厂的一个工人往往可以完成早先100甚至250—350个工人的工作。在一切生产部门中都有类似的结果，因为外部自然力日益被强行用于[X]人类劳动。如果说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需要所需耗费的

①威·舒尔茨原著中写的是“人口”。——编者注

时间和人力现在比过去减少了一半，那么，与此同时，在不损害物质生活舒适的情况下，给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提供的余暇也就增加一倍…… 但是，甚至在我们从老克伦纳士自己领域中夺得的虏获物的分配方面，起决定作用的也仍然是像掷骰子游戏那样的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在法国有人计算过，在目前的生产状况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平均劳动时间为每日五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 尽管因机器改进而节省了时间，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持续时间对众多居民来说却有增无已。”（同上，第67、68页）

“从复合的手工劳动向下一阶段过渡，首先要将这种手工劳动分解为若干简单的操作。但是，最初只有**一部分**单调的重复的操作由机器来承担，而另一部分由人来承担。根据事物的本性和一致的经验，这种连续不断的单调的活动无论对于精神还是对于肉体都同样有害。因此，在机器同较大量人手之间进行的简单分工**相结合**的状况下，这种分工的一切弊病也必然要显露出来。工厂工人的死亡率较高尤其表明了这种分工的[XI]弊病…… 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同上，第69页）

“但是，在各国人民未来的生活中，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同上，第74页）

“在英国的纺纱厂中就业的只有158 818个男工，却有196 818个女工。兰开斯特郡的棉纺织厂每有100个男工就有103个女工，而在苏格兰甚至达到209个。在英国利兹的麻纺厂中每有100个男工就有147个女工；在邓迪和苏格兰东海岸甚至达到280个。在英国的丝织厂中有很多女工；在需要较强劳力的毛纺织厂中男工较多。1833年在北美的棉纺织厂中就业的，除了18 593个男工以外，至少有38 927个女工。可见，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女性有了较大的就业范围……妇女在经济上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关系方面互相接近了。”（同上，第71、72页）“1835年，在拥有蒸汽动力和水力动力的英国纺纱厂中劳动的有8—12岁的儿童20 558人，12—13岁的儿童35 867人，13—18岁的儿童108 208人…… 当然，机械的进一步改进——因为它使人手日益摆脱一切单调的工作——促使这种弊病逐渐[XII]消除。但是，资本家能够以最容易和最便宜的方式占有下层阶级以至儿童的气力，以便使用和消耗这种气力来**代替**机械手段，正是这种情况妨碍机械的迅速进步。”（舒尔茨《生产运动》第70、71页）

“布鲁姆勋爵向工人大声疾呼：‘做资本家吧。’……不幸的是，千百万人只有通过那种伤害身体、使道德和智力畸形发展的紧张劳动，才能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做是一种幸运。”（同上，第60页）

“于是，为了生活，一无所有者不得不直接地或间接地替所有者**效劳**，也就是说，依赖于他们。”（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73]第409页）

佣人——工钱；工人——工资；职员——薪金或报酬。(同上，第409、410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出借自己的劳动换取利息"，"代替别人劳动"。

"出租劳动材料"，"出借劳动材料换取利息"，"让别人代替自己劳动"。(同上[，第411页])

[XIII]"这种经济制度注定人们从事如此低贱的工作，处于如此悲惨和痛苦的境地，相比之下，野蛮状态也犹如王公的生活了。"(同上，第417、418页)

"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同上，第421页及下一页)捡破烂者。

查·劳顿在《人口等问题的解决办法》(1842年巴黎版)[74]一书中估计英国卖淫者的数目有6万—7万人。贞操可疑的妇女也有那么大的数目。(第228页)

"这些不幸的马路天使的平均寿命，从她们走上淫荡的生活道路算起，大约是6—7年。因此，要使卖淫者保持6万—7万这个数目，在联合王国每年至少要有8 000—9 000名妇女为这种淫秽的职业献身，或者说，每天大约要有24名新的牺牲者——每小时平均要有一名；如果这同一比例适用于全球，那么这类不幸妇女势必经常有150万人。"(同上，第229页)

"贫困的人口随着他们贫困的增长而增长；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下的人数不胜数，争夺着受苦受难的权利……　1821年爱尔兰的人口是6 801 827人。1831年增加到7 764 010人，就是说，在十年中间增加了14%。在最富裕的伦斯特省，人口只增加8%，而在最贫困的康诺特省，人口却增加21%(《在英格兰公布的关于爱尔兰的调查摘要》1840年维也纳版)。"(比雷《论贫困》① 第1卷第36、37页)

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做物；劳动是商品；价格高，意味着对商品的需求很大；价格低，就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很多；劳动作为商品，其价格必然日益降低；这种情况之所以必然发生，一部分是由于

①即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巴黎版。——编者注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一部分是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

"出卖劳动的工人人口，不得不满足于产品的最微小的一份…… 关于劳动是商品的理论，难道不是披着伪装的奴隶制的理论吗？"（同上，第43页）"为什么人们把劳动只看成交换价值呢？"（同上，第44页）大工场宁可购买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因为这种劳动比男子的劳动便宜。（同上）"工人在雇用他的人面前不是处于自由的卖者地位。……资本家总是自由雇用劳动，而工人总是被迫出卖劳动。如果劳动不是每时都在出卖，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完全消失。与真正的［商品］不同，劳动既不能积累，也不能储蓄。［XIV］劳动就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进行新陈代谢，就会衰弱并很快死亡。为了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也就必须容许奴隶制。"（同上，第49、50页）

可见，如果劳动是商品，那么它就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然而，甚至按照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也不是商品，因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由结果**。［同上，第50页］现在的经济制度

"同时降低了劳动的价格和劳动的报酬；它造就了工人，却贬低了人"。（同上，第52、53页）"工业成了战争，而商业成了赌博。"（同上，第62页）

单是加工棉花的机器（在英国）就相当于8 400万手工劳动者。［同上，第193页，脚注］

工业直到现在还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

"它像大征服者那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其军队的人的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比雷，同上，第20页）"这些利益〈即经济利益〉如果听之任之……就必然要互相冲突；它们除了战争再无其他仲裁者，战争的判决是使一些人失败和死亡，使另一些人获得胜利。……科学在对抗力量的这种冲突中寻求秩序和平衡：按照科学的意见，连绵不断的战争是获得和平的唯一手段，这种战争就叫做竞争。"（同上，第23页）

工业战争为了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需要有人数众多的、能由它调集到一个地点并承受巨大牺牲的军队。这种军队的士兵之所以能忍受强加在他们身

上的重担，既不是出于忠诚，也不是由于义务，而只不过为了逃避那严酷的饥饿命运。他们对自己的长官既不爱戴，也不感恩。长官对自己的部下也毫无亲善可言。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不是人，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这些日益密集的工人大众甚至没把握会经常受雇于人；把他们集合起来的工业只是在它需要他们的时候才让他们活下去；而一旦能够摆脱他们，它就毫不踌躇地抛弃他们；于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人身和力气。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时间越长，越使他们痛苦和厌恶，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就越少；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16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同上，第68、69页）

[XV]"我们确信……那些负责对手工织布工状况进行调查的专员们也会相信，大工业城市如果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健康人、新鲜的血液不断从邻近农村流入，就会在短期内失去自己的劳动人口。"（同上，第362页）

资本的利润

[I]一、资本

（1）**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尽管资本本身不归结为盗窃或诈骗，可是为了使继承神圣化，仍然需要有立法的协助。"（萨伊，第1卷第136页①）

人怎样成为生产基金的所有者？他怎样成为用这些生产基金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所有者？

根据**实在法**。（萨伊，第2卷第4页）

人们依靠资本，例如，依靠大宗财产的继承，可以得到什么？

①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编者注

> “例如，继承了大宗财产的人并不因此直接得到政治权力。这种财富直接和径直提供给他的那种权力无非是**购买的权力**，这是对一切他人劳动或者说对当时市场上存在着的他人劳动的一切产品的控制权。”（斯密，第1卷第61页①）

因此，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下面我们首先将看到，资本家怎样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力，然后将看到资本的支配权力怎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

什么是资本？

> “一定量的积蓄的和储存的劳动。”（斯密，第2卷第312页）

资本是**积蓄的劳动**。

（2）**基金**，资金，是土地产品和工业劳动产品的任何积累。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斯密，第2卷第191页）②

二、资本的利润

> “**资本的利润或赢利与工资**完全不同。二者的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尽管监督和管理的劳动在不同的资本那里可能是一样的。其次，在大工厂，这方面的全部劳动委托给一个主管人，这个主管人的薪金同由他监督如何使用的[II]资本并不保持一定的比例。尽管这里的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几乎等于零，他仍然要求利润同他的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斯密，第1卷第97—99页）

---

①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第2版。——编者注

②这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译者热·加尔涅写的脚注。——编者注

为什么资本家要求利润和资本之间保持这种比例呢?

如果资本家从出卖工人生产的产品中,除了用于补偿他预付在工资上的基金所必需的数额以外,不指望再多得一些,他就不会有**兴趣**雇用这些工人了;如果他的利润同所使用的基金的量不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斯密,第1卷第97页)

因此,资本家赚得的利润首先同工资成比例,其次同预付的原料成比例。

利润和资本的比例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确定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的通常的、平均的工资额已经很困难,那么确定资本的利润就更困难了。资本家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的变化,他的竞争者和顾客的运气好坏,商品在运输中或在仓库中可能遇到的许许多多意外事故,——这一切都造成利润天天有变动,简直是时刻有变动。(斯密,第1卷第179、180页)尽管精确地确定资本的利润是不可能的,但根据**货币利息**仍可大致有数。如果使用货币而得到的利润多,那么为使用货币而付出的利息就多;如果使用货币而得到的利润少,那么付出的利息也少。(斯密,第1卷第180、181页)通常的利息率和纯利润率之间应当保持的比例,必然随着利润的升降而变化。在英国,人们认为,双倍利息就是商人所称的**正当的**、**适度的**、**合理的利润**;这些说法无非是指**通常的和普通的利润**。(斯密,第1卷第198页)

什么是**最低的**利润率呢?什么是**最高的**利润率呢?

资本的**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足以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遇到的意外损失,必须始终**有些剩余**。只有这种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最低利息率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密,第1卷第196页)

[III]**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可能是这样的,它**吞没**大多数商品中**地租的全部**,并且使供应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工资降到**最低价格**,即仅够工人在劳动期间糊口。在工人被雇用从事劳动时,人们总得设法养活他们;地租却可以完全不付。例如,在孟加拉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的经理们。(斯密,第1卷第197、198页)

资本家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微小竞争的一切好处之外,

还能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把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之上。

首先，如果那些向市场供应商品的人离市场很远，就利用**商业秘密**；这就是说，对价格变动即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保密。这种保密的效果就是使其他资本家不致把自己的资本投到这个部门来。

其次，利用**制造业秘密**；这种秘密使资本家可以用较少的生产费用，按照与自己的竞争者同样的价格甚至比他还低的价格供应商品，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以保密来进行欺骗不是不道德吗？交易所的交易。）——**再次**，把生产限制在特定的地点（例如，名贵的葡萄酒），以致**有效的需求**永远不能得到满足。**最后**，利用个人的和公司的**垄断**。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斯密，第1卷第120—124页）

可能提高资本利润的另一些偶然的原因：

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出现甚至在富国也往往可以提高资本利润，因为它们可以从旧行业抽走一部分资本，缓和竞争，以较少的商品供应市场，从而促使这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品经营者就能够对贷款支付较高的利息。（斯密，第1卷第190页）

商品加工越多，商品越变成加工对象，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部分就比分解为地租的部分增长得越大。随着对商品加工时手工劳动的增加，不仅利润的数目增大，而且每一后来的利润总比先前的利润大，因为产生利润的资本[IV]必然越来越大。雇用织工的资本必然总是大于雇用纺工的资本，因为前一种资本不仅要补偿后一种资本及其利润，而且还要支付织工的工资，而利润必定总是同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第1卷第102、103页）

由此可见，在对自然产品加工和再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不是使工资增加，而是一方面使获利资本的数额增加，另一方面使每一笔后来的资本比先前的资本增大。

关于资本家从分工中获利，后面再讲。[①]

资本家是双重获利：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

---

①参看本卷第140—141页。——编者注

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人加进商品的份额越大，死资本的利润就越大。

在同一社会，与不同工种的工资相比，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十分接近于同一水平。（第1卷第228页）各种不同用途的资本的普通利润率随着收回资本的可靠性的大小而不同。利润率随着风险增大而提高，尽管二者并不完全成比例。（第1卷第226、227页）

不言而喻，资本利润还由于流通手段（例如，纸币）的简便或低廉而增长。

三、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

资本占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工业，投入批发商业的某一部门还是投入零售商业的某一部门，其唯一动机是对他自己的利润的考虑。至于资本的哪一种用途能推动多少**生产劳动**，[V]或者会使他的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增加多少价值，他是从来不会想到去计算的。（斯密，第2卷第400、401页）

对资本家来说，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可靠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来说并不总是最有利的。最有利的资本使用就是用于从自然生产力中取得好处。（萨伊，第2卷第130、131页）

最重要的劳动操作是按照投资者的规划和盘算来调节和指挥的。而投资者所有这些规划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润**。就是说：利润率不像地租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利润率很自然地在富国低，在穷国高，而在最迅速地走向没落的国家中最高。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不像其他两个阶级的利益那样与社会的普遍利益联系在一起……　经营某一特殊商业部门或工业部门的人的特殊利益，在某一方面总是和公众利益不同，甚至常常同它相敌对。商人的利益始终在于扩大市场和限制卖者的竞争……　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斯密，第2卷第163—165页）

四、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资本的增加使工资提高，但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又有使资本家利润减少

的趋向。(斯密,第1卷第179页)

"例如,一个城市的食品杂货业所需的资本如果分归两个不同的食品杂货商经营,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会使双方都把售价降到比一个人独力经营时便宜;如果分归20个[VI]杂货商经营,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更剧烈,而他们彼此达成一致意见来抬高他们的商品价格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小。"(斯密,第2卷第372、373页)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垄断价格是尽可能高的价格;既然资本家的利益甚至按照一般国民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同社会相敌对的;既然资本利润的提高像复利一样影响商品的价格(斯密,第1卷第201页),——那么,**竞争**就是抵制资本家的唯一手段;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论述,竞争既对工资的提高产生好影响,也对商品价格的下降产生有利于消费公众的好影响。[75]

但是,只有当资本增加而且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时候,竞争才有可能。只有通过多方面的积累才可能形成许多资本,因为资本一般只有通过积累才形成,而多方面的积累必然转化为单方面的积累。资本之间的竞争扩大各种资本的积累。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只要听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说来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我们已经听说,资本的利润同资本的量成正比。因此,即使一开始就把蓄谋的竞争完全撇开不谈,大资本也会按其量的大小相应地比小资本积累得快。

[VIII]由此可见,完全撇开竞争不谈,大资本的积累比小资本的积累快得多。不过,我们要进一步探讨这个过程。

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利润由于竞争而减少。因此,受害的首先是小资本家。

资本增长为大量的资本，是以一国财富的日益增长为前提的。

"在财富达到极高程度的国家，普通利润率非常低，从而这个利润能够支付的利息太低，以致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因此，所有中等有产者都不得不自己使用自己的资本，经营一种实业，或参与某种商业部门。"（斯密，第1卷第196、197页）

这种状态是国民经济学最喜爱的状态。

"资本总额和收入总额之间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决定着勤劳和懒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普遍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普遍懒惰。"（斯密，第2卷第325页）

在这种日益扩大的竞争中，资本使用的情况如何呢？

"随着资本的增加，生息信贷基金的数量也必然不断增长。随着这种基金的增加，货币利息会日益降低，(1)因为一切物品的市场价格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2)因为**随着一国资本的增加**，新资本要找到有利可图的用途**越来越困难**。不同资本之间就产生了竞争，一个资本的占有者千方百计夺取其他资本所占领的位置（营业）①。但是，如果他不提出更优惠的条件做交易，那么他多半不能指望把其他资本挤出所占的位置。他不仅要廉价销售物品，而且往往为了寻找销售的机会，还不得不高价收购物品。指定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越多，对劳动的需求也就越大：工人容易找到工作，[IX]而资本家却难以找到工人。资本家的竞争使工资提高，利润下降。"（斯密，第2卷第358、359页）

因此，小资本家必须作出选择：(1)由于已经不能靠利息生活而把自己的资本吃光，从而不再做资本家；或者(2)亲自经营实业，自己的货品要比更富有的资本家贱卖贵买，并且支付较高的工资；因为市场价格由于所设想的激烈竞争已经降得很低，所以小资本家就得陷

①手稿中"营业"写在"位置"的上方。——编者注

于破产。相反，大资本家要挤掉小资本家，却拥有对小资本家的一切优势，这些优势是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对工人所拥有的。对大资本家来说，较少的利润可以由他的较大量的资本来补偿；他甚至可以承受暂时的亏损，直至小资本家破产，直至他摆脱小资本家的竞争。他就是这样把小资本家的利润积累在自己手里。

其次，大资本家总是比小资本家买得便宜，因为他的进货量比较大。因此，他可以贱卖而不亏损。

但是，如果说货币利息下降会使中等资本家由食利者变为企业家，那么反过来，企业资本的增加以及因此引起的利润的减少，会造成货币利息下降。

"随着使用资本所能取得的利润减少，为使用这笔资本所能支付的价格也必然降低。"（斯密，第2卷第359页）

"财富、工业、人口越增长，货币利息，从而资本家的利润就越降低。利润尽管减少，资本本身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迅速。大资本利润虽低，但一般说来要远比利润高的小资本增长得迅速，俗语说得好：钱能生钱。"（[斯密，]第1卷第189页）

如果像在所设想的那种激烈竞争状态下发生的那样，利润低的小资本同这个大资本相对立，那么大资本会把它们完全压垮。

在这种竞争中，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无毒不有，正如在大城市中看到的，这是必然的结果。

[X]此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是大资本和小资本的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情况。

"**流动资本**是用于食品生产、制造业或商业的资本。只要它仍然为自己的主人所占有或者继续保持原状，它就不会给自己的主人带来收入或利润。它不断以一种形式用出去，再以另一种形式收回来，而且只有借助于这种流通，或者说

借助于这种连续的转化和交换，才带来利润。**固定资本**是用于改良土地，购置机器、工具、手工业器具之类物品的资本。"（斯密，第2卷第197、198页）

"固定资本维持费的任何节约都意味着纯利润的增长。任何企业家的总资本必然分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只要资本总额不变，其中一部分越小，另一部分就越大。流动资本供他购买原料、支付工资和推动工业运转。因此，固定资本的任何节约，只要不是减少劳动生产力，都会增加［推动工业运转的］基金。"（斯密，第2卷第226页）

从一开头就可以看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对大资本家要比对小资本家有利得多。最大的银行家需要的固定资本只比最小的银行家略多一点。二者的固定资本都只限于银行办公的费用。大土地占有者的生产工具决不会与他的土地面积成比例地增加。同样，大资本家所享有的比小资本家高的信用，就是固定资本即一笔必须经常准备着的货币的更大节约。最后，不言而喻，凡是工业劳动高度发展的地方，也就是几乎所有手工劳动都变成工厂劳动的地方，小资本家仅仅为了拥有必要的固定资本，哪怕把他的全部资本都投入也不够。大家知道，大规模耕作所用的劳动，通常只占用不多的劳动人手。

与较小的资本家相比，在大资本积累时，一般还发生固定资本的相应的积聚和简化。大资本家为自己[XI]采用某种对劳动工具的组织方法。

"同样，在工业领域，每个工场和工厂都已经是相当大一批物质财富为**共同的**生产目的而同多种多样的智力和技能实行的广泛结合⋯⋯ 凡是立法维护大地产的地方，日益增长的人口的过剩部分就涌向工商业，结果，正如在英国那样，大批无产者主要聚集在工业领域。而凡是立法容许土地不断分割的地方，正如在法国那样，小的和负债的所有者的数目就增加，他们由于土地进一步分割而沦为穷人和不满者的阶级。最后，当这种分割和过重的负债达到更高程度时，大地产就重新吞掉小地产，正像大工业吃掉小工业一样；而且因为较大的地产

重新形成，大批不再为土地耕作所绝对需要的一无所有的工人就又涌向工业。”（舒尔茨《生产运动》第58、59页）

“同一种商品的性质由于生产方法改变，特别是由于采用机器而发生变化。只是由于排除了人力，才有可能用一磅价值3先令8便士的棉花，纺出350束总长167英里或36德里、商业价值为25基尼的纱。”（同上，第62页）

“45年来英国的棉纺织品价格平均降低 $\frac{11}{12}$，并且据马歇尔计算，相同数量的制品，在1814年需要付16先令，而现在只用交1先令10便士。工业产品的大落价既扩大了国内消费，也扩大了国外市场；因此，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工人人数在采用机器以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4万上升到150万。[XII]至于工业企业家和工人的收入，那么由于厂主之间的竞争加剧，厂主的利润同他们供应的产品量相比必然减少。在1820—1833年期间，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在每匹印花布上所得的总利润由4先令1$\frac{1}{3}$便士减少到1先令9便士。但是，为了补偿这个损失，生产量更加增大。结果，在个别工业部门部分地出现生产过剩；破产频繁发生，在资本家和雇主的阶级**内部**造成财产的变化不定的波动和动荡，这种波动和动荡把一部分经济破产的人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同时经常的和突然的停工或缩减工作成为必然，这种不利情况总是使雇佣劳动者阶级痛感其害。”（同上，第63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就是开始自己的奴隶生活；而出租劳动材料就是确立自己的自由……　劳动是人，而劳动材料则根本不包括人。”（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第411、412页）

“材料要素如果没有别的要素即**劳动**，根本不能创造财富；材料要素获得对他们[这种材料要素的所有者]富有成果的魔力，好像他们是自己加进了这种不可缺少的要素。”（同上，第412页）

“假定一个工人的日常劳动每年给他平均带来400法郎，而这个数目足够一个成年人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那么，这等于说，一个每年拥有2 000法郎利息、地租、房租等等收入的所有者在间接地迫使5个人为他劳动；10万法郎的收入表示250人的劳动，而100万法郎则表示2 500人的劳动。”（因而，3亿法郎（路易-菲力浦）表示75万工人的劳动。）①（同上，第412、413页）

“人们制定的法律赋予所有者以使用和滥用即随心所欲地处置任何劳动材料的权利……　法律并不责成所有者始终及时地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提供工作，而且还付给他们总是够用的工资，等等。”（同上，第413页）“对生产的性质、数量、质量和适宜性的确定，对财富的使用和消费以及对一切劳动材料的支配，

---

①马克思在他收藏的康·贝魁尔这本著作第413页下边的空白处作了这一计算。——编者注

都是完全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只考虑他自己的个人利益，随意地自由交换自己的物品。"（同上，第413页）

"竞争不过是任意交换的表现，而任意交换又是使用和滥用任何生产工具的个人权利的直接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实际上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这三个经济因素——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交换的自由和无限制的竞争——引起如下的后果：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乐意的方式，在他乐意的时间和地点，生产他乐意生产的东西；他可以生产得好或坏、过多或过少、过迟或过早、过贵或过贱；没有人知道，他能否卖出去、卖给谁、如何卖、何时卖、在何处卖。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XIII]生产者既不知道需用的东西也不知道原料来源，既不知道需求也不知道供给。他在他愿意卖和能够卖的时候，在他乐意的地点，按照他乐意的价格，卖给他乐意卖的人。他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这一切方面总是偶然情况的玩物，是强者、不受折磨者、富有者所强加的法律的奴隶…… 一个地方是财富的不足，而另一个地方是财富的过剩和浪费。一个生产者卖得很多或者卖得很贵并且利润丰厚，而另一个生产者卖不出去或者亏本…… 供给不知道需求，需求不知道供给。你们根据消费者中出现的爱好和时兴进行生产；可是，当你们准备好提供这种商品的时候，他们的兴趣已经消逝，并转到另一种产品上去了…… 这一切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连续不断的和日益扩大的破产；失算，突如其来的破落和出乎意料的致富；商业危机，停业，周期性商品滞销或脱销；工资和利润的不稳定和下降；财富、时间和精力在激烈竞争的舞台上的损失或惊人的浪费。"（同上，第414—416页）

李嘉图在他的书[①]（地租）中说：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在法译本第二十六章中说：

"对于一个拥有2万法郎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 000法郎的人来说，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 000个工人，都是无关紧要的…… 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

①指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第2版第2卷。——编者注

国家的人口有1 000万还是有1 200万，它是不会关心的。"①"德·西斯蒙第先生说(第2卷第331页)：真的，只盼望国王孤零零地住在自己的岛上，不断地转动手柄〈Kurbel〉，通过自动机来完成英国的全部工作了。"②

"雇主用只够满足工人最迫切需要的低价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对于工资不足或劳动时间过长，他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自己也要服从他强加给别人的法律…… 贫困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人，不如说在于物的力量。"([比雷，]同上，第82页)

"英国许多地方的居民缺少资本来充分耕种他们的土地。苏格兰南部各郡的羊毛，因为缺少就地加工的资本，大部分不得不通过很糟糕的道路，长途运送到约克郡去加工。英国有许多小工业城市，那里的居民缺少足够的资本把他们的工业产品运往可以找到需求和消费者的遥远市场。这里的商人[XIV]只不过是住在某些大商业城市中的比较富有的商人的代理人。"(斯密，第2卷第382页)"要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价值，就只有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或者提高已被雇用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无论哪一种情况几乎总是必须增加资本。"(斯密，第2卷第338页)

"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资本的**积累**是分工的必要的先导，只有资本的积聚越来越多，分工才会越来越细。分工越细，同样数目的人所能加工的材料数量也就增加得越多；因为每个工人的任务在更大程度上逐渐简化，减轻和缩减这些任务的新机器才大量发明出来。因此，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经常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就必须预先积聚和从前同样多的生活资料，以及比从前分工不大发达时更多的材料、工具和手工业器具。在任何劳动部门，工人人数总是随着这一部门分工的发展而增长，更正确地说，正是工人人数的这种增长才使工人可能实现这种分类和细密分工。"(斯密，第2卷第193、194页)

"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资本家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本来生产数量尽可能多的产品，因此他力求在自己的工人中间实行最恰当的分工，并把尽可能好的机器供给工人使用。他为在这两方面获得成功而采取的办法，[XV]就看他

---

①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94—195页，引自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6—7页。——编者注

②指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331页，引自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6—7页。——编者注

有多少资本，或者说，要看这个资本能够雇用多少工人。因此，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工业的数量随着推动劳动的**资本的扩大**而增加，而且，同一数量的工业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也由于资本的扩大而大大增加。”（斯密，同上，第194、195页）

由此出现了**生产过剩**。

“由于在更大规模的企业中实行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生产力更广泛地联合起来。有些地方，主要的生产部门彼此之间已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大工厂主也力图购置大地产，以便他们的工业企业所需要的原料至少有一部分不必从他人手中得到；或者他们结合自己的工业企业开办商业，不仅为了销售他们自己的产品，而且也为了购买其他种类的产品并把这些产品卖给他们的工人。在英国，单个的工厂主有时拥有10 000—12 000个工人……不同生产部门在**一个**有才智者的领导之下的这种结合，这种所谓国家中的小国家或国家中的管辖地区，已经屡见不鲜。例如，伯明翰的矿主近来已把制铁的**全部**过程掌握起来，而过去这一过程是分散在许多企业家和占有者手里的。见1838年《德意志季刊》第3期《伯明翰的矿区》一文。最后，我们在目前已如此之多的大股份企业中，还看到**许多**股东的财力同另一些担任实际工作的人的科技知识和才能的广泛结合。这样一来，资本家就有可能以更纷繁多样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积蓄，甚至还可以把积蓄同时用于农业、工业和商业。因此他们的利益也就是多方面的了，[XVI]而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之间的截然对立也缓和下来并趋于消失。然而，这种用不同方式便于资本得利的可能性本身，必定会加深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舒尔茨，同上，第40、41页）

房东从贫困中取得巨额利润。房租和工业贫困成反比。

还从堕落的无产者的恶习中抽取利息。（卖淫，酗酒，抵押放债人）

当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并且资本由于数额庞大而能够把各种生产部门联合起来的时候，资本的积累日益增长，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

对人的漠不关心。斯密的二十张彩票。[76]

萨伊的纯收入和总收入。

地　　租

[I]**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萨伊,第1卷第136页,注)土地所有者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有所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产物也索取地租。(斯密,第1卷第99页)

"也许有人认为,地租不过是土地所有者用来改良土地的资本的利润……有时候,地租可能部分地是这样……但是,土地所有者(1)甚至对未经改良的土地也要求地租,而人们可能看做改良费用的利息或利润的东西,则往往是这种原始地租的附加额(追加费)①;(2)此外,这种改良并不总是用土地所有者的资金,而有时是用租地农场主的资金来进行的;虽然如此,在重订租约时,土地所有者通常要求提高地租,仿佛这种改良全是由他自己出资进行的;(3)而且,他有时甚至对那根本不能用人力来改良的东西也要求地租。"(斯密,第1卷第300、301页)

为说明后一种情况,斯密举叉明草(Seekrapp,salicorne)为例,

"这是一种海洋植物,一经燃烧便产生碱性盐,可用于制造玻璃、肥皂等等。这种植物生长在英国各地,特别是苏格兰,但只生长在潮汐〈涨潮,marée〉可及的岩石上;这些岩石每日两次被海潮淹没,因此这些岩石上的产物决不能通过人的劳动而增多。然而,生长这种植物的土地的所有者也要求地租,就像对谷田要求地租一样。设得兰群岛附近海域盛产鱼类。该群岛很大一部分居民[II]都靠捕鱼为生。但是,要从海产品获利,就必须在近海地带有住所。这里的地租不是同租地农场主可能从土地取得的东西成比例,而是同他可能从土地和海洋这两方面取得的东西的总和成比例。"(斯密,第1卷第301、302页)

"可以把地租看成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那些**自然力**的产物。

①手稿中"追加费"写在"附加额"的上方。——编者注

这种产物的多少，取决于那些自然力的大小，换句话说，取决于土地的自然肥力或人工肥力的大小。地租是扣除或抵消一切可以看做人的劳动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产物。”（斯密，第2卷第377、378页）

“这样一来，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根本不同土地所有者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成比例，也不同土地所有者为了不亏损而必须取得的数额成比例，而是同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损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数额成比例。”（斯密，第1卷第302页）

“在这三个阶级①中，土地所有者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用劳力也不用劳心，可说是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手中的，并且用不着任何洞察力和计划。”（斯密，第2卷第161页）

我们已经听说，地租的数量取决于土地**肥力**的程度。

决定地租数量的另一个因素是土地的**位置**。

“不管土地的产品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不管土地的肥力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斯密，第1卷第306页）

“如果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相等，它们的产品就同用来耕作或开发的资本大小以及[III]对这种资本的恰当使用的程度成比例。如果资本额相等而且都同样得到恰当使用，它们的产品就同土地、渔场或矿山的自然富饶程度成比例。”（[斯密，]第2卷第210页）

斯密的这些论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在生产费用和资本额相等的条件下把地租归结为土地富饶程度的大小。这就清楚地证明了国民经济学[5]颠倒概念，竟把土地富饶程度变成土地占有者的特性。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地租，看它在现实的关系中是如何形成的。

---

①手稿中是“三个生产阶级”。在马克思对亚·斯密著作的摘要中，此处是“三个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第356页。——编者注

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承认是社会组织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

"当决定租约条款时，土地所有者尽量使租地农场主所得的份额仅够补偿他用于置备种子，支付劳动报酬，购买、维持耕畜和其他生产工具的资本，此外，还使他取得该地区农场的普通利润。显然，这是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本的条件下所愿意接受的最低份额，而土地所有者是很少愿意多留一点给他的。产品或产品价格超过这一部分的余额，不论它有多大，土地所有者都力图把它作为地租攫为己有。这种地租就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额。[IV]这个余额始终可以看做自然地租，或看做大多数土地在出租时自然应该得到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299、300页）

萨伊说："土地所有者对租地农场主实行某种垄断。对他们的商品即土地的需求可能不断增长；但是他们的商品数量只能扩展到某一点……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所达成的交易，总是对前者尽可能有利……除了本应得到的好处以外，他还从自己的地位、较大的财产、信誉、声望中得到好处；但是，仅仅前一种好处就足以使他能够总是**独享**他的土地的一切有利条件。运河或道路的开辟，地区人口的增长和富裕程度的提高，总是会提高地租…… 诚然，租地农场主本人也可能自己花钱来改良土壤；但是他只能在租期内从这笔投资中得到好处；租期一满，好处就转归土地所有者了；从这时起，土地所有者虽然没有预付什么，却获取利益，因为地租相应地增加了。"（萨伊，第2卷第142、143页）

"因此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斯密，第1卷第299页）

"因此，土地地面的地租大都……占总产品的三分之一，并且大都是一种固定的、[V]不受收成意外变动的影响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351页）"这种地租很少低于总产品的四分之一。"（同上，第2卷第378页）

不可能为一切商品都支付**地租**。例如，在一些地区，就不用为石头支付地租。

"通常人们只能把这样一部分土地产品送往市场，即这种产品的普通价格

足够补偿把它们运往市场所需的资本，并能为这笔资本提供普通利润。如果普通价格超过此数，它的余额自然会归入地租。如果普通价格恰好是此数，商品虽然能够完全进入市场，但是不能给土地占有者提供地租。价格是否会超过此数呢？这取决于需求。"（斯密，第1卷第302、303页）

"地租以与工资、资本利润**不同的方式**加入**商品价格**的构成。**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商品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是这一价格的**结果**。"（斯密，第1卷第303、304页）

食物是始终提供**地租**的**产品**之一。

"因为像一切动物一样，人的繁殖自然同其生存资料相称，所以对食物总是有或大或小的需求。食物总是能够购买或多或少的[VI]劳动量，并且总是有人愿意为获得食物去做某种事情。诚然，由于有时要支付高工资，食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并不总是同食物被分配得最经济时所能维持的劳动量**相等**。但是，食物总是能够购买到它按照当地通常标准所能维持的那种劳动的劳动量。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土地生产出的食物都超出为维持有助于使食物上市而必需的全部劳动所用的数量。这食物的超出部分又始终超过那个足够补偿推动这种劳动的资本并提供利润的数量。因此，这里始终有一些余额用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斯密，第1卷第305、306页）"不仅食物是地租的原始源泉，而且，如果任何其他土地产品后来也提供地租，那么它的价值中的这个超出部分，则归因于：通过〈au moyen〉土地的耕种和改良，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力有所提高。"（斯密，第1卷第345页）"可见，人的食物总是足够支付地租的。"（第1卷第337页）"一国有多少人口，不是看这个国家的产品能够保证多少人穿衣住宿，而是看这个国家的产品能够保证多少人糊口度日。"（斯密，第1卷第342页）

"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和住宅连同取暖设备，就是人类的两大需要。这些东西大都可以带来地租，但并非必定如此。"（同上，第1卷第338[—339]页）

[VIII]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土地所有者如何榨取社会的一切利益。

（1）"地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77]（斯密，第1卷第335页）

（2）我们已经从萨伊那里听说，地租如何随着铁路等等的修建，

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日益安全和多样化而增加。

(3)“社会状况的任何改善，都有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地租、扩大土地所有者的实际财富即扩大土地所有者购买他人劳动或他人劳动产品的权力的趋势…… 土壤改良和耕作上的进步可以直接造成这种结果。土地所有者在产品中得到的那个份额，必然随着产品的增加而增加…… 这种原料实际价格的提高，例如家畜价格的提高，也可以直接地并以更大的比例提高地租。随着产品的这种实际价值的增长，不仅土地所有者所得份额的实际价值，即这一份额所赋予他的支配他人劳动的实际权力必然增长，而且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份额在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也随着这种价值增长。这种产品的实际价格提高以后，提供这种产品和补偿所使用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并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因此，现在剩下的属于土地所有者的那部分产品在总产品中的比例，将比过去大得多。”(斯密，第2卷第157—159页)

[IX]对原产品的较大需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原产品价值的提高，可能部分地是人口及其需要增长的结果。但是，每一项新的发明，工业对于过去从未利用或很少利用的原料的每一次新的采用，都提高地租。例如，随着铁路、轮船等等的出现，煤矿的地租大大提高了。

除了土地所有者从工业、各种发现和劳动中获取的这种利益以外，我们现在还会看到另一种利益。

(4)“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方法既能直接降低工业品的实际价格，也能间接提高实际地租。土地所有者用超过他个人消费的这部分原料或这部分原料的价格来交换工业品。凡是降低工业品实际价格的措施，都能提高农产品的实际价格。这时，同量原产品将相当于较多的工业品，而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数量较多的享乐品、装饰品和奢侈品。”(斯密，第2卷第159页)

但是，斯密从土地所有者榨取社会的一切利益这一事实得出[X]结论说(第2卷第161页)，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始终同社会的利益一致，这就荒谬了。根据国民经济学，在私有制的统治下，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利益同社会从个人得到的利益正好成反比，正像高利贷者靠

挥霍者得到的利益决不同挥霍者的利益相一致一样。

我们现在只是顺便提一下土地所有者针对外国地产的垄断欲，例如，谷物法[53]就来源于这种垄断欲。同样，我们在这里不谈中世纪的农奴制、殖民地的奴隶制、英国的农民（农业短工）①的贫困。让我们继续谈论国民经济学本身的原理吧。

（1）按照国民经济学的原理，土地所有者与社会的繁荣有利害关系；他与人口、工业生产的增长，与社会需要的增长，一句话，与社会财富的增长有利害关系，正如我们上面所考察的，这种增长与贫困和奴役的增长是一致的。房租上涨和贫困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是土地所有者与社会有利害关系的一个例子，因为随着房租的上涨，地租，即房基地的租金也增长。

（2）根据国民经济学家自己的看法，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租地农场主从而同社会的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敌对的。[78]

[XI]（3）因为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越少，土地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能够索取的地租就越高，因为土地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索取的地租越高，租地农场主就把工资压得越低，所以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雇农的利益是敌对的，正如工厂主的利益同他的工人的利益是敌对的一样。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也要求把工资压到最低限度。

（4）因为工业品价格的实际降低可以提高地租，所以土地占有者与工业工人工资的降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生产过剩以及工业发展所造成的一切灾难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5）由此看来，如果说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完全不一致，并且同租地农场主、雇农、工业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相敌对，那

---

①手稿中“农业短工”写在“农民”的上方。——编者注

么，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由于竞争，也决不会同另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一致。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种竞争。

大地产和小地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是与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必然引起大地产的积累和大地产对小地产的吞并。

[XII]（1）工人和劳动工具的相对数量，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地产中那样随着资金规模的增大而减少得那么多。同样，全面利用的可能性，生产费用的节约和巧妙的分工，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地产中那样随着资金规模的增大而提高得那么多。不管地块多么小，耕种这块土地所必需的劳动工具如犁、锯等等的数量少到一定限度便不能再减，而地产的面积则可以缩小，完全不受此限。

（2）大地产把租地农场主用来改良土地的那笔资本的利息用于自己的积累。小地产则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本投入这方面。因此，对小地产来说，就没有这全部利润了。

（3）每一项社会改良都对大地产有利而对小地产有害，因为这种改良总是需要小地产付出越来越多的现金。

（4）还要考察一下关于这种竞争的两个重要规律：

（α）生产人们食物的耕地的地租，调节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331页）

归根结底，只有大地产才能生产家畜之类的食物。因此，大地产调节其他土地的地租，并能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自耕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正像拥有**自己的**工具的手工业者和工厂主的关系一样。小地产简直成了劳动工具。[XVI]对小土地占有者来说，地租完全消失了，留给

他的至多只是他的资本的利息和他的工资；因为通过竞争，地租可能降低到刚好相当于并非土地占有者本人所投入的那笔资本的利息。

（β）此外，我们已经听说，如果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相等和开发程度相等，那么产品就同资本的大小成比例。因此，大土地所有者取得胜利。同样，如果资本相等，那么产品就同土地的富饶程度成比例。因此，在资本相等的条件下，拥有较富饶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取得胜利。

（γ）“一般说来，一个矿山是富饶还是贫瘠，要看用一定量的劳动从这个矿山所取得的矿物量是多于还是少于用同量劳动从其他大多数同类矿山所取得的矿物量。”（斯密，第1卷第345、346页）“最富饶的煤矿的产品价格也调节邻近其他一切煤矿的煤的价格。土地所有者和企业主二者都发现，如果他们的产品的卖价比邻矿低一些，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更多的地租，企业主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润。这时，邻矿也不得不按同一价格出卖自己的产品，虽然他们不大有可能这样做，虽然这种价格会越来越降低，有时还会使他们失去全部地租和全部利润。结果，一些煤矿就得完全放弃开采，另外一些煤矿提供不了地租，以后只能由土地所有者本人开采。”（斯密，第1卷第350页）“秘鲁银矿被发现以后，欧洲的银矿大都被废弃…… 波托西银矿被发现以后，古巴和圣多明各的银矿，甚至秘鲁的老矿，也都发生同样的情况。”（第1卷第353页）

斯密在这里关于矿山所讲的这些话，或多或少也适用于一般的地产。

（δ）“应该指出，土地的市场价格始终取决于市场利息率……如果地租大大低于货币利息，那么谁也不愿购买土地，这又会使土地的市场价格很快下跌。反之，如果地租的收益抵补货币利息而绰绰有余，那么，所有的人都愿争购土地，这同样又会使土地的市场价格很快回升。”（[斯密，]第2卷第367、368页）

从地租对货币利息的这种关系可以得出结论说，地租必然越来越降低，以致最后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地租过活。因而不出租土地

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便不断加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破产。大地产进一步集中。

[XVII]这种竞争的结果还会使一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同时也成为土地所有者，正如较小的土地所有者一般说来现在已经仅仅是资本家一样。同样，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成为工业家。

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地产买卖，地产转化为商品，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后形成。

(1)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的眼泪，我们可没有。他们总是把**土地的买卖**中的卑鄙行为同土地**私有权的买卖**中包含的那些完全合理的、在私有制范围内必然的和值得期待的后果混为一谈。首先，封建地产按其本质来说已是买卖了的土地，已是同人相异化因而以少数大领主的形态与人相对立的土地。

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农奴是土地的附属物。同样，长子继承权享有者，即长子，也属于土地。土地继承了他。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但是，在封建的土地占有制下，领主至少**在表面上**是领地的君王。同样，在封建的土地占有制下，占有者和土地之间还存在着比单纯**实物**财富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的外观。地块随它的领主而个性化，有它的爵位，随它的领主而有男爵或伯爵的封号；有它的特权、它的审判权、它的政治地位等等。土地仿佛是它的领主的无机的身体。因此，俗语说：**没有无主的土地**。这句话表明领主的权势是同土地占有结合在一起的。同样，地产的统治在这里并不直

接表现为单纯的资本的统治。属于这块地产的人们对待这块地产毋宁说就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性。

[XVIII]正像一个王国给它的国王以称号一样，封建地产也给它的领主以称号。领主的家庭史，他的家族史等等——对他来说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产个性化，使地产名正言顺地归属于他的家族，使地产人格化。同样，那些耕种他的土地的人并不处于**短工**的地位，而是一部分像农奴一样本身就是他的财产，另一部分则对他保持着尊敬、忠顺和纳贡的关系。因此，领主对他们的态度具有直接的政治性，同时又有其**温情的**一面。风尚、性格等等因地块而各不相同，并且仿佛同自己所属的小块土地是一体的，但是后来把人和地块连结在一起的便不再是人的性格、人的个性，而仅仅是人的钱袋了。最后，封建领主并不力求从自己的领地取得最大可能的收益。相反，他消费那里的东西，并且心安理得地让农奴和租地农场主设法为他提供各种消费品。这就是**贵族**对领地的关系，这种关系给领主罩上浪漫主义的灵光。

这种外观必将消失，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单纯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国民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的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被利益的联姻所代替，而土地也像人一样必然降到交易价值的水平。地产的根源，即卑鄙的自私自利，也必然以其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稳定的垄断必然变成动荡的、不稳定的垄断，变成竞争，而对他人血汗成果的坐享其成必然变为以他人血汗成果来进行的忙碌交易。最后，在这种竞争中，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因资本运动的

规律而破产或兴起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从而,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俗语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

[XIX](2)关于地产的分割或不分割的争论[79],应该指出下面一点。

地产的分割否定地产的**大垄断**,扬弃它,但只通过下述办法——使这种垄断**普遍化**。地产的分割并不消灭垄断的基础——私有制。它只触及垄断的存在形式,而不触及垄断的本质。结果,地产的分割成了私有制规律的牺牲品。因为地产的分割是适应工业领域的竞争运动的。除了工具分开和劳动相互分离(显然,应当同分工区别开来:这里不是一件工作由许多人来分担,而是大家各自从事同样的劳动,这就是无数次地重复同样的劳动)这种经济上的不利之外,这种分割也和上述的竞争一样,必然重新转化为积累。

因此,凡是进行地产分割的地方,就只能或者回到具有更加丑恶形态的垄断,或者否定(扬弃)①地产分割本身。但是,这不是回到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而是扬弃整个土地私有制。对垄断的最初扬弃总是使垄断普遍化,也就是使它的存在范围扩大。扬弃了具有最广泛的、无所不包的存在形式的垄断,才算完全消灭了垄断。联合一旦应用于土地,就享有大地产在国民经济上的好处,并第一次实现分割的原有倾向即平等。同样,联合也通过合理的方式,而不再采用以农奴制度、领主统治和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为中介的方式来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的关系,因为土地不再是牟利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个人财产。地产分割的一大优点是,一大批人不再听命于农奴制,他们将以不同于工业的方

①手稿中“扬弃”写在“否定”的上方。——编者注

式因财产而没落下去。

至于说到大地产，它的维护者总是用诡辩的方式把大农业在国民经济上的好处同大地产混为一谈，仿佛这种好处，恰恰不是通过这种财产的废除，才能一方面获得[XX]最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第一次成为社会的利益。同样，这些维护者还攻击小地产的牟利精神，仿佛大地产甚至在它的封建形式下也没有潜藏着牟利行为，更不用说现代英国的地产形式了，在那里，地主的封建主义是同租地农场主的以产业形式牟利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

地产分割指责大地产实行垄断，大地产可以把这种责难回敬给地产分割，因为地产分割也是以私有财产的垄断为基础的；同样，地产分割可以把说它分割的责难回敬给大地产，因为在大地产那里也是分割占统治地位，只不过采取不动的、冻结的形式罢了。总之，私有财产是以分割为基础的。

此外，正如地产分割要重新导致作为资本财富的大地产一样，封建的地产，不管它怎样设法挣脱，也必然要遭到分割，或者至少要落到资本家手中。

这是因为大地产，像在英国那样，把绝大多数居民推入工业的怀抱，并把它自己的工人压榨到赤贫的程度。因此，大地产把国内的贫民和全部活动都推到敌对方面，从而促使自己敌人的势力即资本、工业的势力产生和壮大。大地产把国内的大多数居民变成工业人口，从而使他们成为大地产的敌人。如果工业获得雄厚的实力，像现在英国那样，那么工业就会逐步地迫使大地产把它的垄断针对外国[①]，并

①手稿中原来写的是“针对外国的垄断”，后来马克思把“的垄断”删去。——编者注

让它投入同外国地产的竞争。因为，在工业的统治下，地产只有通过针对外国的垄断才能确保自己的封建威严，从而不受与它的封建本质相矛盾的一般商业规律支配。地产一旦卷入竞争，就要像其他任何受竞争支配的商品一样，遵循竞争的规律。它同样会动荡不定，时而缩减，时而增加，从一个人手中转入另一个人手中，任何法律都无法使它再保持在少数注定的人手中。[XXI]直接的结果就是地产分散到许多人手中，并且无论如何要服从于工业资本的权力。

最后，那种就这样靠强力维持下来并在自己身旁产生了巨大工业的大地产，要比地产分割更快地导致危机，因为在地产分割条件下工业的权力总是处于次要地位。

正如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大地产就它力求赚到尽可能多的货币而言，已经失去自己的封建性质，而具有工业的性质。它给所有者带来尽可能多的地租，而给租地农场主带来尽可能多的资本利润。结果，农业工人的工资被降到最低限度，而租地农场主阶级在地产范围内代表着工业和资本的权力。由于同外国竞争，地租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收入了。很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不得不取代租地农场主的地位，而租地农场主就有一部分以这种方式沦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有许多租地农场主也会把地产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因为有优裕收入的大土地所有者大都沉湎于挥霍，并且大多数都不适宜于领导大规模的农业，他们往往既无资本又无能力来开发土地。因此，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完全破产。最后，为了经受住新的竞争，已经降到最低限度的工资不得不进一步降低。而这就必然导致革命。

工业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以便学会信任人，同样，地产必然以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发展起来，以便

以这两种方式走向必不可免的灭亡。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XXII]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做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80]。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做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同样,竞争到处出现,对此它则用外部情况来说明。至于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国民经济学根本没有向我们讲明。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

的车轮。①

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联系，所以才把例如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经营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重新对立起来。因为竞争、经营自由、地产分割仅仅被阐述和理解为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强制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以及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以及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81] 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

我们且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82]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

①手稿中这段话下面删去一句话："我们现在必须回顾上述财产的**物质**运动的本质。"——编者注

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83]，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84]。

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间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85]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XXIII]现在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对象化**，即工人的生

产，以及对象即工人的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

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对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这前一种关系的**结果**，而且证实了这一点。对问题的这另一个方面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考察。因此，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

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是，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

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86]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第一，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是**自我异化**，而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

[XXIV]我们现在还要根据在此以前考察的**异化劳动**的两个规定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87]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①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

①手稿中“材料”写在“对象”的上方。——编者注

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88

因为，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

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

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

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

(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

关系。

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因此，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

[XXV]我们的出发点是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国民经济事实。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应该怎样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

如果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我，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

这个存在物是谁呢？

是**神**吗？确实，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建造神庙的活动等等，不仅是为供奉神而进行的，而且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但是，神从来不是劳动的唯一主宰。**自然界**也不是。况且，在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日益受自己支配的情况下，在工业奇迹使神的奇迹日益变得多余的情况下，如果人竟然为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乐趣和对产品的享受，那岂不是十分矛盾的事情。

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

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

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还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这个命题: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对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对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宰。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动看做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做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世俗人对僧侣或者世俗人对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

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工人方面考察了这一关系;下面我们还要从非工人方面来加以考察。

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宰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

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

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

(1)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89]然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因此，我们也看到，**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后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下面我们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现在还只是作出几点[XXVI]结论。[90]

强制**提高工资**（且不谈其他一切困难，不谈强制提高工资这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

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91]

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2）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

（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总以为是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关系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补入(1)　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

在这里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

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个方面，考察了**外化**劳动对**工人**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说，考察了**外化劳动对自身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一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果是**非工人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工人来说，占有表现为异化，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同劳动和工人**疏远的**人对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

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内心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

[XXVII]**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

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

[笔 记 本 II]

[私有财产的关系]

[……][XL]构成他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同样,在资本身上也客观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但是,**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条件。作为资本,工人的**价值**按照需求和供给而增长,而且,**从肉体上来说**,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作为**工人**、作为**商品**的人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对于仅仅充当工人而别无其他身份的人来说,他作为工人之所以还保留着人的种种特性,只是因为这些特性是为**异己的**资本而存在的。但是,因为资本和工人彼此是异己的,从而处于漠不关心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关系中,所以这种异己性也必定**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资本一旦想到——不管是必然地还是任意地想到——不再对工人存在,工人自己对自己来说便不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因为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才得以存在,所以他就会被埋葬,会饿死,等等。工人只有当

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他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因此，国民经济学[5]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因此，工资就与其他任何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与资本连同利息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与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可见，工资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必要**费用**之一，并且不得超出这个必要的需要。因此，英国工厂主在实行1834年的济贫法[34]以前，把工人靠济贫税得到的社会救济金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并且把这种救济金看做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生产不仅把人当做**商品**、当做**商品人**、当做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做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这种生产的产品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和**能够自主活动的商品**……**商品人**……　李嘉图、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萨伊进了一大步，他们把人的**存在**——人这种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说成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在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同样，现代[XLI]英国国民经济学[92]也合乎逻辑地进了一大步，它把**劳动**提升为国民经

济学的**唯一**原则，同时十分清楚地阐释了工资和资本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关系，指出资本家通常**只有**通过降低工资才能增加收益，反之则降低收益。它还指出，不是对消费者诈取，而是资本家和工人相互诈取，才是**正常的**关系。——

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的人的活动的生产，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来说完全异己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因而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而且没有任何**表面上的**人的关系混合在一起），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极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因此，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它指明了地租是最坏耕地的利息和最好耕地的利息之间的差额，揭示了土地所有者的浪漫主义臆想——他的所谓社会重要性和他的利益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这一点是**亚当·斯密**早就继重农学派[93]之后主张过的①；它预料到并且准备了这样一个现实的运动：使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庸的资本家，从而使对立简化和尖锐化，并加速这种对立的消除。这样一来，作为**土地**的**土地**，作为**地租**的**地租**，就失去了自己的**等级**

①见本卷第146页。——编者注

的差别，变成了毫无内涵的**资本**和**利息**，或者毋宁说，变成了只有货币内涵的**资本**和**利息**。——

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私有的**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固定**环节。同不动的地产相反，在工业等等中只表现出工业产生的方式以及工业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那个同农业的对立。这种差别只要在下述情况下就作为**特殊**种类的劳动，作为一个**本质的、重要的、包括全部生活的**差别而存在：同地产（贵族生活（封建生活）①）**相对立**，工业（城市生活）形成了，而且工业本身在垄断、公会、行会和同业公会等形式中还带有自己对立面的封建性质；而在这些形式的规定内，劳动还具有**表面上的社会**意义，**现实的**共同体的意义，还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和完全自为地存在的地步，就是说，还没有从其他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自由的**资本。[XLII]但是，获得自由的、本身自为地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工业对它的对立面的支配立即表现在作为一种真正工业的**农业**的产生上，而过去农业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地主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而这种转化最初是通过**租地农场主**这个中间环节实现的。但是，**租地农场主**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的公开的**秘密**；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才有**他的国民经济上的**存在，才有他的作为私有者的存在，——因为他的土地的地租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的竞

①手稿中"封建生活"写在"贵族生活"的上方。——编者注

争才能获得。因此,地主以**租地农场主**的身份出现,本质上已**变成普通的**资本家。而这种情况也必然在现实中发生:经营农业的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必然要成为地主,反过来也一样。租地农场主的**以产业形式牟利**就是**土地所有者**的以产业形式牟利,因为前者的存在设定后者的存在。——

但是,当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回想起自己的对立面的产生,回想起自己的来历时,土地所有者才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目空一切的、获得自由的、发了财的昔日奴隶,并且看出他对自己这个**资本家**的威胁;而资本家则知道土地所有者是自己的坐享其成的、残酷无情的(自私自利的)①昔日主人;他知道土地所有者使他这个资本家受损害,虽然土地所有者今天的整个社会地位、财产和享受都应归功于工业;资本家把土地所有者看成**自由**工业和不依赖于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资本的对立面。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极其激烈,而且各自说出对方的真相。只要看一看不动产对动产的攻击,并且反过来看一看动产对不动产的攻击,对双方的卑鄙性就会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财产的贵族渊源,夸示封建时代留下的纪念物(怀旧)②,标榜他的回忆的诗意、他的耽于幻想的气质、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而如果他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那么他就会说:**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同时,他把自己的对手描绘为狡黠诡诈的,兜售叫卖的,吹毛求疵的,坑蒙拐骗的,贪婪成性的,见钱眼开的,图谋不轨的,没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背离社会和出卖社会利益的,放高利贷的,牵线撮合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的,圆滑世故的,招摇撞骗的,冷漠

①手稿中"自私自利的"写在"残酷无情的"上方。——编者注

②手稿中"怀旧"写在"封建时代留下的纪念物"的上方。——编者注

生硬的，制造、助长和纵容竞争、赤贫和犯罪的，破坏一切社会纽带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贪财恶棍**。(见重农学派**贝尔加斯**的著作，对他，卡米耶·德穆兰在自己的杂志《法国革命和布拉班特革命》中曾经予以抨击；见芬克、兰齐措勒、哈勒、莱奥、科泽加滕的著作；[94]见爱好夸张的老年黑格尔派神学家**丰克**的著作，他满眼含泪，按照莱奥先生的说法讲述了在废除农奴制时一个奴隶如何拒绝不再充当**贵族的财产**。还可参看**尤斯图斯·默泽的《爱国主义的幻想》**，[95]这些幻想的特色是它们一刻也没有离开庸人的那种一本正经的、小市民的、"凡俗的"、**平庸的**狭隘眼界；虽然如此，它们仍然不失为**纯粹的**幻想。这个矛盾也使这些幻想如此投合德国人的口味。并见**西斯蒙第**的著作，以及其他各种文献。)

动产也显示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的嫡子；它很遗憾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对自己的本质**懵然无知的**(这个评价完全正确)，想用粗野的、不道德的暴力和农奴制来代替合乎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的蠢人；动产把这个对手描绘成一个貌似**率直坦诚、一本正经、热心公益、始终不渝**，而实际上缺乏活动能力、一味贪求享乐、只顾自己、牟求私利、居心不良的唐·吉诃德。它宣布自己的对手是诡计多端的**垄断者**；它回顾历史，以辛辣嘲讽的口气历数这个对手在浪漫的城堡里干的下流、残忍、挥霍无度、荒淫无耻、卑鄙龌龊、无法无天和大逆不道的勾当，以此来给对手的怀旧之情、诗意和幻想大泼冷水。[XLIII]动产宣称自己给人间带来了政治自由，解除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把各领域彼此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洁的道德、令人愉悦的文化教养；它使人民摒弃低俗的需要，代之以文明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而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的、只会碍事的粮食投机商——则抬高人民最必需的生活

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因此，土地所有者妨碍国民年收入的增长，阻碍资本的积累，从而减少人民就业和国家增加财富的可能性；最终使这种可能性完全消失，引起普遍的衰退，并且像高利贷一样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而没有对现代文明作丝毫贡献，甚至不放弃自己的封建偏见。最后，动产认为应当让土地所有者看一看自己的**租地农场主**——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农业和土地本身仅仅作为赐给他的财源而存在，——并且让土地所有者说说，他是不是这样一个**一本正经的、耽于幻想的、狡猾的**无赖：不管他曾怎样反对工业和商业，也不管他曾怎样絮絮叨叨地讲述历史的回忆以及伦理的和政治的目的，他其实早已在心里并且在实际上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了。动产认为，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提出的为自己申辩的一切，只有用在**耕作者**（资本家和雇农）身上才是符合事实的，而确切地说，**土地所有者**是耕作者的**敌人**；因此，土地所有者作了不利于自身的论证。动产认为，**没有**资本，地产就是死的、无价值的物质；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见保尔·路易·库利埃、圣西门、加尼耳、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和米歇尔·舍伐利埃的著作。）——

由**现实的**发展进程（这里插一句）产生的结果，是**资本家**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说，发达的私有财产必然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正如一般说来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受欲**，直认不讳的、老于世故的、孜孜不息的、精明机敏的**开明**利己主义必然战胜眼界狭隘的、一本正经的、懒散懈怠的、耽于幻想的**迷信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

那些对完成的自由工业、完成的纯洁道德和完成的博爱商业的危险多少有点预感的国家，企图阻止地产资本化，却完全白费力气。——

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同周围世界的纠结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

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中的这些成分必定经历的运动是：

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

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后来，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

[第二：]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工人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

[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资本家彻底牺牲。他沦为工人阶级，正像工人——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

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商品。

敌对性的相互对立。

[笔 记 本 III]

[对笔记本II第XXXVI页的补充]

[私有财产和劳动]

[I]补入第XXXVI页。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因此，十分明显，只有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只有这种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的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因此，按照这种在私有制范围内揭示出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96]的看法，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体系和重商主义体系的拥护者，是**拜物教徒**、**天主教徒**。因此，**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①。正像路德把**信**

①见本卷第61页。——编者注

仰看成是**宗教**的外部**世界**的本质，因而起来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像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一样，正像他把僧侣移入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设定为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在人之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也就是只应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维护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①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以前是**自身之外的存在**——人的真正外化——的东西，现在仅仅变成了外化的行为，变成了外在化。因此，如果上述国民经济学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等等开始，并由于把私有财产移入人自身的本质中而能够不再受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那么国民经济学在它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必定抛弃这种**伪善性**，而表现出自己的**十足的昔尼克主义**[97]。它也正是这样做的——它不在乎这种学说使它陷入的那一切表面上的矛盾——，它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然而它表明，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实际上是**敌视人的**；最后，它还致命地打击了私有财产和财富源泉的最后的**个别的**、

---

①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

自然的、不依赖于劳动运动的存在形式即**地租**，打击了这种已经完全成了国民经济学的东西因而对国民经济学无法反抗的封建所有制的表现。(**李嘉图**学派。)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学的**昔尼克主义**不仅相对地增长了——因为**工业**所造成的后果在后面这些人面前以更发达和更充满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但是，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因为他们使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成为主体，就是说，既使人成为本质，同时又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Unwesen]的人成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支离破碎的[II]**工业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本来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则。——

魁奈医生的重农主义学说是从重商主义体系[26]到亚当·斯密的过渡。**重农学派**[93]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解体，但正因为如此，它同样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变革**、恢复，不过它的语言这时不再是封建的，而是经济学的了。全部财富被归结为**土地和耕作**(农业)。土地还不是**资本**，它还是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应当在它的自然特殊性中并且**由于**它的这种自然特殊性而起作用。但是，土地毕竟是一种普遍的自然**要素**，而重商主义体系只知道**贵金属**是财富的存在。因此，财富的**对象**、财富的材料立即获得了**自然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普遍性，因为它们作为**自然界**仍然是直接对象性的财富。而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因而财富的主体本质已经移入劳动中。但是，农业同时是**唯一的生产的**劳动。因此，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上被理解的，它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因而，它也还是

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的。因此，劳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外化，正像劳动产品还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财富——与其说来源于劳动本身，不如说来源于自然界的财富。在这里，土地还被看做不依赖于人的自然存在，还没有被看做资本，就是说，还没有被看做劳动本身的因素。相反，劳动却表现为**土地**的因素。但是，因为这里把过去的外在的仅仅作为对象存在的财富的拜物教归结为一种极其简单的自然要素，而且已经承认——虽然只是部分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认——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所以，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人们向重农学派证明，从经济学观点即唯一合理的观点来看，**农业**同任何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毫无区别，因此，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

重农学派既然把劳动宣布为财富的**本质**，也就否定了**特殊的**、外在的、仅仅是对象性的财富。但是，在重农学派看来，劳动首先只是地产的**主体本质**（重农学派是以那种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并得到公认的财产为出发点的）；他们认为，只有地产才成为**外化的人**。他们既然把**生产**（农业）宣布为地产的**本质**，也就消除了地产的封建性质；但是，由于他们宣布**农业是唯一的**生产，他们就对工业世界持否定态度，并且承认封建制度。

十分明显，那种与地产相对立的、即作为工业而确立下来的工业的**主体本质**一旦被理解，那么这种本质同时也包含着自己的那个对立面。因为正像工业包含着已被扬弃了的地产一样，工业的**主体**本质也同时包含着**地产**的主体本质。

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而工业在历史上最初仅仅作为

财产的一个特殊种类与地产相对立——或者不如说它是地产的获得自由的奴隶——，同样，在科学地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理解**劳动**时，这一过程也在重演。而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后来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III]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

[对笔记本II第XXXIX页的补充]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补入第XXXIX页。但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98]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前进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因此，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但是，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发展了的矛盾关系、因而也就是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补入同一页。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最初，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但是劳动仍

然被看成它的本质。因此，它的存在形式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蒲鲁东。)或者，劳动的**特殊方式**，即划一的、分散的因而是不自由的劳动，被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有害性**的根源，理解为私有财产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傅立叶**，他和重农学派一样，也把**农业劳动**看成至少是**最好的**劳动，[99]而**圣西门**则相反，他把**工业劳动**本身说成本质，因此他渴望工业家**独占**统治，渴望改善工人状况。①最后，**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起先它是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的。由于这种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的，所以共产主义

(1)在它的最初的形态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100]而作为这种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共产主义是以双重的形态表现出来的：首先，**实物**财产的统治在这种共产主义面前显得如此强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在这种共产主义看来，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共同体同物的世界的关系；最后，这个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是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妇女变为**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来反对**婚姻**(它确实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公妻制**这种思想是这个还相当粗陋的和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昭然若揭的秘密**。[101]正像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一样，财富——也就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性的婚姻的关系转向它同共同体的普遍卖淫关系。这种共

①昂·圣西门的这些论点，见他的《实业家问答》1824年巴黎版。——编者注

产主义——由于它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而形成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的隐蔽形式。任何私有财产本身所产生的思想，**至少**对于比自己**更富足的**私有财产都含有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他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制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IV]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102]

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

把**妇女**当做共同淫欲的**虏获物**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因为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的**、**自然的**类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此，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

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合乎人性的**,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自然**。这种关系还表明,人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最具有个体性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

由此可见,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私有财产力图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

(2)共产主义(α)还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β)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因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

(3)**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

解答。[103]

[V]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而上述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则从个别的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历史形态中为自己寻找**历史的**证明，在现存的事物中寻找证明，它从运动中抽出个别环节（卡贝、维尔加德尔等人尤其喜欢卖弄这一套），把它们作为自己是历史的纯种的证明固定下来；但是，它这样做恰好说明：历史运动的绝大部分是同它的论断相矛盾的，如果它曾经存在过，那么它的这种**过去的**存在恰恰反驳了对**本质**的奢求。

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还是在外部世界进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欧文**）[104]，而**无神论**最初还根本不是**共产主义**；那种无神论主

要还是一个抽象。——因此，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但是，同样，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并且二者必须是这个**出发点**，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此）。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①

[VI]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决不**仅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动和直接**共同的**享受这种形式中，虽然**共同的**活动和**共同的**享受，即直接通过同别人的**实际交往**表现出来和得到确证的那种活动和享受，在社会性的上述**直接**表现以这种活动的内容的本质为根据并且

①马克思在这一页结尾标示的通栏线下面写了一句话："卖淫不过是工人**普遍**卖淫的一个**特殊**表现，因为卖淫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包括卖淫者，而且包括逼人卖淫者——后者的下流无耻尤为严重——，因此，资本家等等也包括在卖淫这一范畴中。"——编者注

符合这种享受的本性的地方都会出现。

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

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态，而在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

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

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

因此，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

可见,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

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类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

//(4)**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VII]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

//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做**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

//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在丰富性。（关于**拥有**这个范畴，见《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论文。[105]）//

//因此，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 //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

同样，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为我**自己**所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

不言而喻，**人的**眼睛与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与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

//因此，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

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VIII]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因此，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进食活动与**动物的**进食活

动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

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

//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IX]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理解为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理解为工业的一个

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如果科学从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中只知道那种可以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么人们对于这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

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编纂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做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①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②。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X]**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

①路·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第84—85页)以及《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58—70页。——编者注

②手稿中"发展的历史"写在"作准备的历史"的上方。——编者注

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因此,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激情**,从而激情在这里就成了我的本质的**活动**。——//

(5)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自身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因此,**创造**[*Schöpfung*]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对人民意识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这种存在是同实际生活的一切**明显的事实**相矛盾的。

大地创造说,受到了**地球构造学**[106]即说明地球的形成、生成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我产生的科学的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107]是对创世说[Schöpfungstheorie]的唯一实际的驳斥。

现在对单个人讲讲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的下面这句话,当然是容易的:你是你父亲和你母亲所生;这就是说,两个人的交媾即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你这个人。①这样,你看到,人的肉体的存在也要归功于人。因此,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你会进一步发问: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了他的祖父?等等。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

①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8卷第4章。有关论述还可参看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2部分第646—647页。——编者注

是主体。

但是，你会回答说：我向你承认这个循环运动，那么你也要向我承认那个无限的过程，那个过程驱使我不断追问，直到我提出问题：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

我只能对你作如下的回答：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来说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想坚持自己的抽象，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XI]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一旦你那样想，那样提问，你就会把自然界的存在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许你是个设定一切都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在的利己主义者吧？

你可能反驳我：我并不想设定自然界等等不存在；我是问你自然界的**形成过程**，正像我问解剖学家骨骼如何形成等等一样。

但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

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6)在这一部分，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特别是《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有关辩证法的叙述，以及最后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略作说明，也许是适当的。——

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对于现代的批判同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特别是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如此缺乏认识，以致像**施特劳斯**[①]和**布鲁诺·鲍威尔**这样的批判家仍然受到黑格尔逻辑学的束缚；前者是完全被束缚，后者

①大·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为我的著作〈耶稣传〉辩护和关于评述现代神学特性的论争文集》1837年蒂宾根版第1—

在自己的《符类福音作者》中（与施特劳斯相反，他在这里用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①，甚至在《基督教真相》中，至少是有可能完全地被束缚。例如，《基督教真相》一书中说：

> “自我意识设定世界、设定差别，并且在它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自身，因为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同它自身的差别，因为它只是在创造活动中和运动中才是自己本身，——这个自我意识在这个运动中似乎就没有自己的目的了”，等等。或者说：“他们（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未能看到，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能实际上成为自为的运动，从而达到同自身的统一。”②

这些说法甚至在语言上都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实际上，这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

[XII]鲍威尔在他的《自由的正义事业》一书中对格鲁培先生提出的“那么逻辑学的情况如何呢？”这一唐突的问题避而不答，却让他去问未来的批判家。[108]这表明，鲍威尔在进行批判活动（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时对于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是多么缺乏认识，而且在物质的批判活动之后也还缺乏这种认识。

但是，即使现在，在**费尔巴哈**不仅在收入《轶文集》的《纲要》中，而且更详细地在《未来哲学》中从根本上推翻了旧的辩证法和哲学之

3册；《评述和批判。神学、人类学和美学方面的轶文集》1839年莱比锡版；《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年蒂宾根—斯图加特版第1—2卷。——编者注

①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VI—XV页。——编者注

②布·鲍威尔《基督教真相》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13—115页。——编者注

后；在无法完成这一事业的上述批判反而认为这一事业已经完成，并且宣称自己是“纯粹的、坚决的、绝对的、洞察一切的批判”之后；在批判以唯灵论的狂妄自大态度把整个历史运动归结为世界的其他部分——它把这部分世界与它自身对立起来而归入“群众”这一范畴——和它自身之间的关系，并且把一切独断的对立消融于它本身的聪明和世界的愚蠢之间、批判的基督和作为“**群氓**”的人类之间的**一个**独断的对立中之后；在批判每日每时以群众的愚钝无知来证明它本身的超群出众之后；在批判终于宣称这样一天——那时整个正在堕落的人类将聚集在批判面前，由批判加以分类，而每一类人都将得到一份赤贫证明书——即将来临，即以这种形式宣告批判的**末日审判**[①]之后；在批判于报刊上宣布它既对人的感觉又对它自己独标一格地雄踞其上的世界具有优越性，而且只是不时从它那尖酸刻薄的口中发出奥林波斯山众神的哄笑声[②]之后，——在以批判的形式消逝着的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主义）做出这一切滑稽可笑的动作之后，这种唯心主义甚至一点也没想到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甚至一点也没表明它对费尔巴哈辩证法的批判态度。这是对自身持完全非批判的态度。

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

①见梅·希策尔《苏黎世通讯》（1844年《文学总汇报》第5期第12、15页）。并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第7章第1节《批判的群众》，第9章《批判的末日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编者注

②见布·鲍威尔《本省通讯》（1844年《文学总汇报》第6期第30—32页）。并见本卷第348—355页。——编者注

的那种谦虚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形成惊人的对照。

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①

(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②

(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③

费尔巴哈这样解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

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

第二，他扬弃了无限的东西，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哲学，对宗教和神学的扬弃。)

第三，他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重新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宗教和神学的恢复。④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做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

---

①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33页。——编者注

②同上，第77—84页。——编者注

③同上，第62—70页。——编者注

④同上，第33—58页。——编者注

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或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证，被认为是对自身还不能确信因而自身还受对立面影响的、对自身怀疑因而需要证明的肯定，即被认为是没有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自身的、没有被承认的[XIII]肯定；因此，感觉确定的、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是同这种肯定直接地而非间接地对立着的。

费尔巴哈还把否定的否定、具体概念看做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和作为思维而想直接成为直观、自然界、现实的思维。[109]

但是，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同现代的批判即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所描述的同一过程①的区别；或者更正确些说，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

现在看一看黑格尔的体系。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68]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

现象学。

(A)**自我意识。**

I. **意识**。(α)感觉确定性或"这一个"和**意谓**。(β)**知觉**，或具有

①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版第37—247页。——编者注

特性的事物和**幻觉**。(γ)力和知性，现象和超感觉世界。

II. **自我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a)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主人和奴隶。(b)自我意识的自由。斯多亚主义[110]，怀疑主义[111]，苦恼的意识。

III. **理性**。理性的确定性和真理性。(a)观察的理性；对自然界和自我意识的观察。(b)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身来实现。快乐和必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道。(c)自在和自为的实在的个体性。精神动物世界和欺骗，或事情本身。立法的理性。审核法律的理性。

(B)**精神**。

I. **真的**精神；伦理。II. 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养。III. 确定自身的精神，道德。

(C)宗教。**自然**宗教，**艺术宗教**，**启示**宗教。

(D)**绝对知识**。——

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112]，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像自然界对这种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来说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是作为外化的抽象思维来理解。——最

后，**精神**，这个回到自己的诞生地的思维，在它终于发现自己和肯定自己是**绝对**知识因而是绝对的即抽象的精神之前，在它获得自己的自觉的、与自身相符合的存在之前，它作为人类学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精神，总还不是自身。因为它的现实的存在是**抽象**[113]……——

黑格尔有双重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现象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　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因此，整个运动是以绝对知识结束的。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XVII]（见第XIII页）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因此，**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就是说，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动，不过是这些唯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这些唯一有意义的对立构成其他世俗对立的**含义**。在这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在同自身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在同抽象思维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被当做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

[XVIII]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实现

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因此，在《现象学》中，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尽管实际上已包含着往往早在后来发展之前就先进行的批判，黑格尔晚期著作的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解和恢复——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存在着了。**其次**，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例如，有这样一种认识：**感性**意识不是**抽象的**感性意识，而是**人的**感性意识；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了的现实，是客体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了的现实；因此，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这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品**，因此，在这个限度内，它们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可见，《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关于"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不过也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正像**本质**、**对象**表现为思想本质一样，**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或者更正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因此，在《现象学》中出现的异化的各种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正像抽象的意识**本身**——对

象就被看成这样的意识——仅仅是自我意识的一个差别环节一样，这一运动的结果也表现为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同一，即绝对知识，也就是那种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这就是说，纯思想的辩证法是结果。(下接第XXII页)

[XXII](见第XVIII页)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14]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做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

我们将以《现象学》的最后一章——绝对知识——来详细说明黑格尔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一章既包含经过概括的《现象学》的精神，包含《现象学》同思辨的辩证法的关系，也包含黑格尔对这二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

且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115]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因此，同以往的哲学相反，他能把哲学的各个环节

加以总括，并称自己的哲学才是**哲学**。至于其他哲学家做过的事情——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做自我意识的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黑格尔**认为**那只是哲学的**行动**。因此，他的科学是绝对的。

现在让我们转向我们的本题。

绝对知识。《现象学》的最后一章。[116]

主要之点就在于：**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设定人＝自我意识。）

因此，需要克服**意识的对象**。**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了的**、同**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因此，**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内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就是说，因此，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

黑格尔对**克服意识的对象**的运动作了如下的描述：

对象不仅表现为向**自我**[das *Selbst*]**复归**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这是对这一运动的**片面的**即只抓住了一个方面的理解）。设定人＝自我。但是，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是**自我的[selbstisch]。人的眼睛、人的耳朵等等都是**自我的**；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在人身上都具有**自我性**[*Selbstigkeit*]这种特性。但是，正因为这样，说**自我意识**具有眼睛、耳朵、本质力量，就完全错了。毋宁说，**自我意识**是人的自然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并非人的自然是[XXIV]**自我意识**的质。①

①参看马克思《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绝对知识〉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66—367页）。——编者注

本身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被提升到自己的纯粹抽象、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下文还要谈到这一点。)

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做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相反，**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做**现象学**。因此，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全部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象向自我的复归就是对对象的重新占有。——

意识的对象的克服可**全面**表述如下：

(1)对象本身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的东西；

(2)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

(3)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

(4)它不仅**对我们**有这种意义或者说自在地有这种意义，而且**对它本身**也有这种意义；

(5)对象的否定，或对象的自我扬弃，**对意识**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或者说，它所以**知道**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是由于它把自身外化了，因为它在这种外化中把**自身**设定为对象，或者说，为了**自为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把对象设定为自身；

(6)另一方面，这里同时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因此，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

(7)这就是意识的运动,因而也是意识的各个环节的总体;

(8)意识必须依据对象的各个规定的总体来对待对象,同样也必须依据这个总体的每一个规定来把握对象。对象的各个规定的这种总体使对象**自在地**成为**精神的本质**,而对意识来说,对象所以真正成为**精神的本质**,是由于把这个总体的每一个别的规定理解为**自我**的规定,或者说,是由于对这些规定采取了上述的**精神的**态度。①

补入(1)。所谓对象本身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的东西,就是上面提到的**对象向自我的复归**。

补入(2)。**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因为人=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外化的、对象性的本质即**物性**(**对他来说**是**对象**的**那个东西**,而且只有对他来说是本质的对象并因而是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那个东西,才是他的真正的对象。既然被当做主体的不是**现实的人**本身,因而也不是**自然**——人是**人的自然**——而只是人的抽象,即自我意识,所以物性只能是外化的自我意识)=**外化的自我意识**,而**物性**是由这种外化设定的。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它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而它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却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东西。相反的情况倒是神秘莫测的。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XXVI]②此外还很

①上述有关"意识的对象的克服"这八点说明,几乎逐字逐句摘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绝对知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66—367页。——编者注

②马克思在手稿的页码中漏编了第XXV页。——编者注

明显的是：物性因此对自我意识来说决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的东西**，而只是纯粹的创造物，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这个被设定的东西并不证实自己，而只是证实设定这一行动，这一行动在一瞬间把自己的能力作为产物固定下来，使它**表面上**具有独立的、现实的本质的作用——但仍然只是一瞬间。

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117]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18]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119]、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

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又说，在这个东西自身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自身对于第三者来说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此，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使自身解除饥饿，它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使我的身体得以充实并使本质得以表现所不可缺少的。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

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XXVII]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

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唯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因为，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独自**存在着，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他物**、**另一个现实**。因此，对这个第三对象来说，我是和它不同的**另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是**它的**对象。这样，一个存在物如果不是另一个存在物的对象，那么就要以没有**任何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存在为前提。只要我有一

个对象，这个对象就以我作为对象。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也就是说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

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 //因此，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

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回过来谈。)

第三，因为物性的这种设定本身不过是一种外观，一种与纯粹活动的本质相矛盾的行为，所以这种设定也必然重新被扬弃，物性必然被否定。

补入(3)、(4)、(5)、(6)。(3)意识的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也有**肯定的**意义。(4)它不仅**对我们**有这种肯定的意义或者说自在地有这种肯定的意义，而且对它即意识本身也有这种肯定的意义。(5)对象的否定，或对象的自我扬弃，**对意识**所以有**肯定的**意

义，或者说，它所以**知道**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是由于它把**自身**外化了，因为意识在这种外化中**知道**自身是对象，或者说，由于**自为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知道对象是它自身。(6)另一方面，这里同时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因此，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被异化的对象性本质的占有，或在**异化**——它必然从漠不关心的异己性发展到现实的、敌对的异化——这个规定内对于对象性的扬弃，在黑格尔看来，同时或甚至主要地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因为并不是对象的**一定的**性质，而是它的**对象性的**性质本身，对自我意识来说是一种障碍和异化。因此，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的东西，是一种**虚无性**。对象的这种虚无性对意识来说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因为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正是它自身的非对象性的即[XXVIII]**抽象**的**自我确证**。对于**意识本身**来说，对象的虚无性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是因为意识**知道**这种虚无性、这种对象性本质是它自己的**自我外化**，知道这种虚无性只是由于它的自我外化才存在……　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行动。因此，只要意识**知道某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对意识来说就生成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意识所以知道对象的虚无性，就是说，意识所以知道对象同它之间的差别的非存在，对象对它来说是非存在，是因为意识知道对象是它的**自我外化**，就是说，意识所以知道自己——作为对象的知识——，是因为对象只是对象的**外观**、障眼的云雾，而就它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知识本身，知识把自己同自身对立起来，从而把某种**虚无性**，即在知识之外没有**任何**对象性的某种东西同自身对立起来；或者说，知识知道，当它与某个对象发生关系时，它只

是**在**自身**之外**,使自身外化;它知道**它本身**只**表现为**对象,或者说,对它来说表现为对象的那个东西仅仅是它本身。

另一方面,黑格尔说,这里同时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因此,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

这段议论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

第一,意识、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因此,自我意识——或者,如果我们在这里撇开黑格尔的抽象而设定人的自我意识来代替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

这里首先包含着:意识——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冒充为它自身的**他物**,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思维。(费尔巴哈。)[①]这里所以包含着这一方面,是因为仅仅作为意识的意识所碰到的障碍不是异化了的对象性,而是**对象性本身**。

第二,这里包含着:因为有自我意识的人认为精神世界——或人的世界在精神上的普遍存在——是自我外化并加以扬弃,所以他仍然重新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充为自己的真正的存在,恢复这个世界,假称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因此,在扬弃例如宗教之后,在承认宗教是自我外化的产物之后,他仍然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或神学的设定、否定和恢复,然而这应当以更一般

---

①路·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55页第30条称"黑格尔是一位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思想家"。——编者注

的形式来表述。①因此，理性在作为非理性的非理性中就是在自身。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因此，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

因此，现在不用再谈关于黑格尔对宗教、国家等等的适应了，因为这种谎言是他的原则的谎言。

[XXIX]如果我**知道**宗教是**外化的**人的自我意识，那么我也就知道，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得到确证的不是我的自我意识，而是我的外化的自我意识。这就是说，我知道我的属于自身的、属于我的本质的自我意识，不是在**宗教**中，倒是在**被消灭**、**被扬弃的**宗教中得到确证的。

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证真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证假本质或同自身相异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否定的否定是否定作为在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本质，并使它转化为主体。

因此，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

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法**＝**道德**，扬弃了的道德＝**家庭**，扬弃了的家庭＝**市民社会**[11]，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世界历史**。[120]在**现实**中，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环节**，变成人的存在和存在

①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34—42页。——编者注

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运动的环节**。

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因此，我的真正的宗教存在是我的**宗教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政治存在是我的**法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自然存在是**自然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艺术存在是**艺术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我的**哲学的**存在。同样，宗教、国家、自然界、艺术的真正存在＝宗教**哲学**、自然**哲学**、国家**哲学**、艺术**哲学**。但是，如果只有宗教哲学等等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宗教存在，那么我也就只有作为**宗教哲学家**才算是真正信教的，而这样一来，我就否定了**现实的**宗教信仰和现实的**信教的**人。但是，我同时**确证了**它们：一方面，是在我自己的存在中或在我使之与它们相对立的那个异己的存在中，因为异己的存在仅仅**是**它们的**哲学的**表现；另一方面，则是在它们自己的最初形式中，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不过是**虚假的**异在、比喻，是隐蔽在感性外壳下面的它们自己的真正存在即我的**哲学的**存在的形式。

同样地，扬弃了的**质**＝**量**，扬弃了的量＝**度**，扬弃了的度＝**本质**，扬弃了的本质＝**现象**，扬弃了的现象＝**现实**，扬弃了的现实＝**概念**，扬弃了的概念＝**客观性**，扬弃了的客观性＝**绝对观念**，扬弃了的绝对观念＝**自然界**，扬弃了的自然界＝**主观精神**，扬弃了的主观精神＝**伦理的**客观精神，扬弃了的伦理精神＝**艺术**，扬弃了的艺术＝**宗教**，扬弃了的宗教＝**绝对知识**。[121]

一方面，这种扬弃是对思想上的本质的扬弃，就是说，**思想上的**私有财产在道德的**思想**中进行自我扬弃。而且因为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

也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因为对象对于思维来说现在已成为一个思维环节，所以对象在自己的现实中也被思维看做思维本身的即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

[XXX]因此，从一方面来说，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本身，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因此，从一方面来说，黑格尔既同**现实的**本质相对立，也同直接的、非哲学的**科学**或这种本质的非哲学的**概念**相对立。因此，黑格尔是同它们的通用的概念相矛盾的。

另一方面，信奉宗教等等的人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自己的最后的确证。

现在应该考察——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

//(a)**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这是在异化之内表现出来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这是异化的见解，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对这种中介的扬弃——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

然而，无神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恰恰相反，无神论、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或者说，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

这样，因为黑格尔理解到——尽管又是通过异化的方式——有关自身的否定具有的**积极**意义，所以同时也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简单地说，他——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

(b)但是，撇开上述的颠倒说法不谈，或者更正确地说，作为上述颠倒说法的结果，在黑格尔那里，这种行动，第一，**仅仅是形式的**，因为它是抽象的，因为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做**抽象的、思维着的本质**，即自我意识；而

第二，因为这种观点是**形式的**和**抽象的**，所以外化的扬弃成为外化的确证，或者说，在黑格尔看来，**自我产生**、**自我对象化**的运动，作为**自我外化和自我异化**的运动，是**绝对的**因而也是最后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安于自身的、达到自己本质的**人的生命表现**。因此，这个运动在其抽象[XXXI]形式上，作为辩证法，被看成**真正人的生命**；而因为它毕竟是人的生命的抽象、异化，所以它被看成**神性的过程**，然而是人的神性的过程，——人的与自身有区别的、抽象的、纯粹的、绝对的本质本身所经历的过程。

第三，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只作为结果出

现；因此，这个结果，即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神**，**绝对精神**，就是**知道自己并且实现自己的观念**。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122]

关于第一：对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或自我对象化的行动的**形式的**和**抽象的**理解。

因为黑格尔设定人＝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异化了的对象、人的异化了的本质现实性，无非就是**意识**，就是异化的思想，就是异化的**抽象的**因而无内容的和非现实的表现，即**否定**。因此，外化的扬弃也不外是对这种无内容的抽象进行抽象的、无内容的扬弃，即**否定的否定**。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就成为这种活动的纯粹抽象，成为**绝对的否定性**，而这种抽象又作为抽象固定下来，并且被想象为独立的活动，或者干脆被想象为活动。因为这种所谓否定性无非是上述现实的、活生生的行动的**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所以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去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下文我们将阐明绝对的否定性的**逻辑**内容。）

黑格尔在这里——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普遍异化的

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把它们联贯起来了。例如，扬弃了的存在是本质，扬弃了的本质是概念，扬弃了的概念……是绝对观念。[123]然而，绝对观念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绝对观念不想再去从头经历全部抽象行动，不想再满足于充当种种抽象的总体或充当理解自我的抽象，那么绝对观念也要再一次扬弃自身。但是，把自我理解为抽象的抽象，知道自己是无；它必须放弃自身，放弃抽象，从而达到那恰恰是它的对立面的本质，达到**自然界**。因此，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XXXII]绝对观念、**抽象**观念，

> "从它与自身统一这一方面来**考察**就是**直观**"（黑格尔《全书》第3版第222页），它"在自己的绝对真理中**决心**把自己的特殊性这一环节，或最初的规定和异在这一环节，即作为自己的反映的**直接观念**，**从自身**释放出去，就是说，把自身作为**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同上），

举止如此奇妙而怪诞、使黑格尔分子伤透了脑筋的这整个观念，无非始终是**抽象**，即抽象思维者，这种抽象由于经验而变得聪明起来，并且弄清了它的真相，于是在某些——虚假的甚至还是抽象的——条件下决心**放弃自身**，而用自己的异在，即特殊的东西、特定的东西，来代替自己的在自身的存在（非存在）①，代替自己的普遍性和不确定性；决心把那只是作为抽象、作为思想物而隐藏在它里面的**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就是说，决心抛弃抽象而去观察一番**摆脱了**它的自然界。直接成为**直观**的抽象观念，无非始终是那种放弃自身并且决心成为**直观**的抽象思维。从逻辑学到自然哲学的这整个过渡，无非是对抽象思维者来说如此难以实现、因而由他作了如此离奇的描述的从**抽**

①手稿中"非存在"写在"在自身的存在"的上方。——编者注

象到**直观**的过渡。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驱使哲学家从抽象思维转向直观，那就是**厌烦**，就是对内容的渴望。

（同自身相异化的人，也是同自己的**本质**即同自己的自然的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思维者。因此，他的那些思想是居于自然界和人之外的僵化的精灵。黑格尔把这一切僵化的精灵统统禁锢在他的逻辑学里，先是把它们每一个都看成否定，即**人的**思维的**外化**，然后又把它们看成否定的否定，即看成这种外化的扬弃，看成人的思维的**现实**表现；但是，这种否定的否定——尽管仍然被束缚在异化中——，一部分是使原来那些僵化的精灵在它们的异化中恢复；一部分是停留于最后的行动中，也就是在作为这些僵化的精灵的真实存在的外化中自身同自身相联系{（这就是说，黑格尔用那在自身内部旋转的抽象行动来代替这些僵化的抽象概念；于是，他就有了这样的贡献：他指明了就其起源来说属于各个哲学家的一切不适当的概念的诞生地，把它们综合起来，并且创造出一个在自己整个范围内穷尽一切的抽象作为批判的对象，以代替某种特定的抽象。）（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黑格尔为什么把思维同**主体**分隔开来；但就是现在也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人，那么人的本质表现也不可能是人的，因此思维也不能被看做是人的本质表现，即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生活的有眼睛、耳朵等等的人的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表现。）}；一部分则由于这种抽象理解了自身并且对自身感到无限的厌烦，所以，在黑格尔那里放弃抽象的、只在思维中运动的思维，即无眼、无牙、无耳、无一切的思维，便表现为决心承认**自然界**是本质并且转而致力于直观。）

[XXXIII]但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不言而喻，这位决心转向直观的抽象思维者是抽象地直观自然界的。正像自然界曾经被思维者禁锢于他

的这种对他本身来说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即绝对观念、思想物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不过现在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即这个自然界是思想的异在，是现实的、被直观的、有别于抽象思维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或者用人的语言来说，抽象思维者在它直观自然界时了解到，他在神性的辩证法中以为是从无、从纯抽象中创造出来的那些本质——在自身中转动的并且在任何地方都不向现实看一看的思维劳动的纯粹产物——无非是**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概念**。因此，对他来说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概念而已。他重新把自然界**分解**为这些抽象概念。因此，他对自然界的直观不过是他把对自然界的直观加以抽象化的确证行动，①不过是他有意识地重复的他的抽象概念的产生过程。例如，时间＝自身同自身相联系的否定性（前引书②，第238页）。扬弃了的运动即物质——在自然形式中——同扬弃了的生成即定在相符合。光是**反射于自身**的**自然**形式。像**月亮**和**彗星**这样的物体，是**对立物**的**自然**形式，按照《逻辑学》，这种对立物一方面是**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是以自身为根据的**否定的东西**。地球是作为对立物的否定性统一的逻辑**根据**的**自然**形式，等等。

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

---

①手稿中删去下面一段话："我们姑且考察一下黑格尔的自然界诸规定以及从自然界到精神的过渡。自然界是作为具有异在形式的观念产生的。因为观念……"——编者注

②指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编者注

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无**，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

“有限的**目的论的**观点包含着一个正确的前提，即自然界本身并不包含着绝对的目的。”(第225页)①

自然界的目的就在于对抽象的确证。

“结果自然界成为具有**异在**形式的观念。既然**观念**在这里表现为对自身的否定或**外在于自身的东西**，那么自然界并非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对这种观念来说是外在的，而是**外在性**构成这样的规定，观念在其中表现为自然界。”(第227页)②

在这里不应把**外在性**理解为**显露在外的**并且对光、对感性的人敞开的**感性**；在这里应该把外在性理解为外化，理解为不应有的偏差、缺陷。因为真实的东西毕竟是观念。自然界不过是观念的**异在**的**形式**。而既然抽象思维是**本质**，那么外在于它的东西，就其本质来说，不过是某种**外在的东西**。抽象思维者同时承认**感性**、同**在自身中**转动的思维相对立的**外在性**，是自然界的本质。但是，他同时又把这种对立说成这样，即**自然界的**这种**外在性**，自然界同思维的**对立**，是自然界的**缺陷**；就自然界不同于抽象而言，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XXXIV]一个不仅对我来说、在我的眼中有缺陷而且本身就有缺陷的存在物，在它自身之外有一种为它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说，它的本质是不同于它自身的另一种东西。因此，对抽象思维者来说，自然界必须扬弃自身，因为他已经把自然界设定为潜在**地被扬**

①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第225页第245节。——编者注

②同上，第227页第247节。——编者注

弃的本质。

"**对我们来说**，精神以**自然界**为自己的**前提**，精神是自然界的**真理**，因而对自然界来说，精神也是某种**绝对第一性的东西**。在这个真理中自然界消逝了，结果精神成为达到其自为的存在的观念，而**概念**则既是观念的**客体**，又是观念的**主体**。这种同一性是**绝对的否定性**，因为概念在自然界中有自己的完满的外在的客观性，但现在它的这种外化被扬弃了。而概念在这种外化中成了与自身同一的东西。因此，概念只有作为从自然界的回归才是这种同一性。"（第392页）①

"**启示**，作为**抽象**观念，是向自然界的直接的过渡，是自然界的**生成**，而作为自由精神的启示，则是自由精神把自然界**设定**为**自己的**世界，——这种设定，作为反思，同时又是把世界**假定**为独立的自然界。概念中的启示，是精神把自然界创造为自己的存在，而精神在这个存在中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确证**和**真理**。""**绝对的东西是精神**；这是绝对的东西的最高定义。"②

[私有财产和需要]

[XIV]（7）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而在私有制范围内，这一切却具有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

①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第392页第381节。——编者注

②同上，第393页第384节。——编者注

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更加贫穷，他为了夺取敌对的存在物，更加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就是说，他的需求程度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加而日益增长。——因此，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货币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己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一点部分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任意的奇想**、**突发的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是厚颜无耻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木不仁的享受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说来本应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种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他人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诱使苍蝇飞近涂胶竿的弱点；对共同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利用，正像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对人来说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心的途径；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邻人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但是你知道，有先决条件；你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工业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

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

这种异化也部分地表现在：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义上的自身。对于工人来说，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而且他在洞穴中也是**朝不保夕**，仿佛这洞穴是一个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XV]付不起房租，他每天都可能被赶走。他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①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粗陋的**方式**（**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踏车**又成了许多英国工人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爱尔兰人只知道有**吃**的需要，确切地说，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感染上斑点病的马铃薯**，②那是质量最差的一种马铃薯。而如今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都已有一个**小爱尔兰**[124]。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机器、劳动的简单化，被利用来把

①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5幕。——编者注

②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110—111页。——编者注

正在成长的人、完全没有发育成熟的人——**儿童**——变成工人，而工人则变成了无人照管的儿童。机器迁就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

//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如何造成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国民经济学家（和资本家：每当我们谈到国民经济学家，我们一般总是指**经验的**生意人，国民经济学家是他们的**科学的**自白和存在）是这样论证的：（1）他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并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于是他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都没有别的需要了；因为他**甚至**把这样的生活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2）他把尽可能**贫乏的**生活（生存）当做**计算**的标准，而且是普遍的标准：说普遍的标准，是因为它适用于大多数人。他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像他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因此，工人的任何**奢侈**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被动的享受或能动的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因此，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要人们**节约**对新鲜**空气**或身体**运动**的**需要**。这门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禁欲**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却又**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却又**进行生产的**奴隶。它的道德理想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存入储蓄所的**工人**，而且它甚至为了它喜爱的这个想法发明了一种奴才的**艺术**。人们怀着感伤的情绪把这些搬上了舞台。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节制，对生活乃至人的一切需要都加以节制。你越是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少思考，少爱，

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积攒**的就越多，你的那些既不会被虫蛀也不会被贼偷的财宝[①]，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多**。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拥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XVI]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院，它能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政治权力，它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但是，货币尽管是这一切，它除了自身以外却**不愿**创造任何东西，除了自身以外不愿购买任何东西，因为其余一切都是它的奴仆，而当我拥有了主人，我就拥有了奴仆，我也就不需要去追求他的奴仆了。因此，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工人只能拥有他想活下去所必需的那么一点，而且只是为了拥有这么一点，他才想活下去。//

诚然，在国民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争论。一方（罗德戴尔、马尔萨斯等）推崇**奢侈**而咒骂节约；另一方（萨伊、李嘉图等）则推崇节约而咒骂奢侈。但是，一方承认，它要求奢侈是为了生产出**劳动**即绝对的节约；而另一方承认，它推崇节约是为了生产出**财富**即奢侈。前者沉湎于**浪漫主义的**臆想，认为不应仅仅由贪财欲决定富人的消费，并且当它把**挥霍**直接当做发财致富的手段时，它是跟它自己的规律相矛盾的。因此，后者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向前者证明，我通过挥霍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我的财产**。后者装腔作势地不承认，正是突发的怪想和念头决定生产；它忘记了“考究的需要”，它忘记了没有消费就不会

①《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19—20节。——编者注

有生产；它忘记了，通过竞争，生产只会变得日益全面、日益奢侈；它忘记了，按照它的理论，使用决定物的价值，而时尚决定使用；它希望看到仅仅生产“有用的东西”，但它忘记了生产过多的有用的东西就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的**人口。双方都忘记了，挥霍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画等号的。

而且，如果你愿意节俭行事，并且不愿意毁于幻想，那么你不仅应当在你的直接感觉，如吃等等方面节约，而且也应当在普遍利益、同情、信任等等这一切方面节约。

//你必须把你的一切变成**可以出卖的**，就是说，变成有用的。如果我问国民经济学家：当我靠失去贞操、出卖自己的身体满足别人的淫欲来换取金钱时，我是不是遵从经济规律（法国工厂工人把自己妻女的卖淫称为额外的劳动时间，这是名副其实的），而当我把自己的朋友出卖给摩洛哥人时，我是不是在按国民经济学行事呢（而像征兵买卖等等的直接贩卖人口的现象，在一切文明国家里都有）？于是，国民经济学家回答我：你的行为并不违反我的规律；但你要考虑到道德教母和宗教教母说些什么；我的**国民经济学的**道德和宗教丝毫不反对你的行为方式，但是——但是，我该更相信谁呢，是国民经济学还是道德？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是**谋生**、劳动和节约、节制，——但是，国民经济学答应满足我的需要。——道德的国民经济学就是富有良心、美德等等；但是，如果我根本不存在，我又怎么能有美德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富有良心呢？//——//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这是以异化的本质为根据的，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异化，每一个//[XVII]领域都把异化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下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异化的关系…… 例如，**米歇尔·舍伐利**

埃先生责备李嘉图撇开了道德。[①]但是，李嘉图让国民经济学用它自己的语言说话。如果说这种语言不合乎道德，那么这不是李嘉图的过错。当米·舍伐利埃论述道德的时候，他撇开了国民经济学；而当他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时候，他必然地而且实际上撇开了道德。如果国民经济学家同道德的关系，并非任意的、偶然的因而并非无根据的和不科学的，如果这种关系不是**装装样子**，而是被设想为**本质的**，那么这只能是国民经济学规律同道德的关系；如果实际上并非如此，或者恰恰出现相反的情况，那么李嘉图对此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况，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也只是一种**表象**，**它既是对立**，又不是对立。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

//节制需要，这个国民经济学的原则在它的**人口论**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人太**多**了。甚至连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而如果工人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议公开赞扬那些在两性关系上表现节制的人，并公开谴责那些违背这一结婚不生育原则的人……[②]难道这不是禁欲主义的道德、学说吗？），那么他就会在生育方面实行**节约**。人的生产表现为公众的不幸。——//

生产对富人所具有的意义，**明显地**表现在生产对穷人所具有的意义中；对于上层来说总是表现得讲究、隐蔽、含糊，是表象；而对于下层来说则表现得粗陋、明白、坦率，是本质。工人的**粗陋的**需要是比富人的**讲究的**需要大得多的赢利来源。伦敦的地下室住所给房产主带来的收入比宫殿带来的更多，就是说，这种住所对房产主来说是**更大的财富**，因此，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更大的**社会**财富。——

---

①见米·舍伐利埃《论法国的物质利益》1839年巴黎第4版。——编者注

②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59页。——编者注

正像工业利用需要的讲究来进行投机一样，工业也利用需要的**粗陋**，而且是人为地造成需要的粗陋来进行投机。因此，对于这种粗陋来说，**自我麻醉**，这种对需要的**虚假**满足，这种包容**在**需要的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因此，英国的酒店是私有制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表现。酒店的**奢侈**表明工业的奢侈和工业的财富对人的真正的关系。因此，酒店理所当然地是人民唯一的、至少得到英国警察从宽对待的星期日娱乐场所。——

[增　　补]

[XVIII]我们已经看到，国民经济学家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设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1)资本是**积累的劳动**；(2)生产范围内的资本的使命——部分地是会带来利润的资本再生产，部分地是作为原料(劳动材料)的资本，部分地是作为本身**工作着的工具**(机器是被直接设定为与劳动等同的资本)——就在于**生产劳动**；(3)工人是资本；(4)工资属于资本的费用；(5)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产；(6)对资本家来说，劳动是他的资本的活动的因素。

最后，(7)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的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原始状态。这两个因素如何[XIX]作为两个人而互相对立，这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是一种**偶然的**因而只应用外部原因来说明的事情。(见穆勒。[①])——

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照得眼花缭乱，因而仍然是金属

①见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32—33页。——编者注

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对立。——

例如，从**拜物教**就可看出，理论之谜的解答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只要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还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那么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就是必然的。——

平等不过是德国人所说的自我＝自我①译成法国的形式即政治的形式。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这同德国人借助于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来论证共产主义，是一回事。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是**平等**，因为这是政治；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蒲鲁东，应当从这一点出发来加以批判和承认。[125]——

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因而还不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而只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肯定，[……]②可见，既然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

①德国哲学家约·哥·费希特用的一个公式。——编者注

②手稿这一页的左下角破损，最后六行原文残缺不全，本卷没有翻译。——编者注

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和目的，并且有了超越历史运动的意识，我们应当把这一点看做是现实的进步。——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把学说、宣传等等视为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不再是联系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

[XX]//当国民经济学主张需求和供给始终相符的时候，它立即忘记，按照它自己的主张，**人的**供给（人口论）始终超过对人的需求；因而，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比例失调在整个生产的重要结果——人的生存——上得到最显著的表现。——//

//作为手段出现的货币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真正的**力量**和唯一的**目的**，那使我成为本质并使我占有异己的对象性本质的**手段**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目的本身**……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地产（在土地是生活的源泉的地方）以及**马**和**剑**（在它们是**真正的生存手段**的地方）也都被承认为真正的政治的生命力。在中世纪，一个等级，只要它能佩**剑**，就成为自由的了。在游牧民族那里，有**马**就使人成为自由的人，

成为共同体的参加者。——//

//我们在上面说过，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等等，然而是在一种异化的、敌对的形式下退回到那里的。野人在自己的洞穴——这个自由地给他们提供享受和庇护的自然要素——中并不感到陌生，或者说，感到如同**鱼**在水中那样自在。但是，穷人的地下室住所却是敌对的、"具有异己力量的住所，只有当他把自己的血汗献给它时才让他居住"；他无权把这个住所看成自己的家园，而只有在自己的家园，他才能够说：这里就是我的家；相反，他是住在**别人的**家里，住在一个每天都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他不交房租就立即将他抛向街头的**陌生人**的家里。他同样知道，就质量来说，他的住所跟**彼岸的**在财富天国中的人的住所是迥然不同的。//

//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

//仅仅供享受的、不活动的和供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做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所以他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做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在这里，对人的蔑视，表现为狂妄放肆，表现为对那可以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觉，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做自己无度的要求、自己突发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财富又被仅仅看做手段，看做应当加以消灭的东西。因而，他既是自己财富的奴隶，

同时又是它的主人;既是慷慨大方的,同时又是卑鄙无耻的、性情乖张的、傲慢自负的、目空一切的、文雅的、有教养的和机智的。他还没有体验到这种财富是一种作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他宁愿把财富仅仅看做自身的力量,而且[……][1]终极目的[不是]财富,而是**享受**。面对着这种财富[……][1][XXI]同这种为感性外观所眩惑的关于财富本质的美妙幻想相对立的,是**实干的**、**清醒的**、**朴素的**(**节俭的**)[2]、看清财富本质的工业家;不过,当他为挥霍者的享受欲开辟越来越大的范围,并且用自己的各种产品向挥霍者百般献媚时——他的一切产品正是对挥霍者欲望的卑劣恭维——,他也懂得以唯一**有利的**方式把挥霍者的正在消失的力量据为己有。//因此,如果说工业财富在开始时表现为挥霍的、幻想的财富的结果,那么后来工业财富的运动就以能动的方式即通过它本身的运动排除了挥霍的、幻想的财富。//**货币利息**的降低是工业运动的必然后果和结果。因此,挥霍的食利者的资金日益减少,同享受的手段和诱惑的增加恰成**反**比。这样,他必定或者吃光自己的资本,从而走向破产,或者自己成为工业资本家…… 另一方面,**地租**固然由于工业运动的进程而直接不断地提高,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总有一天,地产必定和其他一切财产一样,落入那会带来利润的、自行再生产的资本的范畴,而且这是同一个工业运动的结果。因此,挥霍的地主也必定或者吃光自己的资本,从而走向破产,或者自己成为他自己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即经营农业的实业家。——

因此,货币利息降低——蒲鲁东把这看成资本的扬弃和资本社

①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②手稿中"节俭的"写在"朴素的"上方。——编者注

会化的倾向①——不如说直接地就是劳动的资本对挥霍的财富的彻底胜利的征兆，也就是一切私有财产向**工业资本**转化。这是私有财产对它的**表面**上还合乎人性的一切性质的彻底胜利，是私有者对私有财产的本质——**劳动**——的完全服从。

当然，工业资本家也享受。他决不退回到违反自然的粗陋需要。但是，他的享受仅仅是次要的事情，是一种服从于生产的休息；同时，他的享受是**精打细算的**，从而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的**享受，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享受也算入资本的费用。因此，他为自己的享受所挥霍的钱只限于这笔花费能通过会带来利润的资本再生产而重新得到补偿。可见，享受服从于资本，享受的个人服从于资本化的个人，而以前的情况恰恰相反。因此，利息的减少，只有当它是资本的统治正在完成的征兆，也就是异化正在完成因而加速其扬弃的征兆的时候，才是资本的扬弃的征兆。一般说来，这就是存在的东西确证自己的对立面的唯一方式。——//

因此，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不过是已弄清了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同还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但是，双方都不善于把争论的对象用简单的词句表达出来，因而双方相持不下。——

[XXXIV]其次，**地租**作为地租已经被推翻了，因为现代国民经济学与断言土地所有者是唯一真正的生产者的重农学派[93]相反，证明土地所有者本身倒是唯一的完全不生产的食利者。现代国民经济学认为，农业是资本家的事情，资本家只要有希望从农业得到通常的

①参看皮·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第4章的第7个论题的历史评述，见该书1841年巴黎版第230—231页。——编者注

利润,他就会这样使用自己的资本。因此,重农学派所提出的论点,即认为土地所有者作为唯一生产的所有者应当单独支付国税,从而也唯有他们才有权对国税进行表决并参与国事,就变成了相反的论断,即地租税是对非生产收入征收的单一税,因而也是无损于国民生产的单一税。显然,照这样理解,土地所有者的政治特权就再也不可能来源于他们是主要纳税人这一事实了。——

凡是蒲鲁东认为是劳动反对资本的运动[①],都不过是具有资本的规定即**工业资本**的规定的劳动反对那种不是**作为**资本即不是以工业方式来消费的资本的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正沿着胜利的道路即**工业**资本胜利的道路前进。——因此,我们知道,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

[片　　断]

[分　　工]

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XXXV]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正像政治家议论**人权**时那样,国民经济学家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个人,从个人那里他抽去一切规定性,把个人确定为资本家或工人。——

①见本卷第166页。——编者注

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

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说，关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国民经济学家们讲得极不明确并且自相矛盾。

亚当·斯密：

"**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交换倾向和互相买卖产品缓慢而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交换倾向或许是应用理性和语言的必然结果。它为一切人所共有，在任何动物中间是找不到的。动物一旦长大，就独立生活。人则经常需要别人的帮助，如果他单单指望别人发善心给以帮助，那是徒劳的。如果他能求助于他们的个人利益，并能说服这些人，说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他们去做他希望他们做的事，这样就可靠得多了。在向他人求助的时候，我们不是求助于他们的**人性**，而是求助于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对他们决不说**我们有需要**，而总是说**对他们有利**…… 这样一来，因为我们相互需要的帮助大部分是通过交换、交易、买卖获得的，所以**分工**的起因也正是这种**买卖**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部落中，有个人制造弓矢比其他人更迅速、更有技巧。他往往用自己日常制作的这类东西去同部落的伙伴交换家畜和野味。他很快发觉，他用这种方法可以比他亲自去狩猎更容易获得这些东西。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就把制作弓等等当做自己的主要工作。个人**天赋才能**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如果人没有交易和交换的倾向，那么每个人就得亲自生产一切生活上必需的和提供方便的东西。一切人都将不得不做**同样的日常工作**，这样，唯一能够造成才能上巨大差别的**职业上的巨大差别**就不会存在…… 正像这种交换倾向造成人们的才能差异一样，这同一种倾向也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益的。——动物的许多种，尽管是同类，都具有天生不同的属性，就其禀赋来说，它们比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里看到的要显著得多。就才能和智力来说，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异生来就比家犬和灵猩猎犬之间、灵猩猎犬和长毛垂耳犬之间、长毛垂耳犬和牧羊犬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可是动物的这些不同的种，尽管

是同类，却几乎无法相互为用。家犬无法[XXXVI]利用灵猩猎犬的敏捷以补充自己力气大的优势，等等。由于缺乏交易和交换的能力或倾向，这些不同的才能和不同程度的智力的作用不能全汇集在一起，而且丝毫不能有助于**类的优势**或**共同的方便**…… 每个动物都必须独立生活和保卫自己；自然界让同类动物在能力上有差异，动物却不能由此得到丝毫好处。相反，人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则能相互为用，因为依靠交易和交换这种普遍倾向，可以说，他们的每个不同工业部门的**不同产品**汇集成共同的资源，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因为**交换**这种倾向产生了**分工**，所以**这种分工的发展程度**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或换句话说，受**市场大小**的限制。如果市场非常小，那就不会鼓励人们完全致力于某一种职业，因为他不能用他本身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换取自己想获得的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在**进步**的状态下，"每个人都**靠**échanges〈靠交换〉来生活，并成为一种**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说也成为**商业**社会。〈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商业**就是社会的整个本质"[①]〉…… 资本的积累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增长，反之亦然。"

以上是**亚当·斯密**说的。[②]

"如果每个家庭都生产自己的全部消费品，那么社会即使在不实行任何交换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存在。——交换虽然不是**基本的东西**，但在我们的进步的社会状态下是不可缺少的。——分工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分工可以增加社会产品、社会威力和社会享受，但是它剥夺、降低每一单个人的能力。——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有生产。"

以上是让·巴·**萨伊**说的。[③]

---

①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1826年巴黎版第68、78页。——编者注

②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29—37页和第46页。——编者注

③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1卷第76—77页。——编者注

“人生来就有的力量：他的智力和他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而来源于社会状态的力量，则在于**分工**的能力和**在不同的人中间分配不同工作**的能力……在于交换**相互服务**和交换那些构成生活资料的产品的**能力**…… 一个人为什么向别人提供自己的服务，其动机是利己心——他要求得到为别人服务的报酬。——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权利是人们之间进行交换所不可缺少的。”“交换和分工是相互制约的。”

以上是**斯卡尔培克**说的。①

穆勒把发达的交换即**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

“人的活动可以归结为极简单的要素。实际上，人能做的不过是引起运动；他能移动物品，使它们相互[XXXVII]离开或相互接近；其余的事情则由物质的特性来完成。人们在使用劳力和机器时常常发现，把彼此妨碍的操作分开并把一切能以某种方式相辅相成的操作结合起来，通过这样巧妙的分配，就可以加强效果。鉴于人们一般地不能以习惯使他们练就的从事少数几项操作的能力即以相同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的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有利的。——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多数情况下，必须进行大规模操作，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少数在有利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大制造业，有时不仅向一个国家，而且向几个国家，按照那里要求的数量，供应它们所生产的产品。”

以上是**穆勒**说的。②

但是，全部现代国民经济学一致同意：分工同生产的丰富，分工同资本的积累是相互制约的；只有**自由放任的**、自行其是的私有财产才能创造出最有利的和无所不包的分工。

亚当·斯密的论述可以归纳如下：分工给劳动以无限的生产能

①弗·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29年巴黎版第1卷第25—26、27、75和121页。——编者注

②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7、11—12页。——编者注

力。它起源于**交换**和**买卖的倾向**，这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很可能不是偶然的，而是通过应用理性和语言来决定的。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人的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即交换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也只有交换才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用的。同类而不同种的动物的特殊属性生来就比人的禀赋和活动的差异显著得多。但是，因为动物不能从事**交换**，所以同类而不同种的动物具有的不同属性，对任何动物个体都没有用。动物不能把自己同类的不同属性汇集起来；它们丝毫无助于自己同类的**共同**优势和方便。**人**则不同，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和活动方式可以相互为用，**因为**人能够把各自的**不同**产品汇集成共同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购买东西。因为分工是从**交换**的倾向产生的，所以分工依**交换的大小**、**市场的大**小而发展或受到限制。在进步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商人**，社会则是**商业社会**。

萨伊把**交换**看成偶然的、不是基本的东西。社会没有交换也可以存在。在进步的社会状态下，交换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有**生产**。分工对于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但是它降低**每一单个人的能力**。最后这个意见是萨伊的一个进步。

斯卡尔培克把个人的、**人生来就有**的力量即智力和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同**来源于**社会的力量即相互制约的**交换**和**分工**区别开来。但是，**私有财产**是交换的必要前提。在这里，斯卡尔培克用客观的形式表述了斯密、萨伊、李嘉图等人所说的东西，因为斯密等人把**利己主义**、**私人利益**称为交换的基础，或者把**买卖**称为交换的**本质的**和**适合的**形式。

穆勒把**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人的**活动可归结为**机**

械的运动，分工和使用机器可以促进生产的丰富。委托给每个人的操作范围必须尽可能小。分工和使用机器也决定着财富的大量生产即产品的生产。这是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

[XXXVIII]对**分工**和**交换**的考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

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

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

我们应当考察的各个因素：第一，**交换的倾向**——利己主义被认为是它的基础——被看做是分工的原因或分工的相互作用的因素。萨伊认为交换对于社会的本质来说不是**基本的东西**。用分工和交换来说明财富、生产。承认分工使个人活动贫乏和丧失。交换和分工被认为是产生**人的才能的**巨大**差异**的原因，这种差异又由于交换而成为**有用的**。斯卡尔培克把人的生产的本质力量或者说生产性的本质力量分为两部分：(1)个人的、他所固有的力量，即他的智力和从事一定劳动的特殊素质或能力；(2)**来源于**社会——不是**来源于**现实个人——的力量，即分工和交换。——其次：分工受**市场**的限制。——人的劳动是简单的**机械的运动**；最主要的事情由对象的物质特性去完成。——分配给每一个人的操作应当尽可能少。——劳动的划分和资本

的积聚，个人生产的无效果和财富的大量生产。——自由的私有财产对于分工的意义。

[货　　币]

[XLI]如果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如果感觉、激情等等仅仅因为它们的**对象**对它们是**感性地**存在的而真正地得到肯定，那么不言而喻：(1)对它们的肯定方式决不是同样的，相反，不同的肯定方式构成它们的存在的、它们的生命的特殊性；对象对它们的存在方式，就是它们的**享受**的特有方式；(2)如果感性的肯定是对采取独立形式的对象的直接扬弃（吃、喝、对象的加工，等等），那么这就是对对象的肯定；(3)只要人是**合乎人性的**，因而他的感觉等等也是**合乎人性的**，那么对象为别人所肯定，这同样也就是他自己的享受；(4)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既在其总体上、又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5)私有财产的意义——撇开私有财产的异化——就在于**本质的对象**——既作为享受的对象，又作为活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

货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　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但是，在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充当中介的**那个东西**，也在**我**和对我来说的他人的存在之间**充当中介**。对我来说**他**人就是这个意思。

“见鬼！脚和手，
还有屁股和头，当然都归你所有！
可我获得的一切实在的享受，
难道不同样也为我所拥有？

假如我能付钱买下六匹骏马，
我不就拥有了它们的力量？
我骑着骏马奔驰，我这堂堂男儿
真好像生就二十四只脚一样。”

歌德《浮士德》（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①]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说：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不，天神们啊，
我不是无聊的拜金客。
……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这东西会把……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壮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
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即使她的尊容会使那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该死的土块[②]，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

①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书斋》。——编者注

②马克思引用的是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德文版，此处为“Metall”（金属）。——编者注

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

并且下面又说：

“啊，你可爱的凶手，
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
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玛尔斯！
你永远年轻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黛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
你会使冰炭化为胶漆，仇敌互相亲吻！
[XLII]为了不同的目的，
你会说任何的方言！
你这动人心坎的宝物啊！
你的奴隶，那些人类，要造反了，
快快运用你的法力，让他们互相砍杀，
留下这个世界来给兽类统治吧！”①

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描绘得十分出色。为了理解他，我们首先从解释歌德那几行诗句开始。

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为之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那**是我**——货币占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

①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4幕第3场。——编者注

征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使我不用费力就能进行欺诈，因为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货币占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再说他可以给自己买到颇有头脑的人，而能够支配颇有头脑者的人，他不是比颇有头脑者更有头脑吗？既然我有能力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种种无能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

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界和人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不能够把一切纽带解开和联结在一起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通用的**分离剂**吗？它既是地地道道的**辅币**[①]，也是地地道道的**黏合剂**；它是社会的[……][②]**化合**力。

莎士比亚特别强调了货币的两个特性：

(1)它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能使冰炭化为胶漆。

(2)它是人尽可夫的娼妇，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

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

---

①“辅币”原文是Scheidemünze，其构成与前一句中的Scheidungsmittel(分离剂)一样，都同动词scheiden(分离)相联系。——编者注

②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

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因此，货币把这些本质力量的每一种都变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

当我渴望食物或者我因无力步行而想乘邮车的时候，货币就使我获得食物和乘上邮车，就是说，它把我的那些愿望从观念的东西，把那些愿望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改变成和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作为这样的中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

当然，没有货币的人也有**需求**，但他的需求是纯粹观念的东西，它对我、对第三者、对[其他人][XLIII]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是不存在的，因而对于我本人依然是**非现实的**，**无对象的**。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而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

如果我没有供旅行用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旅行的**需要**，就是说，没有现实的和可以实现的旅行的需要。如果我有进行研究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如果我实际上**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但我有愿望**和**货币，那么我也就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本领。**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

和幻象，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因此，仅仅按照这个规定，货币就已经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

其次，对于个人和对于那些以独立**本质**自居的、社会的和其他的联系，货币也是作为这种**起颠倒作用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

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

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因为货币所交换的不是特定的品质，不是特定的事物，不是人的本质力量，而是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所以，从货币占有者的观点看来，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

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

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卡·马克思写于1844年4—8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

原文是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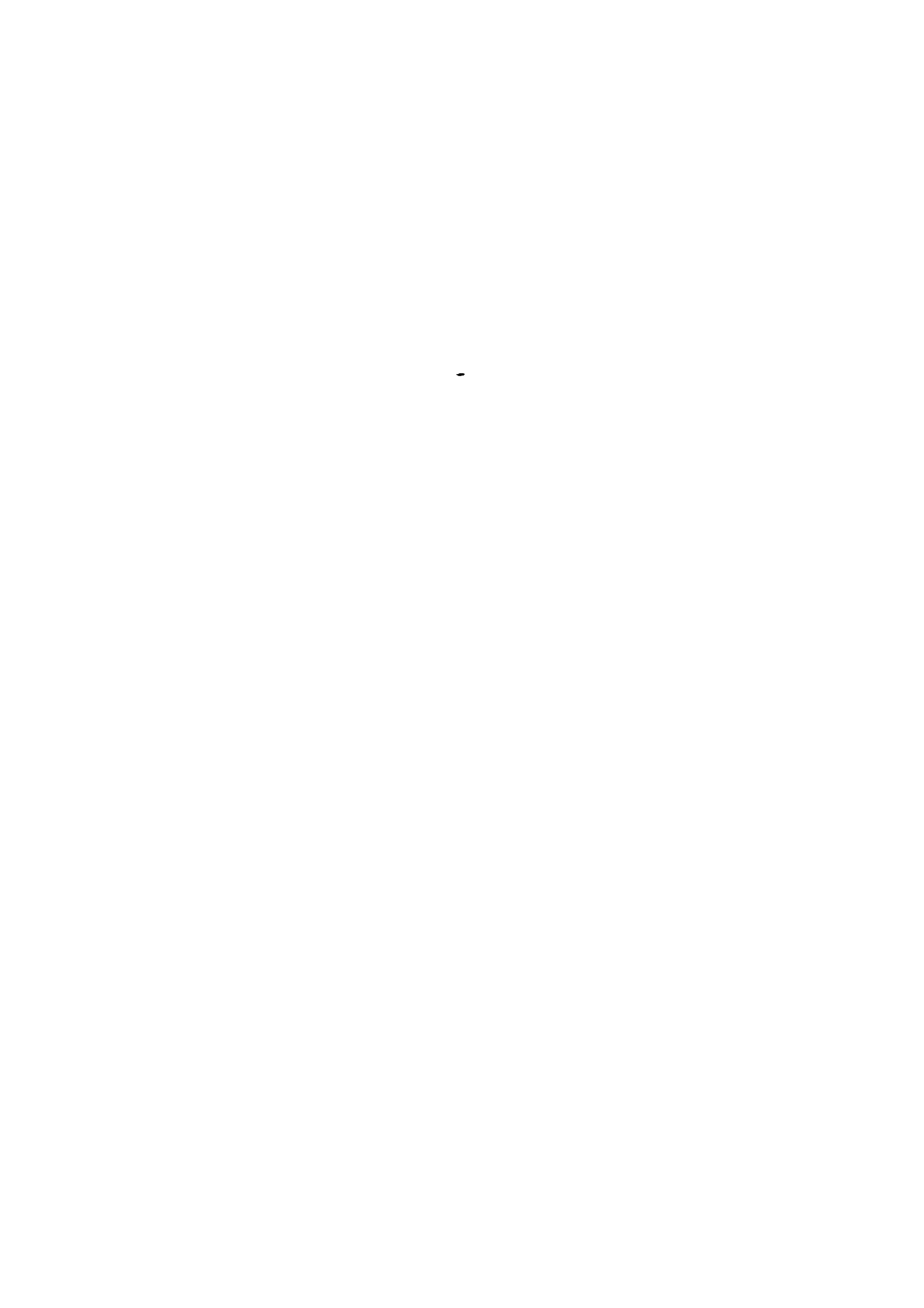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0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神圣家族，
或
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26]

（节　选）



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

Vo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Frankfurt a. M.

Literarische Anstalt.

(J. Rütten.)

1845.

《神圣家族》第一版的扉页



序　言

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用福音书作者的话教诲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①显而易见，这种没有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臆想中才具有精神。在**鲍威尔的**批判中，我们所反对的正是以**漫画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日耳曼**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通过把"**批判**"本身变为某种超验的力量来作自己的最后一次尝试。

我们的阐述主要涉及**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我们手边有该杂志的前八期），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从而**整个德国思辨**的胡说达到了顶点。批判的批判（即《文学报》的批判）越是把哲学对现实的颠倒变成最明显的滑稽剧，那就越有教益。（请看**孚赫**和**塞利加**二人的例子。）《文学报》提供了一份材料，就连广大的读者也能通过这份材料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这也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

我们的阐述自然要取决于阐述的**对象**。批判的批判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的理论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因此，如果我们**在这本书中**不

①引自《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6章第63节。这句话中的"灵"，德文原文为"Geist"，通常译做"精神"。——编者注

再对这一发展本身**进行评论**，那是因为我们所阐述的对象的本性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更确切地说，是批判的批判使我们不得不用现已达到的成果**本身**来批驳它。

因此，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然后再写几部独立的著作，在那些著作里，我们——当然是各自单独地——将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也正面阐述自己对现代哲学学说和社会学说的态度。

恩格斯　马克思

1844年9月于巴黎

第 四 章
体现为认识的宁静的批判的批判
或埃德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4)蒲　鲁　东

批判性的评注 1

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都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同样，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也是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对**国民经济学**所做的批判。——至于该书有关法律的部分，即根据法的观点来批判法的这一部分，我们在这里没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因为该书的主旨是批判国民经济学。——因此，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其中包括对蒲鲁东所了解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蒲鲁东的著作才能被科学地超越。这一工作正是由于蒲鲁东本人做过的一切才有可能进行，正如蒲鲁东所做的批判是以重农学派[93]对重商主义[26]学说的批判、亚当·斯密对重农学派的批判、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批判以及傅立叶和圣西门的著作为前提一样。

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述都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民经济学把这

个基本前提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考察，甚至像**萨伊**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国民经济学只是“偶然”提到这一事实。蒲鲁东则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对现代国民经济学的意义，正如**西哀士**的著作《第三等级是什么?》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

如果说蒲鲁东本人还没有把私有财产的各种进一步的形式，如工资、商业、价值、价格、货币等等，像《德法年鉴》那样看做私有财产的形式(见弗·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而是用国民经济学的这些前提来反驳国民经济学家，那么这是完全符合他上述从历史上说具有充足理由的观点的。

把私有财产关系当做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国民经济学，不断地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财产——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正像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经常从合乎人性的观点来解释宗教观念，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例如在国民经济学中，工资最初表现为产品中劳动应得的那个合乎比例的份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仿佛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中的。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是一个纯粹偶然的规定，这个规定根本不需要同生产费用和社会效用有任何关系。工资的数额起初是通过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让资本家去确定工资，而资本家

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商业和其他一切国民经济关系方面的情况也都是这样。有时国民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对这些矛盾的论述成了他们相互之间斗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国民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指责**私有财产**的某种**个别**形式扭曲了本来(即在其想象中)合理的工资、本来合理的价值、本来合理的商业 。例如，亚当·斯密有时抨击资本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抨击汇兑业者，西蒙德·德·西斯蒙第抨击工厂制度，李嘉图抨击土地所有制，而几乎所有现代的国民经济学家都抨击**非产业**资本家，即仅仅作为**消费者**来体现财产的资本家。

可见，国民经济学家们只是有时候，特别是在他们抨击某种特殊的滥用行为的时候，才破例地维护经济关系上的人性的假象，但在一般场合，他们恰恰是从这些关系同人性显然有**区别**的方面，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把握这些关系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在这种矛盾中踉跄而行。

蒲鲁东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严肃地看待国民经济关系的**人性的假象**，并让这种假象同国民经济关系的**非人性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迫使这些关系在现实中成为它们把自己想象成的那种东西；或者更确切些说，他迫使这些关系抛弃它们关于自身的这种想象而承认自己是真正非人性的。因此，蒲鲁东始终不同于其他国民经济学家，他不是以限于局部的方式把私有财产的这种或那种形式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而是以总括全局的方式把私有财产本身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

埃德加先生想**说明**《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的**观点的特征**，当然，他根本没有谈到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谈到蒲鲁东的著作所具

有的不同于他人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正是在于把**私有财产的实质**问题看做对国民经济学和法学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批判的批判说来，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蒲鲁东并未因他否定私有财产而有了任何新的发现。他不过是无意中透露了批判的批判讳莫如深的秘密罢了。

> 埃德加先生在进行了他那赋予特征的翻译之后，马上接着说道："于是，蒲鲁东发现了某种绝对的东西，发现了历史的永恒基础，发现了为人类指引方向的神。这就是公平。"①

1840年出版的蒲鲁东这部法文著作并不是立足于1844年德国发展的观点。这就是蒲鲁东的观点，也是许多与他截然对立的法国作家所共有的观点，这种观点给批判的批判以方便，使它可以对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的特征不加区分而一笔带过。此外，只要把蒲鲁东自己所提出的规律，即公平通过对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规律坚持贯彻到底，就可以摆脱历史上的这个绝对的东西。如果说蒲鲁东没有做到坚持贯彻到底，那么这是因为他不幸生为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

对埃德加先生说来，由于蒲鲁东提出了历史上的绝对的东西，由于他坚持对公平的信仰，所以他就成了**神学的**对象；而批判的批判由于职业的缘故就是神学的批判，现在就可以抓住蒲鲁东，从而在"宗教观念"上大做文章了。

> "一切宗教观念的特点都是把这样一种情况奉为信条：两个对立面中有一个最后总要成为胜利的和唯一真实的。"

我们将看到，宗教的批判的批判是把这样一种情况奉为信条：

---

①埃·鲍威尔《蒲鲁东》，载于1844年4月《文学总汇报》第5期，本节中的引文均出自此文。——编者注

两个对立面中有一个——**“批判”**——最后会作为唯一的真理战胜另一个对立面——“群众”。可是蒲鲁东却把群众的公平当做绝对的东西，奉为历史上的神，从而就犯下了更不公平的过错，因为公平的批判已经**非常明确地**为自己保留了这个绝对的东西、这个历史上的神的地位。

批判性的评注 2

> “贫困、贫穷的事实使蒲鲁东片面地进行了一些思考；他认为这个事实是同平等和公平相**抵触**的；这个事实使他有了自己的武器。于是，对于他，这个事实就成了绝对的、合理的，而财产存在的事实则成为不合理的了。”

认识的宁静告诉我们说，蒲鲁东认为贫困的事实是同公平相抵触的，可见，他认为这个事实是不合理的；可是话音未落，认识的宁静就连忙硬说，对于蒲鲁东，这个事实成了绝对的、合理的。

以往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运动仿佛为**国民**创造的**财富**出发，进行了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思考。蒲鲁东从国民经济学用诡辩掩盖的相反的方面出发，即从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贫穷出发，进行了否定私有财产的思考。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那种体现私有财产充满矛盾的本质的最彰明较著、最触目惊心、最令人激愤的形式，即贫穷、贫困的事实出发的。

> “可是，批判把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合而为一；它认清了二者的内在联系，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向这个整体本身探询其存在的前提。”

批判直到现在对财产和贫穷的事实还毫无认识，“可是”，它却用仅仅在自己想象中完成的行为来反驳蒲鲁东的真实的行为。它把**两**

个事实合而为**一**，并且在把**两个**事实变为一个**唯一的**事实之后，又认清了**二者**的内在联系。批判不能否认，蒲鲁东也认清了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正是由于这种内在联系，他才要废除财产，以便消灭贫困。蒲鲁东甚至还做得更多。他详尽地证明了资本的运动**怎样**造成贫困。可是，批判的批判却不干这种琐碎的小事。它认识到贫穷和私有财产是**两种对立的东西**：这本是广为流传的知识。它使贫穷和财富**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向这个整体**本身**探询其存在的前提"，这更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因为批判自己刚刚**创造了**这个"整体本身"，那么它的这种**创造**本身就是这个整体存在的前提。

批判的批判既然向"整体本身"探询其存在的前提，那就是用真正神学的方式在这个"整体"**之外**寻求其存在的前提。批判的思辨在它自称正在研究的那个对象以外运动着。**整个对立**无非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可是批判的思辨却避而不去研究这个形成整体的现实的运动，以便能够宣称，批判的批判作为认识的宁静是凌驾于对立的两个极端之上的，唯有它那创造"整体本身"的活动才能消灭它所创造的抽象物。

无产阶级和财富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整体。它们是私有财产世界的两种形态。问题在于它们二者在对立中所占有的特定地位。只说明它们是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财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财产。

相反，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的

私有财产。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被唾弃的状况的**愤慨**，这是这个阶级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同作为对这种本性的露骨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的生活状况发生矛盾而必然产生的愤慨。

因此，在这种对立内，私有者是**保守的**一方，无产者是**破坏的**一方。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财产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发展，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时，无论如何决不会因此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到那时，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会消失。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那么这决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因为他们把无产者当做**神**。事实恰好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

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也已被剥夺，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所达到的非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而同时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并不是白白地经受那种严酷的但能使人百炼成钢的**劳动**训练的。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

"批判的批判"之所以不肯承认这一点，是因为它已宣告自己是历史的唯一创造因素。历史上的种种对立从它那里产生，消灭这些对立的行动也从它那里产生。因此，它借它的化身埃德加的口发布了如下的**宣言**：

> "有教养和没有教养、有财产和没有财产，这些**对立**如果不应该**受到亵渎**，那就必须**受到完全而彻底的**批判。"

有财产和没有财产被当做批判的思辨的两个对立面而受到了

形而上学的尊崇。因此，只有批判的批判的手才能触动它们而又不犯亵渎圣物的过错。资本家和工人则不应该过问他们自己的相互关系。

埃德加先生根本没有料想到，有人可能触动他的关于对立的批判观点，有人可能亵渎这些圣物，因此，他就让自己的论敌提出只有他自己才能对自己提出的异议了。

> 批判的批判所臆想的论敌问道："除了自由、平等这一类已有的概念而外，难道还可能使用其他的概念吗？我的回答是〈请注意埃德加先生的回答〉，当希腊语和拉丁语所表达的思想领域被穷尽的时候，这两种语言就已经死亡了。"

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批判的批判没有用**德**语给我们提出任何一种思想。表达它的思想的语言还没有产生，尽管赖沙特先生通过批判地处理外语词汇，孚赫先生通过批判地处理英语，埃德加先生通过批判地处理法语为创造一种**新的批判的**语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批判性的评注 3

> "蒲鲁东根据什么来证明财产是不可能的？还是根据那个平等的原则，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足以促使埃德加先生相信这一点。埃德加先生不会不知道，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把"**无限的**自我意识"作为自己的一切论述的基础，甚至把这一原则看成福音书的创造原则，而福音书由于其无限的无意识性显然是同无限的自我意识直接矛盾的。同样，蒲鲁东把平等看成同平等直接矛盾的私有财产的创造原则。如果埃德加先生把法国的**平等**和德国的"自我意识"稍微比较一下，他就会发现，后一个原则**按德国的方式**即用抽象思维所表达的东

西，就是前一个原则**按法国的方式**即用政治语言和具象思维的语言所说的东西。自我意识是人在纯粹思维中同他自身的平等。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他自身的意识，也就是说，人意识到别人是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做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平等是法国的用语，它表示人的本质的统一，表示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表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它表示人同人的社会关系或人的关系。因此，正如德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以前，试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瓦解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一样，法国的破坏性的批判也试图用**平等**的原则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 "蒲鲁东竭力反对哲学，这件事本身我们不能怪他。但他为什么反对呢？他认为，哲学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够实际的，它昂然骑在**思辨**的高头大马上，因此**人们**在它的面前显得过分渺小。我认为，哲学是超实践的，也就是说，它到现在为止无非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它总是受被它认为是绝对的东西的事物现状的前提的束缚。"

哲学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这一看法，最初并不是埃德加先生提出的，而是**费尔巴哈**提出的；费尔巴哈最先把哲学称做思辨的和神秘的经验，并作了证明。可是，埃德加先生却能够使这种看法发生独创的、批判的变化。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曾经得出结论，认为哲学应该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贫困的深渊，而埃德加先生却相反，他教导我们说，哲学是超实践的。其实情况是这样：正因为哲学过去只是事物现状的超验的、抽象的表现，正由于它自己的这种超验性和抽象性，由于它**在想象中不同于**世界，它必定会以为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是远远低于它自己的；另一方面，因为哲学过去并不是**在实际上**与世界有所不同，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作出任何**实际的判断**，未能表现出对世界有任何现实的识别力，也就是说，未能**通过**

实践来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所谓哲学曾经是超实践的，这只是说哲学曾经飘浮在实践之上。批判的批判认为人类就是精神空虚的群众，这样它就为思辨认为现实的人无限渺小的论点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旧的思辨在这一点上同批判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例如，请大家看看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下面这一段话：

“从需要的观点看来，观念的具体对象就是我们称之为**人**的那种东西；因此，在这里，而且**其实**也只是在这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人的。”①

当思辨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它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观念**、**精神**等等。至于哲学表述事物现状的方式，孚赫先生对英国事物现状的描述和埃德加先生对法语的现状的描述，已经提供了生动感人的例子。

“可见，蒲鲁东也是很实际的：他发现了平等这个概念是证明财产的根据以后，就从这个概念出发振振有词地反对财产。”

蒲鲁东在这里的做法和德国批判家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德国的批判家发现了人是证明神的存在的根据以后，就从人这个观念出发振振有词地直接反对神的存在。

“如果平等的原则所造成的结果比平等本身更强有力，那么蒲鲁东怎么还要帮助这个原则获得这么意外的强力呢？”

按照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观点，自我意识是一切宗教观念的

①《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256页（《法哲学原理》第190节）。——编者注

基础。在他看来，自我意识是福音书的创造原则。为什么自我意识的原则所造成的结果比自我意识本身更强有力呢？人们用德国的方式回答我们说，这是因为：自我意识固然是宗教观念的创造原则，但是它只有作为脱离自身的、自相矛盾的、外化和异化了的自我意识，才能成为这种创造原则。因此，达到了自身、理解了自身、认识了自己本质的自我意识，就是支配着它的自我外化的各种产物的力量。蒲鲁东的情况也完全是这样，当然有一点不同，就是：他讲法语而我们讲德语，因此他是用法国方式表达我们用德国方式所表达的东西。

蒲鲁东自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平等作为创造的理性原则是财产赖以确立的基础，而且作为最终的理性依据，它又是证明财产的一切论据的基础，但是，为什么不存在平等，反而存在对平等的否定——私有财产呢？因此，蒲鲁东就对财产的事实本身进行考察。他证明，"事实上，财产作为一种制度和原则是**不可能**的"（第34页），也就是说，**它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正在各方面扬弃着自身；用德国的方式来说，它是外化了的、自相矛盾的和自我异化的平等的定在。和对这种异化的认识一样，法国的实际状况也以充分的理由向蒲鲁东指明了真正扬弃异化的必然性。

蒲鲁东感到，在否定私有财产的同时，也需要**历史地**说明私有财产存在的理由。像所有这一类最初的论述一样，蒲鲁东的论述也带有实用的性质，这就是说，他假定过去的各代人都自觉地和深思熟虑地想要在自己的各种制度中实现他认为代表人的本质的平等。

"我们一再提起这一点……蒲鲁东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的。"

蒲鲁东写作的出发点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自我构想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是一种远远

超出**批判**的、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蒲鲁东不单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他本人就是无产者，工人。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因此具有与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作品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

> “蒲鲁东是为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的利益而写作的。拥有和一无所有，在他看来是两个绝对的范畴。拥有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在他看来不拥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考对象。蒲鲁东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但是只应当和别人一样多。但是请想一想，在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中，我感兴趣的只是唯我独有的东西，我比别人多的东西。在平等的情况下，拥有与平等本身对我来说都将是无关紧要的了。”

按照埃德加先生的看法，**拥有**和**不拥有**对蒲鲁东来说是两个绝对的**范畴**。批判的批判到处都只看到一些范畴。因此，按照埃德加先生的看法，拥有和不拥有，工资，薪饷，匮乏和需要，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劳动，都无非是一些范畴而已。

如果社会所必须摆脱的只是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那么为社会“克服”和“扬弃”这两个范畴，对任何一个甚至比埃德加先生更差劲的辩证论者说来，该是一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呵！埃德加先生也把这种事看做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认为面对蒲鲁东仅仅**说明**一下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都不值得做。但是，既然不拥有不只是一个范畴，而是最悲惨的现实，既然当今一无所有的人也就是极其卑微的人，既然他连一般的生存之路都已被切断，而合乎人道的生存之路就更无从谈起，既然不拥有的状态就是人完全脱离其对象性的状态，那么，蒲鲁东把不拥有看做最重要的思考对象，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正因为在蒲鲁东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著作家以前很少有人考虑这个对象，所以这样做就更加正确。不拥有是最令人绝望的**唯灵论**，是

人的完全的非现实，是非人的完全的现实，是一种非常实际的拥有，即拥有饥饿，拥有寒冷，拥有疾病，拥有罪过，拥有屈辱，拥有愚钝，拥有一切不合人道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但是任何对象，只要它的重要性头一次被人们所充分认识从而成为思考的对象，那它就是**最重要的思考对象**。

蒲鲁东想扬弃不拥有以及拥有的旧形式，这同他想扬弃人与自己的**对象性本质**的实际异化的关系，以及想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在**国民经济学**[5]上的表现，其实都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但是，由于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还受到国民经济学的前提的束缚，因此，蒲鲁东仍以国民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理解对象世界的重新获得。

蒲鲁东并不是像批判的批判硬要他做的那样用拥有去反对不拥有；而是用**占有**去反对拥有的旧形式——**私有财产**。他把占有解释为"**社会职能**"。在一种职能中"值得关注的"不是"排斥"别人，而是使用和实现我自己的本质力量。

蒲鲁东未能对这个思想作出恰当的阐述。"**平等的**占有"是国民经济学的观念，因而本身也是下述状况的异化表现：**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在**国民经济学的异化**范围内**扬弃国民经济学的异化。

批判性的评注 4

"既然他〈蒲鲁东〉保留工资的概念，既然他把社会看做一个给我们工作并支付我们劳动报酬的机构，那么，他就更不能把时间当做报酬的尺度，因为他赞成**许霍·格劳秀斯**的看法，不久前阐述了一种观点，认为在事物的**效用**方面，时间是无关紧要的。"

唯有在这个地方批判的批判才企图解决自己的任务并企图向蒲鲁东证明，他从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出发错误地驳斥国民经济学。在这里，批判的批判以真正批判的形式**大出其丑**。

同许霍·格劳秀斯的意见一致，蒲鲁东发挥了一种观点，即**时效**不能作为把**占有**变为**财产**、把一种"**法的原则**"变为另一种"**法的原则**"的根据，这就像时间不能把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这个真理变为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三直角的真理一样。

> 蒲鲁东大声疾呼："你们决不可能使那本身什么都创造不了、什么都转变不了、什么都更改不了的时间把**使用**某物品的**人变为**该物品的**所有者**。"

埃德加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因为蒲鲁东说，单是时间不能把一种法的原则**变为**另一种法的原则，而且时间本身又什么都转变不了，什么都更改不了，所以他把**劳动时间**当做劳动产品的国民经济学上的**价值**的尺度，就犯了前后不一贯的错误。埃德加先生之所以能得出这个批判的批判的意见，是因为他把"valeur"["价值"]译成了"Geltung"["效用"]，因此在谈到法的原则的效用和谈到劳动产品的商业价值时，都可以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把空闲的时间和充实的劳动时间等量齐观。如果蒲鲁东说时间不能把蚊子变为大象，批判的批判同样有理由得出结论说，既然如此，他就没有理由把劳动时间当做工资的尺度。

生产某个物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钱，因此撇开**竞争**的影响不谈，就是它能**卖**多少钱，甚至批判的批判本身也肯定会认识到这一点。除劳动时间和劳动材料外，国民经济学家还把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及资本家的利息和赢利也算入生产费用。在蒲鲁东那里，地租、利息和

赢利都消失了，因为在他那里私有财产消失了。于是剩下的只有劳动时间和预支费用。由于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产品价值规定的尺度，他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在旧国民经济学中却是资本和地产的物质力量起决定作用，这就是说，蒲鲁东还是以国民经济学的、因而也是充满矛盾的形式恢复了人的权利。他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处理这个问题正确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即新国民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开头部分就阐发了这样的见解：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尺度。

然而就算批判的批判暂时假定蒲鲁东没有从工资的前提出发吧。难道它认为生产某件物品所需要的**时间**将来**会有一天**不再成为包含在这件物品的"**效用**"中的主要因素吗？难道它认为时间将会丧失自己的**珍贵性**吗？

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确定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即确定这种物品的**价值**，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就取决于时间。

甚至**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如果我想合理地行动，在确定某种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计划时，难道我不必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如果不考虑时间，我至少会遇到一种危险，即我思想中的物品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中的物品，因而它也就只能获得想象中的物品的价值，也就是**想象的价值**。

以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对国民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承认人的活动的一切本质规定，但只是在异化的、外化的形式中来承认。例如在这里，这种批判把时间对**人的劳动**的意义变为时间对**工资**、对雇佣劳

动的意义。

埃德加先生继续写道：

"为了强迫有才能的人接受上述的尺度，蒲鲁东竟**滥用自由贸易**这个概念，并断言社会和社会的单个成员本来就有权利拒绝有才能的人的产品。"

在**傅立叶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127]那里，有才能的人站在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报酬**的过高**要求**，并把他们关于自己具有无限价值的幻想提出来作为确定其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尺度。蒲鲁东对这些有才能的人的回答，跟国民经济学对任何想使价格大大超过所谓自然价格即所提供的物品的生产费用的奢求所作的回答一样——他用自由贸易来回答。不过，蒲鲁东并没有在国民经济学的意义上**滥用**这种关系，相反，他把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只是名义上的、虚拟的东西，即缔约双方的**自由**，设想为现实的东西。

批判性的评注 5

"蒲鲁东根据人类因利息制度和利润制度以及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而特别遭到损害这一点，对财产的不可能性进行了证明；这个证明缺少一个反题，即指出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是可能的。"

批判的批判具有良好的本能，不用去深入研究蒲鲁东关于利息制度和利润制度等等的论述，也就是说，不用去深入研究蒲鲁东的最重要的论述。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关于私有财产运动的完全实际的知识，要想在这一点上批判蒲鲁东，哪怕只是做个批判的样子，也完全是不可能的。于是，批判的批判就指出蒲鲁东没有提供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是可能的证明，企图以此弥补自己的无能为力。批判除了空话什

么也没有拿出来，它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给它提供**一切**呢?

> “蒲鲁东用来证明财产的不可能性的论据是，工人不能用自己劳动的报酬重新买回自己的产品。蒲鲁东在探究资本的实质时，没有提出详尽透彻的论据。工人不能重新买回自己的产品，是因为产品始终是集体的产品，而工人本身无非是单个的被雇用的人罢了。”

与蒲鲁东的推论相反，埃德加先生本来甚至可以更详尽透彻地说，工人之所以不**能**重新买回自己的产品，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产品**重新买回来**。在购买的定义中就已经包含这样的意思：工人把自己的产品当做他失去的、异化了的对象来对待。顺便说一句，埃德加先生的详尽透彻的论据并没有详尽透彻地说明，资本家自己也**无非是单个的**人，而且还是**被**利润和利息**所雇用的**人，为什么资本家不仅能重新买回劳动产品，而且还能重新买回比劳动产品更多的东西。要说明这一点，埃德加先生就必须说明劳动和资本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必须去探究资本的实质。

前面援引的那段批判的话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批判的批判怎样立刻利用它刚从一位作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以便通过批判的言词使这些东西成为它自己的天才发明，用来反对那个作家。要知道，批判的批判正是从蒲鲁东那里汲取了这个未曾被蒲鲁东提出过而由埃德加先生提出来的论据。蒲鲁东说：

> “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 如果把工人彼此分离开来，那么，付给每一个单个的人的日工资就很可能超过每一单个人的产品的价值；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虽然你们给一切个人力量支付了报酬，但是你们并没有给集体的力量支付报酬。”

蒲鲁东**最先**提醒人们注意，付给单个工人的工资的总和，即使

在每一单个人的劳动都完全得到了报酬的情况下，也还是不足以偿付物化在大家的产品中的集体力量；因此，工人不是作为**集体劳动力的一部分**被雇用的。埃德加先生把这个思想牵强附会成了工人无非是单个的被雇用的人。这样，批判的批判就利用蒲鲁东的**总的**思想去反对同一个蒲鲁东对同一个思想所作的进一步的**具体**发挥。它用批判的方式夺过了这个思想，并在下面这段话中道出了**批判的社会主义**的秘密：

> “当今工人的**思维**只顾及自己，也就是说，他只是为他个人而索取报酬。正是**工人自己**不考虑他在同其他力量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而事实是，英国和法国的工人成立了各种联合会，在这些联合会中，工人们彼此谈论的话题不仅有他们作为**工人**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们作为**人**的各种需要，此外，在这些联合会中，他们表现出了对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的非常全面而充分的认识。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就能够摆脱自己的企业主和他们自己实际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而批判的批判却相反，它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

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极其丰富的想象，不再为他们个人而索取报酬，那么他们在现实中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了。从这以后，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作为以太般的生物，他们自然就可以靠纯粹思维的以太来生活了。批判的批判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上征服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现实的资本；只要他们在意识中改变自己的"**抽象的我**"，并把**现实地**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改变自己存在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的**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做非批判的行为轻蔑地加以拒绝，他们就会**现实地**发生变化并使自己成为现实的人。**这种"精神"**既然把现实只看做一些范畴，它自然也就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批判的批判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埃德加先生发表了自己的这番宏论之后，当然必定会"否认"蒲鲁东的批判具有"意识"了。

> "但是蒲鲁东也想成为**讲求实际**的人。""他认为他已经有了认识。""虽然如此"，认识的宁静得意扬扬地大声叫道，"但我们现在也还是必须否认他**有认识的宁静**。""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摘引几段话，以证明他很少认真考虑自己对社会的态度。"

在后面我们还要从批判的批判的著作中摘引几段话（见《贫民银行》和《模范农场》），以证明它连最基本的国民经济关系都还未能认识，更谈不到认真考虑，却以它所特有的批判的机敏，感到自己有责任对蒲鲁东作出自己的评价。

在批判的批判作为认识的宁静"**制服了**"**一切群众性的**"**对立面**"之后，在它用范畴的形式夺得了整个现实并把人的一切活动消融

在思辨的辩证法中之后，我们将看到，它又用思辨的辩证法重新创造世界。不言而喻，为了使采用批判的思辨形式来创造世界的奇迹不致遭到“亵渎”，就只能用**秘密**形式向普通群众进行宣示。于是，批判的批判就化身为维什努－塞利加，以**贩卖秘密的商人**[128]的身份出现了。

第 五 章
贩卖秘密的商人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或塞利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2)思辨结构的秘密

对《巴黎的秘密》所作的批判性叙述的秘密，就是**思辨结构**即**黑格尔结构**的秘密。在塞利加先生宣称"文明中的野蛮化现象"和国家中的无权利处境是"秘密"，也就是把它们消融在"**秘密**"这个范畴之中以后，他就让"秘密"开始自己的**思辨的生命历程**。要说明这种思辨结构的**总的**特点，只要几句话就够了。塞利加先生对《巴黎的秘密》的论述就是对思辨结构的**具体**运用。

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品**"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我再进一步**想象**，我从各种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品**"["*die* Frucht"]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之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么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语言**来表达)"**果品**"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因此，我说，对梨说来，梨之成为梨，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苹果之成为苹果，也是非本质的。这些物的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它们的可以用感官感触得到的现实的定

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并强加于它们的本质，即我的观念的本质——“**果品**”。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品**”的单纯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诚然，我的有限的、有感觉支持的理智能把苹果和梨、梨和扁桃区别开来，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宣称这些感性的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紧要的。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品**”。各种特殊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品**”这个“实体”。

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如果一位矿物学家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么，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而已。这位思辨的矿物学家看到任何一种矿物都说，这是“**矿物**”，而他的学问就是有多少种现实的矿物就重复多少遍“矿物”这个词。

思辨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一个**抽象的“果实”——“**果品**”，所以，为了要达到某种现实内容的外观，它就不得不用某种方法从“**果品**”、从**实体**返回到现实的**千差万别的**平常的果实，返回到梨、苹果、扁桃等等。但是，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品**”这个抽象的观念很容易，而从“**果品**”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困难了。如果我不**抛弃**抽象，甚至不可能从抽象转到抽象的**对立面**。

因此，思辨哲学家又抛弃了“**果品**”这个抽象，但是，他是用一种**思辨的**、**神秘的**方法来抛弃的，就是说，使人看来好像他并**没有**抛弃抽象似的。因此，他事实上也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而已。他大体上是这样进行推论的：

如果说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无非是“**实体**”、“**果品**”，那么，试问“**果品**”又怎么会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

扁桃呢？同我关于**统一体**、关于“**实体**”、关于“**果品**”的思辨观念显然相矛盾的**多种多样的外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思辨哲学家回答道：这种外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果品**”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身有区别的、能动的本质。普通果实的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感性的理智有意义，而且对“果品”本身，对思辨的理性也是有意义的。通常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品”的不同的生命表现，它们是“**果品**”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因此，比如说，在苹果中“**果品**”给自己一个苹果形状的定在，在梨中就给自己一个梨形状的定在。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实体观点出发那样，说梨是“**果品**”，苹果是“**果品**”，扁桃是“**果品**”；而是相反，必须说“**果品**”把自己设定为梨，“**果品**”把自己设定为苹果，“**果品**”把自己设定为扁桃；把苹果、梨、扁桃彼此区别开来的差别，正是“**果品**”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果品**”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果品**”就不再是无内容的、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品**”都给自己一个更为发展的、表现得更为鲜明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又是活生生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既把每一种果实全都消融于自身中，又从自身产生出每一种果实，正如身体的各部分不断消融于血液，又不断从血液中产生一样。

人们可以看出，基督教认为，上帝只有**一个**化身，而思辨哲学则认为，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化身，比如在这里，在思辨哲学看来，每一种果实都是实体的化身，即绝对的果实的化身。所以，思辨哲学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把现实的、普通的果实的**存在**制造出来，然后以神秘

的口吻说，有苹果、梨、扁桃、葡萄干。但是，我们在思辨的世界里重新找到的这些苹果、梨、扁桃和葡萄干最多不过是**虚幻的**苹果、**虚幻的**梨、**虚幻的**扁桃和**虚幻的**葡萄干，因为它们是“**果品**”这种抽象的**理智本质**的生命的各个环节，因而就是抽象的**理智本质**本身。在思辨中使人们感到高兴的，就是重新获得了各种现实的果实，但这些果实已经是具有更高的神秘意义的果实，它们是从你的脑子的以太中，而不是从物质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它们是“**果品**”的化身，是**绝对主体**的化身。因此，当你从抽象，从“**果品**”这一**超自然的**理智本质返回到各种现实的**天然的**果实时，你倒使这些天然的果实具有了一种超自然的意义，使它们变成了纯粹的抽象。所以，你最感兴趣的正是证明“**果品**”在它的这一切生命表现即苹果、梨、扁桃等等中的**统一性**，也就是证明这些果实的**神秘的联系**，证明“**果品**”怎样在这些果实的每一种中**逐渐地**实现自身，并怎样**必然地**从自己的一种定在转变为另一种定在，例如，从葡萄干转变为扁桃。因此，通常的果实的价值**已经不**在于它们的**天然**属性，**而**在于使它们在“**绝对果品**”的生命过程中获得一定地位的**思辨**属性。

当一个普通人说有苹果和梨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说出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但是，如果哲学家以思辨的方式说出这些存在物，那他就是说出了**非同寻常的东西**。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从“**果品**”这个非现实的**理智本质**中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等，也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的抽象的理智**（即他所设想的在他身外的一种绝对主体，在这里就是“**果品**”）中**创造出**这些果实。在思辨哲学家说出的每一种存在物中，他都完成了一次创造行动。

不言而喻，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属

性当做由他**发明**的规定塞了进来，因为他给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即抽象的理智公式起了现实事物的**名称**，最后，因为**他**把从苹果的观念**过渡**到梨的观念这种他**自己的**活动，宣布为绝对主体即“**果品**”的**自我活动**。

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塞利加先生，先作这些说明是必要的。如果说塞利加先生过去一直把现实的关系（例如法和文明）消融在秘密这个范畴中，从而把“**秘密**”变为实体，那么，现在他才登上了真正思辨的、**黑格尔的**高峰，并把“**秘密**”变成了**体现**为现实的关系和人的独立主体，而伯爵夫人、侯爵夫人、浪漫女子、看门人、公证人、江湖医生、桃色事件、舞会、木门等等就成了这一主体的生命表现。他先从现实世界造出“**秘密**”这一范畴，然后又从这一范畴造出现实世界。

由于塞利加先生无疑具有高出**黑格尔**的**两大**优点，所以他笔下的**思辨结构**的秘密就暴露得**更加清楚**了。首先，黑格尔善于用诡辩的巧妙手法把哲学家借助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个对象过渡到另一个对象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是臆想出来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所完成的过程。其次，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现实的**叙述。这种在思辨的阐述**之中**所作的现实的阐述会诱使读者把思辨的阐述看成是现实的，而把现实的阐述看成是思辨的。

在塞利加先生那里就没有这两种困难。他的辩证法丝毫没有伪善和矫饰。他以值得称赞的诚实和老实人的直率来表演他的特技。而且他不在**任何地方**掺入**现实的内容**，所以他的思辨结构没有任何碍手碍脚的附加物，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掩饰，这种思辨结构让我们看

到的是赤裸裸的美。而且，在塞利加先生那里还出色地表明：一方面，思辨怎样以虚假的自由方式从自身中先验地[a priori]造出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思辨又怎样由于想用诡辩来摆脱对**对象**的合理的、自然的依存关系，却偏偏陷入了对对象的最不合理和最不自然的**从属关系**，而不得不把对象的最偶然的和最个性化的规定臆造成绝对必然的和普遍的规定。

第 六 章
绝对的批判的批判
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1)绝对批判的第一次征讨

(a)"精神"和"群众"

到目前为止，批判的批判看来或多或少是对各种各样的**群众性**的对象进行批判的研究。现在我们却发现它正在研究绝对批判的对象，即**它自己**。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靠批判地贬低、否定和改变**一定的**群众性的对象和人物来取得自己的相对荣誉。现在它却靠批判地贬低、否定和改变普遍的群众来取得自己的**绝对**荣誉。过去，相对的批判同相对的界限相对立。现在，绝对的批判同绝对的界限，群众的界限，即作为界限的群众相对立。同一定的界限相对立的相对的批判本身必然是**有限的**个体。而同**普遍的**界限即界限本身相对立的绝对的批判必然是**绝对的**个体。正像各种各样的群众性的对象和人物汇聚在"**群众**"这一锅**不纯的**稀粥里一样，表面上还是对象性的和人物性的批判变成了"**纯粹的批判**"。先前，批判看来或多或少是赖沙特、

埃德加、孚赫等等这些批判的个体的**特征**。现在，批判却是**主体**，而布鲁诺先生则是它的化身。

先前，**群众性**看来或多或少是被批判的多种对象和多种人物的特性；现在，多种对象和多种人物却变成了“**群众**”，而“**群众**”则变成了一种对象和一种人物。以前的一切批判的关系都已化为绝对的批判的英明同绝对的群众性的愚蠢的关系。这种**基本的关系**现在表现为到目前为止的批判行动和批判斗争的**意图**、**趋向**、**解答**。

“纯粹的”批判根据其绝对的性质在登场时将立即发表与众不同的“**箴言**”，但是尽管如此，作为绝对的精神，它必定要经历一个辩证的过程。它的原初概念，只有在它的天体运行的终点上才会真正得到实现（见黑格尔《哲学全书》①）。

> 绝对的批判宣告说：“还在几个月以前群众就以为自己是强大有力的，是注定要统治世界的，他们认为能够扳着指头计算这一天的到来。”[129]

正是**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在《自由的正义事业》（自然是“他**自己的**”事业）、《犹太人问题》[130]等著作中扳着指头计算过统治世界的日子的到来，虽然他也曾承认不能够确切地指出这个日期。他竟把他自己的一大堆罪过列入群众的罪行录。

> “过去群众以为自己掌握了许多对他们说来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只有当人们依靠**真理**的论据始终追随**真理**的时候，……人们才完全地**掌握了真理**。”

真理对鲍威尔先生来说也像对黑格尔一样，是一台自己证明自己的**自动机器**。人应该**追随**真理。现实发展的结果，也像在黑格尔那

①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编者注

里一样，不外是**被证明了的**即**被意识到了的真理**。因此，绝对的批判可以用最褊狭固执的神学家的腔调问道：

“如果历史的任务不正是要**证明**一切真理中的这些最简单的真理（例如地球围绕太阳运行），那么还要**历史干什么**呢？”

正像在从前的目的论者看来，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的；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的；同样，历史所以存在，也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的。人为了历史能存在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真理的论据**能存在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着思辨的英明：人所以存在，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

因此，**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人物，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倒仅仅是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所以，绝对的批判使用了下面这些空洞的说法：

“**历史**不容许别人对它漠然置之，**历史**在这方面尽了**它的**最大努力，**历史**已经承担了任务，否则还要**历史**干什么呢？**历史**明确地向我们提供证明；**历史**把真理提出来讨论”云云。

如果按照绝对的批判的说法，到现在为止，历史的任务只是证明这样**几条**终归是不言而喻的最简单的真理，那么，绝对的批判把人类过去的全部经验说得如此贫乏，这首先只是证明了绝对的批判**自己的**贫乏。相反，从非批判的观点来看，历史达到的结果是，最复杂的真理最终是不言而喻的，一切真理的总和，即**人**，最终是不言而喻的。

绝对的批判继续声称：“但是，群众却**觉得**种种真理是如此一目了然，以至

它们**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以至群众认为证明真理是多余的事，因此，这些真理不值得让历史明确地对它们提供证明；它们根本就不是历史要设法加以解决的那些任务的一部分。"

绝对的批判在对群众大发一通神圣的雷霆之怒的同时，又向群众巧言奉承了一番。的确，如果因为群众**觉得**真理一目了然，真理就真**是**一目了然，如果历史按照群众的**这种态度**来**对待**真理，那么这样一来，群众的判断就是绝对的，准确无误的，是历史的**规律**，而历史只是要证明，什么东西对于群众来说还**不**是一目了然因而是需要加以证明的。所以，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活动"。

绝对的批判谈的是"**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凭着自己的批判的天真想法，臆造出了绝对的"**一开始**"和抽象的不变的"**群众**"。在绝对的批判的心目中，16世纪群众的"一开始"和19世纪群众的"一开始"，就像这两个世纪的群众本身一样，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一种已经成为**真实**和**明显**的、不言而喻的真理的特点，正在于它"**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绝对的批判对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的抨击，就是对完全"不言而喻"的真理的抨击。

对绝对的批判以及对神妙的**辩证法**说来，不言而喻的真理已丧失了它的精神实质、意义和**价值**。它像一潭死水一样，变得浑浊不清了。所以，绝对的批判一方面**证明**一切不言而喻的东西，以及许多幸而难于理解因而永远不会不言而喻的东西；另一方面，对它来说，凡是需要阐明的东西都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言而喻，现实的任务**都**不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真理**"和历史一样，是超凡脱俗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所以，它不是面向经验的人，而是面向"**心灵的深处**"，为了"**真正被认识**"，真理不去接触住在英国地下室深层或法国高高的屋顶阁楼里的

人的**粗糙的躯体**，而是"完完全全"在人的唯心主义的肠道中"蠕动"。诚然，绝对的批判向"群众"提出证据证明，到现在为止，群众曾用自己的方式即肤浅的方式被那些由历史仁慈地"提出来讨论"的真理所触动；但同时绝对的批判又预言道：

> **"群众同历史进步的关系将发生彻底的改变。"**

这一批判预言的隐秘含义立即就"使我们感到一目了然"了。

> 我们且听："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和没有取得富有影响的成效，正是因为群众对这些活动**表示关注**和**怀有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是因为在这些活动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肤浅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彩。"

看来，一种理解只有满足于一种思想，因而符合一种思想，才不再是肤浅的理解。布鲁诺先生只是**为了装样子**，才把**思想**同对它的**理解**之间的**关系**搬出来；正像他只是**为了装样子**，才把不合时宜的历史**活动**同**群众的关系**搬出来一样。如果绝对的批判因此而谴责某个对象是"肤浅的"，那么这个对象就是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绝对的批判摒弃**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见茹尔·孚赫先生论英国热点问题的文章）。此外，根据以往的**非批判的**历史，即不是按照绝对批判的意愿编纂的历史，应该严格地分清：**群众**对目的究竟"**关注**"到什么程度，群众对这些目的究竟**怀有**多大"**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理解，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

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合时宜的**”，它“**赢得了**”一切，并且有过“**极有影响的成效**”，尽管“**激情**”已经烟消云散，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摇篮的“**热情的**”花朵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这场革命只有对于**那样一些群众**来说才是“不合时宜的”，那些群众认为在**政治**“思想”中并没有体现关于他们的现实“**利益**”的思想，所以他们的真正的根本原则和这场革命的根本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如果说这场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合时宜的，那么，它之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它在本质上仍然停留在那样一种群众生活条件的范围内，而那种群众是**仅仅由少数人组成的**、不是把全体居民包括在内的、**有限的**群众。如果说这场革命是不合时宜的，那么，并不是因为群众对革命“**怀有热情**”和表示“**关注**”，而是因为人数众多的、与资产阶级不同的那部分群众认为，在革命的原则中并没有体现他们的**现实**利益，并没有体现**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包含一种“**思想**”，也就是仅仅包含一个激起暂时**热情**和掀起表面**风潮**的对象罢了。

因此，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事情当然必定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相反，“在这些活动中”，“**重要的**”仅仅是“**一种思想**”。

批判教导我们说："**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以前的自由主义的代言人所认为的那样**到别的地方**去寻找。"

在群众**以外**的进步之敌恰恰是独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群众的自轻自贱、自暴自弃和自我外化的产物**。所以，群众用反对他们的**自轻自贱**的独立存在的**产物**的办法来反对他们**本身的**缺点，就像一个人用反对上帝存在的办法来反对他**自己的宗教热忱**一样。但是，因为群众的这些**实际的**自我外化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必须同时以**外在的**方式同它们进行斗争。群众决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外化的这些产物仅仅看做**观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识**的单纯的**外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外化。早在1789年路斯达洛编辑的刊物[131]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

> "伟人们在我们看来显得伟大，
> 只是因为我们跪着。
> 让我们站起来吧！"

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让用思想所无法摆脱的那种**现实的**、**感性的**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够的。可是，**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这样一种技艺**，即把存在于**我身外**的**现实的**、**客观的**链条转变成**纯观念的**、**纯主观的**、只存在于**我身内**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

这种批判的转变**奠定了批判的批判**和**书报检查机关之间的先定的和谐**。从批判的观点看来，作家和书报检查官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相反，书报检查官只不过体现了我自己的、由

早有防备的警察机关为了我而加以**人格化的机智**，也就是与我的不机智和非批判性进行斗争的我自己的机智。作家和书报检查官的斗争只不过是装样子的，只有在卑劣的感性看来，这种斗争才是某种跟作家**与他自己**进行的**内心斗争**不同的东西。**如果说**书报检查官是**在现实上**、**在个体上**与我**不同的**，用外在的与事物格格不入的标准来糟蹋我的精神产品的**警察刽子手**，那么，这样的书报检查官正是**群众性的**想象，是**非批判的幻想**。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革纲要》[132]曾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查禁，那么罪过并不在于书报检查机关的官方的野蛮，而在于费尔巴哈的《纲要》的不文明。没有被任何群众和物质所玷污的“**纯粹的**”批判认为，书报检查官也是纯粹的、“超凡脱俗的”、脱离一切群众性现实的形象。

绝对的批判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它对这一点进一步作了如下解释：

> “现在精神知道，它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唯一的**对头**，——就是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骗和懦弱无能中去寻找。”

绝对的批判是从“**精神**”的绝对合理性的**信条**出发的。其次，它是从精神存在于**世界以外**即精神存在于人类群众以外的**信条**出发的。最后，它一方面把“**精神**”、“**进步**”，另一方面又把“**群众**”变成**固定不变的**本质，即概念，然后又把双方当做这种永久不变的两极彼此对立起来。绝对的批判并不想去研究“**精神**”本身，并不想去研究精神自己的唯灵论本性及其轻率的奢望是否就是“空话”、“自我欺骗”、“懦弱无能”的根源。相反，精神是**绝对的**，然而遗憾的是，精神同时不断地变为**精神的空虚**，因为它的如意算盘总是不如意。所以，它必须有一个对它施以奸计的**对头**。这个**对头**就是群众。

讲到“**进步**”，情形也是这样。尽管有“**进步**”的奢望，却经常出现**退步**和**兜圈子**。绝对的批判根本没有想到，“**进步**”这个范畴完全是没有内容的和抽象的，可是绝对的批判竟考虑得如此周全，以至为了能够虚拟出敌视进步的“**人格化的对头**”**即群众**来说明退步，而承认“**进步**”是绝对的。因为“**群众**”无非是“**精神的对立物**”，即“**批判**”所说的**进步**的“**对立物**”，所以也只能用这一想象的对立物来给群众下定义。如果把这一对立物撇开不谈，那么，关于群众的**意义**和存在，批判所能说的只不过是某种完全不确定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群众这个‘**词**’的**意思也**包含**所谓**有教养的人士。”

对批判的定义来说，一个“也”或一个“所谓”就已经足够了。这样一来，**群众**也就不同于**现实的**群众，群众只是为了“**批判**”才作为“**群众**”而存在。

一切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一方面，甚至最顺利的辉煌行动看来都没有取得辉煌的结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行动；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人类群众的进步**，群众陷入了日益严重的**非人**境遇。因此，那些著作家宣称（见**傅立叶**的著作）“**进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的**空洞词句**；他们已推测出（见**欧文**及其他人的著作）文明世界的基本缺陷；因此，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广大群众**的运动，而过去的历史发展是与这个运动相对立的。人们只有了解英法两国工人的钻研精神、求知欲望、道德毅力和对自己发展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才能想象这个运动的**合乎人道的**崇高境界。

面对这些精神的和实践的事实，“绝对的批判”只是片面地看出

事情的**一个**方面即精神的不断破产，并且怀着由此产生的懊恼心情寻找“**精神**”**的对头**，而且认为“**群众**”就是这个对头，可见绝对的批判具有多么卓越的才智哟！而所有这些伟大的批判的**发现**最终都不过是**同义反复**。按照批判的意见，**精神**到现在为止一直受到限制，碰到障碍，就是说，它曾经有一个**对头**，**因为**它有过一个**对头**。谁是**精神**的对头呢？**精神的空虚**。因为批判把群众规定为只是精神的“对立物”，只是**精神的空虚**，只是精神空虚的更详细的定义，也就是“懒惰”、“肤浅”、“自满”。绝对的批判不去追溯精神的空虚、懒惰、肤浅和自满的根源，而是从**道德上**严加谴责，并且**发现**这些品质是精神、进步的对立物，——它比起共产主义的著作家来是多么高明哟！如果这些品质被说成是**群众**的品质，即与这些品质还有所不同的某个**主体**的品质，那么这种区分只不过是“批判的”**虚假**区分而已。绝对的批判认为，除了精神的空虚、懒惰等抽象的品质以外，还有一个**特定的**具体主体。它这样认为只是装样子的，因为根据批判的理解，“**群众**”**无非就是**这些抽象的品质，是这些品质的另一种**称呼**，这些品质的**虚幻的人格化**。

然而“精神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一层**隐蔽的**含义。这层含义在以后的论述过程中将完全揭示出来，这里我们只大略地谈一谈。布鲁诺先生**所发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日耳曼**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范围内，在人类世界本身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作为**积极的**精神的少数杰出**个人**与作为**精神空虚的群众**、作为**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

黑格尔的历史观以**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为前提，这种精神是这样发展的：人类只是这种精神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

可见，黑格尔是在**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内部让**思辨的**、隐秘的历史发生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

同这种黑格尔学说同时发展的，在法国有**空论派**[133]的学说。他们宣布**理性至上**来同**人民至上**相对立，为的是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这是十分彻底的做法。如果说**现实的**人类的活动无非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群众**的活动，那么与此相反，**抽象的普遍性**即**理性**、**精神**则应该有一种抽象的表现，即在少数个体身上展示无遗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个体是否愿意去冒充"**精神**"的这种代表，这就取决于他的地位和想象力了。

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已经在**群众**身上有了自己的材料，但只是在**哲学**中才有了自己相应的表现。不过，**哲学家**仅仅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 。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现实的运动是由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的。所以，哲学家是事后[post festum]才上场的。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首先，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却决不宣布**现实的哲学家个人**就是**绝对精神**；其次，他只是**在表面上**让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精神去创造历史。因为绝对精神只是**事后**[*post festum*]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是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制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布鲁诺先生消除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

首先，他宣布**批判**就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除在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除在批判之外。所以

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

其次，布鲁诺先生又消除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他不再像黑格尔的精神那样事后[post festum]在幻想中创造历史，而是同其余人类的群众相对立，**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进入目前的同群众的**戏剧性的**关系中，在深思熟虑之后有目的地发明历史和完成历史。

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历史上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是的，批判同群众的关系，也就是已经体现出来的批判即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同群众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唯一的**历史关系。现代的全部历史都归结为这两个方面相互对立的运动。所有的对立都消融在这一**批判的**对立之中了。

因为批判的批判只有通过它的对立面，通过群众，通过**蠢物**才能**具体地存在**，所以它就必须经常为自己**制造**这种对立面，而孚赫、埃德加和塞利加三位先生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批判在它的专长方面，也就是在它把人和物进行**群众性的愚蠢化**方面具有高深的造诣。

现在，让我们跟着绝对的批判去看看它对**群众的征讨**。

(2)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

(a)欣里克斯，第二号。“批判”和“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谴责

根据第一次征讨取得的成果，**绝对的批判**可以认为“**哲学**”已被驱除，并且直截了当地把哲学称为“**群众**”的同盟者。

> “**哲学家**命中注定是要去实现**群众的**心愿的。”那就是说，“群众**要求**有一些简单概念，以便同事物本身不发生任何关系，要求有一些秘诀，以便从一开始就能对一切问题应付裕如，要求有一些说法，以便用来消灭**批判**。”①

而“哲学”正在满足“群众”的这个欲望！

被自己的胜利业绩弄得醉醺醺的绝对批判**莫名其妙地**对哲学大发雷霆。有一口隐藏的火锅，用蒸气激起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绝对批判的魁首的怒火，这口火锅就是**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②。批判在三月里读了费尔巴哈的这部著作。这次阅读的成果，同时也是认真阅读的标准，就是那篇驳斥欣里克斯教授的第二号论文。

从未逃出黑格尔派考察方式的樊笼的绝对批判，在这里对着它的监狱的铁槛和围墙狂呼乱叫。“简单概念”、术语、哲学的全部思维方式，甚至整个哲学在这里都遭到鄙弃。“**人的关系的现实丰富性**”、“**历史的惊人的内容**”、“**人的意义**”等等突然把它们取代了。人们宣告“**体**

①布·鲍威尔《欣里克斯〈政治讲义〉第二卷1843年哈雷版》，载于1844年4月《文学总汇报》第5期。——编者注

②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编者注

系的秘密”“已被揭露”。

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滥用的那些范畴：“人的关系的现实丰富性、历史的惊人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与精神的斗争”等等。

在认识到人是本质、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的基础之后，唯有“**批判**”还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像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一个范畴，变成一整套范畴的原则。当然，这样“批判”就走上了最后的求生之路，因为对惊慌不安和受到查究的**神学的**非人性说来已别无他路可走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费尔巴哈**作了种种天才的阐述以后，**绝对的**批判竟还敢用新的形式来为我们重新制造一大堆陈腐的废物，而且正是在它突然把这些陈腐的废物当做“**群众的**”废物来痛骂的时候。可是它根本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它并没有为哲学的解体动过一个指头。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揭露**批判的**“**秘密**”，就足以使人们赞赏批判对欣里克斯教授（这位教授的“**疲惫**”已给批判帮了很大的忙）说出下面这些话时所表现的批判式的天真幼稚：

"凡是没有经历过发展进程的人都要承受**损失**,因此,**即使他们想要改变自己,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充其量来说,他们是想要改变**新的**原则——不!新东西**决不可能被**曲解为**空谈,从新东西那里借用只言片语是不可能的。**"

绝对的批判在欣里克斯教授面前夸耀自己解开了"**各门学科的奥秘**"。难道批判解开哲学、法学、政治学、医学、国民经济学等等的"奥秘"了吗?根本没有。批判曾经——请注意!——在《自由的正义事业》中指出,为谋生而进行的研究与自由的科学之间、教学自由与学科章程之间是互相矛盾的。

尽管"绝对的批判"并没有像它对待别人那样,把它在引证费尔巴哈时所误解和歪曲的原理强加给费尔巴哈,硬借**费尔巴哈**之口大放厥词,这当然是好的,不过,如果它诚实的话,它就该供认出它关于"哲学秘密"的所谓奇思妙想是来自何处。而且,"绝对批判"的**神学**观点还有一个特点:当现在德国的庸人们都开始理解**费尔巴哈**并接受他的结论时,批判却没有能力正确理解和恰当运用费尔巴哈的任何一个原理。

当批判把"**群众**"同"**精神**"的斗争"规定"为迄今为止全部历史的"**目的**"时,当批判宣称"**群众**"是"卑贱"的"**纯粹的无**"时,当批判径直把群众称为"**物质**",而把"**精神**"当做真理性的东西同"物质"对立起来时,批判实现了超过它的第一次征讨的业绩的真正进步。这样一来,难道绝对的批判不就是**真正基督教日耳曼的批判吗**?在唯灵论和唯物主义原先的对立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决出胜负,并且被**费尔巴哈**一劳永逸地克服以后,"**批判**"又重新以最令人厌恶的形式把这种对立变成基本教条,并且让"**基督教日耳曼精神**"获得胜利。

最后,批判在这里把**精神**和**群众**的对立跟"**批判**"和群众的对立等同起来,这一点应当看做是批判在第一次征讨中还隐蔽着的秘密

的发展。以后它会更进一步，把**自身**和"**批判**"等同起来，从而把自己说成是"**精神**"，是绝对的，是无限的，相反把群众说成是有限的、粗野的、鲁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因为"**批判**"就是这样理解物质的。

历史的丰富性如果只限于人类和**鲍威尔先生**的关系，是多么惊人呀！

(b)犹太人问题，第二号。关于社会主义、法学和政治学（民族问题）的批判的发现

有人在向群众的、物质的犹太人传布**基督教**关于**精神自由**、**理论自由**的教义，那是一种**唯灵论的**自由，那种自由即使戴着锁链也把自己**想象成**是自由的，那种自由在"**观念**"中是称心如意的，而只是由于一切群众性的存在而感到拘束。

> "犹太人现在在**理论**领域内有多大程度的进展，他们就获得多大程度的**解放**；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想要成为自由的人**，他们就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人了。"[134]

按照这个原理，人们立即就可以测量出那条把**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同**绝对的**社会主义分隔开来的批判的鸿沟。世俗社会主义的首要原理把**单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作为一种幻想加以摒弃，为了**现实的**自由，它除了要求有理想主义的"**意志**"以外，还要求有很具体的、很物质的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仅仅为从事"**理论**"研究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这样的"**群众**"在神圣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低下啊！

我们暂且从纯粹精神的社会主义跳到**政治学**中来看看！

里瑟尔先生反对布·鲍威尔的观点，指出**他的**国家（即**批判的**国家）必须排除“犹太人”和“基督徒”。里瑟尔先生说得完全正确。既然鲍威尔先生把**政治**解放同**人的**解放混淆起来，既然国家只知道用强行排除敌对分子的代表**人物**的办法去对付那些敌对分子（基督徒和犹太人在《犹太人问题》中已经被判定为叛逆分子），比如，恐怖统治就曾想用砍掉囤积居奇者脑袋的办法来杜绝囤积居奇行为，那么鲍威尔先生在他的“批判的国家”中也就必然把犹太人和基督徒送上绞架了。既然鲍威尔已经把政治解放同人的解放混淆起来，那么他也就必然合乎逻辑地要把实现解放的**政治手段**同实现解放的**人的手段**混淆起来。但是，只要有人向绝对的批判指出其推论的**特定**含义，绝对的批判就会加以反驳，其用语同**谢林**以前反驳一切论敌时的用语如出一辙（那些论敌用**现实的**思想来取代谢林的空话）：

> “**批判的**反对者之所以成为批判的反对者，是因为他们不仅用自己的**教条主义**的尺度来对待批判，而且认为批判本身也是**教条主义的**；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反对批判，就是因为批判不承认他们的教条主义的区分、定义和托词。”

当人们把绝对批判的**特定的**、现实的含义、思想和观点作为前提时，他们对绝对批判当然就像对**谢林**先生那样，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然而，为了适应并且为了向里瑟尔先生证明自己的博爱之忱，“**批判**”决心使用教条主义的区分、定义、特别是“**托词**”。

比如，有这样一段话：

> “如果我在那本书里〈在《犹太人问题》中〉**愿意**或者**可以**越出批判的**范围**，我本来**应当**〈！〉**谈论的**〈！〉就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因为‘社会’并不排除任何人，只有那些不愿意参与社会发展的人才自己把自己从社会中排除出去。”

在这里，绝对的批判在它本来应当做的事（如果它没有做出相

反的事的话)和它实际做的事之间进行了**教条主义的区分**。它用禁止它越出“**批判的范围**”的**意愿**和**许可**这种“**教条主义的托词**”来解释自己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的局限性。怎么?“**批判**”应当**越出**“**批判**”**的范围**吗?由于教条主义的必然性,一方面势必要断言自己对犹太人问题的理解是绝对的,是“**批判**”,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有更广泛的理解的可能性,绝对的批判才产生这种完全**群众性**的想法。

批判“**不愿意**”和“**不许可**”**的秘密**将在后面被揭开,原来这种秘密就是批判的**教条**。根据这种教条,“批判”的一切表面上的局限性无非是为迁就群众理解力而采取的必要的**适应行为**而已。

批判**不愿意**!批判**不许可**越出自己对犹太人问题的狭隘理解的范围!但是,如果它**愿意**或者**许可**的话,那它会做出些什么来呢?它会提出**教条主义的定义**。它会不谈“国家”而谈“**社会**”,因而它不会去研究犹太人同**当前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它会**教条主义地**给不同于“国家”的“**社会**”**下定义**,指出**国家**会把**那些**不愿参与社会发展的人从国家中排除出去,而这些人却是自己把自己从社会中**排除**出去的!

在排除异己方面,社会的做法跟国家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社会做得斯文一些罢了。社会不是把你一脚踢出门外,而是设法使你在这个社会里感到很不舒服,让你自己自愿地走出门外。

实际上,国家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国家并不排除那些能遵守其一切要求和一切禁令、并顺应其发展的人。**完备的**国家甚至无视事实,它把**现实的**对立说成是**非政治的**、对它毫无妨碍的对立。此外,绝对的批判本身还提出一种思想,认为就是因为犹太人排除国家,也就是说**犹太人自己**把**自己**从国家中排除出去,国家才排除犹太人。如果这种相互关系在**批判的**“社会”中采取更温文尔雅、更假仁假义、更阴险狡诈的形式,这只是证明“**批判的**”“**社会**”的更加

虚伪和发育不全。

我们再来看看绝对批判的“教条主义的区分”、“定义”、特别是**“托词”**。

例如，里瑟尔先生要求批判家“**把**法的范围以内的东西和法的范围以外的东西**区分开来**”。

批判家对于这种**法律上的**要求的蛮横无理表示愤慨。

> 他反驳说：“**可是**直到目前，情感和良心都干涉了法，常常补充它，由于法的**教条主义形式**〈因而不是法的教条主义**本质**?〉所决定的法的性质，就必须常常补充它。”

批判家只是忘记了，**法本身**也非常明确地**把**自身同“情感和良心”**区分开来**；他忘记了，这种区分可以由**法**的片面**本质**和教条主义**形式**来说明，这种区分甚至成了法的**主要教条之一**；最后，他忘记了这种区分的实际实现就构成**法的发展的**顶峰，正像宗教同全部世俗内容的脱离使宗教成为**抽象的**、**绝对的**宗教一样。“情感和良心”干涉法这个事实使“**批判家**”有足够的根据在谈法的地方谈情感和良心，在谈**法律**教义的地方谈**神学**教义。

通过绝对批判的“定义和区分”，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去领教它关于“**社会**”和“**法**”的最新“**发现**”。

> “**批判**准备了世界形式，**甚至第一次**准备了世界形式的**思想**。这种世界形式不**单单是法的**形式，而且是〈读者，请你提起精神来！〉**社会的**形式，关于这种形式**至少可以**说这么多〈这么少?〉：谁对它的建立毫无贡献，谁在它那里不凭自己的良心和情感来生活，他就不会感到在它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也不可能参与它的历史。”

“批判”所准备的世界形式被规定为**不单单是**法的形式，**而且是**

社会的形式。这个规定可以有两种解释。这里所引的这句话或者可以解释为世界形式“**不是**法的，**而是**社会的”形式；或者可以解释为世界形式“不单单是法的，而且**也是**社会的”形式。让我们按照这两种解释来考察一下这句话的内容，先按第一种解释来进行考察。绝对的批判在前面把这个不同于“**国家**”**的**新“世界形式”规定为“社会”。现在它却用形容词“**社会的**”来规定名词“**社会**”。欣里克斯先生的“**政治的**”一词曾经三次受到“**社会的**”**这个词**的批驳，而里瑟尔先生的“**法的**”一词则受到了“**社会的社会**”**这个词组**的批驳。如果向欣里克斯先生所作的那些**批判的**解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公式：“社会的”+“社会的”+“社会的”=3a，那么，绝对的批判在其第二次征讨中就是从**加法**进一步转用**乘法**，让里瑟尔先生去找自我相乘的社会，社会的**平方**，即社会的社会=a^2。绝对的批判为了使它的关于社会的解释臻于完善，只剩下以分数计算、求社会的**平方根**等等办法尚未使用。

如果我们反过来按照第二种解释，即“**不单单是**法的，**而且也是**社会的”世界形式来考察，那么这种双重的世界形式无非是**现今**存在的**世界形式**，即**现今社会的**世界形式。“**批判**”在其史前时代的思维中就先为**现今存在**的世界形式的**未来**存在**作准备**，这是伟大的令人崇敬的**批判奇迹**。但是，不管“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社会”情况怎样，关于这种社会，**批判**除了讲“寓言教导”[fabula docet]，除了谈**道德**教化以外，眼下就再也不可能透露什么东西了。谁在这个社会里不凭自己的情感和良心来生活，“他就不会**感到**自己在它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到最后，除了“纯情感”和“纯良心”，即“精神”、“**批判**”及其**自己人**之外，将不会有任何人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群众**将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社会中被排除出去，其结果是，“群众的社会”将置身于“社会的社会”之外。

总而言之，这个社会无非是**批判的天堂**，而现实的世界则作为**非批判的地狱**从那里被排除出去。绝对的批判正在其纯粹思维中为这个“**群众**”和“**精神**”相对立的超凡入圣的**世界形式**作准备。

就**民族**命运问题向里瑟尔先生所作的解释，如同就“**社会**”问题所作的解释一样，具有同样的**批判的**深度。

绝对的批判从犹太人渴望解放和基督教国家渴望“把犹太人打入政府的另册”——仿佛犹太人不是早已被打入基督教政府的另册似的！——出发，最后作出了关于**各民族衰亡**的种种预言。我们看到，绝对的批判是通过多么复杂的曲折道路，也就是通过**神学的曲折道路**才走向现代的历史运动的。下面这句光芒四射的神谕般的预言证明，绝对的批判用这种办法获得了多么伟大的结果：

> “各民族的**未来**——**是**——**很**——**黑暗的**！”

看在批判的面上，姑且让各民族的未来黑暗到批判想要达到的程度吧！然而有一点，而且是必要的一点显得很**清楚：未来是批判的创造物**。

> 批判大声疾呼：“**命运**可以任意决定一切；我们现在知道，命运是**我们的创造物**。”

正如上帝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自己的**创造物——人一样，**批判**也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自己的创造物**——命运。所以创造命运的**批判**也像上帝一样是**万能的**。甚至它所“**遭遇到的**”来自身外的“反抗”也是它自己的创造物。“**批判创造**自己的对手”。所以，针对批判的那种“**群众性的愤慨**”只会“严重威胁”“群众”自己。

既然批判像上帝一样是**万能的**，那么它也像上帝一样是**无所不**

知的，并且善于把它的万能同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天职**结合起来：

“如果批判没有本事使**每个人**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没有本事毅然决然地向每个人指出**适合其本性**和**意志的**那种观点，批判就不成其为**划时代**的力量了。”

与此相比，**莱布尼茨**恐怕也不可能更加顺利地实现上帝的万能同人的自由和天职之间的先定的和谐。

“批判”没有**把**想要成为某种东西的**意志**和可以成为某种东西的**能力区分开来**，如果说它这样做看起来是违反了心理学，那么人们就必须想一想，批判是有确凿的根据来宣告这种**“区分”**是**“教条主义的”**。

让我们养精蓄锐进行第三次征讨！让我们再一次唤醒自己的记忆，回想一下“**批判创造自己的**对手”！但是，如果批判不说空话，它怎么能创造自己的对手——**“空话”**呢？

(3)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

(b)犹太人问题，第三号

“绝对的批判”并不限于以自己的自传来证实它所特有的无所不能的本领，证实它能够“像**破天荒地首创新事物**那样**首创旧事物**”。它也不限于**亲自出马**为自己的过去撰写辩护书。现在，它给第三者、其余的世俗界提出了一项绝对的“任务”，而且“**恰恰是目前**至关紧要的任务”，这就是为鲍威尔的行为和“著作”**辩护**。

《德法年鉴》刊载了一篇对鲍威尔先生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的

评论①。这篇文章揭露了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混为一谈的根本错误。固然，这篇文章没有使旧的犹太人问题首先获得一个“**正确的提法**”，但是，对“犹太人问题”是根据对**旧的时事问题**作出新的解释的那种提法来探讨和解决的，也正是由于这种提法，旧的时事问题才由过去的“问题”变成了现代的“问题”。

看来，绝对的批判认为在**第三次**征讨中有必要给《德法年鉴》一个答复。绝对的批判首先**承认**：

> “在《犹太人问题》中出了同样的‘**纰漏**’——把**人的**本质和**政治**本质混为一谈。”②

批判指出：

> “现在想要**指责**批判还在**两**年前部分地所持的立场，未免太迟了。”“**其实，重要的是应当对批判**甚至曾不得不……从事政治这一点加以说明。”

“**两**年前”？现在，我们就按**绝对的**纪元，从批判的救世主即鲍威尔主编的《文学报》**诞生的那一年**算起吧！批判的尘世拯救者诞生于**1843年**。同年，《犹太人问题》增订第二版问世。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这一文集中对“犹太人问题”进行“批判的”研究[135]，也是在旧历1843年，不过日期要晚一点。就在这重要的旧历1843年即批判的纪元元年，在《德国年鉴》和《莱茵报》被**查封之后**，鲍威尔先生的虚假政治的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出版了。这本书原封不动地重犯了

---

①指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编者注

②布·鲍威尔《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载于1844年7月《文学总汇报》第8期。《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一节引自《文学总汇报》的引文大都出自这篇文章。——编者注

鲍威尔在“**政治**本质”这一问题上的老毛病。辩护者被迫假造了一份**年表**。

对于为什么鲍威尔先生“**甚至曾不得不**”从事政治这一点的“**说明**”，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具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既然把绝对批判的可靠性、纯洁性和绝对性事先奉为**基本的信条**，那么，与这种信条相矛盾的事实当然会变成一堆谜，这些谜就像上帝的那些看来并不神圣的行动在神学家眼中那样深奥费解、意味深长、玄妙莫测。

相反，如果把“**批判家**”看做有限的个人，如果不把他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界限**分离开来，那就用不着再回答**为什么**“**批判家**”**甚至**曾不得不在世界范围以内求得发展这一问题了，因为**问题**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过，如果绝对的批判要坚持自己的要求，那我们愿意提供一篇经院式的短论来阐明下面的**时事问题**：

“为什么恰好要由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来证明童贞马利亚是因圣灵而怀孕这个事实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必须证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天使是神的**真正的**流出体，是尚未达到**消化食物**所必需的浓度的流出体？”“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必须为普鲁士王室作辩护并且把普鲁士国家奉为**绝对的**国家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在自己的《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中必须用‘**无限的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在《基督教真相》中必须用**黑格尔**的形式来重谈**基督教的创世说**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必须要求自己和别人来‘**说明**’他必定要犯错误这种怪事呢？”

我们在证明这些既是“批判的”，同样也是“绝对的”必要性之前，还是先来仔细听听“**批判**”用于辩护的遁词。

“犹太人问题……作为**宗教的**、**神学的**问题和作为**政治的**问题，必须……首先获得一个**正确的**提法。”“在探讨和解决这两个问题时，‘**批判**’**既**不持**宗教的**观点，**也**不持**政治的**观点。”

这番话的由来是，《德法年鉴》将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探讨宣布为**真正**神学的探讨和**虚假**政治的探讨。

首先，“**批判**”针对自己被“指责”为有**神学**局限性，作了这样的回答：

“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启蒙**认为，只要把**宗教的对立**看做**无关紧要的对立**或者甚至予以否定，就可以解决犹太人问题。可是，**批判**却必须把这一纯粹的宗教对立表述出来。”

至于说到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方面，我们将会发现，神学家鲍威尔先生甚至在政治上研究的也不是政治，而是神学。

而《德法年鉴》反对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当做“**纯粹宗教的**”问题来探讨，那是专门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文集里的一篇文章来说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

《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这篇文章和旧的“启蒙”毫无关系。该文包含着鲍威尔先生对现代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即获得解放的可能性的**肯定**见解。

“批判”说道：

“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

疑问恰恰是：**什么是宗教**问题，特别是，当前**什么是**宗教问题？

这位**神学家**将根据**表面现象**作出判断，把**宗教**问题就看成**宗教**

问题。但是，请“批判”回想一下它为反驳**欣里克斯**教授所作的那番解释：当前的**政治**利益具有**社会**意义，关于**政治利益“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根据同样的道理，《德法年鉴》曾对批判说过：**宗教的**焦点问题在当前具有**社会**意义。关于**宗教**利益**本身**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只有这位**神学家**还会认为，这里涉及的是作为宗教的宗教。不过，《德法年鉴》也做了**不合道理的事情**，它竟不满足于单单使用“**社会的**”**这个词**。它还描述了犹太教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现实**地位。在剥掉了犹太教的**宗教**外壳，使它只剩下经验的、世俗的、实际的内核之后，才能够指明那种可以消除这个内核的实际的、**真正社会**的方式。鲍威尔先生却心安理得地认为“宗教问题”就是“宗教问题”。

《德法年鉴》决没有否认犹太人问题也是**宗教**问题，那只是鲍威尔先生故意制造的**假象**。相反，该杂志曾经指出，鲍威尔先生**只了解**犹太教的**宗教**本质，但不了解这一宗教本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他把**宗教意识**当做某种独立的本质来反对。所以，鲍威尔先生不是用**现实的犹太人**去说明犹太人的宗教的秘密，而是用**犹太人的宗教**去说明**现实的犹太人**。因此，鲍威尔先生对犹太人的理解仅限于犹太人是**神学**的直接对象或犹太人是**神学家**。

因此，鲍威尔先生就没有意识到，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也连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是在**货币制度**中最终形成的。他之所以未能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犹太精神是现实世界的一环，而只把它当做是**他的**世界即**神学**的一环；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忠实于上帝的人，不是把进行工作的、从事**日常劳动**的**犹太人**，而是把在**安息日**里假装正经的**犹太人**视为**现实的**犹太人。在这位**笃信基督**的神学家鲍威尔先

生看来，犹太教的**世界历史**意义已经必不可免地从基督教**诞生的那一时刻**起荡然无存。所以，他必然要重复那种认为犹太教是**违反**历史而保存下来的陈旧的正统观点；而认为犹太教只是作为神的诅咒的**确证**，作为基督启示的**明证**而存在的陈旧的神学偏见，则必然要在鲍威尔那里以**批判的神学**的形式屡屡出现。根据这种形式，犹太教现在和过去都只是作为**在宗教上**对基督教的超世俗起源的**肆无忌惮的怀疑**而存在，也就是作为反抗基督启示的**明证**而存在。

与此相反，《德法年鉴》曾经证明，犹太精神是**通过**历史、**在**历史**中**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发展不是用神学家的眼睛，而是只有用世俗人的眼睛才能看到，因为这种发展不是在**宗教学说**中，而是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德法年鉴》曾经说明，**为什么**实际的犹太精神只有在完备的**基督教**世界里才达到完备的程度；不仅如此，那里还指出，这种实际的犹太精神正是**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完备的**实践**。《德法年鉴》不是用犹太人的宗教——这种宗教竟然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自为地存在的本质——来说明**现代**犹太人的生活，而是用那些在犹太人的宗教中得到**幻想**反映的市民社会的实际要素来说明犹太人宗教的顽强生命力。因此，在《德法年鉴》中，犹太人解放成为人，或者说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是像在鲍威尔先生笔下那样，被理解为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是被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德法年鉴》已经证明，消除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除**市民社会**[11]**中的犹太精神**的任务，就是消除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

鲍威尔先生虽然是**批判的神学家**或者说是**神学的批判家**，但却是**名副其实的**神学家，他并没有能够超越**宗教的对立**。他把犹太人对

基督教世界的关系**仅仅**看做是**犹太人的宗教**对**基督徒的宗教**的关系。他甚至不得不在犹太人和基督徒与**批判的**宗教——**无神论、有神论**的最后阶段、对神的**否定性的**承认——的**对立**中批判地恢复宗教对立。最后，他由于自己的**神学狂热**，不得不把"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即现代世界"获得自由"的能力，仅仅**局限于**他们理解并亲自从事神学"批判"的能力。在正统的神学家看来，整个世界都应归结为"宗教和神学"（他也可以同样成功地把世界归结为政治学、国民经济学等等，并且给**神学**加上天国的**国民经济学**之类的名称，因为，它是一门关于"**精神财富**"和天国财宝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学说！），同样，在激进的批判的神学家看来，世界获得解放的**能力**就应归结为把"宗教和神学"作为"宗教和神学"加以批判的**唯一的**抽象能力。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斗争是反对自我意识的**宗教**局限性的斗争，然而自我意识的批判的"**纯粹性**"和"**无限性**"也同样是神学的局限性。

可见，鲍威尔先生之所以用**宗教**和**神学的**方式来考察**宗教**和**神学**问题，就是因为他把现代的"宗教"问题看做"**纯粹宗教的**"问题。他那种"对问题的**正确提法**"，只不过使问题获得了一种同他回答问题的"**特有能力**"相符合的"正确"提法！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方面。

在许多国家，**犹太人**（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还远远没有获得**人的**意义上的解放。可见，**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必定是存在**差别**的。所以，必须对**政治**解放的实质，也就是对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进行研究。而对那些还不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的国家，也应该对照完备的政治国家来加以衡量，指出它们是不发达的国家。

这就是研究犹太人的"**政治解放**"这一问题所应依据的观点，而

《德法年鉴》所依据的就是这一观点。

鲍威尔先生为“批判”的“犹太人问题”作了如下的辩护：

> “有人向犹太人指出，他们对他们要求获得自由的那种**制度**抱有幻想。”

鲍威尔先生的确已经指出**德国**犹太人的幻想，就是在不存在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要求参加政治共同体，在只存在政治特权的国家要求**政治权利**。可是，《德法年鉴》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他自己对“德国政治制度”所抱有的“幻想”并不比犹太人少。他就是用“**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这一点来说明犹太人在德意志各邦的处境的。他歪曲了事实，他把**特权**国家、**基督教日耳曼**国家设想成绝对的基督教国家。可是，《德法年鉴》已经向他证明，那种没有任何宗教特权的政治上完备的现代国家，也就是完备的**基督教**国家；因此，完备的基督教国家不仅**能够**解放犹太人，而且已经解放了他们，同时按这种国家的本质来说，也必定会解放他们。

> “有人向犹太人指出……如果他们以为，他们是在要求**自由**和要求承认**自由的人性**，那么他们是在给自己制造有关自身的最大的幻想，其实对他们来说，关键是而且只能是专门的**特权**。”

自由！承认自由的人性！专门的特权！这些都是为了在辩护中规避某些问题而使用的动听的字眼！

自由？这里指的是**政治**自由。《德法年鉴》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犹太人要求自由而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宗教，这就是在“**从事政治**”，而不是在提出任何与**政治**自由相抵触的条件。《德法年鉴》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把人**划分**为不信宗教的**公民**和信奉宗教的**私人**，这同政治解放毫不矛盾。《德法年鉴》已经向他指出，当国家摆脱了**国**

教，而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则让宗教自由行事时，国家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不再把宗教当做**公共**事务而当做自己的**私人事务**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最后，《德法年鉴》已经指出，法国**革命**对**宗教**采取的**恐怖**行动远没有驳倒这种看法，相反倒证实了这种看法。

鲍威尔先生没有去研究**现代**国家对宗教的现实关系，就必然要幻想出一个**批判的**国家来，这样的国家其实无非就是那种在自己的幻想中**狂妄地自认为体现着国家的神学批判家**。每当鲍威尔先生陷入**政治**的时候，他总是重新把政治当做自己的信仰即**批判的**信仰的俘虏。只要他研究国家，他总是把它变成对付**"敌人"**即**非批判的**宗教和神学的**论据**。国家以**批判神学**的心愿的实现者身份来效力尽职。

当鲍威尔先生第一次摆脱了**正统的**非批判的**神学**时，在他的心目中，**政治的权威**就代替了**宗教的权威**。他对耶和华的信仰就变成了对普鲁士国家的信仰。在布鲁诺·鲍威尔的著作《普鲁士福音教》中，不仅普鲁士国家，而且——这是合乎逻辑的——普鲁士王室也被设想为**绝对的**。其实，鲍威尔先生对这个国家并没有什么**政治**兴趣，相反，在"批判"看来，这个国家的功绩就在于通过教会**合并**来取消宗教信条，并利用警察来迫害持不同意见的教派。

1840年开始的政治运动使鲍威尔先生摆脱了**他的保守派政治**，并且一度使他上升到**自由派**政治的水平。但是，这种政治本来又不过是神学的**借口**而已。在《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这一著作中，自由的国家就是波恩神学院的批判家，就是反对宗教的论据。在《犹太人问题》中，国家和宗教的对立成了议论的主旨，以致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变成了对犹太人的宗教的批判。在其最近的政治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中，这位狂妄地自认为体现着国家的批判家的最隐

秘的心愿终于吐露出来了。**宗教为国家制度而牺牲**，或者更确切地说，国家制度仅仅是消灭“**批判**”的敌人即非批判的宗教和神学的**工具**。最后，正像1840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使**批判**摆脱了自己的保守派政治一样，从1843年以来在德国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使**批判**摆脱了(虽然只是在表面上)一切政治，从此以后，**批判**终于能够把自己的反对**非批判的**神学的著作说成是社会的作品，并且能够毫无阻碍地从事它自己的**批判的**神学，宣扬精神和群众的对立，同时从事批判的救世主和尘世拯救者的布道事业了。

再回过头来谈我们的正题吧！

承认自由的人性？犹太人不是认为要去力求承认、而是的确一直在力求承认的那种“自由的人性”，就是在所谓普遍**人权**中得到**经典式**承认的那种“自由的人性”。鲍威尔先生本人却不容分说地把犹太人为了使他们的自由的人性得到承认所作的努力当成是他们为获得普遍**人权**所作的努力。

《德法年鉴》已经向鲍威尔先生阐明，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无非是对**利己的市民个体**的承认，也是对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状况的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失去控制的**运动的承认；因此，**人权**并不是使人摆脱宗教，而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不是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不是使人摆脱牟利的龌龊行为，反而是赋予人以**经营的自由**。

《德法年鉴》已经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意义。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

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现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本身。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正如现代国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而今它又通过**人权宣言**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可见，犹太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和赋予犹太人以"**人权**"，这是一种彼此相互制约的行为。当里瑟尔先生提出自由活动、自由居留、自由旅行、自由经营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种种要求时，他是正确地表达了犹太人要求承认自由的人性的含义。在法国人权宣言中，"**自由的人性**"的这些表现作为人权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具有纯粹商业的犹太人的本质，而犹太人一开始就是这个自由的市民社会的必然成员，所以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此外，《德法年鉴》还曾阐明，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首先被称为"人"，为什么人权被称为"天赋的权利"。

除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人权"**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话以外，"**批判**"说不出其他任何关于人权的批判性言论来。批判曾经断言，犹太人和基督徒为了使别人和自己获得普遍的人权，**就必须牺牲信仰的特权**（批判的神学家是用自己的**唯一的**固定观念来解释一切事物的）。为了反驳这种论断，《德法年鉴》最后专门指出了在一切非批判的人权宣言中写明的一项事实，即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的**权利**，进行任何宗教礼拜的权利，都作为**普遍的人权**得到了明确承认。此外，"**批判**"可能也知道，人们在推翻阿贝尔派时找到的借口就是该派侵犯了人权，因为它侵犯了**宗教自由**；同样，在后来恢复礼拜的自由时，人们也是以人权为依据的。

"至于谈到**政治的**本质，**批判**追溯了它的矛盾，追溯到50年来曾经最彻底地

研究过**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的地方，——一追溯到**法国代议制**，在这种代议制之下，理论自由被实践所否定，而实际生活的自由则在理论中徒然寻找自己的表现。

在主要的幻想如今也被消除之后，在**法国议会辩论**中被指出的**矛盾**，即**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效力**之间的矛盾，特权的法定效力和**公共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纯个人的利己主义**力图支配**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之间的矛盾，本来应该被看做这个领域的**普遍矛盾**。"

批判在法国议会辩论中所指出的矛盾，无非是**立宪主义**的矛盾。如果批判把它看做**普遍的**矛盾，它算是看到了立宪主义的普遍矛盾。如果批判走得比它认为"本来应该"走的还远一些，也就是说，如果它进而想要**消除**这个普遍的矛盾，它就会从立宪**君主制**进而正确地得出建立**民主代议制国家**即完备的现代国家的结论。批判根本没有对政治解放的本质进行批判的分析，根本没有探究这种本质和人的本质的确切的关系，所以，它只能触及政治解放的**事实**，触及发达的现代国家，也就是说，只能触及这样的地方，在那里，现代国家的存在是符合它的本质的，所以人们在那里所能看到并加以描述的不仅是相对的**缺陷**，而且还有绝对的**缺陷**，也就是那些构成现代国家本质本身的**缺陷**。

当**批判**以为自己大大高于"**政治本质**"，其实是大大低于这一本质的时候，它就不得不还是在政治本质中去寻求解决**自己的**矛盾的**方法**，并且还一味坚持自己对**现代国家的原则**茫然无知的态度。上面引用的那两段"批判的"话越是明显地证明这一点，它们就越有价值。

批判把"**特权的实际效力**"和"**自由的理论**"对立起来，把"**公共状况**"和"**特权的法定效力**"对立起来。

为了不曲解**批判**的看法，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批判在法国议会辩论中所指出的那个矛盾，即"本来应该被看做"**普遍**矛盾的那个矛盾。

当时谈到了每周规定一天让童工歇班休息的问题。有人提议把这一天定在**礼拜日**。为此，有一个议员在提案中主张不要在法律中采用礼拜日这个提法，因为他认为这个提法是违反宪法的。而马丁(·迪诺尔)大臣则认为，这一提案实际上是宣布基督教已经不复存在的提案。克雷米约先生代表法国的犹太人宣称，犹太人出于对绝大多数法国人所信仰的宗教的尊重，并不反对礼拜日这一提法。可见，根据自由的理论，犹太人和基督徒是平等的，而根据这种实践，同犹太人相比，基督徒却享有特权，因为不然的话，基督教的礼拜日怎么能够在为全体法国人制定的法律中找到其位置呢?难道犹太教的安息日就没有同样的权利吗?或者说，在法国的实际生活中，犹太人实际上也并没有受到基督教特权的压制，然而法律却不敢确认这种实际的平等。鲍威尔先生在《犹太人问题》中所举出的政治本质的一切矛盾，**立宪主义**的一切矛盾，就是这种情况。而立宪主义总的说来就是现代代议制国家和旧的特权国家之间的矛盾。

鲍威尔先生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他认为，由于把这个矛盾当做“普遍的”矛盾来理解和批判，他便从**政治的**本质上升到了**人的**本质。其实他只是从局部的政治解放上升到了完全的政治解放，从立宪制国家上升到了民主代议制国家。

鲍威尔先生认为，随着**特权**的取消，特权的**对象**也会被取消。联系到马丁(·迪诺尔)先生所发表的意见，他指出：

> “如果**不存在享有特权的宗教，也就不会存在任何宗教**。一旦抽掉宗教的排他力量，宗教也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行业活动**并不随着**行业特权**、行会**特权**和同业公会**特权**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只有在取消了这些特权之后，真正的**工业**才

开始发展；**地产**并不随着**享有特权的**土地占有制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只有在取消了地产的特权以后，地产才通过土地的自由分割和自由让渡开始自己的普遍运动；**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它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获得真正的实现；同样，只有在不存在任何享有**特权**的宗教的地方（请看实行共和制的北美各州），宗教才**实际上**普遍地发展起来。

现代的"**公共状况**"的基础、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认为的那样是特权的社会，而是**废除**和**取消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的发达的**市民社会**。在这里，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同别的封闭状态相对立，同公共状况相对立。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正在消除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从而也在消除各种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之间的斗争；而与此同时，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却用挣脱了特权束缚的（这种特权使人们同普遍整体隔绝开来，但同时又把他们结合成为较小的排他性整体）、自身不再由于普遍纽带的**假象**而依赖于他人的人，来取代那些封闭状态，从而引起人反对人、个人反对个人的普遍斗争。同样，整个**市民社会**就是这种由于各自的**个性**而从此相互隔绝的所有个人之间相互反对的战争，就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然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运动。**民主代议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是社会**共同体**和**奴隶制**的**典型**对立的完成。在现代世界，每一个人都既是奴隶制的成员，**同时**又是共同体的成员。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这种奴隶制看上去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个人**独立**，这种个人把自己的异化的生命要素如财产、工业、宗教等的既不再受普遍纽带束缚也不再受人束缚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做**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实际上是个人的十足的屈从性和非人性。在

这里，**法**代替了**特权**。

所以，在这里，在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效力不发生任何矛盾，相反，特权的实际消灭、**自由的**工业和**自由的**贸易等与“自由的理论”相适应的地方，在**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与公共状况相对立的地方，在批判所阐述的矛盾已被**消除**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完备的现代国家**。

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恰好是与法律截然**相反**的情况，鲍威尔先生在谈到法国议会辩论时，对法律发表了与马丁(·迪诺尔)先生一致的意见。

> “正像马丁(·迪诺尔)先生把反对在**法律**中提到**礼拜日**的建议看成是宣布基督教已经不复存在的提案一样，根据同样的理由(**并且这种理由是完全有根据的**)，如果宣告**安息日戒律**对犹太人不再具有约束力，那就等于**宣布取消犹太教**。”

在发达的现代国家，情形正好**相反**。国家宣布，宗教，正像其他的市民生活要素一样，只有当国家宣布它们是**非政治的**因而让它们自行其是的时候，它们才**开始**获得充分的存在。取消这些要素的**政治**存在，比如说，通过废除**选举资格限制**来取消**财产**的政治存在，通过废除**国教**来取消**宗教**的政治存在，正是这种宣告这些要素对国家的隶属关系已经消亡的做法，才能使这些要素保持最强有力的生命，这个生命从此便顺利无阻地服从于自身的规律，并且充分扩展其生存的空间。

无政府状态是摆脱了使社会解体的各种**特权**的市民社会的规律，而**市民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则是现代**公共状况**的基础，正像公共状况本身又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保障一样。它们彼此既十分对立，同样又完全互相制约。

由此可以看出，**批判**在领会“新事物”方面具有多大的才能。如果我们停留在“纯粹批判”的范围以内，那么试问，为什么批判不把它在谈到法国议会辩论时阐述的矛盾看做**普遍**矛盾呢？按照批判的意见，不是“本来”就“应该”把这种矛盾看做普遍矛盾吗？

> “可是，当时要走这一步**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不仅因为……**而且因为**如果没有同自己的对立物在发生内部纠葛后留下的这点**最后残余**，批判**是不可能进行的**，并且也**不可能达到**只有**一步之差的那个地方**。”

不可能的……因为……是不可能的！**批判**肯定地说，为了“可能达到只有**一步**之差的那个地方”所要走的这不幸的“**一步**”是不可能迈出的。谁又能反驳这一点呢？为了达到只有“**一步**”之差的那个地方，绝对不可能再迈出那么“**一步**”，因为这一步必然使我们跨越那个地方，结果在背后又出现了“**一步**”之差。

结局好，一切好！**批判**在它和敌视鲍威尔先生的《犹太人问题》的**群众**的战斗接近尾声时供认，**它**对“**人权**”的理解，**它**对“法国革命时代的宗教的评价”，“**它**有时**在自己的**议论**结尾部分**指出的那种自由的政治本质”，总之，整个“法国革命时代对于**批判**说来，不多不少仅仅是一个象征——因此，那个时代并不是人们在直白的意义上明确指出的由法国人进行革命尝试的时代——也就是说，那个时代不过是**批判**在末尾看到的那些形象的虚幻的表现”。批判可以这样聊以自慰：如果说它在政治上犯有过失，那也只发生在它的著作的“结尾”和“末尾”。我们并不想剥夺**批判**的这种自我安慰。一个鼎鼎大名的酒鬼总是以自己从来没有在午夜以前喝得烂醉而自慰。

在“犹太人问题”这个领域，**批判**无疑从**敌人**手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地盘。受鲍威尔先生庇护的**批判**的著作，在“犹太人问题”第一号

里还是绝对的，而且揭示了“犹太人问题”的“**真正的**”和“**普遍的**”意义。在第二号里，**批判**“不**愿意**和不**许可**”越出**批判**的范围以外。在第三号里，批判本来**应该**再走“**一步**”，但是走这一步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不是由于它“愿意和许可”，而是由于它陷入了自己的“对立物”的窘境之中，它才无法迈出这“**一步**”。它很想跳过最后的一关，然而遗憾的是，它那批判性的神奇快靴却被**群众的最后残余**纠缠得寸步难行。

(c)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

群众的局限性迫使“**精神**”、**批判**、鲍威尔先生不把**法国革命**当做人们在“**直白**的意义上”所说的那个由法国人进行革命尝试的时代，而“**只**”当做它自己的批判幻想的“**象征和虚幻表现**”。**批判**用对**这场革命**进行**新的考察**的办法，来对自己的“**失误**”进行**忏悔**。同时它还把这种“新的考察”的结果告诉“群众”，以此来惩罚这些使它断送清白的诱惑者。

“**法国革命**是一种还完全属于18世纪的实验。”

像法国革命这样的18世纪的实验还完全是18世纪的实验，而决不是19世纪的实验，这种年代学上的真理看来“还完全”属于那类“一开始就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在对“明如白昼”的真理深怀反感的**批判**所用的术语中，这样一种真理叫做“**考察**”，因此也就在“对这场革命的新的考察”中获得了理所当然的地位。

“但是，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超出革命想用暴力来推翻的那个秩

序的范围。”

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由此可见，从字面的**意思**来看，上述批判的说法也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因此也是“**考察**”。

法国革命没有受到这种考察的阻挠，这场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789年在**社会小组**[136]中开始、中期以**勒克莱尔**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同**巴贝夫**的密谋活动一起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了彻底的酝酿，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

“因此〈!〉在这场革命消除了人民生活内部的封建主义界限以后，革命就不得不满足民族的纯粹利己主义要求，甚至煽起这种利己主义；而另一方面，革命又不得不通过对这种利己主义的必要补充，即承认一种最高的存在物，通过在更高的层次上确认那必须把单个的自私的原子联合起来的普遍国家制度，来约束这种利己主义。”

民族的利己主义是普遍国家制度的自发的利己主义，它同封建主义界限所体现的利己主义互相对立。最高的存在物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确认普遍国家制度，因而也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确认民族。尽管如此，最高的存在物却必须**约束**民族的利己主义，即普遍国家制度的利己主义！通过确认利己主义，而且通过在**宗教上**确认利己主义，即通过承认利己主义是超人的、因而是不受人约束的存在物，来约束利己主义，这是真正批判的任务！最高存在物的创造者对自己这种批判的意图是一无所知的。

毕舍先生认为民族狂热是靠宗教狂热来支撑的，他更理解自己的英雄**罗伯斯比尔**。

罗马和希腊曾经由于民族问题而失败。因此，当**批判**说法国革命由于民族问题而失败的时候，**批判**并没有说出有关法国革命的任何独到见解。当它把民族的利己主义定义为**纯粹的**利己主义时，它同样也没有说出有关民族的任何东西。如果把这种纯粹的利己主义同**费希特的"自我"**的纯粹的利己主义加以对照，这种纯粹的利己主义反倒表现为非常阴暗的、掺杂着血和肉的、自发的利己主义。如果说这种利己主义的纯粹性只是相对的，因而与封建主义界限所体现的利己主义截然不同，那就没有必要对"革命"进行"新的考察"，以便发现以民族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比以特殊等级和特殊团体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更普遍或更纯粹。

批判对普遍国家制度的阐述也同样使人深受教益。这些阐述仅限于指出，普遍国家制度必须把单个的自私的原子联合起来。

在直白的意义上明确地说，市民社会的成员决不是**原子**。原子的**典型特性**就在于它没有**任何**特性，因此也没有任何受它自己的**自然必然性**制约的、同身外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原子是**没有需要的**，是**自满自足的**；它身外的世界是绝对的**空虚**，也就是说，这种世界是没有内容的，没有意义的，空洞无物的，正因为原子是**万物皆备**于自身的。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在他那非感性的观念和无生命的抽象中可以把自己夸耀为**原子**，即同任何东西毫无关系的、自满自足的、没有需要的、**绝对充实的**、极乐世界的存在物。而非极乐世界的**感性的现实**却决不理会他这种想象，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他身外的世界和个人的意义，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在提醒他：**身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是真正**使人充实的**东西。他的每一种本质

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命欲望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追逐身外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需求**。但是，因为一个个人的需要，对于另一个拥有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利己主义的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言自明的意义，就是说，同这种需要的满足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所以每一个个人都必须建立这种联系，为此，每一个个人都同样要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牵线者。可见，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不管它们是以怎样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纽带是**市民**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联合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想象的**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就是说，他们不是**超凡入圣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还会妄想，市民生活必须由国家来维系，其实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市民生活来维系的。

> “**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关于要造就完全按照**正义**和**美德**的准则生活的‘**自由人民**’的伟大思想——例如，见圣茹斯特关于丹东罪行的报告及另一篇有关普遍警察制的报告——只是靠恐怖才得以维持一段时间，这种思想是一种**矛盾**，**人民大众**中的卑劣而自私的分子**对这种矛盾**是以怯懦和阴险的方式作出反应的，人们不可能指望这些人采取别的方式。”

这种**绝对批判的**言词把“自由人民”描绘成一种“**矛盾**”，而“**人民大众**”的分子必须**对**这种“**矛盾**”作出反应。这些言词是绝对的空话，其实，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所主张的**自由**、**正义**、**美德**只能是“**人民**”的生命表现，只能是“人民大众”的特性。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明确地谈到**古典古代的**、只属于“**人民大众**”的“自由、正义、美德”。**斯巴达人**、**雅典人**、**罗马人**在他们强盛的时代就是“自由的、正义的、有

美德的人民”。

罗伯斯比尔在关于公共道德的原则的演说（在1794年2月5日召开的国民公会会议上）中问道：“民主的或受民众拥护的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什么？**是美德**。我说的是**公共的**美德，这种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造成了那么伟大的奇迹，并且必将在共和制的法兰西造成更令人惊异的奇迹。我所说的美德无非就是热爱祖国和祖国的法律。”

接着，罗伯斯比尔明确地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称做“自由人民”。他不断地唤起人们对古典古代的“**人民大众**的回忆”，并且既提到“人民大众”的英雄莱喀古士、狄摩西尼、米太亚得、亚里斯泰迪兹、布鲁土斯，也提到“人民大众”的败类卡提利纳、凯撒、克劳狄乌斯、皮索。

圣茹斯特在关于逮捕丹东的报告（批判引用了这一报告）中明确地说：

“在**罗马人**以后，世界变得空虚了，只有想起罗马人，世界才充实起来，才能够再预言**自由**。”

他以古典古代的方式把**丹东**称做**卡提利纳**，从而对丹东提出指控。

在**圣茹斯特**的另一篇关于**普遍警察制**的报告中，**共和主义者**被描写成完全具备**古典古代**精神即具有**坚强不屈**、**俭朴**、**单纯**等品质的人。**警察局**按其本质来说应当是相当于罗马**监察厅**那样的机关。柯德尔、莱喀古士、凯撒、小卡托、卡提利纳、布鲁土斯、安东尼、卡西乌斯等人的名字在报告中赫然在目。最后，**圣茹斯特**用**一句话**表明了他所要求的“**自由**、正义、美德”的特征，他说：

“革命者都应当成为**罗马人**。”

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典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同体**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他们认为必须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普遍竞争、自由地追求自己目的的私人利益、无政府状态、自我异化的自然个性和精神个性的社会，同时又力图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个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力图以**古典古代的**形式来造就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迷误！

当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人权"**大牌子，怀着骄傲的自尊说"正是我创造了这个业绩"时，这种迷误就悲剧性地显现出来了。正是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里所说的人不可能是古典古代共同体的人，正像这种人的**国民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典古代的**一样。

这里不是替**恐怖主义者**的迷误进行历史性辩护的地方。

> "在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政治启蒙**和**政治运动**就迅速向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这个方向发展，因此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之后不久就能够说：'有了我的地方行政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可以利用法国来做我想做的一切了。'"

但是，**世俗的**历史告诉我们，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从前**想超越**自我的、**热情洋溢**的**政治**启蒙，才开始以质朴平淡的方式得到实现。尽管**恐怖主义**想要为古典古代政治生活而牺牲资产阶级社会，革命本身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在**督政府**统治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在汹涌澎湃的生活浪潮中迅速崛起。创办工商企业的狂飙突进运动已经兴起，人人渴求发财致富，新的资产阶级生活使人眼花缭乱，这种生活的最初享受

显得鲁莽、放荡、无礼而且令人陶醉；法兰西的**土地**状况**真正**被查清，土地的封建结构已经被革命的巨锤打得粉碎，现在许许多多新的所有者正怀着初次涌动的激情对土地进行全面耕作；获得了自由的工业也第一次活跃起来——这就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生命特征。**资产阶级社会**由**资产阶级**作为其**正面的**代表。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人权**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了。

在雾月十八日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的，决不像**批判**忠贞不渝地相信的某位冯·罗泰克先生和韦尔克尔所说的那样，是整个革命运动，而是**自由资产阶级**。只要读一读当时的立法者们的演说，就会坚信这一点。读着这些演说，人们会以为自己仿佛离开了国民公会[43]而置身于现在的某个众议院。

拿破仑进行的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同样也是由这场革命宣告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拿破仑当然已经有了对**现代国家**的本质的认识；他已经懂得，现代国家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顺利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作为基础的。他决定承认并保护这一基础。他不是一个狂热的恐怖主义者。但与此同时，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许有**自己意志**的**下属**。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实施了恐怖主义**。他满足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要求，直到它完全餍足为止；但是他也要求，只要他的征服行动的政治目的需要，就立即牺牲资产阶级的生意、享乐、财富等等。当他专横地压制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实践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候，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同他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就不再顾惜这些物质利益了。他对实业家的鄙视是他

对**意识形态家**的鄙视的补充。在内政方面，他也把资产阶级社会当做国家的对头来加以钳制，国家在他的心目中仍然是绝对的目的本身。例如，他曾在枢密院宣称，他不容许大土地占有者随便耕种或不耕种自己的土地。又如，他制定了计划，通过掌管**货物运输**把商业置于国家支配之下。法国的商人策划了首次动摇拿破仑权势的事件。巴黎的证券投机商们人为地制造饥荒，迫使拿破仑把宣布出征俄国的时间推迟了近两个月，结果使这次征战延期到过晚的时节。

如果说自由资产阶级在拿破仑时代再一次遇到了革命的恐怖主义，那么在波旁王朝即复辟时代则再一次遇到了反革命。1830年自由资产阶级终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愿望，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政治启蒙**现在已经**完成**，他们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做自己追求的国家的理想，看做世界的福祉和全人类的目的，而是把它看做自己的**独占**权力的**正式**表现，看做对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认。

法国革命的各种要素中的一个要素在1830年取得了胜利，这个要素由于意识到其**社会**意义而得到了充实，但是，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的生命史到1830年并没有结束。

(d)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

"18世纪，**斯宾诺莎主义**不仅在其以物质为实体的法国后续发展中占统治地位，而且也在赋予物质一个更具精神性的名称的自然神论中占统治地位…… **法国的斯宾诺莎学派**和自然神论的信徒只不过是在**斯宾诺莎体系**的真谛这个问题上互相争辩的两个流派…… 在这一启蒙不得不向从法国运动兴起以来就开始出现的反动势力投降以后，这一启蒙的简单命运就是在**浪漫主义**中灭亡。"

批判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将扼要地把法国唯物主义的世俗的群众的历史同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作一个对比。我们将毕恭毕敬地承认，在实际发生的历史同按照既是旧事物的创造者同样又是新事物的创造者的“**绝对的批判**”的命令发生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最后，我们将遵照**批判**的指示，把批判的历史的“为什么？”，“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这三个问题作为“持久研究的对象”。

“在**直白的意义**上**明确地**说”，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正像**费尔巴哈**在他第一次坚决地站出来反对**黑格尔**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一样。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经历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在**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同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在**直白的意义**上**明确地**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

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汇入了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这两个派别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错的。我们没有必要来详细考察直接起源于**笛卡儿**的法国唯物主义，同样，我们也没有必要来详细考察法国的**牛顿**学派和法国一般自然科学的发展。

因此，我们只指出如下的几点：

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自主创造的力量，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质的生命活动。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

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附和**笛卡儿**的**物理学**而同他的形而上学相对立。他的学生按职业来说都是**反形而上学者**，即**物理学家**。

这一学派由**医师勒鲁瓦**开创，医师**卡巴尼斯**使该学派达到了自己的最高峰，医师**拉美特利**是该学派的中心人物。当笛卡儿还在世的时候，勒鲁瓦把笛卡儿关于**动物**结构的观点用于人的灵魂（18世纪**拉美特利**也这样做过），并宣称灵魂是**肉体的样态**，**思想**是**机械运动**。勒鲁瓦甚至还认为笛卡儿隐瞒了自己的真正的见解。笛卡儿提出了抗议。18世纪末，**卡巴尼斯**在他的著作《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①中完成了笛卡儿的唯物主义。

法国直到今天还存在着**笛卡儿派**[137]**的**唯物主义。它在**机械的自然科学**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在**直白的意义**上**明确地**说，人们决不可能指责这种自然科学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法国以**笛卡儿**为主要代表，它从诞生之

---

①皮·让·若·卡巴尼斯《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1843年巴黎版。这部著作中很大一部分曾于1798—1799年在法国科学院学术通报上发表。——编者注

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这一对抗者**。代表唯物主义同笛卡儿较量的人物，是**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恢复者**伽桑狄**。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始终同**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笛卡儿的形而上学所遇见的另一个对抗者是**英国的**唯物主义者**霍布斯**。伽桑狄和霍布斯正是在他们的对手已经作为官方势力统治着法国的一切学派的时候战胜这个对手的，而这已是他们去世以后很久的事了。

伏尔泰指出，18世纪法国人对耶稣会派和詹森派[138]的争论漠不关心，与其说这是由哲学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由**罗**的财政投机造成的。可见，人们之所以能用18世纪的唯物主义理论来解释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仅仅是因为人们对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用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形态来解释的。这种生活所关注的是直接的现实，是世俗的享乐和世俗的利益，是**尘俗的**世界。同它那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这种**理论的**发展过程。

17世纪的形而上学（请大家想一想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还具有**实证的**、世俗的内容。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其他一些表面看来从属于它的特定科学领域都有所发现。但是在18世纪初这种表面现象就已经被消除了。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独立的活动范围。全部形而上学的财富只剩下思想之类的东西和天国的事物，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实在的东西和尘俗的事物却开始吸引人们的全部注意力。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在17世纪最后两位伟大的法国形而上学者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逝世的那一年，**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诞生了。

使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

是**皮埃尔·培尔**。他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锻造而成的**怀疑论**。他本人起初是从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出发的。正像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把**费尔巴哈**推向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就是因为他认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因为他不得不迫使神学家从伪科学逃回到**粗野的**、可恶的**信仰**，同样，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他为了撰写形而上学的灭亡史而成了形而上学的历史编纂学家。他主要是驳斥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

皮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接受唯物主义和合乎健全理智的哲学作了准备，而且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能够**存在的，无神论者**能够**成为可敬的人，玷辱人的尊严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通过这种**证明**，他宣告了不久将要开始存在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

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来说，**皮埃尔·培尔“是17世纪意义上的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也是18世纪意义上**的**第一个哲学家**”。

那时，人们除了要对神学和17世纪形而上学进行否定性的批驳之外，还需要有一个**肯定性的**、**反形而上学的**体系。人们需要一部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纳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这时，**洛克**关于人类理智起源的著作[①]适时地在海峡那边出现了，这部著作就像人们翘首以待的客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试问：难道**洛克**是**斯宾诺莎**的学生吗？“尘世的”历史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本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

---

①约·洛克《人类理智论》1690年伦敦版。——编者注

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本身来宣讲**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唯名论是**英国**唯物主义者理论的主要成分之一，而且一般说来它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

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感性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提出**种子说**的**阿那克萨哥拉**和提出**原子论**的**德谟克利特**，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确实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把**理性方法**运用于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在**物质**固有的特性中，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是**运动**，——不仅是物质的**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物质的**冲动**、**活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以朴素的形式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但是，那种格言警句式的学说本身却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色彩，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为了能够在**漠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的领域制服这种精神，唯物主义本身就不得不扼杀自己的肉欲，成为**禁欲主义者**。它以**理智之物**的面目出现，同时又发展了理智

的无所顾忌的彻底性。

霍布斯根据培根的观点声称，既然感性给人提供一切知识，那么观点、思想、观念等等，就无非是多少摆脱了感性形式的物体世界的幻影。科学只能为这些幻影命名。**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若干个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想象的永远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一般的存在物，这就是一个矛盾。实际上，**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是一个同样的矛盾。**形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如果"**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具有无限增添补充的能力，这个词就**毫无意义**。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被感知、被认识的，所以人们对神的存在就**一无**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激情都是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是善。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更详尽地论证培根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理。

洛克在他试论人类理智的起源的著作中，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原理。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而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等人则消除了洛克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自然神论[139]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摆脱宗教的简便易行、凑合使用的方法罢了。

我们已经提到过，洛克的著作的出现对于法国人是多么适时。洛克论证了bon sens的哲学，即合乎健全理智的哲学，也就是说，他

间接地指出不可能有与人的健全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不同的哲学。

直接受教于洛克并将他的著作译成**法文**的**孔狄亚克**立即用洛克的感觉论去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他证明，法国人把这种形而上学当做幻想力和神学偏见的拙劣作品加以抛弃，是有理由的。他发表了驳斥**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等人的体系的著作。

他在他的著作《人类知识起源论》①中详细阐述了洛克的思想，他证明，不仅灵魂，而且感觉，不仅创造观念的艺术，而且感性知觉的艺术，都是**经验**和**习惯**的事情。因此，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只是**折中主义**哲学把孔狄亚克从法国各学派中排挤出去了。

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区别就是这两个民族的区别。法国人赋予英国唯物主义以机智，使它有血有肉，能言善辩。他们使英国唯物主义具有从未有过的气质和优雅风度。他们使它**文明化**了。

爱尔维修同样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在他那里唯物主义获得了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立即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②）。感性的特性和自尊、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基础。人的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然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

拉美特利的著作是笛卡儿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拉

---

①埃·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1746年阿姆斯特丹版。——编者注

②爱尔维修《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1775年伦敦版。第1版于1773年在海牙出版。——编者注

美特利详尽地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他的《人是机器》[①]一书是仿照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的模式写成的。在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②]中，物理学部分也是由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构成的，而道德部分实质上则是以爱尔维修的道德论为依据的。还同形而上学保持着最密切联系并为此受到黑格尔赞许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罗比耐**（《自然论》[③]），与**莱布尼茨**的学说有着明显的关系。

在我们既证明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两重起源，即起源于笛卡儿的物理学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又证明了法国唯物主义同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即同笛卡儿、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以后，我们就既没有必要再来谈论沃尔涅、杜毕伊、狄德罗等人的观点，也没有必要再来谈论重农学派[93]的观点了。自从德国人自己处于同**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中以后，他们才有可能看到这种对立。

笛卡儿的唯物主义汇入了**真正的自然科学**，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汇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感觉等等的，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常常体验到自己

---

①茹·拉美特利《人是机器》1751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保·霍尔巴赫《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1770年伦敦版。——编者注

③让·巴·罗比耐《自然论》1763—1766年阿姆斯特丹新版第1—4卷。——编者注

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那就必须使人们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产生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温床，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那他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不应当根据单个个人的力量，而应当根据社会的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的力量。

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这里并不是评论他们的地方。对于说明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洛克的一个较早的英国学生**曼德维尔为恶习所作的辩护**。他证明，在**现代**社会中恶习是**必不可少的**和**有益的**。这决不是替现代社会辩护。

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陋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以**爱尔维修**所赋予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论构建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论证了英国的共产主义。亡命英国的法国人**卡贝**受到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回到法国，成为一个最受欢迎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

鲍威尔先生或**批判**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给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

的历史搜集资料的呢？

(1)**黑格尔**的《哲学史》[①]把法国唯物主义说成斯宾诺莎的实体的**实现**，这无论如何总比把它说成是“法国的斯宾诺莎学派”明智得多。

(2)**鲍威尔**先生从黑格尔的《哲学史》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以为法国唯物主义就是斯宾诺莎**学派**。既然他现在从黑格尔的另一著作里发现，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是承认**同一个**基本原理的**两个派别**，那么他也会发现，斯宾诺莎有**两个**对其体系的意义进行争论的学派。鲍威尔先生可以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找到我们所谈到的这一段说明。现在就把它照抄在下面：

> “在那个绝对本质的问题上，**启蒙**自己同自己发生了争执……并分裂成了**两派**……　一派……把那个无谓语的绝对物称为……**最高的绝对本质**……另一派则把它称为**物质**……　二者是**同一个**概念，区别并不在于事情本身，而仅仅在于两种解释的出发点不同。”(黑格尔《现象学》第420、421、422页)

(3)最后，鲍威尔先生还可以从黑格尔那里知道，如果实体不进一步发展为概念和自我意识，那它就会演变为“浪漫主义”。《哈雷年鉴》当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但是，“**精神**”无论如何必定要给它的“敌人”**唯物主义**宣判一种“**简单的命运**”。

注释。法国唯物主义同笛卡儿和洛克的联系，以及18世纪的哲学同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大多数近代**法国**哲学史中都有详尽的阐述。为了反驳批判的批判，我们在这里只要重复一下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就行了。可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同19世纪英国和法

①指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编者注

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还需要详尽地加以阐述。我们在这里只引证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著作中少量精辟的段落。

(1)**爱尔维修**。“人并不恶，但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因此，应该抱怨的不是人的恶，而是那些总是把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对立起来的立法者的无知。”——“道德家们迄今还没有获得任何成就，因为要拔除滋生恶行的根子，就必须到立法当中去挖掘。在新奥尔良，只要妻子对丈夫感到厌倦了，她就可以把自己的丈夫赶出家门。在这样的地方就没有行为不轨的妻子，因为妻子没有必要欺骗自己的丈夫。”——“如果不把道德同政治和立法结合起来，那么道德就不过是一门轻薄下贱的学问而已。”——“如果道德家们一方面对危害国家的恶行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却对私人的恶行怒不可遏地加以抨击，那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伪善的道德家。”——“人们并不是生而为善或生而为恶，但是他们亦可为善亦可为恶，这要看共同利益是把他们结合起来还是把他们分离开来。”——“如果公民们不实现普遍福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特殊福利，那么除了傻瓜以外就根本不会有染有恶行的人。”(《论精神》①1822年巴黎版第1卷第117、240、241、249、251、339和369页)——爱尔维修所理解的教育不仅是通常所谓的教育，而且是个人的一切生活条件的总和(同上，第390页)，他认为正是这种教育在造就人；如果需要进行改革来消除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那么为了进行这种改革，就必须同时转变人的意识：“只有削弱人民对旧的法律和习俗的盲目崇敬”(同上，第260页)，或者，如他在另一个地方所说，只有消除无知，“才能实现伟大的改革”。

(2)**霍尔巴赫**。“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能爱他自己；人在与自己同类的存在物中，只钟爱他自己。”“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一刻也不能脱离开自己，他不能不关注自己。”“促使我们去爱或去恨某些东西的……始终都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利益。”(《社会体系》②1822年巴黎版第1卷第80、112页)但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爱别人，因为别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　道德向他证明，在一切存在物中，**人最需要的是人**”(第76页)。“真正的道德也像真正的政治一样，是那种试图使人们增进彼此了解，以便使他们能够为相互间的幸福而共同努力工作的道德。凡是把**我们的利益同我们同伴的利益**

①爱尔维修《论精神》1822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

②保·霍尔巴赫《社会体系，或道德和政治的自然原则》1822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

分开的道德，都是虚伪的、无意义的、违背天性的。"（第116页）"爱别人……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同我们同伴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以便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 **美德**不外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第77页）"人若没有激情或愿望就不再成其为人…… 一个完全不关爱自己的人，怎么能够让他去结交别人呢？人若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毫无激情，自满自足，就不成其为合群的存在物…… 美德无非是**传播善事。**"（第118页）"宗教的道德从来没有被用来使世俗的人变得更合群些。"（第36页）

(3)**边沁**。我们只引证边沁驳斥"政治意义上的普遍利益"的一段话。"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公众利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不都是像其他一切人一样，构成了公众的一部分吗？你们所人格化了的这种公众利益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它所体现的只是个人利益的总和…… 如果承认为了增加他人的财产而牺牲一个人的财产是一件好事，那么，为此而牺牲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至于无数人的财产，就更是好事了…… 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229、230页）

(f)绝对批判的思辨循环和自我意识的哲学

因为**批判**在**一个**领域内使自己实现了所谓的**完善**和纯粹，**所以**，当它并没有在世界的**一切**领域都达到"纯粹"和"完善"时，批判就只是犯下了一种**过失**，"只是"暴露了一种"不彻底性"。这"一个"批判性的领域无非就是**神学**领域。这个领域的**纯粹的**疆土从布鲁诺·鲍威尔的《符类福音作者考证》开始，一直延伸到布鲁诺·鲍威尔的最远的边境要塞——《基督教真相》。

我们在《文学总汇报》上看到："现代的批判终于澄清了斯宾诺莎主义。因此，如果批判——即使只是在个别被错误解释的观点上——不加约束地在一个领域内假定有**实体**，那也是不彻底的。"

不久前，**批判**曾经供认自己陷入了**政治**偏见，但这种供认很快就被冲淡了，它声称：这种陷入"**从根本上说是十分轻微的！**"现在，它又在

这里供认自己的做法是**不彻底**的，但却插言说这种不彻底只是表现在**个别被错误解释的观点**上，于是它的供认又被冲淡了。可见，过错不在鲍威尔先生身上，而在像倔强的劣马一直驮着**批判走**的**错误观点**上。

有几段引文将会表明，**批判**在克服了**斯宾诺莎主义**以后转向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从"**实体**"转向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怪物**，即"**主体**"、"**作为过程的实体**"、"**无限的自我意识**"，"完善的"和"纯粹的"批判的最后结果就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符类福音作者考证》：

> "施特劳斯仍然忠实于把**实体**视为绝对物的观点。具有这种普遍性形式（这种普遍性形式尚未达到普遍性的现实的和理性的规定性，因为这种规定性只有在**自我意识**中，在自我意识的**个别性**和**无限性**中才能达到）的传说，无非就是**实体**，这种实体摆脱了自己的逻辑单纯性，并且作为**社团力量**采取了特定的存在形式。"（《符类福音作者考证》第1卷前言第6—7页）

我们姑且让"达到规定性的普遍性"、"个别性和无限性"——黑格尔的**概念**——听其命运去摆布。——鲍威尔先生没有指出，斯宾诺莎的**实体**观念是贯串在**施特劳斯**关于"社团力量"和关于"传说"的理论中的观点的**抽象**表述，是这种观点的逻辑形而上学的**象形文字**，却让"**实体摆脱**自己的**逻辑单纯性**，并且作为社团力量采取了特定的存在形式"。他利用**黑格尔**的神奇机器让"**形而上学的范畴**"（从**现实**中抽出的抽象概念）跳出使它们溶化于思想的"**单纯性**"中的**逻辑学**范围，并采取自然存在或人类存在的"特定形式"，也就是说，让它们显现出来。**欣里克斯**，来帮帮忙吧！

> **批判**继续驳斥施特劳斯说："这种观点之所以神秘，是因为每当它想要解释

和清楚地描述福音故事产生的过程时，它都总是只能提供某种过程的**假象**。'福音故事的来源和发端是传说'这个句子两次讲了同一个东西——'传说'和'福音故事'；的确，这里也讲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向我们说明，福音故事的发展和解说起源于什么样的**实体的内在过程**。"

按照**黑格尔**的意见，应当把**实体**理解为**内在过程**。对于以实体观点为出发点的**发展进程**，黑格尔作了如下的说明：

"如果仔细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展开**的发生不是因为同一个东西具有不同的形态，而是这种展开就是那种本身仅仅……包含差别性的无聊的**假象**的**同一个东西**的无形态的**重复**。"（《现象学》序言第12页）

欣里克斯，来帮帮忙吧！

鲍威尔先生继续说道：

"因此，批判必须反对它自身，并且使**神秘的实体性**……消融到**实体本身的发展**驱使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去，而这种发展驱使我们走向观念的普遍性和规定性及观念的现实存在，走向**无限的自我意识**。"

黑格尔在批判实体性的观点时继续说道：

"实体的封闭性必须打破，并且必须把实体提高到**自我意识**的水平。"（《现象学》第7页）

在鲍威尔那里，**自我意识**也是**提高**到自我意识水平的**实体**，或者说，是作为**实体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这是一幅讽刺人同自然**分离**的**形而上学的神学**漫画。因此，这种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人**，而是**观念**，因为观念的**现实存在**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变成了人**的观念，因而也是**无限的**。**人的**一切特性就这样**秘密地**变成了想象的"**无限的自我意识**"的特性。因此，鲍威尔先

生在谈到这种"无限的自我意识"时**十分明确地**说，**一切事物**都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中找到其**起源**和其**解释**，即找到其**存在**的**根据**。**欣里克斯**，来帮帮忙吧！

鲍威尔先生继续说：

"**实体性关系**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欲望，这种欲望把我们引向概念、观念和自我意识。"

黑格尔说：

"所以，**概念**是实体的**真理**。""**实体性关系**的过渡是由于它本身固有的内在必然性而出现的，而且恰恰说明**概念**是实体的真理。""**观念**是对等的概念。""概念……成长为**自由**的存在……无非就是**自我**或**纯粹的自我意识**。"(《逻辑学》，《黑格尔全集》第2版第5卷第6、9、229、13页)

欣里克斯，来帮帮忙吧！

十分可笑的是，鲍威尔先生在他的《文学报》上还说：

"**施特劳斯**已经衰颓了，因为他没有能**完成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尽管他以他那不彻底的批判证明了完成这一批判的必要性"，等等。

鲍威尔先生本人在他的《符类福音作者考证》中并没有打算对黑格尔的体系作**完善的批判**，而至多不过是打算**完成黑格尔的体系**罢了，至少在把黑格尔体系应用于神学这一方面是这样的。

他把他的批判(《符类福音作者考证》前言第21页)称为"特定体系的最后业绩"，而这个特定体系不是别的体系，正是**黑格尔的**体系。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论争，是一场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之内进行的论争。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

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施特劳斯立足于**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鲍威尔立足于**费希特主义的观点**，两人各自在神学的领域内彻底地贯彻**黑格尔**体系。他们两人都**批判了**黑格尔，因为上述两个要素之中的每一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都由于另一个要素的渗入而**遭到歪曲**；可是他们使每一个要素都进一步获得了**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阐释。——因此，他们两人在自己的批判中都**超出了**黑格尔体系，但同时他们两人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而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只有**费尔巴哈**才立足于**黑格尔的观点**之上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因为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为他同时也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宏、堪称典范的**纲要**。

在鲍威尔先生那里，向福音书作者口授福音书本文的虽然已经不是**神圣精神**，然而却是**无限的自我意识**：

"我们不应该再隐瞒，对福音故事的正确理解也是有其**哲学基础**的，那**就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布鲁诺·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考证》前言第15页）

为了说明**鲍威尔**的这种**自我意识的哲学**以及鲍威尔先生从他对神学的批判中获得的**结果**，必须从他的**最后一部**关于宗教哲学的著作《基督教真相》中摘引几段文字。

该书在谈到**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地方写道：

"如果说唯物主义的**真理**即**自我意识的哲学**已被发现，而**自我意识**又被认为是**一切**，是**斯宾诺莎的实体**之谜的解答和真正的自身**原因**[*causa* sui]……那么又何必要**精神**呢？**又何必要自我意识呢**？仿佛**自我意识**在这种由它自身体现的运动中没有自己的目的，也没有首先掌握它自身似的！实际上，自我意识设定**世界**，设定**差别**，并且在它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它自身**，因为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和它本身之间的差别**，并且只有在创造中和在运动中才是它本身。"(《基督教真相》第113页)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确曾把自我意识的运动看做普遍本质即物质的运动，但是他们**还未**能看出，**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真正**变成了自为的运动，才达到了与本身的统一。"(同上，第114—115页)

欣里克斯，来帮帮忙吧！

第一段话说得很清楚：**唯物主义**的真理就是唯物主义的**对立面**——**绝对的**即唯一的、得意扬扬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即**精神**就是**一切**。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自我意识"即"**精神**"是世界、天空和大地的万能创造者。自我意识必定要使自己**外化**并采取**奴隶形象**，而**世界**就是自我意识的生命表现，但是世界和自我意识之间的差别只是**虚假的差别**。自我意识不把**任何现实事物**同自身区别开来。世界实际上只是形而上学的**区分**，是自我意识的超凡入圣的头脑的幻想和**想象物**。因此，自我意识又重新扬弃了它一度特许的仿佛在它之外有某种事物存在的假象，并且不承认它本身的"创造物"是实在的物体即同它有实际差别的物体。但是，**自我意识**也通过这种运动首次把自己作为绝对的东西制造出来，因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要想成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就必须经常地经历一种**诡辩的过程**，就是说，他必须先把**他身外**的世界变成**虚假之物**，变成**自己**头脑的单纯的突发之念，然后宣布这种**幻象**是真正的幻象，是纯粹的幻想，以便最终可以宣告他自己的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甚至不再为外部世界的假象所限

制的存在。

第二段话说得很清楚：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确曾把物质的运动看做富有精神的运动，但是他们还未能看出，这不是**物质**运动，而是**观念**运动，自我意识的运动，即纯粹思想的运动。他们还未能看出，现实的宇宙运动只有作为独立于**物质**和摆脱了**物质**即独立于**现实**和摆脱了**现实**的、自我意识的**观念**运动，才是真正的和现实的；换句话说，与观念的头脑运动不同的**物质**运动，只是作为**假象**而存在。**欣里克斯**，来帮帮忙吧！

这种思辨的**创世说**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我们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现象学》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理论：

> "正是**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实物性**…… 自我意识在这种外化中把自己设定为**对象**，或者说把对象设定为**自身**。另一方面，这里同时还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自我意识同样又**扬弃**了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并且把这种外化和对象性收回到自身…… 这就是**意识的运动**。"（黑格尔《现象学》第574—575页）
>
> "自我意识具有一个**内容**，它把这个内容同**自身**区别开来…… 这种内容在其**差别**中本身就是**自我**，因为内容是自我扬弃的**运动**…… 这种内容，更确切地说，无非就是**刚才所说的运动本身**，因为内容就是贯穿自身而且是作为**精神自为地**贯穿自身的**精神**。"（同上，第582—583页）

针对黑格尔的这种创世说，**费尔巴哈**指出：

> "物质是精神的自我外化。从而物质本身就获得了精神和理智，但同时物质又被设定为**虚无的**、**不真实的**本质，因为只有从这种外化中产生的本质，也就是使自己摆脱了物质、摆脱了感性的本质，才被称为完善的、具有真正形态和形式的本质。可见，自然的、物质的、感性的事物在这里也是**被否定的事物**，正像在神学中**被原罪所毒害的自然界**一样。"（《未来哲学》第35页）

这样，鲍威尔先生既为反对**非批判的神学**的唯物主义作辩护，同时又指责唯物主义"还没有"成为**批判的神学**、**理智的神学**、

黑格尔的思辨。欣里克斯！欣里克斯！

鲍威尔先生在**一切**领域中都贯彻**自己**同**实体**的对立，贯彻**他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或**精神的**哲学，因此他在一切领域就不得不只同他自己**头脑**中的**幻想**打交道。**批判**是他手中的工具，他用这个工具把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之外**还维持着**有限的**物质存在的一切，都归入单纯的**假象**和**纯粹的思想**。他所反对的实体不是**形而上学的幻觉**，而是**世俗的**内核——**自然**，他既反对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也反对人本身这个自然。他在阐述中还使用了这样的语言：在任何领域都不假定有**实体**；他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不承认任何有别于思维的**存在**、任何有别于**精神自发性**的**自然力**、任何有别于**理智**的**人的本质力量**、任何有别于**能动**的**受动**、任何有别于**自身作用**的**别人的影响**、任何有别于**知识**的**感觉**和**愿望**、任何有别于**头脑**的**心灵**、任何有别于**主体**的**客体**、任何有别于**理论**的**实践**、任何有别于**批判家**的**人**、任何有别于**抽象的普遍性**的**现实的共同性**、任何有别于**我**的**你**。因此，鲍威尔先生进而把**自己**同**无限的自我意识**、同**精神**等同起来，即用这些创造物的创造者来代替这些创造物，这是合乎逻辑的。同样，由于整个**其余世界**固执地坚持认为自己和**他**鲍威尔先生的创造物**有所区别**，因此鲍威尔先生把整个**其余世界**都当做**顽固不化的群众**和**物质**加以摒弃，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于是他就希望：

> "过不了多长时间，
> 各种物体都将彻底灭绝。"①

同样合乎逻辑的是，他把**自己**由于迄今未能遏制"这个**愚蠢的**

---

①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编者注

世界的**作用**”而产生的怨艾情绪凭空说成是这个世界的**自怨自艾**，并把他的批判对人类发展的恼怒凭空说成是人类对**他的**批判、对**精神**、对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的**群众性的**恼怒。

鲍威尔先生最初是一个**神学家**，但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神学家，而是一个**批判的神学家**或**神学的批判家**。早在他还是一个**老黑格尔**正统派的最极端的代表，一个一切**宗教胡说**和**神学胡说**的思辨炮制者的时候，他就不断地宣称**批判**是他的**私有财产**。那时，他就已经把**施特劳斯的**批判看做是**人的**批判，而同这种批判相反，他**十分明确地**要求享有**神的**批判的权利。后来，他从宗教的外壳中剥出了这种神性的隐秘的内核，即伟大的**自我感觉**或**自我意识**，使其独立化，变成独立的存在物，并在“**无限的自我意识**”的幌子下把它提升为批判的原则。接着，他在他**本身的**运动中完成了被“自我意识的哲学”描述为绝对的生命行为的那种运动。他又扬弃了“创造物”即**无限的自我意识**与创造者即**他自己**之间的“差别”，并认识到，**无限的**自我意识在自己的运动中“**只是**”鲍威尔“**他自己**”，所以宇宙的运动只有在它本身的观念的自我运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和现实的**。

神的批判**在返回自身**时，以合理的、自觉的、批判的方式复活了，**自在的存在**变成了**自在自为的存在**，而且只有在**最后**才会变成完成了的、实现了的、**显现**出来的**开端**。和**人的**批判不同，**神的**批判是作为**批判**、作为**纯粹的批判**、作为**批判的批判**显现出来的。对鲍威尔先生的新旧著作的辩护代替了对新旧约全书的辩护。神与人、精神与肉体、无限性与有限性之间的**神学的**对立，变成了**精神**、**批判**或**鲍威尔**先生与**物质**、**群众**或世俗世界之间的**批判的神学的**对立。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神学的对立变成了**健全的理智**与纯粹批判的思维之间的批判的神学的对立。《思辨神学杂志》变成了批判的《文学报》。最后，**宗教**

的救世主终于显化为**批判的救世主鲍威尔**先生了。

鲍威尔先生的最后阶段并不是他发展中的反常现象，这个阶段是他的发展从**外化向**自身的**返回**。不言而喻，**神的**批判使自己**外化**并超出自身范围的那一瞬间，是与它部分地背弃自己而创造某种**人的东西**的那一瞬间相吻合的。

绝对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以后，就结束了**思辨的循环**，从而也结束了自己的**生涯**。它的往后的运动是纯粹的——超越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体内的**循环，因此，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兴趣了。

第 七 章
批判的批判的通信

(2)“非批判的群众”和“批判的批判”

(a)“顽固不化的群众”和“不满意的群众”

“群众”的冷酷无情、顽固不化和盲目的无信仰体现在一位相当坚定的代表人物身上。这位代表人物谈到了“柏林学社[140]的纯黑格尔哲学的素养”。

他说：“只有认识现实，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进步。但是，我们从您那里只是得知，我们的认识不是对现实的认识，而是对某种非现实的东西的认识。”

他把“自然科学”称为哲学的基础。

“一个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同哲学家的关系，就好比是哲学家同神学家的关系一样。”

接着，他谈到“柏林学社”：

“我试图说明，这些人的处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虽然经历了精神上的

脱毛过程，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这种脱毛的产物，所以就不能接受那些使人获得新生和重现青春的因素。我认为，我这样说并没有言过其实。""这些〈自然科学的和工业的〉知识我们还必须掌握。""我们首先需要的关于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不是单凭思想的敏锐所能获得的；要获得这种知识，所有感官都必须协同动作，而且人的一切素质都必须作为必需的和不可缺少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否则，直观和认识必然总是有欠缺之处……甚至会导致**道德的沦丧**。"

但是，这位通信者把他送给批判的批判的药丸加上金色包装。他"让**鲍威尔的言辞**得到正确的运用"，他"注视着**鲍威尔的思想**"，他让"**鲍威尔说得**很正确"，最后，他表面上并不同**批判**本身论战，而是同有别于批判的"柏林学社"论战。

批判的批判感到自己被击中了要害，加上它在一切**有关信仰的事情**上都像一个老处女那样神经过敏，所以它不会被这种赞许之词和言不由衷的恭维迷住眼睛。

它回答说："您想把您来信一开头所描绘的那一派人看做**您的敌人**，那就**错了**。您不如干脆**承认**〈接着就是一道非常令人震惊的革出教门令〉，**您就是批判本身的敌人**！"

不幸的人呵！群众的人呵！**批判本身**的敌人呵！至于说到上述**群众的**论战的内容，批判的批判宣称自己是**尊重**它对**自然科学**和**工业**所抱的批判态度的。

"**十分尊重自然科学**！**十分尊重**詹姆斯·瓦特，然而〈真正崇高的言辞！〉丝毫不尊重瓦特给自己的亲人带来的百万财富！"

十分尊重批判的批判对别人的尊重！批判的批判在这封回信中指责上述的**柏林学社**不在扎实而有分量的著作上下工夫，没有去研究那些著作，指责他们只是指出某一著作是划时代的等等便**算了事**。

但是就在这封信中，**它自己**也只是简单地宣称尊重整个自然科学和**工业就算了事**。而批判的批判在宣称尊重**自然科学**时所加的保留条件，使人不禁想起已故的骑士**克鲁格**反对自然哲学时所发出的第一批雷矢①。

> "自然界并不**因为我们吃的和喝的都是自然界的一个个产品**就成了唯一的现实。"

关于自然界的**一个个产品**，批判的批判所知道的只不过是"我们**吃**它们**和喝**它们"而已。十分尊重批判的批判的自然科学！

针对那种令人厌烦的强加于人的要求，即关于研究"自然"和"工业"的要求，批判合乎逻辑地发出下面这种妙不可言的修辞学上的感叹：

> "难道〈!〉您以为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已经完结了**吗？难道〈!〉您知道有哪一个历史时期已经被**真正**认识了？"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它就能达到，哪怕只是**初步**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确实，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

①即闪电，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神箭。——编者注

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

“顽固不化的”和“冷酷无情的”群众的代表因提出过中肯的指责和忠告，而被批判斥为**群众的唯物主义者**。批判对待另一位不太恶毒、群众特征不太明显的通信者，也不见得好些。这位通信者虽然对批判的批判寄予期望，但是他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这位“**不满意的**”群众的代表写道：

> “不过，我必须承认，贵报第一期**完全不能**令人**感到满意**。我们所期望的确实是另外的东西。”

批判的族长亲自出面回答道：

> “说什么本报没有满足期望，这我早已预料到了，因为这些期望对我说来是很容易想象到的。人们实在是太怠惰了，竟想要**一下子**就得到**一切**。得到一切？不可能！也许同时得到的既是一切又是虚无。那种不费力气就可得到的一切，那种不经过任何阐释就能理解的一切——那样的一切，只是有名无实的东西。”

“群众”要求按原则和本性“**不能提供任何东西**”的批判提供**一些东西**，甚至**一切东西**，于是批判的族长在对“群众”的不正当的要求表示愤恨的同时，以长者的口吻讲述了如下的一则**趣闻**：不久以前，柏林的一位**熟人**以尖刻的语气抱怨这位族长的著作冗长拖沓，废话连篇（大家知道，布鲁诺先生根据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所谓思想写成了这本大部头的著作）。鲍威尔先生安慰他，答应为了使他便于理解而赠给他一种印书用的小圆球状的油墨。这位族长用油墨的不匀来解释自己的“著作”的冗长，正像他用“世俗的群众”（他们为了充实自己而想要一口吞下一切和虚无）的空虚来解释他的《文学报》的虚无一样。

人们并不否认上述报道的重要性，同样人们也不可能认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就在于：批判的批判的一位属于群众的熟人说批判很空虚，而批判则反过来说这位熟人是非批判的；另一位熟人认为《文学报》没有满足他的期望；最后，**第三位**熟人和挚友认为批判的著作冗长絮叨。不过，怀抱期望的第二号熟人和至少想要摸清批判的批判的秘密的第三号挚友，却构成向批判与“非批判的群众”之间的**更富有内容**和更为紧张的关系的过渡。我们会看到，**批判**一面以残酷无情的态度对待具有“顽固不化的心”和“普通人的理智”的群众，一面以屈尊俯就的宽容态度对待那些苦苦哀求从对立中获得**解救**的群众。那些群众带着破碎的心，以忏悔的心情和谦恭的态度去接近批判，批判将对他们说出一些**深思熟虑的**、**预言式的**、**有分量的**话语，作为对他们的诚实表现的褒奖。

(b)“软心肠的”和“需要解救的”群众

伤感的、**诚恳的**、**需要解救的群众**的代表倾吐心曲，鞠躬行礼，目光惊慌不定，低三下四地恳求批判的批判说几句友善的话。这位群众代表说：

“为什么我要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您呢？为什么我要在您的面前为自己辩白呢？因为我**尊敬**您，所以我**希望博得**您的**垂青**；因为我万分地**感激**您对我的培养，所以我**爱戴**您。您责备了我，所以**我的良心**驱使我在您面前**为自己辩白**……我**决不**是要**强求**于您，但是根据我**个人的切身体会**想来，您**本人也会乐于**看到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证明他对您的**好感**。我**决不妄求**您来答复我这封信。我**既不**想占去您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的宝贵时间，**又不想**给您增加麻烦，**更不想**使自己因为看到希望**不能实现**而苦恼。**您可以**把我这封信说成是**伤感**、**纠缠**或**虚荣**〈!〉，或者随便您说成其他什么都行；您可以答复或不答复，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而我却**情不自禁地**要发出这封信，但愿您能理解我写信的**友好情意**〈!!〉。”

正像上帝向来就怜悯**怯懦的人**一样，这个群众的、然而却是恭顺的、哀求批判怜悯的通信者终于**如愿以偿了**。批判的批判善意地答复了他。不仅如此！批判的批判还对他极想知道的问题作了**极其深刻的解答**。

批判的批判教诲说：“两年前对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进行回顾是适时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在当时已经打响的战役中让这些**轻装部队**在一个地方采取行动。但是目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如今实际情况变得很快。当时是**适宜的东西**，现在却成了**失误**。”

当至尊至上的绝对的批判把这些**轻装部队**称为“**我们的圣徒**”、我们的“**先知**”、“**教长**”等等（见《轶文集》第2卷第89页①）时，这在当时自然也只不过是一种“**失误**”，然而却是“**适宜的**”失误。谁能够把**轻装部队**称为“**教长**”的**部队**呢？批判热情地谈论这些**轻装**部队“毕生为真理而思考、工作和钻研”时所表现的克己精神、道义力量和热忱，这是一个“适宜的”失误。批判在《基督教真相》一书序言中声称，这些“**轻装**”部队已经“显现出不可战胜的姿态，而且**每一个内行人**事先都向他们提出证据，说他们一定会**使整个世界彻底倾覆**”，事实已经“确凿无疑地表明，他们也的确能成功地**使世界面貌一新**”。这种说法也是一个“失误”。这些**轻装部队**果真能获得这样的成功吗？

批判的批判继续教诲“**诚恳的群众**”的求知心切的代表说：

“尽管法国人以前由于试图创立社会理论而建立了**新的**历史功绩，可现在

---

①指布·鲍威尔《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一文，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编者注

他们**已经日薄西山了**；他们的新理论还不**纯粹**，他们的社会幻想、他们的**和平的民主**还远没有摆脱旧秩序的前提。”

批判在这里谈论的是——如果说它是以不同的方式谈论某种东西的话——**傅立叶主义**[127]，特别是《和平民主日报》的傅立叶主义。但是，这种傅立叶主义根本不是法国人的“社会理论”。法国人有**好几套社会理论**，而不是仅有**一套**社会理论。《和平民主日报》所鼓吹的那种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无非是主张博爱主义的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所坚持的社会学说。人民拥护**共产主义**，不过分裂为许多不同的派别。真正的运动和对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倾向的改造不仅没有**日薄西山**，而且只是在现在才真正**开始**。这一运动将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希望的那样以纯粹的、即抽象的**理论**为归宿，而将以**实实在在的实践**为归宿，这种实实在在的实践决不会为批判的那种绝对的范畴耗时费力。

批判继续絮叨说：“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具有**某种优点**。假如有一个民族能成功地……获得对其他各民族的精神优势，那么这个民族必定是能够批判自己和其他各民族并能认识普遍衰败的原因的民族。”

直到**现在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种优点**。但是，如果批判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将不**会**具有某种长处，因为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现在都在“**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衰败的原因”。最后，说“批判”、“认识”即**精神**活动能提供**精神优势**，其实只是一种词句上的**同义反复**；批判凭借无限的自我意识，使自己凌驾于各民族之上，期待着各民族跪在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它正是通过这种漫画化的、基督教日耳曼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

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

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批判并不是什么在人类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化的东西，这种批判是那些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的个人所进行的**现实的人的活动**，这些个人作为人也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动。因此，他们的批判同时也是实践的，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实践的、明确的实际措施，在这里面他们不仅思考，并且更多的是行动。因此，他们的批判是对现存社会的生动的现实的批判，是对"衰败"原因的认识。

批判的批判向求知心切的群众成员作了一番说明之后，自然有理由这样来谈它的《文学报》：

"这里进行了**纯粹的**、明白易**懂**的、通达事理的、不附加任何东西的批判。"

这里"不提供**任何独立的东西**"，这里提供的只是那种**不提供任何东西的批判**，即一种最终成为极端的非批判的批判，除此之外根本**不提供任何东西**。**批判**把加了着重号的词句排印出来，并且在**自己的摘录**中达到了其辉煌灿烂的顶点。**沃尔弗冈·门采尔**和**布鲁诺·鲍威尔**互相伸出了友谊之手，可见批判的批判还停留在**同一哲学**在本世纪最初几年所处的**地方**，那时群众要求谢林提供一点东西，随便什么东西都行，只要不是**纯粹的**、**纯哲学的**哲学。**谢林**针对这种要求提出了抗议。

第 八 章
批判的批判走进尘寰并改变形象，或盖罗尔施泰因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4)被揭露了的有关“观点”的秘密

“鲁道夫没有停留在他那高超的〈！〉观点上…… 他不辞辛劳，用自由选择的方式持有上下左右**各种观点**。”（**塞利加语**）①

批判的批判的主要秘密之一，就是“**观点**”和**用观点来评判观点**。在它的眼中，每一个人跟每一种精神产品一样，都变成了观点。

如果你看清了批判的批判的总秘密就是重弹思辨的老调，那么要发现观点的秘密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首先，让**批判**自己通过族长**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口来谈谈它关于“观点”的理论。

“科学……**永远与这单个的个人或这种特定的观点毫**无关系…… 当然，

① 塞利加《评欧仁·苏〈巴黎的秘密〉》，载于1844年6月《文学总汇报》第7期。——编者注

科学也不会错过机会去**消除某种观点的界限**，如果值得在这上面花费力气而这种界限又确实具有普遍的人的意义；但是，科学把这种界限看做**纯粹的范畴和自我意识的规定性**，因此它只为那些有勇气上升为**自我意识的普遍性**的人，即那些决不想停留在这些界限以内的人辩护。"（《轶文集》第2卷第127页）①

鲍威尔的这种勇气的**秘密**就在于**黑格尔的《现象学》**。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的现实在这里只表现为**自我意识的**一种**特定**形式，只表现为**自我意识的**一种**规定性**。但自我意识的单纯规定性是"**纯粹的范畴**"，是单纯的"思想"，因此，我能够在"纯粹"思维中扬弃并且通过纯粹思维克服这种"思想"。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的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种破坏性工作一旦把**对象世界**、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想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单纯**规定性**，一旦有可能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消融于"**纯粹思维的以太**"之中，它就自以为征服了这个世界了。因此，《现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的现实，——它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因为自我意识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它之所以用**绝对**知识来代替，是因为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对象世界的约束。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因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对象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即便如此，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些界限当然还是继续

①布·鲍威尔《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编者注

存在。此外，一切显示**普遍自我意识的有限性**的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一切感性、现实性、个性，在黑格尔看来都必然是界限。整部《现象学》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

近来，鲍威尔先生把绝对知识改名为**批判**，而给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换上了一个听起来更具有世俗意味的名字——**观点**。在《轶文集》中两个名字仍然并用，而观点也仍然是用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来解释的。

因为"**宗教世界作为宗教世界**"只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世界而存在，所以批判的批判家——职业的神学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到，竟然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意识**和**存在**是不同的，而当我只是扬弃了这个世界的思想存在，即这个世界作为范畴、作为观点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而并没有用真正对象性的方式改变对象性现实，即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对象性**现实和其他人的对象性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仍然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因此，**存在**和**思维**的思辨的**神秘的同一**，在批判那里作为**实践**和**理论**的同样神秘的同一重复着。因此，批判怒气冲冲地反对那种还想同理论有所区别的实践，同时也反对那种还想同把某一特定**范畴**变成"**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的做法有所区别的理论。批判本身的理论仅限于把一切确定的东西(如国家、私有财产等)宣布为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的对立物，因而也就把它们宣布为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恰好相反，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国家、私有财产等怎样把人变为抽象概念，或者它们怎样成为**抽象的**人的产物，而不是成为单个的、具体的人的现实。

最后，不言而喻，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的关系的要素，那么鲍威

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这幅漫画只是满足于从某种精神产物中或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撷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思想规定性，变为**范畴**，并用这个范畴充当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以便能够以老成练达的姿态、扬扬得意的神气从抽象概念、普遍范畴、普遍自我意识的观点，傲然睨视这种规定性。

在鲁道夫看来，所有的人不是持善的观点，就是持恶的观点，并且对所有的人都要按照这两个不变的观念来进行评价；同样，在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看来，所有的人不是持**批判**的观点，就是持**群众**的观点。但是鲁道夫和鲍威尔及其伙伴都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9—11月

1845年2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卷翻译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41]

（节　　选）





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von
Friedrich Engels.

Leipzig.
Druck und Verlag von Otto Wigand.
1845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版的扉页



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142]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24岁。现在我的年纪相当于那时的三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标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1892年由斯旺·桑南夏恩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①是根据美国版序言[143]写的，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的。现代大工业已经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

①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编者注

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所玩弄的那些猥琐的骗人伎俩,可以使他们在本乡本土获得很多好处,并且可以在那里普遍使用,可是只要他们一来到汉堡或柏林,那些狡猾手段就失灵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腕和花招,虽然这些手腕和花招在他本国被看做生意场上的智慧顶峰。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据说德国的许多情况也改变了,特别是当德国人在费城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会战[144]以后,连那条德国市侩的老规矩也声誉扫地了,那条规矩就是:先给人家送上好的样品,再把蹩脚货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的确,玩弄这些狡猾手腕和花招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53]的废除以及由此而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空间。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兰开夏郡的机械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来说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而且是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原产品和输入

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末开始使用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产品,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现在看来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工厂主靠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互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充其量对那些急需挣钱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如果他们不想在竞争中毁灭,就必须抓住每一文钱。于是,工厂区的实物工资制[145]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46],并且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这些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直接矛盾,但却使大资本家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的竞争更具优势。

此外,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经营方面的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工厂主,就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也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于是,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规模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根本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弊端。这样一来，下面这个重大的基本事实就越来越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个小时，才算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目前已经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境况最差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124]已经消失，

"七日规"[147]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在1844年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那些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地陷入同样衰败、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当然,猪和垃圾堆现在是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①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如雪片,但只能用来掩盖工人的穷困状况,而不能消除这种状况。

但是,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进入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那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很不相同,但毕竟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属于同一性质。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并从法律上确定工作日、特别是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148],"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是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奈尔斯维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149]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描写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文字一样②。同样

①见《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1885年》。——编者注

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542—548页。——编者注

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行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矿山管理处的房屋，来压制矿工们的反抗。

不论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不打算详细地一一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的想法基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要是那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详细描述了1865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如果我那样做，就得重复马克思已经讲过的内容。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社会主义才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体现了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

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期的激情使我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的预言已经实现了，还有当时我就预见到的（诚然我把时间估计得过早了）大陆的、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也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①照抄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6月的《新时代》第6期上。

“40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大规模的、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性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停滞时期后，就是短短的

①恩格斯《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编者注

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发疯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崩溃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然而，正如约翰·布莱特所说，那些城市饥民'不是作为乞讨面包的穷人，而是如同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与政权——实行人民宪章[54]；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瓦解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注重眼前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正当宪章运动[150]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它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151]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152]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大土地占有制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密切相关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于是这个阶级就努力地行动起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也就是服从工业资本家眼中最为重要的目的：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对于英国来说，其他一切国家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

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比大陆上沾染庸人习气较深的竞争者出色的地方。宪章运动已经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理所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形成，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153]所激烈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他们反对的是把自由贸易变成事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日益清楚地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让所有工厂主望而生畏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中去。从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遇到适当时机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选举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154]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议会正在讨论的关于选区的法案，划分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

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155]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变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同1850—1870年这20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所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规定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起码是较为合理的正常工作日，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

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庞大的工联。这是那些全部使用或主要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钳工、粗细木工、建筑工人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建筑工人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15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对他们非常满意，而且他们对雇主也非常满意。他们构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内·莱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对于每个精明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非常可爱、非常听话的人。

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20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危机之后，1873年前后有过一次短暂而微弱的工商业高涨，但这次高涨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沉寂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商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各行各业的所有市场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将近10年来所遇到的情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唯一的伟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谎言。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并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10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连刚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塔福德郡的陶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归英国工厂所占有的世界供应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后果会怎样呢？让自

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绍斯波特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部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营业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各大工业部门的发展进入了停顿时期。**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转入不再发展的状态。**’①

但是整个事态的结局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稳定不变的，它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持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持续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遭殃的究竟是哪一个呢？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么，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令人感到压抑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死气沉沉的萧条状态变成英国工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

①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三届年会报告。1883年9月于绍斯波特》1884年伦敦版第608—609页。——编者注

真相是这样的：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捞取了绝大部分利益，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同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

以上是我在1885年所写的文章。在1892年1月11日写的英国版序言中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作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中的社会主义和诗歌中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证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对这种舆论始终表示蔑视。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方案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进步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重新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一潭死水了。伦敦东头甩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没有技术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的

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多方面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立者和支持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涌向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是他们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田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过一系列重大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犯过同样的错误，而那些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空论社会主义者直到今天还在犯同样的错误。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成员正在摆脱种种传统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的、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们

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至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闻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①]参加竞选，并且公开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加；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同他们竞争，这两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料的压倒多数当选了。在米德尔斯伯勒，一个工人候选人[②]出来同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外，却都遭到了无可挽救的失败。在迄今为止的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一心要把自己的工人本色淹没于自由主义海洋，以求得别人宽恕的人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代表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很不光彩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德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在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他们能获得什么样的成果。对“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统治了英国工人几乎40年的迷信——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只要他们提出要求，并且明白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去关心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

①詹·基·哈第和约·白恩士。——编者注

②约·哈·威尔逊。——编者注

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鼓舞英国人的奋斗精神。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现，新议会奈何不得格莱斯顿先生，格莱斯顿先生也奈何不得新议会；到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将会完善地组织起来，足以很快地结束那两个轮流执政并以这种方式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的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弗·恩格斯

1892年7月2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2年7月21日

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156]

工人们！

我谨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向我的德国同胞真实地描述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前景。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对你们的境况进行了一些了解。我非常认真地对待所获得的认识，研究过我所能找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我不以此为满足，我想要的不限于和我的课题有关的纯粹**抽象的**知识，我很想在你们家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的：我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波尔图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这样做，我感到既高兴又骄傲。感到高兴，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在了解你们的实际生活时度过了许多愉快时光，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上流社会的闲谈和令人厌烦的礼节中浪费掉；感到骄傲，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对这个受压迫遭诽谤的阶级给以公正的评价，他们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境极为不利，仍博得每个人的尊敬，只有英国的锱铢必较的商人除外；我感到骄傲，还因为这样一来我就能够维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来自大陆的这种鄙视，正是你们国家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

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

由于同时有很多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我很快就得出结论：你们不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们总是企图证明相反的说法，并且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真心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的行为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足以证明下面的事实：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他们能够把你们劳动的产品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旦他们无法靠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赚钱了，就任凭你们饿死也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来证实他们自称的对你们的好意？对你们的疾苦他们可曾表示过一点点真诚的关心？除了支付五六个调查委员会的费用，他们还为你们做了些什么呢？这些委员会的长篇大论的报告注定要永远沉睡在内务部档案架上的废纸堆里。他们可曾尝试过从那些散发出霉味的蓝皮书[157]中哪怕只编写一本可读的书，使每个人都不难从中获得一些有关绝大多数"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状况的资料？他们当然没有这样做；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谈论的事情。他们宁可让一个外国人去向文明世界报道你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屈辱状况。

我希望，我对**他们**来说是外国人，而对**你们**则不是。我的英语也许不纯正，但是，我希望你们将发现它是**平实易懂的**。在英国，顺便说一下，在法国也一样，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把我看做外国人。我极其满意地看到你们已经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这些极端有害的东西，它们归根结底不过是**大规模的利己主义**而已。我看到你们同情每一个真诚地致力于人类进步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国人；我看到你们仰慕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不论它是不是在你们祖国的土地上培

育的。我确信，你们不仅仅是**英国人**，不仅仅是单个的、孤立的民族的成员；我确信，你们是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伟大的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对你们作为这样的人，作为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家庭**的成员，作为真正符合人这个词的含义的**人**，我以及大陆上其他许多人祝贺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并希望你们很快获得成功。

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你们还将经受许多历练；要坚定，要勇敢，你们必定会获得成功，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为我们共同的事业，人类的事业所共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门（莱茵普鲁士）

序　言

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最初我是打算仅仅作为一部内容比较广泛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中的一章来论述的。但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快就使我不得不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傅立叶主义[127]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是它的间接产物。因此，为了一方面给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这种理论的一切空想和幻想，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不列颠帝国，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状况才具有**典型的形式**，才表现得最完备；而且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

我曾经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就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不仅我的观点，而且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时候；对此我是

有准备的。我也清楚地知道，在这本书里，人们可能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差错。研究一个庞大的题目，需要具备广泛的前提条件，出现一些差错就是对英国人来说也是难以避免的，更何况即使在英国也还没有一本像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著作。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提出挑战：请他们拿出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向我指出哪怕是一个对我的整个观点多少有些意义的事实是不确切的。

描述不列颠帝国无产阶级状况的典型形式，特别是在目前，对德国来说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更多地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我们德国的理论家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对这个"丑恶的现实"进行改革。在公开主张这种改革的代表人物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生活状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甚至连善意的"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158]（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在这些协会里对社会问题大肆歪曲）也经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无聊的见解作为出发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了解实情。虽然德国无产阶级的状况还没有发展到像英国那样典型的程度，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迟早会发展到在北海彼岸已经达到的那种极端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长此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而在当前，揭示**英国的**贫困，也将推动我们去揭示我们**德国的**贫困，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德国的贫困的范围以及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

动[159]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险的程度，这种危险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最后，我还要作两点声明。第一，我总是用*Mittelklasse*[**中等阶级**]这个词来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说的middle-classes），它同法文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尤其是和所谓的贵族不同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作为“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①同样，我也总是把工人（working men）和无产者，把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语来使用。第二，我在引用别人的话时，在大多数场合都指出引文作者所属的党派，因为自由党人几乎总是竭力强调农业区的贫困，否认工厂区的贫困，而保守党人恰恰相反，他们承认工厂区的贫困，但不想承认农业区的贫困。因此，当我描述工业工人的状况而缺少官方文件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利用**自由党人**的证据，以便用自由资产阶级亲口说出来的话来打击自由资产阶级；只有当我通过亲身观察了解了真实情况或者引文作者本身或文章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真实无误的时候，我才引用托利党人[56]或宪章派[153]的材料。

弗·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门

①根据恩格斯的这一说明，本文中的Mittelklasse一词在多数场合译为“资产阶级”。——编者注

导　言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英国是发生这种变革（这种变革越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越是强有力）的典型地方，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最主要的结果即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把无产阶级放在它的一切关系中并从各个方面来加以研究。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这个革命的历史，不谈它对现在和未来的巨大意义。这个题目留待将来的一部内容更广泛的著作去论述。现在我们只谈几点，这几点是为弄清以后要讲到的事实和了解英国无产者的现状所必需的。

在采用机器以前，纺纱和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丈夫把纱织成布，如果当家人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这些织工家庭大部分住在城市近郊的农村，靠自己挣的钱能生活得不错，因为就布匹的需求来说，本地市场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市场。后来由于国外市场的占领和贸易的扩大出现了竞争，但竞争的威力对工资产生的影响还不显著。同时本地市场的需求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和人口的缓慢增长是同步的，因而保证了所有工人都有工作；此外，工人之间还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竞争，因为他们散

居在农村。这样，织工多半能够积蓄一点钱，租一小块地，在空闲的时候耕种。至于空闲的时间，他们愿意有多少就有多少，因为什么时候织布和织多长时间是随他们便的。当然，他们是蹩脚的农民，他们的耕作是马马虎虎的，没有很多实际收益；但是，他们至少不是无产者，他们，正如英国人所说的，已经在故乡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他们是定居的，其社会地位比现在的英国工人要高一等。

工人们就这样颇为愉快地度过时光，他们极其虔诚、受人尊敬，过着正直而又平静的生活，他们的物质状况比他们的后代好得多；他们无须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有余暇到自己的园子或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对他们就是一种休息；此外，他们还能够参加邻居的娱乐和游戏；而九柱戏、打球等等所有这些游戏对保持健康和增强体质都是有好处的。他们大都是些强壮、结实的人，在体格上和他们邻近的农民很少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区别。他们的孩子生长在农村的新鲜空气中，孩子们也帮助父母做些事情，但并不是经常性的，当然更谈不到一天工作8小时或12小时。

这个阶级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怎样，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和城市隔离，从来没有进过城，因为他们把纱和布交给流动的代理商，从他们那里取得工资；他们和城市完全隔离，连住在城市近郊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直到最后机器剥夺了他们的生计，迫使他们到城里去寻找工作。他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和农民处于同一水平，由于有一小块租地，他们大部分人本来就和农民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把**乡绅**——当地最有影响的地主——看做自己的天然尊长，向他讨主意，有了小小的争吵，请他来公断，对他表示在这种宗法关系下所应表示的一切尊敬。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当家人，过着合

乎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使人过不道德生活的诱因——附近没有酒馆和妓院,而他们有时去解解渴的小饭馆的老板也是值得尊敬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大佃农,店内有好的啤酒和良好的秩序,每天晚上很早就把买卖收了。他们的孩子整天和父母一起待在家里,受的教育是服从父母,敬畏上帝。宗法的家庭关系一直保持到孩子们结婚。年轻人直到结婚前都是在幽静纯朴的环境中、在和游伴互相信赖的气氛中长大的,虽然婚前发生性关系几乎是普遍现象,可是这仅仅是在双方都已经把结婚看做道义上的责任时发生的,只要一举行婚礼,就一切都正常了。总之,当时英国工业工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与现在德国某些地方的工人是一样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读,能写的人就更少了;他们按时去教堂,不问政治,不搞密谋,不动脑筋,热衷于体育活动,带着祖传的虔诚心情听人讲圣经,他们为人谦逊恭顺,和社会上比较显贵的阶级相处得很和睦。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外面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运动一无所知。他们在自己的平静、刻板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脱离这种生活方式的。诚然,这种生活很惬意,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确实也不算是人,而只是一部替一直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做工的机器。工业革命只是使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剥夺了他们独立活动的最后一点残余。但是,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也就促使他们去思考,促使他们去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旋涡。

使英国工人以前的这种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北兰开夏郡布莱克本附近斯坦德希尔的织工**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制造的**珍妮纺纱机**(1764年)。它是后来的走锭精纺机的雏形，是用手摇的，但不像普通的手摇纺车只有一个锭子，它有16—18个锭子，只需要一个工人摇动，因而能够提供比过去多得多的纱。从前，一个织工经常需要三个纺纱女工供给纱，纱还总是不够用，织工常常要等纱，现在，纱却比现有织工织布所能用的多了。新发明的机器使纱的生产费用减少了，布匹的价格也跟着降低，于是，本来就已增长的对布匹的需求更加增长了。这就需要更多的织工，织工的工资提高了。现在，因为织工靠自己的织机能挣更多的钱，他们就逐渐抛弃了自己的农业而专门织布了。这时，四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用来缠纱)的家庭，一天工作10小时，每星期可挣4英镑(合28个普鲁士塔勒[①])，如果买卖景气，工作饱满，常常挣得更多；单个织工靠自己的织机一星期挣两英镑的事，也是常有的。这样，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逐渐完全消失而成为新兴的纯粹的织工阶级，他们仅仅靠工资生活，没有一点财产，甚至连名义上的财产(一块租来的土地)也没有，于是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working men)。此外，纺工和织工以前的那种关系也不存在了。以前，纺纱和织布是尽可能在一个屋子里进行的。现在，使用珍妮纺纱机像使用织机一样，都需要有气力，于是男人也开始做纺纱的工作了，而且整个家庭完全靠珍妮纺纱机生活；而另一些家庭却把现在已经过时的、落后的纺车扔在一边，如果他们买不起珍妮纺纱机，就不得不单靠当家人的织机过活。后来工业中无止境地发展的分工就是这样从织布和纺纱开始的。

---

①德国旧时的银币，1塔勒合3马克。——编者注

当**工业无产阶级**已经随着最初的、还很不完善的机器发展起来的时候，这台机器也促进了**农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在这以前，有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即所谓自耕农，他们过着平静的、不动脑筋的庸碌生活，就像他们的邻居，那些兼营农业的织工一样。他们完全沿用父辈们古老而粗陋的方法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以那种世代相传墨守成规的人们所特有的顽固僵化来反对任何革新。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小佃农，但不是今天所说的佃农，而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由于契约规定的世袭租佃权或者由于古老的习惯，从父亲和祖父手里继承了小块的土地，至今一直稳稳地坐在上面，好像这些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现在，由于工业工人放弃了农业，许多土地闲起来了，在这些土地上出现了新的**大佃农**阶级，他们一租就是50英亩、100英亩、200英亩或者更多的土地，这些人就是tenants-at-will，也就是每年都可能被解除租契的佃农，他们能够通过更好的耕作和较大规模的经营来提高土地收益。他们的产品可以比小自耕农卖得便宜；而小自耕农由于土地已经不再能养活自己，只能卖掉土地去买一部珍妮纺纱机或织机，或者到大佃农那里去当短工，成为农业无产者。小自耕农天生的惰性和世代相传而无法改进的粗陋的耕作方法，使他们不得不同另一些人竞争，那些人用更合理的方法耕种租来的土地，而且具有大规模经营和投资改良土壤所带来的一切优越性。

可是工业的运动并没有就此止步不前。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减少工人数量，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仅仅用手摇动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由于珍妮纺纱机不断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干脆弃置不用；资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机器已经过时，也还可以维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纺工来说，就难以为继了。如

果说这样一来就为工厂制度奠定了基础，那么，由于**翼锭纺纱机**的出现，工厂制度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这种机器是北兰开夏郡**普雷斯顿**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在1767年发明的，在德国通常叫做经线织机，除了蒸汽机，它是18世纪最重要的机械发明。这种机器从一开始设计就考虑使用**机械动力**，而且是以全新的原理为根据的。**菲尔伍德**（兰开夏郡）的**赛米尔·克朗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经线织机的特点，于1785年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克莱**又发明了**梳棉机**和**粗纺机**，于是工厂制度就成为棉纺业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了。这些机器经过一些不大的改变，逐渐开始用来纺羊毛，以后（19世纪最初10年）又用来纺麻，于是在这里也排挤了手工劳动。但是事情还没有就此停止。在18世纪最后几年，乡村牧师**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机械织机**，大约在1804年，他把这种机器又改进得足以压倒手工织工；所有这些机器由于有了**蒸汽机**发动，就加倍重要了，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在1764年发明的，从1785年起用来发动纺纱机。

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从那时起，英国工业的全部历史所讲述的，只是手工业者如何被机器驱逐出一个个阵地。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几乎全被占领，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生计的任何保证，道德败坏，政治骚动，以及我们将在下面各章加以研究的使英国有产阶级极端不快的种种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仅仅一台像珍妮纺纱机这样很不完善的机器就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我们对于从我们这里得到原料而

还给我们以布匹的一整套构造精密相互配套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现在，我们来稍微详细地研究一下英国工业的发展①，先从它的主要部门**棉纺织业**开始。在1771—1775年输入英国的原棉平均每年不到500万磅；1841年输入52 800万磅，而1844年输入至少60 000万磅。1834年，英国输出55 600万码棉布，7 650万磅棉纱和价值120万英镑的棉针织品。同年，棉纺织业中使用了800多万锭子，11万台机械织机和25万台手工织机，经线织机没有计算在内。根据**麦克库洛赫**的计算，当时全联合王国直接或间接靠这一工业部门生活的有近150万人，其中在工厂工作的只有22万人；这些工厂所使用的动力，蒸汽力是33 000马力，水力是11 000马力。现在这些数字都已经远远地被超过了；可以大胆地设想，在1845年，机器的动力和数量以及工人的数目，都将比1834年增加二分之一。这种工业的中心是**兰开夏郡**，兰开夏郡是棉纺织业的摇篮，棉纺织业使得兰开夏郡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把它从一个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变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这种工业在80年内使兰开夏郡的人口增加了9倍。居民共达70万人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如**博尔顿**（6万居民）、**罗奇代尔**（75 000居民）、**奥尔德姆**（5万居民）、**普雷斯顿**（6万居民）、**阿什顿**和**斯泰利布里奇**（共4万居民），以

①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根据**波特**《国家的进步》，伦敦版，1836年第1卷，1838年第2卷，1843年第3卷（根据官方资料写成）；这里还根据其他一些大部分也来自官方的资料。"

在1892年德文版上，恩格斯在原注文之后又加了一句话："这里关于工业变革的历史概述在某些细节上是不准确的，但是在1843—1844年没有更好的资料。"——编者注

及其他许多工厂城市，就像是用了法术一样，一下子就从地下变出来了。在南兰开夏郡的历史上可以看到近代的一些最大的奇迹（但是这一点还没有一个人谈到过），所有这些奇迹都是棉纺织业创造的。此外，**格拉斯哥**形成了苏格兰的棉纺织业区（包括**拉纳克郡**和**伦弗鲁郡**）的第二中心，这个中心城市的人口自兴办这种工业的时候起到现在也从3万增加到30万。**诺丁汉**和**德比**的**织袜业**，由于棉纱价格的降低也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由于织袜机的改良又获得了第二个推动力，这种改良使人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同时织两只袜子。自从1777年发明了**网织机**，**花边的生产**也成了重要的工业部门；此后不久**林德利**发明了**花边机**，1809年**希思科特**又发明了**络丝机**。这样一来，制造花边的工作无限地简化了，而对花边的需求随着它的降价而大大增长，以致现在至少有20万人以从事这种生产为生。它的主要中心是**诺丁汉**、**莱斯特**和英格兰西部（**威尔特郡**、**德文郡**等）。从属于棉纺织业的劳动部门，如漂白、染色和印花也得到了同样的发展。此外，**漂白业**由于在化学漂白中用**氯**代替了氧，**染色业**和**印花业**由于化学的迅速发展，印花业由于机械方面的一系列极其辉煌的发明，又有了新的高涨；由于这种高涨以及棉纺织业的发展引起的这类营业部门的扩大，这些行业空前地繁荣起来了。

在**羊毛加工业**中也展开了同样的活动。这种行业过去曾经是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但当时的产量根本不能和现在所生产的数量相比。1782年，前三年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把这些机器改装得适用于毛纺业的尝试完全获得成功。这时，在毛纺织业区也开始了我们在棉纺织业所看到的那种迅速的发展。1738年，**约克郡西区**生产了毛织品75 000匹，1817年生产了

49万匹，毛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1834年输出的毛织品就比1825年多45万匹。1801年加工的羊毛是10 100万磅（其中700万磅是输入的），1835年加工的是18 000万磅（其中4 200万磅是输入的）。这种工业的主要中心是约克郡的西区，在这里，特别是在**布拉德福德**，英格兰的长羊毛制成供编织等用的毛线，而在其他城市，如**利兹**、**哈利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等地，短羊毛制成合股毛纱，然后再制成呢绒织物；其次，是**兰开夏郡**的毗邻地区，即**罗奇代尔**一带，这里除了生产棉纺织品，还生产许多法兰绒；最后，是**英格兰西部**，这里生产最精细的呢子。在这里人口的增加也是很明显的：

	1801年	1831年
布拉德福德	29 000人	77 000人
哈利法克斯	63 000人	110 000人
哈德斯菲尔德	15 000人	34 000人
利兹	53 000人	123 000人
整个约克郡西区	564 000人	980 000人

1831年以来，这些地方的人口至少又增加了20%—25%。1835年，全联合王国从事毛纺业的工厂是1 313个，共有工人71 300人，在这个数目中只包括了直接或间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广大群众中的一小部分，并且几乎完全没有包括织工在内。

麻纺织工业中的进步开始得比较晚，因为原料的天然特性给纺纱机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虽然18世纪最后几年在苏格兰已经有人作过这种尝试，但是直到1810年，法国人**日拉**才以一种实用的方法建立了**麻纺业**。而他的机器也只是在英国加以改善，并在**利兹**、**邓迪**和**贝尔法斯特**普遍应用以后，才在不列颠的土地上获得它们应有的重要意义。从这时起，英国的麻纺织工业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1814年，有3 000吨[1]亚麻运入邓迪，到1833年就有大约19 000吨亚麻和3 400吨大麻了。输入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亚麻布从3 200万码(1800年)增加到5 300万码(1825年)，其中大部分又从大不列颠输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麻织品的输出从2 400万码(1820年)增加到5 100万码(1833年)。麻纺厂的数目在1835年达到347个，共有工人33 000人；其中一半是在苏格兰南部，有60多个在约克郡西区(利兹及其附近)，25个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其余的在多塞特郡和兰开夏郡。麻织品的生产是在苏格兰南部以及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但主要是在爱尔兰。

英国人在**蚕丝加工**方面也获得了同样的成绩。他们从南欧和亚洲取得已经纺好的原料，而主要的工作就是捻成细线(捻线)。1824年以前，生丝的高额关税(每磅四先令)大大限制了英国丝纺织工业的发展，英国丝纺织工业的市场仅仅限于本国及其殖民地，因为那里实行保护关税。现在，进口税降低到一个便士，工厂的数目就立刻大量增加了。一年之内并纱锭的数目从78万增加到118万，虽然1825年的商业危机也使这个工业部门的发展一时陷于停顿，但到1827年这一部门生产的产品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了，因为英国人在掌握机械方面的熟练程度和他们的经验保证了他们的捻线机优越于其竞争者的拙劣机械。1835年，不列颠帝国共有捻丝厂263个，工人3万名，这些工厂大部分设在**柴郡**(**麦克尔斯菲尔德**、**康格尔顿**及其附近地区)、**曼彻斯特**和**萨默塞特郡**。此外，还有许多从事废茧加工的工厂；用废茧制成一种特别的丝(绢丝)，英国人甚至用它来供给巴黎和里

---

①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英国1吨等于2 240英磅。"
在1892年德文版上，恩格斯在原注文后又加了："约1 000公斤。"——编者注

昂的织造业。用这种方法捻和纺的丝，主要在苏格兰（**佩斯利**等地）和伦敦（**斯皮特尔菲尔兹**），同时也在**曼彻斯特**和另外一些地方织成绸子。

但是，从1760年开始的英国工业的巨大高涨，并不局限于衣料的生产。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而许多和前面提到的情况毫无联系的发明，也由于它们正好出现在工业普遍高涨的时候而获得了双倍的意义。其次，当工业中机械力的巨大意义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以后，人们便想尽一切办法来全面利用机械力，并使这种利用有利于一个个的发明家和厂主；此外，对机器、燃料和原料的需求本身，就直接要求大批工人和许多行业加倍地工作。由于蒸汽机的出现，英国丰富的**煤层**才具有了重要意义；只是现在才出现了**机器制造业**，而对为制造机器提供原料的**铁矿**的关注也随之加强了。羊毛消耗量的增加使英国的饲羊业得到发展，而羊毛、亚麻和蚕丝输入的增加又引起了英国商船队的扩大。发展得最快的是**铁的生产**。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熔炼铁矿石总是用木炭，而由于土地耕作的改良和森林砍伐殆尽，木炭越来越贵，产量越来越少。上一世纪才开始用经过干馏的煤（焦炭）来炼铁，在1780年以后又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把用焦炭熔炼的、以前只能作为铸铁使用的那种铁变成可用的锻铁。这种把炼铁时掺在铁里面的碳收回的方法，英国人叫做搅炼；它给英国的铁的生产开辟了崭新的活动地盘。高炉建造得比过去大50倍，矿石的熔炼由于使用热风而简化了，因此，铁的生产成本能够大大降低，以致过去用木头或石头制造的许多东西现在都用铁制造了。1788年，著名的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在约克郡建造了第一座铁桥，接着出现了无数铁桥，现在几乎所有的桥，特别是铁路桥，都是用铸铁建造的，在伦敦甚至用这种材料建造了一座横

跨泰晤士河的桥(萨瑟克桥);铁柱和铁制机座等普遍被采用,而随着使用瓦斯照明和修筑铁路,英国的制铁业又获得了新的销售领域。钉子和螺丝钉也逐渐用机器制造了。设菲尔德人**亨茨曼**在1760年发明了一种铸钢方法,这种方法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劳动,并且能生产出全新的便宜的制品。只是到这时,由于使用的材料纯度更高,工具更完善,机器更新,分工更完善更细,英国的金属制品生产才产生了重大影响。**伯明翰**的人口从73 000(1801年)增加到20万(1844年),**设菲尔德**的人口从46 000(1801年)增加到11万(1844年),而仅在设菲尔德这座城市,煤的消耗量在1836年就达到了515 000吨。1805年输出了4 300吨铁制品和4 600吨生铁,1834年输出了16 200吨铁制品和107 000吨生铁,铁的全部生产在1740年还只有17 000吨,1834年就增加到将近70万吨。仅熔炼生铁,每年就要消耗300多万吨煤,甚至很难想象,**煤矿**在最近60年中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意义。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所有煤层都在开采,仅仅**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煤矿每年就有500多万吨由海上运出,使用的工人有4万—5万。根据《达勒姆纪事报》的报道,上述两个郡进行开采的煤矿:

1753年……………………14个,
1800年……………………40个,
1836年……………………76个,
1843年……………………130个。

同时,现在所有煤矿的开采都比过去紧张多了。**锡矿**、**铜矿**和**铅矿**也在同样地加紧开采;和**玻璃生产**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即**陶器的生产**,这种生产在1763年前后由于**乔赛亚·韦奇伍德**而赢得了重要地位。他把整个陶器制造过程归纳成科学原理,采

用了新的艺术风格，并且在**北斯塔福德郡**八英里见方的一片地方建立了**陶器厂**(potteries)，这地方从前是不毛之地，现在却布满了工厂和住宅，并且养活了6万多人。

一切都被卷入了运动的这个大旋涡。**农业**也发生了变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地产转到了另外一些占有者和耕种者的手里，不仅如此，农业也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大佃农投资改良土壤，拆毁不必要的篱笆，排干积水，施以肥料，使用较好的农具，实行系统的轮作制(cropping by rotation)。科学的进步也帮助了他们。**汉·戴维**爵士把化学应用于农业得到了成功，而力学的发展又给大佃农带来许多好处。此外，由于人口的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尽管从1760年到1834年有6 840 540英亩荒地变成了耕地，可是英国却由粮食输出国变成了粮食输入国。

在**交通**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1818—182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1 000英里法定宽度为60英尺的公路，而且几乎所有的旧公路都按照**麦克亚当**的原则加以改造。在**苏格兰**，公共工程局从1803年起修筑了约900英里公路，并建造了1 000多座桥梁，因此，苏格兰山地的居民一下子就接触到了文明。过去大部分山民从事盗猎和走私；现在他们成了勤劳的庄稼人和手工业者；虽然为了保存盖尔语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凯尔特的习俗和语言一经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爱尔兰**的情形也一样。在**科克**、**利默里克**和**凯里**等郡之间，以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任何可行驶的道路，这个地方由于很难通行而成了一切罪犯的隐匿处和南爱尔兰的凯尔特-爱尔兰民族的堡垒；现在这里已经是公路纵横，从而文明也进入了这个荒凉的地方。整个不列颠帝国，特别是英格兰，60年以前道路还和当时的德国、法国一样差，现在却有了很好的公路网，而所有这些公路，像

英格兰的几乎一切设施一样，都是私人企业家修建起来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国家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1755年以前英国几乎没有**运河**。1755年，在兰开夏郡开凿了从**桑基布鲁克**到**圣海伦斯**的运河，1759年**詹姆斯·布林德利**开凿了第一条有重要意义的运河，即**布里奇沃特公爵**运河，这条运河从**曼彻斯特**及附近的煤矿流到**默西**河口，并在**巴顿**附近通过渡槽越过**艾尔韦尔**河。由此开始了英国的运河建设，布林德利是第一个重视这一建设的人。现在人们已经向四面八方开凿了许多运河，河流也疏浚得可以通航了。仅仅在**英格兰**就有2 200英里运河和1 800英里可通航的河流；在**苏格兰**开凿了横贯全境的**喀里多尼亚运河**，在**爱尔兰**也开凿了好几条运河。这些工程，也像铁路和公路一样，几乎全部是私人和公司修筑的。

铁路只是在最近才修筑起来。第一条大铁路是从**利物浦**通往**曼彻斯特**的铁路（1830年通车）。从那时起，所有大城市彼此之间都用铁路联系起来了。伦敦和南安普敦、布赖顿、多佛尔、科尔切斯特、剑桥、埃克塞特（经过布里斯托尔）、伯明翰之间有铁路相通；伯明翰和格洛斯特、利物浦、兰开斯特（一线经过牛顿和威根，一线经过曼彻斯特和博尔顿）、利兹（一线经过曼彻斯特、哈利法克斯，一线经过莱斯特、德比及设菲尔德）之间有铁路相通；利兹和赫尔、纽卡斯尔（经过约克）之间有铁路相通。此外还有许多正在建设和设计中的支线，不久以后从爱丁堡到伦敦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够了。

蒸汽不仅使陆路交通发生变革，而且使水路交通焕然一新。第一艘轮船是1807年在北美的哈得孙河下水的，而在不列颠帝国则是1811年在克莱德河下水的。从那时起，英国建造了600多艘轮船，1836年在英国港湾运营的轮船有500多艘。

简单说来，这就是最近六十年的英国工业史，这是人类编年史中的一部无与伦比的历史。六十年至八十年以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只有很少而且简单的工业，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了：有居民达250万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厂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给产品而且几乎全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智慧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工业①，他们是由完全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需要的民族。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是，这种工业变革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机器的使用如何促使无产阶级诞生。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急剧增长，而且增加的几乎全是无产者阶级。此外，爱尔兰只是从18世纪初才进入安定状态，这里的人口过去在骚乱中被英国人残酷地屠杀了十分之一以上，现在也迅速增长起来，特别是从工业繁荣开始吸引许多爱尔兰人到英格兰去的那个时候起。这样就产生了不列颠帝国的大工商业城市，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属于工人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些小商人和人数很少很少的手工业者。新的工业能够获得重要意义，只是因为它把工具变成了机器，把作坊变成了工厂，从而把中间阶级中的劳动者变成了工人无产者，把以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的中

①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文版中，这里是“工业和商业”。——编者注

间阶级，并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在狭义的工业范围之外，在手工业方面，甚至在商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上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被挤到了无产者阶级中去。同时，由于迄今为止的手工业生产被废除，由于小资产阶级被消灭，工人已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以前，他们总还有希望作为有固定住所的师傅自己开一个作坊，也许日后还可以雇几个帮工；可是现在，当师傅本人也被厂主排挤的时候，当独立经营一个企业必须有大量资本的时候，工人阶级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固定的阶级，而在过去，它往往只是通向资产阶级的过渡。现在，谁要是生为工人，那他除了一辈子当无产者，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是现在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

这样就形成了庞大的工人群体，他们现在布满了整个不列颠帝国，他们的社会状况日益引起文明世界的注意。

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无产者，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业，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日益迫切地要求分享社会设施的利益，这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从改革法案[152]通过时起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议会中一切稍微重要的辩论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虽然英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们企图回避这个大问题，并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真正的民族利益，但这都是完全无济于事的。议会每开一次会，工人阶级都赢得地盘，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则退居次要地位，虽然资产阶级是议会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力量，但是1844年最近的一次会议

所讨论的却始终是有关工人的问题(济贫法案、工厂法案、主仆关系法案)[160]。工人阶级在下院的代表托马斯·邓库姆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而要求废除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提议拒绝纳税的激进资产阶级却充当了可怜的角色。甚至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辩论,实质上也只是关于爱尔兰无产阶级状况和援助他们的措施的辩论。确实,英国资产阶级应该赶快向工人让步了,否则将为时太晚;工人不是在乞求,而是在威逼,在要求。

尽管如此,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困发财的工厂主阶级,却不正视这种贫困的状况。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代表民族的阶级,却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痛处;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是贫困的,因为正是**他们**,有产的工业阶级,对这种贫困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当人们开始谈论工人状况时,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即资产阶级)通常总是报以轻蔑的一笑;因此,整个资产阶级对有关工人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在议会内外一谈到无产阶级的状况就牛头不对马嘴;因此,虽然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正从他们脚下被挖空并且每天都可能坍塌,而这种很快会发生的坍塌就像某个数学和力学定律那样肯定无疑,他们还是可笑地安然自得;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虽然天知道英国人已经用了多少年来反复调查和修补工人的状况,他们竟还没有一本完整地阐述工人状况的书。但是,因此也产生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这些富有者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他们受命运的摆布。这种愤怒要不了多久(这个时刻人们几乎可以算出来)就必然会爆发为革命,同这一革命比较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

工业无产阶级

研究各部门无产阶级所应遵循的顺序，自然决定于前面讲过的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第一批无产者属于工业，是工业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工业工人**，即从事原料加工的人。工业材料即原料和燃料本身的生产，只是由于工业变革才重要起来，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新型的无产阶级，即**煤矿和金属矿的工人**，才能够产生。第三是工业影响了**农业**，第四是工业影响了**爱尔兰**，这样也就可以确定相应的各部门无产阶级的位置。我们也会看到，各种工人（也许爱尔兰人是例外）的教育程度直接取决于他们和工业的联系，所以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是工业工人，矿工们已经差一些，而农业工人几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工业无产者本身的队伍中也会发现这样的顺序，并且会看到，工厂工人，工业革命的这些初生子，始终是工人运动的核心，其他工人如何参加运动，完全决定于他们的手工业被工业变革侵害的程度。这样，我们从英国的例子中，从工人运动与工业运动同步并进这一事实中，就会更好地理解工业的历史意义。

但是，因为目前几乎整个工业无产阶级都卷入了运动，而且各个部门的状况正是由于它们都属于工业而具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先来考察这些共同点，然后再就各个部门的特点更详细地研究这些部门。

上面已经指出，工业如何把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它用这些资本来建立庞大的企业，从而使从事手工业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它用这些资本来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以便把个体手工业工人从市场上排挤出去。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小工业创造了中间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中间阶级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但是，这只是为了有朝一日更有把握地推翻他们。目前，无可争辩的和容易解释的事实是，"美好的旧时代"的人数众多的小中间阶级已经被工业摧毁，从他们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分化出贫穷的工人①。

但是工业集中化的趋势并没有就此停止。人口也像资本一样集中起来；这很自然，因为在工业中，人——工人，仅仅被看做一笔资本，他把自己交给厂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利息。大工业企业要求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他们必须住得集中，甚至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附近也会形成一个村镇。他们有种种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还需要其他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村镇的居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劳动，逐渐熟悉这种劳动；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就业时，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里来。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城市越大，定居到这里就越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运河和公路；挑选熟练工人的机会越来越多；由于附近的建筑业主和机器制造厂主之间的竞争，在这种地方开

①参看我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61]。这一著作谈到了"自由竞争"，但工业只是自由竞争的实践，自由竞争只是工业的原则。

办新企业就比偏远地区花费要少，因为在偏远地区，建筑材料和机器以及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都必须先从别处运来；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同提供原料的市场和销售成品的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样一来，大工厂城市的数量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不过，农村同城市相比也有优势，那里的工资通常比较低。于是农村和工厂城市不停地竞争，今天优势在城市方面，明天农村的工资又降低到在农村开办新工厂可以获利更多的程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集中的趋势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而在农村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包含工厂城市的萌芽。如果工业的这种疯狂的活动还能这样持续100年，那么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就会在沃灵顿或牛顿一带相互毗连。人口的这种集中也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商业中，因此，像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赫尔和伦敦这样几个大港几乎垄断了不列颠帝国的整个海上贸易。

因为这些大城市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得最充分，所以这种发展对无产阶级造成的后果在这里也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财产的集中达到极点；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最彻底地被摧毁；在这里，人们已经走得这样远，以致连美好的老英国这个名称也变得无法想象了，因为老英国甚至在祖父母的回忆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失着。小资产阶级，这个过去最稳定的阶级，现在成了最不稳定的阶级；他们是旧时代的少数残余和一些渴望发财的人，十足的实业投机家和投机商，其中或许有一个人可以致富，但同时会有99个人破产，而这99个人中一多半只是靠破产生存。

但是，这些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无产者，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他们的生活如何，大城市对他们的影响又如何。

结　果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城市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并且再把这些结论同实际情况进行比较。让我们看看，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状况是怎样的。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们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加害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致人以死命，那么我们就把他的行为叫做谋杀。但是，如果社会①把成

①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说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负有责任的整体时，我所指的当然是**社会的权力**，即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目前拥有政治和社会的统治权，从而同时应该对那些它没有赋予参政权的人的状况负责。在英国像在其他文明国家一样，这个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有责任至少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比如说设法不要饿死一个人，这个道理是无须我来向我的**德国**读者论证的。不过，如果我是写给英国资产阶级看的，那自然又当别论。"

在1887年英文版上，恩格斯在原注文之后又加了两句话："目前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公元1886年，我们德国的资本家至少在这方面已经完全达到了英国的水平。"

在1892年德文版上，恩格斯在上面注文之后又加了两句话："这50年来一切都变得多么厉害啊！目前，英国资产者中已经有人承认社会对它的各个成员负有责任；而德国资产者怎样呢?!?"——编者注

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害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上万人的必要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迫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成千上万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社会还让这些条件存在下去，那么，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这种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表面上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死亡的，因为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被英国工人报刊合情合理地称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必须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得以引用官方文献、议会报告和政府报告来确定杀人的事实时，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如此缺乏的阶级，不可能保持健康，不可能活得长久，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地特别是从工人健康状况方面把这些情况逐一加以考察。大城市人口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不良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

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街道上，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居民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肢体疲劳，精神委靡，生命力减退。因此，大城市的居民虽然患急性病的，特别是各种炎症的，比生活在清新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对健康不利，那么，工人区的污浊空气造成的危害又该是多么大啊，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在农村，就是在房子旁边有一个粪坑，也不会那么有害，因为那里空气可以四面八方自由流通。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巷和大杂院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切腐烂的肉类和蔬菜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毫无阻挡地散出去，势必要造成空气污染。因此，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至于被污染的河流，也散发出同样的气体。但是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他们被吸引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污浊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这样一些地区去，那里的建筑杂乱无章，因而通风条件比其他一切地区都要差。一切可以保持清洁的手段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被污染，根本不能用于清洁目的。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令人作呕的污物和粪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处理这些东西。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地区变得十分肮脏。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各种各样的灾祸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人口本来就过于稠密，而穷人还被迫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他们不仅呼吸街上的

污浊空气，还被成打地塞在一间屋子里，他们在夜间呼吸的那种空气完全可以使人窒息。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为他们建造的房子不能使恶浊的空气流通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产生最激烈的情绪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人们像追逐野兽一样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得到安宁，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刺激他们经常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得到的这两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经受住这一切，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的厄运。到那时，他们至今还保留的一点东西也将被彻底剥夺。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人的体质注定越来越衰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如何。

城市中条件最差的地区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其他生活条件结合起来，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这一点我们从各个方面得到了证明。前面引证过的《工匠》杂志上那篇文章说得完全正确：肺病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这类疾病也确实特别是在工人当中经常发生。伦敦的特别是工人区的污浊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我们在街上可以遇到许多面带病态潮红的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清晨大家去上工的时候，如果你在街上稍微转一下，就会惊讶地发现有那么多人看上去或轻或重地患有肺结核。甚至在曼彻斯特，人们看起来也还不至于**这样**。这种随时都可以碰到的脸色苍白、身材消瘦、胸部窄小、

眼窝凹陷的幽灵，这种虚弱无力、委靡不振、没精打采的面孔，我只是在伦敦才看到过这么多，虽然肺结核在北部的工厂城市每年也都要夺去不少人的生命。同肺结核同样可怕的疾病，除了其他肺病和猩红热，首先是一种在工人中间发生的最有毁灭性的疾病——伤寒。根据官方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这种到处蔓延的灾害是直接由于住宅的通风、排水和卫生的恶劣状况引起的。这个报告——不要忘记，它是由英国第一流的医生们根据其他医生的统计材料写成的——断定，只要有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大杂院，只要有一个没有排水沟的死胡同，就足以引起热病，特别是当居民住得很挤而附近又有腐烂的有机物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且事实上几乎总是有这种病出现。这种热病的性质几乎到处都相同，而且几乎在一切场合下都会发展成明显的伤寒。这种疾病在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区，甚至在较小的地方的某些房屋质量很差而又维护得不好的街区都可以发现，而蔓延得最广的是在贫民窟，当然，在条件较好的地区也会有个别的患者。在伦敦，这种疾病已经猖獗好久了。它在1837年闹得特别厉害，于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官方报告。根据**绍斯伍德·斯密斯博士**关于1843年伦敦热病医院的年报，该院收治的病人有1 462人，比以往收治病人最多的年份还多418人。在伦敦东区、北区和南区的潮湿而肮脏的地方，这种疾病特别猖獗。很多病人是从乡下迁移来的工人，他们在旅途中和到达伦敦以后受过千辛万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找不到工作，终于得了热病。这些人进入医院时非常虚弱，必须服用极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氨制剂和其他兴奋剂。全部病人中有16.5%死亡。曼彻斯特也发现这种恶性的热病；在旧城、安科茨、小爱尔兰[124]等地的条件更差的工人区，这种病几乎从未绝迹，但是在这些地方，也像在**英格兰**各城市一样，这种病还没有蔓延得像预料的那

样厉害。而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伤寒猖獗的程度却超出一切想象。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在1817年物价腾贵期间，在商业危机后的1826年和1837年，伤寒特别猖獗，每次都要延续三年左右才稍微缓和一个时期。在爱丁堡，在1817年流行病蔓延的时候，患热病的约6 000人，在1837年蔓延期间约1万人，随着流行病的每一次重新来临，不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而且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也增高了①。但是这种疾病在以前所有各个时期的肆虐情形，和1842年危机之后的猖獗程度比较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在整个苏格兰，有六分之一的穷人患了热病，这种灾害由流浪的乞丐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在两个月中患热病的人比过去12年还要多。1843年在格拉斯哥患热病的占居民的12%，共计32 000人，其中有32%死亡，而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死亡率一般只有8%。这种病的危险期是在第7天和第15天；在第15天，病人的皮肤通常变成黄色，我们的权威认为，这种情况证明了，疾病的原因还应当从精神上的不安和忧虑方面去寻找②。在爱尔兰，这种流行性热病也是常见的。在1817—1818年的21个月中，住过都柏林医院的热病患者有39 000名，据艾利生郡长说（《人口原理》第2卷），后来有一年甚至达到6万名。1817—1818年，在科克住过热病医院的病人占居民的七分之一，在同一时期，在利默里克患热病的达全体居民的四分之一，而在沃特福德的**贫民窟**里竟占二十分之十九③。

①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

②艾利生博士1844年10月在约克举行的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会议上宣读的报告中谈到这一点。

③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

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果考虑一下，他们的住宅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人，病人和健康人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那么，人们还会对于这样一种容易传染的热病竟没有更广泛地蔓延而感到惊奇。如果注意到，病人所得到的医药治疗是多么少，许多患者根本得不到医生的忠告，连饮食方面最普通的注意事项也不知道，那么，这个死亡率就显得太低了。对这种病很有研究的艾利生博士，也和引证过的报告一样，认为穷人的贫困和悲惨的状况是生病的原因；他强调说，正是缺衣少食和生活需要不能充分满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使流行病变得特别可怕，使它迅速蔓延。他证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商业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匮乏时期都有伤寒病流行，而且这种病几乎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值得注意的是，据他说，患伤寒的人多数是当家人，也就是一家人里最不能缺少的人；他所提到的许多爱尔兰医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工人的住宅，不如说是他们的饮食。工人吃的食物本来就很不容易消化，对小孩是完全不合适的；可是工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孩子弄到比较合适的食物。此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习惯，就是给孩子喝烧酒，甚至食鸦片。由于这一切，再加上其他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有害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就患上了贻害终身的多种消化器官疾病。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消化不良症，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继续吃那种使他们消化不良的食物。他们又怎能知道这是有害的呢？即使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文化水平没有改变以前，他们又怎能遵守比较合适的饮食规定呢？由于消化不良，他们还在童年时代就染上了新的疾病。几乎所有工人都患着瘰疬，患瘰疬的父母有患瘰疬的孩子，特别是当具有父母遗传的腺病体质的孩子们又受到最初引起

这种病的原因的影响的时候。身体发育时期营养不良所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佝偻病(英吉利病,关节结节性赘瘤),这种病在工人的孩子中也是很常见的。骨头的硬化延缓,骨骼的生长整个地受到阻碍,除佝偻病的普通现象外,还常常可以看到腿和脊柱的弯曲。至于在商业行情波动、失业以及危机造成的工资微薄使工人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些疾病怎样更加肆虐,那就用不着我来说了。几乎每一个工人在一生中都至少要过一段吃不饱饭的生活,这使得虽然质量差但数量毕竟还够的食物所已经引起的后果更加严重。正是在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只能吃半饱的孩子们(这样的孩子在每一次危机期间,甚至在繁荣时期,不知有多少)必然十分虚弱,必然患严重的瘰疬和佝偻病。从他们的外表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患这种病的。大批工人的孩子所遭受的缺乏照顾的命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从事劳动的整整一代人都衰弱了。如果再加上工人没有保暖的衣服,因而无法防止伤风,非到病倒不能停止工作,一生病家庭就更加贫困,通常得不到任何治疗等等情况,那就大致可以想象英国工人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了。而各个劳动部门的工作在目前条件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在这里还根本没有谈到。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健康恶化。首先是酗酒。各种引诱,各种可能的诱惑合在一起,使工人走向酗酒。烧酒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快乐泉源,而且所有一切都在促使工人去接近它。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困倦不堪;他的住宅是那么不适于居住,既潮湿阴冷又肮脏;他迫切需要消遣,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身体不健康、特别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惫、烦闷和忧郁的心情,由于其他的生活状况,由于生存没有保障,由于受到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和无法使自

己的生活状况得到保障，而达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他的身体已经被混浊的空气和劣质的食物弄得很衰弱，迫切地需要某种外来的刺激；他的社交要求只能在酒馆得到满足，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会见自己的朋友。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怎么能没有极强烈的酗酒愿望，怎么能抵抗酒类的诱惑呢？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大部分工人都**不能不**沉湎于酒。促使工人酗酒的，除了这些多半是肉体上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情况：周围大批人酗酒，促使他们跟着效仿；工人得不到教育；人们无法使年轻人抵御诱惑；在许多情况下，酗酒的父母直接影响子女，他们竟让孩子喝酒；人们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贫困和压力；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情况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强大，使我们实在难以责备工人对酒的偏爱。我们可以向染上恶习的人追究责任，但是在这里，酗酒已不再是这样一种恶习。酗酒成了一种现象，成了一定条件作用于一个没有意志的、至少是面对这些条件时变得毫无意志的对象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些使工人沦为这种简单的对象的人应该对此负责。但是，正像大批工人必然要沉湎于酒一样，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精神和肉体造成毁灭性的影响。酗酒强化了工人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一切诱发疾病的因素，极大地助长了肺病和下腹部疾病的传播以及伤寒的发生和蔓延。

工人阶级遭受肉体上的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了病不可能请高明的医生来诊治。的确，有许多慈善机构在设法弥补这种缺陷，例如曼彻斯特医院每年医治大约22 000个病人，部分住院治疗，部分只接受医生的忠告和药品。但是，对于一个根据加斯克尔的统计[①]每年

---

①《英国的工业人口》第8章。

有四分之三的居民需要医疗救助的城市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英国医生收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这笔费用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不得不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服用那些从长远看来弊大于利的假药。在英国的所有城市都有大批江湖医生在干这种勾当，他们靠广告、招贴以及其他伎俩在贫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许多包治百病的所谓专利成药（patent medicines）出卖，什么莫里逊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以及成千种的其他丸药、香精和药膏等等，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常常是有害的；因为所有的广告都向不明药理的工人宣传说，这些药品怎样吃也不会过量，所以无怪乎工人们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药品。帕尔氏生命丸的制造者在一星期之内卖出20 000—25 000盒这种万应灵药是常有的事，这些丸药有的人用来治便秘，有的人用来治腹泻，有的人用来治热病、虚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正如我们德国的农民喜欢在一定的季节拔火罐或放血一样，英国工人现在喜欢吃专利成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把自己的钱装进了这些药品制造者的口袋。这些专利成药中最有害的一种，是用鸦片制剂、特别是鸦片酊制成的水药，即市场上出售的所谓“戈弗雷强心剂”。在家里干活并且要照顾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的妇女们给孩子们吃这种水药，使他们安睡，或者如许多人所认为的，使他们强壮起来。她们不知道这种“强心剂”是多么有害，常常是在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他们吃这种药，直到孩子们死去为止。孩子的身体对鸦片的作用越迟钝，服用量就越多。如果这种“强心剂”不再起作用，就给孩子吃纯粹的鸦片酊，常常是一次15—20滴。诺丁汉的验尸官曾向一个政府调查委

员会作证说[1]：据一个制药者供认，他在一年内为配制"戈弗雷强心剂"使用了13公担糖浆[2]。不难想象，这对接受这种治疗的孩子们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他们变得面色苍白，精神委靡，身体衰弱，大部分不到两岁就死了。这种药品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区里都有很广的销路。

这一切影响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中间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封闭的室内工作的工业工人是如此，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仅仅是他们。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毫无气力，面色苍白，由于患有热病，他们身上除了那些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肌肉以外，其他肌肉都是松弛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症，总是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都会病倒。所以他们老得快，死得早。死亡率统计表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户籍总署署长乔·格雷厄姆的报告，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每年接近于2.25%，即每45人中每年有一人死亡[3]，至少1839—1840年的平均数是这样的；第二年死亡率稍稍降低了一点，每46人中才有一人死亡。但在大城市，死亡率就完全不同了。我手头有几份官方的死亡率统计表（刊登在1844年7月31日的《曼彻斯特卫

---

①《矿山、煤矿以及雇有大批不受工厂管理法保护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的行业和工厂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号和第2号报告》。第2号报告中的格兰杰的报告。通常在引用时称做《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是最好的官方报告之一，其中包含许多最有价值的但也是最可怕的事实。第1号报告于1841年问世，第2号报告于两年后问世。

②在1887年英文版上是"13公担鸦片酊"。——编者注

③《英国户籍总署署长关于出生、死亡、婚姻的第5号年度报告》。

报》上)，根据这些统计表，几个大城市的死亡率是这样的：曼彻斯特，如包括索尔福德和乔尔顿，是1:32.72，不包括索尔福德和乔尔顿，是1:30.75；利物浦，如包括西德比(郊区)，是1:31.90，不包括西德比，是1:29.90；而柴郡、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所有地区(这些地区包括许多农业区或半农业区以及许多小城市，总人口为2 172 506人)的平均死亡率是1:39.80。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如何恶劣，从兰开夏郡的普雷斯科特的死亡率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煤矿工人居住的地方，由于在矿井工作对健康不利，所以在这方面它还不如农业区。但是这些工人是住在乡下的，他们的死亡率是1:47.54，就是说，比整个英格兰的平均数约低2.50。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1843年死亡率统计表。在苏格兰的各城市，死亡率还要高：在爱丁堡，1838—1839年是1:29，而1831年在旧城甚至是1:22；在格拉斯哥，根据考温博士的统计(《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①，自1830年以来，平均是1:30，有些年份是1:22或1:24。平均寿命大大缩短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方面；至于所有阶级的平均寿命，则因为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的死亡率较低而有所提高，这从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有一个最新的证明是曼彻斯特的医生P. H. 霍兰提供的，他受官方委托，调查过曼彻斯特郊区梅德洛克河畔的乔尔顿②。他把房屋和街道各分为三等，得出如下不同的死亡率：

一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1

---

①罗·考温《从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看居民的卫生状况》，载于1840年《伦敦统计学会会刊》第3卷。——编者注

②参看1844年《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地区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附录。

一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45
一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36
二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5
二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8
二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一等房屋：缺
三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25

从霍兰提供的其他许多表格可以看出：二等**街**的死亡率比一等街高18%，三等街比一等街高68%；二等**房屋**的死亡率比一等房屋高31%，三等房屋比一等房屋高78%；而糟糕的街道经过改善以后，死亡率就降低了25%。他用下面这些从一个英国资产者口里讲出来要算是很坦白的话结束自己的报告：

“既然我们发现某些街道的死亡率比别的街道高三倍，而整个等级的街道又比其他等级的街道高一倍，既然我们又发现死亡率在情况恶劣的街道几乎总是高的，而在条件好的街道几乎总是低的，那么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大批的同胞，我们成百的近邻，每年都因缺乏最普通的预防措施而被毁灭了(destroyed)。”

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的一份统计资料也证实了同样的事实。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35岁，商人和收入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在议会报告里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事实。

死亡率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数字很高。小孩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生活条件的不利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一人死亡，孩子就常常没有人照顾，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恶果；因此，像曼彻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而上等阶

级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只有20%，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①，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在前面多次提到的《工匠》杂志的那篇文章里，我们得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详细的材料。该文的作者把城市和农业区各种儿童疾病的死亡数字一一加以对比，证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说来比农业区高两倍；在城市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多四倍，患胃病的比农村多一倍多，同时，在城市因肺部疾病死亡的人数和农村比较是2.5:1。在城市，因天花、麻疹、百日咳和猩红热而死亡的幼儿比农村多三倍，因脑水肿而死亡的多两倍，因痉挛而死亡的多九倍。为了再引证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列出一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中根据1832年议会工厂委员会的报告制成的。

每1万个死亡者中	5岁以下	5—19	20—39	40—59	60—69	70—79	80—89	90—99	100岁以上
拉特兰郡——卫生状况良好的农业区	2 865	891	1 275	1 299	1 189	1 428	938	112	3
埃塞克斯郡——沼泽地农业区域	3 159	1 110	1 526	1 413	963	1 019	630	77	3
卡莱尔市1779—1787年，工厂出现以前	4 408	911	1 006	1 201	940	826	533	153	22

①《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第3卷霍金斯博士关于兰开夏郡的报告。这里引用了“曼彻斯特最高统计权威”罗伯顿博士的材料。

每1万个死亡者中	5岁以下	5—19	20—39	40—59	60—69	70—79	80—89	90—99	100岁以上
卡莱尔市工厂出现以后	4 738	930	1 261	1 134	677	727	452	80	1
普雷斯顿工厂城市	4 947	1 136	1 379	1 114	553	532	298	38	3
利兹工厂城市	5 286	927	1 228	1 198	593	512	225	29	2

除了贫穷阶级目前被忽视和被压迫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病，还有其他原因促使幼儿死亡率上升。有许多家庭，妻子和丈夫都外出工作，结果孩子就完全没有人照顾，他们或者被锁在家里，或者交给别人照看。这样，如果有成百的这种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英国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车压死，被马踩死，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烧死。孩子们因烧伤或被开水烫伤而致死的特别多。这种事情，在曼彻斯特的冬季数月里几乎每周都要发生一次，在伦敦也同样经常发生，只是报上很少刊登罢了；我手头只有1844年12月15日《每周快讯》上的一个统计材料。根据这个材料，从12月1日到7日这一星期中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这些惨遭横死的可怜的孩子们完全是我们的社会混乱以及热衷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但是人们很难断定，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是否对这些孩子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们摆脱了充满艰辛和困苦的、忧愁多而欢乐少的漫长一生。在英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资产阶级天天在报纸上读到这一切，但他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如果我根据所引用的那些**肯定**为他们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

的证据，直接控告他们犯了社会谋杀罪，他们也是无法申辩的。他们应该想办法结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则就把管理公共利益的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对后一种办法，他们没有兴趣；而前一种，只要他们还是资产阶级，还坚持资产阶级偏见，他们就无力做到。虽然现在，在数十万牺牲者已经倒下去以后，他们终于对未来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预防性措施，公布了一个至少对住宅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的情形多少有所限制的"首都建筑法"①，虽然他们夸耀他们这种不仅远远没有触动弊端的根源，而且连最普通的卫生警察的规定也算不上的措施，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们的罪名。英国资产阶级现在只能二者选一，或者不顾这种落到他们身上的无可辩驳的谋杀罪名，继续进行统治，或者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自己引退。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宁愿选择前者。

现在让我们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他们的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在生活上只满足工人起码的需要，那我们也就不必因为它只允许工人接受符合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教育而感到奇怪了。而这种教育实在是太少了。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相比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为数不多的日校，只有少数人能去就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差的，教师是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其他不堪使用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其中多数人甚至不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具备的道德修养，并且根本不受公众监督。这里也受自由竞争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钱人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来作出判断。没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真正的工厂里，正如我们将

①1844年在英国议会通过。——编者注

要看到的，所谓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1843年的议会会议上要使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生效时，工业资产阶级倾其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坚决表示**赞成**。此外，大批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劳动，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的**夜校**几乎根本没有人去，去了也学不到东西。青年工人劳累了12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在晚上8点到10点去上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那里睡着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上百个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日学校，但是那里教师也极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经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帮助。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课时不会忘记他在上一次课上，即在一星期以前的课上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证据，委员会本身也坚决认为，无论是日校还是主日学校都远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列举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的例子，这样的愚昧无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也是没有的。但是，事情也只能如此。工人受教育，资产阶级得不到多少好处，反而会有许多可怕的方面。政府在5 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公共教育的仅为4万英镑这样一个微小的数额。假如没有各宗教教派的狂热，教育经费也许还要少得更多，而这种宗教狂热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消。但是高教会[162]成立了自己的国民学校，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它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留住本教教徒的孩子，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从其他教派那里把可怜的孩子争取过来。结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上的奥义，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激

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迷信，而一切理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却被严重地忽视了。工人不断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公共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给各教派的神职人员去管，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届内阁同意采取这类措施。这是必然的。内阁大臣是资产阶级的驯服的奴仆，而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们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否则，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教派至今还在为争夺最高的统治权而争吵，所以工人阶级就只好暂时不受教育了。不错，厂主们吹嘘他们已经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阅读了，但是所谓能阅读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就可以看出。谁认识了字母，就说他已经能阅读，于是厂主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阅读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受过长期的教育才能学会，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工人缺少知识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只有很少的工人完全会写，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连许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高教会、贵格会[163]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校里，根本不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来说是一种过分世俗的活动”。工人所受的其他教育是怎样的，从以下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些例子都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个报告可惜没有涉及真正的工厂工业领域。

格兰杰委员说：“在伯明翰，经我考试过的所有孩子，全都没有受到哪怕是一点点有益的教育。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只有**宗教课，但就是在这方面他们一般也都是极端无知。”霍恩委员说：“在伍尔弗汉普顿，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校的11岁的女孩‘从来没有听说过另一个世界，没有听说过天堂或另一种生活’。一个17岁的男孩不知道2×2等于多少，说不出两个便士合多少法寻（四分之一便士），甚至把这些钱放到他手里还是说不出来。有几个男孩从来没有听说过伦敦，甚至连威伦霍尔也没有听说过，虽然这个地方

离伍尔弗汉普顿只有一小时的路程，而且两地的交通很频繁。有些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像纳尔逊、威灵顿、波拿巴这样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连圣保罗、摩西或所罗门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对拦路抢劫者迪克·特平，特别是小偷和越狱者杰克·谢泼德的生平、活动和个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16岁的男孩不知道2×2是多少，也不知道4法寻等于多少便士；一个17岁的男孩说，10法寻就是10个半便士，还有一个17岁的男孩，对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干脆回答说，'他什么也不知道'(he was ne jedge o'nothin)。"(霍恩，《报告》附录第2部分Q.18，No. 216、217、226、233等)

这些孩子被人们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结果并没有比原来多知道一点什么。

有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五年主日学校，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亚伦等"(同上，文件q. 39页，I. 33)。另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六年主日学校，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拯救我们的救世主而流了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彼得或圣保罗"(同上，q. 36页，I. 46)。还有一个孩子"在七年之内上过好几个主日学校，只能读一些薄本书和简单的单音节的字；他听说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圣彼得或圣约翰是不是在内，以为圣约翰就是圣约翰·卫斯理(循道宗的创始人)，如此等等。"(同上，q. 34页，I. 58)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一问题，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亚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救世主的主的儿子(he was the Saviour's Lord's Son)"；而一个16岁的男孩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伦敦国王。"

在设菲尔德，该委员会委员西蒙斯让一些主日学校的学生阅读；但这些学生说不出他们读了些什么东西，也说不出使徒是些什么人，其实他们刚刚读过关于使徒的材料。在西蒙斯就使徒的问题依次问过所有孩子而得不到一个正确回答以后，一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男孩满有把握地喊道：

"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麻风病的人！"(西蒙斯，《报告》附录第1部分E22页及以下各页)

报告中提到的制陶业地区和兰开夏郡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为工人阶级的教育和培养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状况给了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的那套东西，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些东西乱七八糟搅在一起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他们却十分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什么是全民族的利益。他们也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虽然他们不会写，但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国民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废除谷物法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但是他们却因此而更加深刻地了解尘世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英国所有的学校里，道德教育是和宗教教育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然也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人们用来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简单原则，由于社会状况，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20]，本来就已经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而当这些原则和无法理解的宗教原理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横而毫无根据的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莫名其妙和格格不入。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英国资产阶级由于自私自利竟这样冷酷，这样鼠目寸光，甚至不肯花一点力气把现代道德，即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自身的保障而炮制出来的道德灌

输给工人！日益委靡、怠惰的资产阶级连为自己考虑都认为是太费力了，都好像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到那时就已经晚了。如果工人不了解这种道德，不遵从这种道德，资产阶级是不应该抱怨的。

可见工人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也遭到统治阶级的摒弃和忽视。资产阶级为工人考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向资产阶级步步进逼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法律来钳制他们；就像对待无理性的动物一样，资产阶级对工人只有**一种**教育手段，那就是皮鞭，就是残忍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威吓人的暴力。所以毫不奇怪，这些被当做牲口对待的工人，不是真的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强烈仇恨，靠着对资产阶级永不熄灭的内心愤慨才能保持合乎人性的意识和感情。只有他们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才是人；如果他们驯顺地让人把挽轭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舒适些，而不想打碎这个挽轭，那他们就真的成了牲口。

这就是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人阶级在其他方面的生活状况，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责备他们对统治阶级所抱的那种仇恨。工人在学校里得不到的道德教育，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也不会得到，——至少得不到**那种**在资产阶级心目中还有点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状况和周围环境都强烈地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几乎一切享受都与他们无缘，法律的惩罚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分得一份呢？无产者有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财产的神圣性”时，那是十分动听的，资产者听起来很入耳。

但是对没有财产的人来说，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这个世界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拿走，从而把他们变成实际的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证实了他们的无神论，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性和威力，那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穷到处境悲惨和食不果腹的时候，那就会更加促使他们蔑视一切社会秩序。这一点资产阶级自己多半也是知道的。**西蒙斯**指出[①]，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对身体一样。**艾利生**郡长也很详尽地告诉有产者，社会压迫对工人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②]。贫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哪里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人宁愿偷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当然，工人中间也有许多人道德水平高，即使走投无路也不愿去偷，而这些人就会饿死或自杀。从前自杀是上等阶级的令人羡慕的特权，现在在英国无产者中间也流行起来，许多穷人都以自杀来摆脱贫困，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摆脱贫困的方法。

但是生活状况的不稳定、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使英国工人沦为**无产者**的那种情况，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在德国，我们的小农多半也贫困，也常受物质匮乏之苦，但是他们受偶然事件支配的程度比较小，他们至少还有些固定的东西。而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支配，没有丝毫的保障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每产生一次危机，雇主每发一次脾气，都

①《手工业和手工业者》。

②《人口原理》第2卷第196、197页。

可能使他失业——，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境地。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的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至于饿死的保障；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淹没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却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洪流中的一滴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情况下的没有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短期内勉强活下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情况决定的。他或者是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旋涡底下去，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的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①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任凭命运去摆布他并企图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境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或者是认为这种斗争是无益的而放弃摆脱自己所处状况的斗争，只是力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得到一点好处。积蓄对他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他存的钱，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可能长久地保有财产，假使他有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人来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较多的工资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活一下，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宽裕一点，这使英国资产者感到惊奇并极为恼怒。要知道，如果积蓄对工人没有好处，而那些积蓄最后还是要成为蛀虫和铁锈的牺牲品，也就是被资产者所吞没，那么，工人在可能的时候去享受一下生活，而不去积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是完全

①我们以后将看到，在英国，由于有了自由结社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成为合法的了。

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方式都更使人堕落。卡莱尔关于棉纺工人所说的话，也适用于英国的一切工业工人：

"他们的生计像不停的赌博一样，今天还十分景气，明天就一蹶不振；他们的生活也很像赌徒，今天奢侈豪华，明天就忍饥挨饿。阴郁的反叛的不满情绪，一个人心中所能埋藏的最痛苦的感情，吞没了他们。英国商业，连同它的世界范围的痉挛和动荡，连同它的无可比拟的普罗特斯——蒸汽，就像魔力一样，把他们的一切生路都弄得很不可靠；冷静、坚定、长期的安宁，人类最起码的幸福，他们是没有的……　对于他们，这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满了荒唐而无谓的痛苦，充满了抗争、哀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阴森的监牢。这是上帝所创造、所统治的青葱翠绿、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创造、所统治的弥漫着硫酸烟雾、飘浮着棉絮尘埃、回响着酗酒者的喧嚷、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劳役痛苦的那个阴沉昏暗而又人声鼎沸的陀斐特[164]呢？"①

往下，第40页：

"如果说阳光下的唯一罪恶是不公正，是违背真理、违背事实、违背自然秩序，如果说世界上唯一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意识到自己遭受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那么，我们关于工人状况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种状况公正吗？首先是：他们自己对于这种状况公正与否是怎样想的呢？——他们的话语就是明确的回答，他们的行动则是更明确的回答……　反抗，反抗上等阶级的突发的复仇欲望十分强烈；对自己的世俗上司的命令越来越不尊重，对自己的教会上司的说教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切正在日益成为下等阶级的普遍情绪。对这种情绪可以加以谴责，可以给予惩罚，但是大家必须承认这一切在那里是确实存在的，必须知道这种状况是可悲的，如果不加以改变，必将带来灾难。"

就事实而论，卡莱尔讲得完全对，但是在对工人强烈憎恨上等阶级的情绪加以谴责的时候，卡莱尔就讲得不对了。实际上，这种憎恨、这种愤怒是一种证明，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非人的境地，

①《宪章运动》第34页及以下几页。

证明他们不想被人贬低为牲口，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感到如此愤怒的工人身上清楚地看到，在他们当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安分守己，得过且过，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的锁链锻造得更结实，他们还处于工业时代以前的那种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另一些人则听天由命，玩世不恭，在失去外部的稳定依托以后，又失去内心的稳定依托，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逐女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还对恶习的传播十分惊诧，其实正是他们自己造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工人颓废堕落的另一个根源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没有什么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了。工人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来说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干活？是由于本能？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长时间地、不间断地做这种单调的工作，如果他还保有一点人的性情，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在最初几个星期内感到工作是一种折磨。分工把强制劳动的这种使人动物化的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劳动部门，工人的活动都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地重复着，年年如此①。如果一个人从

①是否在这里也需要引用一下资产阶级人士的证明呢？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前引用版）第3卷第5编第1章第297页上找到。

童年起就每天有12小时或12小时以上从事制针头或锉齿轮的工作，另外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么，当他30岁的时候，还能保留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呢?这种情形在使用蒸汽动力和机器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肌肉不紧张了，工作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但也是极其单调的。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投入很大的注意力，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的一切可支配的时间，工人只有一点时间用于吃饭和睡觉，而没有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在大自然中获得一点享受，更不用说从事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又只能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这样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如果说这一切原因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大量的颓废堕落现象，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颓废堕落现象更加严重，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们正在因大城市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高唱反调的耶利米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长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原因，《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者**沃恩**博士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直接的联系。假如这些作家说，贫穷、生活无保障、过度劳动和强制劳动是主要的原因，那么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回答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禁止过度劳动的法律吧。但是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完全是自然发展起

来的，人们完全是自愿迁居到那里去的；同时现在也还没有立刻得出结论说，创造大城市的只是工业和靠工业发财的资产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很容易就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只能使那些至少已处于萌芽状态的灾难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艾利生至少还保有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认这种灾难；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工业资产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资产者和托利党人，所以真正的资产者完全看不见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们在这里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正是在大城市，恶习和寻欢作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坏人和浪子避开淳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可以发大财作为他们所冒风险的补偿。美德在这里湮没无闻，罪恶由于不易被识破而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享乐而为人所喜好。谁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贾尔斯区，走过都柏林的狭窄而拥挤的街巷，走过格拉斯哥的贫民区，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　大城市堕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难抵御这种近在眼前、每天都会遇到的恶习的引诱。有钱人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经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到处都要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享乐的诱惑……　在大城市里，想使穷人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颓废堕落的原因。"

在作了一大段关于道德的论述之后，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

"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类似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犯罪的力量，道德很难与之抗衡，特别是年轻人一般都不可能抵挡这种力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

在后面一个地方，作者写道：

“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狭小空间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和不可避免。对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水平而言，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很难责备**他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①

够了！尽管半资产者艾利生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毕竟揭露了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恶果。另外一个十足的资产者，反谷物法同盟[31]的中心人物安德鲁·**尤尔**博士②揭露了这些恶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教育工人（即教育他们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地从邪恶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忌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最好的恩人**——那些俭朴的富于进取心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教育他们才行，否则国家就要破产，其他灾祸就要发生，因为工人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集中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以更快的速度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观点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

①《人口原理》第2卷第76页及以下几页、第135页。

②《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我们以后还要提到这本著名的书。这里所引用的地方见该书第406页及以下几页。

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首先开始考虑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首先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人团体、宪章运动[150]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疾病，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疾病的真实性质和治疗的正确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大城市推动社会智慧的发展，工人决不会进步到现在的水平。此外，大城市消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痕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它使依附于某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资产阶级当然会为此感到痛惜，他们是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那种情况下，资产者几乎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资产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资产者在工资以外还对工人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看起来都出自一片纯真、乐善好施、舍己为人的仁爱之心，其实加起来还远远不到他所应尽的责任的十分之一），那么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错，作为个别资产者，在并非由他本人造成的环境中，他至少部分地尽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这个阶级正因为**处于统治地位**，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维护公众利益），他就根本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相反却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剥削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饰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势必在精神上死气沉沉，对自己的利益一无所知，成为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的时候，当他看清自己和雇主仅仅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金钱利润才产生联系的时候，当他对雇主的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表面的爱戴完全消失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

才不再在思想、感情和意志表达方面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而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爱尔兰移民，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爱尔兰移民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明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另一方面，爱尔兰移民也由此而促进了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进程和身体生病的进程是一样的；这种病症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国这个国家不会在这次最后的危机中灭亡，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以我们对于使这个病症达到顶点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爱尔兰移民在这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还由于他们把爱尔兰人的热情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阶级。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很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的开朗乐观、容易激动、热情奔放的气质和英格兰人的沉着、坚毅、富于理智的气质相融合，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假如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侠义的、很重感情的性格使英格兰工人受到感染，假如不是由于血统混合以及日常交往使英格兰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么英国资产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还会更多地存在于工人阶级中。

了解这一切之后，我们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的相近之处，都要多于它和它身边的工人的相近之处。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

的习俗和道德原则，不同的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同，好像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在大陆上，至今我们还只知道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但是，恰恰是由无产者组成的另一种人显然对英国的未来最为重要。[①]

英国工人在社团中和政治原则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上述各种原因所产生的结果，而且只谈这些结果对工人的个人性格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乞丐通常几乎只向工人乞讨，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总是比资产阶级做得多。这个随时都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教士帕金森先生也证实了。他说：

"穷人给穷人的要比富人给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们的最老、最有经验、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兹里博士的证言来证实我的话。他曾公开说过，每年穷人们相互给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期富人给予穷人的数目。"[②]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能同情那些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者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因为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而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固有的特殊的价

---

①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小说《女巫，或两种民族》中，几乎同时表述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成两种不同的民族这同一观点。"——编者注

②曼彻斯特的理·帕金森教士著的小册子《曼彻斯特等地的穷苦劳动者的现状》1841年伦敦—曼彻斯特第3版。

值，即神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拜金者”。因此，对金钱没有这种敬畏感的工人，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对事实看得清楚得多，不是戴着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一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尘世而活着，力求得到尘世上的生存权利。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不上教堂。也许只有爱尔兰人、一些老年人以及半资产者——监工、工头之类的人是例外。在群众中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完全漠视宗教的现象，最多只有一些自然神论[139]的迹象，而且这种自然神论是十分浮泛的看法，以致只表现为一些口头禅，或表现为对 infidel（不信教的人）和无神论者这类名词的模模糊糊的恐惧。一切教派的神职人员都很不受工人欢迎，虽然他们只是最近才失去在工人中的影响；现在，只要有人大叫一声“he is a parson！”（“他是个牧师！”），人们就常常会把一个神职人员从公共集会的讲坛上赶下来。同生活状况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和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原则和先入之见的束缚。资产者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偏见，头脑中充斥着别人从他年轻时起就灌输给他的原则。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对任何运动都麻木不仁。他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工人正在取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将来必定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们在

下面再谈——构成了这个阶级的性格的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也可以简略地加以概括，而且这同样是自然地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酗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指责工人的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艾利生**郡长断言，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大约有3万工人喝得烂醉（这个数字确实是不小的）；在这个城市里，1830年每12幢房子有一家小酒店，而在1840年每10幢房子就有一家；在苏格兰，1823年纳消费税的烧酒有230万加仑，而在1837年就有662万加仑；在英格兰，1823年有1 976 000加仑，而在1837年就有7 875 000加仑。[①]1830年颁布的啤酒法便利了啤酒店即所谓 Jerry-Shops 的开设，店主获准出售啤酒，to be drunk on the premises（只供店里喝），这个法令也助长了酗酒的风气，因为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有了小酒店。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几家这样的啤酒店，而在乡下，只要有两三幢房子在一起，其中必然有一家 Jerry-Shop。此外，还有很多Hush-Shops，即私设小酒店，这些小酒店没有获得专卖许可，在大城市中警察很少到的偏僻地方，有不少秘密酒坊酿造着大量的烧酒。据加斯克尔在前引书中估计，这种酿酒作坊仅在曼彻斯特就有100多家，它们的年产量至少达156 000加仑。此外，曼彻斯特有1 000多家小酒店，所以它们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至少和格拉斯哥一样大。在其他一切大城市，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我们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同那些堕落最深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牺牲品，即小偷、骗子、妓女混在一起；我们如果注意到，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这时，我们就一定会

---

①引自《人口原理》的几个地方。

承认，光顾这样的场所势必造成颓废堕落的后果。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收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酗酒者的各种粗野的表现。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少了一些吵闹罢了。钱花光了，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去，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这种当铺每个大城市都有许多，曼彻斯特有60家以上，仅索尔福德的一条街（教堂街）就有10—12家。家具、节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话）、餐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铺里赎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送回当铺去，直到出现某种偶然情况使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的手里，或者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东西付出一文钱为止。谁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行为在英国工人中间蔓延的情形，谁就会确信阿什利勋爵的断言[①]，他说，这个阶级每年花在喝酒上的钱大约2 500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可怕地摧毁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破坏一切家庭关系，那是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想象的。不错，戒酒协会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几千个"节制饮酒者"对几百万工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当爱尔兰的戒酒使徒马太神父在英国的城市巡行的时候，往往有3万到6万人"pledge"（起誓）不再喝酒，但是不出一个月，大多数人又全都忘了。例如，如果统计一下过去三四年中在曼彻斯特起过戒酒誓的人数，那么得出的数字一定比全城居民总数还要多，但是仍然看不出酗酒的现象有所减少。

①1843年2月28日在下院的演讲。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大恶习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而又没有正当地利用这种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么，这种恶习的产生就是无法改变的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必然。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放纵地沉溺于其中。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环境，那么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之风，每天晚上充斥于伦敦街头的4万个妓女[①]中，有多少人是靠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向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为此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资产者的引诱呵！因此毋庸置疑，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及不遵守社会秩序，就是不能为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少报酬和最低限度的感官享受的阶级，难道能够不狂热地、盲目地投入这些享受吗？一个自身教育无人关心、自身命运受各种偶然事件支配、自己的生活朝不保夕的阶级，又有什么理由、什么兴趣使自己具有远大的目光，过“有节制的”生活，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利益呢？况且这种将来的享乐对于这个阶级及其始终动荡、毫无保障的状况来说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社会秩序的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

---

①艾利生郡长《人口原理》第2卷。

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人阶级就一天不能避开它,如果个别的工人起来反对这个社会秩序,那么最大的灾祸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间不适于居住的、肮脏的、连晚上栖身的条件都几乎不具备的、家具破损不堪、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污浊而且又挤满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做工,也许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见面,此外,他们还经常受到烧酒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家庭生活呢?但是工人毕竟离不开家庭,他必须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这不仅对夫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在道德上起着极其恶劣的影响。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颓废风气盛行的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种环境的一部分),在无人管教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又怎能指望他们日后具有高尚的道德呢?自鸣得意的资产者向工人提出的要求真是太天真了!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产生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80°时必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工人因受到资产阶级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对待而变成像水一样缺乏意志的东西,他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个一定的点他就会丧失一切自由。因此,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

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的。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人数就如下表所示：

1805年	4 605
1810年	5 146
1815年	7 818
1820年	13 710
1825年	14 437
1830年	18 107
1835年	20 731
1840年	27 187
1841年	27 760
1842年	31 309

就是说，37年中被捕的人数增加了六倍。在1842年发生的这些拘捕事件中，仅兰开夏郡就有4 497起，即14%强，在米德尔塞克斯区（包括伦敦在内）有4 094起，即13%强。这样，我们就看到，仅仅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大城市），就占了全国犯罪数字的四分之一以上，虽然它们的人口远远不到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些犯罪统计表还直接证明，绝大部分罪犯属于无产阶级，因为在1842年的罪犯中有32.35%完全不会读不会写，有58.32%不完全会读会写，有6.77%读和写都不错，有0.22%受过较高的教育，还有2.34%的人教育程度不详。在苏格兰，犯罪数字增加得更快。在这里，1819年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人，到1837年已经有3 176人，到1842年甚至增加到4 189人。在艾利生郡长亲自写过官方报告的拉纳克郡，居民在30年中增加了一倍，而犯罪数字在五年半中就增加了一倍，比居

民的增长快五倍。罪状和所有的文明国家一样，大多数是侵犯财产，即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而发生的犯罪，因为谁也不会去偷自己已经有的东西。侵犯财产的罪行和人口总数的比例在荷兰是1:7 140，在法国是1:1 804，在英国，当加斯克尔写书的时候是1:799；侵犯人身的罪行和人口总数的比例在荷兰是1:28 904，在法国是1:17 573，在英国是1:23 395。在农业区，一般罪行和人口总数的比例是1:1 043，而在工厂区则是1:840①；现在，在全英国这个比例**几乎是**1:660②，而从加斯克尔的书出版以来，总共还不到10年！

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资产者来思考一下这种状况所引起的后果，这些事实的确已经绰绰有余了。如果堕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增长20年——如果在这20年中英国工业不像以前那样走运，犯罪的增长只会更加迅速——，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我们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会看到社会纽带全部松弛的最有说服力的事例。我从面前的一堆英国报纸中随手拿出一张，这是一张《曼彻斯特卫报》(1844年10月30日)，里面报道了三天的消息。这家报纸已经不再花力气去详细报道曼彻斯特的消息，它只报道人们最感兴趣的事件，例如：在一个工厂，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而罢工，治安法官强迫他们复了工；在索尔福德，几个男孩偷了东西，一个破产的商人想欺骗他的债权人。附近城市的消息报道得更为详细：阿什顿发生两起偷窃案、一起入室盗窃案和一起自杀案；贝里发生一起偷窃案；博尔顿发生两起偷窃案和一起偷漏消费税案；利城发生一起偷窃案；在奥尔德姆，发生了一起因工资而引起的罢工、一起偷窃案，

①《英国的工业人口》第10章。

②这是**已定罪的**犯人人数(22 733人)除以居民总数(约1 500万人)所得的数字。

几个爱尔兰女人打架斗殴，一个不是工会会员的制帽工人被工会会员殴打，一个儿子殴打母亲；罗奇代尔发生多起打架斗殴、一起袭击警察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在斯托克波特发生了一起工人对工资不满的事件、一起偷窃案、一起诈骗案、一次打架斗殴、一个男人殴打老婆事件；沃灵顿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次斗殴；威根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伦敦的报纸所报道的还要糟得多；在这里诈骗、偷窃、抢劫以及家庭纠纷一件接着一件。我手头正好有一张《泰晤士报》(1844年9月12日)，里面只登载着**一天**之内发生的事件。它报道了一起偷窃案、一起袭击警察案、一项要父亲抚养非婚生子的判决、一起父母遗弃孩子的案件和一起妻子毒死丈夫的案件。类似的报道在英国所有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取决于自私自利的打算，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最有利。没有人还想通过和平的方法来和自己的同伴达成谅解，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自卫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话，每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供自己利用的手段。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统计表所表明的，一年比一年更加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方面已渐渐划分成相互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它不过是已经包含在自由竞争中的原则的彻底实现。让我们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但他们却泰然处之，无动于衷；虽然他们每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别说没有对现在的社会状况感到愤怒，甚至也没有对这种社会状况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对每一起个别的犯

罪行为所预示的总爆发感到恐惧。可是这正好说明他们是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他们甚至连事实都看不到，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令人惊异的仅仅是，阶级偏见和先入之见竟能使整个阶级盲目到这种程度，可以说盲目到疯狂的程度。但是这个民族还是要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不管资产者是否看到这一点；而且在这种发展中，总有一天会发生有产阶级的聪明人士所梦想不到的事件，从而使这个阶级感到震惊。

工人运动

即使我没有在许多场合一一证明，大家也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这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处于这种境况，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思想、感觉和生活。因此，工人必须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必须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地位。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它的利益正是在于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想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会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随时都发现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品、当做自己的财产来对待，就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在前面已经举了上百个例子，而且还能再举出上百个例子来证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尊严。而工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管里掺入了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英国工人已经不再是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邻居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拜金者；他的内心充满了丰富的感情，他那北方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消，这种热情已经控制了他。智力教育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

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缺少这种智力教育，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一样强烈奔放。英国的民族性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整个生活状况而进行反抗，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尊严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会在这种反抗中显示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性的特点。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倾注于这一方面，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作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粗暴行为，甚至是野蛮行为，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甚至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场战争，那么，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悍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地里阴险地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并经过了不同的阶段。这里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些内容将在我以后的一部著作中加以阐述，在这里我仅限于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消耗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无益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他们的偷窃行为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袭击每一个人并以巨大的优势压倒他。况且，盗窃是一种最无教养、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仅仅由于这个原因，盗窃也决不会成为工人舆论的一般表现形式，虽然工人舆论也许会悄悄地赞同这种行为。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工业运动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遭受过这种暴力，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发生了许多反对使用机器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经过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工掀起的风潮几乎完全一样：工人捣毁了工厂，砸碎了机器。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只是零散的，它局限于一定的地区，并且仅仅针对现存关系的一个方面。只要工人达到了眼前的目的，社会权力就以全部力量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随心所欲地惩罚他们，而机器还是被采用了。工人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56]的寡头议会颁布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1824年通过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自由结社的权利**。诚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有显著的成果。例如，据西蒙斯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137页及以下几页)，在苏格兰，还在1812年就发生了由秘密联合会组织的格拉斯哥织工的总罢工。1822年又发生了罢工，在罢工中有两个因不愿加入联合会而被参加者看做本阶级叛徒的工人脸上被人泼了硫酸，结果这两个人都

成了瞎子。1818年，苏格兰矿工联合会同样也已经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些联合会都要求成员宣誓效忠和保守秘密，通常有名册、基金、簿记和地方分会。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联合会的发展。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很快就遍布全英国而变得强大起来。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成立了这样的协会（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保护各个工人使其免遭资产阶级的暴行和歧视。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照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同资本家谈判，争取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谁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通过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需求的势头，从而使工资保持高水平，并尽可能阻止厂主通过采用新机器和新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最后，用救济金来援助失业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用协会的基金来解决，或者利用证明工人身份的卡片来进行，工人带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资助他并告诉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这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们叫做流浪，而这种走四方的人就叫做流浪者。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一个主席兼秘书，并发给薪金（因为可以设想，没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样的人），同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收取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费的开支，使其符合联合会的目的。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个联合会，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有几次，人们曾试图把全英国同一行业的工人组成一个大的工会，并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1830年——试图建立一个全国工人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业都保留自己的特有的组织。但是这种联合会是维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暂时成立起来；只有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

这样的联合会诞生，并使它具有行动的能力。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支付联合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送一份请愿书（可见，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联合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按照工会的建议调整工资，这种罢工（turn-out或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雇主都拒绝这样做，那么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也并不总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联合会，有些人为了资产者所许诺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联合会，这种合法手段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常用威胁、辱骂、殴打或者其他粗暴手段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资产阶级至今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在所有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不得不自己降低工资标准，或者自己彻底解散，而在劳动需求大大增加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形成的水平。但是，对比较微小的、个别起作用的原因来说，工会是强有力的。假使厂主不会遇到工人集中的、大量的反抗，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

逐渐把工资越降越低；此外，他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工资很快就会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之间**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会为工人的反抗所扼制。每个厂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资，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竞争者所共有的条件决定的，结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无疑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他的资本在罢工期间将会闲置，机器也要生锈。至于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资也还很难说，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竞争者就会跟他学，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低，因此，他由于降低工资而得到的利润又会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之后，工会常常会使工资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快地提高。厂主所关心的，是在其他厂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现在工人自己要求提高工资，因为市场情况好转，他们往往利用厂主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原因是起不了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复工，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场上还有存货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救济的工人很多，联合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连小铺老板也拒绝高利赊购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枷锁。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们的利益——也要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降低工资，而工人把每次由市场状况决定的工资降低都看做他们的状况的恶化（他们必须尽力抵御这种恶化）；因此，大多数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人们不禁要问，工人明明知道罢工没有用处，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必须**反抗这种降低的必要性本身；因为工人必须宣布，他们是人，

不应该让他们去顺从环境，而应该让环境来适应**他们**，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意味着承认这种环境，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让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没有完全丧失人的情感，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照章记录在案，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一样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起作用的，这种抗议把资产阶级的金钱欲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活动保持生机；同时，这种抗议也促使工人意识到，要粉碎资产阶级的统治，除了成立工会和罢工，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这些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是工人**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工人之间的竞争上，即建立在由于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分裂上。正是因为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命脉（虽然其反对的方式是片面的和有局限性的），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们看得这样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定决心，不再让资产阶级剥削自己的时候，财产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国

民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结了。当然,假如工人在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作用。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整个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那么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就是说,他们根本不能这样做。有一种必要性在迫使他们不仅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彻底消灭竞争,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者更懂得,即使是有产者之间的竞争,由于会引起商业危机,也对工人造成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着手做这件事情。

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这是无须加以说明的。因此,在群情异常激愤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发生了——不论领导者是否知情——一些只能用达到绝望地步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篱的狂野的激情来解释的个别行动。属于这一类行动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泼硫酸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事件。现在我就举出几件来。1831年当工人运动高涨时,曼彻斯特附近海德的厂主,年轻的阿什顿,一天晚上在经过田野时被人枪杀了,凶手的线索一点也没有发现。毫无疑问,这是工人的报复行为。纵火和试图爆炸的事件也经常发生。1843年9月29日,星期五,有人试图炸毁**设菲尔德**霍华德街厂主派金的制锯工场。用来进行爆炸的是一根装满了炸药而且两端堵死了的铁管;损失是相当严重的。第二天,即9月30日,在**设菲尔德**附近**设尔斯-摩尔**的伊毕岑刀锉工厂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伊毕岑先生积极参加资产阶级运动,压低工资,专门雇用工贼,还利用济贫法来攫取私利(在1842年的危机时期,他把那些拒绝接受低工资的人的名字通知济贫所,说他们能够得到工作,但不愿工作,因而不应当得到救济,以此来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资),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

炸使他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所有来到出事地点的工人，都只恨“没有把工厂全部炸毁”。1843年10月6日，星期五，在**博尔顿**有人试图纵火焚烧安斯沃思—克朗普顿工厂，但没有造成损失。这已经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三次或第四次有人试图焚烧这家工厂了。1844年1月10日，星期三，在**设菲尔德**市政会会议上警官给大家看一个专门用来爆破的生铁炸弹，装有四磅炸药，有一根烧焦了但已熄灭的引线，这个炸弹是在设菲尔德市厄尔街基钦先生的工厂里发现的。1844年1月20日，星期日，在兰开夏郡的**贝里**的本特利—怀特锯木厂发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厂里的火药包引起的，损失严重。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设菲尔德**的索霍车轮工厂被人放火烧得精光。四个月内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而引起的。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我来说的。这些事实清楚地证明，在英国，甚至像在1843年年底那样的商业繁荣时期，社会战争就已经爆发并公开地进行了。然而英国资产阶级依然执迷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1838年1月3日至11日格拉斯哥陪审法庭审理的**格拉斯哥的萨格**[①]案件。从审讯中人们可以看到，1816年就在这里成立的棉纺工人联合会拥有一种少有的组织和力量。它的会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每次罢工都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基金。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厂的奖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于雇用女工贼来代替男纺工而被放火烧掉；其中有一个少女的母亲麦克弗森太太被杀死，

①这些工人被称为萨格。萨格是东印度一个著名的种族，他们以杀害一切落到他们手中的外来人为生。165

两个凶手由联合会出钱送到美国去了。1820年有一个叫麦克夸里的工贼遭到枪击而受伤，联合会付给开枪者15英镑。以后又有一个叫做格雷厄姆的也遭到枪击；开枪者得到20英镑，但被揭发，并被判处终身流放。最后，1837年5月，在奥特班克和迈尔-恩德的一些工厂里，由于罢工而发生了骚动，十来个工贼遭到殴打；同年7月，骚动还在继续，一个叫斯密斯的工贼被打死。这时委员会的成员才被逮捕和审讯。主席和主要成员被控犯有参加非法社团、对工贼使用暴力和纵火焚烧詹姆斯—弗兰西斯·伍德工厂的罪行，被判处流放7年。对这一事件我们的善良的德国人会说些什么呢？①

有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同工人有直接接触的从事制造业的那一部分人，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各种理由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理由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从一定角度来看就是错误的，而且对工人的理性不会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是：落到厂主腰包里的一切必定是从工人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

①"一种特殊的'野蛮的正义感'(wild-justice)支配着他们，驱使他们在密室中集会，以冷静的思考宣布自己的工人伙伴是自己阶级和这个阶级的事业的逃兵，把这些叛徒和逃兵判处死刑，并把他们处决，因为官方的法庭和刽子手是不干这种事的，所以由秘密的刽子手来执行，就像古代的'菲默法庭'166或骑士时代的秘密法庭突然以这种方式恢复了，并一再呈现在人们惊愕的目光下，只是现在的这些法官穿的不是铠甲，而是粗布夹克，法庭不是设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森林里，而是设在格拉斯哥铺砌得很好的盖罗盖特大街上！——虽然把自己的情感用如此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少数人，但这种情感势必广泛传播，并且有力地渗透到群众之中！"——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41页。

会至少能够把他们的雇主竞相降低工资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限制，他们也会因为通过工会能使厂主即自己的敌人受到损失这一点而参加工会。在战争中，一方的损失就是另一方的利益，由于工人和他们的厂主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高贵的君主们在彼此争斗时所做的一样。在所有资产者中，又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成了所有工会的最疯狂的敌人。他一谈到最强有力的工人派别棉纺工人的“秘密法庭”就勃然大怒，这些法庭自称能够使任何不听话的厂主束手待毙，“并从而使养活他们多年的人破产”。他还谈到一个时代，“那时工业发明家的头脑和活跃的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好一个现代的梅涅尼·阿格利巴！[167]遗憾的是，英国工人并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抚。最后，尤尔还说了下面这样一个美妙的故事。操纵走锭纺纱机的粗纺工有时滥用他们的力量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高工资并没有引起他们对厂主的感激之情和发展智力（自然是在对资产阶级无害甚至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愿望，反而常常使他们变得傲慢，使他们有钱来为罢工者的反叛精神提供支撑，而许多厂主却一个接一个地平白无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发生这类不幸的乱子时，这一带的厂主们担心被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赶出市场，就向夏普—罗伯茨公司的机器制造厂求助，请求夏普先生发挥他的发明才能，设计一台自动走锭纺纱机，以便“把生产从痛苦的奴役和毁灭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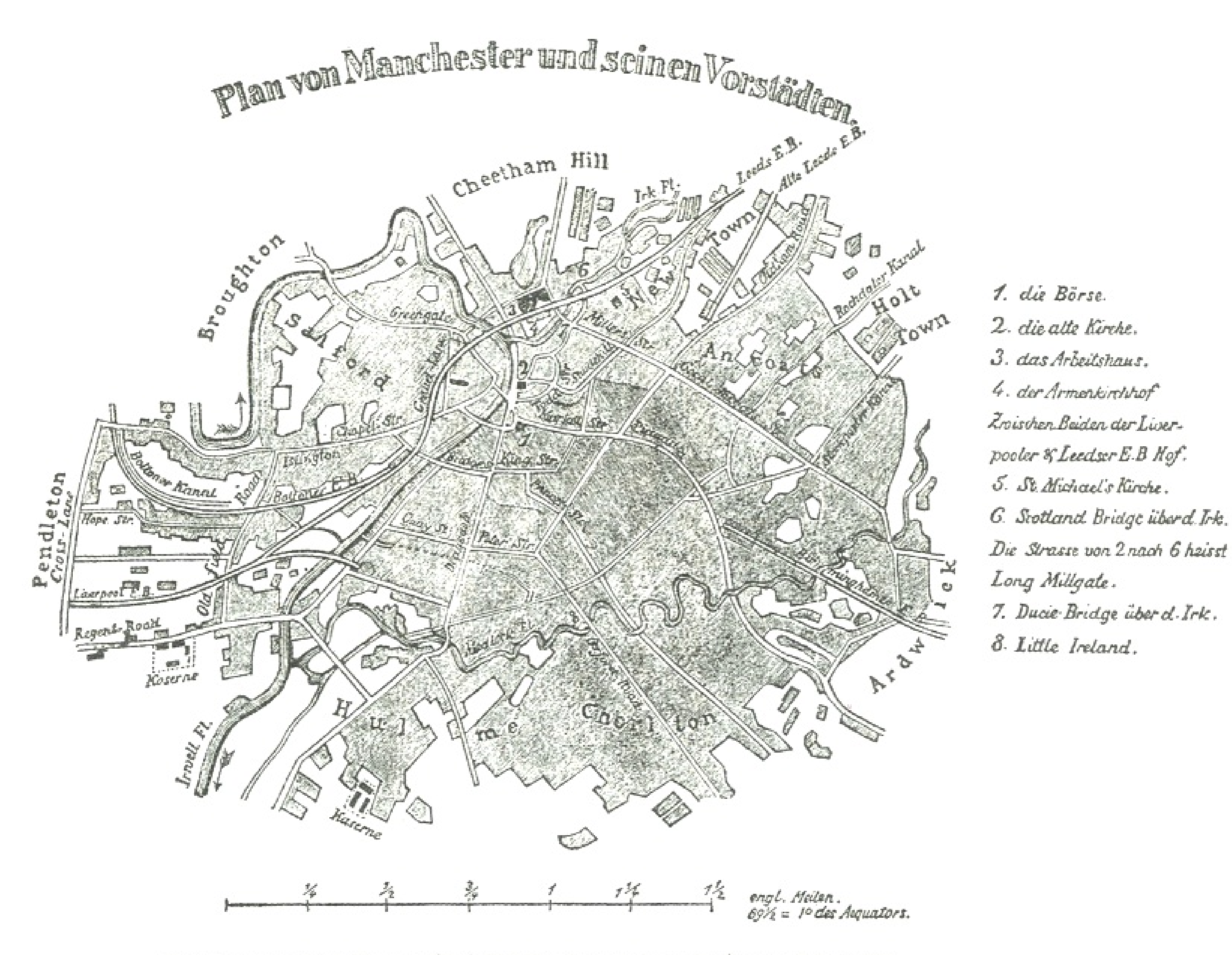
“几个月以后，一台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练工人所具有的思维能力、感觉和触觉。**这个铁人**（工人是这样叫这台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纳发的命令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的手中**跳了出来。它是这样一个创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业阶级之间的秩序，并保证英国人的工业统治权。关于这个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奇物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可以说，这个奇妙的创造物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摇篮就把无法无天的许德拉扼杀了。**”

接着尤尔又证明，同时印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机织业中浆纱工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浆纱机的诞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①这个尤尔不久前还竭力用许多篇幅来证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阿什沃思先生和其他一些人也没有放过向这些联合会发泄自己满腔愤怒的机会。这些足智多谋的资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鼓动者、阴谋家、蛊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们硬说，这些工会的拿报酬的代理人对鼓动感兴趣是因为他们靠鼓动为生；殊不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剥夺了这些人的工作，工会才认为必须向他们支付报酬！

这类罢工令人难以置信地频繁发生，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经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罢工，有时是由于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由于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由于厂主雇用工贼，有时是由于厂主拒绝废止虐待行为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由于厂主采用新机器，或由于无数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些罢工只是前哨的小冲突，有时也形成影响较大的战斗；它们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最确凿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已经迫近。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在这里为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斗争做好准备；罢工是各个劳动部门关于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翻阅一下唯一报道无产阶级一切运动的报纸《北极星报》全年合订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工业区的所有工人都已经组成联合会，并且常常用总罢工来表示自己对

①尤尔《工厂哲学》第366页及以下几页。

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军事学校，罢工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英国人那种独特的勇敢在罢工中展现出来了。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懦夫，他们不能干革命，因为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暴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完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他们同法国人一样并不安守本分，但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进行斗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以政治的方式同社会弊端作斗争的。英国人则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存在的，他们不是同政府而是直接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种斗争暂时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由于工商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贫困，1834年在里昂爆发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起义，1842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的总罢工。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更多的勇气，需要更果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一个亲身体验到什么是贫困的工人说来，能够同妻子儿女一起面对贫困，能够长达数月地忍受饥饿和匮乏，并且始终坚强刚毅、毫不动摇，这确实不是一件小事。英国工人为了不受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宁可慢慢地饿死，宁可天天看着家里的人挨饿，宁可冒着总有一天资产阶级肯定要复仇的危险，与这一切相比，威胁着法国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会看到英国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无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让步的那种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勇气概。正是在这种沉着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要经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身品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而忍受着这么多苦难的人们，也一定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权势。即使撇开上述情况不说，英国工人也已经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1842年的罢工



曼彻斯特及其郊区平面图

之所以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在资产阶级逼迫下才举行了罢工，一方面是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当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国工人已经多次证明自己是有勇气的。1839年威尔士的起义就不用说了，当我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1843年5月），那里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砖厂（波林—亨弗莱）加大了砖模的尺寸，但是没有提高工资，当然较大的砖会卖更高的价钱。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制砖工人联合会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费了很大的力气从附近地区和工贼中招到了工人，工人联合会对这些人最初使用了恐吓的办法。公司雇了12个当过兵或当过警察的人在院子里守卫，并给他们配备了枪支。由于恐吓没有产生效果，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一支排成战斗队形、第一列用火枪武装起来的制砖工人队伍袭击了工厂，工厂离步兵营房几乎不到400步。① 人们冲了进去，发现警卫后就向他们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晾晒的砖坯，抛散了垒成堆的干砖，毁坏了他们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家具，痛殴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监工的妻子。那时，警卫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们可以准确地毫无阻碍地射击。袭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砖窑前，火光照亮了他们，以致敌人的每发子弹都能命中，而他们的每一枪都不能击中目标。但是射击仍然继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他们的弹药用光并达到了这次行动的目的，把院子里一切可以毁坏的东西全部毁坏为止。这时军队开来了，制砖工人向埃克尔斯（距曼彻斯特三英里）撤退。快到埃克尔斯时，他们把队伍集合起来，按每人编组的号码点了一次

①在十字胡同和瑞琴特路拐角上，见曼彻斯特平面图。

名，然后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手中。受伤者的数量肯定很多，但是人们知道的只是那些受伤后被捕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膀中了三枪，他还是步履蹒跚地坚持走了四英里多路。这些人确实证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面对枪林弹雨毫不畏惧。1842年，一些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在封闭的集市广场被几个把住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控制住而动弹不得，这种情况决不能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当时即使国家权力即资产阶级权力的奴仆们不在场，这些群众也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只要人民在心目中有了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伯利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动用大炮来防守。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来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对他特别不利，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保护他的利益的，而最重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资产者的社会地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柱。英国资产者把法律看做自己的化身，正如他把自己的上帝看做自己的化身一样，所以他认为法律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对于他具有极大的安抚力。而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并且十分清楚地知道，法律对他来说是资产者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不是万不得已工人是不会诉诸法律的。可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有人企图袭击一个装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的警察分局。1842年罢工时，警察

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所述，只是由于工人自己没有拿定主意的缘故。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承认它的力量，所以，他们至少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54]（people's charter），它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在民主基础上改组下院。**宪章运动**[150]是反抗资产阶级的强有力的形式。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是个别的工人或个别部门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由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运动。在宪章运动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153]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的政党，它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8年以威廉·拉维特为首的全伦敦工人协会（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其中包括下列"六条"：(1)一切有健全意识和没有犯罪行为的成年男子均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为议员支付薪金，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避免资产阶级的贿买和恐吓；(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构成，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

和上院彻底毁掉。宪法中的所谓君主和贵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因为资产阶级乐于留着他们**摆摆样子**；这两者也确实是形同虚设。但是，要是下院有朝一日获得全国舆论的支持，要是它不再仅仅是表达资产阶级的意志，而是表达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贵族失掉他们头上最后的神圣光环。英国工人既不尊敬勋爵，也不尊敬女王，资产阶级虽然事实上很少听取勋爵和女王的意见，但对他们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国的宪章派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们从来不用或极少用这个字眼；尽管他们同情各国的共和党，然而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

诚然，宪章运动从1835年开始产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间开展的运动，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严格划清界限。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是他们的共同口号，他们每年共同举行“国民公会”，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党。那时，小资产阶级由于对改革法案的结果感到失望，由于1837—1839年是工商业不景气的年份，好战和好杀的情绪很高，所以宪章派的激烈鼓动很合他们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宪章派号召人民武装起来，有时甚至号召他们起义。人们制造了长矛，就像过去法国革命时代一样。1838年，一个叫斯蒂芬斯的循道宗的传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彻斯特的集会群众讲了这样的话：

“不要害怕政府的势力，不要害怕你们的压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炮；你们有比这一切都更有力量的一种手段，一种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对付的武器。这种武器是10岁的孩子也会用的。只需要几根火柴和一把蘸上沥青的干草。我要看看，当人们勇敢地使用起这种武器的时候，政府和它的几十万士兵对这

种武器究竟有什么办法!”①

但同时,工人的宪章运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出来。这位斯蒂芬斯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曼彻斯特的“圣山”克萨尔-摩尔[168]举行的20万人的大会上又讲了下面的话:

> “朋友们,宪章运动并不是有关你们获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问题,宪章运动是**饭碗问题**;宪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喝得好,工资高,工作日短。”

因此,反对新济贫法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46]的运动在那时就已经和宪章运动有了极其密切的联系。在这一期间,每次群众大会都有**托利党人**[56]奥斯特勒参加,而且除了在伯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国民请愿书,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社会状况的请愿书。1839年,鼓动还是同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当鼓动开始有点松懈的时候,伯西、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计划被人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发动起义,因此他的行动遭到了失败。北方的起义组织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行动已经失败,就及时地退却了。两个月以后,1840年1月,约克郡(例如在设菲尔德和布拉德福德)发生了几次所谓的警察叛乱(spy-outbreaks)[169],后来这种激昂的情绪逐渐平息下去。这时,资产阶级急忙实施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其结果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工人很快就明白,废除谷物法**对他们**好处很少,而对资产阶级却很有利,所以资产阶级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842年的危机爆发了。鼓动又像1839年那样活跃起来。但是

①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话对工人起了多大的作用。

这一次富有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由曼彻斯特厂主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暴力倾向。这个同盟的报刊和鼓动者使用毫不掩饰的革命语言，其原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1841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派一样，同盟现在直接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同样有所行动，这一年在国民请愿书上有350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党派过去曾经有些疏远，那么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1842年2月15日，自由党人和宪章派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党派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宣传鼓动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引起的贫困和普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这一次，由于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资产阶级甚至抛弃了他们的守法立场；他们要革命，但是要靠工人的帮助。资产阶级要让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工人为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各方面的人士重新谈起以前（1839年）就已经由宪章派提出的**“神圣月”**，即工人总罢工的想法；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发起义，但是资产阶级肯定会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7月底，商业情况开始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现在，**在行情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7月底和8月初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商业报告），斯泰利布里奇有三家公司降低了工资；至于是它们自己决定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之后才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贝利兄弟

公司却坚持下去；这家公司对前来申诉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愿接受这种办法，也许他们最好去过一段休闲的生活。这种讥讽的口吻使工人大哗，他们纷纷离开工厂，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小时，所有工厂都停工了，工人列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8月5日的事。8月8日，他们有5 000人出发到阿什顿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a fair day's wages for a fair day's work)。8月9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们**被准许入城**，并且使工厂都停了工。11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特，在这里，当他们袭击资产阶级宠爱的机构——习艺所[170]时，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博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起义很快扩展到所有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止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愿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常态**，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已经开了头，但是工人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为那些力图废除谷物法的厂主的利益而遭到枪杀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则认为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1840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是由于这些原因而失败的。假如它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自觉的工人起义，那么无疑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这些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根本没有明确目的的群众，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同时，在履行2月15日的盟约方面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的资产阶级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愿意充当他们的工具，他们离开“守法”立场的矛盾行为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危险；因此，资产阶级又回

到他们原来的守法立场，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先是由他们煽动起来，然后又被他们逼着起义的工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忠实奴仆充当了特别警察[171]——在曼彻斯特，德国商人也参加进来，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扬威、虚张声势地踱来踱去；在普雷斯顿，资产阶级下令向人民开枪，于是这个毫无目的的人民起义就一下子不仅面对政府的武装力量，而且面对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没有目的的工人逐渐散去，起义就这样结束了，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后，资产阶级还接二连三地干了一些卑鄙勾当；他们表示厌恶人民的暴力行动，力图以此来洗刷自己。这种说法和他们在春天所讲的革命词句大相径庭。他们把起义的罪责推给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其实他们自己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们极端厚颜无耻地重新站到先前承认法律神圣的立场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没有为起义做什么工作，他们只是做了资产阶级准备做的事情，即利用机会，可是他们却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判了罪，而资产阶级却没有遭到丝毫损失，在停工时期他们还卖掉了存货，获得了利益。

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宪章派过去也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甚至通过革命。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的地位来说都是危险的，他们反对使用"物质力量"，而只想通过"道义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竟把这种道义力量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看成是两回事）。这是一个争论点，但是，这个争论点事实上已经消除了，因为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值得信任）后来在口头上表示，他们也不会诉诸物质力量。第二个争论点，也是最重要的争论点，正是这一点使宪章运动表现为纯粹的宪章运动，这就是谷物法问题。关心

这个问题的是激进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以前的宪章派分裂成两派，两派的政治原则在口头上完全一致，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1843年1月的伯明翰国民公会上，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斯特奇**提议把宪章这一**名称**从宪章协会的章程中删去，据称是因为在起义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种联系已经存在了好几年，而斯特奇先生过去并没有认为必须加以反对。工人们不愿放弃这个名称，斯特奇的提案被多数票否决。这时，这位忽然变得守法的贵格会[163]会士带了少数人退出会场，组织了一个由激进资产阶级组成的“完全选举权协会”。这个不久前还是雅各宾派[172]的资产者竟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讨厌，甚至连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发笑的名称——完全选举权(complete suffrage)来代替了！工人们嘲笑了他，仍然沉着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这时起，宪章运动就成了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工人的事业。要求“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周纪事报》、《观察家》等等报刊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纸同样无精打采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总的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派，仅把解决谷物法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这个问题对英国人来说只是自由竞争的问题。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支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角色。

与此相反，宪章派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斗争。自由竞争使工人遭受极大的痛苦，引起他们的痛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即资产者成了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

会使工人遭殃。工人迄今提出的要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济贫法[34]，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宪章运动的基本内容，是直接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愿过问有关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废除谷物法的事情；他们对废除谷物法至少是抱着极端冷漠的态度，而对废除谷物法的拥护者却极端愤恨，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却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章运动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而资产者的理智却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

宪章运动的民主和迄今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宪章运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质**。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六条”就是一切，这“六条”最多还能促使人们对宪法作某些修改，但对无产者来说，这“六条”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派现在明确喊出的口号。传教士斯蒂芬斯所说的关于“饭碗问题”的话，在1838年只是对一部分宪章派是真理，但是在1845年对一切宪章派都是真理了。宪章派中间再也没有纯粹的政客了。诚然，他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地产析分(allotment-system)是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而实际上由于工业的发展，地产析分早已过时了(参看导言)；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议(保护工人利益等等)表面上看来一般都带有反动性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的措施本身必然导致重新屈服于竞争的威力，从而恢复旧状况，或者必然导致消灭竞争本身；另一方面，宪章运动目前的暧昧状况和它脱离纯粹政治党派的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正是**它所独有的特征**获得进一步发展。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

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这次危机必然紧跟在目前工业和商业繁荣状况的后面，最晚在1847年爆发①，但是也许会在明年爆发。这次危机将比过去历次危机都剧烈和尖锐得多，它将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贫困的办法。工人将实现自己的宪章，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这之前他们还要弄清许多通过宪章所能做到的事情，而他们现在对此还不很清楚。

同时，社会主义的鼓动也在继续进行。在这里，我们谈英国的**社会主义**只是就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而言。英国社会主义者要求以建立两三千人（这些人都从事工业和农业，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享受同样的教育）的“国内移民区”[173]的方法来逐渐实行财产公有，要求为离婚提供便利条件，建立理性的政府，使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取消刑罚，给犯人以理性的待遇。这就是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建议；至于他们在理论方面的原则，同我们在这里的论述并没有关系。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欧文**，他是一个工厂主，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很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以很不公平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十分温顺随和；不管现存的各种关系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这些关系有合理性，因为他们除了争取公众信任外，对改变现存关系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同时他们的原则又是如此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公众信任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颓废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含有进步成分，看不见唯利是图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

①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预言准确地实现了。”——编者注

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亡的目的[①]。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反对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愤怒这种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手段并没有什么用处，为此他们宣扬对英国的现状更加没有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个的人在内，都是立足于过去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来自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中被他们争取过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当然这一部分是最有教养的和性格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共同财富，因此，它甚至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派的立场上来。但是，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②]）那里发展起来，它不久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发展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英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比法国共产主义广泛得多，但是在发展[③]方面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时回到法国的立场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当然，到那时法国人也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最坚决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这样坚决，以致那些**不自觉地**纯粹由于实际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往往被这种表现的尖锐性所吓退。但是在这里，贫困也将迫使工人抛弃信仰，他

①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文版中，这句话的后半句为："以达到使这种变革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的地步。"——编者注

②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自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欧文主义者这一特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③"发展"一词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文版中为"理论发展"。——编者注

们会越来越认识到，这种信仰只能使他们变得软弱，使他们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对榨取他们脂膏的有产阶级俯首帖耳。

这样我们就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即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宪章派还处于很落后的状态，发展水平还很低，但他们却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比较远，提出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的融合，法国共产主义以英国方式的再现，将会在最近发生，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实现了这一点，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有利于宪章运动的继续发展。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独自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以提高文化水平。这样的设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组织里和几乎每个宪章派的组织里都有，而且在许多单个的行业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子们受到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这种设施对资产阶级是很危险的，他们已经在某些类似的设施中，即在"技术学校"[174]中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们变成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目前，这里讲授的是自然科学，这些科学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还能使他们掌握从事发明的手段，以增加资产阶级的收入。但是，自然科学**目前**对于工人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们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们常常根本看不到大自然。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国民经济学的说教；工人从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对他们来说，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里

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们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说教。工人群众自然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们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去阅读，讨论直接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关系。于是自满自足的资产阶级就说：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Dixi et salvavi]，并且不屑一顾地避开了这个“宁愿听恶意的煽动者狂暴的叫喊而不愿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阶级。而实际上工人也是重视“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这种教育不掺杂资产阶级牟取私利的伎俩。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在所有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教育机构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国民经济学问题的演讲，而且听众很多。我常常会听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谈论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比一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划时代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获得自主的教育方面已经取得多么大的成就。资产者是现存社会制度以及和这种制度相联系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惧怕、诅咒和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睁大眼睛正视这一切，兴致勃勃地而且富有成效地研究它们。在这方面，特别是社会主义者为无产阶级的教育做了许多事情，他们翻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把这些译文和英国最优秀的作品一道以普及本的形式加以传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也仅仅是在无产者中间流传。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存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

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超越边沁，向前发展。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献，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远胜过一切资产阶级文献。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还必须指出一点。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业区的工人，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兰开夏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强大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越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参加运动的也就越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越明朗。伯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了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宪章运动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工业工人都被卷入了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他们一致认为，他们是“工人”——这个头衔使他们引以自豪，并且是宪章派集会上通常的称呼——，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所谓的贵族阶级在内，因为说它是贵族阶级，说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并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者把它们二者都只看做有产阶级，即资产者。在财产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仅在于本来意义上的资产者是和工业无产者、部分地和矿业无产者打交道的，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产者也和农业短工打交道，而所谓贵族只是和一部分矿业无产者以及农业无产者有关系。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内部腐败，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不知道有别的痛苦①。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任何观点都不可能不受到污染。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家庭成员，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个人美德，在日常交往中，

①卡莱尔在他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一书中绝妙地描述了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令人作呕的贪欲，该书的一部分我已经译出，刊登在《德法年鉴》上，请读者参阅[175]。

也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是可敬的和体面的，甚至在商业方面，他们也比德国人好打交道，他们不像我们那些会打小算盘的人那样挑剔和讨价还价，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赚钱。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建筑形式，谈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状况，我说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建筑得如此糟糕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说："and yet,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money made here（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是不切实际的，都是幻想。所以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赚钱的科学就成为这些唯利是图者所喜爱的科学。他们每个人都是国民经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断言自己不是"劳动"而是人（这个人的确除了其他特性，也还具有劳动的特性）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是看做**"手"**（hands），他经常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了**现金交易**，资产者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妻子之间的联系99%也只是"现金交易"。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金钱使资产者所处的那种可怜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

(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就“有势力”(influential),而他所做的,在他那个圈子里就是举足轻重的。牟利精神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范畴来表现。需求和供应,需要和提供,supply and 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自由放任[176]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疗、教育,或许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会的统治已日趋崩溃。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自由竞争来说,最好是处在一个完全没有国家制度的状态,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比如说,就像在朋友施蒂纳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资产阶级即使为了使无产阶级就范,也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就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阶级,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他们用最卑鄙的伪善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富人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是的,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虚伪地施以小恩小惠,以使自己感到满足,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大慈善家的姿态,而你们归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似乎这样做就是造福于无产者!这种善行使施者比受者更加人格扫地;这种善行使得被蹂躏的人受到更大的欺凌,它要求那些失去人的尊严、受到社会排挤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放弃对人的尊严的要求;这种善行在大发慈悲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去乞求它的恩赐**!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所说的吧。不到一年以前,我

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封给编辑的信，编辑把这封信作为完全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评语刊登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

> 编辑先生：
>
> 近来在我们的城市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衫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未愈合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常常是极端无耻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同情。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缴过济贫税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打扰。如果城市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nuisance)。
>
> 永远忠实于您的　　**一位太太**

果不其然！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他们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打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洞穴里，不要公开暴露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脆弱的神经！你们完全可以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给医院20英镑所换取的东西！啊，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资产者的可耻的善行！“**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们”是这个样子，那么“老爷们”又该怎样呢？——人们会说，这只是个别情形。不，上面这封信正好表达了英国资产阶级中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否则编辑也不会把它刊登出来，即使登出来也会引起某种异议，而在以后几天的报纸中我没有找到这种异议。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森**教士就亲口

说过，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正直的无产者深知饥饿的滋味，对他们来说，虽然从自己少得可怜的食品中拿出一部分是一种牺牲，但他们还是乐于助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扔出来的施舍迥然不同的。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无限慈悲的样子，——但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在他们的政治学和国民经济学中就体现了这一点。五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们只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才希望废除谷物法[53]。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食价格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资，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竞争。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资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调整工资的原则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工人的需求也会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资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业工人也会找到工作，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满足英国工业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规模扩大一倍；从废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们又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因为对工业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无产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资产者直截了当地说过好多次了。但是，这些厂主们只看到废除谷物法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由于目光短浅，他们不懂得，从这种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来说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厂主彼此之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以前的水平。而他们直到现在还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

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阔佬们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31]的金库里去。但是谁都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赚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表示赞成人民宪章，以此作为他的诚意的试金石。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人的帮助，因为在宪章里他们只要求**自己**帮助**自己**的**权力**。谁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战，无论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伪装的朋友。——此外，为了争取工人，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谎言和诡计。它企图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资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企图用最荒唐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论断；而这个论断本身比出自经济学家之口的任何其他主张都更加荒唐。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向工人许诺，劳动市场需求的增加，会带来最大的幸福。他们甚至无耻地抬着两个面包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写着：**8便士一个的美国面包，工资一天4先令**，而在另一个小得多的上面写着：**8便士一个的英国面包，工资一天2先令**。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对自己的雇主认识得太清楚了。

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看一下实践就够了。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计地剥削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何自行其是地虐待工人的情形。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作为政党、甚至作为国家政权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种种情况。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漂泊流浪和露宿街头行为的法律就宣布无产阶级本身是不受法律

保护的，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重要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是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立刻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如果富人被传唤，或者更确切些说，被请到法庭上来，法官便会为打搅了这位富人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尽力使案件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给他判罪，那么法官又要为此表示极大的歉意，如此等等，判决的结果是让他交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于是资产者轻蔑地把钱往桌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唤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么他几乎总是被带到拘留所，和其他许多这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叱骂，他的辩护被一声轻蔑的“啊，我们懂得这些借口”制止，最后被处以罚款，他付不出这一笔钱，于是只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役来抵罪。即使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流浪汉（a rogue and a vagabond——这两个词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用）送去做苦役。治安法官的偏袒行为，特别在乡间，实在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而且这种行为已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是过分耸人听闻的事件都被报纸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评论地刊登出来。也不可能指望有别的做法。一方面，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来解释法律，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资产者，他们首先认为本阶级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础。和治安法官一样，警察也是这样做的。资产者无论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无产者受到犯有各种罪行的**怀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直接闯进他家里，逮捕他，粗暴地对待他。只是在工人协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无产者

说来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不得不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为了加紧奴役无产阶级，至今有产阶级还在议会里同那些尚未完全沉溺于利己主义的议员的较善良的情感进行斗争。公地一块接一块被掠夺并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农业生产，但是使无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穷人可以在那里放驴、放猪或放几只鹅，孩子们和年轻人也可以有一个玩耍和嬉戏的地方。现在这种事情越来越少了，穷人的收入减少了，年轻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馆去。议会每一会期都要通过一系列开垦公地的文件。1844年的议会会议上政府曾决定要那些垄断一切交通的铁路公司把车费降低到适合工人状况的程度（降到一便士一英里，约合五银格罗申一德里），使他们也能乘火车旅行，并为此建议各铁路线上每天开一班这样的三等列车，这时，“可敬的教父”伦敦主教却建议把星期日，即把在业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为例外；这样一来，星期日就只许富人旅行，不许穷人旅行了。但这个建议太直接，太露骨，以致无法通过，遭到否决。可是采取隐蔽方式侵犯无产阶级的行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议会会期所发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1844年那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不出名的议员迈尔斯先生提出了一个调整主仆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看来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政府赞同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给一个委员会。那时北部发生了煤矿工人的罢工，罗伯茨正带着他那些被宣判无罪的工人胜利地走遍英国。后来这个法案由委员会交回来，但里面加了几项专横到极点的条文，特别是这样一条：凡口头或书面同意替雇主做某种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绝工作或者有**其他不良行为**（misbehaviour），雇主有权把他送到任何一个（any）治安法官

那里去；法官根据雇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监工的誓言——即原告的誓言——可以判处工人两个月以下的监禁或劳役。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怒，特别是因为这时议会正在讨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而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鼓动。工人们开了几百次会，给无产阶级在伦敦议会里的辩护人托马斯·**邓库姆**送去了几百份请愿书。除"青年英国"[177]的代表费伦德外，邓库姆是唯一的有力的反对者。当其他的激进派看到人民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一个跟一个地悄悄向邓库姆靠拢，连自由资产阶级面对工人的激愤也没有勇气表示赞成这个法案，在人民面前，根本没有一个人特别热衷于支持这个法案，于是这个法案便彻底破产了。

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30]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现在我们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匮乏、贫困、穷苦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从而分为不同的阶级，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这些阶级中有的比较富裕、受过教育、有道德，而另一些阶级则比较穷苦、贫困、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得出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由于他们的竞争而降低。济贫机构给穷人工作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得到消费，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所以济贫机构经营的事业是在损害私人产业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限制过剩人口。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

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补充说，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为他在出生前没有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纳他”①。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是完全自然的，因为这种理论对他们来说是最舒适的卧榻，而且对现存关系来说有许多方面是适合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么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多余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这一点，然而目前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无产者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所以无产者只得听凭法律宣布他们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从新济贫法中就可以看出。以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四十三年)法案为基础的旧济贫法[178]还天真地以照顾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这样的原则为出发点。谁没有工作，谁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做权利来要求，而不是当做恩惠，这对资产阶级来说终究是非常令人不快的。1833年，当资产阶级通过选举法改革法案取得政权，而农业区的贫困又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贫法。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法实施机构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许多滥

①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826年伦敦第6版。——编者注

用救济的事实。人们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了贫民，他们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贫金过活，因为穷人在工资低的时候从济贫金中得到补助；人们发现，这个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能够抚养自己的孩子，并承认穷人是完全需要保护的；人们发现，这个制度使国家破产，

> "它阻碍工业发展，鼓励轻率结婚，刺激人口增长，抵消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诚实的人沮丧，使懒惰、放荡和轻浮的人受到保护；它破坏家庭的纽带，不断阻碍资本的积累，使现存的资本瓦解，并使纳税人破产；此外，它给私生子的抚育费无疑是在为私生子发奖金"（摘自济贫法委员会委员的报告）①。

这一段对旧济贫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励懒惰，促进"过剩"人口的增长。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然不得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状况都一样，那么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结论说，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糕透顶的；而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认为应当根据惩戒理论，把贫穷当做犯罪来对待。

但是这些聪明的马尔萨斯信徒们却那样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无误的，以致毫不犹豫地把穷人放到他们的意见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去，按照这种意见极其残酷地对待穷人。他们和马尔萨斯及其他拥护自由竞争的人们都深信，最好是让每个人自己管自己，彻底实行自由放任[176]的原则，他们最希望把济贫法全部废除。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权威来这样做，他们就提出一个尽可能符合马尔萨斯观点的济贫法。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自由放任的

①《济贫法委员会委员所获得的情报资料摘要》1833年伦敦官方版。

原则还要残忍，因为这个原则只是消极地起作用，而济贫法则是积极地起作用。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把贫穷，更确切地说，把失业称为过剩，宣布这是犯罪，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这种犯罪。诚然，委员们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让人活活地饿死甚至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看来也有点太可怕了。他们说，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是**生存的权利；然而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也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你们是国家的祸害，即使我们不能像消灭其他任何祸害一样立刻把你们消灭掉，你们自己也应当感觉到自己是祸害，至少必须把你们控制起来，使你们不可能直接生产出其他“多余的人”，也不可能通过引诱他人走上懒惰和失业之路而间接生产出“多余的人”。你们可以活着，但是，你们活着只是为了对所有那些也有可能成为多余者的人起警示作用。

于是他们提出了新的济贫法，这个法律在1834年由议会通过，直到今天还有效。一切现金或生活资料的救济都取消了；只保留一种救济方式，即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170]里去。这种习艺所(work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济贫法巴士底狱”(poor-law bastiles)的设施，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决定请求救济以前自己先尽到最大的努力，马尔萨斯的信徒挖空心思把习艺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居留地。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就业的工人吃的还要差，而工作却更繁重；否则工人会情愿住习艺所，而不愿在外面过那种可怜的生活。住习艺所的人很少见到肉，特别是鲜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差的面包和燕麦粥，很少有啤酒，或者根本没有。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实际上

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不能吃饭；想外出须事先请假，准与不准要看他的表现或者监管人对他的意见；抽烟是禁止的；也不准接受所外亲戚朋友馈送的东西。这些穷人穿着习艺所的制服，完全听从监管人的摆布。为了使他们的劳动不致同私人产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几乎没有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出“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紧张地工作一天所能砸出的那样多”；女人、小孩和老头拆旧船索，这种工作有什么微不足道的用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道德败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们只有在一定的时间才能见面，次数很少，而且只有当督察人员认为他们很规矩的时候才被允许见面。为了使这些巴士底狱中的贫穷传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绝，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督察人员的许可才能在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督察人员的监视或许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无论如何，食物应当是卫生的，待遇应当是人道的。但是，法律的精神太明确了，要实现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如果认为可以实行原则而避免后果，那就错了。新的法律条文规定的待遇是和整个法律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实质上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丧失人类尊严的、讨厌的、令人憎恶的对象，那么，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无济于事。实际上人们并不是按照法律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精神来对付穷人的。这里举几个例子。

1843年夏天，在**格林尼治**的习艺所里，一个五岁的男孩被罚三夜关在停尸房中，他只好睡在棺材盖上。——在**赫恩**的习艺所里，一个小女孩因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样的惩罚。这种惩罚方法显然是经

常采用的。这个习艺所位于肯特的一个最美丽的地区，但是有一个特点，这里所有的窗子都向院内开，直到不久前才开了两个向外的窗子，使住习艺所的人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个记者在《彩色杂志》上描述了这件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话结束的：

"如果上帝惩罚人的罪过，就像人们惩罚人的贫穷一样，那么，亚当的子孙们该是多么可怜啊！"

1843年11月，莱斯特有一个人刚从**考文垂**习艺所放出来两天就死了。这个习艺所对待穷人的详细情况令人气愤。这个人叫乔治·罗布森，他的肩部受了伤，但根本没有得到治疗。他被派去压抽水机，只能用那只健康的胳膊来工作。他吃的是习艺所的普通伙食，由于伤口得不到护理而引起身体虚弱，所以他消化不了这种食物。自然，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越诉苦，受到的待遇就越残酷。罗布森的妻子也住在习艺所，她想把自己的一点啤酒拿给丈夫，竟挨了一顿骂，并且被迫当着女看管的面把它喝光。罗布森病了，但是就在这时也没有对他好一点。最后，根据他的请求，他和妻子在辱骂声中一起被放出来。两天后，罗布森就在莱斯特死去，据验尸的医生说，他是因伤口未得到护理和身体衰弱无法消化食物而致死的。当他离开习艺所的时候，别人才交给他几封附有汇款的信，这些信已在习艺所压了六个星期，并且按照习艺所的规矩，已被监管人拆开过了！——在**伯明翰**习艺所发生了非常可耻的事件，当局最终在1843年12月派了一个官员去调查这件事。他查明，有四个流浪者（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这个名词）①被剥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闭室

①见本卷第451页。——编者注

(blackhole)里；他们在这里已经被拘留了八到十天，他们常常挨饿，每天在中午以前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当时是最寒冷的季节。有一个小男孩在这个习艺所被关过各种各样的禁闭，先是被关在一间又潮湿又狭小的拱形的储藏室里，后来有两次被关在禁闭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闭室里关了同样长的时间，最后被送到流浪者禁闭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脏又臭又狭小的洞穴，这位官员去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两个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缩成一团的男孩，他们关在那里已经有四天了。在禁闭室里常常被塞进七个流浪者，而在流浪者禁闭室里则往往塞进20人之多。女人也经常因不愿上教堂而被关在禁闭室里。有一个女人甚至在流浪者禁闭室中被关了四天，天晓得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药的时候发生的！还有一个女人虽然神志完全清醒，却受到了送进疯人院的惩罚。——1844年1月在萨福克郡的**拜克顿**习艺所也进行了一次这样的调查，发现一个痴呆女人在这里当看护，她对待病人的手段极其荒唐；为了使女看护们免去夜里值班的辛劳，她竟用绳子把那些常常在夜里不安静或者起床的病人捆在床上；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捆着死掉的。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的缝制廉价衬衣的习艺所里，一个患癫痫病的男人在发病的时候闷死在床上，谁也没有去搭救他。在这个习艺所里，一张床上睡四到六个有时甚至八个孩子。——在伦敦的**邵尔底治**习艺所，一个男人和一个发高烧的病人挤在一张床上睡了一夜，而且床上还爬满了虫子。——在伦敦的**贝斯纳尔格林**习艺所，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妇女和她的不满两岁的孩子从1844年2月28日到3月20日一直被锁在会客室里，而不允许她们住进习艺所，这间会客室里既没有床，也没有地方大小便。她的丈夫被带进了习艺所，当他请求把他的妻子放出来时，

习艺所竟认为他行为鲁莽而把他关了24小时禁闭，只给他一点水和面包。——1844年9月，在温莎附近的**斯劳**习艺所有一个人快要死了，病人的妻子到那里去探望，她在夜里12点到达目的地后，急忙赶到了习艺所，但是不让她进去。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被允许和自己的丈夫见面，那也只有半小时时间，而且还有女看管在场；以后几次会面这个女看管也都在场，半小时一到就催她走。——在兰开夏郡的**米德尔顿**习艺所，一间屋子睡12个人，有时甚至睡18个人，男女都有。这个机构不受新济贫法约束，而受以前的特别济贫法（吉伯特法）约束。监管人在这个习艺所里私人开设了一个啤酒厂。——1844年7月31日，在**斯托克波特**有一个72岁的老头被人从习艺所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原因是他拒绝砸石子，说自己年纪太大，膝盖弯不过来，干不了这种工作。他请求给他安排一种适合他体力的工作，但是白费口舌，他被判处两个星期的苦役。——1844年2月，在**巴斯弗德**习艺所，一个检查官发现住在那里的人的床单已有13个星期没有换，衬衣有四个星期没有换，袜子有两个月到10个月没有换，因而45个男孩子中只有三个还穿着袜子，所有的人的衬衣都是破破烂烂的。床上爬满了虫子，食具在尿桶中洗涤。——**伦敦西区**的习艺所有一个患梅毒的看门人，他把病传染给了四个女孩子，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另一个看门人从一间屋子里带出一个聋哑女孩，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没有被开除。

对待活人是这样，对待死人也是如此。穷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样草草了事。在伦敦，**圣布莱德**穷人公墓是一块光秃秃的泥泞地，它从查理二世以来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堆满了白骨。每星期三，把死掉的穷人扔到一个14英尺深的坑里，神父匆忙地祈祷，人们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层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开，直到尸体填满不能再往

里扔的时候为止。从这里散发的尸体腐烂的臭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都污染了。——在**曼彻斯特**，穷人公墓位于艾尔克河畔，和旧城相对；这也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约两年以前一条新修的铁路经过这里。假如这是有身份的人的墓地，那么，资产阶级和牧师们会怎样对这种亵渎行为大嚷大叫啊！但这是穷人公墓，是穷人和多余的人安息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毫不介意了。人们甚至不肯费点力气把没有完全烂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另一边去。哪里修路方便，就把那里的坟挖开，木桩打入新坟，充满了腐败物的水从烂泥中冒出来，使附近一带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这里发生的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备详细描述了。

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到这些巴士底狱去，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看到过五份关于真正饿死人的材料，在他们死去的前几天，济贫机构除了让他们进习艺所外，不给任何救济，而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到这个地狱里去。从这方面来说，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习艺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加激起了工人阶级对有产阶级的仇恨，而大部分有产者则因新济贫法而欣喜若狂。从纽卡斯尔到多佛尔，这个新法律引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怒的呼声。资产阶级在这个法律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理解自己对无产阶级的义务的，这一点连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明白。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直截了当、这样露骨地宣称，没有财产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供有产者剥削，当有产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应当饿死。正因为如此，新济贫法也大大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因为这个法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将有利于农村地区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我再补充一点，**爱尔兰**从1838年起也有一个类似的济贫法，它

为8万贫民设立了同样的收容所。在那里，这个法律也同样激起了人们的憎恨，假如它在爱尔兰能够产生像在英格兰那样的重大影响，它将会引起更强烈的憎恨。但是，在一个拥有250万无产者的国家里有8万无产者受到恶劣的待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格兰除了某些地方，根本没有济贫法。

我希望在描述过新济贫法及其后果以后，大家不会认为我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评过于苛刻。在这个社会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政权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愿望，表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的那些卑鄙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只能归咎于个别人的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派别，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1844年的议会辩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自由党颁布了新济贫法；以首相皮尔为首的保守党为它辩护，只是在1844年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中对它作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颁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贵的贵族们则两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们当人对待。我们确信，不列颠帝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①]

---

①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差别，这些派别和政党只具有历史的和理论的意义。因此，我也只能顺便提到少数几个例外的、值得尊敬的资产阶级成员。这些人有的是比较坚决的激进派，他们几乎就是宪章派，例如，下院议员阿什顿的欣德利厂主和托德莫登（兰开夏郡）的菲尔登厂主，此外还有托利党人慈善家，他们不久以前组织了一个叫做‘**青年英国**’的团体，其中有议会议员迪斯累里、博思威克、费伦德、约翰·曼纳斯勋爵等等。阿什利勋爵也和他们关系密切。‘青年英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我在21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亲眼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所了解到的。我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明确表示，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无法忍受；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1833年加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难以避免。1838年卡莱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运动和工人的革命情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179]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款待自己。1844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

“如果想使欧洲，至少是使英国还能够长期适于居住的话”。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1844年6月直截了当地写道：

国'的目的是恢复昔日'美好的英国'以及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浪漫的封建主义；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但是这些人怀着善良的心愿，勇敢地起来反对现存制度，反对流行的种种偏见，有勇气承认现存制度下的卑鄙行为，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半德国人半英国人**托马斯·卡莱尔**是十分独特的，他最初是托利党人，后来比上面谈到的那些人都进步得多。在所有的英国资产者中，他最深刻地了解社会混乱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劳动组织起来。我希望已经找到正确道路的卡莱尔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以自己和其他许多德国人的名义向他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在1892年德文版上，恩格斯在原注文之后又加了一段话：“但是二月革命使卡莱尔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不再向市侩们发出正义的愤怒，却对那把他抛到岸上的历史巨浪发出狠毒的市侩的怨言。”——编者注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威慑行动的战斗号召，它可能再一次响彻我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英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吧。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废除了谷物法(几年后必然会废除)，外国的工业，首先是美国的工业，也能够经受住英国的竞争。目前德国的工业正在加紧发展，美国的工业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美国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有巨量的煤铁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别是有坚毅而勤劳的居民，和他们比起来，英国人就是一群反应迟钝的懒虫；美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行销了。其他工业部门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说有一个国家能够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那么这就是美国。如果英国工业就这样被打垮(如果当前的社会状况不改变，这种事情必然要在最近20年内发生)，那么无产阶级的多数将永远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饿死，或者革命。英国资产阶级考虑到这种前途了吗?恰恰相反，他们最宠爱的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从自己的书房里教导他们说，根本不用考虑美国这样一个还没有足够人口的年轻国家也能够顺利地从事工业活动，更不用说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竞争了。如果美国人想这样尝试的话，那他们就是发疯，因为这样做只会赔钱。最好还是让他们仍然去从事农业吧，等他们把全国的土地都开垦了，他们顺利地从事工业的日子或许会到来。——聪明的经济学家这样说，整个资产阶级随声附和，可是美国人却正在把市场一个一个地抢走，而且不久以前一个大胆的美国投机者甚至把一批美国货运到**英国**来，在这里再作

为出口货抛售出去！

但是，即使英国保住了工业的垄断权，即使它的工厂的数目会继续增加，结果又将怎样呢？商业危机依然存在，它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严重，日益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使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百万富翁，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阶段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权力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

然而事情很可能并不沿着这两条道路发展。商业危机（它是促进无产阶级独立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加上外国的竞争和小资产阶级的日益破产将加速事件的进程。我不相信人民会安然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机。1846年或1847年行将到来的下一次危机，很可能会促成谷物法的废除和宪章的通过。宪章将引起什么样的革命运动，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到了再下一次危机（按过去的危机类推，那次危机应当在1852年或1853年到来，虽然它的到来可能因谷物法的废除而推迟，或因外国的竞争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国人民必然会对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忍受剥削或在资本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去饿死这样的事情感到深恶痛绝。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还不变得清醒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他们绝不可能变得清醒），那么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会像斯蒂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点燃烈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1793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迄今发生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即使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即使资产阶级普遍有了改进，也都无济于事。

要知道，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即使可以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中庸的程度；那些较坚决地归附于工人的资产者会形成新的吉伦特派[46]，这一派别将在暴力发展的过程中灭亡。整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以上得出的这些结论都是确凿无疑的，因为这些结论的前提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本性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清楚这样明显的发展。革命**必然**到来，要找到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已经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进行得比上面预言的温和些。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越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就越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而不承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要消除这种敌对。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关系中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把责任归于个别人这一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越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越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为现在这样的暴力行动，那将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措施中野蛮和粗暴行为也就越少。假如能够在斗争爆发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么斗争就会很和

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太晚了。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发以前，至少也应当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十分清楚的了解，从而使共产党能够借助于各种事件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并防止热月九日的重演。无论如何，法国人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用的，况且，现在宪章运动的多数领袖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超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运动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去寻找）所赞同。

如果这些结论在这里还显得根据不够充分，那么我希望在别的地方还会有机会来证明，这些结论是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坚定地认为：现在已经个别地、间接地进行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普遍的、全面的和直接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正在汇集成大规模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引起山崩地裂。那时全国都将会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防备措施就太晚了。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

1845年5月在莱比锡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0]

1. 关于费尔巴哈①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

①马克思1845年的稿本。——编者注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181]的问题。

三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七

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11]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翻译

马克思论费尔巴哈[1]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

①恩格斯1888年发表的稿本。——编者注

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

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2）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七

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

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中的单个人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

第一次作为附录发表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版单行本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182]

（节　选）



第一卷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

序 言

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枷锁下日渐委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一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臆想，另一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批判地对待这些臆想，还有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从头脑里抛掉这些臆想，这样——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①

这些天真的幼稚的空想构成现代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核心。在德国不仅是公众怀着畏惧和虔敬的心情来接受这种哲学，而且**哲学英雄们**自己在抬出这种哲学的时候，也一本正经地觉得它有颠覆世界的危险性和不怕被治罪的坚决性。本书第一卷的目的就是要揭露

---

①这里提到的三个人是指：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麦·施蒂纳。——编者注

这些自以为是狼、也被人看成是狼的绵羊,指出他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而这些哲学宣讲者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耽于幻想、精神委靡的德国民众口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

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各种统计给他提供大量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新证据。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①

---

①手稿中删去以下几段话:"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的物质世界的奥秘。

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在他看来,不仅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他并不满足于记述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活动。

从自己的幻想世界中被唤醒的德国哲学家们反抗思想世界。他们把关于现实的东西、有形的东西的观念同思想世界……

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日,但今后不应继续存在。他们彼此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想用什么方法来拯救在他们看来还在自己的固定思想的威力下呻吟的人类;他们彼此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什么东西宣布为固定思想。他们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相信这种思想的统治;他们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相信他们的批判的思想活动一定会使现存的东西灭亡,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或者认为有他们的孤立的思想活动就已足够,或者希望争得共同的意识。

第一卷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

相信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相信观念世界……

德国哲学家们在他们的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迷失了方向，他们反对思想、观念、想法的统治，而按照他们的观点，即按照**黑格尔的幻想**，思想、观念、想法一直是产生、规定和支配现实世界的。他们表示反抗并停止……

按照黑格尔体系，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他的叛逆的门徒从他那里接受了这一点……"——编者注

第一章
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I]

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①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183]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王国产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狄

①"意识形态家"原文为Ideologe,过去曾译"思想家"、"玄想家"。Ideologe一词是由Ideologie(意识形态)派生出来的。为了保持这两个词译法的一致性,现将"思想家"、"玄想家"改为"意识形态家"。当时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颠倒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以纯思想批判代替反对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哲学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把鼓吹这种哲学的人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编者注

亚多希[184]的斗争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在1842—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

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

然而，不管怎么样，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在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熄灭之后，这具残骸①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那些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扑向这种新的化合物。每个人都不辞劳苦地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份。竞争不可避免。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并且循规蹈矩。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生意都因搞批量的和虚假的生产，因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竞争变成了激烈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现在却被吹嘘和构想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一种产生了十分重大的结果和成就的因素。

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狭隘性、地域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②

---

①原文是caput mortum，原意为“骷髅”；在化学中，是指蒸馏过程结束后的残留物。——编者注

②手稿中删去以下一段话：“因此，我们在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先提出一些有关德国哲学和整个意识形态的一般意见，这些

一 费尔巴哈

A.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经超越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①，但是后来却用一些比较世俗的名称如"类"、"唯一者"、"人"②等等，使这些范畴世俗化。

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③。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至于什么是

意见要进一步揭示所有代表人物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这些意见将充分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们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编者注

①大·施特劳斯和布·鲍威尔使用的基本范畴。——编者注

②路·费尔巴哈和麦·施蒂纳使用的基本范畴。——编者注

③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这种批判自以为是使世界消除一切灾难的绝对救世主。宗教总是被看做和解释成这些哲学家们所厌恶的一切关系的终极

宗教意识,什么是宗教观念,他们后来下的定义各有不同。其进步在于:所谓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其他观念也被归入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的领域;还在于: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被宣布为宗教意识或神学意识,而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总而言之,**"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到处涉及的都只是教义和对教义的信仰。世界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内被圣化了,直到最后可尊敬的圣麦克斯[①]完全把它宣布为圣物,从而一劳永逸地把它葬送为止。

老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把一切都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则硬说一切都包含宗教观念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由此来**批判**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另一派则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而加以赞扬。

既然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总之,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就像老年黑格尔派把它们看做是人类社会的真正镣铐一样,那么不言而喻,青年黑格尔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设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

原因,他们的主要敌人。"——编者注

①指麦·施蒂纳(约·卡·施米特的笔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用其他绰号称呼他,例如,称他为"圣桑乔"、"圣者"、"教父"、"乡下佬雅各"等等。——编者注

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①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185]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至于他们的全部其他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修饰他们的要求：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

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

1. 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

A. ②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

---

①指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所说的意识。——编者注

②手稿中删去以下一段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
《费尔巴哈》中的一页手稿

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②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

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编者注

①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编者注

②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但是，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编者注

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186]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

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187]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在人们靠耕作为生的情况下，这种所有制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首先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动产私有制以及后来的不动产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但它们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公民仅仅共同拥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隶的权力，因此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约束。这是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他们面对着奴隶不得不保存这种自然形成的联合方式。因此，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民权力，随着私有制，特别是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趋向衰落。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已经产生，后来，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出现了。在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

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这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关系，这些关系

我们在考察现代私有制时还会遇见，不过规模更为巨大而已。一方面是私有财产的集中，这种集中在罗马很早就开始了（李奇尼乌斯土地法[188]就是证明），从内战[189]发生以来，尤其是在帝政时期，发展得非常迅速；另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平民小农向无产阶级的转化，然而，后者由于处于有产者公民和奴隶之间的中间地位，并未获得独立的发展。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地旷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也没有使人口大量增加，——这种情况决定了起点有这样的变化。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中开始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蹶不振，商业停滞或被迫中断，城乡居民减少了。这些情况以及受其制约的进行征服的组织方式，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190]的影响下，发展了封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随着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也产生了与城市对立的现象。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武装扈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这种封建结构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一样，是一种联合，其目的在于对付被统治的生产者阶级；只是联合的形式和对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有所不同，因为出现了不同的生产条件。

在**城市**中与这种土地占有的封建结构相适应的是同业公会所

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在这里财产主要在于个人的劳动。联合起来反对成群搭伙的掠夺成性的贵族的必要性，在实业家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对公共商场的需要，流入当时繁华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的加剧，全国的封建结构，——所有这一切产生了**行会**；个别手工业者逐渐积蓄起少量资本，而且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他们的人数没有什么变动，这就使得帮工制度和学徒制度发展起来，而这种制度在城市里产生了一种和农村等级制相似的等级制。

这样，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等级结构固然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在农业中，分工因土地的小块耕作而受到阻碍，与这种耕作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工业中，各手工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也是非常少的。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而在比较新的城市中，只是在后来当这些城市彼此发生了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分工才发展起来。

比较广大的地区联合为封建王国，无论对于土地贵族或城市来说，都是一种需要。因此，统治阶级的组织即贵族的组织到处都在君主的领导之下。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

的个人[1]，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3]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

---

①手稿的最初方案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一定的个人"。——编者注

②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自身的状况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相反的假设，只有在除了现实的、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的精神以外还假定有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编者注

③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而且人们是受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编者注

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ß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ß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

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实例来加以说明。

[II]

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①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1]；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2]其次，还要根据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正如同清除宗教的和神学的无稽之谈一样，而且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再次清除这些无稽之谈。[3]当然，在像德国这样一个具有微不足道的历史发展的国家里，这些思想发展，这些被捧上了天的、毫无作用的卑微琐事弥补了历史发展的不足，它们已经根深蒂固，必须同它们进行斗争。[4]但这是具有地域性意义的斗争。

[……][5]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做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费尔巴哈对感性世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人。唯一者。个人。——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编者注

②此处手稿缺损。——编者注

③马克思加了边注：“词句和现实的运动”。——编者注

④马克思加了边注：“词句对德国的意义”。——编者注

⑤这里缺五页手稿。——编者注

⑥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191]“**人**”实际上是“德国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①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②

此外，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

---

①恩格斯加了边注：“注意：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编者注

②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要问题(或者如布鲁诺在第110页上[①]所说的"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神秘莫测的崇高功业"[②]的问题。然而,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分配、不同社会阶级的划分,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这样一来,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100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只能发现罗马富豪的葡萄园和别墅。[③]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

---

①布·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编者注

②歌德《浮士德》的《天上序幕》。——编者注

③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做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诚然，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①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②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非常明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②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显了。①

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②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③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④，它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未拥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

---

①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谈论历史，只是因为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说教有术的'圣布鲁诺就是一个出色的例子。"——编者注

②马克思加了边注："**历史**"。——编者注

③马克思加了边注："**黑格尔**。地质、水文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编者注

④指布·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的观点。——编者注

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从这里立即可以明白，德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是谁的精神产物。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他们却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解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上万的假说。

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这时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材料来考察和阐明家庭，而不应该像通常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此外，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做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使德国人能够明白，把它们看做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

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这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感性确定性"；而在莱茵河彼岸之所以不可能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是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

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①]。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②]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编者注

②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编者注

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①]；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②]。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编者注

②马克思加了边注：“与此同时出现的是意识形态家、僧侣的最初形式”。——编者注

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能不是因为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①]出现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既然这个矛盾似乎只表现为民族意识范围内的矛盾，那么在这个民族看来，斗争也就限于这种民族废物，因为这个民族就是废物本身。但是，意识本身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②]、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此外，不言而喻，"幽灵"、"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观念上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③]

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

---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宗教。具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德国人**"。——编者注

②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活动和思维，即没有思想的活动和没有活动的思想。"——编者注

③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这种关于现存的经济界限的观念上的表现，不是纯粹理论上的，而且在实践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就是说，使自己自由存在的并且同现存的生产方式相矛盾的意识，不是仅仅构成宗教和哲学，而且也构成国家。"——编者注

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德国的理论家们对此一窍不通，尽管在《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过这一点）。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

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

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另一方面，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

最后，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

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

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此外，许许多多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大量的劳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从而由于竞争，他们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他们陷于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否则，例如财产一般怎么能够具有某种历史，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地产怎么能够像今天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那样，根据现有的不同前提而发展呢？——在法国，从小块经营发展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在英国，则是从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发展到小块经营。至于贸易——它终究不过是不同个人和不同国家的产品交换——又怎么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而统治全世界呢？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关系就像古典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但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

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1]。前面的叙述已经表明，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的叙述中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192]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

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①

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

---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交往和生产力"。——编者注

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193]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①。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关于意识的生产**"。——编者注

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这种观点仍然可以用思辨的、观念的方式,也就是用幻想的方式解释为“类的自我产生”(“作为主体的社会”),从而把所有前后相继、彼此相联的个人想象为从事自我产生这种神秘活动的唯一的个人。这里很明显,尽管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但是他们既不像圣布鲁诺胡说的那样,也不像“唯一者”、“被创造的”人那样创造自己本身。

最后,我们从上面所阐述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1)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2)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①;(3)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这些人所关心的是维持现在的生产状况”。——编者注

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①，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②

---

①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消灭在……统治下活动的现代形式"。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消灭劳动"，是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下的异化劳动。关于这种说法的含义，并见本卷第570—573、579—582页。关于异化劳动，可参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编者注

②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至于谈到革命的这种必要性，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不论是法国的、英国的或德国的，早就一致同意了，而圣布鲁诺却继续心安理得地幻想，认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所以取代'唯灵论的地位'(唯灵论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只是为了赢得崇敬。他继续幻想：那时候'灵魂将得救，人间将成为天国，天国将成为人间。'(神学家总是念念不忘天国)'那时候欢乐和幸福将要永世高奏天国的和谐曲'(第140页)[194]。当末日审判——这一切都要在这一天发生，燃烧着的城市火光在天空的映照将是这一天的朝霞——突然来临的时候，当耳边响起由这种'天国的和谐曲'传出的有炮声为之伴奏、有断头台为之击节的《马赛曲》和《卡马尼奥拉曲》旋律的时候；当卑贱的'群众'高唱着ça ira, ça ira并把'自我意识'吊在路灯柱上[195]的时候，我们这位神圣的教父将会大吃一惊。圣布鲁诺毫无根据地为自己描绘了一幅'永世欢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①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②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③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

乐和幸福'的振奋人心的图画。'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的追随者'对这种'欢乐和幸福'似乎有独特的想法，他们在谈到革命的时候，强调的是与'天国的和谐曲'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没有兴致来事先构想圣布鲁诺在末日审判这一天的行为。至于应当把进行革命的无产者了解为反抗自我意识的'实体'或想要推翻批判的'群众'，还是了解为还没有足够的浓度来消化鲍威尔思想的一种精神'流出体'，这个问题也确实难以解决。"——编者注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②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的用语。——编者注

③布·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的用语。——编者注

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想象自己是由纯粹

"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它的历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了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粗陋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种姓制度[196],于是历史学家就以为种姓制度是产生这种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对于**德国**历史编纂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种历史哲学后来在圣布鲁诺看来也一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终消失于"自我意识"中。圣麦克斯·施蒂纳更加彻底,他对全部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他认为历史进程必定只是"骑士"、强盗和幽灵的历史,他当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幻觉而得救。①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整个这样的历史观及其解体和由此产生的怀疑和顾虑,仅仅是德国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对德国来说也只有**地域性**的意义。例如,近来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②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这个"神的王国"不是存在于想象之中,而是存在于其他什么地方;似乎那些学识渊博的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反动的性质。"——编者注

②路·费尔巴哈《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编者注

先生们不是一直生活在——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目前正在寻找途径以求到达的那个"人的王国"之中；似乎这种科学的娱乐——这确实只是一种娱乐——就在于去说明这个理论上的空中楼阁多么奇妙，而不是相反，去证明这种空中楼阁是从现实的尘世关系中产生的。通常这些德国人总是只关心把既有的一切无意义的论调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就是说，他们假定，所有这些无意义的论调都具有某种需要揭示的特殊**意义**，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如前所说，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对于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理论观念并不存在，因而也不用去消灭它们。如果这些群众曾经有过某些理论观念，如宗教，那么现在这些观念也早已被环境消灭了。

上述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所具有的纯粹民族的性质还表现在：这些理论家们郑重其事地认为，像"神人"、"人"等这类幻象，支配着各个历史时代；圣布鲁诺甚至断言：只有"批判和批判者创造了历史"①。而当这些理论家亲自虚构历史时，他们会急匆匆地越过先前的一切，一下子从"蒙古人时代"②转到真正"内容丰富的"历史，即《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历史，转到黑格尔学派在普遍争吵中解体的历史。所有其他民族和所有现实事件都被遗忘了，世界舞台局限于莱比锡的书市，局限于"批判"、"人"和"唯一者"③的相互争吵。或许这些理论家有朝一日会着手探讨真正的历史主题，例如18世纪，那时他们也只是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

①布·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的用语。——编者注

②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的用语。——编者注

③即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和麦·施蒂纳。——编者注

础的事实和实际发展过程脱离的，而他们阐述这种历史的意图也只是把所考察的时代描绘成在真正的历史时代即1840—1844年德国哲学斗争时代到来之前的一个不完善的预备阶段、尚有局限性的前奏时期。他们抱的目的是为了使某个非历史性人物及其幻想流芳百世而编写前期的历史，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是：他们根本不提一切真正历史的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性的干预，为此他们的叙述不是以研究而是以虚构和文学闲篇为根据，如像圣布鲁诺在他那本已被人遗忘的《18世纪的历史》一书①中所做的那样。这些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以为他们无限地超越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其实他们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偏见。他们根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业绩是历史性的；他们生活在德国，依靠德国和为着德国而生活；他们把莱茵之歌[197]变为圣歌并征服阿尔萨斯和洛林，其办法不是剽窃法兰西国家，而是剽窃法兰西哲学，不是把法兰西省份德国化，而是把法兰西思想德国化。费奈迭先生，同打着理论的世界统治这面旗帜而宣布德国的世界统治的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相比较，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从这些分析中还可以看出，费尔巴哈是多么错误，他（《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②）竟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谓词，以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空洞范畴。[198]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

①布·鲍威尔《18世纪政治、文化和启蒙的历史》1843—1845年夏洛滕堡版第1—2卷。——编者注

②该刊发表了路·费尔巴哈《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一文。——编者注

人们是互相需要的，而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他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所能达到的地步，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立即用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来代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多少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像同"源于精神的精神"、同哲学范畴、同势均力敌的对手作斗争那样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而就圣布鲁诺来说，这样做也还是为了实际的利益。我们举出《未来哲学》中的一个地方作为例子，来说明费尔巴哈既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这一点始终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费尔巴哈在那里阐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199]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做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因此，在这样的场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借以产生的基地，也就

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只来谈谈其中的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成为轮船行驶的航道，一旦河水被引入水渠，而水渠的水只要简单地排放出去就会使鱼失去生存环境，那么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把所有这类矛盾宣布为不可避免的反常现象，实质上，同圣麦克斯·施蒂纳对不满者的安抚之词没有区别，施蒂纳说，这种矛盾是他们自己的矛盾，这种恶劣环境是他们自己的恶劣环境，而且他们可以安于这种环境，或者忍住自己的不满，或者以幻想的方式去反抗这种环境。同样，这同圣布鲁诺的责难也没有区别，布鲁诺说，这些不幸情况的发生是由于那些当事人陷入“实体”这堆粪便之中，他们没有达到“绝对自我意识”，也没有认清这些恶劣关系是源于自己精神的精神。①

[III]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

① 布·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编者注

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我们在上面(第[534—538]页)已经说明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并且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这一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须讲的，在前面(第[536—539,542—543]页)已经讲过了。

然而，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①。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而言。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它使许多无产者有可能升到无产阶级之上，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普遍性符合于：（1）与等级相对的阶级，（2）竞争、世界交往等等，（3）统治阶级的人数众多，（4）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意识形态家的欺骗与分工。）"——编者注

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要比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所作的斗争更加坚决、更加彻底。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

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做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也就很自然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第446页）。[1]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意识形态家和哲学家，并得出结论说：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尔表述过了。这样，证明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

---

①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1837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9卷）。——编者注

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

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原因、在经验的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

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个相继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把这些思想看做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凭借自己的经验的基础，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被**仅仅**当做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差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差别）。

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意识形态家，而这些人又被看做是历史的制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①。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说明它为什么主要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从它与一切意识形态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务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必须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而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分工出发，是很容易说明这些幻想、玄想和曲解的。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编者注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获得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象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

[IV]

[……][①]从前者产生了发达分工和广泛贸易的前提，从后者产生了地域局限性。在前一种情况下，各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本身已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因此，这里出现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耕地**（水，等等）可以看做是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在前一种情况下，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主要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具备普通常识就够了，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彼此还完全没有分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应该已经实行分工。在前一

①这里缺四页手稿。——编者注

种情况下，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在前一种情况下，存在着小工业，但这种工业决定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因此这里没有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业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对于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来说，私有制是必要的。在采掘工业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反谷物法同盟[31]）。——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这

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在中世纪，有一些城市不是从前期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城市里，每个人的唯一财产，除开他随身带着的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构成的那一点点资本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劳动。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手工业者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必须有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以及与此相联的禁止外人进入这些场所的规定；各手工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性；全国性的封建组织，——所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这里我们不打算详细地谈论以后历史发展所引起的行会制度的多种变化。在整个中世纪，农奴不断地逃入城市。这些在乡村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农奴是只身流入城市的，他们在这里遇见了有组织的团体，对于这种团体他们是没有力量反对的，在它的范围内，他们只好屈从于由他们那些有组织的城市竞争者对他们劳动的需要以及由这些竞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处境。这些只身流入城市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力量，因为，如果他们的劳动带有行会的性质并需要培训，那么行会师傅就会使他们从属于自己，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他们；或者，如果这种劳动不需要

培训，因而不是行会劳动，而是短工，那么劳动者就根本组织不起来，始终是无组织的平民。城市对短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

这些城市是真正的“联盟”[200]，这些“联盟”的产生是由于直接的需要，由于对保护财产、增加各成员的生产资料和防卫手段的关心。这些城市的平民是毫无力量的，因为他们都是只身流入城市的彼此素不相识的个人，他们无组织地同有组织、有武装配备并用忌妒的眼光监视着他们的力量相抗衡。每一行业中的帮工和学徒都以最适合于师傅利益的方式组织起来；他们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使师傅具有双重力量：第一，师傅对帮工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第二，帮工在同一师傅手下做工，对这些帮工来说这是一根真正的纽带，它使这些帮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师傅手下的帮工，并同他们分隔开来；最后，帮工由于自己也想成为师傅而与现存制度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平民至少还举行暴动来反对整个城市制度，不过由于他们软弱无力而没有任何结果，而帮工们只在个别行会内搞一些与行会制度本身的存在有关的小冲突。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起义都是从乡村爆发起来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成熟，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201]

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用货币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一样——，而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资本，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等级**资本。

在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少的，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

凡是用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必须都会做；各城市之间的有限交往和少量联系、居民稀少和需求有限，都妨碍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正因为如此，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劳动和熟练技巧还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可以升华为某种有限的艺术感。然而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每一个手工业者对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安于奴隶般的关系，因而他们对工作的屈从程度远远超过对本身工作漠不关心的现代工人。

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

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

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这个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他们被亚历山大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他们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也有同样的遭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初期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佛兰德——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在其他国家，例如在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最初只限于国内市场。除上述前提外，工场手工业还以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为前提。资本开始积聚到个人手里，一部分违反行会法规积聚到行会中，一部分积聚到商人手里。

那种一开始就以机器，尽管还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机器为前提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过去农民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着而在乡村中附带从事的织布业，是由于交往的扩大才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织布业是最早的工场手工业，而且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场手工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料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并由于交往逐渐扩大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

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除了为自身需要而一直在继续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被用来供应整个国内市场,通常还供应国外市场。

织布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能并很快就分化成无数部门的劳动,由于自己的整个特性,它抵制行会的束缚。因此,织布业多半在没有行会组织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

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

同时,工场手工业还成了农民摆脱那些不雇用他们或付给他们极低报酬的行会的避难所,就像行会城市过去曾是农民摆脱土地占有者的避难所一样。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同时也就开始了一个流浪时期,这个时期的形成是由于:取消了封建侍从,解散了拼凑起来并效忠帝王、镇压其诸侯的军队,改进了农业以及把大量耕地变为牧场。从这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流浪现象是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密切联系着的。早在13世纪就曾出现过的个别类似的流浪时期,只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才成为普遍而持久的现象。这些流浪者人数非常多,其中单单由英王亨利八世下令绞死的就有72 000人,只有付出最大的力量,只有在他们穷得走投无路而且经过长期反抗之后,才能迫使他们去工作。迅速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特别是在英国,渐渐地吸

收了他们。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只要彼此有了联系，就互相进行和平的交易。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继续存在，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而在比较大的、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城市里，则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者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关于这个阶段的一般情况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多谈。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又助长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因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而在那些没有受到刺激去扩大生产的行会里，自然形成的资本却始终没有改变，甚至还减少了。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而集中在行会里的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里占统治地位了，而是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工场手工业主的统治[①]。由此可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小资产者——中间等级——大资产阶级"。——编者注

见，行会一跟工场手工业接触，就衰落下去了。

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里，各国在彼此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起初，由于流通的金银数量很少，这些金属是禁止出口的；另一方面，工业，即由于必须给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不可或缺的、大部分是从国外引进的工业，没有特权不行，当然，这种特权不仅可以用来对付国内的竞争，而且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外的竞争。通过这些最初的禁令，地方的行会特权便扩展到全国。关税产生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即客商交的免遭抢劫的买路钱。后来各城市也征收这种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捐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

美洲的金银在欧洲市场上的出现，工业的逐步发展，贸易的迅速高涨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受行会束缚的资产阶级的兴旺发达和货币的活跃流通，——所有这一切都使上述各种措施具有另外的意义。国家日益不可缺少货币，为充实国库起见，它现在仍然禁止输出金银；资产者对此完全满意，因为这些刚刚投入市场的大量货币，成了他们进行投机买卖的主要对象；过去的特权成了政府收入的来源，并且可以用来卖钱；在关税法中有了出口税，这种税只是阻碍了工业的发展，纯粹是以充实国库为目的。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7世纪中叶，它几乎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商业和航运比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条例[202]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据优势。这里已经出

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

对工场手工业一直是采用保护的办法: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在海上贸易和殖民实力方面占据优势的国家,自然能保证自己的工场手工业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工场手工业一般离开保护是不行的,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最微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只要在稍微有利的条件下,工场手工业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某个国家建立起来,正因为这样,它也很容易被破坏。同时,它的经营方式,特别是18世纪在乡村里的经营方式,使它和广大的个人的生活条件结合在一起,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工场手工业的生存而允许自由竞争。因此,工场手工业就它能够输出自己的产品来说,完全依赖于商业的扩大或收缩,而它对商业的反作用,相对来说是很微小的。这就决定了工场手工业的次要作用和18世纪商人的影响。正是这些商人,特别是船主最迫切地要求国家保护和垄断;诚然,工场手工业主也要求保护并且得到了保护,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他们始终不如商人。商业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已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并带有大资产阶级性质,而在工厂城市里仍然是小资产阶级势力占统治。参看艾金①。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平托关于这一点说得很明确:"贸易是本世纪的嗜好。"他还说:"从某个时期开始,人们就只谈论经商、航海和船

①约·艾金《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编者注

队了。"①

虽然资本的运动已大大加速了，但相对来说总还是缓慢的。世界市场分割成各个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由单独一个国家来经营；各国之间的竞争的消除；生产本身的不灵活以及刚从最初阶段发展起来的货币制度，——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妨碍了流通。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当时一切商人和一切经商方式都具有斤斤计较的卑鄙的小商人习气。当时的商人同工场手工业主，特别是同手工业者比较起来当然是大市民——资产者，但是如果同后一时期的商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小市民。见亚·斯密②。

这一时期还有这样一些特征：禁止金银外运法令的废除，货币经营业、银行、国债和纸币的产生，股票投机和有价证券投机，各种物品的投机倒把等现象的出现以及整个货币制度的发展。资本又有很大一部分丧失了它原来还带有的那种自然性质。

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1640

①伊·平托《关于商业忌妒的通讯》，见《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集》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34、238页。——编者注

②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编者注

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旧的关税已无力抵制大工业了），并随即在保护关税之下兴办大工业。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竞争是实际的贸易自由；保护关税在竞争中只是治标的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段），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①]是自动体系。[它][①]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

①此处手稿缺损。——编者注

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

当然，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产生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

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从而也是所有制的形式。在每一个时期都发生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的。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从狭隘的观点出发，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做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而这样做是相当容易的，因为进行这些革命的个人都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对他们自己的活动本身抱有种种幻想。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

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尽管竞争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它却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使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因此这会持续很长时间，直到这些个人能够联合起来，更不用说，为了这种联合——如果它不仅仅是地域性的联合——，大工业应当首先创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而便利的交通。因此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战胜同这些孤立的、生活在每天都重复产生着孤立状态的条件下的个人相对立的一切有组织的势力。要求相反的东西，就等于要求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不要有竞争，或者说，就等于要求各个人从头脑中抛掉他们作为被孤立的人所无法控制的那些关系。

住宅建筑。不言而喻，野蛮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洞穴和茅舍，正如游牧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独自的帐篷一样。这种单个分开的家庭经济由于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而成为更加必需的了。在农业民族那里，共同的家庭经济也和共同的耕作一样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但是，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分开的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组织共同的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采暖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的经济本身将不会再成为新

生产力，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基础上，就是说，将是一种纯粹的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还可能有什么呢？——这就是城市里的集中和为了各个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公共房舍（监狱、兵营等）的兴建。不言而喻，消灭单个分开的经济是和消灭家庭分不开的。

（在圣桑乔那里常见的一个说法是：每个人通过国家才完全成其为人①，这实质上等于说，资产者只是资产者这个类的一个标本；这种说法的前提是：资产者这个**阶级**在构成该阶级的个人尚未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②）

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自卫都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域性市民团体中，开始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同现存关系相对立并由于这些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便成了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资产阶级本身开始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

---

①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编者注

②马克思加了边注："在哲学家们看来，阶级是预先存在的"。——编者注

一切有财产的阶级[1](同时资产阶级把以前存在过的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这些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至于个人隶属于阶级怎样同时发展为隶属于各种各样的观念,等等,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了。

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下进行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进行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臆想: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者说这些个人发展了**人**;这种臆想,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看做是普遍表达方式的一些类别,看做是**类**的一些亚种,看做是**人**的一些发展阶段。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

---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它首先吞并直接隶属于国家的那些劳动部门,接着又吞并了所有或多或少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等级”。——编者注

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①]。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意识形态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而对他们本身来说，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在等级中（尤其是在部落中）这种现象还是隐蔽的，例如，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关系如何；这是一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本身是资产阶级

①恩格斯加了边注：“（费尔巴哈：存在和本质）”。

路·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关于存在和本质的论点，参看本卷第549—550页。——编者注

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本身。因此，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等级的差别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当市民等级、同业公会等等起来反对农村贵族的时候，他们的生存条件，即在他们割断了封建的联系以前就潜在地存在着的动产和手艺，表现为一种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对立的积极的东西，因此起先也具有一种特殊的封建形式。当然，逃亡农奴认为他们先前的农奴地位对他们的个性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但是，在这方面，他们只是做了像每一个挣脱了枷锁的阶级所做的事，此外，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解放出来的，而是零零散散地解放出来的。其次，他们并没有越出等级制度的范围，而只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等级，在新的处境中也还保存了他们过去的劳动方式，并且使这种劳动方式摆脱已经和他们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桎梏，从而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相反，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即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已变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单个无产者是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够使他们加以控制。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对无产者本身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因为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他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

注意。不要忘记，单是维持农奴生存的必要性和大经济的不可能性（包括把小块土地分给农奴），很快就使农奴向封建主缴纳的贡赋降低到各种代役租和徭役地租的平均水平，这样就使农奴有可能积累一些动产，便于逃出自己领主的领地，并使他有希望上升为市民，

同时还引起了农奴的分化。可见逃亡农奴已经是半市民了。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获得动产的可能性最大。

由此可见，逃亡农奴只是想自由地发展他们已有的生存条件并让它们发挥作用，因而归根结底只达到了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①，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一般化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这正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相互分离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相互分离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过去的联合决不像《社会契约

①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在每一个历史时代获得解放的个人只是进一步发展自己已有的、对他们来说是既有的生存条件。"——编者注

论》①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而只是关于这样一些条件的必然的联合（可以对照例如北美合众国和南美诸共和国形成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下，各个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这种在一定条件下不受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各个时代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这样，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迄今为止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做无机的条件。然而他们并不以为过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就是给他们提供资料，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来说是无机的。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等级在18世纪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家庭或多或少地也是如此。这种差别不是我们为每个时代划定的，而是每个时代本身在既存的各种不同的因素之间划定的，而且不是根据概念而是在物质生活冲突的影响下划定的。

①让·雅·卢梭《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编者注

在后来时代(与在先前时代相反)被看做是偶然的东西,也就是在先前时代传给后来时代的各种因素中被看做是偶然的东西,是曾经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都取决于它。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这是施蒂纳顽固地提出来**反对**人的主要论据[①]),尽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无疑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诚然,不以它们的意愿为转移。)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在上述这种矛盾产生以前,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合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②]。这样,在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

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

①麦·施蒂纳《施蒂纳的评论者》一文中的议论;并见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第443页。——编者注

②马克思加了边注:"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编者注

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由于这种发展是自发地进行的，就是说它不是按照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制定的共同计划进行的，所以它是以各个不同的地域、部落、民族和劳动部门等等为出发点的，其中的每一个起初都与别的不发生联系而独立地发展，后来才逐渐与它们发生联系。其次，这种发展非常缓慢；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延续下去。由此可见，甚至在一个民族内，各个人，即使撇开他们的财产关系不谈，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较早时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经为属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由此也就说明：为什么在某些可以进行更一般的概括的问题上，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以致人们在以后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

相反，有些国家，例如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

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11世纪和12世纪的冰岛可以作为例子。类似的关系在征服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另一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交往形式被现成地搬到被征服国家的话。这种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以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这些地方却能够而且应当充分地和不受阻碍地确立起来，尽管这是为了保证征服者拥有持久的政权(英格兰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203]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

———

征服这一事实看起来好像是同整个这种历史观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做是历史的动力。这里我们只能谈谈主要之点，因此，我们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以及与此相联系重新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罗马和蛮人，封建制度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对进行征服的蛮族来说，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粗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越来越需要新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交往形式越来越被加紧利用。相反，在意大利，由于地产日益集中(这不仅是由购买和负债引起的，而且还是由继承引起的，当时一些古老的氏族由于生活放荡和很少结婚而逐渐灭亡，他们的财产转入少数人手里)，由于耕地变为牧场(这不仅是由通常的、至今仍然起作用的经济原因引起的，而且也是由掠夺来的和进贡的谷物的输入以及由此造成的意大利谷物没有买主的现象引起的)，自由民几乎完全消失了，就是奴隶也在不断地死亡，而不得不经常代之以新的奴隶。奴隶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基础。介于自由民

与奴隶之间的平民，始终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总之，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城市，它与各行省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

———

有一种最普通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在历史上只有**占领**才具有决定意义。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种占领的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的过渡。但是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占领国家此时是否已经像现代国家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被占领国家的生产力主要是否只是以它的联合和共同体为基础。其次，占领是受占领的对象所制约的。如果占领者不依从被占领国家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就完全无法占领银行家的体现于证券中的财产。对于每个现代工业国家的全部工业资本来说，情况也是这样。最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占领都是很快就会结束的，已经不再有东西可供占领时，必须开始进行生产。从这种很快出现的生产的必要性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

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这种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生产力的制约，这从企图仿效古罗马来建立其他形式的失败尝试（查理大帝，等等）中已经得到证明。

待续。——

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现代的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舍尔比利埃①等人自己就把个人的联合同资本的联合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个人本身完全屈从于分工，因此他们完全被置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私有制，就它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来说，是从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起来的。起初它大部分仍旧保存着共同体的形式，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

（各个民族的个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的自身能力，已经通过种族杂交而产生的能力，——因此德国人是白痴式的；在法、英等国是异族人移居于已经发达的土地上，在美国是异族人移居于一块全新的土地上，而在德国，土著居民安居不动。）

---

①安·埃·舍尔比利埃《富人或穷人》1840年巴黎—日内瓦版。——编者注

因此，这里显露出两个事实。第一，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①因此，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是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无关紧要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

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而现在它们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劳动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

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

①恩格斯加了边注："西斯蒙第"。——编者注

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受所要占有的对象的制约，即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因此，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遍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属于全体个人，不可能归属于各个人。

其次，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条件总是表现为偶然的，而现在，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每一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才是偶然的。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人”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把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①借助于这种从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们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②只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自我异化”。——编者注

②“市民社会”的原文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术语也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意思。——编者注

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决定的。在古典古代民族中，一个城市里聚居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权利则局限于简单的占有，但是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涉及地产。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开始的。——(奴隶制和共同体)(古罗马公民的合法的所有权[dominium ex jure Quiritum])。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由于税收而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由于国债而完全归他们掌握；现代国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内国家证券行市涨落的调节，所以它完全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的商业信贷。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

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在那里，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已被消灭的等级还起着某种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种混合体，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对居民的其他部分进行统治。德国的情况就正是这样。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著作家都一致认为，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入日常的意识了。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

私法是与私有制同时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罗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没有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引起进一步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整个生产方式没有改变。①在现代民族那里，工业和商业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随着私有制和私法的产生，开始了一个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在中世纪进行了广泛的海上贸易的第一个城市阿马尔菲还制定了海商法。204当工业和商业——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又立即得到恢复并取得威信。后来，资产

---

①恩格斯加了边注："（放高利贷！）"。——编者注

阶级力量壮大起来,君主们开始照顾它的利益,以便借助资产阶级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所有国家中——法国是在16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在所有国家中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完善,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原则。(不应忘记,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

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作为普遍意志的结果来表达的。仅仅使用和滥用的权利[jus utendi et abutendi]就一方面表明私有制已经完全不依赖于共同体,另一方面表明了一个错觉,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实际上,滥用[abuti]对于私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从而他滥用的权利转入他人之手的话;因为仅仅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一种**关系**,哲学家们称之为观念)。①这种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错觉,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虽然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包括享有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只要他还未占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自己的土地,他作为土地所有者就一无所有。法学家们的这种错觉说明:在法学家们以及任何法典看来,各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缔结契约这类事情,一般都是偶然的;他们认为这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在哲学家们看来关系=观念**。他们只知道‘**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现实的关系都成了观念。”——编者注

些关系可以随意建立或不建立,它们的内容完全依据缔约双方的个人意愿。

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

分工对科学的影响。

镇压在国家、法、道德等等中的作用。

资产者之所以必须在法律中使自己得到普遍表现,正因为他们是作为阶级进行统治的。

自然科学和历史。

没有政治史、法律史、科学史等等,艺术史、宗教史等等[①]。

为什么意识形态家使一切本末倒置。

笃信宗教者、法学家、政治家。

法学家、政治家(一般的国务活动家)、伦理学家、笃信宗教者。

关于一个阶级内的这种意识形态划分:**职业由于分工而独立化**;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他们之所以必然产生关于自己的手艺和现实相联系的错觉,是手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关系在法学、政治学中——在意识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运用法典,因此法官认为,立法是真正的积极的推动者。尊重自己的商品,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和公众打交道。

---

①马克思加了边注:"同表现为古典古代国家、封建制度、专制君主制的'共同体'相适应的,同这种联系相适应的,尤其是宗教观念。"——编者注

法的观念。国家的观念。在**通常的**意识中事情被本末倒置了。

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

要更通俗地表达这一点。

法、宗教等领域中的传统。

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关系会相对于他们而独立？他们自己生命的力量会成为压倒他们的力量？

总之：**分工**，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土地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

等级的所有制。手工工场所有制。工业资本。

第 二 卷
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们在第一卷(参看《圣麦克斯》,《政治自由主义》)考察过迄今存在的德国自由主义和法英资产阶级运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德国社会主义和法英无产阶级运动之间也同样存在。除德国共产主义者之外,还出现了一些著作家,他们接受了法国和英国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把这些思想和自己的德国哲学前提混合起来。这些“社会主义者”,或者像他们自称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是纯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像他们想象中的德国哲学体系一样,完全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著作即使在宣传某些体系,也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的,是以一定国家的一定阶级的整个生活条件为基础的。他们对该派某些著作界代表人物的幻想深信无疑,似乎这些代表人物所谈的是“最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需要。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禁锢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而不可能去考察现实的关系。面对“不讲科学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就是首先激起德国读者对这些外国人的皮相之见或“粗俗的”经验主义表示应有的蔑视,就是为“德国科学”唱颂歌,并

赋予它这样的使命：揭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揭示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于是他们立刻开始工作，想以“德国科学”代表的身份来完成这个使命，尽管在大多数场合，这个“德国科学”对他们来说几乎就像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原著一样是陌生的，他们只是根据施泰因、厄尔克斯等人所编的东西才了解那些原著。他们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个“**真理**”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他们来说却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思想的纯粹文献上的联系甚至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对这类文献的错误了解。他们把这些共产主义的体系、评论和论战性著作同现实运动割裂开来，其实这些体系、评论和著作不过是现实运动的表现；然后，他们又任意把这些体系、评论和著作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他们把一定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生活领域的意识同这些生活领域割裂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来衡量这个意识。他们始终一贯地把这些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变为“**人**”的关系，他们把这些一定的个人关于他们自身关系的思想解释成好像这些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这样一来，他们就从现实的历史基础回到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去，而且，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现实的联系，因而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别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虚构幻想的联系。他们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语言，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它被大吹大擂地说成是“民族的骄傲和所有邻国人民羡慕的对象”，就像托利党人[56]谈到英国宪法时所说的那样。

由此可见，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

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精神天国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德国情感天国中的变容而已。声称以“科学”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身首先就是一种秘传的科学；它的理论著作只供那些熟知“思维着的精神”的奥秘的人阅读。但是它也有公开的著作；只因为它关心社会的、公开的关系，它就得进行某种宣传。在这种公开的著作中，它不再诉诸德国“思维着的精神”，而是诉诸德国“情感”。而这样做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说来是再容易不过的，因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了。因此，它不是求助于无产者，而是求助于德国人数最多的两类人，求助于小资产者及其博爱的幻想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家，即哲学家和哲学学徒；总之，它求助于德国现在流行的“平常的”和不平常的意识。

由于德国实际存在的各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个中间派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把共产主义和流行观念调和起来的企图。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许多曾以哲学为出发点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正是经过这样的过渡而走向了并且继续走向共产主义，而其他那些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羁绊的人则宣传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直到寿终正寝。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中那些不久前写了我们在下面所批判的著作的人，究竟是仍然坚持这种观点，还是已经前进了。我们决不是反对这些人，我们只是把刊印出来的文献看做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泥潭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那个流派的表现。

此外，“真正的社会主义”显然给一批青年德意志[205]的美文学家、江湖医生和其他著作家打开了利用社会运动的大门。由于德国没有**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社会运动在开始时也就变成了**纯粹**文学的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完备的社会文学运动，这



1938年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摘译本

个运动是在现实的党派利益之外产生的，而且在共产主义党派形成以后还想不顾它而继续存在。不言而喻，从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党派在德国产生的时候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将越来越局限于把小资产者作为自己的公众，并把那些委靡和堕落的著作家作为这些公众的代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秋—1846年5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年版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德国哲学杂志》1966年第10期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1985年德文版单行本翻译

卡·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206]

（节　　选）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A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 Karl Marx.



PARIS.
A. FRANK,
69, rue Richelieu

BRUXELLES.
C. G. VOGLER,
2, petite rue de la Madeleine.

1847

《哲学的贫困》第一版的封面

第 二 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第一节　方　法

现在我们是在德国！我们在谈论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要谈论形而上学。而在这方面，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差不多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

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法国资产阶级即将取得必然胜利的代表。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著名的《**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除了已经有的对该表的1 001个注解以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作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明**”的《经济表分析》。

蒲鲁东先生是另一个魁奈医生，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整个哲学，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们作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如果蒲鲁东博士不满意我们的说明，那没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院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解说》。207

第一个说明

> “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畴**在**出现**时有时候是同时代的，有时候又是颠倒的……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系列**，值得夸耀的是，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已被我们发现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145和146页）

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疑问是想吓唬他们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蒲鲁东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呢？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

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已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做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设定自己的场所，又没有可以与之相对立的客体，也没有可以与之合成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设定、对立、合成。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辞的含意。固然这不是希伯来语①（请蒲鲁东先生不要见怪），然而却是脱离了个体的纯粹理性的语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维的普通个体，而正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

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

①皮·约·蒲鲁东在1827年后曾作为校对者参加圣经的出版工作并在此期间掌握了希伯来语知识。蒲鲁东经常谈到希伯来语，马克思在这里暗喻此事。——编者注

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继续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哲学家和基督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有一个**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则有无数化身。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如果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设想把运动的逻辑公式看做是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

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

> “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逻辑学》第3卷）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

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把自己设定为特定的范畴呢？这就是理性自己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从这种生育过程中产生出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一个矛盾的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

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第二个说明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①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208]才是停滞不动的。

第三个说明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这些阶段互相产生，像反题来自正题一样一个来自一个，并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无人身的人类理性。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因此，他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经济发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竞争等等不可。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系列**中、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根本还不存在。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

①1885年德文版改为“生产方式”。——编者注

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第四个说明

现在我们看一看蒲鲁东先生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像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奴隶制是同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是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

地图上抹掉美国。①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存在于各民族的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不加掩饰地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问题**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就不需要提出问题。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

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问题并且自愿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通过辩证的生育过程生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自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

①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对1847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限于输入移民和工业产品,输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各蓄奴州生产谷物和肉类。直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国,而美国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苦力的隐蔽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弗·恩·"——编者注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他用尽全力一跳便跳到一个新范畴的领域中。这时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系列**。

他随手拈来一个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鲁东先生的话，税收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税收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这样，蒲鲁东先生把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做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这二者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

第五个说明

"在绝对理性中，所有这些观念……是同样简单和普遍的…… 实际上我们只有靠我们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但是，真理本身并不以这些辩证的图形为转移，而且不受我们思想的种种组合的束缚。"(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2卷第97页)

这样，一个急转弯(现在我们才知道其中奥妙)就使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突然变成了幻想！蒲鲁东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实话。的确，一旦把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做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

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对他来说却不存在了。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不再是这些经济范畴相互产生的次序。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么，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时间次序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么，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们怎样拖着蒲鲁东先生走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说明的引子）之前，我们应当再作一个比较次要的说明。

让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

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至于蒲鲁东先生，他还在意识形态家所走的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缓慢行进，离开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个说明

我们且沿着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鲁东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粹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既然蒲鲁东先生认为各种观念在辩证运动中不能互相"**区分**"，那么他就一笔勾销了**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而本来总还可以用它们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埋怨一切，甚至连法国话也埋怨起来。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

"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生产出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古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　**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第2卷第102页）

自身**起作用**并且使蒲鲁东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创造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说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的顺序了，可是，他那本大作却继续存在，而这部著作恰恰被他自己称为“**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式(因为蒲鲁东先生就是公式化的人物)帮助他**一跳**就越过他的一切矛盾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绝对的、纯粹的和纯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动活跃的人们的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最初间或写做“**社会天才**”、“**普遍理性**”，最后又写做“**人类理性**”。然而这种名目繁多的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人们认出是蒲鲁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好的和坏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问题。

“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人类理性只能发现真理。但是直到现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因而是矛盾的。经济范畴本身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因此它们也是不完备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鲁东先生以前，社会天才只看见**对抗因素**而未发现**综合公式**，虽然两者同时潜藏在**绝对理性**里面。既然经济关系只是这些不充足的真理、这些不完备的范畴、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间的实现，因此，它们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并且有好坏两个方面。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在蒲鲁东先生的想象中，这

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畴跑到另一个范畴，但是仍然不能靠这一整套范畴从上帝那里，从绝对理性那里得到一个综合公式：

> “首先，社会〈社会天才〉假定一个原始的事实，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对抗性结果在社会经济中展开来就像它的后果会在精神上被推论出来一样，所以工业运动在各方面随着观念的演绎分为两道洪流：一道是有益作用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结果的洪流…… 为了和谐地构成这个两重性的原理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就产生**第二个**二律背反，随后很快地又产生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行进**，直到它用尽自己的全部矛盾(尽管未曾得到证实，但是我料想，人类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用**唯一的公式**来解决自己的全部问题时为止。”(第1卷第133页)

正如以前**反题**变成**消毒剂**一样，现在**正题**将变成**假设**。但是，蒲鲁东先生这种术语上的变换现在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惊奇了。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人类的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个合题，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有关问题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冲撞，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题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人类理性，社会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用唯一的公式来解决自己的全部问题”。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唯一的公式是蒲鲁东先生真正的发现。这就是**构成价值**。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通过蒲鲁东先生之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博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之所以接连不断地实

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设，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换句话说，因为平等是蒲鲁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背离平等。由于历史和蒲鲁东先生的臆测步步发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拖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没有头脑的纯粹理性要好得多。他在论税收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解释事实的多种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使苏格兰地产获得了新的价值。而英国工业则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然把耕地变成牧场。要实行这种改变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代替他们。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现在你们说，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地产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么，你们就创造出了天命的历史。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认为以往各世纪及

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资料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用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来代替过去各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否认后一代人改变前一代人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同是一件东西对甲说来是成品，对乙说来只是从事新的生产的原料。

如果你们同蒲鲁东先生一道假定：社会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确切些说即兴制造出封建主，是为了达到把**佃农变为负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那么，你们就把目的和人都换了，这种做法同为了达到恶意的满足（即用羊群赶走人）而在苏格兰确立地产制度的天命比较起来，毫不逊色。

可是，蒲鲁东先生既然对于天命表现出那样亲切的关怀，我们就介绍他看一看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这个目的已经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

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看到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看到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看到乡村中家庭工业的繁荣,看到通过各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组织起来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制度、特权、无政府状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问题。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

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①]残存物的无产阶级相伴随。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仅仅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么,一旦那些成员之间出现对立,他们的利益就会互相对抗和冲突。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本身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

①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此处加了边注:“劳动阶级”。——编者注

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而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认为这些苦难是暂时的、偶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其次是**人道学派**，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比；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者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只要这种理论与实践

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对抗。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做是贫困的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

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合成的错误。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经济进化**的系列是由分工揭开的。

分工的好的方面

“就实质而论，分工是实现条件上和智能上的**平等**的方法。”（第1卷第93页）

分工的坏的方面

“对我们说来，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泉。”（第1卷第94页）

另一种说法

“劳动**按照**它所特有的、构成其有效性的首要条件的**规律进行划分**，结果就会否定自己的目的，毁灭自己。”（第1卷第94页）

应当解决的问题 { 找寻“一种新的合成，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第1卷第97页）。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196]、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必须用一个**分**字来解释。如果你们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们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诸多影响了。

当然，如果把事物归结为蒲鲁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这些事物看得太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非是那样绝对的。德国为了实现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或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那里则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或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cotton-lords）。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说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蒲鲁东先生说：

“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 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萨伊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这一切并未妨碍蒲鲁东先生在另一处说：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因此他还说：让·巴·萨伊**第一个**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但是，让我们听听勒蒙泰吧；让人人各得其所。

"让·巴·萨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采纳了我在论分工的道德影响这一节中提出的原理，这使我感到荣幸。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大概是因为我那本书①的标题失之浅薄。我只能以此来解释作家的沉默。这位作家由于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认这种小小的剽窃。"（《勒蒙泰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245页）

让我们给勒蒙泰以公正吧：他机智地描绘了今天所实行的这种分工的有害的结果，蒲鲁东先生对这一点未能作任何补充。既然由于蒲鲁东先生的过错我们已卷入谁在先的争论，那么不妨再顺便说一下，在勒蒙泰之前很久，而且在亚当·斯密以前17年，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在专门论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正比例。在若干门机械技艺中……没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也完全可以达到目的，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或脚的习惯动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说，在工场手工业方面，其最完善

①指皮·勒蒙泰的《理智和愚蠢各抒己见。供年长智低者阅读的简明伦理教程》1801年巴黎版。——编者注

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因此，不费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做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 一位将军可能是十分精通战争艺术的人，而士兵的全部价值却只是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后者之所失…… 在这一切都互相分离的时期，思维的技艺本身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1783年巴黎版[第108—110页]）

为了结束这场文献的涉猎，我们明确地否认"**所有的**经济学家更多强调的是分工的有益方面而不是有害方面"。只需举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说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鲁东先生就只有把众所周知的一般词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说一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蒲鲁东先生怎样从被当做普遍规律、范畴和观念来看待的分工中引申出同它有关的**有害方面**。这个范畴、这个规律怎么会包含一种损害蒲鲁东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这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风开始袭击人类。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 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 这是进步对人的偏私，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命的不平等，并且它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级制度。"（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94页）

分工产生了种姓。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产生的。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如果我们想进一步问问，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级制度和特权呢？蒲鲁东先生会回答我们说：是进步。但是又是什么引起进步呢？界限。界限，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所谓的进步对人的偏私。

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也不是辩证的历史，而是比较的历史。蒲鲁东先生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印刷工人，将克

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将现代的作家和中世纪的作家加以对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纪形成或由中世纪留传下来的分工的人们。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这就是蒲鲁东先生应当证明的吗？不是。他应当向我们表明一般分工，即作为范畴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过，既然在后面不远我们就会看到蒲鲁东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论据，我们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上面呢？蒲鲁东先生继续写道：

> "自**灵魂被损害**以来，劳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脑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　但是，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16—18小时，所以，自从不能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时起，补偿就要靠价格，于是工资就要降低……　有一点是不容怀疑而且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的，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工作和小工的劳动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来，一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身份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残以外，还免不了要忍受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

我们不打算谈这种三段论法的逻辑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使人误入歧途的谬论。

它的实质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身份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身份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资与被损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鲁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责备，便说，这是普遍良心所希望的。请问，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鲁东先生的灵魂呢？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而他用自己的辩证法一开始便把机器变成**工厂**。

为了从分工中推论出贫困，蒲鲁东先生假设了现代工厂；接着

他又假设由分工产生的贫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贫困的辩证的否定。蒲鲁东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份的职能**、在肉体上用工资微薄的办法惩罚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属于工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责怪工厂和机器，说它们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而且，为了彻底贬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绝妙的辩证法！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不然。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为此目的，他必须忘记刚才关于分工所讲的一切。

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现在且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社会上机器的不断出现，就是劳动的反题，即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被分散的和杀人的劳动的抗议**。其实什么是机器呢？**这就是把**分工后互相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的一种方式**。每一台机器都可以看做多种操作的结合…… 因此，通过机器会使**劳动者复原**…… 在政治经济学中同分工相对立的机器，在人脑中则是同分析相对立的合题…… 分工只不过使劳动的不同部分互相分开，让每一个人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工厂按照每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来组合劳动者…… 它把权威原理带入劳动领域…… 但是，还不止于此，**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并彻底贬低他，强使他从

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即机器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在分工和交换**之后出现的**。”

我们提醒蒲鲁东先生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蒲鲁东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始于世界之初，其实，它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中才存在。

其次，蒲鲁东先生为了表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生雇佣劳动，他给我们拿出了一份非同寻常的“有趣的家谱”。

(1)他假设一个人，这个人“注意到，把生产分为不同的部分并让单个的工人来从事其中的每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扩大生产力。

(2)这个人“抓住这个思想线索向自己说，只要把那些为了实现他给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配备的劳动者组成一个经常性的集团，他就会得到比较持久的生产等等”。

(3)这个人向别人提出**建议**，要求他们领会他的思想，抓住这个思想线索。

(4)在工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们**，即后来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

(5)“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

现在让我们用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工厂或机器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把**权威原理**带入社会；工厂或机器是不是一方面恢复劳动者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又同时使劳动者从属于权威；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新的合成，是不是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的劳动的**合题**。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至于工场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式中是很不发达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确立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威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考察一下，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

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

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这条航道同东印度通商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地制度，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场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其中的下层人员在未进入作坊之前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世纪和16世纪中流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们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种平等者之间的友好协定。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工场手工业不是将劳动分解并使专业工人去适应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费用等等。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无论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我们都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同一手艺的各部门已经互相分离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只要把它们集合在一个场所就可以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作坊。但是只要人和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过去以行会形式存在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在作坊内部反映出来。

如果说蒲鲁东先生能看见事物的话，他是把它们颠倒过来看的。在他看来，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出现在作坊之前，可是实际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题**，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

机器是劳动工具的集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

"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集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论机器……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230页]）

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化不能分离一样。英国在土地这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工，并且还使用机器开发土地。而在法国，工具分散，即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一般说来，这里既没有农业分工，也没有机器在土地上的应用。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

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来提醒。例如，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过去多半是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黎凡特①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最后，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任何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这种物品的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

还用得着谈论蒲鲁东先生在机器的发明和最初的应用中发现的**天命的**和慈善的**目的**吗？

在英国，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

自动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绝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而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最后，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

---

①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编者注

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威的恢复，或如蒲鲁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因此，在18世纪，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尤尔博士说道：

"在阿克莱以前很久，淮亚特发明了纺纱机械（一列沟槽轧辊）…… 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自动装置的发明…… 困难主要在于培养必要的纪律，使人们抛弃毫无次序的工作习惯，帮助他们和自动的大机器的始终如一的规律性运转融为一体。但是要发明一个适合机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纪律法典并付诸实施，是一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是阿克莱的可贵成就。"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当蒲鲁东先生愿意当一个经济学家而暂时放弃"理性中的系列的发展"时，他就从亚当·斯密在自动工厂刚刚产生的时期所写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学识。其实，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我们在自动工厂里所见的分工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差别，只需从尤尔博士的《工厂哲学》中引证几段就够了。

"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自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他认为分工就是使工场手工业日臻完善的伟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别针的生产为例，说明工人由于完成同一操作而日益熟练，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据这个原理，在工场手工业的每一部门中，某些操作，如将铜丝切成等长部分就变得容易完成，而其余操作如针头的成形和安装却仍较困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样很自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项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资将和他的技艺相适应。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不过，在亚当·斯密博士时代可以当做有用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生误解。事实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在自动工厂的操作计划中

几乎不加考虑；相反，在每一个要求高度灵敏性和精确性的操作的地方，这种操作不再由熟练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种不规则动作的工人来完成，而由某种专门的机械取而代之，因为机械的自动工作极有规则，只需小孩看管就行了。

因此，自动体系的原理就在于用机械技艺取代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在手工操作制度下，手工劳动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中花费最大的因素；而在自动体系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

人类天赋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越是熟练，他就越是有主见，越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越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给整个机械体系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只要把他们固定在唯一的对象上面**，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很容易使这两种能力达到完善的程度。

在劳动分成各种等级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特别困难的机械操作，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而在某种操作分解为由自动机器来完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给一个只经过短期训练的平平常常的工人；必要的时候企业主甚至还可以任意把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种变换显然是违背老规矩的，按照老规矩的分工，一个人固定做针头，另一个人固定磨针尖，这种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渐愚钝……　但在**均等化**原则即自动体系下，工人的能力只是进行轻松的操练"等等。"……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极其规律地运转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多样化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们的劳动所产生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大了。因此，**工作均等分配**制度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开阔以及身体的发育受阻碍；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分工，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的一切改进措施都有始终不变的目的和趋势，那就是尽可能取消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用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　这种只用眼灵手快的儿童而不用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的趋向，证明按照工人的不同熟练程度来分工的死板教条，终于为我们开通的厂主们抛弃了。"（安德鲁·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第1卷第1章）

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勒蒙泰说：

“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军事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活动领域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

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

蒲鲁东先生连自动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一面也不懂，竟倒退一步，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个部分，而要顺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别针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识。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综合劳动。进一步和退一步也构成一种综合运动，这一点谁也不会表示异议。

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师傅那里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只要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

竞争的好的方面 { “对劳动来说，竞争和分工同等重要……要使**平等到来**，必须有竞争。”

竞争的坏的方面	"竞争的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后果是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
一般的想法	"竞争的**有害的**结果同它带来的益处……逻辑上都是由它的原理产生的。"
应当解决的问题	"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这一原理必须来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规律。" 另一种说法： "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除竞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为它找到一种均衡，我看就是**警察**。"

蒲鲁东先生一开始就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反对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人们①。

"无目的的竞赛"是不存在的。"每一热衷的对象都必然和热情本身对应：妇女是求爱者热衷的对象，权力是野心家热衷的对象，黄金是守财奴热衷的对象，桂冠是诗人热衷的对象，**利润**必然是工业竞赛的对象。竞赛就是竞争本身。"

竞争就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工业竞赛必然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即竞争吗？蒲鲁东先生用肯定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蒲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样。

如果说求爱者热衷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么，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是产品，而不是利润。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

①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傅立叶主义者。——弗·恩·"——编者注

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阶段，所有的人都患了一种不从事生产而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

如果你们对14世纪的手工业者说：工业上的特权和全部封建组织即将废除，并由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来代替，那么他一定会回答你们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就是有组织的竞争。蒲鲁东先生说的“竞赛就是竞争本身”也正是这个意思。

> “假如颁布一道法令，说从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资都有保障，那么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转变为严重的松弛。”

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鲁东先生为了证明竞争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专门颁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们以为只需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么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制定这样一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蒲鲁东先生会坚定不移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们的本性”的假设，并且他有权“把我们排斥于辩论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 “让我们根据事实来谈吧。法国革命既为了争取工业自由，也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我们要明确地说，虽然法国在1789年未曾认识到它要求实现的原理的全

部后果,可是它的愿望和期待都没有落空。谁想否认这一点,我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评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原则上认为2 500万人犯了自发性错误的论敌进行辩论…… 假如竞争不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那么,为什么人们宁愿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废除**,却不肯考虑将它们加以**修正**呢?”

这样说来,既然18世纪的法国人废除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而不是将它们改头换面,那么19世纪的法国人就应该把竞争改头换面而不是将它废除。既然竞争在18世纪的法国是作为某些历史需要的结果而形成的,那么它在19世纪的法国就不该由于另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18世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非现实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17世纪说来是伟大人物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

革命以后就出现了目前这种局面。蒲鲁东先生同样从这里猎取一些事实,来说明竞争的永恒性。他证明,像农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由于竞争这一范畴尚未充分发展,目前仍处于落后和衰败状态。

说什么某些生产部门尚未发展到竞争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水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证明竞争的永恒性。

蒲鲁东先生的全部逻辑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我们现在借以在其中发展我们的生产力的一种社会关系。对于这个真理,他并没有在逻辑上加以说明,而是赋予了形式,而且往往是十分可笑的形式,他说: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时髦方式,是劳动中的责任,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

"**竞争**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间也没有**分歧**。谈论竞争就已经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见，竞争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可悲的错误，正是在于它把竞争看成社会的倾覆。"

谈论竞争就是谈论共同目标，而这就证明：一方面，竞争是联合，另一方面，竞争不是利己主义。难道谈论**利己主义**就不是在谈论共同目标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见，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资料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竞争和联合之间甚至没有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社会主义者很清楚，当前的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既然他们自己就打算推翻当代社会，他们怎能责备竞争要推翻当代社会呢？既然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争，他们又怎能反而指责竞争要推翻未来的社会呢？

往后，蒲鲁东先生又说，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因此，竞争不可能是**联合的对立面**。

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可见它并不同当时还不存在的竞争对立。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竞争同封建主义并不对立吗？

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因此，怎么可能有认为仅仅靠**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呢？蒲鲁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设想，仅仅把竞争说成是**联合**就可以维护竞争而反对社会主义呢？

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是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竞争的好的一面。现在我们来谈谈竞争的坏的即否定的一面，谈谈它的缺陷，它的

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方面，有害的属性。

蒲鲁东先生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情景是非常阴暗的。

竞争产生贫困，它酿成内战，“改变自然区域”，混合各民族，制造家庭纠纷，败坏公德，“搞乱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更坏的是，它还破坏诚实而自由的贸易，甚至也不拿**综合价值**、固定而诚实的价格来代替。竞争使得人人失望，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毁灭的地步。

从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竞争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争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吗？

我们要注意：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破坏作用，将随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增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好处。

> “从竞争的起源来考察，作为一种经济状态或一个经济阶段的竞争，是……减少生产费用的理论的必然结果。”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

> “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垄断的这种起源就证明垄断的正当…… 垄断是竞争的天然对立面…… 可是，既然竞争是必要的，那么它本身就含有垄断的思想，因为垄断好像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

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题和反题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谁都知道，现代的垄断就是由竞争本身产生的。

一牵涉到内容，蒲鲁东先生就得依靠诗意的形象。竞争曾经把

“劳动的每一细小部分”变成“一个好像是独立自主的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表现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垄断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独立自主的领域”至少和“屏障”同样好听。

蒲鲁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现代垄断。但是，大家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

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

反题：竞争。

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是竞争的否定。

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垄断。蒲鲁东先生把资产阶级的垄断当做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挛状态的垄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鲁东先生在垄断问题上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罗西先生，大概对资产阶级垄断的综合性质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举出人为的和自然的垄断之间的区别。他说：封建的垄断是人为的，即专横的；资产阶级的垄断则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鲁东先生推论说：垄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是“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启示。竞争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不过，不好的就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坏的是垄断和竞争的互相吞噬。怎么办呢？设法找到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合题，把它从太古以来所寄居的神的怀抱中拉出来。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

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者彼此竞争着，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如果垄断者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者来说，无产者群众越增加，各国垄断者之间的竞争就越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为了辩证地引导出随**垄断**而来的**税收**，蒲鲁东先生向我们谈到了**社会天才**。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

> “他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踌躇；**走到垄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产品课以赋税，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者付给报酬**。”

关于这位饿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散步的唯一目的是通过税收来消灭资产者们，而税收恰恰为资产阶级保持统治地位提供了手段；关于这种散步，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为使读者约略地了解蒲鲁东先生对待经济细节的方法，只需说明一点就够了：他认为设立**消费税**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级。

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它在工业资本即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的手中，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詹姆斯·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前10年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对消费税的这种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写。他说：

> “在纯粹的君主制度下，君主对财富的增长似乎有些忌妒，所以就向发财致

富的人征税，即向生产征税。而在立宪制度下，赋税主要落在日益贫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费身上。因此，君主们向工业征税……比如人头税和财产税是根据纳税人的假定财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纳税。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费课税。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纳税。”

至于税收、贸易差额和信用（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出现的**逻辑顺序**，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奥伦治的威廉三世时期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后，一到它可能自由发展自己的生存条件时，立即建立了新的税收制度、公共信用和保护关税制度。

对于蒲鲁东先生在警察或税收，在贸易差额、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问题上搜索枯肠制定的理论，这些概略的说明已经足以使读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敢说，最宽容的评论也不会对这些章节进行认真的研究了。

第四节　所有权或租[209]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虽然蒲鲁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谈论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

“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说是在经济之外：它根源于同财富生产没有多少关联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第2卷第269页）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是承认自己在了解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财富生产没有多少关联，但是同他那狭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鲁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这不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了吗？

蒲鲁东先生

“**只是提醒**：在经济进化的第七个时代（即**信用**时代），现实曾为虚构所排挤，人的活动有在空虚里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必要**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而租就是这种新契约的代价。”（第2卷第265页）

有40个埃巨的人[210]预感到后来会出现一个蒲鲁东先生，因而说：“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说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可是您绝不能使我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在您的世界里，信用是**使人消失于空虚**的手段，因此，**要把人束缚于自然**，所有权很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实生产的世界里，土地所有权总是出现在信用之前，所以蒲鲁东先生的惧怕空虚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管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租佃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这种争执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租的平均额怎样呢？请看蒲鲁东先生是怎么说的：

“李嘉图的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社会之初，人刚来到地球上，只见大片的森林，土地广袤无垠，而工业仅仅萌芽，在这个时候，租当然等于零。未经劳动开垦过的土地是使用对象，并不是交换价值，它是公共的，但不是社会的。由于家族繁衍和农业进步，土地开始具有价格。劳动使土地具有价值，由此产生了租。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情况下，收成越多的土地，价格也就越高；因此，所有者总

是力求把除去租佃者的工资即除去生产费用以外的全部土地产品攫为己有。于是所有权就紧跟在劳动之后，以便从劳动那里夺取超过实际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所有者执行着神秘的义务，并在佃农面前代表共同体，因此租佃者命中注定只是负有义务的劳动者，他有义务把超过他应得工资的全部所得向社会交代…… 因此，从本质和使命来说，租是一种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经济天才用来达到平等的无数手段之一。这是所有者和租佃者在不能秘密串通的情况下，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地籍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必须具备所有权的这种魔力，才能从佃农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产品的唯一创造者。租，或者更恰当地说，所有权，摧毁了农业上的自私，产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产生的团结…… 现在，所有权已经获得道义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租了。”

所有这些响亮的词句首先可以归结如下：李嘉图说，农产品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润和利息在内）的余额，就是租的标准。蒲鲁东先生则更为高明，他使化装成解围之神①的所有者出面干预，从**佃农**那里夺去超过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余额。他利用所有者的干预来说明所有权，利用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租。他回答问题的方法就是提出同样的问题，并在后面加上一个音节②。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蒲鲁东先生用土地的不同肥力来决定租，使租又有了一个新的起源，因为他认为土地在按照不同肥力来估价之前，“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公共的”。那么关于租的产生是由于有必要**使行将消失于无限空虚里**的人**回到土地上来**的这种虚构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

①解围之神的原文为：deus ex machina，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剧院中，扮演神的演员是借助于特别的机械装置而出现在舞台上的），转义是：突然出现的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②用propriétaire（所有者）的干预来说明propriété（所有权），用rentier（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rente（租）。——编者注

李嘉图的学说被蒲鲁东先生用天命的、比喻的和神秘的语句煞费苦心地包扎起来了，现在我们来把它解开。

李嘉图所说的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

我们看到，根据李嘉图的学说，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费用，其中包括产业利润；换句话说，价格取决于所用的劳动时间。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

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决定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像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即肥力相同的土地。其次，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较多的劳动量获得较少的产品。人口的需要必然造成这种劳动的增加，因此耕作费用较高的土地的产品就一定和耕作费用较低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销路。但由于竞争使市场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产品就要同劣等地的产品等价销售。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就构成租。假如人们可以随时得到肥力相同的土地，假如人们能够像在工业生产中一样也可以随时使用费用较少而效率较高的机器，或者假如后来的投资和最初的投资具有相同的生产效率，那么，农产品的价格就会像我们所见的工业产品价格一样，取决于最好的生产工具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但是，从这时起租就会消失。

要使李嘉图的理论普遍正确，必须[①]使资本能够自由运用于各生产部门；资本家之间高度发展的竞争必须使利润达到同一水平；必须使租佃者变成产业资本家，他要从他投入劣等地[②]的资本中取得相当于他投资于例如棉纺工业[③]时所能取得的利润；必须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工业制度进行；最后，还必须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货币收入。

在爱尔兰，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租。[④]因为租不仅是扣除工资以后，而且还是扣除经营利润以后的余额，所以，如果所有者的收入只是来自克扣工资，租就不可能存在。

这样看来，租决不是把土地使用者、租佃者变成**简单的劳动者**，决不是“从佃农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已有的产品的余额”，不是使土地所有者同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或雇工对立，而是同产业资本家对立[⑤]。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它所占有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费

①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这一句的开头改为“要使李嘉图的理论（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确，还必须”。——编者注

②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为“投入土地”。——编者注

③马克思在自用本中划去了“他投资于例如棉纺工业”，并在左页边标明“任何工业部门”。在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又恢复了“他投资于”，因而整个句子的这一部分就是“他投资于任何工业部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184页）。——编者注

④这句话在1896年巴黎版中为“可能发生像在爱尔兰那样的情况：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租”（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184页）。——编者注

⑤在1885年德文版中，这里作了如下的补充：“他用雇佣工人来经营土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资本的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的余额作为租金付给土地所有者”。——编者注

用(不仅由工资而且也由产业利润决定)的余额。可见,租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夺去了他的一部分收入。[①]因此,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封建租佃者才被产业资本家所取代。例如,在德国这种变化直到18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间才开始。只有在英国,产业资本家[②]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当蒲鲁东先生的佃农孑然独存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租。可见,一出现了租,佃农就不再是租佃者而是工人,即租佃者的佃农。劳动者被贬低了,沦为替产业资本家干活的普通工人、日工和雇工;像经营任何一个工厂一样地经营土地的产业资本家出现了;土地所有者由一个小皇帝变成一个普通的高利贷者:这就是租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关系。

李嘉图所说的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产业,把产业资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连在一起。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这时起土地所有权就取决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租,土地所有权成为动产,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益,迫使他最终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是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租。租使土地所有者完全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他甚至不需要了解自己的领地,

①在1885年德文版中,没有"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他的一部分收入"这段话。——编者注

②马克思在自用本中划去了"产业资本家",把"资本家"改写为"租佃者",在左页边又一次加上了"租佃者"。在送给娜·吴亭娜的本子中也有这一改动。——编者注

正像在英国那样。至于租佃者、产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他们不再被束缚在他们所经营的土地上，正如厂主和工厂工人没有被束缚在他们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样。他们感到切身有关的只是他们的经营费用和货币收益。因此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他产业的那些规律，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私利哀悼的对象。因此，可以说，租成了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

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规定租的必要前提，但是他仍然把他的租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

蒲鲁东先生曾赋予租以天命的目的——把**佃农**变成**负有义务的劳动者**，现在他从这个天命的目的转向租的平均分配。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租是由于**肥力不等的**土地的产品具有**同等的价格**造成的。所以假定1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产费用是20法郎，那么，原来花费10法郎的1公石谷物就可以卖到20法郎。

只要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购买市场上的全部农产品，市场价格就由最昂贵的产品的费用来决定。正是这种由竞争而不是由土地的不同肥力产生的价格均等化，使优等地的所有者能够从他的租佃者所卖出的每公石中取得10法郎的租。

我们暂且假定谷物的价格决定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那么，优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将按10法郎的价格出售，而劣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20法郎。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么，平均市场价格就是15法郎，但是按照竞争的规律，平均市场价格应为20法郎。假如平均价格等于15法郎，那么租要进行均等的或者别的什么方式的分配都不可能，因为租本身就不存在。只有在生产者用

10法郎生产的1公石谷物能卖20法郎时,租才能存在。蒲鲁东先生假定生产费用不等而市场价格相等,那是为了把不等的产品进行均等的分配。

穆勒、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要求租归国家所有以代替税收,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在整个资产阶级生产中是一个无用的累赘。

但是,首先1公石谷物要按20法郎支付,然后再把从消费者身上多取的那10法郎普遍进行分配,这的确足以使**社会天才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时闷闷不乐**,并且一走到**拐角**就碰破了自己的脑袋。

租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变成了

> "所有者和租佃者……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地籍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只有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租所造成的某种地籍册才可能有实际意义。

但是,我们已经指出,租佃者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为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向所有者支付的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以及其他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使租发生变化。这些不容置辩的论据足以证明,以租为基础的地籍册是不精确的。

另一方面,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力程度的固定指标,因为化学在现代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力的估价。英国东部各郡的广阔土地直到大约20年前才着手开垦,在这以前,由于人们对腐殖质和下层土的构成之间的

相互关系了解不够,这些土地没有开垦。

可见,在租方面,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现成的地籍册,而只是把现有的地籍册加以改变或全部推翻。

最后,肥力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天然素质,它和当前的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作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

蒲鲁东先生发明那种甚至并不具备普通地籍册所具有的意义的地籍册,纯粹是为了用来体现租的**天命的平等的目的**。蒲鲁东先生继续说:

> "租就是付给永存不灭的资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于这种资本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上不断改进,所以,虽然贷款(mutuum)的利息或利润由于资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租将由于工业的更加完善和由此造成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这就是租的实质。"(第2卷第265页)

这一次蒲鲁东先生在租里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标志,所不同的只是,租是特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恒的资本,"它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上不断改进"。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租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利息由于资本充斥而下降,租由于工业更加完善和由此引起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日益改进而上升。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看法的实质。

首先我们看看所谓租是资本的利息这一说法有多少正确的成分。

对土地所有者本人来说,租代表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资本的利息,或代表他卖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资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

时他买进或卖出的只是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租而付出的代价由一般利率而定，与租的性质本身无关。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通常低于投入工商业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利息同租本身区分开来，那么土地资本的利息就要比其他资本的利息更低些。但是，问题不在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它的市场价值，不在资本化的租，而在租本身。

租金不仅包含真正的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讲的真正的租。

只要土地不被用做生产资料，它就不是资本。正如所有其他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按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我们不能在土地的物质成分上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就可以在不增加土地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蒲鲁东先生的土地物质，就是有界限的土地。至于他赋予土地的永恒性，我们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质具有这种性质。但是土地资本也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

产生利息的黄金和白银，也和土地一样是经久而永恒的。如果说金价、银价下跌而地价却上涨，那么，这决不是土地的或多或少的永恒性质造成的。

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需要得到再生产和维持。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内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使物质变成生产资料的改良是一样的。假如土地资本是永恒的，那么，有些地方的面貌就会

完全不同于今天，罗马坎帕尼亚地区、西西里岛和巴勒斯坦就会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辉。

甚至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对土地实行的改良依然存在，而土地资本却已消失。

首先，这种情况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租由于有新的更肥沃的土地的竞争而被消灭的时候发生；其次，在一定时期内曾经具有价值的改良，在农艺学的发展使其普及以后，就不再具有这种价值了。

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租佃者。土地作为资本带来的收入不是租而是利息和产业利润。有些土地产生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润，但不产生租。

总之，土地只要提供利息，就是土地资本，而作为土地资本，它不提供租，不构成土地所有权。租是土地经营赖以进行的社会关系产生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稳固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土地使用方法的改进”（“工业更加完善”的后果）是租不断上升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改进迫使租周期地下降。

一般说来，农业上或工业上的一切改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由于这些改良，租佃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劳动量获得比较少的产品。这时，他不需要耕种劣等地，他在同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可以保持相同的生产率。因此，这些改良不但不能像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断提高租，它们反而成为租上升的暂时障碍。

17世纪英国的所有者们非常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唯恐自己的收入减少，就反对农业上的成就。（见查理二世时期英国经济学家配第

的著作[①])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要知道，什么是工资？工资就是粮食……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说，工资就是构成财富的各种要素同劳动群众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例。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于发给每一个生产者一份比他的产品更大的份额，这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数产业中提高，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我可以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110和111页）

除了二加二等于四以外，我们否定上述一切论点。

首先，不可能有**价格的普遍上涨**。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和工资同时增加一倍，价格并没有变化，起变化的只是说法而已。

其次，普遍提高工资决不会引起商品价格或多或少的普遍上涨。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么，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

但是，由于各生产部门中手工劳动对固定资本的比例并不一样，所以凡固定资本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迟早总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商品价格。反之，如果它们的商品价格不降低，它们的利润就一定会超过利润的一般水平。机器不是雇佣工人。因此，普遍提高工资对于那些使用机器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影响就比较小。但

①指配第《政治算术》。——编者注

是，由于竞争不断使利润平均化，超过一般水平的利润只能是暂时的。可见，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

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产品的价格。至于"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甚至引起生活必需品匮乏"，这种思想只有在不可理解的诗人的头脑里才能出现。

在英国，罢工常常引起某种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机器可以说是资本家用来对付熟练劳动者反抗的武器。现代工业中一个最重大的发明——自动走锭纺纱机击溃了进行反抗的纺纱工人。即使说同盟和罢工的结果只是引起各种用来对付同盟和罢工的机械发明，那么仅就这一点来说，同盟和罢工对工业的发展也是有巨大影响的。蒲鲁东先生继续说：

> "我在莱昂·福适先生1845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近来英国工人对**同盟**已不发生兴趣（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我们只有向他们表示祝贺），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改善主要是经济上开化的结果。在博尔顿的一次集会上一个纺纱工人大声说过：'工资不是由厂主决定的。在萧条时期老板们可以说只是充当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只得鞭打。起调节作用的原理是供求关系，而老板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蒲鲁东先生大叫道："好啊，这就是驯良的模范工人"……　"英国过去是不存在这种贫困的；但愿它不要跨过海峡。"（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261和262页）

在英国的各城市中，博尔顿的激进主义声势最大。博尔顿的工人是以革命最坚决闻名的。当英国为废除谷物法[53]而掀起广泛的鼓动宣传的时候，英国厂主们认为，只有让工人打先锋，他们才能对付土地所有者。但是由于工人利益同厂主利益的对立并不亚于厂主利

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对立，所以，很自然，厂主们在工人的集会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厂主们干了些什么呢？为了顾全面子，他们组织了一些主要由工头、少数忠于他们的工人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参加的集会。后来，真正的工人要参加集会（当时博尔顿和曼彻斯特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对这种虚假的示威，却被拒之门外，说这是凭票入场的集会，意思是只有持入场券的人才能参加。可是墙上的招贴明明写的是公众的大会。每逢举行这种集会的时候，厂主们的报纸总是大登特登有关会上发言的报道。不用说，在会上发言的都是一些工头。伦敦的报纸一字不改地将他们的发言全文转载。不幸蒲鲁东先生竟把工头当成普通工人，而且严禁他们渡过海峡。

1844年和1845年罢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这是因为1844年和1845年是1837年后英国工业繁荣的头两年。尽管这样，那时并没有一个**工联**解散。

现在我们来听听博尔顿的工头们的发言。他们说，厂主不能操纵工资，因为厂主不能操纵产品价格，其所以不能操纵产品价格，则是因为厂主不能操纵世界市场。于是他们根据这个理由，要求工人们懂得：不应当组织同盟来要挟老板增加工资。蒲鲁东先生则相反，他禁止组织同盟是唯恐引起工资的提高，因而引起生活必需品的普遍匮乏。不言而喻，工头们和蒲鲁东先生在提高工资就等于提高产品价格这一点上是同声相应的。

但是，使蒲鲁东先生恼怒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呢？不是。他对博尔顿的工头们恼怒纯粹是因为他们用**供求关系**来确定价值，毫不关心**构成价值**，即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毫不关心价值的构成，其中包括**不断的交换可能性**以及其他一切同天命并列的**关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关系**。

"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 每一个工人有个人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第1卷第334和335页）

蒲鲁东先生想把刑法典的条文说成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结果。

在英国，组织同盟是议会的法令所认可的，而且正是经济制度迫使议会以法律的形式作出了这种认可。1825年，在哈斯基森大臣任内，议会必须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应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环境，在这个时候，议会不得不废除一切禁止工人组织同盟的法律。现代工业和竞争越发展，产生和促进同盟的因素也就越多，而同盟一经成为经济事实并日益稳定，它们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

因此，刑法典的有关条文至多只能证明，在制宪议会和帝制时期，现代工业和竞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211]

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①在谴责**同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经济学家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如果你们结成同盟，就会阻碍工业的正常进程，妨碍厂主满足订货要求，扰乱商业，加速采用机器，而机器会使你们的一部分劳动毫无用处，从而迫使你们接受更低的工资。再说，你们的行动肯定是徒劳的。你们的工资总是决定于人手的供求关系；抗拒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不但可笑，而且危险。

社会主义者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你们这样做最终会得到什

①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弗·恩·"——编者注

么呢?能提高工资吗?经济学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们证明:即使事情顺利,在短期内多拿到几文钱,但是以后工资要永远减少下去。熟练的核算家会向你们证明:单是你们组织和维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笔经费,就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从提高的工资中得到补偿。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则要告诉你们:即使不谈钱的问题,你们也决不会因为结成了同盟就不再当工人,而老板将来却照旧当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为组织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吗?

经济学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经形成、经济学家已经在自己的教科书里加以描述并予以肯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

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更好地进入他们用非凡的先见之明为工人准备就绪的新社会。

不管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什么教科书和乌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扩大。现在甚至可以说,同盟在一国内的发展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且组织得最好的同盟。

在英国,工人们就不限于组织一些除临时罢工外别无其他目的并和罢工一起结束的局部性同盟。他们还建立经常性的同盟——**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现在,所有这些地方工联已组成为全国职工联合会[212],拥有会员8万人,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这些罢工、同盟、工联是与工人的政治斗争同时并进的,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153]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

劳动者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

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而且在经常联合的资本面前,对于工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重要。下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只是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必要的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一旦达到这一点,联盟就具有政治性质。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阶段历时最长,花的力量也最多。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

对资产阶级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城市自治团体直到构成阶级,已有不少的探讨。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对罢工、同盟以及无产者在我们眼前实现他们组成为阶级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给以明确说明的时候,一些人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验的**蔑视。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的阶级统治呢?不是。

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①

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导致剧烈的**矛盾**、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

---

①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的和有限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这些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213,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弗·恩·"——编者注

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①

卡·马克思写于1847年上半年

1847年7月初以小册子形式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和1847年法文版翻译

①见乔治·桑《扬·杰士卡》。——编者注



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和1932年北平东亚书局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译本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214]

[第　一　篇]

布鲁塞尔9月26日。今天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登了海因岑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海因岑以反驳编辑部的无谓指责、为自己进行辩护为借口，大张旗鼓地开始同共产主义者论战。

编辑部建议双方不要进行论战。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本来只应发表海因岑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即确实是对指责他首先攻击共产主义者的说法加以反驳、为自己进行辩护的那一部分内容。即使“海因岑没有一份可供自己支配的报纸”，这也不能成为理由，说明应当提供一份报纸供他支配，让他发表连该报编辑部自己都认为是无聊的攻击性的东西。

不过，这篇文章的发表倒是向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帮助。过去任何一个党派所受到的责难，都没有像海因岑在这篇文章中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这样荒唐和狭隘。这篇文章最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是正确的。它证明，如果共产主义者以前一直没有抨击过海因岑，那么，现在就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了。

海因岑先生一开头就以德国一切非共产主义激进派的代表自居；他想以一个党同另一个党争论的方式同共产主义者进行争论。他

“有权提出要求”，他极其坚决地宣称：“必须估计到”共产主义者会做些什么，“必须要求他们”做些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是什么。他把**他**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德国共和派与民主派”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完全混为一谈，并用“**我们**”一词来代表这些共和派说话。

海因岑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代表谁呢？

海因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小官吏，他在1844年还如痴如醉地向往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和可怜的德国宪法，他至多只是在私下小心翼翼地承认过，在很遥远的未来，共和国也许是值得向往而又能够实现的。但是，海因岑先生认为在普鲁士有可能进行合法斗争，这一点是错了。他曾因为他那本关于官僚制度的蹩脚著作（连雅科布·费奈迭在多年以前写的一本论述普鲁士的著作都比他的好得多）[275]而不得不逃亡在外。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宣称进行合法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变成了革命家，当然也变成了共和派。在瑞士，他结识了严肃的学者卢格；卢格向他传授了自己的那一丁点儿哲学，这种哲学是用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关于人的学说、黑格尔的影响和施蒂纳的高调拼凑而成的杂乱无章的东西。海因岑先生掌握了这一套东西之后，便以为自己成熟了，于是他右靠卢格，左靠弗莱里格拉特，开始了他的革命宣传。

当然，我们并不想责难海因岑先生从自由主义转向疯狂的激进主义。可是我们要指出，他这种转变完全是由于个人因素的影响。当海因岑先生还有可能进行合法斗争的时候，他对一切认为必须进行革命的人都加以攻击。一旦**他**不可能再进行合法斗争，他就声称这种斗争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而不考虑德国资产阶级目前还完全有可能进行这种斗争，而且他们的斗争常常具有十分合法的性质。**他**的退

路一旦被切断，他就宣称必须立即进行革命。他不去研究并从总体上把握德国的情况，由此推断什么样的进步措施、什么样的发展以及什么样的办法是必要而又切实可行的，他不去弄清德国各个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同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确定应当遵循的政策，总之，他不是使自己适应德国的发展进程，而是十分任性地要求德国的发展进程适应他自己。

当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海因岑先生曾激烈地反对过它。而一旦哲学变得反动，成了所有动摇分子、懦夫和雇佣文人的避难所，海因岑先生便不幸地同它合流了。对海因岑先生来说更加不幸的是，那个毕生都只充当改宗者的卢格先生，又使海因岑先生成了唯一在他的劝诱下改变信仰的人。因此海因岑先生肯定会使卢格先生得到安慰，因为至少有一个人自认为领会了卢格先生空洞言论的奥义。

海因岑先生究竟主张什么呢？他主张立即建立德意志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是美国的传统和1793年的传统以及从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某些措施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具有鲜明的黑红黄色彩。[216]德国由于本国工业委靡不振，在欧洲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地位，以致它永远不可能发挥首倡精神，永远不可能首先宣布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永远不可能离开法国和英国而独立自主地建立共和国。任何一个脱离文明各国的运动而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任何一次据称要独立自主地进行的、按照海因岑先生的主张将完全对德国各个阶级的实际运动置之不顾的德国革命，都是以黑红黄色装饰起来的纯粹幻想的产物。为了使这个光荣的德意志共和国更加光荣，海因岑先生把它嵌进卢格化的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的学说的框子里，宣布它是即将出现的“人”的王国。所有这些层出不穷的幻想，难道都要德国人去实现吗？

可是,伟大的"鼓动家"海因岑先生究竟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呢?他宣称君主是造成一切贫困和一切灾难的祸首。这种论断不仅可笑,而且极端有害。海因岑先生在这里对德国君主这帮庸碌无能、昏聩愚蠢的傀儡的阿谀谄媚,实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为他把一种虚构的、超自然的、神奇的无限威力加在这帮傀儡身上。海因岑先生既然断言君主能造成如此多的灾祸,那他同时也就承认君主有能力做出同样多的好事。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是必须进行革命,而是应当虔诚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君主、好心的皇帝约瑟夫。但是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谁是压迫他们的人。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

海因岑先生号召立即举行起义。他本着这个精神印刷传单,试图在德国散发。试问:这种毫无意义的、盲目进行的宣传难道不是极其严重地损害着德国民主派的利益吗?试问:难道经验没有证明这种宣传是毫无补益的吗?难道在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动荡时期即30年代,德国境内没有散发过几十万份类似的传单、小册子吗?难道其中有一份取得什么成效了吗?试问:难道一个头脑多少还正常的人会异想天开地认为人民对这类政治说教和训诫将予以丝毫重视吗?试问:海因岑先生在他的传单中除了进行训诫和说教以外,什么时候还做过别的事情吗?试问: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顾及实际情况,就声嘶力竭地向全世界发出革命号召,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党的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德国民主派报

刊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以下各个方面证明民主制的必要性:目前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贵族的政府是应当受到鄙弃的,那种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立宪制度是不完备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报刊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不仅产生了政治压迫,而且首先产生了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种压迫;它应该证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取得政权是采取这些手段的首要条件。其次,它应该探讨,立即实现民主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党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当它还很软弱不能独立行动的时候,它应当联合哪些党派。所有这些任务,海因岑先生完成了一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花费精力这样做。他没有向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说明任何问题。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各阶级和党派的情况。他所做的,无非是在"暴动,暴动,暴动!"这**一个**题目上玩弄花样。

海因岑先生又是对谁进行这种革命说教的呢?首先是对小农这个在目前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近600年来,一切进步的运动都发源于城市,其结果就是:第一,农民的独立民主运动(瓦特·泰勒、杰克·凯德、扎克雷、农民战争)[217]每一次都是反动的,第二,这种运动每一次都被镇压下去。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1789年的法国革命,英国、法国和美国东部各州的现代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海因岑先生在现在,在19世纪,却还把希望寄托在农民暴动上面!

然而海因岑先生也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当然,这是由于人民对他的号召表示冷淡才慢慢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又是些什么改革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步骤。在海因岑先生

那里唯一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却又是他从他所激烈抨击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一到他的手里，也成了荒谬绝伦、虚无缥缈的东西。一切旨在限制竞争和限制大资本聚积在个别人手里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废除继承权的办法，以及一切通过国家来对劳动进行组织的办法等等，所有这些措施作为革命的措施不仅是可能实行的，甚至是必须实行的。这些措施之所以有可能实行，是因为整个奋起反抗的无产阶级赞同这些措施并用武力支持这些措施。尽管经济学家借口一些困难和弊端来反对这些措施，这些措施还是有可能实行的，因为正是这些困难和弊端将迫使无产阶级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这些措施作为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措施和过渡的中间阶段是有可能实行的，而且它们也只能是这样一种措施。

可是海因岑先生却要把所有这些措施都当做确定不移的最终的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不应当是为实现任何目标而采取的准备步骤，而应该是最终的措施。在他看来，这些措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些措施不是要导向革命的社会状态，而是要导向宁静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状态。这样一来，这些措施就成为不能实现的，而且是反动的了。与海因岑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措施与自由竞争比较起来是反动的，他们这种看法完全正确。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因此一切从私有制的基础出发而同时又反对自由竞争的措施都是反动的，都力图恢复私有制的低级发展阶段，因此，这种措施最终必将在竞争面前遭到失败，使目前这种社会状态重新恢复。只要我们把上述社会改革看成单纯的社会福利措施，看成革命的过渡的措施，资产者的这些反对意见就会显得毫无力量，而这些反对意见却会使海因岑先生的农业的、社会主义的、黑红黄色

的共和国彻底破产。

海因岑先生当然异想天开地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人之一）当然不可能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海因岑先生不可能知道，不改变整个农业经营方式就不能把大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土地所有制，不然，大土地所有制很快就会重新恢复起来。海因岑先生不可能知道，现代大工业、资本积聚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海因岑先生不可能知道，像德国这样一个在工业上处于依附和被奴役地位的国家，只能对本国的财产关系实行有利于资产阶级和自由竞争的改造，除此之外，它永远也不敢独立自主地实行其他类型的改造。

总之，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那里是有意义的、明智的，因为它们不是随意提出的措施，而是从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中，以及由此决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结果；由此产生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最终的措施，而是从过渡性的阶级斗争本身产生的过渡性的社会福利措施。

这些措施在海因岑先生那里却既无意义，又不明智，因为在他那里它们纯粹是任意编造出来的改善世界的庸俗幻想，因为他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些措施和历史发展的联系，因为海因岑先生一点儿都不考虑实现自己的建议的物质可能性，因为他不是力求表述工业领域的各种必然性，而是力求用法令来消除这些必然性。

正是这位粗暴地把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搞得十分混乱并把它们变成纯粹的空中楼阁以后才加以接受的海因岑先生，却指责共产主义者，说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说他们“追求空中楼阁”、“丧失了现实基础〈!〉”！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整个鼓动活动；我们直言不讳地声明，我们认为这种鼓动对整个德国激进派是极其有害的，是有损它的声誉的。党的政论家应当具备完全不同于海因岑先生（前面已经指出，他是本世纪最无知的人之一）所具有的素质。海因岑先生也许怀有人间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许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具有勇气和毅力。但是，单凭这些条件还不能成为党的政论家。作为党的政论家，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洪亮的嗓音而外，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同海因岑先生现在具有的和多年经验证明他能够具有的各方面的条件相比，党的政论家还需要具有更多的智慧、更明确的思想、更好的风格和更丰富的知识。

然而海因岑先生由于逃亡在外，就势必要去充当一名党的政论家。他不得不在激进派中间试行组织自己的党派。于是他就担任了他所无法胜任的职务，他为履行这一职务而进行的种种徒劳的努力，只是使他成为笑料。如果德国的激进派让他保留这样一种假象：似乎他就是激进派的代表，似乎他是以激进派代表的身份成为笑料的，那么，他就会使德国激进派本身也同样成为笑料。

可是海因岑先生并不代表德国激进派。他们的代表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如雅科比等。海因岑先生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出钱支持他进行鼓动的少数几个德国资产者外，谁也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不过我们错了。德国有一个阶级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对他狂热崇拜，为他大吹大擂，竭力为他压倒所有饭店顾客的声音（正像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共产主义者"压倒了整个著作界反对派的声音"一样）。这个阶级就是人数众多、思想开明、信念坚定而又颇有影响的推销人阶级。

就是这位海因岑先生，居然要求共产主义者承认他是激进的资产者的代表，要求共产主义者把他当做激进的资产者的代表和

他争论！

上面讲的一切已经足以说明，共产主义者对海因岑先生的驳斥是正确的。我们准备在下一期谈一谈海因岑先生在本报第77号上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

假如我们不是坚信海因岑先生根本没有能力当一名党的政论家，我们就会劝他仔细钻研一下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因此，在他劝我们去阅读福禄培尔的《新政治》的时候，我们只能回报以另一种劝告：请保持安静，心平气和地等待"战斗"吧。我们相信，海因岑先生作为一个政论家有多么拙劣，作为一个营指挥官就会多么英明。

为了使海因岑先生不致抱怨匿名攻击，我们在本文末尾署上名字。

弗·恩格斯

[第　二　篇]

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说明，共产主义者之所以抨击海因岑，并不是因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蹩脚的民主派政论家。他们并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而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对他进行抨击的。至于同他展开论战的恰恰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完全是出于偶然；即使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肯定是要起来反对海因岑的。这里争论的全部问题仅仅涉及下面两点：(1)海因岑先生能不能作为党的政论家和鼓动家给德国民主派带来好处，我们否定这一点；(2)海因岑先生的鼓动方式是否正确，人们对这种鼓动方式是否还能容忍，对这一点我们也是否定的。可见，这里既不涉及共产主义，也不涉及民主主义，这里涉及的只是海

因岑先生个人及其个人的妄想。

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无益的争论，相反，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们自己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派的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完全可以从理论上进行讨论，而决不会使共同行动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人们甚至可以对民主主义实现以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所有儿童的教育费用由国家负担等等。

我们还是来谈谈海因岑先生吧。

海因岑先生宣称，是共产主义者先同他争论，而不是他先同共产主义者争论。这是人所共知的无赖式的论据，因此我们不打算同他争辩。他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者的冲突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激进派阵营里制造的无谓分裂”。海因岑说，早在三年前，他就曾尽一切力量并利用一切机会来防止即将发生的分裂，但是他的努力未能奏效，结果共产主义者还是对他发起了攻击。

大家都很清楚，三年前海因岑先生根本还不在**激进派阵营里**。当时海因岑先生还主张实行法律范围内的进步措施，坚持自由主义。因此，同他的分裂决不意味着**激进派**阵营内部的分裂。

海因岑先生是1845年初，在布鲁塞尔这里见到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当时根本没有因为海因岑先生在政治上坚持所谓激进主义而想要攻击他，相反，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当时还是自由派的

海因岑先生转到这种激进主义的立场上来。但没有用。海因岑先生只是到了瑞士才成为民主主义者。

"后来我越来越深信〈!〉大力反对共产主义者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是深信在激进派阵营制造无谓的分裂是必要的!我们请问德国民主主义者们:这样可笑地自相矛盾的人配做党的政论家吗?

可是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对他进行攻击的共产主义者是些什么人呢?上文提到的那些暗示,特别是下面紧接着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海因岑说,共产主义者

> "压倒了整个著作界反对派阵营的声音,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他们还肆无忌惮地贬低最激进的人士,……他们竭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最后,他们甚至直接同反动派联合起来。更糟的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显然是在他们的教义的影响下,他们常常堕落为**卑鄙的奸险的阴谋家**……"

这些模模糊糊的责难描画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形象——雇佣文人卡尔·格律恩先生的形象。三年以前,格律恩先生同海因岑先生之间曾有过一些个人的纠葛;格律恩先生为此在《特里尔日报》上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攻击,格律恩先生曾试图压倒整个著作界反对派阵营的声音,曾竭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等等。

可是,格律恩先生是从什么时候起成为共产主义的代表的呢?即使三年以前他曾经企图靠近共产主义者,人们也从未承认他是共产主义者,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自命过,近一年多以来他甚至还认为必须反对共产主义者。

况且,马克思在当时就曾向海因岑先生表示不同意格律恩先生的做法,后来,他一有机会就公开地揭露格律恩的真面目。[218]

至于海因岑先生最后对共产主义者进行"卑鄙的奸险的"诬蔑,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由于格律恩先生和海因岑先生之间的纠葛。这

种纠葛同上述两位先生有关，而同共产主义者却毫不相干。我们连这种纠葛的详细情形都不了解，因此无从评判。我们姑且假定海因岑先生是对的。但是当马克思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已经否定了有关人士的做法以后，当这位有关人士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已经昭然若揭以后，如果海因岑先生还要把这种纠葛说成是共产主义教义的必然后果，那就太卑鄙了。

如果说海因岑先生的上述责难除了针对格律恩先生以外还针对别的什么人，那么，他所针对的无非是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人的十足的反动理论早就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否定。这个现在已经完全瓦解的派别中所有能够前进的人都已经站到共产主义者这一边来了，并且只要“真正的社会主义”一露头角，他们就加以抨击。海因岑先生把这些早已被埋葬的幻想又挖掘出来，并把它们归咎于共产主义者，这就再一次暴露了他的屡见不鲜的极端无知。海因岑先生在这里指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同共产主义者混为一谈，而后来他却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指责共产主义者荒诞不经。因此，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抨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本人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属于这一派。当共产主义者撰写文章猛烈抨击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这位海因岑先生正在苏黎世倾听卢格先生传授他自己混乱的脑袋里所装的那一套支离破碎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确实，卢格先生找到了一位值得教诲的门生！

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哪儿呢？海因岑先生谈到了值得尊敬的非凡人才和才华横溢的人物，而且预言这些人将拒绝共产主义的同情〈!〉①。共产主义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行动已经

①卡·海因岑要讲的是“拒绝同情共产主义”。这种表达方式说明他的文风很糟糕，所以恩格斯在这里加了〈!〉。——编者注

拒绝给以同情。在上述所有的责难中，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加在共产主义者的头上，只有这整段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例外，这句话原文如下：

> "共产主义者……妄自尊大，嘲笑一切可以成为**正直的人**联合的基础的东西。"

海因岑先生这句话大概是指共产主义者曾讥笑他那道貌岸然的姿态，并曾嘲讽所有那些神圣高超的思想、操守、正义、道德等等，海因岑先生以为，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一切社会的基础。这个责难我们接受。尽管海因岑先生这个**正直的**人感到义愤填膺，共产主义者还是要继续嘲讽这些**永恒的真理**。而且共产主义者认定，这些永恒的真理决不是它们自身形成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基础，恰恰相反，它们是那个社会的产物。

此外，既然海因岑先生已经预见到，共产主义者对他想列入共产主义者营垒的那些人将拒绝给以同情，那么，他进行所有这些荒唐的责难和卑鄙的诬蔑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海因岑先生对共产主义者的了解显然只是来自道听途说，既然他对共产主义者是些什么人知之甚少，以致要求他们对自身的情况作出更确切的说明，要求他们向他作一番**自我介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同共产主义者进行论战，这岂不是太无耻了吗？

> "如果对那些真正代表共产主义或叙述共产主义真实内容的人的情况作出说明，这可能会使大部分信奉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的人完全脱离共产主义，而反对这种要求的恐怕也不会只是《特里尔日报》的那些人。"

隔几行下面接着写道：

"对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相信**他们会坚决而又**真诚地**〈哦，好一个老实人！〉坦率宣布自己的教义，并宣布同那些非共产主义者脱离关系。**应当要求他们**〈这一切都是老实人的用语〉不要**伤天害理地**〈！〉助长那种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所制造的**混乱**，而制造这种混乱的手段就是通过幻想或欺骗，硬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说成有可能实现，即认为有可能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找到实现这种教义的途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又是这个老实人〉是：或者让所有站在他们一边的不明实情的人充分地了解实情，并把他们引向一个既定目标，或者同他们**一刀两断，不再利用他们。**"

假如卢格先生造出了上面这样三个主从复合句，那他就会感到欣幸了。老实人的思想混乱同老实人提出的各种要求是完全吻合的，在思想混乱的情况下，他所关心的只是事情本身，而决不是形式，正因为如此，他讲的和他想讲的就截然相反。海因岑先生要求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一刀两断，要求他们结束由于混淆两个不同的派别而产生的混乱（这正是他**想要**讲的）。但是当"共产主义者"和"混乱"这两个词在他脑袋里碰到一起的时候，他脑袋里却产生了混乱。海因岑先生的思路中断了；他那固定不变的公式，即共产主义者**一般**都要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这个公式，成了他自己的绊脚石，他忘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他笨拙可笑地在各种通过幻想和欺骗硬被说成可能实现而实际上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上跌跌撞撞地行进，最后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整个倒了下去，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清醒过来。这时他才又想到，他想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他谈的根本不是这个或那个是否可能的问题。他又回到自己的题目上来，但他还是神情恍惚，连他在前面要把戏时所用的那个冠冕堂皇的句子都没删掉。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文风。至于事情本身，我们再说一遍，作为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海因岑先生的要求提得太晚了，共产主义者早就

否定了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次，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背地里进行诬蔑同老实人的本性也决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特别是海因岑先生十分明显地让人意识到，共产主义政论家只是在利用那些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他相当直率地表示，这些政论家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会使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的大部分人完全脱离共产主义。他把共产主义政论家看做先知、术士或牧师，认为他们把某种秘密的谋略据为己有，而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守口如瓶，以便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应当**使**一切**不明实情的人了解实情**而不应当**利用**他们，他所提出的所有这些老实人的要求显然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似乎共产主义著作家乐于让工人对实情一无所知，似乎他们只是在利用那些工人，就像上一世纪的伊留米纳特[219]企图利用人民一样。这种荒唐的看法也使海因岑先生不合时宜地到处宣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头脑中的混乱，而且语句颠三倒四，这是他说话不直截了当的报应。

我们只是把这些诬蔑指出来，而不再就此展开辩论。我们让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去评判。

我们看了海因岑先生所有这些预先声明、迂回其辞、要求、诬蔑和种种把戏以后，最后来看看他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击和他的论据。

海因岑先生

> "认为共产主义教义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也包括在内）和作为这种废除的必然结果的共同利用人间财富的原则"。

海因岑先生异想天开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的**教义**。海因岑先生

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海因岑先生现在也许会认识到，他在评判共产主义的时候，只是认为它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是不够的；他最好不要信口开河地空谈废除私有财产，而应当研究一下国民经济学；假如他对废除私有财产的条件也不了解，那他对废除私有财产所造成的**后果**就不可能有丝毫的认识。

可是，海因岑先生对废除私有财产的条件极端无知，他竟认为"共同利用人间财富"（措辞挺不坏）是废除私有财产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大工业和机器设备、交通工具、世界贸易发展的巨大规模使这一切越来越不可能为个别资本家所利用，因为日益加剧的世界市场危机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因为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的生产**力**和交换**手段**日益超出了个人交换和私有财产的范围，总之，因为工业、农业、交换的共同管理将成为工业、农业和交换本身的物质必然性的日子日益逼近，所以，私有财产一定要被废除。

因此，如果海因岑先生把废除私有财产（这种废除当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同这种废除本身的条件分离开来，如果他把废除私有财产置于同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之外，只是把它视为蛰居书斋而

产生的臆想，那么，这种废除就成了纯粹的空谈，海因岑先生只能就此发表一通平庸的废话。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通过上面所谈到的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的做法，共产主义必然也要废除个**人的独立存在**〈可见，海因岑先生是在责备我们要把人们变成连体双胎〉。结果又把每个人投入几乎是〈!!〉刻板划一的兵营生活〈有劳读者留意，海因岑先生承认这一切只是他自己妄谈个人的独立存在的结果〉。共产主义者就这样毁灭了个性……独立性……自由〈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陈词滥调。由于违背自己意愿的分工而成为鞋匠、工厂工人、资产者、律师、农民，即成为一定工作以及与这种工作相适应的习俗、生活方式、偏见、局限性等等的奴隶的现代个人，似乎还具有某种可以毁灭的个性!〉。共产主义把个人连同他**获得的**私有财产这个个人必不可少的属性或基础〈这个“**或**”字真是妙极了〉用来祭祀‘共同体或社会的幽灵’〈这不也是施蒂纳的话吗?〉，而对每个个人来说，共同体可以而且应该〈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海因岑先生特别重视**获得的**私有财产，这就再一次证明了他根本不了解他所谈论的对象。海因岑先生本着他那老实人的正义感，想把各人挣得的留给各人，可惜这种正义感被大工业化为乌有了，只要大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使自己完全挣脱私有财产的羁绊，它就不能容许现存方式以外的其他任何分配产品的方式，资本家就还要把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工人在实践中也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蒲鲁东先生曾经企图对**获得的**财产进行系统的阐述，并把它同现存关系联系起来，大家知道，他的这种企图显然已经破产了。诚然，海因岑先生永远也不敢进行类似的尝试，因为这样他就必须研究问题，而他是不打算进行什么研究的。不过，他仍然可以将蒲鲁东先生作为前车之鉴，少向公众显示自己获得的财产。

如果海因岑先生还来指责共产主义者，说他们追求空中楼阁，丧失了现实基础，那么试问这种责难到底对谁最为合适呢?

海因岑先生还谈了许多别的，我们都不去管它了。我们只是指

出，越往后他的语句就越糟糕。他始终未能找到恰当的词语，因而语言显得拙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败坏任何一个承认他是自己的著作家的党派的名声。他那固执的信念总是使他说出一些完全不是他所想说的话。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两重废话：一种是他想说的废话，另一种是他不想说但还是说出来的废话。上面我们已经举了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海因岑先生不断重复他关于君主威力的陈旧的迷信观点，他说，那种应当被推翻而本身也无非是国家权力的**政权**，现在是而且过去也始终是一切不公正现象的制造者和维护者，他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并在这个幻想的大厦的范围内“进行所有那些由于普遍的发展〈!〉而产生的理论上正确〈!〉而又实际可行的〈!〉社会改革”!!!

愿望多好，文风就多糟，这就是正直的品德在这个丑恶的世界上的命运。

受到了时代精神的诱惑，
成为出身林莽的长裤汉[220]，
舞跳得虽然十分拙劣
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信念；
……
虽无才能，却有性格。[221]

我们的文章会使海因岑先生陷入一个老实人在受到屈辱时所产生的那种义愤之中，但他既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写作风格，也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那种败坏名声和毫无补益的鼓动方式。他威胁说，他要在行动和决战的那一天把敌人吊在路灯柱上，这使我们感到十

分可笑。

总之，共产主义者应当而且也希望同德国激进派采取共同行动。但是他们保留对任何一个败坏整个党派声誉的政论家进行抨击的权利。仅仅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才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抨击。

弗·恩格斯

1847年10月3日于布鲁塞尔

注意：我们刚才收到一个工人[1]写的小册子：《海因岑的国家。**斯蒂凡**的批评意见》伯尔尼版，由雷策尔印行。如果海因岑先生的写作水平能赶上这个工人的一半，那他就可以感到欣慰了。除了其他一些东西外，海因岑先生从这本书中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工人对他的农业共和国丝毫不感兴趣。我们还要指出一点，这是第一本由工人写成的书，这本书不是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力图说明当代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日

载于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翻译

[1] 斯·波尔恩。——编者注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222]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

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223]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工商业繁荣期和萧条期的更替,取决于没有节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条件下的这种穷人、这种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一向是自由的和没有节制的一样。

第四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因而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生产的商品

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生产的又便宜又好。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工业全部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于是资本家很快就占有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从此，在衣料生产方面就实行了工厂制度。机器和工厂制度一经采用，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和金属品制造业等部门。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于是，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现在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分工可以使产品生产得更快，因而也更便宜。分工把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常简单的、时刻都在重复的机械操作，这种操作利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因此，所有这些工业部门都像纺纱和织布业一样，一个跟着一个全都受到了蒸汽动力、机器和工厂制度的支配。这样一来，这些工业部门同时也就全都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除了原来意义上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也渐渐受到工厂制度的支配，因为这里的大资本家也在通过建立可以大量节省开支和实行细致分工的大作坊，不断挤掉小师傅。结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劳动部门都照工厂方式进行经营了，在所有劳动部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几乎都被工业挤掉了。于是，从前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工人原来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现在已经几乎独占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这个阶级叫做无产者阶

级或无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无产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给资产者的？

答：劳动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劳动的价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由同样的规律决定的。正像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在大工业或自由竞争的统治下，情形都一样，商品的价格平均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灭绝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工人的劳动所得不会比为了这一目的所必需的更多。因此，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将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额。但是，因为工商业有时萧条有时兴旺，工人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像厂主出卖商品所得有多有少一样。如果把工商业繁荣期和萧条期平均起来，厂主出卖商品所得既不多于他的生产费用，也不少于他的生产费用，同样，工人平均所得也是既不会多于这个最低额，也不会少于这个最低额。大工业越是在所有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工资的这一经济规律体现得就越充分。

第六个问题：在工业革命前，有过什么样的劳动阶级？

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直到今天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他们还是这种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贵族的**农奴**，直到今天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他们还是这种农奴。此外，在中世纪，直到工业革命前，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渐渐出现了受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单个的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与主人利害攸关，他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单个的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财产，他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做物，不被看做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处于比奴隶更高的阶段。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占有并使用一种生产工具，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用别人的生产工具为这个别人做工，从而得到一部分收益。农奴是交出东西，无产者是得到报酬。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财产所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获得解放。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224]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有什么区别？

答：16—18世纪，几乎任何地方的工场手工业工人都占有生产

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几乎总是生活在农村，和地主或雇主维持着或多或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而变成无产者。

第十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首先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第一，由于在世界各国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旧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闭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获得解放，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地方，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和势力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专制王朝。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

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势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摧毁了行会师傅的势力。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取代行会和手工业者的特权；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什么也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只是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才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从而资本家，资产者成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势力以后，也就消灭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上升为第一阶级以后，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阶级。它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做到这一点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立宪君主制的形式。在这种立宪君主制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这些资产者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者政府。

第三，工业革命到处都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者越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越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加，所以无产阶级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是完全同步的。同时，工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其次，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上面说过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

越来越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工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

第十二个问题:工业革命进一步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兴旺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因此,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225],每一次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

第十三个问题:这种定期重复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发展初期自己造成了自由竞争,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大工业必须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只要还在现今的基础上进行经营,就只能通过每七年出现一次的普遍混乱来维持,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因此,或者必须完全放弃大工业本身(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大工业使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成为绝对必要的,在这个全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

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

这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

(1)从现在起，可以把所有这些弊病完全归咎于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

(2)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这些弊病的手段已经具备。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公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私有制本身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不是一向就有的;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工场手工业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工场手工业便产生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要看生产的发展阶段。在依赖农业的中世纪,是领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行会师傅、帮工和短工;在17世纪是工场手工业主和工场手工业工人;在19世纪是大工厂主和无产者。非常明显,在这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能以足够的产品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还没有发展到私有制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障碍。但是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越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

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十八个问题：这个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也许还需要第二次斗争，但是，这次斗争只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这些作为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现在已经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

（3）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5）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为止。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货币经营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

（7）随着国家拥有的资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国家工厂、作坊、铁路和船舶，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已垦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

（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2）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

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第二十个问题：最终废除私有制将产生什么结果？

答：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经营方式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

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到那个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还必须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过剩将成为新的进步的条件和起因，它将实现这种进步，而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因此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摆脱了私有制压迫的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场手工业和我们今天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农业在目前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小块化而难以利用现有改良成果和科学成就，而在将来也同样会进入崭新的繁荣时期，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因此，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而迄今为止的分工方式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面说过的水平，单靠机械和化学的辅助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当上个世纪的农民和工场手工业工人被卷入大工业的时候，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成为完全不同的人，同样，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共同经营生产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越来越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

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分工，将完全消失。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于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必然消灭。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为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点现在人们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

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迄今为止的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号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民族？

——保留原案[226]。

第二十三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宗教？

——保留原案[227]。

第二十四个问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

答：所谓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种社会已被大工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消灭，并且每天还在消灭。这一类社会主义者从现今社会的弊病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恢复封建和宗法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种弊病。他们的所有建议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这一目的。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们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并为此而洒出热泪。因为：

(1)他们追求一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他们企图恢复贵族、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他们想恢复的这种社会固然没有现今社会的各种弊病，但至少会带来同样多的

其他弊病，而且它根本不可能展现通过共产主义组织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何前景；

(3)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阶级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总要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那时他们马上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

第二类是现今社会的拥护者，现今社会必然产生的弊病，使他们为这个社会的存在担心。因此，他们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弊病。为此，一些人提出了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另一些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今社会的基础，从而保存现今社会本身。共产主义者也必须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希望沿着和共产主义者相同的道路去实现×××问题[①]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做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做足以消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病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同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

①手稿此处空白，指的是第十八个问题。——编者注

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

第二十五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

答：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坚持的社会主义措施中越接近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说，他们越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越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的利益就越多。例如在**英国**，由工人组成的宪章派就要比民主主义小资产者或所谓激进派在极大程度上更接近共产主义者。

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即全国土地改革派[228]。

在**瑞士**，激进派虽然本身也是个成分极其复杂的政党，但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所能接触交往的唯一政党，其中瓦特州和日内瓦州的激进派又是最进步的。

最后，在**德国**，资产阶级和专制君主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因此，在同政府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者，只是应当注意，不要跟着资产者自我欺骗，不要听信他们关于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

者和无产者进行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所采取的党的政策，将和在资产阶级现在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0月底—11月

1914年以小册子形式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波兰的演说[229]

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230]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

马克思的演说

各民族的联合和兄弟联盟，这是目前一切派别，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231]的一句口头禅。的确，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要使它们利益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只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只有工人阶级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对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的胜利，这些冲突在目前使各国互相敌视。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

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病入膏育了，我们绝对不希望它恢复。不过病入膏肓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经病入膏肓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人的处境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覆灭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覆灭是建立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的条件。

在所有的国家里，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因此，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因此，不应该在波兰解放波兰，而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因此，你们宪章派[153]不应该仅限于表达解放各民族的善良愿望。打倒你们国内的敌人，那时你们就可以自豪地感到，你们消灭了整个旧社会。

恩格斯的演说

我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今天破例以一个德国人的身份来讲几句话。我们德国的民主主义者特别关心波兰的解放。正是德国的君主们曾经从瓜分波兰[232]中得到好处，正是德国的士兵直到现在还在蹂躏加利西亚和波森。我们德国人，我们德国民主主义者，首先应当洗刷我们民族的这个污点。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正因为这样，波兰和德国才有着一致的利益，也正因为这样，波兰的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才能够为解放两个民族而共同努力。我也认为，导致民主主义胜利、导致欧洲各国解放的首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将来自英国的宪章派；我在英国已经住了几年，并且在这段时间内公开地参加了宪章运动[150]。英国的宪章派将第一个奋起，因为正是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为什么最为激烈呢？因为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英国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由于这种原因，对立方面的一切压迫阶级也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样，斗争便简单化了，因此只要有一次重大的打击，就能对这种斗争产生决定性影响。难道不是这样吗？贵族在英国已不再拥有任何权力，资产阶级独揽大权，并且控制着贵族。跟资产阶级对抗的是众志成城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战胜统治者资本家的

时刻已经日益临近了。过去使工人的各个部分互相分离的那种对立的利益已经消除，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趋于平均化，这一切你们都应归功于机器生产；没有机器生产就不会有宪章运动，即使机器生产使你们现在的处境恶化，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胜利才有可能。不仅在英国，就是在所有别的国家里，机器生产对工人的影响也都是如此。在比利时、美国、法国和德国，机器生产使一切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平均化了，并且越来越平均；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现在的共同利益，就是推翻压迫他们的阶级——资产阶级。各民族工人生活水平的平均化，他们的党派利益的一致，都是机器生产的结果，因此机器生产仍然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

载于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第9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翻译



卡·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233]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234]

这部著作从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235]上。它的基础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236]作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没有全文刊载；在第269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但这一点并未实现，因为当时接连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德累斯顿、伊瑟隆、埃尔伯费尔德、普法尔茨和巴登发生起义[237]——使报纸本身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这部著作的续稿，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始终没有发现[238]。

《雇佣劳动与资本》已经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过好几种单行本，最后一次于1884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合作印书馆出版。所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一字不动地按原稿印行的。可是，现在刊印的新版是宣传性质的小册子，发行量至少应当是一万册，因此我不免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修改地重印呢？

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不尽一致，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如果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而不言而喻：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

这种早期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修改地重印这些早期著作。在这种情况下，重印这些早期著作，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

但是，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这与上面所说的情况不同。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确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况且原本已经大量发行，在我将来有机会把它不加修改地编入全集重印以前，这已经够了。

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向资产者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确信，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工人对最艰深的经济学论述也很容易理解，而“有教养的人”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袭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法，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的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于工厂主进行营业、记账和计算价格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个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谬误和混乱。

经济学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在经济

学中被称做“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不断地发生变动；由于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影响，商品的价格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纯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当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在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本身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地时而上涨、时而下降的变动和波动中，经济学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波动所围绕的稳定的轴心。一句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

于是古典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古典经济学满足于这样的解释。我们也可以暂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给这一商品追加一个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价值量。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是简单地采用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总是以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资本论》第一卷里找到。①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445页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102页。——编者注

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么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假如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么我们对一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绝对地毫无所知。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

于是古典经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说：商品的价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费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逻辑施加一些暴行。他们不去考察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遗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工人**的生产费用。而这种生产费用是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改变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中，它同样是个特定的量，至少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是个特定的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条件下，在这里，居民中的一个人数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阶级，只有为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占有者工作以挣得工资，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工人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的数量繁殖下去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现在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是平均每天3马克。

这样，我们这个工人从雇他的资本家那里得到一天3马克的工

资。资本家借此让他一天工作比如说12小时。在这当中，资本家大致是这样盘算的：

假定我们的这个工人——一个钳工——应当做出他在一天里所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成必要样式的铁和铜——值20马克。又假定蒸汽机的耗煤量，以及这蒸汽机、旋床和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损耗，按一天时间和按他所占的份额计算，值1马克。一天的工资，照我们的假定是3马克。总共算起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要耗费24马克。但是资本家却打算平均从零件购买者手上取得27马克的价格，即要比他所支出费用多3马克。

资本家装到自己腰包里去的这3马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的，也就是按照相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于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27马克——就和它的价值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在这27马克当中，有21马克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20马克包含在原料中，1马克包含在工作期间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时所使用，因而工作效能已经按这一价值额降低了的机器和工具中。剩下的6马克被加到原料的价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们那些经济学家自己的假定，这6马克只能是从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个劳动中产生的。这样一来，他12小时的劳动创造了6马克的新价值。因此，他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等于6马克，这样我们就会终于发现什么是“劳动的价值”了。

“等一等！”——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说，——“6马克吗？但是我只拿到3马克呀！我的资本家向天发誓说，我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只等于3马克，假使我向他要6马克，就要被他嗤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前面在谈到劳动价值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陷在一个圈子里走不出去，那么现在我们又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多于我们所需要的。对于工人说来，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3马克；对于资本家说来却是6马克，资本家从这6马克中拿出3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其余3马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货币所表现的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那么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荒谬了。在12小时劳动时间内创造了6马克的新价值。这就是说，在6小时内创造的是3马克，即工人劳动12小时所得到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12小时，而他当做等价物得到的却是6小时劳动的产品。因此，或者是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12等于6！两种情况都是极端荒谬的。

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分支——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经济学家所看做“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马克思说：“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①因此，他最多只能出卖

①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5页。——编者注

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有待去完成），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资本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在计日工资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计件工资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费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一致的；那些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费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进而谈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马克思在论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也就是这样做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第3节）。

那么，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后，就是说为了获得预先讲定的工资——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去支配之后，情形又怎样了呢?资本家把这个工人带到自己的工场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经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料，辅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工作起来。假定他一天的工资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样是3马克，——至于他是以计日工资还是以计件工资获得这笔工资，那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我们还是照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12小时内用自己的劳动在被使用的原料上追加了6马克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是资本家在出卖成品的时候实现的。从这6马克中，他付给工人3马克，剩下的3马克则留给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12小时里生产6马克的价值，那么在6小时里他所创造的就是3马克的价值。这样，工人在替资本家工作了6小时之后，就已经把包含在工资中的3马克等量价值偿还给资本家了。在6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讫，谁也不欠谁一文钱。

"等一等!"——现在是资本家叫起来了,——"我雇工人是雇的一整天,是12小时。6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6小时做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算是两讫!"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愿"签订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6小时的劳动产品,应该去工作整整12小时。

计件工资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在12小时内制成了12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损耗共计2马克,而每件商品却卖$2\frac{1}{2}$马克。这样,在上面所假设的同样条件下,资本家只付给工人每件商品25分尼。12件就是3马克;要得到这3马克,工人必须工作12小时。资本家从12件商品上得到30马克。扣除原料和机器损耗共24马克外,还剩下6马克,从这6马克中,他拿出3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把其余3马克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样。这里工人为自己工作6小时,即为偿还自己的工资而工作6小时(在12小时中,每小时为自己工作半小时),而为资本家工作6小时。

那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们把"劳动**力**"价值作为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在我们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这就是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在现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里能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一项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费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的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时间就在缩短;

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分时间却在延长。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当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因为价值只是劳动的另一种表现，是我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些由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那些占有原料、机器、工具和预付资金，因而有可能去购买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所以，工人阶级从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资本家阶级保留在自己手里并至多也只需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随着每一项新的发明和发现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阶级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计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点也不增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缩减。

但是，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日益提高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最终必将造成一种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很少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免除极度贫困的任何保障。社会的这种状况日益显得荒谬，日益显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状况**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

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现在工人们正日益坚决地为实现这个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这一点，明天（5月1日）和星期日（5月3日）[239]将在大洋两岸都得到验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4月30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1年4月30日

载于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第109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雇佣劳动与资本

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①我们只是当这些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直接突显出来的时候，才有意地提到过这些关系。

过去我们要做的首先是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现的历史材料来从经验上证明：当进行过二月革命[240]和三月革命[241]的工人阶级遭到镇压的时候，工人阶级的敌人（在法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整个欧洲大陆则是反对过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同时被战胜了；法国“正直的共和国”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以争取独立的英勇战争响应了二月革命的那些民族的失败；最后，随着革命工人的失败，欧洲又落到了过去那种受双重奴役即受**英俄两国**奴役的地位。巴黎的六月斗争[242]，维也纳的陷落[243]，1848年柏林11月②的悲喜剧[244]，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拼命努力，爱尔兰的严重饥荒——这些就是集中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主要事件。我们曾经根据这些实例证明过：任何一次革命起义，不论它的目的显得离阶级斗争有多么远，在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胜利以前，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一种社会改革，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反革命没有在**世界战争**中用武器进行较量以前，都是要成为空想的。在我们的阐述中，也如在现实中一样，**比利时**和**瑞士**都是巨幅历史画卷中的悲喜剧式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4日”。——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柏林11月”前面没有“1848年”。——编者注

的、漫画式的世俗画：前者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典型国家，两者都自以为既跟阶级斗争无关，又跟欧洲革命无关。

现在，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经济关系本身，也就正当其时了，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

我们分三大部分来加以说明：(1)**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遭受奴役的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各个中间市民阶级和所谓的市民等级**[①]**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欧洲各国资产者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的奴役和剥削的情形**。

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加之，在德国到处都存在着对最简单的经济关系极端无知和理解混乱的现象，从特许的现存制度的辩护者到**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和**未被承认的政治天才**都莫不如此，这种人在四分五裂的德国比诸侯王爷还多。

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工资？它是怎样决定的**？

假如问工人们："你们的工资是多少？"那么一个工人回答说："我做一天工从我的雇主那里得到一马克[②]"；另一个工人回答说："我得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所谓的市民等级**"，而是"**农民等级**"。——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马克"，而是"法郎"。以下出现的"马克"原来也都是"法郎"。——编者注

到两马克”，等等。由于他们隶属的劳动部门不同，他们每一个人因[①]做了一定的工作（比如，织成一尺麻布或排好一个印张的字）而从各自的雇主那里得到的货币数量也不同。尽管他们得到的货币数量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工资是资本家[②]为一定的劳动时间或一定的劳动付出而偿付的一笔货币。

可见[③]，看起来好像是资本家[②]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他们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的东西，是他们的劳动**力**。资本家以一天、一星期、一个月等等为期购买这个劳动力。他在购买劳动力以后使用这个劳动力，也就是让工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劳动。[④]资本家[②]用以购买工人劳动力[⑤]的那个货币量，比如说两马克，也可以买到两磅糖或一定数量的其他某种商品。他用以购买两磅糖的两马克，就是两磅糖的**价格**。他用以购买12小时的劳动力的使用[⑥]的两马克，就是12小时劳动的价格。可见，劳动力[⑤]是一种商品，是和砂糖一模一样的商品。前者是用钟点来计量的，后者是用重量来计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⑤]去换得资本家的商品，即换得货币，并且这种交换是按一定的比例进行的。一定量的货币交换一定量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此处在“因”后面有“劳动了一定的时间或”。——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而是“资产者”。——编者注

③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可见”后面没有“看起来好像是”。——编者注

④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但这只是假象……也就是让工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劳动”这几句话。——编者注

⑤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⑥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的使用”，而是“劳动”。——编者注

的劳动力的使用[①]时间。织布工人的12小时劳动交换两马克。但是，难道这两马克不是代表其他一切可以用两马克买到的商品吗？可见，实质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②]，并且是按一定的比例交换的。资本家付给他两马克，就是为交换他的工作日而付给了他一定量的肉，一定量的衣服，一定量的劈柴，一定量的灯光，等等。可见，这两马克是表现劳动力[③]同其他[④]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即表现他的劳动力[③]的**交换价值**。商品通过**货币**来估价的交换价值，也就称为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只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⑤]的特种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价格的特种名称。

拿任何一个工人来说，比如拿一个织布工人来说吧。资本家[⑥]供给他一台织布机和一些纱。织布工人动手工作，把纱织成了布。资本家把布拿去，卖了比方说20马克。织布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块布中的**一份**，20马克中的**一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一份**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织布工人是在布还没有卖出以前很久，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没有织成以前很久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资的。可见，资本家支付的这笔工资并不是来自他卖布所赚的那些货币，而是来自他原来储备的货币。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的使用"，而是"劳动"。——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而是"劳动交换各种各样的商品"。——编者注

③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④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其他"一词。——编者注

⑤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而是"**劳动价格**"。——编者注

⑥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而是"资产者"。——编者注

资产者给织布工人提供的织布机和纱不是织布工人的产品，同样，织布工人用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①]交换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产品。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资产者给自己的布找不到一个买主。他出卖布所赚的钱，也许甚至不能捞回他用于开销工资的款项。也有可能他出卖布所得的钱，比他付给织布工人的工资数目大得多。这一切都与织布工人毫不相干。资本家拿自己的一部分现有财产即一部分资本去购买织布工人的劳动力[①]，这就同他拿他的另一部分资本去购买原料(纱)和劳动工具(织布机)完全一样。购买了这些东西(其中包括生产布所必需的劳动力[①])以后，资本家就用只是**属于他的原料和劳动工具**进行生产。当然，我们这位善良的织布工人现在也属于劳动工具之列，他也像织布机一样在产品中或在产品价格中是没有份的。

所以，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①]的那一部分。

总之，劳动力[①]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它呢？为了生活。

可是，劳动力的表现即[②]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已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劳动力的表现即”。——编者注

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采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窖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对于他来说，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能不能被看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12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挣钱**，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如果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

劳动力①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力①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出卖自己的劳务一样。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力①一次而永远地卖给奴隶的所有者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力①却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①。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领得报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贡赋。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相反，**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日复一日地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拍卖给出钱最多的人，拍卖给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属于某个所有者，也不属于土地，但是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他每日生命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却属于这些时间的购买者。工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可以随意辞退工人，只要资本家不能再从工人身上获得利益或者获得预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辞退工人。但是，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①]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②]；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这个资本家阶级[③]中间寻找一个买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现在，在更详细地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先简短地叙述一下在决定工资时要考虑到的一些最一般的条件。

我们已经说过，**工资**是一定商品即劳动力[①]的**价格**。所以，工资同样也是由那些决定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规律决定的。

那么，试问：**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

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④]

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是**三方面**的。

同一种商品，有许多不同的卖者供应。谁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卖同一质量的商品，谁就一定会战胜其他卖者，从而保证自己有最大的销路。于是，各个卖者彼此间就进行争夺销路、争夺市场的斗争。他们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而是“**不是属于某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即资产者阶级**”。——编者注

③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编者注

④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5日”。——编者注

每一个人都想出卖商品，都想尽量多卖，如果可能，都想由他一个人独卖，而把其余的出卖者排挤掉。因此，一个人就要比另一个人卖得便宜些。于是**卖者之间**就发生了**竞争**，这种竞争**降低**他们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但是**买者之间**也有**竞争**，这种竞争反过来**提高**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最后，**买者和卖者之间**也有**竞争**。前者想买得尽量便宜些，**后者**却想卖得尽量贵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这种竞争的结果怎样，要依上述竞争双方的情况如何来决定，就是说要看是买者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呢还是卖者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产业把两支军队抛到战场上对峙，其中每一支军队内部又发生内讧。战胜敌人的是内部冲突较少的那支军队。

假定，市场上有100包棉花，而买者们却需要1 000包。在这种情形下，需求比供给大10倍，因而买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很激烈；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竭力设法至少也要搞到1包，如果可能，就把100包全都搞到手里。这个例子并不是随意虚构的。在商业史上有过这样一些棉花歉收的时期，那时几个资本家彼此结成联盟，不只想把100包棉花都买下来，而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买下来。这样，在我们前述的情形下，每一个买者都力图排挤掉另一个买者，出较高的价格收购每包棉花。棉花的卖者们看见敌军队伍里发生十分剧烈的内讧，并完全相信他们的100包棉花都能卖掉，因此他们就严防自己内部打起架来，以免在敌人竞相抬高价格的时候降低棉花的价格。于是卖者阵营里忽然出现了和平。他们冷静地叉着双手，像**一个**人似的对抗买者；只要那些最热衷的买者的出价没有非常确定的限度，卖者的贪图就没有止境。

可见，某种商品的供给低于需求，那么这种商品的卖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很弱，甚至于完全没有竞争。卖者之间的竞争在多大程度上减弱，买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加剧。结果便是商品价格或多或少显著地上涨。

大家知道，较为常见的是产生相反后果的相反情形：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卖者之间拼命竞争；买者少，商品贱价抛售。

但是，价格上涨和下跌是什么意思呢？高价和低价是什么意思呢？沙粒在显微镜下显得很高，而宝塔同山岳相比却显得很低。既然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那么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让我们随便问一个资产者吧。他会像一个新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马上毫不犹豫地利用乘法表来解开这个形而上学的纽结。他会对我们说，假如我生产我出卖的这个商品的费用是100马克，而我把它卖了110马克（自然是以一年为期），那么这是一种普通的、老实的、正当的利润。假如我在进行交换时得到了120或130马克，那就是高额利润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200马克，那就会是特高的巨额利润了。对于这个资产者来说，究竟什么是衡量利润的**尺度**呢？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少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亏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大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赢利了。他是以**生产费用**作为零度，根据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数来测定他的利润的升降的。

我们已经说过，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的改变，时而引起价格的上涨，时而引起价格的下跌，时而引起高价，时而引起低价。

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供给不足或需求剧增而大大上

涨，那么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就不免要相应地下跌，因为商品的价格不过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别种商品和它交换的比例。举例说，假如一码绸缎的价格从五马克上涨到六马克，那么白银的价格对于绸缎来讲就下跌了，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这样，它们的价格虽然没有改变，但比起绸缎来却是跌价了。人们在交换中必须拿出更多的商品才能得到原来那么多的绸缎。

商品价格上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大量资本将涌向繁荣的产业部门中去，而这种资本流入较为有利的产业部门中去的现象，要继续到该部门的利润跌落到普通水平时为止，或者更确切些说，要继续到该部门产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过剩而跌落到生产费用以下时为止。

反之，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那么资本就会从该种商品的生产部门抽走。除了该产业部门已经不合时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该商品的生产，即该商品的供给，就要因为资本的这种外流而缩减，直到该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为止，就是说，直到该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水平，或者更确切些说，直到供给低于需求，即直到商品价格又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上为止，因为**商品的市场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费用**。

我们看到，资本是不断地从一个产业部门向另一个产业部门流出或流入的。价格高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入，价格低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出。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不仅供给，连需求也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未免离题太远了。

我们刚才说过，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总是会重新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在一

定时间内，如果把产业衰退和兴盛总合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而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不应当理解成像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那种意见。经济学家们说，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规律**。他们把价格的上涨被价格的下降所抵消，而下降则被上涨所抵消这种无政府状态的运动看做偶然现象。那么，同样也可以（另一些经济学家就正是这样做的）把价格的波动看做规律，而把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看做偶然现象。可是，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我们细加分析时就可以看出，这种波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并像地震一样震撼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进程中，在这种循环运动中，竞争可以说是拿一个极端去抵消另一个极端。

由此可见，商品的价格是这样由它的生产费用来决定的：某些时期，某种商品的价格超过它的生产费用，另一些时期，该商品的价格却下跌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而抵消以前超过的时期，反之亦然。当然，这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部门来说的。所以，这同样也不是就个别产业家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家阶级来说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构成生产费用的是：（1）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损耗部分①，即产业产品，它们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工作日，因而也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工具的损耗部分”，而是“劳动工具”。——编者注

就是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2)直接劳动，它也是以时间计量的。

调节一般商品价格的那些一般的规律，当然也调节**工资**，即调节**劳动价格**。

劳动报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为转移的，依购买劳动力①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力①的工人之间的竞争情形为转移的。工资的波动一般是和商品价格的波动相适应的。**可是，在这种波动的范围内，劳动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劳动力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那么，劳动力②的生产费用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

因此，某一种劳动所需要的训练时间越少，工人的生产费用也就越少，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工资也就越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训练时间，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的产业部门里，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产费用，几乎只归结为维持工人的具有劳动能力的生命③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可是，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种情况。

工厂主在计算自己的生产费用，并根据生产费用计算产品的价格的时候，是把劳动工具的损耗也计算在内的。比如说，一台机器值1 000马克，使用期限为10年，那么他每年就要往商品价格中加进100马克，以便在10年期满时有可能用新机器来更换用坏的机器。同样，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本身**”。——编者注

③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具有劳动能力的生命”，而是“生命”。——编者注

简单劳动力①的生产费用中也应加入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从而使工人种族能够繁殖后代并用新工人来代替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损耗也和机器的损耗一样，是要计算进去的。

总之，简单劳动力①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额**。这种最低工资额，也和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千百万工人的所得不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

现在，我们既已讲明了调节工资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的最一般规律，我们就能更切近地研究我们的本题了。

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②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

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这个说明和前一个说明是一样的。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6日"。——编者注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1]。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2]，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而是“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是“对自然界的关系”。——编者注

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

不论我们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轮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轮船——资本的躯体——同原先体现资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即同样的价格，那么资本依然还是资本。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

不过，虽然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但并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

任何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一个交换价值。任何单个交换价值都是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例如，值1 000马克的一座房子是1 000马克的交换价值。值一分尼[①]的一张纸是$\frac{100}{100}$分尼的交换价值的总和。能同别的产品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些产品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交换，而这一定比例就构成它们的**交换价值**，或者用货币来表示，就构成它们的**价格**。这些产品的数量多少丝毫不能改变使它们成为**商品**，或者使它们表现**交换价值**，或者使它们具有一定**价格**的规定。一株树不论其大小如何，终究是一株树。无论我们拿铁同别的产品交换时是以罗特[②]为单位还是以公担为单位，这一点难道会改变使铁成为商品，成为交换价值的性质吗？铁是一种商品，它依其数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价值，高低不同的价格。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分尼”，而是“生丁”。——编者注

②欧洲旧重量单位，约为三十分之一磅。——编者注

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究竟是怎样成为资本的呢？

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①而保存并增大自身。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②是怎样进行交换的呢？

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③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一部分现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工人有什么用处呢？用于直接消费。可是，如果我不把靠这些生活资料维持我的生活的这段时间用来生产新的生活资料，即在消费的同时用我的劳动创造新价值来补偿那些因消费而消失了的价值，那么，只要我消费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我来说就会永远消失。但是，工人为了交换已经得到的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因此，工人自己失去了这种力量。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编者注

③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有个农场主每天付给他的一个短工五银格罗申。这个短工为得到这五银格罗申，就整天在农场主的田地上干活，保证农场主能得到十银格罗申的收入。农场主不但收回了他付给短工的价值，并且还把它增加了一倍。可见，他有成效地、生产性地使用和消费了他付给短工的五银格罗申。他拿这五银格罗申买到的正是一个短工的能生产出双倍价值的农产品并把五银格罗申变成十银格罗申的劳动和力量。相反，短工则拿他的生产力（他正是把这个生产力的作用让给了农场主）换到五银格罗申，并用它们换得迟早要消费掉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五银格罗申的消费有两种方式：对资本家来说，是**再生产性的**，因为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劳动力[245]带来了十银格罗申；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因为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生活资料永远消失了，他只有再和农场主进行同样的交换才能重新取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

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

资本只有同劳动力①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雇佣工人的劳动力②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

所以，资产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断言，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而是"雇佣劳动"。——编者注

致的。千真万确呵!如果资本不雇用工人,工人就会灭亡。如果资本不剥削劳动力[①],资本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力[①],资本就得购买劳动力[①]。投入生产的资本即生产资本增加越快,从而产业越繁荣,资产阶级越发财,生意越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越高。

原来,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过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权力——资本,而它从这种敌对权力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会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会变成再一次把资本投入加速增长运动的杠杆为条件的。

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②]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制约一样。

只要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他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这就是一再被人称道的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共同性。

资本越增长,雇佣劳动量就越增长,雇佣工人人数就越增加,一句话,受资本支配的人数就越增多。[③]我们且假定有这样一种最有利的情形: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资也提高了。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工人的利益**",而是"**劳动的利益**"。——编者注

③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前面加有"科隆4月7日"。——编者注

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

工资的显著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

工资一般不仅是由我能够用它交换到的商品数量来决定的。工资包含着各种关系。

首先，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①取得一定数量的货币。工资是不是单由这个货币价格来决定的呢？

在16世纪，由于在美洲发现了更丰富和更易于开采的矿藏②，欧洲流通的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增加了。因此，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比较起来就降低了。但是，工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①所得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在美洲发现了更丰富和更易于开采的矿藏”，而是“美洲的发现”。——编者注

到的银币数仍和从前一样。他们的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如旧，然而他们的工资毕竟是降低了，因为他们拿同样数量的银币所交换到的别种商品比以前少了。这是促进16世纪资本增长和资产阶级兴盛的原因之一。

我们再举一个别的例子。1847年冬，由于歉收，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面包、肉类、黄油、干酪等等）大大涨价了。假定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①所得的货币量仍和以前一样。难道他们的工资没有降低吗？当然是降低了。他们拿同样多的货币所能换到的面包、肉类等等东西比从前少了。他们的工资降低并不是因为白银的价值减低了，而是因为生活资料的价值增高了。

我们最后再假定，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未变，可是一切农产品和工业品由于使用新机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价格。这时，工人拿同样多的货币可以买到更多的各种商品。所以，他们的工资正因为工资的货币价值仍然未变而提高了。

总之，劳动的货币价格即名义工资，是和实际工资即用工资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并不一致的。因此，我们谈到工资的增加或降低时，不应当仅仅注意到劳动的货币价格，仅仅注意到名义工资。

但是，无论名义工资，即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还是实际工资，即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关系完全表示出来。

此外，工资首先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

实际工资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而相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对工资所表示的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从直接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相比，直接劳动在自己新创造的价值中所占的份额①。

上面，在第14页上②，我们说过："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但是，资本家必须从出卖由工人创造的产品的价格中再补偿这笔工资。资本家必须这样做：他在补偿这笔工资时，照例要剩下一笔超出他所支出的生产费用的余额即利润。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价格，对资本家来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补偿他所预付的原料价格和他所预付的工具、机器及其他劳动资料的损耗；**第二**，补偿资本家所预付的工资；**第三**，这些费用以外的余额，即资本家的利润。第一部分只是补偿**原已存在的价值**；很清楚，补偿工资的那一部分和构成资本家利润的余额完全是从**工人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并追加到原料上去的**新价值**中得来的。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把工资和利润加以比较，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看成是工人的产品中的份额。③

实际工资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了，可是尽管如此，相对工资却可能降低了。假定说，一切生活资料跌价三分之二，而日工资只降低了三分之一，比方由三马克降低到两马克。这时，虽然工人拿这两马克可以买到比从前拿三马克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他的工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相对工资所表示的……"这一段话如下："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格相比的直接劳动价格，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值，是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价值"。——编者注

②见本卷第715页。——编者注

③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这一整段话。——编者注

资和资本家的利润相比却降低了。资本家(比如,一个工厂主)的利润增加了一马克,换句话说,资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换价值付给工人,而工人却必须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换价值。资本的份额与劳动的份额相比提高了①。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均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大的劳动量。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低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级。

究竟什么是决定工资和利润在其相互关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一般规律呢?

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②即利润越增加,则劳动的份额③即日工资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

也许有人会驳斥说:资本家赢利可能是由于他拿自己的产品同其他资本家进行了有利的交换,可能是由于开辟了新的市场或者原有市场上的需要骤然增加等等,从而对他的商品的需求量有所增加;所以,一个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损害了其他资本家的利益,而与工资即劳动力④的交换价值的涨落无关;或者,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改进了劳动工具,采用了利用自然力的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的份额与劳动的份额相比提高了”,而是“资本的价值与劳动的价值相比提高了”。——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的份额**”,而是“**资本的交换价值**”。——编者注

③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的份额**”,而是“**劳动的交换价值**”。——编者注

④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新方法等等。

首先必须承认，所得出的结果依然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是经过相反的途径得出的。固然，利润的增加不是由于工资的降低，但是工资的降低却是由于利润的增加。资本家用同一数量的他人的劳动[①]，购得了更多的交换价值，而对这个劳动却没有多付一文。这就是说，劳动所得的报酬同它使资本家得到的纯收入相比却减少了。

此外，我们还应提醒，无论商品价格如何波动，每一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即它同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总是由**它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因此，资本家相互间的盈亏得失必定在整个资本家阶级范围内互相抵消。改进机器，在生产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和资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但决不是创造出更多的交换价值。如果我用纺纱机能够在一小时内生产出比未发明这种机器以前的产量多一倍的纱，比方从前为50磅，现在为100磅，那么我在一定时间内[②]用这100磅纱所交换到的商品不会比以前用50磅交换到的多些，因为纱的生产费用减少了一半，或者说，因为现在我用同样多的生产费用能够生产出比以前多一倍的产品。

最后，不管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也好，整个世界市场的也好）相互之间分配生产所得的纯收入的比例如何，这个纯收入的总额归根到底只是直接劳动使积累起来的劳动[③]在总体上增加的那个数额。所以，这个总额是按劳动使资本增加的比例，即按利润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他人的劳动”，而是“劳动”。——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在一定时间内”。——编者注

③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里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使直接劳动”。——编者注

与工资相对而言增加的比例增长的。

可见，即使我们停留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范围**内，也可以知道**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资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而利润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价格[1]同样迅速下降、相对工资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以同一比例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30%，那么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

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残羹剩饭就越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越多。

这样我们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资本的尽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的利益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

---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的价格”，而是“劳动的交换价值”。——编者注

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

最后：

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与它敌对的权力，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被允许在越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而工作，满足于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

然而，是不是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资的提高**密不可分呢？[①]我们不应当听信他们的话。我们甚至于不能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似乎资本长得越肥，它的奴隶也吃得越饱。资产阶级很开明，很会打算，它没有封建主的那种以仆役队伍的奢华夸耀于人的偏见。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迫使它锱铢必较。

因此我们就应当更仔细地研究一个问题：

生产资本的增长是怎样影响工资的？

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资本整个说来是在不断增长，那么劳动的积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资本[②]的数量和规模日益增大。资本的**增大**加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规模的不断增大**，为**把装备着火力更猛烈的斗争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军引向产业战场**提供了手段。

一个资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的资本。可是，要能够更便宜地出卖而又不破产，他就必须更便宜地进行生产，就是说，必须尽量提高劳动的生产力。而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10日”。——编者注

②《新莱茵报》发表时误为“资本家”，后在第270号加以更正，现根据这一更正进行改动。——编者注

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越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越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越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因此，资本家之间就发生了全面的竞争：他们竭力设法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可是，假如某一个资本家由于更细地分工、更多地采用新机器并改进新机器，由于更有利和更大规模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样多的劳动或积累起来的劳动生产出比他的竞争者更多的产品（即商品），比如说，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他的竞争者只能织出半码麻布，他却能织出一码麻布，那么他会怎样办呢？

他可以继续按照原来的市场价格出卖每半码麻布，但是这样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出战场，就不能扩大自己的销路。可是随着他的生产的扩大，他对销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采用的这些更有效率、更加贵重的生产资料**使**他**能够**廉价出卖商品，但是这种生产资料又**使**他**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商品，为自己的商品争夺更**大**得多的市场。因此，这个资本家出卖半码麻布的价格就要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些。

虽然这个资本家生产一码麻布的费用并不比他的竞争者生产半码麻布的费用多，但是他不会以他的竞争者出卖半码麻布的价格来出卖一码麻布。不然他就得不到任何额外的利润，而只是通过交换把自己的生产费用收回罢了。如果他的收入终究还是增加了，那只是因为他动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因为他比其他资本家更多地增殖了自己的资本。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价格定得比他的竞争者低百分之几，他追求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压低价格**就能把他的竞争者挤出市场，或者至少也能夺取他的竞争者的一部分销路。最后，我们再提一下，市场价格是**高于**还是**低于生产费用**，这一点始终取决于该种商

品是在产业的旺季出卖还是在淡季出卖。一个采用了生产效能更高的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卖价超出他的实际生产费用的百分率，是依每码麻布的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迄今的一般生产费用为转移的。

可是，这个资本家的**特权**不会长久；参与竞争的其他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采用这些机器和分工。这些新措施将得到广泛的推广，直到麻布价格不仅跌到**原先的生产费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产费用以下为止。**

这样，资本家的相互关系又会像采用新生产资料**以前**那样了；如果说他们由于采用这种生产资料能够以同一价格提供加倍的产品，那么**现在**他们已不得不按**低于**原来的价格出卖加倍的产品了。在这种新生产费用的水平上，同样一场角逐又重新开始：分工更细了，使用的机器数量更多了，利用这种分工的范围和采用这些机器的规模更大了。而竞争又对这个结果发生反作用。

我们看到：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变革，不断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

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抛出原先的轨道，并且**因为**资本已经加强了劳动的生产力而迫使它继续加强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

这个规律正是那个在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中必然使商品价格和商品**生产费用趋于一致**的规律。

不管一个资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资料，竞争总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而一旦竞争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

他的资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一后果就只能是：**要保持原来的价格**，他就必须提供比以前多10倍、20倍、100倍的商品。可是，因为现在他必须售出也许比以前多1 000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产品数量的办法来弥补由于售价降低所受的损失；因为他现在必须卖出更多的商品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①，并且也是为了补偿生产费用（我们已经说过，生产工具本身也日益昂贵）；因为此时这种大量出卖不仅对于他而且对于他的竞争对方都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先前的斗争就**会随着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来。所以，分工和机器的采用又将以更大得无比的规模发展起来。**

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竞争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说，越是有可能便宜地生产，即有可能用同一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争就使更便宜的生产即为了同一价格总额②而提供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规律。可见，资本家努力的结果，除了必须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提供更多的商品以外，换句话说，除了**使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恶化**以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此，竞争经常以其生产费用的规律迫使资本家坐卧不宁，把他为对付竞争者而锻造的一切武器倒转来针对他自己，然而尽管如此，资本家还是不断想方设法在竞争中取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更便宜地进行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以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得到更多的利润"，而是"得到利润"。——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为了同一价格总额"，而是"为了保持原来的价格"。——编者注

代替旧机器和旧分工，并且不等到竞争使这些新措施过时，就这样做了。

现在我们如果想象一下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同时**笼罩了**整个世界市场**，那我们就会明白，资本的增长、积累和积聚是如何导致不断地、日新月异地、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旧机器。

这些同生产资本的增长分不开的情况又怎样影响工资的确定呢？

更进一步的**分工**使**1个**工人**能**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5倍、10倍乃至20倍。工人中间的竞争不只表现于1个工人把自己出卖得比另1个工人贱些，而且还表现于**1个**工人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而资本所实行的和经常扩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进行这种竞争。

其次，**分工**越细，劳动就越**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需要投入紧张的体力或智力。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竞争者的排挤；我们还要提醒一下，一种工作越简单，越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费用越少，工资也就越降低，因为工资像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总之，劳动越是不能给人以乐趣，越是令人生厌，竞争也就越激烈，工资也就越减少。工人想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一小时内提供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工人为贫困所迫，就进一步加重分工带来的恶果。结果就是：**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资就越少**，而且原因很简单：他工作得越多，他就越是同他的工友们竞争，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们变成他自己的竞争

者，这些竞争者也像他一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所以，他归根到底是**自己给自己，即自己给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自己**造成竞争。

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规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为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向街头，而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方，机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我们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资本家相互间的产业战争。**这种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制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工人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工人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

不错，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因采用机器而成为多余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劳动部门里找到工作。

他们不敢干脆地肯定说，在新的劳动部门中找到栖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事实最无情地粉碎了这种谎言。其实，他们不过是肯定说，在**工人阶级的其他组成部分**面前，比如说，在一部分已准备进入那种衰亡的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现了新的就业门路。这对于不幸的工人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资本家老爷们是不会缺少可供剥削的新鲜血肉的，他们让死人们去埋葬自己的尸体。这与其说是资产者对工人的安慰，不如说是资产者对自己的安慰。如果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工人阶级，那么这对资本来说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为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成其为资本了！

就假定那些直接被机器从工作岗位排挤出去的工人以及原来期待着这一工作的那一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报酬会和已失去的工作的报酬同样高呢？**要是这样，那就**

是违反了一切经济规律。我们说过，现代产业经常是用更简单的和更低级的工作来代替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的。

那么，被机器从一个产业部门排挤出去的一大批工人如果不甘愿领取**更低更微薄的报酬**，又怎能在别的部门找到栖身之所呢？

有人说制造机器本身的工人是一种例外。他们说，既然产业需要并使用更多的机器，机器的数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机器制造、从事机器制造的工人也必然增加；而这个产业部门所使用的工人是熟练工人，甚至是受过教育的工人。

从1840年起，这种原先也只有一半正确的论点已经毫无正确的影子了，因为机器制造也完全和棉纱生产一样，日益多方面地采用机器，而在机器制造厂就业的工人，比起极完善的机器来，只能起着极不完善的机器的作用。

可是，在一个男工被机器排挤出去以后，工厂方面也许会雇用**三个**童工和**一个**女工！难道先前一个男工的工资不是应该足够养活三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吗？难道先前最低工资额不是应该足够这个种族维持生活和繁殖后代吗？资产者爱说的这些话在这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了一点：现在要得到维持**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资，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

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越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剧烈，他们的工资就越减少。**

加之，工人阶级还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沦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毫无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就像森林似的越来越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越来越消瘦。

不言而喻，小产业家在这种斗争[1]中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因为这种斗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不断扩大生产的规模，也就是说要做大产业家而决不能做一个小产业家。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资本的总量和数目越增加，资本越增长，资本的利息也就越减少；因此，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租金来维持生活，必须投身于产业，即扩大小产业家的队伍，从而增加无产阶级的候补人数。

最后，上述发展进程越迫使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利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产业地震[2]也就越来越频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也就是说，**危机**也就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3]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但是，资本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要依靠劳动。这位尊贵而又野蛮的主人在葬入坟墓时，也要把他的奴隶们的尸体，即在危机中丧生而成为牺牲品的大批工人一起陪葬。由此可见：**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么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斗争”，而是“战争”。——编者注

②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产业地震”，而是“地震”。——编者注

③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新市场”，而是“市场”。——编者注

厉害；尽管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①

卡·马克思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所作的演说写成

作为社论载于1849年4月5—8和11日《新莱茵报》第264—267和269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和1891年单行本翻译

①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后面加有"（待续）卡尔·马克思"。——编者注

卡·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246]

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
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

先生们！

英国谷物法[53]的废除是自由贸易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在厂主们谈论自由贸易的所有国家里，他们主要指的是谷物和一切原料的自由贸易。对外国谷物征收保护关税，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

廉价的面包，高额的工资（cheap food，high wages），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231]不惜耗资百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他们的热情已经感染了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伙。总之，人们要求自由贸易，是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

可是，奇怪得很！想尽办法让人民得到廉价的面包，而人民却毫不领情。现在英国的廉价面包，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誉扫地。人民把那些充满献身精神的人们，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子。

谁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被称为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153]之间的斗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证明那种

激励他们起来行动的崇高信念的。

他们向工厂工人这样说：

谷物税是工资税，是你们向大地主，向那些中世纪的贵族交纳的税；你们陷于贫困，是因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昂贵。

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30年中，我们的工业获得巨大发展，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却大大超过了谷物价格的上涨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照你们所说的，我们交纳给地主的税，对每一个工人来说，每周约计**3便士**（6苏①）；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手工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8先令降到5先令（从35法郎降到7.25法郎），而在1823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机器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0先令降到8先令（从25法郎降到10法郎）。

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交纳给地主们的税从未超过3便士。而在1834年面包价廉、市场繁荣的时候，你们对我们说过什么话呢？——“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们的婚姻比你们的手艺还要多产！”

这就是当时你们自己对我们说过的话，同时你们还制定了新的济贫法[34]，设立了习艺所[170]这种无产者的巴士底狱。

厂主们对此回答说：

工人先生们，你们说的对，决定工资的不仅是谷物的价格，而且还有求职者之间的竞争。

但是请你们仔细地想一想：我们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砾构成的。你们可别以为在花盆里就能种庄稼！如果我们不是慷慨地献出自

---

①法国旧铜币名，一个苏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编者注

已的资本和劳动，用来耕种不毛之地，而是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么，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了唯一的、庞大的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

可是厂主和自己的工人们的这番谈话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向厂主说道：

如果我们废除了谷物法，那么我们就荒废了农业，但是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迫使其他国家关闭它们的工厂来购买我们的工厂的产品。

结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现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内贸易也会丧失市场。

厂主抛开工人转过身来回答小铺主说：这件事就听之任之吧。一旦废除了谷物税，我们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谷物。那时，我们就会降低工资，同时在那些供给我们谷物的国家里，工资却会因此而提高。

因此，我们除了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还将得到实行低额工资带来的好处，凭借这一切优势，我们就能迫使大陆购买我们的产品。

可是，现在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争论了。

他们叫道：我们又将会面临怎样的境况呢？

难道我们应该把养育我们的农业宣判死刑吗？难道我们能够听任别人断绝我们的生活来源吗？

反谷物法同盟[31]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满足于给三部论述废除谷物法将对英国农业产生有益影响的优秀著作颁发奖金。

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莫尔斯和格雷格三位先生，他们的著作已有成千上万册在农村流传。

其中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租地农场主吃亏，也不会使农业工人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英国租地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谷物。

因此，即使谷物价格下跌，也不会使你们遭致损失，因为这种下跌只会引起地租的缩减，而绝对不会伤及资本的利润和工资，它们依然会保持原有的水平。

第二位获奖者是莫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结果是谷物价格上涨。他挖空心思力图证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没有能保证谷物得到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说，在英国，每当输入外国谷物的时候，谷物价格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谷物价格便急剧下跌。这位获奖者忘记了不是进口引起价格上涨，而是价格上涨引起进口。

他的见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每次谷物价格上涨总是有利于租地农场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租地农场主写的，他不能满足于重复类似的滥调，他的话是比较科学的。

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会引起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会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涨，而谷物法之所以会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涨，正是由于谷物法会迫使资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说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由于外国谷物不能输入，就不得不去开垦肥力较差的土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较大的耗费，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较贵。

既然谷物的销路有充分保证，那么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费最

大的土地的产品价格的调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间的差额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谷物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在没有收益的土地上耕作的缘故。由此可见，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租地农场主的破产。

为了理解格雷格先生的话，作这几点说明是必要的。

他说，那些不能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小租地农场主，可以去工业中谋生。至于那些大租地农场主，则必然在农业中取胜。或者是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和他们订立期限极长的租约。这就有可能使这些租地农场主把巨额资本投向土地，更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而手工劳动的报酬也将由于工资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结果）而跌到更低的水平。

包令博士对所有这些论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大声说："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

显然，这种虚伪的说教根本不能使工人为面包跌价而感到欣喜。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最激烈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46]，即反对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12小时减到10小时的人，正是这些厂主！

为使你们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

任何厂主都有他自己使用的一整套规程，其中规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罚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子上坐了一下，偶

尔私语或谈笑，迟到了几分钟，损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规格等等，他就得挨罚。事实上罚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造成的损失。为了设法使工人容易挨罚，工厂的钟拨快了，发给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没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犯规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们，你们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制造过失却成为生财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资，甚至还要从那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意外事故中得到好处。

有些慈善家力图使工人相信，只要能够改善工人的命运，他们可以付出巨额金钱。这些厂主就正是这样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用最卑劣的手法克扣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

他们不惜耗费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这些宫殿里也设立了自己的某种类似官邸的东西，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清楚，人们希望降低面包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传道者、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名著中说：

"要是我们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廉价的谷物的话，那么，工资就要降低，利润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资，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资。"①

先生们，工人过去收入五法郎，而现在由于谷物价格较贱至多收入四法郎；请不要以为这件事对工人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

工人的工资和利润比较起来难道不是越来越低吗？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吗？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更大的损失。

当谷物的价格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节省少许面包就足以满足其他需要。但是一旦面包变得非常便宜，从而工资大大下降，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靠节约面包来购买其他的东西了。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并没有被自由贸易派的蒙蔽和谎言所欺骗，尽管他们曾同自由贸易派联合起来反对地主，但那样做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是为了此后只需单独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工人并没有估计错：地主为了向厂主进行报复，和工人联合行动使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获得通过；工人们30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

在经济学家会议[247]上，包令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统计表，他想表明，为了满足（照他的说法）工人的消费，英国输入了多少

①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178—179页。——编者注

牛肉、火腿、脂油、鸡雏等等。可是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告诉你们，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来临，曼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工厂城市的工人被抛到了街头。

在政治经济学中，原则上决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同其他任何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因此，自由贸易对工人会是非常有利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已经先以自己的劳动同资本进行了交换[223]。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么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终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候，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经济学家总是在劳动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却把劳动与资本相交换这一环节完全置之度外。

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劳动者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便宜了，那么，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时候，仍然继续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的论据的劳动者将发现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经融化，只剩下五苏了。

于是经济学家们会对你们说：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

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低廉的商品价格会导致消费的增加；大量的消费要求大量的生产，而大量的生产又引起了对人手需求的增加；对人手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能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扩大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须同意。如果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就不仅会停滞不前，而且会走向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将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而在资本扩大时，就像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同样会死亡。生产资本的扩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扩大使工人的专门技能变得一文不值，从前需要这种专门技能的工作，现在任何人都能做，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

这种竞争之所以更趋激烈，是因为分工使一个工人可以完成三个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在更大规模上产生了同样的结果。生产资本的扩大迫使工业资本家采用不断扩大的生产资料进行工作，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其次，因为利息率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活，只好到工业中去工作，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这种市场的需求它并不了解）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因此，生产资本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加剧，而且其激烈

的程度大大超过以前。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负担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彻斯特36个工厂中有1 088个纺纱工人。到1841年纺纱工人总共只有448人，可是他们所照管的纱锭却比1829年的1 088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53 353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数量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而相应增长的话，则工人的数量应达1 848人；也就是说，机械的改进使1 100个工人失去了工作。

经济学家们的答复，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说，这些失去工作的人会找到别的职业。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令博士没有忘记引用这个论据，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令博士在下院就5万名伦敦织布工人的问题发表了演说，这些工人长期忍饥挨饿，一直没有能够找到自由贸易派向他们许诺的新职业。

让我们从包令博士的演说中引用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吧。

他说："手工织工所忍受的困苦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织工几乎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微的振荡，就足以置他们于死地。机械的进步使手工劳动越来越被排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民族的福祉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在所有的发明中间，只有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对手工织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许多手工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已经被排挤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作的许多其他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也将被击败。"

他接下去说："我这里有印度总督跟东印度公司[248]的往来信件，其中论及达卡地区的织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说：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购入600万到800万匹当地手工织机织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渐下降，大约缩减到100万匹。

现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更有甚者，1800年北美从印度购进的棉布约为80万

匹。而1830年北美购进的棉布还不到4 000匹。1800年装船运送到葡萄牙的棉布有100万匹。而1830年葡萄牙购进的不过2万匹。

关于印度织工苦难的报告是可怕的。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场上的出现,在于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来进行生产。大量的织工死于饥饿,其余的人则转入其他行业,特别是转入农业劳动。不能改行的人则等于被判了死刑。现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纱充斥达卡地区。以美观和耐久著称于世的达卡麦斯林薄纱,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而完全绝迹了。像东印度的整个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①

包令博士在演说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演说就更为出色。但是他力图掩盖这些事实时所使用的措辞,和自由贸易派的一切说教一样,是伪善的。他把工人描写成应该以更廉价的生产资料来代替的生产资料。他故弄玄虚,把他所说到的这种劳动看做完全特殊的劳动,而把排斥手工织工的机器也看做特殊的机器。他忘记了,任何一种手工劳动总有一天都要经受手工织布劳动的命运。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的一切改进措施都有始终不变的目的和趋势,那就是尽可能取消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用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多数机器纺纱厂(英文叫throstle-mills)中,纺纱的尽是些16岁及16岁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动走锭纺纱机代替了简单的走锭纺纱机,大部分纺纱工被解雇,留下的仅是些少年儿童。"②

自由贸易的最狂热的信徒尤尔博士的这些话,是对包令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补充。包令先生谈到某些个人的不幸,同时又告诉我们,这些个人的不幸必然要导致整个阶级的毁灭;他谈到了过渡时期的

①约·包令《1835年7月在下院的演说》,引自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安·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34页。——编者注

暂时的苦难，而且毫不隐讳地说，这些暂时的苦难对大多数人说来是从生存到死亡的转变，而对其余的人说来，是从较好的处境向较差的处境的转变。他进一步说，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这种说法等于承认劳动阶级的苦难就是资产阶级福祉的必要条件。

包令先生慷慨地给予奄奄待毙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贸易派所创立的全部补偿理论总的来说可归结如下：

成千上万的奄奄待毙的工人们，你们不应灰心失望。你们可以非常平静地死去。你们的阶级是不会绝种的。它将永远保有足够数量的人听任资本去宰割，而不必担心资本会将它消灭。顺便提一下，如果资本不力求保存工人这种可供其不断地剥削的材料，资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运用呢？

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实现自由贸易会对工人阶级状况产生什么影响作为未解决的问题来谈呢？从魁奈到李嘉图，经济学家们所表述的一切规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已不再存在。这些规律的作用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而加强。其中第一条规律是说，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资呢？要维持工人的生计，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使自己的阶级能保持必要的人数而得以延续，就需要一些物品，最低工资恰好就是为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支出。

不要因此而认为工人只能得到这种最低工资，更不要以为他总是能得到这种最低工资。

不是的，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级有时也比较幸运。有时工人阶级的所得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

了他们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这就是说，工业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这一定的周期内，如果把工人阶级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计起来，那么他们所得的总额恰好是这个最低额；换言之，工人阶级只有经历一切苦难和贫困，在工业战场上抛下许多尸体，才能作为一个阶级保存下来。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数量还在增长。

事情还不止于此。工业的进步提供了不太昂贵的生活资料。例如烧酒代替了啤酒，棉织品代替了毛织品和亚麻织品，马铃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食品来维持劳动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如果说，起初这种工资迫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么，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人存在的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单纯的生产力而已；资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

随着经济学家设定的前提即自由贸易得到实现，变为事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规律即最低工资的规律也就得到了证实。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贸易这一前提作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或者承认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势必要受到经济规律严酷无情的打击。

让我们来作个总结：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

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对立,他们这种妄想,真是令人难以理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为显著。

可以设想,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关税和入市税,一句话,一旦那些至今还有可能被工人看做造成自己贫困境遇原因的所有次要因素全都消失,到那时,所有遮挡工人的视线、掩盖他的真正敌人的帷幕必将被撕得粉碎。

工人将会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

先生们,不要一听到**自由**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

既然这种自由的观念本身不过是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制度的产物,怎么还能用这种自由的观念来肯定自由竞争呢?

我们已经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贸易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会产生怎样一种友爱。如果说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也能促成什么友爱,那么,这种友爱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我们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批驳自由贸易的信徒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诡辩,这些诡辩的价值同我们的三位获奖者霍普、莫尔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论证完全一样。

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

200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也许不出50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禀赋竞争。而这个自然禀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

同时不应忽视另一种情况：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例如，在国际交换中，棉花本身在贸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义。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几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

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批判自由贸易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保护关税制度。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朋友。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

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1848年2月初以小册子形式在布鲁塞尔出版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和法文原文翻译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著作。马克思在这篇导言中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出发，揭示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本质，指出宗教是“颠倒的世界”产生的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见本卷第3页），“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见本卷第4页），论述了对宗教的批判同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的关系，阐明了“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见本卷第4页）。马克思揭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维护德国现存制度的本质，指出这种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的表现，论述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同对德国现实社会的批判的关系，提出了“向德国制度开火”的革命任务（见本卷第6页）。马克思阐释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见本卷第11页）这篇著作首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消灭任何奴役、实现人的解放的阶级，并论述了无产阶级和哲学的关系，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见本卷第17页）。

马克思在1843年3月中—9月底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用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阐述国家问题的部分作了全面分析，特别是对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随后马克思离开德国前往巴黎。他在那里考察了法国的工人运动，研究了当时进步思想界的先进政治思想，在1843年10月中—12月中这一期间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并于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公开发表。

列宁认为，这篇《导言》和同时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彻底完成”（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83页）。

1850年，《导言》的法译文以节选的形式收入海·艾韦贝克的著作《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1887年，《导言》的俄文版在日内瓦出版；1890年12月2—10日，《柏林人民报》再次发表了这篇导言。

《导言》的中译文最早发表在1935年上海辛垦书店出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译者是柳若水。——3。

2 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马克思本来计划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这篇《导言》之后，接着完成在1843年已着手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将其付印。《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逐渐放弃了这一计划。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曾说明了放弃这一计划的原因（见本卷第111页）。

1844年5—6月以后，马克思已经忙于其他工作，并把经济学研究提到了首位。从1844年9月起，由于需要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反击，马克思开始把阐述新的革命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结合起来，同批判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结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这项任务。——4、111。

3 *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在德国兴起的一个法学流派。其特征是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应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反对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该派的代表人物是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他们借口保持历史传统的稳定性，极力维护贵族和封建制度的各种特权。该派以后逐步演变成19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1842年，萨维尼被任命为修订普鲁士法律的大臣，这样，历史法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就成了修订普鲁士法律的依据。

历史法学派的主张同黑格尔法哲学的观点相对立。早在1836—1838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历史法学派与黑格尔法哲学之间的分歧和论争。1841年底，马克思着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同时继续研究历史法学派。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5。

4　马克思后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作过类似的阐述，他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页)——7。

5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做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德国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被等同于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英国经济学家亚·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随着斯密主要著作的问世及其德译本的出版，在德国开始了一个改变思想的过程。有人认为可以把斯密提出的原理纳入德国人界定为国家学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派人则竭力主张把两者分开。路·亨·冯·雅科布和尤·冯·索登在1805年曾作了两种不同的尝试，但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8、56、88、111、143、171、268。

6　指哲学家阿那卡雪斯，西徐亚人。

西徐亚人亦称斯基泰人，是古代黑海北岸古国西徐亚王国的居民，最早属于中亚细亚北部的游牧部落。约公元前7世纪，伊朗族的西徐亚人由东方迁入并征略小亚细亚等地。西徐亚人生性强悍，善于骑射；他们以民族部落为其社会基础，没有自己的文字。——9。

7　马克思按照当时反对德国半封建状况的政治反对派对哲学的作用所持的态度，根据他在《莱茵报》从事编辑活动的一般体会，把这些政治反对派区分为"实践政治派"和"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

这里所说的实践政治派包括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民主派的代表。他们提出实践政治的要求，要么是为争取立宪君主制而奋斗，要么是为争取民主主义共和制而奋斗。

这里所说的理论政治派带有整个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特征。他们从黑格尔哲学得出彻底的无神论结论，但同时又使哲学脱离现实，从而在事实上日益脱离实际革命斗争。——10。

8　1818—1819年黑格尔第一次讲授法哲学(在柏林大学)。他于1817年出版的《哲学全书纲要》一书已经包括了他的法哲学的基本概念。1821年，黑格尔发表了《法哲学原理》，该书的副标题是:《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供授课用》。自1821年至1825年，黑格尔按照他自称为"教科书"的《法哲学原理》多次讲授法哲学。1831年，即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又开始讲授法哲学。1833年，爱·甘斯在柏林出版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随着这个新版本的出版，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深入展开，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黑格尔的国家观曾是青年黑格尔派探讨的中心议题之一。对于马克思来说，如何对待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10。

9　指16世纪德国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领导的要求摆脱教皇控制、改革封建关系的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前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抗议教皇滥用特权，派教廷大员以敛财为目的向各地教徒兜售赎罪券，并要求对此展开辩论。随着《九十五条论纲》的传播，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关于这一运动的情况，可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2。

10　教会财产的收归俗用，在德国是随着宗教改革开始的。教会地产首先转为诸侯地产，只有极小部分低等贵族和市民阶层的成员(城市新贵)从中获利。在法国大资产阶级的直接影响下，1803年的帝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教会诸侯领地收归俗用。普鲁士和南德意志的中等邦国首先能够获得最大的土地利润。随着1810年10月10日颁布的敕令，普鲁士境内教会财产的收归俗用遂告结束。——12。

11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13、30、124、214、308、502、540。

12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利用路易-菲力浦1835年7月28日遭谋刺这一事件于当年9月9日颁布的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权利，对新闻出版业

采取了多项严厉措施，增加了定期刊物的保证金；规定对发表反对私有制和现行政治体制言论的人以政治犯罪论处并课以高额罚款。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德国政府突发奇想”，是指1843年1月31日德国政府颁发的“书报检查令”、1843年2月23日颁发的《关于书报检查机关的组织的规定》、1843年6月30日发布的《指令，包括对1843年2月23日的规定所作的有关新闻出版和书报检查条例的若干必要补充》。——14。

13　*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是欧洲封建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1034年帝国正式称为罗马帝国。1157年称神圣帝国，1254年称神圣罗马帝国。到1474年，神圣罗马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在不同时期包括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法国东部、捷克、奥地利、匈牙利、荷兰和瑞士，是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法律和传统的封建王国和公国以及教会领地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的联盟。1806年，对法战争失败后，弗兰茨二世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14。

14　参看艾·约·西哀士《第三等级是什么?》1789年巴黎第2版第3页：“本文的计划甚为简单，我们要向自己提三个问题。

1. 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

2. 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

3. 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15。

15　高卢是法国古称。*高卢雄鸡*是法国第一共和国时代国旗上的标志，是当时法国人民的革命意识的象征。马克思在这里借用了海涅在《加里多尔夫就贵族问题致穆·冯·莫里加特伯爵书》序言中的形象比喻：“高卢雄鸡如今再次啼叫，而德意志境内也已破晓”。——18。

16　*《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著作。这篇著作是为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布·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这两篇著作中的错误观点而写的。马克思在这篇著作中驳斥了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这一社会政治问题归结为纯粹宗教问题的错误论点，分析了市民社会与宗教的关系，指出宗教并不是政治压迫的原因，而是政治压迫的表现，必须消除政治压迫，才能克服宗教的狭隘性。马克思阐明了

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从封建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消除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特权，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政治解放实现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还远远不是人的解放；资产阶级在这种政治解放中所标榜的普遍的人权，归根结底不过是享用和处理私有财产的权利，这种自私自利的权利同人的解放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突破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消灭私有制，消除人的生活本身的异化。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阐明了共产主义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论犹太人问题》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1850年，海·艾韦贝克在《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圣经》一书中收入了《论犹太人问题》的法译文；1881年6月30日和7月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杂文栏刊登了《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二部分；1890年10月10—19日，《柏林人民报》在增刊上全文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

列宁认为，这篇文章和同时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彻底完成”（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83页）。

《论犹太人问题》的中译文最初于1939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译者是郭和。——21。

17 1840年12月26日法国众议院就关于调整儿童劳动时间的法律草案进行辩论。这一法律草案建议凡16岁以下儿童可以在礼拜日不工作。一位议员在辩论中提出动议，认为法律应阐释儿童一周只可工作6天，以便犹太人有可能不在星期六送自己的孩子去工作。在司法和宗教大臣马丁·迪诺尔的率先反对下，这项动议被否决。——24。

18 *政治狮皮*一词借用了古希腊神话关于大英雄海格立斯的传说中的用语。海格立斯因误杀音乐老师而被放逐。他扼死了涅墨亚大森林中长着钢筋铁骨的猛狮，剥下它刀枪不入的狮皮，一直披在自己身上，以自炫其力大无穷，不可战胜。——31。

19 布·鲍威尔在《市民社会》这一节论述了“需要”是“使市民社会运转的强大动力”，这种需要“保证市民社会的持续存在和保障市民社会的必然性”。

社会按照满足各种需要的方式方法划分为等级。

黑格尔的有关观点，可参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33年柏林版第254—270页；第3篇《伦理》第2章《市民社会》中《需要的体系》一节。——32。

20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即市民社会之外的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人们必须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32、427。

21　1843年夏，马克思在研读威·瓦克斯穆特的著作《革命时期的法国史》时发现菲·约·本·毕舍和皮·塞·卢-拉维涅编纂的《法国革命议会史》（四十卷集）1834—1838年巴黎版为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外，马克思还研读了他本人的巴黎藏书之一、由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加代编纂的《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1821年巴黎版第1卷。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援用了这些著作中的有关资料。——39、43。

22　单子在希腊哲学中指一切简单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论述了自我封闭的、完成的、最终的和有灵魂的诸统一体（实体），它们的总和构成有序的世界体系。——40。

23　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33年柏林版第247页。黑格尔在该书第3篇第2章《市民社会》中阐述了如下观点：市民社会包括三个环节：需要的体系、通过司法实行财产的保护、警察和同业公会。因此，司法制度和警察不归属于政治国家。——42。

24　塔木德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间犹太教关于律法、条例、传统、风俗、祭典、礼仪的论著和释义汇编。犹太教认为它是仅次于圣经的经籍。——53。

25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在同马克思合作以前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论著，是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

中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著作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论述了它的起源、作用和影响；剖析了它的基本范畴，并着重指出竞争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竞争必然会导致的种种恶果；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实质，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表现。恩格斯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矛盾，指出以劳动和资本相对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内部正在孕育并必然产生社会革命，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全面变革社会关系，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社会弊端。

恩格斯的这篇经济学著作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马克思对这篇著作作了详细摘录，给予高度评价，赞誉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指出这篇著作“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1页）。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旬，发表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上。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编辑部为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于11月28日重新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中译文（节译）于1931年发表在广州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3—4卷，译者是何思敬；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思敬的全译本。——56。

26 **重商主义**是15—16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反映了那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货币流入本国，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早期重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56、180、255。

27 **十字军征讨**指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

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200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征讨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西欧国家的人民遭受惨重的牺牲，但是，它在客观上也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57。

28　*宗教裁判所*，又称*异端裁判所*，是天主教会侦查和审讯异端分子的机构，1231年由教皇格雷戈里九世在罗马建立。随后，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先后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以教皇为最高首脑，裁判官由教皇任命并直接控制，不受地方教会机构和世俗政权的监督制约。裁判所对异端分子、异端嫌疑者实行秘密审讯，严刑拷打。刑罚的种类有没收财产、监禁、流放和火刑等。16世纪以后，随着教皇权势的削弱，宗教裁判所也逐渐衰落。1908年，教皇庇护九世把罗马裁判所改为圣职部，由教皇亲自主持，其主要职能是检查书刊，颁布禁书目录，革除教徒教籍以及罢免神职人员等。——57。

29　*社会契约*是卢梭提出的政治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57。

30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尔萨斯提出的理论。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58、77、81、484。

31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

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见注53）。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存在到1849年。——68、435、481、556、746。

32 即阿·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1840年爱丁堡—伦敦版第1—82页。恩格斯对该书作的摘要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第585—589页。——77。

33 以“马尔库斯”这一署名发表的小册子在英国不止一本。这里可能指马尔库斯《论限制人口增长的可能性》（1838年伦敦版），以及《无痛苦灭绝论》等。本文所述显然转引自托·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110—111页。——79。

34 新济贫法指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新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习艺所（见注170）从事强制性劳动。——79、171、470、745。

35 指恩格斯原来准备撰写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他在英国居留期间（1842年11月—1844年8月）曾为撰写这部著作收集了材料，打算在这部著作中用专门的篇幅描写英国工厂制度和工人阶级的状况。后来他改变计划，决定撰写一本专著论述英国无产阶级。他回到德国后完成了这部著作，即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86。

36 《英国状况。十八世纪》是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出发研究英国状况的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采用了与青年黑格尔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来考察英国和西欧18世纪的历史。他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和人性出发，而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出发来阐述历史前进的趋势。他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指出这场革命奠定了英国各种社会

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运动的动力。他指出，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诞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他联系英国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历程，深刻地阐述了英国政治和哲学的特征，并指出科学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动力。

恩格斯于1843—1844年撰写了一组共三篇研究英国状况的文章，本文是其中的第二篇。第一篇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发表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第三篇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按原计划，第二篇和第三篇也准备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但因《德法年鉴》停刊而分别于1844年8月31日—9月11日、9月18日—10月19日在《前进报》上连载。——87。

37　指1792—1815年欧洲国家同盟（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1792年2月欧洲各国联军发动对法战争。英国起初支持联合军队。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1793年1月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联军，公开参战。——87。

38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有如下论述："法国发生了政治革命，随同发生的是德国的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上一世纪末大陆上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这个体系看来从外部是完全不能攻破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只是由那些身为黑格尔派的人从内部攻击，这个体系才被打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89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写道："德国的哲学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过程，也终于达到了共产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74页）——87。

39　莫·赫斯曾探讨过德国和法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所起的作用，他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部第74—91页叙述了从巴贝夫经圣西门和傅立叶到蒲鲁东的法国政治革命，同时也阐述了从康德经费希特和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无神论的哲学革命。——89。

40　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达13年（1640—1653年）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长期国会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政府经费于1640年

11月召开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立法机构和领导机构。该国会于1649年宣布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4月，奥·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将其解散。——91。

41 *制宪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从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立宪君主派在议会中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曾于1789年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1789年8月26日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原则。——91。

42 *立法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1792年8月—1793年6月)的国家立法机关，从1791年10月存在到1792年9月。在此期间法国革命的政治领导权转到吉伦特派手中，但他们未能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和坚决抗击外国武装干涉。——91。

43 *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公布了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1795年10月国民公会被解散。——91、325。

44 *中庸革命*指*七月革命*，即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91、107。

45 *长老派*是英国清教徒中的一派，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设立长老管理教会；初期不脱离国教，只要求依据加尔文的教会组织原则对国教进行改

革；后来发展成为英国长老会。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老派在长期国会中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利益的温和派，主张与国王妥协。1640—1648年该派一度构成长期国会中的多数派，最后被独立派清洗出英国国会。——91。

46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此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91、497。

47　独立派是英国清教徒中的激进派，16世纪末开始形成，反对专制主义和英国国教会，反对设立国教，更不赞成教会从属于国家政权。这一宗教政治派别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中小贵族的利益，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政党，主张推翻并处决君主，成立共和国。1648年在奥·克伦威尔领导下，该派取得了政权，1649年共和国成立后，镇压平等派和掘地派的人民群众运动，并于1653年建立了军事专政的“护国政府”。——91。

48　1793—1795年的山岳派，亦称山岳党，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其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马·罗伯斯比尔、让·马拉、若·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91。

49　这里的平等派全称是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91。

50　阿贝尔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雅各宾派分离出来的左翼政治派别，以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阿贝尔的名字命名。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该派主张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实行全面限价法以及没收嫌疑犯的

财产平均分给农民的嫌疑犯法。——91。

51　*巴贝夫派*是法国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流派之一，18世纪末由法国革命家弗·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创立。他们主张以密谋方式策动工人、贫民和士兵进行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劳动人民共和国。——91。

52　恩格斯大概利用了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所提供的资料。威德在书中叙述了英国直到15世纪所发生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他指出，在当时的农奴中，villains（维兰）"被容许占有小块土地以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bordars（包达尔）"被容许拥有一间小屋，并且要向领主供应家禽、蛋品和其他食物"，cottars（考塔尔）则"由领主指定从事铁匠、木工以及其他手工业劳动"。

根据后来的研究，在15—17世纪，从农奴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英国农民，大多数是凭土地登记册的副本并按照领主的意志而持有土地的，他们是缴纳封建地租的终身佃农和世袭佃农。现代历史学把中世纪英国的不同类别的农奴称为villains，bordars，cottars。——93。

53　*谷物法*是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31）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95、147、366、480、650、744。

54　*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见注150）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宪

章派(见注153)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发给议员薪金(参看本卷第463页)。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95、372、463。

55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以及自由贸易派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的位置。——97。

56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见注152)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53),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97、387、450、465、589。

57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用脚注说明他利用了乔·波特《国家的进步》一书提供的材料,并且还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中对这条脚注作了补充说明:“这里关于工业变革的历史概述在某些细节上是不准确的,但是在1843—1844年没有更好的资料。”(见本卷第394页)恩格斯在本文中把统计数字凑成整数,因而在某些地方有较大的差异。

本文中关于英国工业发展的资料,恩格斯显然还利用了爱·贝恩斯《大不列颠棉纺织业史》以及安·尤尔《大不列颠的棉纺织业》等著作。——105。

58 可能指耶·边沁《关于政府的断想》1776年伦敦版和《道德与立法原则导

论》1789年伦敦版。边沁在这两部著作中第一次论证了功利原则，其出发点是：人的一切感性和精神的动机，可归因于求乐避苦。他认为，道德和立法的任务是使个人的行为目的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05。

59 可能指詹·穆勒《政府》一文，文章载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5、6版的《增补卷》，1824年爱丁堡版第3卷。穆勒从1808年起就维护边沁的学说，并加以补充。——106。

60 权利法案协会即支持权利法案协会，由霍·图克于1769年创立。该协会要求在议会中有英国人民的合法代表，要求缩短当选人任期和公布议会辩论。随后几年出现了不少类似的协会。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18世纪90年代英国不同城市成立了民主主义的通讯协会。1792年制鞋工人托·哈迪创立了伦敦通讯协会，协会的纲领是实现普选权。1794年协会领导人哈迪、图克等被指控犯有谋反罪而遭逮捕，经审判后被宣告无罪。1799年协会解散，此时它已拥有会员8万人。至90年代末，各通讯协会停止了活动。但是，这些协会的思想和传统对英国激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如1816年出现了汉普顿俱乐部领导的要求实行普选权的改革运动，1819年改革运动被政府镇压下去。——106。

6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1844年4—8月撰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各种历史文献和思想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考察，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的经济学观点、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理论观点，并作了初步的综合性阐述。他论述了劳动实践对于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指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正是通过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创造了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批判地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他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说明私有财产的存在必然造成异化劳动，因而必然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指出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消除异化劳动，而要使社会从私有财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必须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他强调指出，

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见本卷第232页）。他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的贡献，并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同时阐发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他还阐明了自然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指出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见本卷第192页）；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见本卷第193页）。此外，手稿还对自然史、人类史以及美的规律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写在三个笔记本中的手稿组成。笔记本I的内容是：对斯密学说中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经济学范畴作比较分析，揭示斯密学说的矛盾；详细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笔记本II只保留下四页手稿，主要是有关私有财产的论述。笔记本III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论述，对当时的各种共产主义理论的考察和评述，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有关分工和货币的两个片断，还有一篇《序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1927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在第三卷附录中摘要发表了这部手稿中的《第三手稿》（即笔记本III）的俄译文，但这部分手稿被误认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三卷以德文原文发表了全部手稿，并加了标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2年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二卷在发表《手稿》时采用了两种编排方式：第一种按《手稿》的写作时间和写作阶段编排；第二种按《手稿》的逻辑结构和思想内容编排，并加了标题。本卷收入的《手稿》中译文是根据按逻辑结构编排的《手稿》校译的。在《手稿》中，作者以红棕色铅笔划了线的文句或段落，中文版均以双斜线表示起讫。

《手稿》最早由何思敬译成中文，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刘丕坤的中译本。——109。

62　这个计划未能实现。马克思没有写这些小册子，可能因为他后来认为，在对各种社会（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生产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以前，要对法、道德、政治和上层建筑的其他范畴的问题进行独立的科

学的考察是不可能的。——111。

63 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和下文中的当代批判的神学家均指布·鲍威尔，他在《文学总汇报》第1期（1843年12月）和第4期（1844年3月）发表了两篇文章评论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图书、论文和小册子。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词句大部分摘自鲍威尔这两篇文章。“乌托邦的词句”和“密集的大批群众”这些用语见《文学总汇报》第8期（1844年7月）布·鲍威尔的论文《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分析批判了鲍威尔及其伙伴。——111。

64 这时，马克思已经掌握了法文，对法国的文献十分熟悉。他研读了普·维·孔西得朗、皮·勒鲁、皮·约·蒲鲁东、埃·卡贝、泰·德萨米、菲·邦纳罗蒂、沙·傅立叶、劳蒂埃尔、弗·维尔加德尔和其他作者的著作，而且还经常作摘要。但他当时还没有掌握英文，因此只能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来利用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例如，罗·欧文的作品，他就是通过法译本和论述欧文观点的法国作家的著作来了解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文和其他文献资料表明，马克思这时还没有具备他后来例如在《哲学的贫困》（写于1847年）中所显示出来的对英国社会主义者著作的渊博知识。——112。

65 除了威·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以外，马克思大概还指魏特林在他本人于1841—1843年出版的杂志《年轻一代》上所发表的文章，以及他为正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性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

在格·海尔维格出版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文集中，发表了莫·赫斯的三篇匿名文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和《唯一和完全的自由》。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本卷第56—86页。——112。

66 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

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一文刊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2卷。这个两卷本的文集，除了其他作者的著作以外，还收入了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一文。在这个文集上发表的《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过去一直认为是马克思写的，实际上是出自路·费尔

巴哈的手笔。——112。

67　指路·费尔巴哈的整个唯物主义观点。费尔巴哈自己把这种观点称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或“人本学”。这种观点阐发了这样一种思想：新哲学即费尔巴哈的哲学，使人这一自然界的不可分离的部分，成为自己的唯一的和最高的对象。费尔巴哈认为，这样的哲学即人本学包含着生理学，并将成为全面的科学；他断言，新时代的本质是把现实的、物质地存在着的东西神化；新哲学的本质则在于否定神学，确立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人道主义。——112。

68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1版于1807年出版。《逻辑学》共三册，分别于1812、1813和1816年出版。1817年，《哲学全书纲要》出版，1821年，《法哲学原理》出版。——112、201。

69　马克思写完这篇《序言》后不久，就与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部批驳布·鲍威尔及其伙伴的著作于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14。

70　“普通人”在手稿中写的是法文“simple humanité”，是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8章中的用语。马克思在这里以及下面引用斯密这本著作时均采用热·加尔涅所译并附译者注释和评述的1802年巴黎版。“simple humanité”一词见该书第1卷第138页。——115。

71　见皮·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1841年巴黎版。蒲鲁东在该书第3章第6节《社会上的一切工资都是平等的》、第5章第2部分的第3节《第三种社会形式的定义：结论》，对工资的平等作了说明。——124。

72　即威·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此书由尤·福禄培尔于1843年11月赠与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巴黎藏书。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章论述积累时重新援用舒尔茨这本著作，部分地利用了他在本手稿笔记本I中引用过并在页边划了线的引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81—128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追溯了舒尔茨关于工具和机器的区别的论述以及它们对社会发展的不同意义；在援用舒尔茨这本著作

时，马克思称它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28页）。——125。

73 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马克思的巴黎藏书中有这本书。马克思在写《工资》和《资本的利润》时援用的引文均出自该书第XXXI章。马克思在阅读该书第405—429页时，在书上划了许多线并作了一个简短的笔记；划线的地方只有极少部分与笔记本I的引文相关。——126。

74 即查·劳顿《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1842年巴黎版。这是一部英文手稿的法译本，原英文手稿可能未曾出版。劳顿曾有一本英文小册子《论人口和生计的均衡》于1836年在利明顿出版。——127。

75 马克思在这里转述了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论述的关于竞争具有良好作用的思想。按照斯密的观点，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将促进劳动报酬的提高，而且不降低利润。在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家必然要破坏关于不得提高工资的“天然协议”。——134。

76 指亚·斯密关于决定工作者成败和工资高低因素的议论。在这些因素中包括“成功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例如，斯密说道：“送孩子去学制鞋，无疑他能学会制鞋技术；但是送他去学法律，那么精通法律并靠这个职业过活的可能性至少是二十对一。就完全公平的彩票而言，中彩者应得到落彩者所失的全部。就成功者一人而不成功者二十人的职业而言，成功者一人应得到不成功者二十人应得而未得的全部。”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215—216页。——141。

77 这是亚·斯密的一个论点：居民对某种大众消费品如马铃薯的需求的增长，这种产品的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即使这种产品是从中等土地上收获的），必将使租地农场主在补偿基本开支和维持劳动力的开支以后仍有巨额盈余。而这种盈余的一大部分则将归于土地所有者。因此得出结论说：随着人口数目的增长，地租也将提高。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335页。——145。

78 这里是指以大·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们得出的关于土地所有者

和农产品生产者之间关系的结论。而亚·斯密则追随重农学派，证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具有所谓的一致性。——147。

79　关于地产的分割和不分割的争论，是马克思曾计划撰写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四篇论文的主要内容。莱茵省总督恩·冯·博德尔施文格为阻止莱茵省农民贫困化趋势的发展，向1841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提出限制地产析分的草案，遭到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拒绝。议员们坚持自由支配土地的观点，他们强调指出，自由让渡还可使地产扩充，而限制地产析分，则会降低土地的价值。这反映出莱茵省与普鲁士其他省份不同，表明封建地产向资产阶级地产的转变已经开始。——152。

80　马克思在《让·巴蒂斯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中对萨伊关于财富的性质和流通的原理的论述写有如下评注："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对此没有说明理由，但是，这个事实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的财富是不存在的，国民经济学按其本质来说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没有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第316、319页）——155。

81　马克思在《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摘要》中写有如下评注："十分有趣的是斯密作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就以分工、以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第336页）——156。

82　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社会批判性著作中相当流行。例如，威·魏特林在其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就曾写道："正像在筑堤时要产生土坑一样，在积累财富时也要产生贫穷。"——156。

83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黑格尔的术语及其探讨对立的统一的方法，把Verwirklichung（现实化）与Entwirklichung（非现实化）对立起来。——157。

84　马克思在手稿中往往并列使用两个德文术语"Entfremdung"（异化）和

“Entäußerung”(外化)来表示异化这一概念。但他有时赋予“Entäußerung”另一种意义,例如,用于表示交换活动,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化,就是说,用于表示那些并不意味着敌对性和异己性的关系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157。

85 马克思在这里以自己的理解复述了费尔巴哈哲学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论点。费尔巴哈说,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贫穷;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必须什么也不是。人在自身中否定了他在上帝身上所肯定的东西。——157。

86 这里表述的思想与费尔巴哈的论点相呼应。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是人的存在及其精神活动的异化。费尔巴哈写道,上帝作为对人来说的某种至高的、非人的东西,是理性的客观本质;上帝和宗教就是幻想的对象性本质。他还写道,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是主体的活动,是主体的被窃走的思维,而绝对哲学则使人自身的本质、人的活动在人那里异化。——160。

87 马克思在本段和下一段利用了费尔巴哈哲学中表述人和整个人类时所用的术语,并且创造性地吸取了他的思想:人把人的“类本质”、人的社会性质异化在宗教中;宗教以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基础,以意识为基础,而意识严格说来只是在存在物的类成为存在物的对象、本质的地方才存在;人不像动物那样是片面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161。

88 *类*、*类生活*、*类本质*都是费尔巴哈使用的术语,它们表示人的概念、真正人的生活的概念。真正人的生活以友谊和善良的关系,即以爱为前提,这些都是类的自我感觉或关于个人属于人群这种能动意识。费尔巴哈认为,类本质使每个具体的个人能够在无限多的不同个人中实现自己。费尔巴哈也承认人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利益的相互敌对和对立关系,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关系不是产生于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现实条件,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而是人的真正本质即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结果,是人同大自然本身预先决定了的和谐的类生活人为地但绝非不可避免地相脱离的结果。——162。

89 马克思显然是指皮·约·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参看该书第3章第

4—8节。——166。

90 马克思在这段话里从广义上使用工资范畴，以表达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性关系。——167。

91 这是马克思在批判皮·约·蒲鲁东的“平等”观念时所持的基本论点。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表述的“平等”观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关系基础上的。他的空想的、改良主义的药方规定，私有财产要由“公有财产”代替，而这种“公有财产”将以平等的小占有的形式，在“平等”交换产品的条件下掌握在直接生产者手中。这实际上是指均分私有财产。蒲鲁东是这样设想交换的“平等”的，即“联合的工人”始终得到同等的工资，因为在相互交换他们的产品时，即使产品实际上不同等，但每个人得到的仍然是相同的，而一个人的产品多于另一个人的产品的余额将处于交换之外，不会成为社会的财产，这样就完全不会破坏工资的平等。马克思认为，在蒲鲁东的理论中，社会是作为抽象的资本家出现的。他指出蒲鲁东没有考虑到即使在小(“平等”)占有制度下也仍然起作用的商品生产的现实矛盾。后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这部著作中表述了这样一个结论：蒲鲁东在经济异化范围内克服经济异化，就是说，实际上根本没有克服它。参看本卷第268页。——167。

92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是指大·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其中包括詹·穆勒的学说，显然，还指其他经济学家即李嘉图的同时代人的学说。——171。

93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

——172、180、235、255、334。

94 1843年7—8月，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摘录了卡·兰齐措勒的著作《论七月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后果》（1831年柏林版）。摘录收入马克思《法国史、德国史、英国史和瑞典史笔记》（第4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

马克思的巴黎藏书中有威·科泽加滕《论地产的可让渡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1842年波恩版。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研究了这部著作。显然这与他计划撰写的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四篇论文有关。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称它为拥护封建制度的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5页。——175。

95 格·丰克的著作指《地产无限制析分对土地耕种和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和由此产生的国家历史要素乃至等级制国家本身的解体》1839年汉堡—哥达版。他在该书第56页写道："默泽讲述了……一个农奴的故事：这个农奴在赎身时，就像丧妻失子一样，号啕大哭，不得不强制他离开屋子。"尤·默泽这段描述见他的《爱国主义的幻想》1820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3卷第266页。丰克著作的第56页还提到亨·莱奥及其著作《略论国家的自然科学》。而马克思把这件事写成"按照莱奥先生的说法"，这一疏忽可能由此而起。——175。

96 *启蒙国民经济学*首先是同亚·斯密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继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也把斯密称为国民经济学的改革者、"路德"。马克思认为，"启蒙国民经济学"在经济思想的发展上是比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两种较早的经济学说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形式）更高的阶段。这两种体系（更确切地说，是实质上同一体系的两个分支）的目标是追求货币顺差（货币主义）或贸易顺差（重商主义）。两者都不外是为了货币而积累货币；不惜任何代价来获得货币和积存货币，实际上被宣布为最高目的和目的本身。重商主义者犹如偶像崇拜者和拜物教徒那样对待货币这种财富的特殊形式，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财富的特殊形式"只应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维护"。同时，这两种体系的信奉者不注意生产本身，不认为生产的发展是社会财富的基础。只有"启蒙国民经济学"才承认生产、劳动是自己的主要原则或基本

原理。——178。

97　*昔尼克主义*又译*犬儒主义*，原本为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安提西尼创立的哲学学派。昔尼克学派崇尚自然，却把自然和社会绝对对立起来，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它蔑视财富，崇尚俭朴，反映了城邦贫民和被剥夺了部分权利的自由民对大奴隶主骄奢淫逸生活的消极反抗。

后来在西方，人们通常在转义上使用昔尼克主义，泛指：蔑视道德；凌辱人的尊严；不知羞耻；冷酷无情；无所顾忌；对眼前事物冷嘲热讽，等等。——179。

98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把"*对立*"和"*矛盾*"这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在*对立*中两个方面的关系是这样的：其中的每一个方面为另一个方面所规定，因此都只是一个环节，但同时每一个方面也为自身所规定，这就使它具有独立性；相反，在*矛盾*中两个方面的关系是这样的：每一个方面都在自己的独立性中包含着另一个方面，因此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是被排斥的。——182。

99　沙·傅立叶对政治经济学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一门错误的科学。他在关于未来世界、所谓协作制度的空想中，违反经济发展的现实趋向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断言在"合理制度"的条件下，工业生产只能被当做对农业的补充，当做在漫长的冬闲时期和大雨季节"避免情欲消沉的一种手段"。他还断言，上帝和大自然本身确定，协作制度下的人只能为工业劳动拿出四分之一的时间，工业劳动只是辅助性的、使农业多样化的作业。——183。

100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法国的格·巴贝夫、埃·卡贝、泰·德萨米，英国的罗·欧文和德国的威·魏特林所创立的空想主义的观点体系。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最初形态，大概首先是指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形成的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关于"完全平等"的社会，以及在排挤私人经济的"国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这种社会的空想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虽然也表现了当时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整个说来还带有原始的、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性质。——183。

101 在中世纪宗教共产主义共同体中，把妻子公有当做未来社会特征的观念颇为流行。1534—1535年在明斯特掌权的德国再洗礼派试图根据这种观点引进一夫多妻制。托·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就反对一夫一妻制。原始的共产主义共同体还有一些特征，如禁欲主义、对科学和艺术持否定态度。1830年和1840年法国的秘密团体，如平均主义工人社和人道社也曾继承了原始的平均主义思想的某些特征。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一文中对此作过描述。——183。

102 让·雅·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等著作中认为，没有受到教育、文化和文明触动的状态，对人来说才是自然的，马克思则认为这种状态是非自然的。——184。

103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路·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文中所说的“历史之谜的解答”，是指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客观矛盾的发展中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结论。——186。

104 指罗·欧文对一切宗教的批判言论。用欧文的话来说，宗教给人以危险的和可悲的前提，在社会中培植人为的敌对。欧文指出，宗教的褊狭性是达到普遍的和谐和快乐的直接障碍；欧文认为任何宗教观念都是极端谬误的。——186。

105 关于拥有（Haben）这个范畴，可参看莫·赫斯的一些著作。他在《行动的哲学》一文中写道：“正是求存在的欲望，即希求作为特定的个体性、作为受限制的自我、作为有限的存在物而持续存在的欲望，导致贪欲。反之，对一切规定性的否定，抽象的自我和抽象的共产主义，空洞的‘自在之物’的结果、批判主义和革命的结果、无从满足的应有的结果，则导致存在和拥有。助动词就这样成了名词。”（见《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32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也谈到过“拥有”和“不拥有”。——190。

106 地球构造学是弗赖贝格（萨克森）矿业科学院的矿物学家阿·哥·韦尔纳于1780年创立的关于地球的形成、地球的结构和岩石的构成的学科。有关论

述还可参看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2部分第432—440页。——195。

107　马克思在这里把generatio aequivoca这一用语当做法文génération spontanée的同义词来使用，照字面直译就是自然发生的意思。

有关论述还可参看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2部分第455—470页。——195。

108　见布·鲍威尔《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1842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85、193—194页。鲍威尔在这本书中既分析批判了奥·弗·格鲁培的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1842年柏林版），也批判了菲·马尔海内克的《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演讲绪论》（1842年柏林版）。

未来的批判家指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言论的青年黑格尔分子。——198。

109　马克思在这里转述了路·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9—30节中针对黑格尔的批判性意见。——201。

110　*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画廊的希腊文是“στοά”）讲学，故称斯多亚派，又译画廊学派。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的观念和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

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202。

111 怀疑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代表人物有皮浪、阿克西劳、卡内亚德、埃奈西德穆及恩披里柯。

怀疑派哲学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哲学学说。它认为事物是不可认识的，因为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相互排斥的意见；既然人们什么也不能确定，就应该放弃判断，放弃认识，平心静气地求得精神的安宁。怀疑主义揭示了人们认识中的矛盾，在认识史上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反对唯物主义，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否定科学知识，实际上为宗教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202。

112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马克思所用版本的章节分立如下：

第1部：逻辑学
第2部：自然哲学
第3部：精神哲学
——202。

113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第3部分《精神哲学》的分节如下：

第1篇：主观精神
A. 人类学
B. 精神现象学
C. 心理学
第2篇：客观精神
A. 法
B. 道德
C. 伦理
第3篇：绝对精神
A. 艺术
B. 启示宗教
C. 哲学

——203。

114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部分，首先叙述了劳动和享受在实现自我意识的自由时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还可参看卡·路·米希勒出版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833年柏林版第1卷第12页："我们现代的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也不仅是从现代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就存在其中的一种遗产，进一步说，是劳动的成果，而且是人类先前世世代代劳动的成果。"——205。

115　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指黑格尔关于劳动以及某些其他范畴的观点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的看法一致，而且也说明黑格尔具有经济学的知识。黑格尔1803—1804年在耶拿大学的演讲中曾引用过亚·斯密的著作。他在《法哲学原理》第3篇第2章《市民社会》阐述《需要的体系》时，就在第189节及其附释中讲到斯密、让·巴·萨伊和大·李嘉图，说明经济学思想的迅速发展。——205。

116　大约在1844年下半年，马克思在其笔记中写了如下的评注：

黑格尔的现象学的结构。

(1)自我意识代替人。主体。客体。

(2)差别。这些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实体被看做是自我区别，或者说，是因为自我区别、差别、知性的活动被看做是本质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提供了把握事物的真正差别。

(3)扬弃异化等于扬弃对象性。(特别是由费尔巴哈予以发挥的一个方面。)

(4)因此，扬弃想象中的对象、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等于真正的对象性的扬弃，等于与思维有差别的感性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需要认真加以发挥。)——206。

117　路·费尔巴哈称自己的哲学观点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同时却回避唯物主义这个术语。这显然表明他不同意先前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的某些原则，特别是不同意抽象性，不同意把感性视为知识的基础和唯一源泉的感觉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在费尔巴哈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形式，他也像费尔巴哈那样对这些唯物主义哲学形式感到不满，认为不是旧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费尔巴哈的哲学——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才能

够理解世界历史的秘密。——209。

118　马克思关于人是直接的和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论点,基本上是以路·费尔巴哈反对宗教唯心主义和哲学唯心主义而阐发的原则为依据的:把人看成自然界特殊的、有意识的存在物;本质由外在对象的性质规定;任何存在物、任何本质必定具有对象的性质;在感性存在物之外的其他物是感性存在物的生存所必需的,如空气供呼吸,水供饮用,光供照明,动植物产品供食用,等等。——209。

119　"受动的"(leidend)这个术语来自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把这个术语解释为周围环境、外部世界对人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和方式。他说,只有受动的和需要的存在物才是必然的存在物;没有需要的存在是多余的存在;只有受动的东西才值得存在。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的上述观点,而且对"受动的"这一经验原则进行了极其重要的加工和扩充,把社会实践即人为了掌握和改造外部世界而进行的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活动也包括进去了。——209。

120　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33年柏林版第68—71页。黑格尔按照"观念的发展的阶段历程",提出这本书的划分。——214。

121　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存在论:A. 质。B. 量。C. 度。本质论:A. 本质作为实存的根据。B. 现象。C. 现实。概念论:A. 主观概念。B. 客体。C. 观念。——自然哲学。——精神哲学。——215。

122　马克思依据路·费尔巴哈并利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批判黑格尔的论点。例如,费尔巴哈在他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想就是存在、主语,而存在同时又是谓语;逻辑学是他所特有的那种形式的思维,是作为无谓语的主语的思想,或者是同时兼为主语和谓语的思想;黑格尔将客体仅仅想象为能思维的思想的谓语。"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这个说法,看来是套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中的"一个自身旋绕的圆圈"、"圆圈的圆圈"等说法。——218。

123　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第1部分逻辑学。黑格尔把自己的逻辑学划分成客观逻辑(《存在论》和《本质论》属于这一部分),以及主观逻辑或《概念论》,这一部分以《绝对观念》章结束。——219。

124 “小爱尔兰”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这一地区的状况作过较为详细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42—343页）。——225、368、412。

125 参看埃·鲍威尔《蒲鲁东》，载于《文学总汇报》第5期第41—42页。并见《神圣家族》第4章第4节《蒲鲁东。批判性的评注3》（见本卷第263—268页）。——231。

126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神圣家族”是对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兄弟及其追随者的谑称，“批判的批判”是指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思想。他们针对布·鲍威尔等人宣扬的唯心史观，指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产而不是自我意识，强调必须从社会物质生产出发来观察历史；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见本卷第287页）；批判了私有制，并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私有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见本卷第261、262页）。他们还针对鲍威尔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攻击，深刻论述和评价了法国唯物主义抨击现存政治制度、批判宗教和神学、反对17世纪形而上学的斗争历史和积极意义，指出了法国唯物主义同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联系。

这部著作写于1844年9—11月，并于1845年2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早在1842年夏季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成立所谓“自由人”小组时，马克思就同他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马克思反对“自由人”小组热衷于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辨和空洞抽象的哲学争论。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他们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分歧发展到了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根本对立的程度。为了批判青年黑

格尔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捍卫和阐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点，他们决定共同撰写这部著作。

1844年8月底—9月初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同马克思一起拟定了全书的大纲，并合写了《序言》。恩格斯在离开巴黎之前写完了他所分担的几个章节。马克思承担了全书绝大部分写作任务，直到1844年11月底才完稿。他在写作时利用了自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研究成果，以及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研究心得和其他许多笔记、摘要。这部著作最初定名为《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付排过程中，马克思在标题上加了"神圣家族"一词。这部著作在章节目录中标明了作者的名字。

列宁对这部著作作了详细摘要（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5—36页）。他认为这部著作"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92页）。

本卷节录了《神圣家族》的若干篇章。这部著作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

《神圣家族》的部分章节在20世纪30年代已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有：1930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第一集刊载的由李一氓翻译的《神圣家族》第四章中的《批判性的评注1》、《批判性的评注2》和第六章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1936年5月日本东京质文社出版的由郭沫若翻译的《神圣家族》第五章和第八章，译者所加的标题为《艺术作品之真实性》。——249。

127 *傅立叶主义者*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的拥护者。傅立叶主义继承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传统，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的规律性，承认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性，尖锐地批判现存的文明制度，指出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寄生者占有工人创造的巨大财富，而创造财富的工人却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贫者；主张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和谐制度下，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phalange）。在法郎吉中，人人参加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产品按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分配。协作社成员居住和劳作的场所称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傅立叶主义者在法国和美国都进行过法郎吉移民区实验，均以失败告终。

圣西门主义者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圣西门的学生及其学说的拥护者。圣西门逝世后，他的追随者奥·罗德里格、圣阿芒·巴扎尔、巴·普·安凡丹等人创立了圣西门学派，同时他们还创办了圣西门主义杂志《生产者》，广为宣传圣西门的思想。这个学派从事的各项活动，在1830年七月革命前后达到高潮。学派的领导人于1828年12月底和1829年8月之间的讲演被编辑成《圣西门学说释义。1828—1829》。《释义》系统地阐述圣西门的学说，对七月革命前不久因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得日益迫切的问题作出了答复。它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抗，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是人剥削人，要求把财产逐渐转为整个社会所有。这个学派所描述的协作社是：每人按自己的能力从事劳动，按自己的劳绩取得报酬。1829年以后，圣西门学派把宗教因素提到首位，1830年建立起教阶制度。1831年圣西门学派发生分裂，巴扎尔及其追随者力争实现圣西门的要求，探索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安凡丹及其追随者则把圣西门主义奉为新宗教，像宗教教派那样研究和实现圣西门学说。——271、354、385。

128　指1844年6月《文学总汇报》第7期发表的塞利加对法国作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这部小说用感伤庸俗的笔调写成，书中充满了社会幻想，于1842—1843年在巴黎出版后，不仅在法国国内大负盛名，而且在国外也赢得声誉。——275。

129　此处和以下的引文均出自布·鲍威尔的文章《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发表在1843年12月《文学总汇报》第1期上；这篇文章是鲍威尔针对在报刊上对他的《犹太人问题》一书的批评所做的答复。——283。

130　布·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1843年在布伦瑞克出版，该书重印了鲍威尔曾用同一标题发表在1842年11月《德国年鉴》上的论文，并作了补充。——283。

131　指《巴黎革命》周报，该报于1789年7月—1794年2月在巴黎发行。在1790年9月以前，革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埃·路斯达洛任该报编辑。——288。

132　指路·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写于1842年1月，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在德国出版，1843年发表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2卷。——289。

133　空论派是复辟时期(1815—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政客集团;空论派是立宪君主主义者,是民主和革命运动的敌人,他们企图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同盟;空论派最著名的人物是历史学家弗·基佐和哲学家保·鲁瓦耶–科拉尔。鲁瓦耶–科拉尔的观点在哲学方面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思想的反动。——292。

134　这一段及以下的引文均出自布·鲍威尔为反驳他的《犹太人问题》一书的批评者而写的第二篇文章。他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文学总汇报》第4期(1844年3月)上,和第一篇文章的标题相同,都是《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297。

135　指收集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这本文集里的布·鲍威尔的《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一文。这本文集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诗人格·海尔维格于1843年在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出版的。——304。

136　社会小组是民主知识分子的代表建立的组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年代在巴黎进行活动。社会小组在共产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社会小组的思想家克·福适主张平均分配土地,限制过多的财产,并主张对凡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给予工作。福适对法国革命文献中宣布的形式上的平等所作的批判,促使"疯人派"的领导者雅克·卢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更加大胆的言论。——320。

137　笛卡儿派指17—18世纪笛卡儿哲学的继承者。笛卡儿在形而上学方面有唯心主义倾向,在物理学方面是唯物主义者,因此,其追随者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学派。一派发展了笛卡儿物理学的机械论自然观,成为唯物主义者;另一派则发展了笛卡儿形而上学中关于上帝与灵魂的学说,成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328。

138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詹森派以荷兰神学家詹森的名字命名,是17世纪和18世纪初法国天主教徒中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该派反映了一部分法国资产阶级对正统天主教的封建思想的不满情绪。——329。

139　自然神论是一种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

理论，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也是无神论在当时的一种隐蔽形式。这种理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者往往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332、439。

140 *柏林学社*是《文学总汇报》的记者对一些不属于布·鲍威尔集团并在若干枝节问题上批评《文学总汇报》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称呼；其中有麦·施蒂纳。——348。

141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是恩格斯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论述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地位、斗争历程和历史使命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阐述了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史，说明了工人阶级伴随工业革命而形成和壮大的过程；以大量生动具体的材料真实地展现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悲惨情景。恩格斯揭示了工人遭受非人待遇的社会根源，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把工人置于这种境地。恩格斯明确宣布，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必然会推动它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在高度评价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热情和坚强意志的同时，论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和前进方向，指出工人运动除了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再没有其他出路，而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才能赢得胜利，只有到那时，“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见本卷第473页），从而实现改造整个社会的任务。

1842年11月—1844年8月，恩格斯在英国居住期间深入工人住宅区进行实地调查，亲自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同时广泛搜集和仔细研究他所能看到的各种官方文件和资料。根据亲自调查和考证的翔实材料，恩格斯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在德国巴门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一版于1845年5月在莱比锡出版，德文第二版于1892年出版，恩格斯为该版写了序言。经恩格斯本人同意还出版了两个英文本，即1887年美国版和1892年英国版，恩格斯分别为这两个版本写了序言。恩格斯还将美国版序言译成德文，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题发表在1887年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

卷)。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包括了英国版序言的主要内容,并在理论阐述上作了新的补充。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这样评价自己的这部著作:"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见本卷第365页)同时,他也说明了其中个别不足之处。他进一步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指出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只给少数工人贵族带来好处,而广大工人群众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见本卷第368页)。他强调工人阶级要善于总结经验,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见本卷第379页)他还评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批判了那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见本卷第371页)。

列宁指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之一"(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277页);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91、92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部分内容曾由陈问路译成中文发表在南京《劳动季报》1935年第5期和1936年第8期。

本卷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了节选。该著作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361。

142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第二版而写的。序言包括了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的主要内容,并在理论阐述上作了新的补充。恩格斯把英国版序言中所录《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一文按1885年《新时代》杂志第3年卷第6期上的德译文照录于本序言中。本篇序言的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德文版写的。——365。

143 这里的"美国版序言"是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这篇文章本来是为美国版写的,但恩格斯

后来写了另一篇阐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文章作为美国版序言。恩格斯将这篇序言译成德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题为《美国工人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365。

144　1876年5月10日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有40个国家参展。为了在英国和法国工业占领的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德国也参加了展览。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展品评判小组主席、柏林工业科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认，德国产品的性能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国民报》第293号首先披露，致使舆论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月至9月就此事专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这一事件称做工业上的耶拿会战，以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10月耶拿会战中被拿破仑法国击溃一事来作比喻。——366。

145　关于实物工资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67—469页）。1831年通过了禁止实行实物工资制的法律，但很多工厂主并不遵守。——367。

146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5—336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367、465、748。

147　“**七日规**”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区，从中心点往外有七条放射状街道。——369。

148　**小宅子制**是英国19世纪上半叶某些工厂自己制定的制度，即工厂主以极

苛刻的条件为工人提供住所，房租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这种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69—470页）。——369。

149 指1886年1月22日—2月2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名矿冶工人举行的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369。

150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792页）。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372、436、463、696。

151 宪章派（见注153）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示威者将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但是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中有许多人发生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劝说请愿的群众就地解散。反动势力利用这次行动的失败向工人发起进攻并对宪章派加以迫害。——372。

152 1831年3月，辉格党内阁首相查·格雷和副首相约·罗素在议会中提出了一项关于选举法改革的法案。这一提案旨在打破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增加资产阶级议员的席位，保证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下院。为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掀起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形成了高潮。经过议会内外的斗争，这项法案于1832年6月4日经上院最后批准，于6月7日生效。改革法案调整了选区，向新兴工业城市补充或分配了下院议员席位，改变了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使多数资本家获得了选举权，但是，为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权。——372、403。

153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见注150)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373、387、463、653、695、744。

154　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这次改革使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但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

1884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秘密投票于1872年实行。——373。

155　马克思在其他著作里,例如在《1859年的爱尔福特精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一文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374。

156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是恩格斯用英文写成的,他本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发给英国各政党的某些领袖、著作家和议会议员们。1845年和1892年德文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用原文刊载了这篇文章,1887年的美国版和1892年的英国版没有收入这篇文章。——382。

157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383。

158　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是1844—1845年间根据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倡议在普鲁士许多城市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诱使德国工人放弃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斗争。尽管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极力使这些协会带有无害的

慈善性质，但是，这些协会的建立还是唤醒了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引起了德国社会各阶层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工业发达的莱茵省各城市，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运动发展的规模较大，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很尖锐，并且已经存在一个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激进民主主义反对派。

革命民主派的知识分子广泛利用筹建这些协会和讨论协会章程的集会来传播先进思想。于是，这些集会以及协会本身成了各种对立的社会利益和阶级利益互相争斗的场所。这种现象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活跃。普鲁士政府慑于这些协会的活动具有它难以预料的倾向，遂于1845年春采取不批准协会章程等手段，阻止协会继续活动，进而将其取缔。——386。

159 指1844年6月4—6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反对降低工资而自发举行的起义以及1844年夏天发生的，包括布拉格近郊纺织工人在内的捷克工人的骚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工人们捣毁工厂，破坏机器。起义遭到了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387。

160 1844年的议会会议讨论的有关问题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61—462、571—572和582页以及本卷第483—484、493页。——404。

161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本卷第56—86页。——406。

162 *高教会*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高教会信徒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他们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其信徒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424。

163 *贵格会*，又名*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会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及其仪式，反对暴力和战争，鼓吹和平主义思想，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425、469。

164 *陀斐特*是耶路撒冷南部的欣嫩子谷，是犹太人焚人以供牺牲之处，后来成为焚烧垃圾的地方。参看《旧约全书·耶利米书》第19章。——431。

165　*萨格*(Thug)是对印度勒杀教派的称呼。该教派的信徒经常在宗教仪式的名义下进行杀人勾当。在19世纪的欧洲文献中,这一名词成为形容职业强盗和杀人犯的流行用语。——456。

166　*菲默法庭*是中古时代盛行于德国西部威斯特伐利亚的秘密法庭。——457。

167　据罗马历史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为了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抗贵族压迫的平民,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四肢反抗胃的寓言,使平民同意和解。阿格利巴把当时的社会比做有生命的机体,把贫民比做机体的手,把贵族比做供养这个机体的胃。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458。

168　相传公元前494年,古罗马的平民由于不堪忍受贵族的压迫而举行起义,后来退往圣山。克萨尔-摩尔是曼彻斯特附近的一座小山,工人们常在那里举行集会。恩格斯因此把它比做古罗马的圣山。——465。

169　*警察叛乱*(spy-outbreaks)指设菲尔德、布拉德福德及其他城市中由煽动者挑起的宪章派和警察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使运动的许多领袖和参加者被捕。——465。

170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入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们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本卷第487页),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士底狱”(见本卷第745页)。——467、487、745。

171　*特别警察*指英国的特别巡警,是由平民组成的警察后备队,他们曾帮助正规警察驱散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示威游行队伍。——468。

172 雅各宾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469。

173 “国内移民区”是罗·欧文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验区的称呼。——471。

174 “技术学校”是一种夜校，工人们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普通学科和技术学科的知识；在英国，这种学校最初在格拉斯哥（1823年）和伦敦（1824年）出现。19世纪40年代初，这类学校有200多所，大都分布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工厂城市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些学校来训练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熟练工人以供他们使用。——473。

175 见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476。

176 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重农学派也主张自由放任，他们认为，经济生活是受自然规律调节的，国家不得对经济事务进行干涉和监督；国家用各种规章进行干涉，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他们要求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478、486。

177 “青年英国”是由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组成的集团，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迪斯累里及托·卡莱尔等。他们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满，企图用蛊惑手段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恩格斯对“青年英国”的评价，见本卷第493—494页。——484。

178 旧济贫法指英国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四十三年）颁布的济贫法。根据这项法律，每个教区必须缴纳救济贫民的特别税，教区中无法维持本人及家庭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贫会获得救济。该济贫法曾经过多次修订。——485。

179 巴尔米开特的餐桌出自《一千零一夜》，富人巴尔米开特愚弄饥饿的穷人，在宴会上，端来一个个的空菜盘，用空话和手势款待饥肠辘辘的人们。——494。

180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的笔记，这个笔记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同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为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这个笔记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实践作用的主要缺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说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本卷第500、501、502页）。马克思还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者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见本卷第501页），从而把对人的认识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

这篇笔记写在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中，标题为《1. 关于费尔巴哈》，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1888年恩格斯在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把这篇笔记作为附录首次发表，标题为《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恩格斯在该书序言中说：“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66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德文版编者根据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的提法，将这一笔记定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恩格斯在发表这个《提纲》时对个别地方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本卷将马克思1845年的原稿本和恩格斯修改的稿本一并收入。

《提纲》的中译文最早发表在1929年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林超真翻译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在以后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多种中译本中都收有这个《提纲》。——499。

181　经院哲学也称烦琐哲学，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学院中形成的一种哲学。经院哲学家们通过烦琐的抽象推理的方法来解释基督教教义和信条，实际上把哲学当做“神学的婢女”。——500。

182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

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共分两卷，第一卷批判了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的唯心史观，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第二卷批判了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德国社会主义"，揭示了这种假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第一卷第一章中首次对唯物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们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论证了研究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科学历史观的前提，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由此出发来阐明意识的各种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因此，"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见本卷第544页）。他们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论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指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生产力制约交往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必然由新的交往形式来代替，"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见本卷第567—568页）。他们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建设新社会并在斗争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任务。他们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见本卷第527页）。他们强调未来新社会的创建一方面"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见本卷第538页）；另一方面要以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这个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见本卷第539页）。他们还指

出，共产主义将消灭旧的分工造成的限制，使每个人的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到那时，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真正获得解放。

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1846年5月共同撰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为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德国寻找出版商。由于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加上出版商对书中所批判的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同情，这部著作未能出版。只有第二卷第四章在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8月号和9月号上发表过。这部著作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没有总标题。现在的书名源于马克思在1847年4月6日发表的声明《驳卡尔·格律恩》中对这部著作的称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43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是未完成的手稿，写于第一卷写作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在手稿中，这一章原来的标题是《一、费尔巴哈》。在手稿第一章的结尾处恩格斯写有：《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显然，这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马克思遗稿，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时对原有标题所作的具体说明。

《费尔巴哈》这一章直到1924年才由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1926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中以德文原文发表；1932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第一次以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五卷，其中《费尔巴哈》这一章由编者重新编排，加了分节标题，删去手稿结尾部分关于社会意识形式等内容的几段札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德文版和中文第一版的第三卷均以这一版本为依据。后来，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65年第10、11期发表了巴加图里亚根据手稿重新编排的《费尔巴哈》这一章的俄译文；1966年《德国哲学杂志》第10期用德文发表了该章的新编版本；此后该章的俄、德文单行本也相继问世。收入本卷的《费尔巴哈》章是根据该章1985年德文单行本译校的。

本卷节录了第一卷中《序言》、《第一章　费尔巴哈》和第二卷的开篇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

《费尔巴哈》这一章曾由郭沫若译成中文，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1942年7月上海珠林书店还出版了克士

(周建人)翻译的这一章的中译文,书名为《德意志观念体系》。——507。

183 大·施特劳斯的主要著作《耶稣传》(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开创了对宗教的哲学批判,并使黑格尔学派开始分裂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

老年黑格尔派强调黑格尔的体系,对德国三月革命(见注241)前的社会和政治实践持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态度。因此,他们也被称做右翼黑格尔派,其成员有格·加布勒、卡·道布、汉宁和亨·莱奥。

青年黑格尔派注重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对基督教和普鲁士国家持批判态度,他们也被称做左翼黑格尔派,其主要成员有大·施特劳斯、麦·施蒂纳、阿·卢格、鲍威尔兄弟等,路·费尔巴哈一度也是该派成员。——512。

184 *狄亚多希*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们,他们在亚历山大死后为争夺权力而彼此进行残酷的厮杀。在这场争斗的过程中(公元前4世纪末至3世纪初),亚历山大的帝国这个不巩固的、实行军事管理的联盟分裂为许多单独的国家。——513。

185 “震撼世界的”一词是《维干德季刊》上一篇匿名文章的用语(见该杂志1845年第4卷第327页)。——516。

186 “*交往*”(Verkehr)这个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些术语,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520。

187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术语Stamm,在本文中译为“部落”。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科学中,这个术语的含义比现在广泛。它是指渊源于共同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近代所谓的“氏族”和“部落”。美国的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在其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摩尔根指明,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基层单位,从而为原始社会的全部历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一书中总结

了摩尔根的这些发现，全面地解释了氏族和部落这两个概念的内容。——521。

188 李奇尼乌斯土地法是公元前367年在古罗马通过的一项法律，又称李奇尼乌斯法。该法律对于把公有地转交个人使用的权利作了某种限制，并规定撤销部分债务。该法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扩大贵族的特权，反映了平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所加强。根据罗马的传统说法，该法是罗马护民官李奇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制定的。——522。

189 内战指在罗马发生的内战，通常是指罗马统治阶级各集团之间从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前30年持续进行的斗争。这些内战连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奴隶起义加速了罗马共和国的衰亡，并导致罗马帝国的建立。——522。

190 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以及《法兰克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中均有关于日耳曼人军事制度的论述。——522。

19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的论述，主要涉及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未来哲学原理》，并且从中引用了费尔巴哈的一些用语。——528。

192 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德文原文是Haupt- und Staatsaktion，其原意是“大型政治历史剧”，指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德国巡回剧团演出的戏剧。这些戏剧用夸张的、同时也用粗俗的和笑剧的方式展现悲剧性的历史事件。

这个词的引申意义是指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德国历史科学中的一个流派“客观的历史编纂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莱·兰克是该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把Haupt- und Staatsaktion看做是需要陈述的重要主题。“客观的历史编纂学”看重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历史，宣称外交政治高于国内政治，无视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540。

193 大陆体系或大陆封锁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为反对英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治措施。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拿破仑于1806年11月21日颁布了《柏林敕令》，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体系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和奥地利。根据1807年的蒂尔西特条约的秘密条款，俄国加入了大陆体系。

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体系便瓦解了。——541。

194 指布·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载于1845年《维干德季刊》第3卷。——543。

195 《马赛曲》、《卡马尼奥拉曲》、《ça ira》(意为：就这么办)都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ça ira》这首歌曲结尾的叠句是："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把贵族吊在路灯柱上！"——543。

196 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及首陀罗。——546、618。

197 莱茵之歌是指德国诗人尼·贝克尔的诗歌《德国的莱茵河》。这首诗在1840年写成后被多次谱成歌曲。——548。

198 路·费尔巴哈在《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一文的结尾处这样写道："由此可见，既不应当称费尔巴哈为唯物主义者，也不应当称他为唯心主义者，更不应当称他为同一哲学家。那他究竟是什么呢？思想中的他，就是行动中的他，精神中的他，就是肉体中的他，本质中的他，就是感觉中的他；他是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仅仅设定在共同性之中——他是共同人，是共产主义者。"——548。

199 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47页。

恩格斯在为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而写的札记《费尔巴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中，引用和评论了费尔巴哈这部著作中有关的话。——549。

200 按照麦·施蒂纳的看法，"联盟"是利己主义者的自愿联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452—501页)。——558。

201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研究了农民反抗封建制度的斗争历史，探讨了1848—1849年农民的革命活动，改变了他们对中世纪农民起义的评价。恩格斯在1850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一书

中阐明了农民起义的性质及其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方面所起的作用。——558。

202　*航海条例*是英国为了保护本国海运、对付外国竞争而制定的一系列法令。条例规定，进口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的船只；英国沿海的航行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只限于英国船只。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航海条例，是1651年奥·克伦威尔为对付荷兰的转运贸易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颁布的。航海条例在19世纪20年代已受到很大限制，1849年只保留了有关沿海贸易部分，1854年全部废除。——563。

203　英格兰于1066年被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征服。

1130年宣告成立的西西里王国包括西西里和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南意大利。西西里王国的建国方针是由诺曼征服者的首领罗·基斯卡德于11世纪下半叶制定的。——577。

204　意大利城市阿马尔菲是10—11世纪繁荣的商业中心。在中世纪，阿马尔菲市海商法在整个意大利都有效，并在地中海沿岸各国广泛采用。——584。

205　*青年德意志*是德国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和德国人民起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它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团体，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极大，在世界观方面受黑格尔思想和圣西门主义的影响。青年德意志作家（卡·谷兹科、亨·劳伯、卢·文巴尔克和泰·蒙特等）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实行立宪制、解放妇女等等。他们的文艺和政论作品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青年德意志派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沦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青年德意志在1848年后解体。——590。

206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批判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阐发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为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散布的取消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观点，批判了他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

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见本卷第602页）同时，马克思对生产力的构成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包括劳动者本身，强调“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见本卷第655页）。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对抗性，指出这种对抗性矛盾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尖锐化，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终将为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新社会所代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强调工人阶级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根本改造的真正的社会力量，阐明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斗争的目标和形式，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斗争来团结和教育广大劳动群众，必须联合起来、结成同盟，用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争取劳动阶级的解放，而“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见本卷第655页）。

马克思在1859年回忆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3页）恩格斯指出，《哲学的贫困》表明“马克思自己已经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9页）。

1846年12月，马克思读了刚出版的蒲鲁东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他在1846年12月28日给俄国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帕·瓦·安年科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中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作了详细的评论，信中表述的思想后来成为马克思撰写《哲学的贫困》的基础。1847年1月马克思着手撰写这部著作，4月初完稿并付印。1847年6月15日，马克思为该书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

这部著作于1847年7月初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以法文出版。1880年4月7日，法国《平等报》刊登了马克思以编辑部名义为该报发表这部著作而写的一篇引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25—426页）。在这篇引言中，马克思写道：“我们决定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初版已售完），是因为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

入门”。马克思还进一步阐明了撰写《哲学的贫困》的目的和意义，他指出："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决裂，这种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一版于1885年出版，恩格斯校订了译文，加了许多注释，并专门写了一篇序言：《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恩格斯在校订德译文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在1876年1月1日送给娜·吴亭娜（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委员尼·伊·吴亭的妻子）的1847年法文版上的修改意见。该书的德文第二版于1892年出版，恩格斯写了一个简短的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333页）。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于1896年出版了法文第二版。

本卷节选了《哲学的贫困》的第二章。该著作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

《哲学的贫困》曾由李铁声译成中文，1928年发表在上海《思想》月刊第2—3期；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杜竹君的译本；1932年北平东亚书局出版了许德珩的译本；1949年解放社出版了何思敬的译本。——593。

207　暗指弗·魁奈的同时代人尼·勃多于1770年发表的著作《经济表说明》。——598。

208　引自卢克莱修的诗篇《物性论》第3卷第869行："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603。

209　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法文版目录中，第四节的标题为："土地所有权或地租”，而在正文中第四节的标题为："所有权或租”，但两者在理论内涵上没有什么区别，正如马克思在本文中指出的那样："虽然蒲鲁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谈论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见本卷第638页）。1885年恩格斯亲自审定的德文版则把目录中第四节的标题改为"所有权或租”。——638。

210　有40个埃巨的人是伏尔泰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农民，每年收入40个埃巨。埃巨是法国当时的币名。——639。

211 当时在法国实行的法律，如1791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宪议会通过的所谓列沙白里哀法案和拿破仑帝制时期制定的刑法典，都禁止工人建立工人联合会和组织罢工，违者受到严厉的惩处。在法国，对工会的禁令到1884年才撤销。——652。

212 全国职工联合会是英国工联的组织，成立于1845年。联合会的活动仅限于争取出卖劳动力的优惠条件和改善工厂立法的经济斗争。联合会一直存在到60年代初，但是1851年以后它在工会运动中便没有发挥太大作用。——653。

213 指斐·拉萨尔的错误提法，这一提法主要出现在1862年4月12日拉萨尔在柏林手工业者联合会所作的报告中。报告的题目是《论当前历史阶段同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拉萨尔的这一报告后来刊印的单行本大都以《工人纲领》为题。——655。

214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是恩格斯为阐述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和理论主张而写的文章。恩格斯在文中批驳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卡·海因岑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诬蔑，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恩格斯阐述了共产主义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本文包含两篇文章，分别写于1847年9月27日以前和10月3日，刊载于1847年10月3日和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657。

215 指卡·海因岑的《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和雅·费奈迭的《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658。

216 卡·海因岑主张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是一个类似瑞士联邦的自治国家的共和联邦。这个共和国的旗帜就是黑、红、黄三色旗。这也是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对待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观点与消除中世纪隔绝状态和政治上不统一的斗争相互矛盾，针锋相对地提出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的主张，参看《共产党在德

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3页)。——659。

217　恩格斯列举的这些农民起义都是中世纪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运动:瓦·泰勒是1381年英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杰·凯德是1450年英国南部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封建起义的领导者;扎克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意即"乡下佬",因此法国1358年的农民起义被称为扎克雷起义;农民战争指德国1524—1525年的农民战争。恩格斯后来研究了农民反抗封建制度斗争的历史,探讨了1848—1849年农民的革命活动,改变了自己对农民运动的评价。他在1850年撰写的《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一书中阐明了农民起义的性质及其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方面所起的作用。——661。

218　见《驳卡尔·格律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667。

219　*伊留米纳特*直译为*照耀派*,是1776年在巴伐利亚成立的近似于共济会的秘密团体,由对国王专制制度不满的市民和贵族反对派组成。伊留米纳特害怕一切民主运动,它在章程中所作的规定使普通会员变成了领导人的盲目工具。1784年,该团体被巴伐利亚当局取缔。——671。

220　*长裤汉*又称*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他们穿粗布长裤,有别于穿丝绒短套裤的贵族富豪,故名。长裤汉原是贵族对平民的蔑称,后来成为"革命者"、"共和主义者"的同义语。1793—1794年,他们曾发起要求社会经济改革的运动。——674。

221　这些诗句引自海涅《阿塔·特洛尔》第24章。从该书序言中可以看出,"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信念"、"虽无才能,却有性格"都是海涅用来讽刺白尔尼派的。恩格斯转引这些诗句用以讽刺卡·海因岑。——674。

222　*《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草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恩格斯在这篇文献中阐明了共产主义理论的本质,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论述了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和阶级特性,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埋葬资本主义和解放全人类

的伟大历史使命；阐述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强调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废除私有制；废除私有制是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要求，但私有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废除的，“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见本卷第685页）。恩格斯论述了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指出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将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阶级对立、城乡对立将消失，社会成员的才能将得到全面发展，等等。恩格斯还阐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和手段，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见本卷第685页）在这篇文献中，恩格斯还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对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流派的态度，论述了共产主义者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

1847年6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了第一个纲领稿本，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同年10月底—11月，恩格斯受同盟巴黎区部的委托，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基础上写出新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准备提交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写信给马克思，扼要介绍了《共产主义原理》的内容，并建议“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5—56页）。这个重要意见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纲领。他们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写成了《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原理》的中译文曾收入1930年由潘鸿文编、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的《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1949年7月上海民间出版社又出版了林若的中译本。——676。

22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50年代，即马克思制定出剩余价值理论以前所写的著作中使用过“劳动价值”、“劳动价格”、“出卖劳动”这样的概念。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导言中指出：“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这些概念“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见本卷第70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使用的是“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出卖劳动力”等概念。——676、751。

224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以下是半页空白，没有答案。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同于无产者的所谓手工业者，上个世纪几乎到处都有，而今天还散见各处，他们顶多是暂时的无产者。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得资本，并用它来剥削其他劳动者。当行会仍然存在，或者当经营自由还没有导致手工业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还没有导致激烈的竞争时，他们往往还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一旦手工业采用了工厂制度，竞争也非常盛行时，这种前景就消失了，手工业者就日益成为无产者。因此，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或者是成为资产者或一般是变为中间等级，或者是由于竞争而成为无产者（正如现在所经常发生的），并参加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参加或多或少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77页）——679。

225　恩格斯曾指出："……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见本卷第371页）——682。

226　在回答第二十二个问题的地方，写着"保留原案"的字样。这是指答案应当维持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的答案，即"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80页）——690。

227　在回答第二十三个问题的地方，写着"保留原案"的字样。这是指答案应当维持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的答案，即"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单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而共产主义却是使一切现有宗教成为多余并使之消灭的发展阶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80页）。——690。

228　**全国土地改革派即北美土地改革派**，又称美国"全国改革协会"，成立于1845年，是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和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

取消常备军等民主要求。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692。

229 《关于波兰的演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关系的重要演说。他们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只有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才能同时获得解放。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此，具有相同处境、相同利益、相同敌人的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起来，共同为争取本阶级的解放和各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说是在1847年11月29日民主派兄弟协会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国际大会上发表的。民主派兄弟协会是英国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和各国革命流亡者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演说的全文。——694。

230 指1830年11月开始的1830—1831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小贵族的手里。由于他们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因而没有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从而导致了起义的失败。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恩格斯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37—541页）以及他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有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74页）。——694。

231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见注31）。19世纪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694、744。

232　*瓜分波兰*指18世纪根据1772年5月3日在圣彼得堡签定的协定对波兰进行的三次瓜分。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波美拉尼亚、库亚维恩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利夫兰及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1793年第二次瓜分波兰时，俄国得到了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地区和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普鲁士得到了但泽(今格但斯克)、托伦及大波兰区的部分地区。奥地利未参加第二次瓜分。1795年第三次瓜分时，俄国分得了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和沃伦的一部分。奥地利攫取了包括卢布林和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本土大部分划归普鲁士。第三次瓜分以后，波兰贵族共和国已不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了。——696。

233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的一部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论著。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了以剥削雇佣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阐明了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科学论证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某些思想，戳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扬的“资本家和工人利益一致”的谎言，指出“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见本卷第734页)，从而说明了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这部著作还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和辩证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深刻危机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这部著作是马克思根据1847年12月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发表的演说写成的，最初以社论形式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在《新莱茵报》陆续发表。后来由于《新莱茵报》被迫停刊，这部著作的连载遂告中断。1880年，这部著作的单行本首次在布雷斯劳出版，并于1881年再版。1884年，瑞士合作印书馆在霍廷根—苏黎世再次出版这部著作的单行本，并附有恩格斯写的简短前言。1891年，为适应工人群众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在恩格斯的关心下，这部著作的新单行本在柏林印行。恩格斯根据《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科学论述，对马克思这部著作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恩格斯在《导言》中指出：“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见本卷第702页)恩格斯阐明了修改的理由，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价值，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指出工人阶级不仅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而且是新的社会制度的创造者。

本卷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根据1891年版译出的。凡是恩格斯所作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注明《新莱茵报》上发表时的原文。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中译文于1919年5月9日—6月1日在北京《晨报》上连载，译者署名食力；1921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袁让翻译的中译本；1929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朱应祺、朱应会合译的中译本；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合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收有这篇著作的中译文。——699。

234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本人校订的、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新版单行本而写的。恩格斯在导言开头部分，把他为这一著作的1884年单行本所写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204页）全部复述了一遍。19世纪90年代，为了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和恩格斯的这篇导言曾在德国大量印行，广为传播。

导言曾以独立的论文形式公开发表，在工人和社会主义报刊上获得广泛的传播。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新版单行本出版以前，这篇导言曾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发表在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第109号附刊。此外，导言还稍经删节刊载于1891年5月30日《自由报》第22号，1891年7月10日意大利杂志《社会评论》第10期，1891年7月2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4号，1892年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问题》等报刊。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后来根据1891年版译成许多种外文出版，所有这些版本都收入了恩格斯写的这篇导言。——701。

235 指《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该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主编；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新莱茵报》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报纸发表的有关德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仍然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

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写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19页）——701。

236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701。

237　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指1849年沙皇军队为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和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对匈牙利进行的武装干涉。

德累斯顿等地的起义是为了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而举行的。这些起义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701。

238　后来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了一份手稿，是为《雇佣劳动与资本》最后一讲或最后几讲准备的提纲，标题为《工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封面上注明"1847年12月于布鲁塞尔"。从内容上看，这份手稿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这篇未完成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补充。但是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未发现《雇佣劳动与资本》已定稿的结尾部分。——701。

239　指1891年五一庆祝活动。在某些国家（英国、德国），这种庆祝活动是在5月1日以后头一个星期日举行的；1891年，5月1日以后的头一个星期日是5月3日。英国、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许多城市的工人，在1891年五一纪念日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710。

240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

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国二月革命在欧洲1848—1849年革命中具有重要影响。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711。

241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711。

242　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01页）——711。

243　指1848年11月1日维也纳被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占领。——711。

244　指1848年11月11日的柏林事件。1848年11月8日国王下令把普鲁士国民议会会址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国民议会的多数派通过了一项继续把会址设在柏林的决定。11月10日国民议会被赶出它经常举行会议的话剧院。11月11—13日议会在射击俱乐部召开会议，11月15日被弗兰格尔将军的军队驱散。——711。

245 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此处即为"劳动力"。关于本文中"劳动力"概念的使用情况，可参看恩格斯为1891年单行本写的导言（本卷第702页）。——727。

246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是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关于自由贸易的谎言，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一篇重要演说。马克思在演说中揭示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事实，指出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自由贸易派所标榜的"贸易自由"，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充分运用资本的自由，就是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自由，同时也是一些国家牺牲另一些国家的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

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说。1848年2月初，这篇演说的单行本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出版。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约·魏德迈将这篇演说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1885年，根据恩格斯的意见，这篇演说的新的德译本作为附录被收入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1888年，这篇演说的英译本在美国波士顿出版，并刊有恩格斯撰写的序言；1888年7月，《新时代》杂志刊载了恩格斯这篇序言，标题为《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这篇著作由邹钟隐译成中文，收入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的《自由贸易问题》一书。——744。

247 指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经济学家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见恩格斯《经济学家会议》和《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750。

248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19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致使东印度

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的焦点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1854年4月30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753。

人名索引

A

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329、333—335、337、474。

安东尼（马可·安东尼）（Antonius，Marcus 公元前83—30）——罗马政治活动家和战略家，尤利乌斯·凯撒的拥护者。——323。

安斯沃思—克朗普顿（Ainsworth & Crompton）——英国一家纺织厂。——456。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529。

奥斯特勒，理查（Oastler，Richard 1789—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改革家；托利党人，贵族慈善运动的主要代表；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斗争中主张通过立法限制工作日。——465。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Gracchus 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 François-Noël 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后被处死。——91、320、335。

巴兹里（Bardsley）——英国医生。——438。

白恩士，约翰（Burns，John 笔名杰克 Jack 1858—1943）——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80年代为新工联的领导人之一，伦敦码头工人罢工（1889）的领导者；90年代转到自由派工联主义立场；议会议员（1892年起），曾任自由党内阁的地方自治事务大臣（1905—1914）和商业大臣（1914）。——380。

拜比吉，查理（Babbage，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626。

拜伦，乔治（Byron，George 1788—1824）——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474。

邦纳罗蒂，菲力浦（Buonarroti，Filippo 1761—1837）——意大利革命家，18—19世纪初法国革命运动的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格·巴贝夫的战友，新巴贝夫主义的创始人。——320。

包令，约翰（Bowring，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官、语言学家和文学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贸易派，高级殖民官员，议会议员；1847—1852年任驻广州领事，1854—1857年继文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和中国商务监督，极力主张对中国进行侵略；1856年10月借口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

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德国的统一；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以保证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374。

毕舍，菲力浦·约瑟夫·本杰明（Buchez，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21年起为圣西门的学生，七月革命后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国民议会议长（1848）。——43、321。

边沁，耶利米（Bentham，Jeremy 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功利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主张效用原则是社会生活的基础。——105—106、335、337、338、474—475。

波尔恩，斯蒂凡（Born，Stephan 真名西蒙·布特尔米尔希 Simon Buttermilch 1824—1898）——德国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通讯员（1848年6—8月）；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工人兄弟会组织者和领袖；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后脱离工人运动。——675。

波林—亨弗莱（Pauling & Henfrey）——英国的一家建筑公司。——461。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287、326。

波特，乔治·理查森（Porter, George Richardson 1792—185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商业副大臣（1841年起）。——105、394。

伯麦，雅科布（Böhme，Jakob 1575—1624）——德国哲学家，鞋匠，自学成才，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的代表，曾阐述一系列世界辩证发展的思想，多次被新教路德宗判为异端，禁其写作。——331。

伯西，彼得（Bussey, Peter）——英国店主，宪章派，1839年宪章派代表大会代表；1839年约克郡起义失败后脱离工人运动。——465。

勃多，尼古拉（Baudeau，Nicolas 1730—1792）——法国神父，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598。

博蒙·德·拉·蓬尼尼埃尔，古斯塔夫（Beaumont de la Bonninière，Gustave 1802—1866）——法国法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1831—1832年受法国政府派遣出访

C

D

E

F

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548、658。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231、321、341、342。

芬克男爵，弗里德里希·威廉·路德维希（Vincke, Friedrich Wilhelm Ludwig Freiherr von 1774—1844）——德国法学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国务活动家，1815年起为威斯特伐利亚省总督；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等级观点的维护者。——175。

丰克，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威廉（Funke, Georg Ludwig Wilhelm）——德国神学家和著作家，老年黑格尔派。——175。

弗格森，亚当（Ferguson, Adam 1723—1816）——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大·休谟的追随者。——619、620。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658。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14。

弗罗斯特，约翰（Frost, John 1784—1877）——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1838年起为宪章运动的拥护者；由于组织1839年威尔士的矿工起义，被判终身流放澳洲；后来被赦免并于1856年回到英国。——465。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329。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Julius]1820—1878）——德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50年为柏林《晚邮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关于住宅问题的著作；1851年为《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编辑；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253、263、265、283、286、293。

福禄培尔，尤利乌斯（Fröbel [Froe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3年底—1844年同马克思有密切联系；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

G

H

J

K

L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8、59。

里瑟尔，加布里埃尔(Riesser, Gabriel 1806—1863)——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犹太人，维护犹太人的平等权利，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最初属于中间派右翼，1848年9月起为中间派左翼。——298、300—302、313。

林德利(Lindley)——英国花边机发明者。——395。

林耐，卡尔·冯(Linné, Carl von 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植物和动物分类法的创立者；主张物种描述采用双名命名制。——88。

琉善(Lucianus[Lukianus] 约120—180)——古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7。

卢，雅克(Roux, Jacques 1752—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代表城乡最贫苦的劳动者阶层利益的“疯人派”领袖之一。——320。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658—659、668、670。

卢-拉维涅，皮埃尔·塞勒斯坦(Roux-Lavergne, Pierre-Célestin 1802—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43。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46、574。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12、61、178、179。

路斯达洛，埃利泽(Loustalot, Elysée 1762—1790)——法国政论家，雅各宾党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巴黎革命》的出版者。——288。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368。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597。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Louis-Philippe], 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138。

M

N

O

P

Q

R

S

T

W

X

Y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377。

C

参孙——圣经中古犹太人的领袖，以身强力大著称。据《士师记》记载，参孙以留发不剃而具有神力，曾徒手撕裂狮子，以一块驴腮骨击杀1 000非利士人。——426。

D

黛安娜——古罗马神话中的司狩猎和丰收的女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尔蒂米斯女神。——244。

F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243、345、529。

H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剧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9。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

K

L

M

Z

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370、703、706、707。

弗·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112、256、406。

《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载于1885年6月《新时代》(斯图加特)第3年卷第6期(England 1845 und 1885.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3. Jg. Nr. 6, Juni 1885)。——371。

《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附1886年附录和1887年序言,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87年纽约版(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with appendix written 1886, and preface 1887. Translated by Florence Kelley-Wischnewetzky. New York 1887)。——365、370。

《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附1892年版序言,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92年伦敦版(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with preface written in 1892. Translated by Florence Kelley-Wischnewetzky. London 1892)。——365、370。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载于《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伦敦版(Vorwort zur englischen Ausgabe 1892 der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 London 1892)。——365、378—379。

《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载于1844年9月18、21、25、28日和10月5、16、19日《前进报》(巴黎)第75、76、77、78、80、83和84号(Die Lage Englands. III. Die englische Constitution. In: Vorwärts. Paris. Nr. 75, 18. September 1844; Nr. 76, 21. September 1844; Nr. 77, 25. September 1844; Nr. 78, 28. September 1844; Nr. 80, 5. Oktober 1844; Nr. 83, 16. Oktober 1844; Nr.84, 19. Oktober 1844)。——10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手稿)(Die deutsche Ideologie. Manuskripte 1845—1846)。——515。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 Frankfurt a. M. 1845)。——199、536。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艾金,约·《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Aikin, J.: 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thirty to forty miles round Manchester. London 1795)。——564。

艾利生,阿·《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两卷集)1840年爱丁堡—伦敦版(Alison, A.: The principles of population, 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human happiness. In 2 vols. Edinburgh, London 1840)。——77、79、413、429、434—435、440、442。

艾利生,威·普·《关于苏格兰贫民的管理及其对大城市卫生状况的影响的考察》1840年爱丁堡版(Alison, W. P.: Observ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poor in Scotland, and its effects on the health of the great towns. Edinburgh 1840)。——413。

爱尔维修,克·阿·《论精神》(两卷集)1822年巴黎版(Helvétius, C. A.: De l'esprit. T. 1—2. Paris 1822)。——337。

爱尔维修,克·阿·《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两卷集)1775年伦敦版(Helvétius, C. A.: De l'homme, de ses facultés intellectuelles et de son éducation. T. 1—2. Londres 1775)。——333。

B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爱·比奥译自英文第3版,1833年巴黎版(Babbage, Ch.: Traité sur l'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 Trad.

de l'anglais sur la 3. éd. par Éd. Biot. Paris 1833)。——626。

包令，约·《1835年7月在下院的演说》，引自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Bowring, J.: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July 1835. Quoted from: W. Atkinson: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0)。——753—754。

包令，约·《1847年9月18日在经济学家会议的演说》，引自1847年《经济学家杂志》(巴黎)第18期(Bowring, J.: Speech at the Congress of Economists, September 18, 1847. Nach: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T. 18, Paris 1847)。——750、753。

鲍威尔，埃·《蒲鲁东》，载于1844年4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5期(Bauer, E.: Proudhon. I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H. 5, April 1844)。——258—259、262—268、271—274。

鲍威尔，布·《本省通讯》，载于1844年5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6期(Bauer, B.: Correspondenz aus der Provinz. I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H. 6, Mai 1844)。——199。

鲍威尔，布·《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Bauer, B.: 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B. 1—2. Leipzig 1841)。——48、198、305、339、341—342。

鲍威尔，布·《国家、宗教和政党》1843年莱比锡版(Bauer, B.: Staat, Religion und Parthei. Leipzig 1843)。——304、311。

鲍威尔，布·《基督教真相》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Bauer, B.: Das entdeckte Christenthum. Eine Erinnerung an das achtzehnte Jahrhundert und ein Beitrag zur Krisis des neunzehnten. Zürich, Winterthur 1843)。——198、305、338、342—343、353。

鲍威尔，布·《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载于1844年7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8期(Bauer, B.: Was ist jetzt der Gegenstand der Kritik? I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H. 8, July 1844)。——304、313—314、317—320、322—324、326。

鲍威尔，布·《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载于1845年《维干德季刊》第3卷(Bauer, B.: Charakteristik Ludwig Feuerbachs. In: 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 1845. B. 3)。——529、531、544、547、550。

鲍威尔，布·《普鲁士福音教和科学》1840年莱比锡版(Bauer, B.: Die evangelische

Landeskirche Preussens und die Wissenschaft. Leipzig 1840)。——311。

鲍威尔，布·《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阿·卢格编，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Bauer, B.: Leiden und Freuden des theologischen Bewusstseins. In: Anek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 Hrsg. von A. Ruge. B. 2. Zürich, Winterthur 1843)。——353、356—358。

鲍威尔，布·《18世纪政治、文化和启蒙的历史》1843—1845年夏洛滕堡版第1—4卷(Bauer, B.: Geschichte der Politik, Cultur und Aufklärung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B. 1—4. Charlottenburg 1843—1845)。——548。

鲍威尔，布·《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载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格·海尔维格编，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Bauer, B.: Die Fähigkeit der heutigen Juden und Christen, frei zu werden. In: 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 Hrsg. von G. Herwegh. Th. 1. Zürich, Winterthur 1843)。——21、23—25、31、47—49、53、304、306、309。

鲍威尔，布·《欣里克斯〈政治讲义〉第二卷1843年哈雷版》，载于1844年4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5期(Bauer, B.: Hinrichs, politische Vorlesungen, Zweiter Band, Halle 1843. I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H. 5, April 1844)。——294。

鲍威尔，布·《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Bauer, B.: Die Judenfrage. Braunschweig 1843)。——21、24—26、28、32、34—35、38—39、41、48—51、53、283、298—299、303—304、311、315、318。

鲍威尔，布·《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1842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Bauer, B.: 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 Zürich, Winterthur 1842)。——198、283、296、311。

贝魁尔，康·《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Pecqueur, C.: Théorie nouvelle d'économie sociale et politique, ou études sur l'organisation des sociétés. Paris 1842)。——126—127、138—139。

比雷，欧·《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两卷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Buret, E.: 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 de la nature de la misère, de son existence, de ses effets, de ses causes, et de l'insuffisance des remèdes qu'on lui a opposés jusqu'ici; avec l'indication des moyens propres

敦版(Report of the 53.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held at Southport in September 1883. London 1884)。——377。

布雷,约·弗·《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Bray, J. F.: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or, the age of might and the age of right. Leeds 1839)。——60、76。

D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路·克·《意识形态原理》第4、5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Destutt de Tracy, A.-L.-C.: Élémens d'idéologie. Pt. 4, 5: Traité de la volonté et de ses effets. Paris 1826)。——238。

迪斯累里,本·《女巫,或两种民族》(三卷集)1845年伦敦版(Disraeli, B.: 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Vol. 1—3. London 1845)。——438。

F

费尔巴哈,路·《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阿·卢格编,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Feuerbach, L.: 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rmation der Philosophie. In: Anek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 Hrsg. von A. Ruge. B. 2. Zürich, Winterthur 1843)。——66、112、194、198、289。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版(Feuerbach, L.: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41)。——201、499、503。

费尔巴哈,路·《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Feuerbach, L.: 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 Zürich, Winterthur 1843)。——112、194、198—200、213—214、294、344、549、571。

费尔巴哈,路·《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载于1845年《维干德季刊》第2卷(Feuerbach, L.: Ueber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in Beziehung auf den "Einzigen und sein Eigenthum". In: 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 B. 2. 1845)。——546—548。

费奈迭,雅·《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Venedey, J.: Preußen und Preußenthum. Mannheim 1839)。——658。

丰克,格·路·威·《地产无限制析分对土地耕种和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和由此产生的国家历史要素乃至等级制国家本身的解体》1839年汉堡—哥达版(Funke,

G. L.W.: Die aus der unbeschränkten Theilbarkeit des Grundeigenthums hervorgehenden Nachtheile hinsichtlich der Cultur des Bodens und der Bevölkerung und die hierdurch bewirkte Auflösung der historischen Elemente des Staates und somit des ständisch-organischen Staates selbst. Hamburg, Gotha 1839)。——175。

弗格森，亚·《论市民社会史》，克·弗·贝尔吉埃译，1783年巴黎版第2卷(Ferguson, A.: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civile. Ouvrage trad. de l'anglais par C. F. Bergier. T. 2. Paris 1783)。——620。

孚赫，茹·《英国热点问题》，载于1844年6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7期(Faucher, J.: Englische Tagesfragen. I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H. 7, June 1844)。——286。

孚赫，茹·《英国热点问题》(续篇)，阿什利勋爵修订，载于1844年7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8期(Faucher, J.: Englische Tagesfragen. Fortsetzung. Lord Ashley's Amendment. In: 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 H. 8, July 1844)。——286。

福禄培尔，尤·《社会政治体系》，即《新政治》一书1847年曼海姆第2版第1—2卷(Fröbel, J.: System der socialen Politik. 2. Auflage der Neuen Politik. Th. 1—2. Mannheim 1847)。——665。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傅立叶全集》第1卷)(Fourier, Ch.: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 2. éd. Paris 1841. Œuvres Complètes de Ch. Fourier T. 1)。——76。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1829年巴黎版(Fourier, Ch.: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 Paris 1829)。——76。

G

格鲁培，奥·弗·《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1842年柏林版(Gruppe, O. F.: Bruno Bauer und die akademische Lehrfreiheit. Berlin 1842)。——198。

葛德文，威·《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两卷集)1793年伦敦版(Godwin, W.: 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 In 2 vols. London 1793)。——105。

H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莱·冯·亨宁编,1833—1834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3—5卷)(Hegel, G. W. 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Hrsg. von L. von Henning. Berlin 1833—1834.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 3—5)。——112、197、341、600。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Hegel, G. W. F.: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3. Ausg. Heidelberg 1830)。——202、219、221—223、283。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卡·路·米希勒编,1833年和1836年柏林版第1—3卷(《黑格尔全集》第13—15卷)(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rsg. von K . L. Michelet. B. 1—3. Berlin 1833 u. 1836.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 13—15)。——336。

黑格尔,乔·威·弗·《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7卷)(Hegel. G. W. F.: 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Berlin 1842.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 7)。——195。

霍尔巴赫,保·昂·迪·《社会体系,或道德和政治的自然原则》1822年巴黎版第1—2卷(d'Holbach, P. H. D.: Système social, ou principes naturels de la morale et de la politique… T. 1—2. Paris 1822)。——337。

霍尔巴赫,保·昂·迪·《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1770年伦敦版第1—2卷(d'Holbach, P. H. D.: Système de la nature, ou des loix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 Par M. Mirabaud. Pt. 1—2. Londres 1770)。——334。

J

加斯克尔,彼·《英国的工业人口,他们的道德、社会和身体的状况以及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附童工劳动调查》1833年伦敦版(Gaskell, P.: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 its moral, 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the change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the use of steam machinery. With an examination of infant labour. London 1833)。——416、445。

K

L

李斯特，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List, F.: 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 1. 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 die Handelspolitik und der deutsche Zollverein. Stuttgart, Tübingen 1841）。——59。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 J. J.: Du contrac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Amsterdam 1762）。——573—574。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82年伦敦版（Rousseau, J. J.: Du contrac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Londres 1782）。——46。

《论爱尔兰及大不列颠的农业及农业居民的状况》1840年维也纳—巴黎版。引自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两卷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De l'agriculture et de la condition des agriculteurs en Irlande et dans la Grande Bretagne. Vienne, Paris 1840. Extraits des enquêtes et des pièces officielles publiées en Angleterre par le parlement, depuis l'année 1833 jusqu' à ce jour.Vol. 1. Nach: E. Buret: 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 de la nature de la misère, de son existence, de ses effets, de ses causes, et de l'insuffisance des remèdes qu'on lui a opposés jusqu'ici; avec l'indication des moyens propres à en affranchir les sociétés. T. 1. 2. T. 1. Paris 1840）。——127。

罗比耐，让·巴·《自然论》1763—1766年阿姆斯特丹新版第1—4卷（Robinet, J. B.: De la nature, Nouv. éd. T. 1—4. Amsterdam 1763—1766）。——334。

罗伯斯比尔，马·《在1794年2月5日（雨月17日）会议上，以救国委员会名义所作的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管理共和国内部行政事务的政治伦理原则的报告》，载于P. J. B. 比歇/P. C. 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史或1789—1815年国民议会公报》1837年巴黎版第31卷（Robespierre, M.: Rapport sur les principes de morale politique qui doivent guide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dans l'administration intérieure de la République, fait au nom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à la séance du 5 février 〈17 pluviôse〉 1794. In: P. J. B. Buchez/P. C. Roux: 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u Journal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 depuis 1789 jusqu'en 1815. T. 31. Paris 1837）。——323。

罗西，佩·《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1837年讲授（包括巴黎版的两卷内容）》，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Rossi, P.: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Année 1836—1837. Contenant les deux volumes de l'édition de Paris. In: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Bruxelles 1843)。第1版1840—1841年在巴黎分两卷出版。——636。

洛克，约·《人类理智论》(四卷集)1690年伦敦版(Locke, J.: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In four books. London 1690)。——330、332。

M

马尔库斯《论限制人口增长的可能性》1838年伦敦版。引自托·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Marcus: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miting populousness. London 1838. Nach: Th. Carlyle: Chartism. London 1840)。——79。

马尔萨斯，托·罗·《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观点》1798年伦敦版(Malthus, Th.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London 1798)。——80。

马尔萨斯，托·罗·《人口原理，或人口过去和现在对人类幸福的影响》(两卷集)1826年伦敦第6版(Malthus, Th.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or, a view of its past and present effects on human happiness. 6. ed. In 2 vols. London 1826)。——80、82、485。

闵采尔，托·《为反驳维滕贝格的不信神、生活安逸、以歪曲方式剽窃圣经从而使可怜的基督教惨遭玷污的人而作的立论充分的抗辩和答复》1524年纽伦堡版。引自莱·兰克《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1839年柏林版第2卷(Müntzer, Th.: Hoch verursachte Schutzrede vnd antwwort wider das Gaistloße Sanfft lebende fleysch zu Wittenberg welches mit verkärter weyße durch den Diepstal der heiligen schrift die erbermdliche Christenheit also gatz jämerlichen besudelt hat. Nürnberg 1524. Nach: L. Ranke: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B. 2. Berlin 1839)。——52。

默泽，尤·《爱国主义的幻想》(四卷集)，他的女儿J. W. J. 冯·福格特(父姓默泽)编，1820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3卷(Möser, J.: Patriotische Phantasien. Hrsg. von seiner Tochter J. W. J. v. Voigt, geb. Möser. 4. verb. Aufl. Th. 1—4. Th. 3. Berlin 1820)。——175。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雅·泰·帕里佐译自英文，1823年巴黎版(Mill, J.:

P

S

ou pauvre. Paris, Genève 1840)。——579。

舍伐利埃,米·《论法国的物质利益》1839年巴黎第4版(Chevalier, M.: Des intérêts matériels en France. Travaux publics. Routes. Canaux. Chemins de fer. 4. éd. Paris 1839)。——229。

圣茹斯特,路·《关于普遍警察制的报告。1794年4月15日(芽月26日)》,载于P. J. B. 比歇/P. C. 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史或1789—1815年国民议会公报》1837年巴黎版第32卷 (Saint-Just, L.: Rapport sur la police générale. Du 26 germinal an 2〈15 avril 1794〉. In: P. J. B. Buchez/P. C. Roux: 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u Journal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 depuis 1789 jusqu'en 1815. T. 32. Paris 1837)。——322、323。

圣茹斯特,路·《以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的名义所作的报告。1794年3月31日(芽月11日)于国民公会》,载于P. J. B. 比歇/P. C. 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史或1789—1815年国民议会公报》1837年巴黎版第32卷(Saint-Just, L.: Au Nom des comités de salut public et de sûreté générale. Convention nationale. Séance du 31 mars〈11 germinal〉1794. In: P. J. B. Buchez/P. C. Roux: 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ou Journal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 depuis 1789 jusqu'en 1815. T. 32. Paris 1837)。——322、323。

圣西门,昂·《实业家问答》1823—1824年巴黎版(Saint-Simon, H.: Catechisme des industriels. Paris 1823—1824)。——183。

施蒂纳,麦·《施蒂纳的评论者》,载于1845年《维干德季刊》第3卷(Stirner, M.: Recensenten Stirners. In: 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 B. 3. 1845)。——575。

施蒂纳,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Stirner, M.: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 Leipzig 1845)。——544、547、569、575。

施特劳斯,大·弗·《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年蒂宾根—斯图加特版第1—2卷(Strauß, D. F.: Die christliche Glaubenslehr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und im Kampfe mit der modernen Wissenschaft. B. 1—2. Tübingen, Stuttgart 1840—1841)。——197—198。

施特劳斯,大·弗·《评述和批判。神学、人类学和美学方面的轶文集》1839年莱比锡版(Strauß, D. F.: Charakteristiken und Kritiken. Eine Sammlung zerstreuter Aufsätze aus den Gebieten der Theologie, Anthropologie und Aesthetik. Leipzig 1839)。——197—198。

施特劳斯,大·弗·《为我的著作〈耶稣传〉辩护和关于评述现代神学特性的论争

文集》1837年蒂宾根版第1—3册(Strauß, D. F.: Streitschriften zur Vertheidigung meiner Schrift über das Leben Jesu und zur Charakteristik der gegenwärtigen Theologie. H. 1—3. Tübingen 1837)。——197—198。

施特劳斯,大·弗·《耶稣传》(校勘本)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Strauß, D. F.: Das Leben Jesu. Kritisch bearbeitet. B. 1. 2. Tübingen 1835—1836)。——48、197。

施特劳斯,大·弗·《耶稣传》1840年蒂宾根第4版第1—2卷(Strauß, D. F.: Das Leben Jesu. 4. Aufl. B. 1. 2. Tübingen 1840)。——474。

舒尔茨,威·《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Schulz, W.: 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s und der Gesellschaft. Zürich, Winterthur 1843)。——124—126、137—138、141。

斯卡尔培克,弗·《社会财富的理论。附政治经济学参考书目》(两卷集)1829年巴黎版第1卷(Skarbek, F.: Théorie des richesses sociales. Suivie d'une bibliographi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1. 2. T. 1. Paris 1829)。——239。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两卷集)1776年伦敦版(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2 vols. London 1776)。——58、105、270、565。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五卷集),热·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注释和评述,1802年巴黎版(Smith, A.: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Trad. Nouv., avec des notes et observations; par G. Garnier. T. 1—5. Paris 1802)。——119、121、130—137、140—146、148—149、237—238。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四卷集),附约·拉·麦克库洛赫写的作者传记、序言、注释和补充论述,1828年爱丁堡版(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an introductory discourse, notes, and supplemental dissertations. By J. R. MacCulloch. Vol. 1—4. Edinburgh 1828)。——61、67—70、72、74、432。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五卷集)1789年巴黎版第2卷(Steuart, J.: Recherche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ou

essai sur la science de la police intérieure des nations libres. T. 1—5. T. 2. Paris 1789)。第1版1767年在伦敦出版。——637—638。

苏,欧·《巴黎的秘密》(十一卷集)1842—1844年布鲁塞尔版(Sue, E.: Les mystères de Paris. Vol. 1—11. Bruxelles 1842—1844)。——276。

T

汤普森,托·佩·《真正的地租理论,驳李嘉图先生等》,载于汤普森《政治习作及其他》1842年伦敦版第4卷(Thompson, Th. P.: The true theory of rent, in opposition to Mr. Ricardo and others. Being an exposition of fallacies on rent, tithes, &c. In the form of a review of Mr. Mill's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9. e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by Ridgway, 18 Dec. 1826. In: Thompson: Exercise's: political and others. Vol. 4. London 1842)。——68。

汤普森,威·托·《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Thompson, W. Th.: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applied to the newly proposed system of voluntary equality of wealth. London 1824)。——60、76。

托克维尔,亚·德·《美国的民主制》(两卷集)1835年巴黎第2版第2卷(Tocqueville, A. d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L'un des auteurs du liver intitulé: 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x États-Unis. 2. éd. T.1. 2. T. 2. Paris 1835)。——27。

W

瓦茨,约·《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科学原则述评,去伪存真》1842年曼彻斯特—伦敦版(Watts, J.: The facts and fic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 being a re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science, separating the true from the false. Manchester, London 1842)。——60、76、83。

威德,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Wade, J.: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With a popular exposition of th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past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industrious orders. Also an appendix. 3. ed. London 1835)。第1版1833年在伦敦出版。——74、84、421。

维尔纽夫-巴尔热蒙,让·保·阿·《政治经济学的历史》1839年布鲁塞尔版

X

Y

1. Bruxelles 1836)。——628—629、754。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修订第2版(Ure, A.: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2. ed., corr. London 1835)。——85—86、435、459。

法律、法令、文件

B

《宾夕法尼亚宪法》，载于古·德·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835年巴黎版第2卷(Constitution de Pennsylvanie. In: G. de Beaumont: Marie ou l'esclavage aux États-Unis, tableau de mœurs américaines; l'un des auteurs de l'ouvrage intitulé: 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x états-Unis. T. 2. Paris 1835)。——39。

D

《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地区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两卷集)1844年伦敦版(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State of Large Towns and Populous Districts. In 2 vols. London 1844)。——419。

F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5年8月22日(果月五日)。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载于《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P.-A. 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J. 加代编，1821年巴黎版第1卷(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Proposé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5. fructidor an III, 22 août 1795.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et des devoir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 In: Collection des constitutions, chartes et lois fondamentales des peuples de l'Europe et des deux Amériques; avec des précis offrant de l'histoire des libertés et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 chez les nations modernes; et une Table alphabétique raisonnée des matières; par P.-A. Dufau, J.-B. Duvergier et. J. Guadet. T. 1—6. T. 1. Paris 1821)。——41—42。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5年8月22日(果月5日)。宪

G

H

J

《济贫法委员会委员所获得的情报资料摘要》——见《皇家委员会委员所获得的有关济贫法的管理和实施的情报资料摘要》。

K

《矿山、煤矿以及雇有大批不受工厂管理法保护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的行业和工厂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1842年第1号报告；1843年第2号报告》(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in mines and collieries and in the trades and manufactures in which numbers of them work together, not being includ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Factories' Regulation Act. First report, 1842; second report, 1843)。——418、424—427。

R

《人民宪章》1838年伦敦版(The People's Charter. Being the outline of an act to provide for the just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Commons' House of Parliament, embracing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 suffrage, no property qualification, annual parliaments, equal representation, payment of members, and vote by ballot. London 1838)。——95、372、463、467。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3年》——见《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3年6月24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T

《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见《矿山、煤矿以及雇有大批不受工厂管理法保护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的行业和工厂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1842年第1号报告，1843年第2号报告》。

X

《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3年6月24日。共和国宪法》，载于《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P.-A.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J.加代编，1821年巴黎版第1卷(Acte constitutionnel. Présenté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24 juin 1793. Acte constitutionnel. De la République. In: Collection des constitutions, chartes et

文学著作

Q

S

T

X

报刊索引

B

C

D

F

G

《工匠》(The Artizan)——英国的一家月刊，建筑工程师的机关报，1843—1873年在伦敦出版。——411、421。

《公益》(The Commonweal)——英国的一家周刊，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1885—1891年和1893—1894年在伦敦出版；1885—1886年曾刊登过恩格斯的一些文章。——371。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469。

H

《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 Journal des intérêt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见《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

L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见《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304。

M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最初为周报，后改为每周出两次，1855年起改为日报。——418—419、445、479。

《每周纪事报》(The Weekly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周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1836—1865年在伦敦出版。——469。

S

T

W

名目索引

C

H

M

R

S

T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
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

首席专家　韦建桦

主要成员　顾锦屏　王学东　李其庆　周亮勋
　　　　　　王锡君　蒋仁祥　胡永钦　翟民刚
　　　　　　章丽莉　张钟朴　冯文光　柴方国

第一卷编审人员

文献选辑和编纂

韦建桦　顾锦屏　李其庆　周亮勋
王锡君　蒋仁祥　胡永钦　章丽莉
张钟朴　冯文光　柴方国

译文审核和修订

韦建桦　顾锦屏　柴方国　徐　洋

题注和说明

韦建桦　顾锦屏　王学东　柴方国

资料审核和修订

章丽莉　王栋华　胡永钦　蒋仁祥
章　林　徐　洋　刘洪涛　沈　延
单志澄　李　楠　张凤凤　张红山
朱　毅　周泓利

全卷译文和资料审定

韦建桦